出版者的话

哈里·杜鲁门于1945年1月任美国总统，同年罗斯福逝世后继任美国总统。本书是杜鲁门自1945年4月12日就任总统至1953年1月卸任这一时期的回忆录，主要记述当时重大国际和国内事件以及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有关政策、措施和活动。作者以较大的篇幅叙述了他在任期中分裂德国、占领日本、干涉中国内政、扶植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提出并实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等方面的作用。

作者的叙述是片面的、虚伪的、反动的，但是也暴露了美帝国主义企图窃取各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果实、在全世界进行侵略扩张的一些情况。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反动本质及其重要措施，我们将本书翻译出版，以供参考。

本书分两卷，第一卷《决定性的一年》，叙述的时间从1945年4月到1945年底；第二卷《考验和希望的年代》，叙述的时间从1946年到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上台止。

中译本根据英国霍德与斯托顿公司1956年版本译出。第二卷基本上照原文译出。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只删去了原书第三十章《海底石油》和其他章节有关生活琐事的叙述部分。

1965年1月
目录

第一章  控制原子能 .................................................. 1
第二章  题目和计划 ............................................... 19
第三章  第一个预算 ............................................... 36
第四章  国防和情报 ............................................... 58
第五章  马歇尔在中国的使命 .................................. 70
第六章  俄国人在中国 ........................................... 86
第七章  援助希腊和土耳其 ...................................... 105
第八章  马歇尔计划 .............................................. 125
第九章  柏林的封锁 .............................................. 137
第十章  巴勒斯坦问题 ........................................... 151
第十一章  巴勒斯坦的分裂 ..................................... 164
第十二章  以色列的诞生 ......................................... 179
第十三章  再次参加竞选 ......................................... 197
第十四章  费拉提尔费亚代表大会 ............................. 218
第十五章  竞选运动和胜利 ..................................... 241
第十六章  第四点计划 ........................................... 264
第十七章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 280
第十八章  美国农业计划 ......................................... 306
第十九章  共产党的颠覆活动和政治迫害行为 .............. 314
第二十章  氯弹 ................................................... 343
第二十一章  三八线 .............................................. 369
第二十二章  朝鲜受到侵略 ..................................... 386
第二十三章 在威克岛与麦克阿瑟的会面 ........................................... 408
第二十四章 共产党中国的干涉 ...................................................... 435
第二十五章 艾德礼首相在华盛顿 ................................................. 462
第二十六章 朝鲜的危机 ............................................................ 484
第二十七章 麦克阿瑟将军的召回 .................................................. 505
第二十八章 朝鲜停战谈判 ............................................................ 528
第二十九章 钢铁危机 ................................................................. 544
第三十章 1952年的总统选举 ....................................................... 561
第三十一章 政权移交艾森豪威尔 .................................................. 580
第一章
控制原子能

在最初几个月里，我发现一个人当了总统就好象骑上了老虎背。他必须一直骑下去，不然就会被老虎吞掉。1945年繁忙得出奇的九个月教导我：一个总统要经常驾驭局势，如果踌躇不决，局势一定会反过来驾驭他。我自始至终没有感觉到我可以偷闲片刻。

没有担任过总统职务的人，决不能真正了解当总统的滋味，即使是总统的最亲密的助手或家属，也不能真正了解。缠在他身上的职责的链条是没有尽头的，人们决不会让他忘记他是个总统。我相信人性的善远远超过它的恶，而政府的任务就是发扬人性的善；在1945年就是这种信念促使我一直往前走。

我生性不善于突然地或轻易地作出决定，无论在决定以前，我需要尽可能地掌握一切材料和情况。不过，一旦做了决定，我就不再操心了。我曾经训练自己在历史中寻找先例，因为我常常本能地在历史中寻找我要做决定的结局。这就是我常常翻来复去地阅读历史的原因。一个总统必须应付的问题大多数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在上两次残酷的战争中，我们看到极权主义侵略者被打得无条件投降。现在，战争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倡议并致力于建立了联合国组织，希望能防止使人类遭受无穷灾难的战争。我曾经在波茨坦会晤丘吉尔、艾德礼和斯大林，努力促使三大国更密切地合作。

但是，尽管我再三努力，同俄国还是越来越难以相处。胜利已经把一个难以对付的战时同盟者变成了一个更加麻烦的和平时期
的伙伴。俄国为了达到帝国主义的目的，似乎意要利用那些被
战争打的支离破碎的邻邦。在远东，国际力量的均势整个起了变
化。欧洲大多数国家破产，千百万人民流离失所，忍饥挨饿，只有
我們国家能够去帮助他們。我們已经采取了一些紧急的救济措施，
还准备尽一切力量设法防止人类的浩劫。

我們現在负荷的經濟和財政重担压得我們步履蹒跚。从战争
时期转到和平时期的调整工作即将完成，我們进行得既周密又有
秩序。我們的经济一直在十分顺利地发展，在几百万军队陆续复
员的情况下，还做到了和平时期的充分就业。我們正亲眼看到美
国在变成一个空前强大而且蒸蒸日上的国家。

但是，1945 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大得使我們同全世界
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到现在，
我們还不能完全了解这件事的后果、結局和問題。这就是原子弹。
随之而来的是如何控制核子能的秘密。我們的职责是历史上空
前未有的。在利用和控制原子能的问题上，我們必须作的决定和要
向国会提出政策很可能影响文明的未来发展。这将是希望和严
重考验的时期开端。

关于控制原子能的議案已經提交国会。那就是在日本投降日
过去后不久就的梅—約翰逊議案，它提出了軍事方式的解决途
徑。它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永久性的“曼哈顿区”，由軍事部门控制。

在 10 月 3 日送交国会的咨文中，我十分强调和平时期利用原
子能的问题，为了这个理由，我們觉得原子能不应当由軍事部門控
制。1945 年秋天，參議院各委员会在有关原子能的議案由誰处理
适宜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致使立法程序被拖延了下来。这爭
論的基本分歧点是；这种新的力量究竟是专一一种軍事武器，还是一
种和平建设的潜在动力资源。

參議院成立原子能特别委员会以后，这爭立法爭論终于得到
了解决。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布里恩·麦克马洪，一个忠诚而有天才的公仆，在制定原子能计划的立法工作中，他的领导作用值得大大表扬。

11月30日，我送给掌管原子能计划的几个官员一份备忘录，说明我认为梅一约翰逊议案应当修正，应使民用占优势，同时我向参议员麦克马洪指出由文官控制的必要性。麦克马洪同意设法修改议案。然而，几天以后，他提出一个议案，建议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也参加原子能特别委员会。军事部门强烈地感觉到控制原子能的发展事宜如果不归他们直接管辖，也应当由他们主持，他们正强硬地向国会提议这样作。

12月4日，在我的办公室举行会议。除了派特逊、福莱斯特尔和参议员麦克马洪以外，格罗夫斯将军也在场，还有度量衡局长爱德华·康登博士和原子能委员会顾问詹姆斯·纽曼。

我请他们每个人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我表明我的态度。我觉得整个计划及其执行应当由文官控制，政府应当垄断原料、设备和生产过程。

12月20日参议员麦克马洪提出参议院第一七一七号议案，实质上，这个议案就包括这个解决办法。12月27日派特逊部长提出一份备忘录，说明他的看法和他的一些反对麦克马洪议案的顾问们的看法。我十分仔细地加以研究以后，在1月23日答复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我提出这份备忘录，坚持由文官控制。

“陆军部长在12月27日提出的备忘录说明他和临时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对我的关于梅一约翰逊议案的特别修正案的建议的看法。

“经过仔细考虑以后，我断定11月30日我的备忘录中的建议应当坚持，不加修改。

“我请你们注意下面特别重要的几项；
“（一）国会为控制原子能成立的委员会应当完全由文官组成。这既符合美国现有的传统，也有法律根据，我国法律明白地禁止武装部队现役人员在政府部门担任其他职位。惟一约翰逊法案的这些条款需要修改。依我的判断，原子能问题也没有理由违背法律。

“我同意在国家危急的时候，可能需要武装部队人员在政府部门担任一些特别适合他们的经验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国会可以像过去一样，通过特别的授权立法。不过，我相信这是一种非常措施，只有在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要求这样做的时候，国会才会采取。

“（二）在我看来，一切分裂性物质的占有、生产和处理都由政府实行绝对的垄断是必要的。当然，分裂性物质同可以产生分裂性物质的原料是要区别开的。所谓分裂性物质，我指的是铀 235、钚或者含有铀 235 和钚的任何物质。

“我承认，对分裂性物质实行严格的控制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些困难。但是，这种困难同由政府垄断在应付国际问题时的好处比较起来，或者同允许私人拥有或生产这些关系重大的物质的危险比较起来，那是很小的。这些物质的应用是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安全的。原子能应当为人民造福，应当尽可能广泛地为人民服务。只有由政府垄断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原子能为社会谋福利。

“（三）我坚持这些原则，并认为必须给私人充分机会享受原子能方面的各种发明的专利权，必须调整特许权使用费，使之公平合理。这些条款将保证原子能广泛地为公众服务，同时保留特许权的鼓励形式，以维持私营企业的利益。

“虽然我只谈谈 11 月 30 日我的备忘录中的三个要点，不过，我认为备忘录中的各项建议都有必要坚持。

“应当通知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众议院的领袖们说明政
府希望重新提出梅—約翰逊議案以便予以修正，如不能，就不要在众議院改变该議案的現状。

“我还希望，政府官員們在国会各委员会里或者在同国会議員們討論有关原子能立法的時候，不要发表同我 11 月 30 日的备忘录中提出的并在这里加以重申的各点相矛盾的意见。

“哈·杜”

由文官控制原子能的議案碰到許多困难。提議由軍事部門控制的人在国会中有許多朋友，參議員麦克馬洪要使人们支持他的措施真是煞費了苦心。2 月 1 日，他差不多花了两个钟头同我在白宫讨论他的困难。

为了公开支持參議員麦克馬洪的議案，我給他写了这封信，并拿出去公开发表；

“亲爱的參議員麦克馬洪：

“你征求我对参議院一七一七号議案，即有关国内发展和控制原子能的議案的意见。我願意在这时把我的想法告訴你，因为我认为，不论是从我們国家的福利的角度，还是从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极端重要而且迫切的问题。

“我很赞同你們委員会在审议原子能问题的意见时那種仔细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我相信，这种符合民主传统的审议已經帮助人民对这样的立法要碰到的问题获得比較透彻的了解。

“你会記得我在 1945 年 10 月 8 日向国会提出了一項特别咨文，呼吁通過立法来确定国内控制原子能的政策。从那以后，我用了相当多的时间来进一步研究这个极端困难的問題。另外，我还研究了一些技术情报和人們在审议会上所发表的意见。因此，我觉得我已经考虑成熟，可以比过去较为詳細地提出我认为正确的
原子能立法所必不可少的内容：

（这封信紧接着前面谈到的致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的备忘录中的三点意见，三点的次序和先后一样，词句也几乎一样。信中接着写道：）

“（四）我在10月8日的信文中曾经写道，

‘我们科学和工业之所以发达，根源在于我国所特有的自由研究的精神和自由企业的精神。……（这）是保持科学和工业的卓越地位的最好保证。而科学和工业正是我们民族幸福的依靠。’

‘这方面的立法必须保证独立进行研究的真正自由，必须保证对传播情报的控制不致于阻碍科学的进步。

‘原子能立法还应保证原子能委员会的研究工作和现在国会设立的全国科学基金会的研究工作两者互相配合。

‘（五）上述有关我国控制原子能的条款，每一条都大可促进国际上达成一种安全有效的协议，使原子能的利用最终只限于和平和人道的目的。原子能委员会应当有办法立即执行关于观察和监督分裂性物质的生产、情报的传播和此类国际活动地区的任何国际协定。

‘我觉得以最快的速度制订我国有关原子能的正确立法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国内和国际上的一些头等重要的问题都决定于这一行动。

‘历史上荣誉的地位正在向你们委员会——为我国人民和全世界造福无穷的立法的首倡者招手。

‘忠诚的，

“哈里·杜鲁门

“1946年2月1日”
关于制定国际上控制原子能的计划问题，已在同…时间提交
山国务卿保尔纳斯指定的一个特别的政府委员会。

1 月 14 日的国際文書肯定了我国通过联合国组织发 展 有 效的控制的希望。我国参加 1 月间在伦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二次
正式会议的代表团受命设法在联合国成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
这是履行上月在莫斯科所达成的协议。

英国人，当时是主人，向大会提出了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的计划，
这个计划得到我国代表团的全力支持，于 1 月 26 日获得通过。大会同意这个新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于 1946 年 6 月 14 日在纽约
举行。

当联合国正在考虑成立一个机构来讨论控制原子能问题的时
候，国务卿指定的委员会已订出一个控制原子能的计划，这个计划
可以在联合国的原子能委员会开会时向它提出。

这个委员会有五个委员，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任主席，和他
一起工作的前陆军部长助理约翰・麦克洛伊，还有同发展炸弹
关系最直接的三个人：范尼尔・布希博士、詹姆斯・康南特博士
和莱斯利・格罗夫斯少将。

有一个顾问团同这个委员会合作并为它服务，顾问团的任务
是分析和鉴定一切有关国际控制问题的事实，并提出建议。顾问
团的主席是田纳西工程管理局的主席戴維・李道塞尔。团成员有：
新泽西电话公司总经理切斯特・巴纳德，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
蒙山多化学公司副经理兼技术指导查尔斯・托马斯博士和通用电
气公司副经理哈里・温。

这个顾问团工作得很出色。它透彻而细致地研究了问题的各
个方面。它的报告得到上级委员会的一致通过。这就是人们常提
到的艾奇逊—李道塞尔报告，它是一份重要的政治文献。
3月21日，我从国务卿贝尔纳斯那里得到这份报告。那时候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这些事情对控制原子能的问题有一定的影响。

3月8日，参议员麦克马洪到白宫来报告，说他提出的原子能议案即将遭到新的困难。参议员范登堡将对这个议案提出一项修正案，修正案提出要成立一个军事联络局；实际上，这个联络局和建议成立的国际原子能委员会是重复的。它可以先于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了解一切事情，它有权在它所选择的任何时候坚持同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商量事情，它有权将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采取的认为“影响国防”的任何行动提请总统注意。

3月12日，参议院原子能委员会通过了这项修正案，参议员中只有麦克马洪一人投票反对。第二天，同样多的人投票通过了一篇略经修改的说明书，投票反对的也只有麦克马洪一人。

这项修正案将会取消文官至上的原则。按照这项修正案，军事部门有权否决原子能委员会的工作。军事部门要求这种否决权的理由是：维护国家安全首先是武装部队的任务。但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防是一种有系统的关和政府各部门的职责，而交给军事部门的只是它的许多方面中的一面。

3月1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我就这一点发表谈话说：

“我不认为一般公众甚至国会人士都清楚地了解由文官控制这个委员会的含意。我曾经努力在2月2日的信中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我的意见是这样：军事部门当然要起重要的作用，应当同它商量；但如果认为只有军事部门能够保卫国家的安全，那就错了。直接对总统负责的文官组织应当担负平衡地大力发展原子能的全部责任，以利于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国家的安全、以及保持对其他国家和世界和平的坚定明确的立场。现在，总统首先是美
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他所直接管辖下的文官委员会，决不会妨碍武装部队的正常职务。

3月16日我同国务卿贝尔纳斯议论国会是否会通过一项原子能法。他宣称我们在原子能方面促进国际合作所进行的努力，我们应当设法将我们关于国际控制的计划提交联合国，而不受国内法律的妨碍，以致我们不可能参加这个管制。

贝尔纳斯对我说，委员会准备随时提出报告。他建议我们提出一个在国内外都有威望的发言人。在我看来，伯纳德·巴鲁克这人正合适。理由有好几个。其中之一便是巴鲁克在参议院里很受人尊重，而这不是毫无根据的。他同政府控制原子能的计划的关系可能有助于消除国会中反对麦克马洪议案的一些意见。近几年来，巴鲁克在国外建立了许多友谊，包括同丘吉尔的友谊。而且，他老早就享有“政界元老”的声誉。我去拜访他，希望他还会给我们向全世界提出的建议增加份量。

3月18日，宣布了对巴鲁克的任命，报界的反映很好。当天，我和国会“四大巨头”会晤的每例例会完全用来讨论麦克马洪议案。我说明了当初制订这个议案的理由，并且说我是不会同意任何不受文官控制的法律的。

贝尔纳斯给我带来艾奇逊—李德塞尔报告的最后草案，我立刻坐下来研究。然而，这份报告通过非官方的途径落入报界之手。它使巴鲁克很不安，他要求见我。他来了，交给我一封信，

“亲爱的总统先生：”

“您这样信任我，任命我为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代表，这在我当然是十分感激的。我既不低估这个荣誉，也不低估这个责任；不过，在我把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以后，有一些事情使我感到忧虑，所以，我想同您讨论一下这些事情。据我的理解，我的
和权力现在只是直接或者通过国务卿按照您的指示在联合国组织内执行美国关于原子能的政策。我看不出我有什么参与制定政策的责任或职责。

“艾奇逊先生领导的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在报纸上发表以后，我不不得不注意这种情况。我没有低估发表这个报告在美国和在全世界的影响；在我还未能仔细研究这份报告以前，我不能表示我个人对它的具体意见，国务卿贝尔纳斯给我这份报告的印象；副国务卿领导的委员会一致同意这份报告。这就使这份报告十分接近美国政府的政策的范畴。

我知道一般公众认为我将同决定我们的原子能政策的工作发生密切的联系。这种看法没有法律基础，现在副国务卿领导的委员会的报告已经发表，它的内容将大大影响政策的决定。虽然前几天我只能粗略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但已相信这份报告将成为人们议论纷纷争辩不休的题目。这份报告的发表（我知道是经过官方批准的）并不会有减轻局势的困难。

“就是这些事情使我感到烦恼，我想在我自己还没有最后肯定在这种局势下我能不能对您有用之前，先和您谈谈这些事。我需要多一点时间来考虑。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您能通知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并决定我的任命的任何行动推迟一些时候，等我有更多一点时间把事情考虑一番再说，这样就可以避免各方面的困难。

“尊敬您的，

“伯纳德·法·巴鲁克

“1946年3月26日”

我首先向巴鲁克先生解释：艾奇逊的报告明显地表明是一份工作草案，不是经过批准的政策文件。我还告诉他说，要他在联合
国内执行的政策都将是经过我批准的。我指出，依照法律，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要受国务卿的监督。我告诉他，当然，国务卿可能会要求他帮助草拟政策的建议，供我批准，不过我不打算给他担任不同于驻联合国的其他代表的任务。

巴鲁克先生接着去看国务卿贝尔纳斯。贝尔纳斯后来告诉我，他给巴鲁克一封信概述他的职责。

“亲爱的伯・姆：

“我在总结了4月18日我们讨论的问题以后（当时汉考克先生和塞耳先生也参加了讨论），已经请你帮忙在我同总统决定美国的政策的时候给我一些建议，你代表美国出席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将以这项政策为指针。

“你说依照法令你不必参与政策的决定。事实上，依照法律，政策由总统决定，而经过我传达给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代表。不过，我知道实际上总统在决定政策时一定会征求我的意见，而我呢，也会征求你的意见。这就是我要求你充分研究这个问题的原因。

“我已经告诉你，我很满意在艾奇逊先生领导下准备的报告，人们已经叫这份报告为国务院的报告。不过，我告诉你，我并不认为它就是这个问题的结论。相反地，你在考虑这个问题以后提出的任何意见，我都将予以仔细的考虑。

“我已经建议，你陈述意见应当不拘形式。我希望你在研究的过程中随时给我提意见。我这样提出建议，是因为我随时都可能被叫去同总统讨论这件事。我愿意同他，或同你一起向他提出我们认为对他考虑这个问题有帮助的任何意见。

“不必作正式报告。决定政策的是总统。你和我可以向他提出建议，正如我在其他许多问题上向他提建议一样。决定政策是
总统的责任：我认为决定以后不应当就由他公开，而应当传达给你，作为美国的代表，应当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会议上宣布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什么。不过，这将留待总统去决定。

“一旦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开始工作，你就要和国务卿密切合作。预料不到的事情将会发生，对待这样的一切事情，你必须谨慎地运用你的判断力，主要是避免采取同总统的政策矛盾的立场。

“我相信你在这些事情上不会有什么困难。你的行动对我负责，就像我的行动对总统负责一样。我知道他的基本政策是什么。掌握了基本政策，对待预料不到的事情应当采取什么立场我就不会犹豫不决。如果遇到十分重大的事情，我就设法向他请示。我们在看法上的分歧没有一次不是很快就消除的。我敢肯定你和他也会这样。

“如果你需要国务院的帮助，我敢保证国务院毫无问题会支持你的。万一发生问题，你可以凭这封信要求国务院的官员帮助你。

“我打算在星期二的早晨离开华盛顿。祝你运气好！

“你的忠实的，

“詹姆斯·贝尔纳斯

“1946年4月19日”

巴鲁克，一向被称为“总统的顾问”，当然充分了解总统对国家政策的职责。在我看来，他所顾虑的实际上是他会不会得到公众的承认。他从来就很重视他的意见和建议（有些并不是总统要求他提的）是否被公布出来。大多数的总统所接受的意见总是比他们可能采用的多。不过，据我了解，现在还只有巴鲁克一个人由他自己建立了非官方的“顾问”的声誉。

我要求他按照我所选定的职责范围协助政府。我并不打算要
他告诉我他的任务应当是什么。我很客气地把这一点向他说明，贝尔纳斯也是这样做过的，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来。

巴鲁克先生对原子能计划的主要贡献是他把艾奇逊—李连塞报告从一份工作报告变成了一份正式的系统的建议，他并且增添了三条：建议给违反规定的任何国家以制裁。6月14日，巴鲁克把美国的计划提交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大约数小时以后，事实表明，苏联另有它的一份建议，而这份建议同美国的意见恰恰针锋相对。

在以后的一个月里，巴鲁克和他的同事们，特别是约翰·汉考克、菲迪南德·艾伯斯塔特和理查德·托里曼博士，把美国的详细计划提交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成立的几个委员会。俄国和波兰的反对是很明显的。实际上，俄国人所希望的计划是，各国达成协议，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停止原子弹的生产，并销毁储存的全部原子弹。这等于要求我们销毁我们的原子弹，如果我们将同意这一切，俄国人才愿意讨论交换科学情报和设立国际监督的问题。

我们的计划建议对能够产生裂变性物质的原料实行直接的监督。只有在建立了这种监督以后，我们才能考虑处置我们储存的炸弹。

如果我们将接受俄国的立场，我们就会被剥夺一切，而所得到的只是他们答应接受监督的诺言。这样一来，一旦俄国人发动原子军备竞赛，我们现在因原子能方面的发现和创造而获得的优势和安全就会丧失。正如我在7月10日写信给巴鲁克所说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当扔掉我们的枪杆，除非我们能够肯定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能武装起来反对我们。”

尽管波兰和俄国反对，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后来还是通过了实质上就是美国的计划。委员会的报告送到了安全理事会。在安全理事会里，俄国仗着否决权，能够阻挡以后的一切行动。
俄国可能不顾就国际监督计划进行合作是我们意料中的事。我们准备在任何情况下保卫我们自己的民族利益。

这时候，英国人对麦克马洪议案表示忧虑。他们说这个议案使他们没有机会分享我们的知识和技术以及他们在战时我们所获得的利益。我国驻伦敦大使阿弗里尔・哈里曼报告我说，艾德礼首相觉得如果麦克马洪议案通过了，英国将不得不自行发展原子能生产。艾德礼说他担心麦克马洪议案将会制止原子能秘密的泄露或者同任何外国包括包括英国政府的立场，在联合国监督生效以前，英国应当设法获得原子武器，或者至少获得自己开始生产所必需的资料。

掌握这些问题的联合政策委员会（英美的机构）4月15日完全陷入僵局，次日，艾德礼给我一封长信，在信中他企图为英国的立场辩护。

他说，1945年11月16日的共同宣言里说过，我们希望“美国、联合王国和加拿大在原子能方面进行充分有效的合作。”他认为，这话的意思至少是指充分地交换情报和公平地分配原料。艾德礼说，这项宣言没有提到在我们当中交换情报，而事实清楚地指出这一点已经有所规定。战争时期把大部分的发展工作以及大规模的工厂建设和生产安排在美国进行，这就意味着技术和工程方面的情报已经积累在我们手里。艾德礼说，现在，如果我们将之间进行充分有效的合作，那就必须交换这类情报。这位英国首相建议联合政策委员会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4月20日我回信给艾德礼说：

“国务卿已经把联合政策委员会讨论联合王国的代表们的要求的情况通知我，联合王国的代表要求充分地获得有关这个国家原子能工厂的建设生产和情况的情报，以便他们能够在联合王国某个地方着手建设一座原子能工厂。”

14
“国务卿告诉我这个要求是基于1945年11月16日杜鲁门、艾德礼和威克齐·金签署的备忘录中提出的建筑工程。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如下：

“（引文一）我们希望美国、联合王国和加拿大在原子能方面进行充分的有效合作。

“（引文二）我们同意联合政策委员会和联合开发托拉斯采取适当的形式继续保存下去。

“（引文三）我们要求联合政策委员会考虑并向上请求适当安排这项建议的办法。（引文完）

“如果我们对这份备忘录有所误解，我将感到十分遗憾。

“我认为我们大家曾经同意，依据魁北克协定，美国在战争期间没有义务供给战后的联合王国建造一座工厂所需要的设计，并在建筑和生产方面予以帮助。所以，问题在于这种情况是否已经改变，依据上述备忘录的文字美国是否承担了这样的义务。

“‘充分的有效’合作，只是一般的用语。我们必须考虑这份备忘录的签署人的意图。我必须说，从来没有人通知我说，提出这份备忘录的目的是要美国承担一种义务：为建造另一座原子能工厂在工程和生产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如果有人通知过我，我当时就不会签署这份备忘录了。

“在您和我签署这份备忘录几小时以后，约翰·安德逊爵士和格罗夫斯将军提出的工作计划就表明当时并没有这样改变我们的义务的意图。我承认我当时并没有注意这份计划，但是这份计划千真万确地表明即使在那些为准备在签署的协定的先生们的心目中，‘充分的有效’合作’这句话只应用于基本的科学情报方面，并没有指随时需要就地提供工厂的建设和生产方面的情报。

“我们心目中的备忘录的第五段内容如下：

“（引文）三国在基本的科学研究方面应当进行充分的有效
合作。在工厂的发展、设计、建造和生产方面，这种合作（在原则上大家认为是需要的）应当在互利的基础上通过联合政策委员会一再努力而达成的关于这方面的协议确定下来。（引文完）

“至于谈到这时候我们达成协议帮助联合王国建造一座原子能工厂，我想，无论从联合王国的立场来看，还是从美国的立场来看，都是非常不明智的。

“11月15日，即在签署上面提到的备忘录的前一天，联合王国、加拿大和美国联合发表了一篇宣言，在宣言中我们的意图是要求联合国设立一个委员会来控制原子能的生产，以便防止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由于我们的这一行动，联合国大会后来通过决议设立了一个管制原子能生产的委员会。我不愿意听人说，在我们关于设立国际管制的宣言发表后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就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它的目的是要美国提供有关工厂的建造和生产方面的情报；以便联合王国能够另外建造一座原子能工厂。这样的目的你既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想到过。

“全世界的人民要求原子能归国际管制。我们发表那篇宣言就是从这种要求出发。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

英国首相直到6月7日才答复我，他来电说，他迟迟答复是为了同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讨论这个问题。电报用很大的篇幅概述英国科学家的努力。艾德礼说，英国科学家在1940年和1941年也是首先研究把原子能用于军事方面的人。1941年10月，罗斯福总统曾向丘吉尔建议两国互相配合努力。这位英国首相说，英国人答应帮助美国的企业，因为“他们深信美国所取得的经验和知识可以为大家自由利用”，这样还可以使英国人能够集中力量于雷达和喷气推进动力的研究。

艾德礼又重复他的要求，说在魁北克的时候，大家曾经同意充
分交换意见和情报；因此，交换大规模工厂的设计和建造方面的情报也不例外。他说，现在有待于美国总统来明确有关美国和英国之间战后工业和商业性质的利益之类的条款。艾德礼说，英国科学家继续贡献他们的力量，直到投下了原子弹为止；至此，美国人曾经考虑到国内原子能发展的问题，期望能够“利用联合企业里到投弹时为止所取得的经验。”当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国人接到通知说，在新的协议未达成以前，美国必须停止供应情报。艾德礼说，为了这件事，他曾到华盛顿交涉继续战时的合作关系。

他在电报里说，“当您同意说应当继续合作，并且答应要求联合政策委员会在这方面提出些办法来的时候，我是感到十分放心的。”

艾德礼争论说，在联合政策委员会草拟的文件中，他找不到有哪句话支持这种说法：没有交换有关建造大规模工厂的情报的义务。他提到联合政策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所拟定的一份协定草案，草案规定，在交换情报方面继续进行充分的有效的合作。他补充说，“我们在历次讨论中说得很明白，我们自己的计划将包括建造大规模的工厂。”艾德礼继续说，但是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当小组委员会的报告交到联合政策委员会的时候，“发现英国政府既不准备达成任何协议，也不准备在我们先前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且还不准备在实际上同意应当通过行政措施继续合作。”

艾德礼宣称，他不能同意这种说法：继续这种合作关系是同“11月间由您、麦肯齐·金和我三人发表的”关于管制原子能的公开宣言不相容的。“我们三国政府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相互关系，这是有案可查的，事实上，这也就是我们倡议发表这篇宣言的原因。在战争时开始的合作关系，到了和平时期还应当继续下去，除非或者直到有一种更广泛的制度可以代替它为止，这一点肯定地
不是同宣言的目的不相容。’

这位首相说，在共同控制原料这一重要方面，合作关系仍然继续着，“那末，为什么我们要放弃共同管理情报呢？”

艾德礼说，“在华盛顿宣言里，或者在联合国大会的决议里，我看不到我们在交换情报方面或者在控制原料方面有什么理由需要散伙，除非有一种更广泛的合伙关系出现。一想到您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不免感到遗憾。”他那冗长的电报是这样结束的；他主张除了在原料方面继续合作之外，还要继续交换情报，“依据各种文件和我们过去共同努力的历史，我们认为我们的理由获得有关安全的种种情报，使我们保持适当的警惕。”

就国会议事的发展情况来看，我不能立即答复艾德礼的电报。究竟是麦克马洪提案最后获得批准呢，还是梅—约翰逊原来的建议稍经修改就能获得通过，现在还不能肯定。在国会未确定以前，我不可能就政策问题对英国有所表示。不过，在任何情况下，不论国会通过什么议案，都将严重地阻碍和限制我们在原子能方面同英国人的合作，这一点是已经很明显的了。麦克马洪提案经过修改，最后在国会里通过了，1946年8月1日我签署这个议案。根据这个议案成立的原子能委员会于1947年1月1日开始工作。我挑选了戴维·李连塞尔担任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他在担任田纳西工程管理局主席的时候工作非常出色。李连塞尔在艾奇逊委员会的顾问团担任主席的时候，已经获得有关原子能问题的知识。

在国际管制成为事实以前，为了民族的安全，也为了全人类的共同福利，美国已经准备实行有计划地发展原子能的方案。
第二章
問題和計劃

我真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看到政府要为增进和保护人民健康做点事，就大惊小怪起来。我常常发现，气势汹汹地反对联邦政府医药补助的就是那些不需要补助的人。但是事实上，我们大部分的人却因为无力支付医药费用而得不到必要的治疗。

早在我懂得一点人事的时候，我就感到非常难过，我看到那么多的病人，只是因为他们和社会都出不起钱，使得他们所需要医疗，而且不仅是那些贫苦的病人必须依靠施舍，就是一般的美国家庭，也付不起昂贵的现代医疗费用。在我第一次担任政府工作的经验中（那时我是县行政人员之一），我就在这方面看出一些问题来。我看到病人付不起医疗费用，被撑出医院，不治而死。不久以后，我在密苏里州杰克逊县担任县政长时，我曾协助创办了一所医院，为那些付不起现有医疗机构的病人治疗。我们知道许多城镇对于病人和受伤者的治疗待遇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即使在那些城镇，病人也还得证明负担医药费用的能力或证明符合施诊的条件。

在我当选为美国参议员后，我支持在公立医院设置基金的各项措施，以期改善这种状况。在我就任总统后，我决定要在这方面多做一点事。

常常有人问我，联邦政府究竟有什么责任要关心人民的医药治疗问题。这难道不该由地方政府负责吗？答案很简单。地方政府不能负担这个责任，而且它也不可能没有联邦政府的帮助，单独
地負起这个責任。

一则因为疾病和传染病并不尊重国界界限。我们从对付小儿麻痹症和其他危害国民健康的疾病的经验得到证明，没有一个地方政府能够自保。但是最迫切需要联邦政府给予帮助的最大原因，却是由于被揭露出来的我国千百万的青年男女不合乎服役条件这个惊人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证实我国人民的健康状况远远不够理想，我认为现在该是联邦政府想点补救办法的时候了。

当我看到我国青年身体不合格的统计数字时，我大为震惊。截至1946年4月1日止，从十八岁至三十七岁应征到的公民约有五百万人，经过检查，因为健康问题而被淘汰的占30%。此外，陆军和海军方面，因为身体或精神不健全必须复员的约有一百五十万人，伤员还没有计算在内。同时，在现役军人中，还有同等数目的人，在入伍以前所患的疾病需要给予医疗。事实上，有34%的人是不合格的。对于我们这个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来说，什么都走在别国的前面，可就是在保护人民身心健康这个基本责任上，却如此落后，这真是莫大的耻辱。

申请加入妇女军团的青年妇女，三分之一以上因为身体或精神方面的原因而被拒绝了。

总计将近二百五十万青年人，照理应该是身强力壮，但却发现不合格服兵役条件。

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揭发。我认为美国应该是世界上最健康的国家，在发现和发展增进公民健康的新方法方面，应该起领导作用。一旦我能够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内最迫切的问题时，我就提出了一个国民保健方案。罗斯福总统早在他的《经济权利法案》中就提到了公民有“享受适当医疗的权利和获得良好健康的机会”，因而为保健方案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45年5月24日，一个社会保险计划由纽约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华格纳和蒙大拿州的参议员詹姆斯·墨菲在参议院里提出，同时由密歇根州的众议员约翰·丁格尔在众议院里提出。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该计划使每一个男子、妇女、儿童都能享受健康保险的好处。这个提案是作为解决医院的希尔伯顿条例的修正案提出的。

虽然在原则上我赞成华格纳—墨菲—丁格尔议案，但是我不大相信它能顺利地在国会通过。这个议案的头绪过繁，目标过多。因此我在1945年9月6日在国会的二十一点议案中声称，不久将提出一个国民保健方案。

1945年11月19日我递交国会一份议案，提议通过扣税以及其他扣除办法，实行国民强制健康保险。按照这个计划，全国公民不论其支付能力如何，都能够享受到医疗住院待遇。议案建议这种全国范围的医疗制度应分散管理，完全归地方政府掌握。按照各地的不同情况和需要，设立地方机构，以便于疾病医疗。

我说得很明白，有了这样一个方案，人民还是有选择医生和医院的自由，而且医生和病人间的金钱障碍一旦撤销后，病人将有更大的自由选择医生。医生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愿意工作的结构，可以自由决定继续单独开业或是和其他医生联合起来开设诊所或参加医院工作。医生仍然有权接受或拒绝病人，医生还是能和往常一样执行自己的业务。

我的建议包括以下几个基本要点，

（一）医疗费用由强制保险费和国家总收入中支付。
（二）因病、因伤的工资损失由政府补助。
（三）扩大公共卫生和妇幼保健事业。
（四）医药学校和医药研究工作由联邦政府给予补助。
（五）医院、診疗所和医药机构由地方政府兴办。

我提醒国会不要因为有些人用“社会主义的医疗制度”这样吓人的字眼到处叫嚷，就吓得连碰都不敢碰健康保险问题。我绝不主张实行什么社会主义的医疗制度，我知道美国人民也不要那玩意儿。社会主义的医疗制度要求所有的医生都是政府的雇员。我所提出的不是这种制度。我提醒国会，我们的国家虽然很富有，经得起许多风险，却经不起疾病。我们相信保险可以预防蒙受不必要的损失，这个信念已经成为美国的传统，而我所提出的这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是为了预防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健康受到的损失。

我所提的健康保险计划，其中有许多要点，虽然不是全部，但都已包括在华格纳—墨莱—丁格尔提案中，国会当时正集中讨论这个提案。这个提案还提出了一些其他问题，因而使问题多多少少过于复杂化。在1946年审查这个提案时拖得太久，因而给了反对派充分时间，组织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反对运动。它不仅反对这个提案，而且根本反对联邦政府采取措施增进国民健康的原则。

华格纳—墨莱—丁格尔提案建议薪金在三千六百元以下的，征税等于薪金收入3%的所得税，这笔款项由劳资双方平均负担。这个提案也包括我的健康保险计划所列举的各点，虽然不是全部。同时这个提案还扩大了社会保险总额和失业保险的范围。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当华格纳—墨莱—丁格尔提案提交参议院的教育与劳工委员会讨论时，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反而不必要地模糊了主要问题。在提案讨论期间，反对势力不断地增强。这种反对的意见，主要来自一贯敌视进步政府的集团和美国有组织的医药界特权势力。

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还这样认为，大多数的开业医生——普通
医生——都能体谅而且赞成公众对于健康保险的要求，所以我觉得由一小撮自命代表全国医药界，凭借医药团体，大量进行收买议员，以期达到自己利益的人们来代表我国医药界的意见，是不公平的。

美国医学协会的领袖们坚持主张他们能够为全国医药卫生问题制订一套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事实上，在我执政期间，美国医学协会从来不曾提出任何可行的办法来代替强制健康保险的建议。美国医学协会的反对意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曾经强烈地反对公共卫生部门，反对创办村镇公立医院的建议，也反对在全国各地建立医院和诊疗所的希尔一伯顿条例。

华格纳一墨菲一丁格尔议案在第七十九届国会第二次会议中被扼杀了。我在1947年5月19日递交国会的特别咨文中，为争取实现全国卫生的立法，重新发动了一次斗争，再度提出1945年11月19日的建议，并重申迫切需要的理由。

“我所提出的全面保健方案对于国民福利有极重大的关系。方案的中心在于国民健康保险。在 conjunction with this plan for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n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it the law of the land and not merely a suggestion for discussion.”

1948年1月，联邦社会保险局长奉命对增进国民健康的可能性进行广泛的调查，并向我报告今后十年内可能达到的目标。调查工作在同年9月完成，调查结果，清楚地显示出如果联邦政府不采取措施，医生、牙医、护士、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的严重不足现象将继续增长。掌握了这些材料，我在1949年4月向国会提出四点建议，要求（一）制订国民健康保险法案；（二）制订扩充医药学校法案；（三）增加兴建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的补助费用：（四）提高联邦政府的补助金额，以促进地方政府对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对妇幼保健、残疾儿童的福利事业以及对一般公共卫生工作的开展。最
后一点建议包括设立医药研究基金会的要求，以奖学金和助学金的方式资助私人和非盈利机构进行研究工作。

肖文指出，这个方案所费的资金要比它所节约的小得多。卫生工作的支出已占国民总收入的4%。而用在预防疾病的开支只占这笔经费的极为微小的一部分。我强调指出，单就生产时间一项来说，公共卫生方案就能节省千千万万的工作小时，虽然它的真正价值是无法以金钱估计的。

这个方案基本上还是1945年我所提出的方案。反对派也还是那些人——现政权的反对政党、反动派和“医药团体”的领袖们。而用以破坏这个方案、迷惑和欺骗人民的谎言，也是“社会主义的医疗制度”那一套谬误。

为了揭穿反对派的宣传，1951年12月29日，我发布了一道行政命令，成立对总统负责的公共卫生事务委员会，目的在于组织一个完全没有政治关系、不带偏见的委员会，由一些能够从公共卫生的全面情况出发，根据事实提出建议的医生、劳工领袖、农业界领袖、教育家和实业家组成。

我选派前退伍军人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医师保罗・马格纳森博士为主席。他从全国各地挑选了十四名代表到委员会里工作，于是全面卫生情况的周密调查工作开始了。

我在1952年1月3日所发布的公告中说明了成立公共卫生事务委员会的理由：

“委员会的目的在于调查事实，提出卓越的专家和非专家的建议。他们的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公众澄清由于对我所主张的，给我国人民创造适当的医疗条件的任何建设性措施一律加以猛烈攻击所造成的思想混乱。上一个财政年度，由于疾病，我们就损失了五万万个工作日。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我们必须和消耗我们人力的疾病作不懈的斗争。”

24
經過了十二個月煞費苦心的調查和研究，听取了人民的反應，在全国各地邀請專家進行了小組討論以及各種訪問和集會以後，委員會在 1952 年 12 月 18 日交給我一个以《增進美國健康》为题的报告，汇报了调查的结果，并提出了他们的建议。

委员会的报告指出了目前通过自願预付的办法来解决个人医疗费用问题，远不足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它证实了医生人数目前远远不够分配的事实，并且估计到 1960 年美国将需要二万二千至四万五千名医生。它在医药研究的总开支中，发现了数目大得惊人的赤字，并注意到去年在基碑和纪念碑方面所花的钱比研究方面多得多。它还发现所有医院都是那么拥挤不堪，许多医院的设备又过于陈旧。报告提出最少要增添二十三万张普通病床和三十三万张精神病床。

委员会对于补助个人医疗机构、培养更多的医生和医务人员，充实研究和新设机构的设备、增设卫生机构，以及委员会本身今后的工作等问题，都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建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尽量利用联邦诊所和乡村保健医院推广预付面。
（二）联邦政府的补助，再加上州政府的补助，用以支持预付保险计划。
（三）在内阁中添设负责卫生保险事宜的职位。
（四）由国會成立一个由十二人到十八人组成的、永久性的联邦卫生委员会，继续调查国民健康情况，每年向总统和国会提出一换报告。
（五）联邦政府对于医药教育、医药研究、地方医疗机构，对于兴建医院和医疗团体和以地区为基础进行的试验性的研究，给予补助。
委员会所提出的方案，基本上是1946年以及在我整个执政期间所提的国民健康强制保险计划和现行的每次诊疗费由个人自付办法的折衷办法。委员会提议设法普遍推广自费保险办法，使未曾保险的千万人民得到好处，凡无力缴纳保险费的，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代付。除了政府在卫生事业方面已花的十亿美元外，估计这个计划每年还需要十亿美元。

这个保险方案和以前提出的是不相同的，因此认为公共卫生事务委员会已经完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现在我们有一个增进我国国民健康的切实可行的办法。这个方案为解决迫切的国内问题提出了一个完全可行而又民主的办法。

在公布报告的同时，我又发布了一个声明，号召大家继续为保持和增进我们人民健康而斗争。

“我自然无从预言下一届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继续推行我们在医疗卫生方面所做的事情。不过我希望他们对于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建议能给以慎重的考虑。这个报告值得每个美国公民重视。由于从感情出发，过去几年来，大多数的保健方案都得不到公正的考虑，如果还是同样的感情在作祟，因而贬低了这个报告的价值，那真是太不幸了。⋯⋯”

我就任总统以来，曾经遭遇到一些风暴的日子，进行过一些激烈的争论。有争论，有政治分歧，才能发扬民主。但是跟那些年复一年地反对我们所提出的任何增进人民健康方案的反动、自私的人们和政客们争论，我实在没有耐性。我在总统任内，曾经遭受过一些惨痛的挫折，但就个人的感情来讲，最使我痛心的是未能击败那个阻碍国民强制健康保险计划实现的反对集团。不过这个反对集团只能推迟，而无法阻止这个必不可少的联邦健康保险计划的实施。

在首都，正如强制健康保险建议这件事所显示出来的一样，就
有这么一个组织严密的小集团能够大吵大叫，引起人们的注意。大多数的人民却没有这种有组织的代言人替他们说话。只有总统才是对全民负责的。只有他一人不受宗派、职业和经济上依附的影响。如果说有人为人民说话，那就只有总统。

1946年我签署了整顿立法机构条例，在其他各项改革中，条例还规定，凡从事院外活动者都须进行登记，并须公开他们的收入来源和支出情况。虽然这项规定对整顿立法机构很有帮助，但是并不能因此真正根本解决立法机关所受的压力和影响问题。

我在参议院工作的经验，使我了解到在某些场合，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们对国会不无用处。他们经常给国会的各种委员会提供一些难以从别处得到的事实和数字。有经验的议员知道怎样利用“好的”和怎样逃避“坏的”议员游说者。

在恢复时期，这些议员游说者对于我们遏止物价飞涨所作的努力起了重大的阻碍作用。他们加诸国会的压力，使我们难以进行工作。尽管我一再要求，尽管我早先曾经否决过一个议案，国会1946年7月通过的物价管制法却并不能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不在限价之列的商品，其价格开始扶摇直上。国会所通过的物价管制法案，包括撤销肉类限价的条款，并规定在8月20日以前不得恢复肉类限价。开放自由市场第一天，在芝加哥牲口市场上，按照物价管制局的最高限价，每百磅十八元的上等牛肉一跃而为二十二元，猪肉从十四元八角五分的限价涨到十八元五角。在7、8月间，一些比较缺货的禽畜，价格空前暴涨，结果造成1946年秋间所谓肉类恐慌。事实上，9、10月间的肉荒，大半是由于7、8月间物价脱缰猛涨，有利可图的机会，而大量屠宰的结果。大量屠宰所得的肉，一下子就给长期吃不到肉的人们所吞咽，因而造成更大的肉荒。

在听取了必须规定物价最高限额的反映后，依法成立的撤销
物价管制委员会于8月20日恢复了对肉类的管制。但是肉类不受任何价格的限制已经快两个月了。在这期间，为了牟取暴利，不惜把没有长膘的牲口大量地赶到屠宰场。如果国会考虑我的建议，不放松对物价的管制，这样屠宰没长膘的牲口的事件就不至于发生了。

这事的真正责任该由那一批不顾一切的自私自利的人们来负——他们有的在国会里，有的在国会外——他们鼓动卖主投机取巧，破坏物价管制。

肉类供应情况搞得这么紧张，因此我在10月14日对全国人民的广播谈话中指出，政府正在考虑暂停物价管制，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对国家是不利的，因为敌人荒之后，一定会出现一个短时期的大吃大嚼。另一个补救的建议是进一步提高牲口价格，但是这样做也无济于事，因为牲口贩子还是会观察不卖，等待取消限价或更高的价格。

许多人曾建议政府查封仓库，但是这也并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查封了空仓库，没有牲口还是徒然。有些人甚至建议政府采取断然措施，派人到农场、牧场，搜捕牲口，送去屠宰，但是我反对政府采用这种极端的战时紧急措施。从国外进口肉类也不是办法，因为从国外找不到足够满足我们需要的肉类。此外，许多别国的人民，就是依靠经过加工、可以出口的肉类来维持自己的生命的。

因此，我宣布目前除了取消肉类限价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并声明我正指示农业部部长和物价管制局局长取消牲畜和畜产品的一切限价。

凡是取消限价而不至于出大乱子的几千件较小的商品，都已经取消了限价。我警告说，如果要避免物价暴涨，保证产品充分供应，不但在肉类工业，而且在其他各方面都要克制和冷静。我还
說，黑市买卖、囤积居奇、非法罢工以及其他类似的自私勾当，都会招致灾难。只有劳工界，企业界，政府和人民都必须用以解决各种问题的共同努力方法才能避免发生上述的不幸。纽约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埃米尔·史拉姆在祝贺我这次演讲的来信中表示，
尽快取消一切限价是唯一解决增加生产问题的方法。我回信说，

“亲爱的埃米尔：

“我的看法是，我们不能草率取消限价——至于肉类，那是一个特殊情况。国会对于管制物价不能及时做出决定，因而导致这样的后果。

“从种种迹象看来，肉类问题明年还是很难加以解决——商人现在又在供不应求后把不够用的牲口赶到市场去，因为现在的市价又在疯狂上涨。那自然需要一年的时间让牲口长大起来，供求关系才会转而正常。东西部沿海地区的人们要付出高得惊人的价格才能买到这种肉类，这样对谁也不会有好处。

“如果国会照我所要求的，在物价管制法期满前九个月就把它的有效期予以延长，并且允许我们在某些商品的供应赶上需求的时候，逐渐取消该项商品的限价，那么情况就要好得多了。

“像衣着、建筑材料等必需品并没有发生供应恐慌的局面，我丝毫未感到奇怪，因为有限价的缘故。如果我们取消建筑材料和房租的限价，那么，我们必将面临物价漫天飞涨的局面，而使佛罗里达州当年大发横财的景象①似乎成了儿戏。

“贪婪似乎已经成为今日的基调，我认为我们只有不惜一切来正视这个问题。

① 佛罗里达州在大西洋与墨西哥湾之间，风景美丽，物产丰富，在美国史上，一度成为地产等项投资的集中地，因而一时出现物价高涨和畸形繁荣的局面。

——编著

29
“如果我們能夠有一个保持合作，动点脑筋的国会，我就不至急于放松这些商品的管制。

“1946年10月18日”

1946年秋间，由于一些主要商品的加速取消限价，不久就清楚地看出，继续控制其他商品的价格已经没有用处了。我从来不主张为管制而管制，我认为对物价和工资做全面的控制，只有在它能够作为控制物价飞涨的有效工具时，才可以采用。

1946年11月9日，我以行政命令取消了对工资和物价的种种管制，声明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商品的配售制度。这个问题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足以颠覆经济的主要环节，而这多半应由国会所通过的、不切实际的物价管制法来负责。

为了整顿那些过去担任、现在还担任着复员工作的机构，在12月12日，随着临时管制局的成立，机构上作了一次重大的调整。合并到这个行政单位中来的有战时动员和复员局，物价管制局，民用物品管理局和经济稳定局。同时，约翰·斯蒂尔曼出任总统助理，协助我调整联邦各部门的计划和方针。

为配合成立临时管制局的行政命令，我又发表了一项文告，宣布这个局将负责继续行使物价管制局和民用物品管理局的职务，以及进行战时动员和复员局的某些活动。从物价和工资的管制以及大部分商品的定量分配取消以后，经济稳定局的任务已经大体上结束了。

共和党控制的第八十届国会在11月间选出。早在1947年1月6日我在给新国会的国情咨文里就已经建议撤销一些紧急条例。我提出警告说，我们的经济目前正处在危机四伏的时候，物价随时有飞涨的可能。我并以工业界和劳工界发出呼吁，要求前者维持物价稳定，要求后者感同身受，提出不合理的提高工资的要求，以免刺激物价上涨。

30
第二次大战战时权力法将在3月31日满期。我在1月31日就要求国会再度延长有效期限，并指出人力和工资的管制以及大部分物品的限价都已经在1946年11月撤销，现在只剩下第二次大战战时权力法所管制的几个项目还需要加以管制。其中之一就是粮食。粮食目前在世界各地都非常缺乏。目前需要保留的主要权力就是该法第三项所规定的有关优先权和分配权部分。

2月19日，我在给国会的另一份咨文里提出废止《1939年和1941年罗斯福总统由于紧急情况发布的、至今仍旧有效的一些临时条令》。我提出废止将近二十四项条款和部分法令。咨文里也列举了其他一些应该立刻延期或继续有效的法令。这个建议是作为进一步解除战时经济管制而提出的。

其结果就产生了所谓的“1947年的第一次撤销管制条例”。这个条现在3月31日由国会送给我签署。这个条例有效地终止了一切紧急管制和各种战时权力，但是为了避免危及我们的经济，并有力地支持我们的外交政策，对保持某些原料管制所必需的某种有限权力则延长了三个月的期限。

在各个行政部门重新研究过它们的需要之后，为了保证继续控制直接影响国际关系的进出口物资，我又提出第二次延长“撤销管制条例”期限的要求。这个1947年的第二次撤销管制条例是在7月15日批准的。连同条令公布的有我的声明，声明中提到我唯愿不必再为这个条令所规定的各项管制申请展期，但是世界各国物资缺乏的现象并未消除，而物价飞涨的威胁也未消失。有一点要弄明白，我们的目的是在于消除国际贸易的障碍，所以政府不应滥用这些管制权力，在情况许可的时候应停止使用。

逐步地、审慎地放宽管制的方针，经国会决定废止许多临时紧急条令和战时法令，并经我在7月26日批准而进一步得到实现。为了配合这一措施，我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这是稳健地、系统地
取消一切紧急权力计划的一部分。然而，总统在1939年9月8日和1941年5月27日所宣布的紧急状况以及战争状态继续存在，因此在当时还可能终止全部战时和紧急权力。

不幸的是，国会没有采纳制定有关管制权力和防止物价飞涨法案的些建议。所以有必要在1947年11月17日召开一次国会特别会议。我在这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了物价已经涨到什么地步，并呼吁会议注意由于物价的高涨在经济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我极力主张制定特别法案，以防止商品交易中肆无忌惮的投机；分配供应不足的商品，并扩大分配运输工具的权力；延长并加强出口管理；限定供应不足的、基本上影响生活费用的生活必需品的最高价格。我还建议延长并加强房租管理。1946年12月28日批准施行的两院联合决议，好像是采纳了些建议。事实上，它并没有采纳防止物价飞涨有效办法所必需的主要措施。所以在签署时我说，这个决议并不能使高涨的生活费用下降，也不能防止物价的继续上升。

国会和总统间的争端现在完全明朗化了。因此，在1948年7月15日，在接受费立特克费亚民主党会议的总统提名时，我猛烈地抨击了第八十届国会，因为它没有能够采纳1947年11月提交的特别会议的方案，特别是因为它没有能够制定可靠的管制条例。共和党会议举行得比民主党早，并采取了一些我曾要求第八十届国会通过的措施作为党纲。所以在7月26日召集的“燕麦节”特别会议”上，我暗示说他们守信用，一定能履行行政纲所作的诺言！我告诉国会我，人民正要求政府采取立法措施，以抑制物价飞涨和生活费用上升，并且帮助解决严重的房荒问题。我说，如果我

① 辛苏里州人认为7月26日是种燕麦的好日子，所谓“七月二十六，不种燕麦种燕麦。”
們不能采取行动，制止物价飞涨，那真是犯了不顾后果的错误。

此后，我在8月6日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又一次责成第十届国会进一步采取行动，因为它迄今尚未能完成其所以召开特别会议的任务。然而唯一的回答还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措施，这比起把国家从高物价的困境中拯救出来所要求的强有力行动，相去未免太远了。第十届国会不是集中精力，考虑采取积极措施，以应付局势，反而不惜违背全国利益，满足于遵循为特权阶级服务的路线。

在劳工法案问题上，国会和总统之间也横着一道鸿沟。当剥夺劳工权利的判决法案在1946年送到我桌上来时，我否决了这个镇压措施。但是反对劳工的领袖约约翰·路易斯在1946年秋天不顾政府的警告煽动起来以后，如今又卷土重来，劳工法案终于成为1947年的主要争端。

1947年1月6日，在国情咨文里，我极力主张制定法案，以解决劳资纠纷的基本问题。我警告说，最近发生的不协调的争端，不但涉及劳资双方，连政府和公众也被卷了进去，因此要特别小心，不要在这种感情冲动之下，制订出惩罚性的法案来。我提出了以下四点方案：

（一）及早制定法案，以防止诸如工会权限纠纷罢工，胁从抵制以及劳方或资方为了现有合同的纠纷而采取经济压力等等的不合理作法。

（二）扩充劳工部机构，以便协助进行集体谈判——合并政府机构，以便采取整债、任意调解和调查事实三个连续步骤。

（三）扩大社会法案的计划，以减轻劳工生活无保障的痛苦——扩大社会保险，改善居住条件，增进国民健康，规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
（四）任命一个临时联合委员会，实地调查劳资关系。

这个方案给解决国内劳资问题提供了一个正确的途径。但是第八十届国会却搞出一套错误的办法。

众议院劳工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的众议员小弗雷德·哈特案所提出的议案4月间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这个严重限制罢工的议案，虽然不无一些优点，却是一个极端的措施。根据这个议案，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就得以撤销，而代之以劳资关系委员会；全国工业总罢工、工会工厂制、工会权限动用罢工和同情罢工、工会纠察和政府公务人员罢工，一律列为非法。这个议案还规定违法工会要受剥夺一年合约权的处份，非法罢工者的复工权要受剥夺，可以对工会提出控诉，工会必须提出财政报告，总统有权禁止州际运输、交通和公用事业的罢工。

以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为首的劳工委员会在参议院里也搞了一个同样的议案。5月间，一个由十人组成的两院协商委员会开始把塔夫脱议案和哈特案议案结合起来。

1947年劳资关系修正法案，即众所周知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在6月18日送到白宫里来让我签署。两天之后，我否决了这个法案。否决咨文中列举了反对的理由：这个议案完全违反我国的经济自由政策，因为执行议案的结果政府必然要或多或少地干预集体谈判的进行。由于它牵涉到复杂的法律问题，这个法案势必成为耗时费日、聚难不休的根源，因而助长了劳资间的相互不信任和敌对情绪。这个法案既不通行，又不合理。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在正常的经济决定中搀杂了政治上的考虑，势必大大地削弱我国的工会运动。我提醒国会中各考虑我在国情咨文里所提出的逐步解决劳工法案的建议和曾经提出的应马速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没有就劳资关系进行详细而公允的
全面审查，就贸然地提出我国劳工政策要改弦更张的法案。

我在1月间所提出的建议，还是给制定一个调子温和而又切
中时弊的法案提供了适当的基础，我极力促使国会就这方面采取
适当步骤。

在发表否决咨文的当天晚上，我在广播谈话中说明，这样的法
案对多年来劳工关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会起什么影响，指出这个
法案跟政府提交国会的劳工法案毫无共同之处，并且警告说，如果
这个法案一旦成为法律，它不但不能纠正时弊，也不能改善劳资关
系，反而会引起冲突和不协调。

6月23日，参议院驳回了我的否决。1947年的劳资关系法案
便正式成为国家的法律。为了维护美国男女劳工的公平合理待遇，我总算在我职权范围内尽了最大的努力。
第三章

第一个预算

联邦预算是在政府各项工作中讨论得最多，而且是最不为人所了解的一项工作。预算是要涉及政府执行各项任务所需的款项。但是联邦政府的职责是越来越繁重、复杂，以致除了整天和它们打交道的人以外，别人很难理解它们。

每一个家庭或多或少都有个预算，以便按照预期的收入，把开支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以内。但是往往因为疾病等等意外事件，开支超出了预算；或者是因为营业欠佳，以及添置房屋、车辆等特别开支，以致收入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只得削减开支，或是挪借、预支未来的进款，希望日后能够做到收支平衡。

把这个过于简单化了的例子，放大数百万倍，就可以看出联邦政府是怎样编制国家预算的。但是联邦政府的预算除了要满足我们的人民的需要外，还要考虑到许多特殊的需要。而这些特殊的需要是由我们在世界上的新地位和新任务所带来的。在我执政的几年中，战后美国的预算曾经做到收支平衡。其中三年——1947、1948 和 1951 年财政年度——事实上还有盈余。由于朝鲜遭受侵犯而大大加剧了的国际危机，防止了国家债务的继续缩减。预算情况的改善有赖于财政上的精打细算，财政部和预算局是我在这方面取得成就的得力助手。

预算局是根据 1921 年的法律而设置的。预算局局长由总统任命，直接对总统负责。一般说来，预算局局长的职务就是“集中、汇编、修订、削减或增加各部门编制的预算”，逐项加以研究，从而
决定为了达到节约财力建设效率目的的变更。一份完整的预算
和预算局的建议在每年1月间国会召开年会时，由总统提交国会。

当然，除了要求总统亲自参加编制预算的最末阶段，对其中的
主要项目加以审定外，不能对总统有过多的要求。但我个人对
预算编制的每一阶段一直都是予以密切注意的。为了研究它的各
项细节，我花费了很多时间。

1928年我第一次在杰克逊县法院工作时，我对国家财政问
题就发生了兴趣。全城事务都受这个机构的监督。在这个工作岗
位上，我获得了掌管收入监督开支，以及征收捐税、动产税、不动
产税的极为可贵的经验。在执行这一些职务中，我很快就认识
到每个人都在希望由别人出钱来维持政府。

在我就任县法院审判长期间，我就直接负责编制预算，并且督
促各部门按照预算办事。在我1934年12月31日离职以前，该县
的全部旧日债务，都根据相当优厚的条件加以清偿；杰克逊县的
财政状况好得很。

作为美国参议员，我在参议院的拨款委员会里服务了十年。在
那里我熟悉了联邦政府复杂的财政机构，认识到国家预算中数字
的意义。我在这个委员会里参加编制过十个预算，凡是由罗斯福
总统提出的或者那几年向国会提出的拨款，我部仔细地研究过。

由于有了这样的经验，我作为总统，花费了许许多时间和精力来
编制预算，草拟预算咨文，一年一度地送交国会第一次会议讨论。

为了编制预算，预算局局长（在总统办公厅工作）和财政部长，和我
保持着紧密的合作。我经常掌握编入预算的全部项目的第一手材
料。按照法律规定，国家元首每年必须向国会提出一个预算案。而
美国政府是按照立法机关制修订的预算办事的，而不是按照行政机
关编制的预算办事。行政机关编制的预算充其量不过是一纸蓝图，由
国会根据它制修订出最后的真正预算。然后，像其他立法提案
一样，国会将这个预算案提交表决。因为我们有一个立法预算，总统提出拨付的各项目费用，就可增可减，或者根本不予通过。这是宪法规定的，宪法规定征税和拨款必须由国会来决定。

根据总统每年提交国会的建议而制定的预算总是要比实际执行的预算早半年——那就是说，自本年7月1日到第二年6月30日这一财政年度的预算案在当年1月就要送交国会批准。例如，我在1945年4月间就任总统时，而1946年度的预算，亦即1945年7月1日至1946年6月30日的各项经费，已经由国会批准。因此，我上任后应该提出第一个预算案要在1946年1月20日提交国会，而那时1946年7月1日至1947年6月30日这一财政年度的预算。

罗斯福总统在他执政期间把预算工作从财政部转移到总统办公厅来，划归预算局局长掌管。但是在我开始编制我的第一个预算之前，我就决定改变一下。为此我把预算局局长哈罗德·史密斯请来。

“我希望把这个工作放在三脚架上，”我告诉他，“由财政部部长协助你来编制预算。”

我在总统任期内提出的八个预算就是这样编成的。

哈罗德·史密斯因为身体不好，在我就任总统的第一年内就辞职了，于是我任命詹姆斯·韦伯接替他的工作。此后我跟韦伯局长、斯奈德部长定期碰头，一起通盘研究预算计划。后来，我跟韦伯的继任人弗兰克·佩斯和弗雷德里克·劳顿也是这样做的。

预算局局长把内阁阁员和政府各部门的首长——请了来，讨论他们的要求。国防部是最会花钱的部门，因此首先征询这个部的意见，然后轮到掌握援助计划的国务院，像这样逐一定地进行讨论。在和斯奈德部长商量过后，对于需要多少大一罢收入才能满足各部门提交预算局的开支计划，我有个谱了。
在编制预算期间，预算局局长每星期至少到我的办公室来两次。我允许他随时可以进来见我。我在编制预算案上所花的时间两倍于以前任何一任总统。我经常探讨妥善经营管理和我债务的长远计划，满足美国人民对经济和社会的基本的、迫切的需要，以及我们盟国的需要——这三者之间的适当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各部门之间较少摩擦，因为它们觉得在把它自己的要求提供上级考虑这一点上，它们有同等的机会。一次又一次，整天整天地在我办公室里开会，终于使我了解到它真正的需要。经过这样的反复商讨，我就给各部分发出明确的指示——我希望他们能够按照我的指示行事。我是在我的良心认为正确的观点作出决定的，一旦作出决定，就要坚持到底。

为了要我批准拨付巨额款项，各方不惜对我施加种种压力。军队方面尤其难以对付。他们经常使用压力迫使我改变我煞费苦心编制出来的、希望军费费用能够和政府其他需要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相平衡的预算。

比方说，如果分配给三个军事部门的预算总额是九十亿元，那么陆军、海军、空军三军就不管自己的实际需要是多少，总是要求平均分摊三十亿。这样任意要求平均分摊的办法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我坚持要陆海空军证实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并说明为什么应该平均分摊的理由。它们提不出理由，只好放弃了任何东西都要平分作三份的老习惯。我迫使这三个部门精打细算，明确地对待它们认为必不可少的要求。军事预算的每一个项目都必须向我和财政部部长提出充分的证据。

它们都是拼命地要钱，但是最无法无天的要算海军部。有一个时期，海军部门竟然囤积了大量的钢板和钢板。我对我们这种情况不得不到予以制止，并且最后不得不要求每一个军事部门详细开列它们每一财政年度所必要的物资。这样，我们才开始摸到军
事预算的底。应该记住，除了目前需要之外，军事预算还应包括过去紧急开支的追加费和士兵的退伍年金等项开支。

我继任总统不久，就开始考虑战后的预算问题。欧洲胜利紧接着就是对日战争的胜利。两方面的胜利使我们面对一个任务：政府既要筹集资金把战时经济转变为和平经济，又要设法使生产、消费和国内就业人数维持在高度水平上。

局势曾经迫使我们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的战时经济体系——这种近乎全面的战时生产在我国还是史无前例的——但是我们又突然面临着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转变我们庞大的生产机构，以适应和平需要，同时还要保持对劳动力、商品和军队的高度需求。

在军需部门服务的男女人数有一千二百万，散布在全球各地。从民用企业抽调出来从事战时生产的还有几百万。未到期的军事订货有数百亿美元，这些订货是为了促使美国工业按期生产赢得战争的军事物资。

1946年的预算提出了武器、弹药、租借法案以及战争其他方面的巨大支出，可是德国的突然崩溃和日本的迅速投降使我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措施，下令修改预算。在5月初，我下令审查概算各个方面。我又吩咐把所有的订货合同检查一遍，看是否能够在不影响作战力量的条件下，取消一些订货。

因而我能够通知国会大约有六百亿美元的军事订货可以取消。这就节省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开支，但是我们还得负担一笔巨大的对日作战的费用。

1945年10月，另一笔用于结束战争和复员所需的公债，也就是最后一笔战争公债——胜利公债，已经筹措到手。

大多数人觉得联邦财政计划非常难以理解，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把批准预算和支付预算混为一谈了。国会通过批准预算要比款项的实际支出早十八个月。支付预算代表政府每月开支的，和在批
唯预算中已經撥付或批准的款項。批准預算之所以能為公众接受，是因為它只是對未來的开支作出合理的估計，但是支付預算卻常常遭到严厉的責難，因為它勢必受到政府實際支付款額的影響。

所有對政府开支提出責難或不滿的原因，幾乎毫無例外地是由于看到支付預算所付出的款額而引起的。這種事情的產生，我認為一方面是出于人之常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對情況不了解或是認識不足所致。公众往往和家庭主婦一般見識，她很滿意丈夫在年初編制的全年預算。可是當她看到為了購買雙方同意的用品，每月的薪水都花光了時，就又覺得預算不太理想。这就是估計開支和实际开支有出入的地方。

在我執政期間，預算局局長對政府各部門的开支不斷進行審核。我也派人檢查所有在既定範圍內計劃的執行情況。一旦發現意外的額外，我就堅持要他們把这笔額外轉用到別的計劃上，或上繳國庫，用來消償國債。各部門負責人必須對我說明他們手上保留着未動用的經費的理由。預算局不斷地進行檢查，務使預算所確定的並已撥給的經費按照既定的計劃使用。如果發現有了變動，就要他們提出合理的解釋。

有些眾議員和參議員的態度往往很成問題。他們所关心的只是地方的和局部的問題和計劃。所以我得時刻提防著他們。他們可能提出各式各樣的修正法案，結果是造成一大疊撥款書，而這些國會議員對國家預算的全面要求往往并不了解。他們只是想在自己的選區里尋找政治資本或是追求头条新聞。

我觉得不仅是一國的行政首長需要了解預算方面的技術問題，每一個和預算有關係的人都應該有透徹的了解。我尤其希望能夠就預算的作用給新聞記者一個簡單、明晰的解釋，使他們能夠正確透徹地報道聯邦政府的財政狀況，從而使全国人民有一個明晰的輪廓。
为了这个缘故，按照我的惯例一年一度在白宫举行一种叫做“预算研究会”的新闻记者特别招待会。举行这种招待会的唯一目的是把整个预算逐条宣读，详细地回答新闻记者所提出的任何问题。每一个新闻记者都发给预算全文一份，等他们到齐了，我一页一页地念下去，就像老师在教室里上课一样。财政部长和预算局长特别为这样一些招待会绘制了许多图表。预算里任何一点为新闻记者所希望知道的，或者我认为新闻记者应该更清楚地了解的，我们就把那些能够帮助我解答这些问题的政府官员请到研究会上来。财政部部长和预局局长在这些招待会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种会有时竟用去了两三个钟头，可以说是时间最长的新闻记者招待会。我在白宫期间所举行的三百二十四次新闻记者招待会中，总算这些招待会最使我感到愉快了。

编制联邦预算可以算是我业余爱好中比较严肃的一项，但它究竟比一种爱好重要得多。事实上，我认为它是总统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一种永远引人入胜的职责。

在我执政期间，公债的处理工作可以概括地分为三个时期：

（一）1945年4月12日至1946年6月30日——继续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费的筹款工作，同时还要致力于重新改造经济的艰巨任务。

1945年7月1日至1946年6月30日这一财政年度的预算上所出现的二百零七亿美元的赤字，反映了战时开支转嫁给这一年的债务。公债金额从1945年4月12日的二千三百四十一亿美元上升到1946年2月的二千七百九十二亿美元的最高峰。随后，公债又降落到1946年6月30日的二千六百九十四亿美元。

（二）从财政观点来看，第二个时期应自1946年的7月1日
起，一直延长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为止。调整是在不影响经济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这四个财政年度内，我们处在一个就业人数和国民收入普遍高涨的时期。我们完成了恢复工作，战时军事人员大部分已经复员，大部分的战时订货已经清理。然而，当这个时期快结束时，出现了新的侵略危机，因而再度扩展军备，又成为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一项支出因素。

这四年内预算的纯盈余达到了四十三亿美元。这么一笔盈余再加上战争开支的一些差额，用来偿付公债，公债确实减少了不少。1949年6月公债总额最低曾经降到二千五百一十二亿美元，虽然到1950年6月30日又上升到二千五百七十四亿美元。

照这个成绩看来，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尽管还应当比这更好一些。在这一时期，我常常提出积累更多盈余和更多地削减债务的建议，但是第八届国会不顾我的否决，仍然通过了不合时宜的和不合理的1948年减税法案，以致于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三）第三个时期应自1951财政年度开始，共产党侵入朝鲜之后，我们就进入了这个时期。我们的防御开支急剧地上升，国会也显著地增加税收，但还是没有照我所要求的增加那么多。在朝鲜受到侵略的开头两个财政年度里，我们大体上能够按照我所倡议的“量入为出”的政策办事。在1951、1952这两个财政年度内，我们的预算盈余约达十五亿美元，而公债的增加则不到二十亿美元。

从1946年6月30日到1952年6月30日，除去开支，政府还得到三十亿美元的纯收入。这样的财政状况我认为很满意。

1952年6月以后，由于防御开支的继续增加，“量入为出”的政策越来越保持不住。如果不修订税率法，1953财政年度的赤字估计将达到五十九亿美元，而1954财政年度将达到九十九亿美元。
元。我对我们目前，特别是在充分就业和国民收入增加的时候，那种放弃支付防御经费政策的倾向提出了警告。

我曾使公债从战后的最高额减少了二百八十亿美元。我的目的是要把总数降到二千亿美元；但是国会不肯为此而冒征收捐税的政治风险。

1947财政年度，我在预算上做到了收支平衡，而这还是在世界大战浩劫之后，改造战时经济阶段。1947年我们的财政部还有一笔盈余，1948年我们也有盈余，1951财政年度同样也有盈余。从1945年7月1日至1952年6月30日，这整整六年中，我们的收入多于支出。在我任总统期间，直到1952年6月30日以后财政上才出现了赤字，如果国会当时通过了我的征税方案，那也就不会有赤字了。

因此，在头两年我所采取的政策，目的在于减少公债，同时还实现其他种种方案，使生产和消费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上。所以减税在这个时期里似乎是不合理的。在我执政的中间四年里，我努力做到收支平衡，并且还争取有盈余结存，用来清偿公债，结果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在繁荣时期，增加税收是合理的。最后两年，按照计划是在量入为出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偿还战争费用、对外援助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数目惊人的国家债务。

在我执政的后期，也就是1952年大选后我在职的最后几个月中，我面前摆着两条可走的道路。一条道路是把国库内的现金结存花光。我们可以利用这笔剩余来减少债务，那么在我们离职时，就债务的数额来看，我们留下的印象就会好得多了。另一条道路则对国家大有好处。我们在国库里留下充裕的盈余，并且作些安排，使得新政府接手时，至少有六个月的时间财务上不必重新张罗，而能够站稳脚跟。

当然，我们尽可以在1月间一走了事，让新政府去自作打算。
那可是一种消极的政治行径。但是在我心里占优势的是公众的利益，不是政治上的考虑，所以，我命令各个部门编制一个临时方案，使得整个政府机构的财政和管理工作能够继续顺利进行。

“放手干吧，对的事我们都干，”我告诉斯奈德部长说。

“您所说的对的事，意思是让接任的政府有一个风平浪静的交接时期吗？”斯奈德问道。

“正是这个意思，”我答道。

我们把继任的人在正式接任前就请了来，并且为他们在财政部里安排好办公场所，使政府的财务管理工作不至于衔接不上。

尽管我们有机会减少五十亿美元的债务，这样做会使民主党政府显得很有成绩，但我认为这笔钱还是应该留给新政府，好让他们有个良好的开端。

共和党的第八十届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那一年的三十亿美元预算盈余要转用于下一年度的预算。他们估计下一任总统将是共和党人，这么一来，他们就能借民主党政府所节约下来的三十亿美元的光了。这种账目上的转移不在国会职权范围之内，可是我对此并不在意。

本届国会还企图把政府信用基金留作以后的用途。那就等于说：“财政报告由我公布，但是，我又不提出需要付款的账单，因为它要到明年才付款。”

这些信用基金，包括社会保险金，养老金，工人赔偿金和铁路员工退休金，都由财政部保管，投资于政府债券里。因此这些基金也就成为政府债务的一部分，必须交代清楚。

我认为政府的全部资产能表达出来，将是一件好事。我常想，如果政府能把它的资产开列清单，例如田纳西工程管理局、大库利水坝、胡佛水坝和邦纳维耳水坝，以及海港、建筑物和国有土地等等资产，资产总值将远远超过国家全部债务。大家知道，商行的资
产货借对账表就是这样记的。政府的账目要是也这样记的话，货
力的数字将相当可观。此外，我也常想，只要国民收入达到国家债
务的一倍半到两倍，那就用不着担心我们的债务能不能清偿，或是
国家财政状况能不能稳定了。

国家债务既可以代表政府对人民福利事业所作的投 资，也可
以代表强加于我们身上而对整个生命财产是一种浪 费 的 战 争 费
用。前者是政府应负的正当义务。它代表很高的生活水平、医药
卫生、军事安全，国家的进步和繁荣等等具体的东西。与此相反，
军事开支则是破坏、消耗、耗尽构成国家财富的人力和物力。在我
就任总统后所编制的八个预算中，我觉得造成唯一真正浪费的就
是那些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战争费用。

我认为“平衡预算”的好处往往是被过分夸大的。安德鲁・
杰克逊清偿了全部国家债务，而且做到了收支平衡，但是 1837 年
空前的经济恐慌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而 1929 年大危机爆发
后的不景气局面，就连一个有盈余的政府也受到了袭击。

在紧急时期，例如 1930 年的不景气，或是 1950 年共产党侵入
朝鲜，政府必须迅速采取紧急行动。而紧急行动往往需要紧急拨
款，例如，公共事业振兴署 1930 年的拨款，就很有可能避免国内血
腥的叛乱。如果需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为了社会福利和安宁，联邦政
府就有责任担负起这些费用。

政府是人民的工具，如果一个有效率的、称职的政府所必需的
种种措施和管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代议政府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怎样建立联邦预算制度是政府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实际
上，我相信这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哲学上最根本的分歧。共和
党对政府、对预算都抱着实用主义的——一种顽固的、有多少花
多少的态度，即使有时候使一部分人陷于破产也在所不计。

我常常认为民主党所代表的政府实行的是比较合理地分配国
家财富的政策，因此任何一部分人民都能得到一些生活上的改善。我经常关心平衡预算上的数字，正如账目所显示的，但是我更关心国内人民预算的平衡。

这就是我制定税收政策和财政计划的基本指导思想。我的目的是要尽快减低预算到二百五十亿美元之谱，同时把我们的税收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使国家债务逐渐减少，而又不影响目前的繁荣局面。

罗斯福执政时期，为了支付复兴工作的种种开支和供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款项需要，只好付一切可能开辟税源。因此，在我接手时，税务部门是个龙蛇虫鱼的破烂摊子。我希望国会能和我合作，制定出一种税制，国家既有足够的收入，人民的负担又公平合理。

由县法官到议员到总统，我一直信守着一条税收原则。那就是量入为出的原则，除非碰上关系人民幸福的紧急情况，在那种时候我才认为政府有责任采取紧急措施，筹措经费，以应救急的急需。照我看来，量入为出并不是什么神圣的概念，它只是我所知道的最可靠的道理原则。

征收捐税，依我看来，只能取决于国家收入的需要。当我力争要在全民间比较公平合理地分配国家财富的时候，我从来也不主张取富济贫的征税办法。公平的税率决定于付税的能力。我所倡议的各种社会改革，都是以特别法案方式提出，从来不假借征税的办法来移花接木。

关于税收方面的事情，通常是财政部提出草案。但是众议院的筹措委员会非常嫉妒财政部在这方面权力，因此我必须和双方保持密切联系，使得不至于因为政策上的重大冲突而打乱整个税收体制。

我最头痛的是怎样使国会通过根据“量入为出”的原则来
满足政府全部计划需要的征税法案。我相信除非对收入甚至支出作好准备，任何向公私业务提供资金的办法都不会是稳妥的。国会可能投票同意某一项拨款，但是过后也可能拒绝通过适应一些新开支需要的增辟税源的法案。我真不能容忍国会这种作法，因为一项措施如果值得拨给经费，那么很明显，就应该征收捐税，拨付使用。

在我执政期间，多少议员都是死抱着一种传统的犬儒主义的政治哲学：“切勿反对拨付经费，但也切勿赞成增加税收。”这可能是获得重新当选的一种方法，但这也是使国家陷入财政困难的一个必然的步骤。

如果不是共和党的第八届国会从中作梗，我的消除税制不合理现象的计划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获得通过。但是第八届国会急于取悦少数议员所代表的特殊利益，通过了全面减税。这在个人收入达到很高水平和几乎充分就业的时期，减税是完全不合理的。只要掌握所减税额的半数，就可以使我的政府消除税务机构所存在的许多不合理的地方。

当我们把税收整顿得有些好转的时候，要不是朝鲜战争爆发的话，我们实际上是能够按照原定的财政计划实现所有目标的。免税的项目可以增加，鼓励的范围可以扩大，同时还能把生产和消费维持在前所未有的高度水平上。

在执行量入为出的计划中，为了维持高度经济水平，我们经常抱着一个想法，计划必须拿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这一政策和国家经济以及人民福利都有重大的关系。自然，在某些场合下，经过深思熟虑，我们还得冒一些危险，这些危险比我们所预料的要求得早。例如，我们看到我们的人口每年增加二百五十万，那就等于每年增加像佛罗里达或衣阿华或路易斯安那那么大的一个州，这些就意味着我们市场的扩大。人口增加对国民经济来说是一种挑
战，可是当这二者亦步亦趋地发展时，那就不至于发生不景气了。

我們鼓励经济继续向上发展，因为我們知道我們新增加的人口可以加以吸收。但是，仅仅为了显示我們能平衡预算，就嗤之以鼻地突然来一个财政紧缩，能够使我們的整个经济开倒車，结果是弄得怨声载道，失业激增。好像有这么一个政治信条，它經常阻止一个總統去向国会请求开辟税源，除非总统能证明这笔钱已經花掉。我懂得这是好策略。但是我也知道要善于理財——而这才是我的職責。

在国会里公事上记载着的有关税收和预算问题的謠言和毁谤，比所有其他问题加在一起都多些。大多数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实际上对税收和预算知道得很少。在众議院的撥款委员会和筹措委员会中，以及在参議院的财政委员会中，經常会有一些忠直干练的人士，他們对政府财政问题有研究。但是在国会的参众两院中也经常会有不少忠直干练的人士，他們不論是对税收或是撥款问题，都是以取悦特殊利益集团为己任的。

财政部是政府工作的最后一关。政府所开支的每一分钱都是通过财政部流出。政府中所发生的事没有一件不和财政部有关，所以必須要有一个稳定的、健全的信用基础，要不然，政府其他部门都要垮台。财政部和预算局是政府赖以运转的两部机器，它们代表着政府的具体活动。

美国的财政部在政府行政部门中是机构最庞大的一个，对于政府整个活动关系重大，必須严密加以管理，并须經常提高工作效率。我特别荣幸能够得到这样一个财政部长，他通晓国内外的财政问题，并且以稀有的技巧和才能管理财政事务达六年以上。

約翰·斯奈德是我们的第三个财政部长，但是在我执政的大部分期間，都是由他负责财政。摩根索部长在我继任总统后三个月就辞职了。后来我又把文森調到最高法院去了，所以文森担任
部长职务只有很短一段时间。我遴选斯奈德执掌政府财政大权是因为我们曾经长期共事。我在杰克逊县当审计长，他在圣路易斯一个银行里当行员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后来我们又在一起受过后备军务训练。我知道他，作为一个银行家，懂得银行经营得对社会的关系。当我在参议院那些年中，我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友谊继续有了增长。

有了斯奈德当财政部长，我就能在财政部进行一系列早就需要的改革。政府会计制度的彻底改革就是其中的一个大成就。有了预算局、财政部和政府会计局联合组成的工作组，我们就能在政府各个部门建立一个统一的会计制度。从前编制财政报告需要三至六个月，现在只要三至六个星期了。

最彻底的机构调整理算在1952年1月计划并开始的税务局改革。这次改革是长期调查研究的部分结果，目的在于保证公共事业中的公公守法的作风和高度的工作效率，保护政府机构不受贿赂的腐蚀。有些税务官员曾辜负了公众的信赖，他们得的罪行查明属实，立即对他们提起公诉。

税务局的这次改革主要有下列几方面：（一）撤销税务局的六十四个征收所。（二）税务局的局长是国会由总统委派，经参议院同意的官员。其余的职位今后都须以经过考试的人员充任。（三）撤销由二百多个官员分别执掌联邦各个地区税务的复杂机构，而代之以不超过二十五个直接对华盛顿的局长负责的地方税务局局长。（四）建立一个健全的、独立的视察制度，以便随时进行检查。（五）精简设立在华盛顿的总局的工序。（六）提高税务官员的薪俸，使这个十分复杂和需要专门技术的政府部门获得质量最高的工作人员。

有了这样一个新的、流线型的税务机构，就使得基层地方税务机构直接受局长领导，因而责任明确，便于监督。建立从上而下的
严密监督和管理，目的在于保证廉洁、忠实的工作作风。

虽然胡佛委员会曾经建议把复兴金融公司划归财政部管辖，可是斯奈德和我都觉得财政部不应该经营银行和信贷业务。我们认为复兴金融公司应该保持其作为一个公司的基本骨架，以便在必要时能加以扩充。拥有我们美国这么巨大有力的经济，如果保留复兴金融公司，在紧急情况发生时作为扩充紧急贷款之用，在紧急情况消失时，作为紧急收缩之用，那么经济衰退或萧条的威胁就可以大大地减轻了。

在朝鲜战争初期，金融方面发生的一个问题和联邦准备局有关。我认为在我们未能肯定需要多大一笔开支才能有效地充实防御能力以前，对于影响国家债务处理的利率，我们必须保持稳定。

按照法令规定，利率（贴现和利息）的调整是由联邦准备局这个不隶属于任何部门的机构掌握。因此，财政部不能直接掌握和它的债务处理有关的利率。我觉得由于利率提高而使我们进入一个财政拮据的时期，那是不合适的。我还坚决主张在危机迫在眉睫的时刻，我们绝不应该迟疑不决，因为这可能引起公众对国家财政的疑虑。

作为政府的首脑，我觉得我有责任，也有权力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实力，保证防御计划的实现。为了这个缘故，我把联邦准备局的委员们找来。在次会议上，我要求联邦准备局像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所作的那样，全力支持财政部的财政措施。

当然，财政部发行证券，原不必经过联邦准备局的批准，但是按照惯例，双方还是充分地进行协商，以期得到该局的通力合作。

在这次会议上，我得到联邦准备局的保证，一定支持财政部为了应付朝鲜战争所作的财政计划。这个保证完全出自该局的自愿。在会议上，我从不曾示意或告诉联邦准备局应该采取什么特殊步骤。我把我作为总统所面临的问题解释给他们听，他们走后，
我肯定地相信我已經取得了他們的同意，支持我們的財政方案。但是後來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們竟沒有支持這個方案。

協議最後總是達成了，但是這只是在財政部和聯邦準備局的不同意見給總統帶來了許多麻煩，給付稅人增加了許多負擔之後的事。貼現率以及公債發行問題顯然不足以成為头条新聞（自然，除非在財經刊物上），但是政府財政的穩定以及數十個個人的幸福都有賴於這些問題的解決。我對於解決所有這些財經問題的看法總是：我有責任使華盛頓保持其為美國財政中心的地位。財政中心應該在華盛頓——但是要把它保持在那裡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 四 章
国防和情报

作为保证我国今后的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步骤，美国古老的国防机构必须迅速加以改组——这就是我就任总统后的一贯主张之一。在我上任之初，我就力图使所有的军事机构合并，使三军统一归一个部管辖。

合并海陆军，统一归国防部领导这一想法的形成是经过长时间的演变的，在演变的过程中也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我就对我国军队组织非常有兴趣，这些年来为改进军队组织而提出的每一个方案我都曾进行过研究。

我在早年对军事史曾作过一些研究，因此我决定加入华盛顿在1792年奏文中所提到的“民兵”组织。民兵已经改名为美国国民警卫队了。

在国民警卫队里以及战后在后备队里当上校时所获得的经验，使我对像我们这样的共和国应该有什么样的军事机构，有了非常明确的概念。我在志愿部队里和后来在参议院里服务的经验对我后来作为最高统帅很有帮助。

从珍珠港事件的审讯记录里，我清楚地看出，悲剧的发生，固然是由于陆军或海军司令官的个人失职所致，但是，不健全的军事组织，无论在战场或在华盛顿都没有统一的指挥，这种情况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1941年，为了检查国防计划，在参议院里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我担任主席，我才充分认识到由于陆、海军部分立，互不协
調，所造成的浪費和無能到了怎樣的地步。我對以前我是不大了解的。我一直認為建立一個協調的國防機構是絕對必要的。在我這個委員會的檢閱台前通過的是由於陸海兩軍各行其事所造成的時間、物力、人力的雙倍浪費。這種情況更加強了我的上述信念。

作為參議院撥款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和國防計劃審查特別委員會的主席，我確信我們不設法協調海陸軍的活動，我們終將使這兩個分立的國防部門垮台，而當空軍也在參眾兩院成立它自己的特別委員會的時候，最後還會使這三個部門都垮台。

陸海軍軍事委員會的主席，特別是在發起撥款的眾議院里，都希望自己能當上陸軍部或海軍部長。有幾個眾議員，軍事撥款小組委員會和海軍軍事委員會的主席們，只要一有借口，就要調查陸軍要塞和海軍基地。這些地方要以鴨炮十七响，舉行閱兵儀式等等來迎接他們的。這些大人先生們就是合併機構的主要絆腳石。眾議院的海軍軍事委員會主席是最礙事的。

根據多方面的調查，我发现陸海軍造成了的難以計數的不必要的重復。例如，我發現陸海軍在國內各地，在巴拿馬，都建立有緊相毗連的八大飛機場，可是海軍的飛機不能在陸軍的機場上着陸，而陸軍的飛機也不能在海軍的機場上降落。這真是我從未見過的可笑做法。在珍珠港，陸海軍的空軍基地不相聞問，就像它們分處在兩個洲，而實際上它們還是緊挨在一起。而且海軍有它自己的“一支操海軍語言的小小陸軍”，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海軍陸战队。海軍還有一支自己的空軍。而陸軍也有它自己的能在內河和海洋作戰的小小海軍。

依我看来，不論在平時或戰時，最高統帥都應該有一個和衷共濟、通力合作的國防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過作戰經驗的野戰指揮官，無論是在陸軍中或海軍中，大多數都贊成成立一個統一的國防部。大約在我就任總統前不久到一年的時候，我在一個杂
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开主张海陆军合井。我列举了“杜鲁门委员会”所揭发的许多触目惊心的浪费事例，竭力主张成立一个新的国防机构，把所有的国防单位都合并到这么一个机构里来，归一个掌握实权的首长指挥。

在那份计划里，我提出人员配备和物资供给都应集中管理；陆海空军不应鼎足而三，而应该像一个整体一样，共同策划，一致行动。指挥大权应该由总参谋长直接掌握，以取得战略和作战的协调一致，而不应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在非法定的基础上，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权宜掌握。

1945年夏季我第一次有了机会，以总统的身份致力于军事机构的改组，当时海军部部长福莱斯特提出了增加海军和海陆战队的常备兵额的提案。我认为终止零敲碎打地提法案，拼拼凑凑地搞计划式的对待军队方面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了。8月21日，我写信给李海海军上将，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从陆海空军总的需要出发，审查海军方面所提出的法案。我建议审查当中应该考虑到战后我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新式武器的发展情况，以及和这些因素有关的陆海空军相应的地位。由于这个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才着手研究陆海军战后所需要的人力。陆军方面受命呈报战后他们所需人力的估计，于是陆军部指定一个以W・波塞耳准将为首的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

9月间，波塞耳委员会报告称，由于政治方面的考虑缺乏上级指导，而陆海军调整机构问题又悬而未决，所以不可能准确地估计所需的人力。它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它的特别委员会所提出的，曾经以三对一通过的合并陆海军的建议。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在10月16日给我提出汇报，并且附来了马歇尔将军、阿诺德将军、金海军上将和李海军上将的意见书。

总而言之，两位陆军将军支持合并，而两位海军上将反对合
于是在我面前的是，陆军参谋长和海军参谋长在合并军事机构这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上，有着截然分歧的意见。

就在这个时候，海军方面一直在为战后的国家安全制度它的计划。这个计划于10月18日送给了我，继续反对和海军合并，但建议组织更有效的联合委员会来弥补那些公认的不协调的严重缺点。海军方案的主要论点是军事方针必须通过建立高级机构和国家政策紧密配合。我完全赞同海军方面所强调的需要一些更有效的方法来促使军事计划和我们的外交政策合拍，我也同意我们需要配合国民经济制度工业总动员的长期计划。换句话说，我清楚地认识到，国防计划不光是改组武装力量的问题，而且需要和安全和防御问题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的各个方面取得密切协调。

就在这个时候，两个合并机构的法案提请国会里来了——一个是亚拉巴马州议员利斯特・希耳提出的，另一个是科罗拉多州议员埃德温・约翰逊提出的。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在10月17日展开了辩论，这一场辩论一直拖到12月17日，陆军和海军代表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眼看需要总统出面调停，我于是在1945年12月19日向国会提出议案，建议依照下列纲要把所有武装部队改组成为一个部。

（一）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防部，全权负责武装保卫国家的安全。

（二）国防部部长应由总统指派文职的内阁阁员充任。部长之下应设文职的副部长一人和文职的部长助理数人。

（三）国防部下应设三个密切合作的分支机构，各置部长助理一人，分掌陆、海、空三军。海军仍旧保有它自己的航空母舰上的或水上的空军，而海军陆战队仍应作为海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四）总统和部长在必要时应有权建立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中
央协调和服务机构。

（五）设国防部总参谋长一人，三个分支机构——陆军、海军和空军各设司令官一名。

（六）总参谋长和陆、海、空军的三个司令官应构成部长和总统的顾问团。

除了上述几点以外，我还着重提出，这个新部门的各个主要职位应从三军中抽调军官充任。总参谋长一职应由三军轮流担任，以免国防部对问题的看法成为由一个或二个军事部门所把持。

我声称我所提出的合并计划具备下列一些优点：军事计划和军事预算做到统筹兼顾；统一管理给养和军事机构较为经济；协调军事部门和政府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建立文职人员控制军队的最有效方法；建立一个同陆军和海军平行的空军部门；有计划地分配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属于的有限资源；执行始终一贯和一视同仁的人事政策。

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在12月下旬指定成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致力于寻求陆、海军双方都能接受的合并案。在八个草案都遭到拒绝以后，托马斯—希奇—奥斯汀议案终于在1946年4月8日被提到第七十九届国会里来。小组委员会费尽苦心才制定出一个可行的而又符合我提交国会的咨文所要求的议案。但是在听取该议案之后，到会作证的全体海军人员一致拒绝了这个最后的产物。

1946年5月13日，我召集陆军部部长派特逊和海军部部长福莱斯特尔到白宫来开会。在这次会议上，我极力说服陆军和海军，在合并问题上必须达成协议。我认为如果不以命令的方式促使陆、海军达成协议，效果会更好一些，所以我建议他们坐下来谈谈，找出他们不同之处，然后用书面形式向我汇报。

5月31日，两个部长送来一份联合报告，概括地提出他们所同
意和不同意的地方。他們的主要分歧包括以下四点：建立一个单一的军事机构；建立密切配合的海陆空三军；空军的管辖问题；海军陆战队的管理问题。

这四点就是陆军和海军经常发生冲突的基本原因。我深感失望，对于解决这么一个传统的冲突没有得到真正的进展。于是我确信只有由我亲自对陆军和海军间的四点分歧一一加以解决，才能为合并问题找出一条出路。6月15日，经过长期审慎的研究，我在给陆、海军部部长和国会中与海军军事有关的各个委员会的主席的信中作出了决定。

在这个决定中，我支持陆军部长的意见，只有统一的国防部才能真正做到协调一致。我也支持陆军部部长提出的应单独成立空军部的意见，空军部应该接管所有以陆地为据点的飞机，包括海上侦察机，反潜艇巡逻机和护航机。我认为这也很难以提出有力的理由为海、陆军双方继续保留以陆地为据点的空军的重复浪费进行辩护。

我同意海军提出的海军陆战队的任务保持不变的意见。我觉得如果海军陆战队有保留的必要，那么硬性规定陆战队参加两栖作战和陆地战斗的范围的努力将是徒然的。我认为海军提出的为了保证某一特殊海上战役的胜利，应该允许陆战队参加一些带有决定性战斗的理由是正确的。

除了上述的决定以外，我同意设立共同防御委员会，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中央情报局，采购供应局，研究处，军事教育训练处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法定机构。我一面促使法案的通过，使海、陆军能够早日合并；另一方面继续努力使海陆军同意这种法案的各项规定。

尽管在我的合并的决定中，某些基本观点不合海军方面的口味，福莱斯特尔部长还是作了巨大的努力，设法消除现存的分歧。
1947年1月16日，他和派特逊部长在一封联名信中通知我说，他们双方都能同意的合并折衷方案已经协商成功了。

这样的努力使我非常感动，因为这表明他们已朝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合并固然有赖于立法，也同样有赖于个人的合作。

接到达成协议的通知后，我发布了一项公开文告，其中提到我所草拟的一项行政命令，命令详细分别规定了按照希望通过的法案建立起来的陆海空军的任务。第二天，我又通知国会说，提请考虑的合并议案正在草拟中。

这一进展标志着合并军事机构这一漫长而艰难的斗争达到了最高峰。现在剩下的只是议案细则的拟订工作。在我的国情咨文中，我希望第八十届国会对于即将讨论的法案给予明智、审慎的考虑，因为这样做既能削减开支，又能确保国家安全。

1947年2月20日，我给众议院议长和参议员范登堡等送去一份议案，这个议案经过修正后通过将成为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案。这个议案最终在7月25日得到了通过，但是它已经不如送交国会的原议案那么有力了，因为要使陆军和海军的意见得到接近，议案包括了双方所作的让步。但是它毕竟结束了对合并原则顿时靡财的争论。而在我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出现全面的军事机构。

新的“国家军事机构”设国防部长一人，由文职的特别助理三人襄理部务。他对其他文职人员的权力仅限于他的本部门，而无权支配陆、海、空军的文职人员。

法案规定建立陆、海、空军三个行政部门，分别设置部长一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存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法律的承认。

法案规定在这一“军事机构”内建立弹药局，以协调三军的采购、生产和分配计划，并就军事情势拟订工业动员计划；法案还规定成立研究与发展局，以协调有关全国安全的科学研究工作。
法案还规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会由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陆、海、空军部部长、弹药局长、研究与发展局局长以及国家安全资源局局长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对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作出估计，并处理有关政府各部门共同利益的国家安全问题。

根据法案成立的还有一些重要机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置中央情报局，汇集来自各个方面的情报活动和材料，加以分析和估计；设国家安全资源局，协调军事、民用以及工业机构的需要。

我指派詹姆斯·福莱斯特尔为第一任国防部长，他在1947年9月15日宣誓就职。

促使合并的理想在立法上通过只是奠定坚固的军事基础的斗争的一部分。为了使这一机构在最初几个月内就发挥效率，我费了更多时间和精力。福莱斯特尔部长再接再厉地努力克服不是一个国会法案所能清除的、长期存在的竞争的局面。他的主要工作是确定陆、海、空军的具体任务，并决定如何分配预算，以保证完成这些任务。经过国防部举行多次的部务会议，他送给我一份划分三军任务的新规定，并且建议以这项新规定来代替在制定法律时我所颁布的行政命令。他的建议经过研究之后，我撤消了我原先的命令，并就这份对任务的新规定作了一些次要的修改，在1948年3月27日公布实施。

这个国家军事机构成立后的第一年中，我逐渐认识到国防部长需要更多的权力，以适应他所担负的责任。事情很明显，法案必须加以修正；重新规定，从而加强部长的职权；增加国防部的副部长一人；参谋长联席会议应设主席一人，海、陆、空军部部长不再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长为唯一参加委员会的军方代表；纠正一年来工作经验中所暴露出来的行政方面软弱无能的许多缺点。

1949年3月5日，我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就这几方面修正国家安全法案。整个说来，我提出的要求顺利地通过了立法手续。但
是在通过后的几个星期里，海军方面和空军方面却在报刊上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公开辩论。

冲突是由于3月间维福莱恩斯特尔担任国防部长的路易斯·约翰逊的行动引起的。约翰逊部长取消了海军订造的新的超级航空母舰。关于匿名攻击空军非法收买的B-86型轰炸机并怀疑它的战斗性能的问题引起了另一场争论。有些报纸和广播电台经常散布流言蜚语，中伤诋毁差不多每一个拥护合并政策的人，而这个政策对海军无论如何都是有所限制的。

冲突以整个海军哗然的局势出现。海军部长约翰·沙利文辞职，以示对约翰逊取消订造超级航空母舰合同的抗议。最后为了整肃军纪，我只得委任路易斯·丹菲尔德继任海军作战司令。最后总算同意了必要的修正，在1949年8月10日，我签署了1949年的国家安全修正法案，于是又向真正统一武装力量的路上迈进了一步。对我来说，国家安全法案和加强法案的修正案的通过是我执政期间突出成就之一。

我一直认为军事法案对于我国安全关系重大，使我遗憾的是国会没有在这方面采取另一个重要步骤。那就是目的在于制定合理的、适当的普遍训练计划的法案。在1945年秋天，我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要求，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反应。

然而在1946年12月，我还是指定了一个普训咨询委员会，研究同国家安全的全面计划有关的普训基本需要和各种计划。我要求委员会在12月20日向我汇报，并利用那次机会告诉他们我对

① 委员会包括下列成员：主席，哈佛大学理工学院院长卡尔·康普顿博士，委员，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哈罗德·多兹博士，前驻俄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前陆军部长副官小查尔斯·吉布森，《基督教先驱报》编辑主任罗伯特·波林博士，社会与工业关系顾问安娜·罗森堡夫人，前总统特别法律顾问塞缪尔·罗森曼，乔治敦大学副校长埃德蒙·华尔多牧师，通用电气公司经理查尔斯·威尔逊。
這個問題的看法。

我說，“我不希望把它當作普遍的軍事訓練計劃來搞，我只希望搞一個普遍的訓練計劃，讓我們青年有機會在一起過過有紀律的生長，使他們認識自己的健康情況和保護上帝賜給他們的昂昂七尺之軀的意義。如果我們給他們灌輸了這些，然後再給他們灌輸一種責任感——最初從對一城一縣的責任感開始，你就可以看到，首先我們將把我們的共和國交托給我們的後一代，就象麥迪遜和漢密爾頓和傑斐遜從前把共和國交托給我們一樣。”

經過將近六個月的深入的調查工作，還舉行了一系列的意见听取會，听取了二百多人的意見，委員會在 1947 年 6 月向我推薦了收集來的材料。委員們經過調查，得出一個全体一致的結論：普遍訓練是完整的國家安全計劃的一個重要部分，而這個計劃的制定是為了保障美國的安全，為了使美國能夠負起維護世界和平和發揮同盟國作用的職責。

這份長達四百四十五頁的報告列舉了三個理由來說明這個結論。

（一）妨礙聯合國發揮其效能的原因之一是別的國家認為美國日益喪失其作為道義上領袖所必需的力量，因而助长了其他強國策劃侵略戰爭的野心。

（二）普遍訓練提供了保持足夠數量的受過軍事訓練的後備力量的唯一方法，而這種力量又分散在民間，國家不致於因維持龐大的陸、海、空軍以及海軍陸战队的常備部隊而負擔過重。

（三）原子弹和新武器的發明使戰爭的範圍擴大，破壞性強而直接，因而每個城鎮都應有受過訓練的人員以應急需。

委員會建議實行普遍訓練，每一個合格的男性公民都應受為
期不少于六个月的普遍训练。计划就军事、教育、体育、道德和精神训练的需要作了审慎和详细的规定。

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中所提出的计划就是大约两年前我向我的内阁所表示的意见，经过彻底研究加工的结晶。我曾希望这份报告由一些有名望的、有代表性的美国人提出，将会促使国会采取行动，可是我的希望又一次落了空。

委员会提出这个报告三年以后，我仍在努力促使国会通过普遍训练的法案。我之所以感到非实行训练计划不可的理由之一，是我打算为我国因为体格的缺陷而不能应征或自愿入伍的34％的青年想点办法。我深信这34％的青年，如果能得到适当的锻炼，大多数都将成为身体合格、自食其力的公民。根据这样一种计划，我们要给我们的青年以公民教育，并且教育他们在不放弃其个人的宗教信仰的条件下，怎样和同胞相处。

我确实相信，当1945年我第一次提出这个计划时，如果国会予以通过的话，那么，我们就将有大批受过基本训练的人，就会使苏联有所顾忌，也许就不敢放手策动柏林危机或发动对朝鲜侵略了。

过去美国只要有一支小小的职业军队就可以解决问题。不幸的是，这种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军事实力是政治策略的决定因素；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是要有效地维护和平，那么外交上和战略上的考虑就必须审慎地配合起来。

一国的元首必须了解全世界的动态，才能在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立刻行动起来。总统必须掌握可能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的所有事实。自然，总统必须熟悉国内情况，因为总统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必须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归根结蒂，美国人民就是政府。

在1946年以前，总统所需要的这类情报，分别由好几个不同
的政府部门搜集。陆军部有一个情报处——G—2①，海军部也有它自己的情报组织——O.N.I.②。国务院从驻外使节取得它的情报，而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也各有各的途径从世界各地搜集有关金融、经济、农业的情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调查局在国外有过一些活动，此外，罗斯福总统在战时创立由威廉·多诺文将军领导的战略情报局也在国外收集情报。

当我在参议院任职时，政府各部门这种各自为政的收集情报办法最初给我的印象是无组织到了惊人的程度。我们参议院的各种委员会，在听取各行政部门作证时，往往为政府各部门所提供的情报感到惊讶，同一问题，情报竟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起初我还不明白这是由于获得情报的方法不同所致。不过，自此以后，我就常想，如果政府能够有一个互通声气的情报机关，那么日本偷襲珍珠港，即使不說不可能，至少也要困难一些。那时候，国务院所知道的事，军队方面却不完全知道，而外交人员也不从知道陆军海军方面所掌握的情报。实际上，陆军和海军也只是依靠一个非常不正式的办法互相交换他们的计划。

换句话说，我们从来未曾多考虑在政府里设立一个中央情报机构。显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没有派遣军队到欧洲、亚洲、非洲和大西洋、太平洋的岛屿上去时，还看不到需要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外情报系统。

战争给了我们上了这样一课——我们的情报收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必須做到在需要它的地方和在需要它的时候就能提出准确明了的材料。如果不是准确明了的话，那是毫无用处的。

---

① 陆军参谋部第二处(Second Section, General Staff)，即陆军情报处。

② 海军情报局(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譯者
在我就任总统后，我发现这种迫切需要的情报没有一处是一致的。各个部门在不同时间把报告送到我办公桌上，同一件事而报告的情况却完全相反。因此，我问李海海军上将对改进情报系统可曾想过办法。李海告诉我，在1944年，按照罗斯福总统的指示，他曾提交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个由多纳文将军制定的集中情报工作的计划。李海这样告诉我：这个计划提出一个由总统直接领导，只对总统负责的情报机构方案。但是，海军部却提出一个相反的建议。按照这个建议，就要设立一个负责全面工作的中央情报机关，但是每一个负责国家安全的部门要在中央情报机关里面分占一席。这个计划大部分是海军情报局副局长、海军少将悉尼·索尔斯提议的。

过后，我要求国务卿贝尔纳斯提出他对合并各部情报机构的建议，并且告诉他我已经请李海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我仍旧希望得到国务院的建议，因为国务院将会在该项工作中担当主要的任务。

国务卿贝尔纳斯认为这样的组织应该由国务卿负责，他和我商量由他来掌管所有的情报。可是，陆军部和海军部都坚决反对。他们坚持主张每一部门要有自己的情报，但也认为迫切地需要一个中央情报机关，把所有与整个国策有关的情报集中起来。这个机关将成为情报汇总地，由各个情报机关供给情报。这个情报汇总地将使那些负责制定军事和对外政策的人们占有指导他们行动的权威情报。

1946年1月，我在白宫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研究各方面提出的有关组织中央情报机关的各种计划。我很赞成陆军部和海军部在海军少将索尔斯的帮助下所拟订的计划。我已经准备把它付诸实施，可是预算局局长哈罗德·史密斯却极力要求延期，以便预算局的人员有时间仔细地研究一下。
“你是要从预算的角度作一番研究吗？”出席会议的罗森曼法官问道。

“不，”史密斯答道。“从情报的角度。”

“哈罗德，”我对史密斯说，“我知道你那部门里有很多情报专家，但是我认为这个计划还不错。如果你的人能把它搞得更完善，那当然更好。但是，这件事我已经盼望了很久。所以，你可以指定专人，在李海海军上将的办公室里，跟海军少将索尔斯共同研究，司法部也派人来，咱们一定得把它做好。”

当然也还有一些次要的不同意见。比方说，司法部就为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提出某些反对意见，但是并没有主要的分歧意见，所以不久就基本上达成了协议。

1946年1月20日，我颁布了建立中央情报组的行政命令。我把这个机构置于由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以及我的个人代表李海海军上将组成的国家情报局监督之下。我还指派海军少将索尔斯为中央情报组组长。

在建立新情报机构的行政命令公布以前，我下令撤销战略情报局。该局的人员和工作，一部分移交国务院，一部分移交陆军部。

海军少将索尔斯早就要退休，我向他保证只等陆军部、海军部和国务院三方面协商提出一个我所能接受的人选，我就解除他的职务。约莫过了六个月，它们一致推荐空军情报局局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于是我委任他为第一个常任组长。而我感到高兴的是，索尔斯少将同意留下来担任范登堡的顾问。

新的情报机构成立后，我开始收到每日简报和国外情报摘要。国务院给我国驻外使节以及海军部和陆军部给他们的驻部队的情报，只要和我国外交政策有关的也都给我一份。这样，我们终于建立了一个协调一致的情报系统，并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使
总统经常了解已经掌握的情报和目前发生的事件。

中央情报组在1947年改名为中央情报局。我每天第一个来见我的人往往是情报局局长。在李海海军上将继续担任最高统帅的参谋长职务期间，我和情报局局长会商时总有他参加；李海退休后，我把海军少将索尔斯调到白宫来，担任总统的情报特别助理的新职务。因此，每天早上中央情报局局长给我送来每日简讯时，他总在座。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三方面的通力合作给我一个良好的印象。通过协商委员会，他们找到一个解决他们之间共同问题的方法，从而避免了经常发生的职权范围的冲突。每天我交出去一个问题，很快就可以得到他们的明确答复。这种答复集中了他们最好的判断。这就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所以在离开波茨坦以前，我告诉这三个部门，我喜欢这种做法，并且要求他们以后继续通过这个委员会在一切共同问题上通力合作。

鉴于这种方法的成功先例，在拟定统一军事机构计划的同时，我坚持也要制定统一的政策。我希望在政府中设立一个永久性的上层机构，协助总统制定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决策。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案规定成立这样一个机构，那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时规定把中央情报组改名为中央情报局，归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给政府增加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机构。现在军事、外交以及资源问题就可以拿到这个委员会来研究和讨论了。这个新机构给我们提供了一本流水账，一份永久性的清单，使我们对所有有关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我们的处境如何以及我们往哪个方向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国家安全委员会原先系由七人组成。除了总统以外，还有国务卿、国防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空军部长以及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的成员，除我以外，有国务卿乔治·马歇尔、
尔，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空军部长斯图尔特·薛明顿，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耳，海军部长约翰·沙利文和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主席阿瑟·希耳。

1949年，我提请国会对于委员会的成员加以变动。从此以后，委员会就由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加进名单中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主席组成。总统依法有权在需要的时候，指定其他行政部门的首长参加委员会。

委员们起初喜欢携带许多不必要的顾问和助理，以致于不得不在1950年7月下令重申出席人数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其他列席人员以经我批准或特别讨论需要参与者为限。

我很感激国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在行政部门中设立了一个研究政策问题的中心机构。我只是把国家安全委员会当作产生建议的机构。跟内阁一样，委员会不作任何决定。政策本身必须由总统颁发，因为一切最后决策都得由他制定。

“表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只是议事的一个程序。委员会从来不制定政策。只有得到总统的批准和批准的表示后才能正式成为美国的国策。即使当时总统以主席的身份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且表示赞同，可是在委员会正式把文件呈交总统批准以前，事情还不能算是最后决定。在这个文件上应当提到会议的召开，并建议采取某种行动，而“这个建议是得到了您的同意的”。等到总统签署了这项文件之后，建议才能成为政府政策的一部分。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数虽少，但他们都具有工作能力很强的在职人员，因为他们都是工作能力很强的在职人员，是他们担任的职务，没有什么政治关系。按照我们的计划，这个组织应当是一个常设机构，不随政府的更迭而变动。为国家安全计划工作的人员必须继续连任，这一点对国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央情报局，作为一个助手，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有着密切
的联系，中央情报局的作用是：每当委员会要考虑一项政策时——例如，有关东南亚的政策——它就要求中央情报局对这个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估计。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列席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会议进行期间不断地提供情况。他所提出的估计代表中央情报局的判断和中央情报局所属的各个咨询委员会的分析判断。这些咨询委员会包括陆军情报处、空军情报处、海军情报处、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和原子能委员会的情报处。然后由国务卿提出政策的最后建议，由总统作出最后的决定。

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的初期，有一两个成员曾经想按照英式的样把它变为高级执行内阁。福莱斯特尔部长和约翰逊部长就时时对行政秘书施加压力。他们要他摄取监督政府其他部门的大权，并且督促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行政秘书正确地予以拒绝，声明如果国会要给他这种权力，那么就应该在法令中明文规定。事实上，法令草案原拟设置‘执政官’一人，国会为了避免误解，才把这个职位改为‘行政秘书’。

国防部长福莱斯特尔曾经倡议我们的政府机构可以仿照英国的内阁制。这个意见颇值得重视——有些地方，内阁政府的效能是比较高的；但是英国实行的是内阁集体责任制。而我们的制度是由一人，那就是由总统负责的。如果要作这样的改变，那我们就得修改宪法，而我认为，遵照我们的宪法，我们已经做得很好。我们按照原有的制度做，一定能做得很好。
第五章
马歇尔在中国的使命

美国人对中国人一向是友好的。美国传教士、美国医生和美国教授在中国住过很多年，他们所努力宣传的基督教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长期以来一直得到国内人民的热烈的支持。此外，在许多美国人的记忆里，中国摆脱了君主政体的枷锁，并开始把它自己从那个古国的深根蒂固的中世纪制度中挣脱出来。然而这个斗争在1931年还没有获得成功，当时，日本已开始进行长期的侵略计划，而随着岁月的消逝，这个侵略计划竟把这个曾经一度是大帝国的广大的土地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

1945年秋，美国被迫面临着多年来在中国所形成的严重的复杂局面。对于中国内部的分裂程度、国民政府对边远地区的控制力的脆弱，以及该国政府中缺乏人民的代表，所有这些情况是很少人真正了解的。

我们在美国往往认为中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事实上，在1945年，中国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自从1911年清朝帝国覆灭以来，中国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权力遍及全国的中央政府。当对日战争胜利时，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

建立一个新国家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罗斯福总统曾经倡导一种说法，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是因为他期望着将来，并希望以此去鼓励中国人民。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
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
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由于共产党人
占领了铁路线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占领东北和中南就不可能。
事情是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
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将被共产党人拿过去。
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常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
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
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
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
便将他们送上日本。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
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就在赫尔利大使于 1945 年秋回华盛顿之前，他拍回来一个电
报，其中包括有我们战时对华政策的总结。

赫尔利大使写道，"华莱士副总统于 1944 年从中国回来时告
诉罗斯福总统说，中华民国政府很快就要垮台。接着两位美国参
议员（布鲁斯特和富德勒）预言道，只有奇迹才能阻止中国政府的
覆灭。这种看法在美国和中国的文职与武职官员中间是非常普遍
的。罗斯福充分了解了这种形势之后才派遣我到中国去作为他的
私人代表的。罗斯福总统给我的指示主要有下列几点：

"（一）防止中国国民政府垮台。

"（二）维持战争时期的中国军队。

"（三）调和中国和美国军事机构之间的关系。

"（四）联合中国的抗日力量……

"可以概括地说……在战争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是军事
性的。即使是经济性的指示也带有军事上的目的……"

赫尔利和作为蒋介石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在实现头三点中做
了许多工作。然而，最关紧要的一点还是第四点。
中国的共产主义问题和其他地方的政治问题有很大的区别。蒋介石所面临的不是一个分散在全国人民中的富有斗争性的政治上的少数派，而是面临着一个控制了一部分土地和大约四分之一人口的敌对的政府。

我们在中国的处境很少有选择的余地。我们不能对这种局势简单地不加过问。在中国还有近两三百万的日本人，其中约有一百万以上是军队。除非我们确知这股力量是被消灭掉了，否则，即使日本人是被打败了，他们仍可以光靠他们在争夺统治权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而控制住中国。

另外一个办法也是同样行不通的。这个办法就是，为了击败共产党人，把日本人从大陆上驱逐出去并用实力迫使俄国人从东北撤退，必须将无限制的物资和大量的美国军队投入中国去。美国人民是不会赞成这样一种计划的。

因此，我们断然认为，摆在我们面前唯一的行动途径就是用一切办法在中国帮助维护和平，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一定限度内对军事上支持蒋委员长。但是我们不能卷入中国的这场阅兵之争。

魏德迈将军在抗日战争的最后日子里，曾以这样的话来描述这种情况：

“毫无疑问，中国人民对于军阀和横暴无比的、不称职的官员对待他们的态度是有许多怨言的。可是，要满意的解决中国问题或世界秩序问题，是决不能靠在地区进行内战来完成的。

“根据有限的材料便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都缺乏民主精神或民主的意向。由于95%的中国人民是文盲，也由于其他许多令人信服的理由，中国是不打算成立一种具有民主形式的政府的。无知的中国人民大众需要和平，他们对于现有的各种思想并不特别感到兴趣，也并不懂得那些。他们最关心的乃是工作机会，为他们的家庭获得食物和衣着以及一个幸福的和平环境。
“这儿的情况最好是能够让一个仁慈的暴君或者是军事独裁者来掌握，至于这样的独裁者是共产党人，或者是国民党人，那倒是无关紧要的。根据我的观察，差不多所有的中国官员对他们自己的扩张都感到兴趣。我有这样的印象，蒋委员长的领导在这个时候对这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提供了最有利的机会。”（着重点是作者所加的。）

整个战争期间，美国以各种方式对华表示了友谊，举例来说，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就超过了十五亿美元。当宋子文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我们在外交上给了中国很大的支持。这次会谈的结果订立了中苏友好条约。

赫尔利大使致力于使中国共产党人和蒋介石政府坐在一起，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争端。大使在给我的一系列的长篇电报中告诉我他对时局的一些看法。他起初到中国去并不是以我们的外交代表身份而是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身份去的。在他给我的许多电报和报告中，他对国务院对一些职业外交家的判断和判断表示怀疑。和我一样，他非常强烈地感觉到，美国必须成为亚洲的反帝国主义拥护者。赫尔利抱怨说，国务院对他的报告与建议没有给予他认为应该给予的优先重视。

最后，在1945年8月10日，他又再度陈述——正如他以前几次所陈述的那样——他所了解的罗斯福总统的在亚洲的长期目标。他陈述了他在促进这些目标方面所作的努力，并引述了几个人在华盛顿作出的决定作为例证。他认为这些决定的目的就与他所认为的最明智的办法不同。于是，他要求准许他回华盛顿。他电报给国务卿说，“我愿意有机会和你及总统讨论美国对亚洲政策。”

赫尔利回国之后，他便与国务卿贝尔纳所到白宫来，一星期之后，赫尔利和魏德迈两人来自白宫作了一次更详尽的讨论。
地告诉他们，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但是我们却不能卷入中国的内战中为蒋介石作战。

赫尔利告诉我，尽管有他与魏德迈所承认的一切缺点，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前景还是很可乐观的。在经济方面，中国的潜力与1937年以前几年的情况没有很大的区别。当前的主要问题看来还不是生产而是分配。在财政方面，我们的不断的援助使中国处于一个多年来没有过的好情况，在政治方面，赫尔利将军刚刚成功地使得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去重庆与国民政府的领袖们举行直接谈判。谈判的结果，中国的领袖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于赫尔利第一次到白宫来的前两天即10月11日公布了。①在那个时候，人们有理由希望，中国的问題是可以解决的。

赫尔利亲自看到了签订这项协定的筹备工作，他告诉我，中国走向真正的和平是有希望的。这项协定要求召开一个制订新宪法的制宪会议——国民大会，并规定了使得一切党派都能参加的条款。显然，蒋介石在制宪会议中将占有优势，因为他在会议中的代表人数要比共产党多。

一个包括有四十个人的临时委员会——由蒋介石指定的，但半数以上的人都不是国民党人——将处理这些事务，直到新宪法付诸实施为止。蒋介石对这个会议的任何决定都可以加以否决，虽然该委员会五分之三的票数就可以拒绝这种否决。

这是一项很好的协定，我对赫尔利所做的使这项协定成为可能的出色工作表示祝贺。然而，这项协定却从来没有产生效果。

那时，蒋介石的军队正在开往日本人所控制的地区，他的一大部分军队是靠我们的空军的运输机来向北方运送的。我们的五万名海军陆战队也在好几个重要港口登陆了，所以，通过这些港口，

① 这里指的是1945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双方代表签订的《双十协定》。——译者

74
日本人的遣返工作就能繼續進行。共产党人要国民政府停止运送这些军队，因为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在利用这种形势来加强反对他们地位。他们对这一点也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他们尽可能地切断铁路线，重庆政府很快地开始收到报告说，中国共产党人违反了协议，在向东北移动。由于互相攻击有增无已，双方的敌对情绪愈来愈增长。

11月4日，我们驻重庆的大使馆报告说，内战看来将要爆发，原定于11月20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議也停止召开了。11月25日，中共驻重庆的主要代表周恩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第二天，他的第一副手也接着回去了。这时，武装冲突的消息已时有所闻。我与赫尔利于11月27日在白宫讨论了这个局势的严重性，我们一致认为，最好是他立即回到重庆去。他向我保证说，他只待办完几件私事后就回中国去。

这次谈话大约是在上午十一点三十分，但是不到二小时，当我正在与内阁成员举行每周内阁午餐时，有人找我去接电话。这是一个白宫的一个记者从全国新闻俱乐部打来的电话，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告诉我，赫尔利大使刚才在俱乐部发表了一个强烈的演说，对政府、国务院、我们的外交政策和个人进行了攻击。

对我来说，这完全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我现在还想不透，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无论如何，我认为赫尔利必须到中国去，内阁一致同意了。第二天，赫尔利果真向报界发表了一封“辞职信”，但是事实上，不管他发表或不发表那封信，他都会不干的。

赫尔利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几个星期之后——1946年1月——他特别来找我的新闻秘书查理·罗斯。他对罗斯解释说，他很想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为我效劳，他希望罗斯告诉我，他辞职时没有蓄意说过任何对我个人进行批评的话。
“他要求我相信，”罗斯对我说，“他是‘与你站在一起的’。”

赫尔利继续对罗斯说，“贝尔纳斯是一个聪明人……但是，他没有从国务院掌管机要的人那里得到充分的情报……贝尔纳斯对中国苏关系没有理由激动，因为这些关系在去年8月的中国和俄国所签订的协定中全都写下来了……”据赫尔利说，贝尔纳斯感到不必担心的理由是，“斯大林遵守他的诺言”。

中国现在看来是被逼向更麻烦的境地去了。我们不能派遣军队之类来保证蒋介石的优势。我们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是发挥我们的最大影响来制止内战。担任此项工作的人必须具有独一无二的资格和极高超的才干。就在赫尔利在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的那一天的午宴上，马歇尔将军的名字被提出来了。他刚刚把陆军参谋长的职务移交给了艾森豪威尔将军。恐怕没有人比马歇尔更应该享受光荣而安静的退休生活了。可是我想不出一个比他更合适的人来担任出使中国的艰巨任务。

我到白宫的红房去打电话到利斯堡马歇尔将军的家里去。在未作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我通知他说，“将军，我希望你代表我到中国去。”马歇尔只是说，“是的，总统先生，”突然就把电话挂上了。

两天之后，当马歇尔到白宫来与贝尔纳斯和我一起讨论他的使命时，我问起他为什么不问任何问题就把电话挂掉。他向我解释的理由是，马歇尔夫人和他刚刚坐车到家，他正在取下他们的东西时，电话响了。他不希望让关心他的健康的马歇尔夫人知道他们的退休是社区短暂。因此，她在她可能听到谈话的任何部分之前就把电话挂上了。他希望把这个消息慢慢儿透露给她。但是当他几分钟后打开收音机时，他所听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宣布将军使命的特快新闻报道。

“我们前面的困难很多，”他承认说。

那天下午，我和马歇尔及贝尔纳斯对中国的局势进行了长谈。
应马歇尔的要求，我叫他只管前去国务院，和他们一道根据我们的
讨论拟订一套指令，这些指令就成为我对马歇尔这次使命的指示。

这些指令是马歇尔与国务院共同起草的。12月11日，我与贝尔
纳斯和马歇尔在另外一次会议上详细地加以检阅。12月14日，
我当着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面将这份文件的定稿交给了马歇
尔，下面便是文件中所包括的指令本文：

“亲爱的马歇尔将军：

“在你行将离此前往中国的前夕，我要再一次重申我对你愿意
担任这项艰巨的使命的谢意。

“我对你完成你担负的工作的能力有着极大的信心，但是，我
愿意将贝尔纳斯和我对你这次的使命有关的一些意见、想法和目的
告诉你，如果你认为它们对你有些指导作用的话。

“我在这里附了几个文件，我认为这些文件应该被看成是这封信
的一部分。第一个文件是美国对华政策声明，据我了解，这个声
明是与你以及国务院的官员商量之后拟定的。第二个文件是国
务卿给国防部的有关中国的一份备忘录。第三个文件是我向新闻
界发表的关于对华政策的谈话的副本。我知道，这些文件已经给
你看过，并得到你的赞同。

“我邀请你去中国这个事实，便使我非常关心中国局势的最明
显的证明。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我两个人都热切地盼望尽可能快地
用和平民主的方法达到中国的统一。我希望你，作为我的特别代
表，以适当和实际可行的方式，用美国的影响来达到这个目的。

“特别是，我希望你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有重要的政
党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以获致中国的统一，同时，设法停止敌对
行动，特别是华北的敌对行动。

“据我了解，重庆现在正在召开一个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由
各个政治团体的代表组成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将使你获得方便的机会与各方面的政治领袖进行讨论。

“当然，正如上面所大致讲过的，你的这番努力能否成功将大部分依赖于我们下述计划的实现，即从中国，特别是从华北撤出日本军队，然后再从中国撤出我们自己的军队。我特别希望，这两个任务都能尽快完成。

“在你与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袖的会谈中，你有权以最坦率的态度和他们谈话。特别是在谈到关于中国人需要贷款、经济方面和技术援助以及军事援助时（我的意思是指那个经我在原则上批准了的拟议中的美国军事顾问团），你可以讲，一个不统一的、被内战弄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实际上不可能被认为是在上述各方面取得援助的合适的地区。

“我热切地希望，你能将你在会谈中的进展和所遇到的障碍及时地告诉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我。你将会得到我们充分的支持，我们将将在任何时候尽一切努力给予你帮助。

“1945年12月15日，华盛顿”

附入的第一个文件题名“美国对华政策声明”。

文件写道，‘美国政府认为，这个新的、具有无限希望的时代的和平与繁荣，有赖于联合国组织的各主权国家联合起来，共谋集体安全。

“美国政府坚信，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对联合国组织的成功与世界和平，最为重要。一个被外国侵略，有如日本所进行的，或被残酷的内战弄得四分五裂的中国，乃是对现在和将来的世界的稳定与和平的一个破坏性影响。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遵循这样的原则，管理内政是主权国家人民自己的责任。然而，本世纪内的各次事件告诉我们，对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和平的破坏都会
威胁到整个世界的和平。因此，为了美国和所有联合国国家的最大利益，中国人民应立即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抓紧每个机会来调整他们的内部纠纷。

“美国政府认为主要的是：

“(一) 在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意见不同的中国军队之间，应该协商停止敌对行动，以便整个中国完全回复于中国人有效的控制之下，包括立即撤退日本军队在内。美国政府准备——如果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邀请——帮助安排必要的保证，并将邀请联合王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共同来参加这种努力。

“(二) 安排一个由各主要政党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以期早日解决目前的内战——内战的解决将带来中国的统一。

“美国和其他联合国国家承认目前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它是达到统一中国目标的最合适的机构。

“美国和联合王国根据1943年的开罗宣言，苏联根据去年(1944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以及1945年8月的中苏条约，都有义务保证中国的解放，包括将满洲归还给中国人民。这些协定都是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

“美国为了与中华民国政府继续进行在战争中的经常与密切的合作，必须按照波茨坦公告，并为了消除日本军队在中国可能遗留下的影响起见，便在解除日军武装和撤退日本军队中担任一个确定的义务。因此，美国一直在帮助并将继续帮助中华民国政府解除收复地区的日军武装和撤退日本军队。在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就是在执行这项任务。为了同样的理由，美国将继续供应军需物资，并将进一步继续帮助中国国民政府运送军队，以便它能重新控制中国的收复地区——包括满洲。

“为了促使停战和计划中的国民大会的悬而未决的临时协定的实现，美国将不把国民政府的军队运入像华北等地区，以免妨碍
达成停战和政治协商的目标。

“美国承认，并将继续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并在国际事务上，特别是在消除日本在中国的影响方面，与它进行合作。美国深信，立即达成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是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非常重要。美国将尽可能避免使它对任何意见不同的中国团体所提供的援助产生附带的影响。除了这些附带的影响以外，美国的支持将不会扩展到以军事干涉去影响任何中国内争的进程。

“美国认识到，目前中国的国民政府是一个‘一党政府’，并相信，如果这个政府的基础扩大到包括了这个国家的其他一些政治党派的话，那末中国的和平、统一和民主改革将迈进一步。因此，美国坚决地主张，这个国家的有各主要政党派有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应取得一致的协议，让这些团体在国民政府中都有公平合理和有效的代表席位。美国政府认为，此举将需要修改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孙逸仙博士为国家向民主发展而创立的临时办法的一党‘训政’制。

“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自性军队的存在是与中国的政治统一不相容的，而且实际上使这种政治统一成为不可能。随着一个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的政府的组成，类似这种自治军队就应该取消，而中国所有的军队都应该有效地合并入中国国军。

“美国遵照它一贯表示的对自决权的主张，认为中国在取得政治统一上所必须的详细步骤应该由中国人自行制定，任何外国政府在这些事情上进行干涉都是不适当的。不过，美国政府感到，中国对其他的联合国家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就是消除在它境内的构成对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的武装冲突——国民党政府和中国所有的政治与军事集团都有这个责任。为了帮助中国人克尽这样的责任，美国政府愿意参加并将邀请联合王国和苏联参加商讨关于确保立即停止这样的武装冲突的必要条件。
当中国沿着上面所说的道路走向和平与统一时，美国就准备以一切合理的方式来帮助国民政府重建其国家，改进农业和工业经济，并建立一个能够履行中国为维持和平与秩序而担负之国内与国际责任之军事组织。特别是，美国准备答应中国人的一项要求，在中国设立美国军事顾问团，并在中国政府需要和美国政府能够供应的情况下，派遣经济和财政方面的这样一类的另外一些顾问，并对中国人在合理的计划条件下所要求的信用借款给予善意的考虑，俾使这种计划有助于发展中国的健全的经济和中美两国之间的正常的贸易关系。

必须明确地承认，要达到上述的目的，将要求美国付出一些物资，并暂时维持驻在中国的美国陆海军队。然而，这些支出与我国被迫在恢复为德国和日本侵略所破坏的和平方面所支出的数目相比较，就微不足道了。这些支出与未来的全球性战争的支出相比较也将是不足挂齿的。在这样的战争中，现有的新式的和可怕的武器一定会使用出来。美国曾为之付出了巨大的财力与生命而取得的果实必须不再受到损害。

第二个附带的文件是给国防部的一份备忘录，内容如下：

“总统和国务卿都迫切地盼望，将通过和平与民主的方法尽快地实现中国的统一。

在 12 月 7 日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的一次公众意见听取会上，国务卿说：

“在战争期间，美国在华的直接目标是促成几个党派在军事上的统一，以便运用他们的联合力量来对付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我们的较长远的目标——当时如此，现在也是如此，这一目标至少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是发展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和民主的中国。

“为了达到这个较长远的目标，中国的中央政府以及各种意
见不同的团体必须以协商的真诚愿望来逐步解决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我们认为——正如我们长期以来所认为的和一贯表明的——蒋介石委员长的政府在发展民主政治方面提供了最令人满意的。但是我们也认为，它还必须扩大，以便包揽那些现在在中国政府中还没有任何人参加的大少组织得很好的团体的代表。

"这个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它需要机智和果断，忍耐和自制。光靠中国领袖们自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影响是一个因素，成功与否将有赖于我们在变动的情况下，运用我们的影响，促成中央政府、所谓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彼此让步。"

"总统邀请马歇尔将军作为他的特使前往中国，目的在要他以一种适当和实际可行的方式，运用美国的影响来达到上述目的。特别是，马歇尔将军将努力影响中国政府来召开一个包括主要政治党的代表的国民大会，以求得中国的统一，并同时实行停止敌对行动，特别是在华北。

为了答复魏德迈将军最近的信，国务院要求国防部对他作下列指示：

"（一）他可以帮助中国政府运输军队到满洲港口，包括对这些军队的后方勤务上的帮助。

"（二）他也可以加强部署，尽速从中国战区遣返日军出境。

"（三）在马歇尔将军在重庆和中国领袖的会谈，以筹备一个包括有主要政党派的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和停止敌对行动的。结果之前，除去利用华北港口运输部队和物资至满洲以外，将停止再运送中国军队至华北。

"（四）运送中国军队至华北的部署应即准备妥当，但可不必通知中国政府。当马歇尔将军决定在下列情况之下，即；（甲）进行
运送中国军队至华北之工作，不致妨碍商谈；或（乙）中国党派之间的协商业已失败，或显示已无成功的希望以及为履行投降条件和保证美国维持国际和平与长期利益的情况之下，使运送部队有必要之时，则此种部署可即付诸实施。”

这封指示信中的第三个附件是一份新闻电讯，它基本上与第一个附件的政策声明相似。

马歇尔于次日（12月15日）乘飞机离开华盛顿。他于12月20日到达中国，并立即开始研究情况。他那通过国防部电台转给我的电文，虽然文字很朴素，却叙述了一段历史，其中包括了中国历史上戏剧性事件中的一切要素。

马歇尔将军以谨慎的态度在中国开始进行他的工作。他花了好几天的时间专门倾听人们的意见。他同蒋介石作了详细的长谈，但后者很少谈到共产党，而对俄国人继续留在满洲则表示非常关切。马歇尔还会见了各党派的领袖，包括共产党人，并对许多蒋介石政府的官员，我们自己的大使馆人员、记者以及其他一些当时在中国的美国人讲了话。

他发现每个人都赞成中国统一，但是就没有人以切实可行的话回答得出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理想。马歇尔指出，这正是问题的所在，需要在这上面做些工作。他是能够间接敦促国民党内和共产党的领袖举行一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起初，中央政府对于这个建议的反应完全是一步不让的，但是经过马歇尔将军的建议，便提出了一项建议案。这项建议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指定代表来同马歇尔商讨关于实行停战的方法，并由政治协商会议选出一个委员会来提出关于解决纠纷地区的建议。

马歇尔已经计划好实施停火的机构。他计划组织包括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代表的小组，每组内有一个美国观察员，在必要的时候
給予战场上的行动以一种公正的处理。

1946年1月8日，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之间的谈判几乎已快达到达成协议的程度。然而，国民政府坚持认为应让他们的军队继续开进热河省与察哈尔省，来占领苏联军队已撤出的或行将撤出的地区。另一方面，共产党则宣称他们已接管了各重要的据点。

停战命令定于1月10日上午十点钟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宣读。在前一个晚上，马歇尔曾劝蒋介石发布停战令时不要提到热河与察哈尔两省的事，然而，直到10日早晨才达成最后的协议，距预定宣布停战令前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

一俟发布了停战令，马歇尔即着手筹划预定设在北平的所谓执行部。然而却遇到一些拖延，因为共产党发现他们从分散的部队里调来足够的军官有困难。当最初几天开始行动时，证明了这个机构是切实可行的。

现在马歇尔着手继续安排下一步工作，那就是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一个三人军事小组经同意成立了，由马歇尔担任顾问。

在这些事情中，马歇尔尽可能地避免任何类似施加压力或授意等事。他常常在等待中国人（国共两方面）邀请他去参加他们的会谈。不然，他只是以一个个人对另外一个个人谈话的方式来和他们谈话。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间曾遇到许多挫折。

举例来说，蒋介石就要求马歇尔说服共产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接受中央政府的建议。马歇尔用下列话来回答蒋介石说，他没有看到两方面曾提出了什么明确的纲领或建议性的举动。他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建议草案，建议把中央政府从一个国民党的执行机构（当时它是合法的）变成一个联合政府，以全中国的国家主权为其基础，这个草案还包含有简短的民权条款。

马歇尔在这一点上作出了不参加政治讨论的聪明的决定，虽然他可能正式地按两方面邀请去作调解人。他对这次使命的正确
观点是，如果可能的话让战争停下来。他尽量避免去参加纯属政治性的事。

然而，在军事方面他却是最积极的。他担任监督停火的三人小组的主席，并担任了着手改组中国军队的委员会的顾问。

在最初的阶段里，共产党代表对于马歇尔的态度看来似乎比中央政府的领袖们还温顺些。他印象中觉得，共产党人感到他们在政治战场上比在战术性的军事战场上更容易取得胜利，因为他们组织控制得比较严密，而在国民党方面则还有许多未发议论的分子。他印象中还觉得，共产党人比国民党人更倾向于在政治斗争方面多利用机会。马歇尔似乎觉得，国民党人看来好象已决定要采取实力政策，而他认为这将使他们走向毁灭的道路。

2月4日，马歇尔向我报告说，“事情是进行得比较顺利的”。政治协商会议看来已在走向通往民主改革之路，整军的协定看来也已不远了。

马歇尔少则每星期一次，有时每星期两次或三次发给我一份很长的电报。他曾指示他的部下说，这些电报应立即发给我，而我也曾把这个特别任务托付给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让他亲自负责使马歇尔将军发给国务院的每一个电报都在二十四小时内得到回电或答复。

马歇尔从中国发来的电报使我能紧紧地跟得上事态的发展。马歇尔将军冷静地写下了非常详尽的实况报告。由于我没有亲身参与其事，我就无法要求比这了解得更多了。
第六章
俄国人在中国

早在1946年2月，俄国人就开始在中国寻畔。根据我所得到的报告，显而易见，俄国人正在利用他们答应从满洲撤退作为手段，从而取得这个战略地区中的举足轻重的特权。

中俄两国在1945年8月所缔结的共同防御条约承认满洲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俄国人只保留如铁路运输等某些权利。自从俄国参加对日作战后，他们就占领了整个满洲。俄国人在一个后来与中国政府所签订的协议中，答应以1946年2月1日作为撤退他们军队的最后的日期。

1946年2月9日，马歇尔写信告诉我，满洲的“局势令人担忧”，他接着写道，他已告知中国的外交部长说，“中国必须以尽可能快的步伐继续完成它的计划中的统一工作，以便消除它目前所存在的易遭苏联暗中攻击的弱点，只要中国有一个独立的共产党政府和一支独立的共产党军队存在，这个弱点也就存在。”

马歇尔又写道，“其次我告诉他，我认为他不应该对苏联政府许下诺言——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答应给它以它所要求的包括经济特权之类的战利品。……

“我告诉王世杰，我认为对苏联来说是不利的，因为它的军队留在满洲的时间愈长，在世人的心目中，它就愈加清楚地变成为一个故意违犯条约的国家。……”

马歇尔对我谈，他这次的报告写得非常详细，“因为我感觉到这不仅在我的使命之外的事情方面牵涉到我，而且也许比目前其
他問題對世界的協調一致更有危險性。……

“我們必須馬上在這方面對中國多做些工作，少給些忠告。……

我們必須馬上在這裡尽可能快地騰出我們的手來，以避免與俄國人發生類似今天英國在希臘駐軍方面所發生的不可避免的爭吵。我們必須結束‘中國戰場’而且代之以迅速派遣軍事顧問團。魏德邁在我的催促下實際上已在南京組織這個顧問團。在這方面，除了留下一些偵察部隊、運輸部隊和一些留守部隊和地方警衛部隊之外，我們必須從中國撤出一切海軍陸戰隊。最後撤退的日期應該立即決定……我並非要求現在立即開始這一行動，但是我希望在下一個月就着手做。在這段時間內我同意大量減少海軍陸戰隊的力量。中國應宣佈要派遣軍隊到日本去的意圖。……

“由於中國具有統一國家的明確的實在，由於美國撤退部隊撤走之後出現的困境，以及由於它的部隊參加了駐扎日本的盟國占領軍，因而提高了它的地位，中國到那时就可以將滿洲問題提交遠東委員會。……”

我於2月12日回信給馬歇爾說：

“親愛的馬歇爾將軍：

“……我很贊同你所提出的新試驗性的行動。

“关于派遣美軍顧問團去中國的問題，參謀長聯席會議不久就可將一項計劃修訂完成，他們所提出的方案將送給你，征求你的意見。

“我對你所提出的關於從中國戰場撤退軍隊的建議很感興趣，並且很願意知道你對於撤退軍隊的日期的看法。魏德邁將軍最近的報告表明，根據他目前的計劃，中國軍隊進入滿洲要到1946年

87
9月1日才能结束，而对这些军队的后勤支援工作要到1946年10月31日才能终止。

“由于中国军队运入华北是要看所担负的使命的进展情况而定，因此我认为关于这一战场活动阶段的可能日期的情报，到目前为止都是不可靠的，我希望你顺利完成你的使命，以便这种活动无须进行。

“我将以极大的兴趣等候着你的关于从华北撤退海军陆战队的进一步的建议。

“你所提及的关于英国军队驻在印度尼西亚和希腊而引起的事件发展，使我更加迫切地希望，一旦美国军队在执行我国对中国的政策方面已不再必要时，马上从中国撤出。

“至于你所谈到的远东委员会与满洲问题的关系，我认为该委员会所能给予满洲形势的唯一实际可行的考虑将在赔款方面，那就是处理日本在满洲的财产。我想你也具有同样的看法。我们认为，远东委员会只应该考虑直接与投降、解除武装和管制日本有关的问题与政策，它的活动范围不应该扩大到带有更普遍的性质的远东问题。

“请允许我再一次对你表示我的信任和崇高的敬意。”

和马歇尔一样，我希望他所建立的三人小组会很快地结束中国的内战。这些三人小组就是停战小组。每一个小组都是由一个国民党军官，一个共产党军官和一个来自马歇尔执行部的美国军官所组成的。

为了在中国两方面军队间的停战协定上增加它的影响，马歇尔曾作了三千英里的飞行，跑遍了整个华北，直到内蒙古的边境。

① 指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协议建立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下面的执行小组。——译者
他和这个地区的重要司令官谈过话，并向我提出报告说，他
能够在这个地区内促使他们普遍了解停战以及为了实现停战而设
立这个机构的目的。在延安时，他曾和毛泽东晤谈过。

困难是非常多的，并且有不少仍未得到解决。然而马歇尔认
为，他的第一阶段工作已在完成了。中国两党之间已达成了停战
协定。彼此之间的猜疑气氛也稍为减轻些了。马歇尔现在要求回
华盛顿来和我作一次个人商谈，并作出一个援助中国政府各个部
门的计划。我很想见到他，就批准了他的提请。

他在回来之前曾就他所见到的形势向我提出了一个详细的报
告。他于3月14日抵达华盛顿之后，我曾和他作了好几次长谈。

他告诉我，就在他离开中国之前，蒋介石最后答应让停战小
组进入满洲，而这在以前他是反对的。实际上，马歇尔认为这一情
况使他可以暂时离开中国一下，以便在华盛顿着手进行几件在内
认为有助于解决中国问题的事。然而，马歇尔离开中国之后，蒋介
石对到满洲去的停战小组的权力曾加以极严格的限制，以致他们
都无法执行任务。结果，战斗又在满洲的几个地区爆发了，而且还
由此蔓延开来。

例如，在4月6日，马歇尔的代表李勒姆将军报告说。国民党
政府当局在沈阳扣留了停战小组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在北平还逮
捕了另外一些人。而且“中国空军”的飞机还在共产党的中心延安
城市上空“盘旋”。另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俄国走了之后立
即占领了满洲的重要据点。还有的情况是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军
队已经占据了的地方，共产党军队向他们进攻，并把他们赶出去。

马歇尔将军把他逗留在华盛顿的短短几十天时间都花在和政
府官员们商谈关于贷款给中国的计划上，以及关于以船只和剩余
物资的形式援助中国的计划。他能够取得协议，促使当时储存在
中国的剩余物资转交中国，并保证中国可以得到若干小型沿海与
内河的船舶。我命令财政部在各方面都和他合作，并达成了一项协议，立即给予中国五亿美元的贷款。什么都办好了，只差中国方面在这个文件上签字。不幸的是，蒋介石的代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坚持要在他签字之前做一次修改。使事情更复杂的是，蒋委员长在同一天在中国发表了一项演说，这个演说实际上就是要诉诸武力。财政部认为，如果在中国不能实现政治解决，那末给予贷款就不符合我国的政策，这种看法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他们的看法是对的。

马歇尔将军于 4 月 18 日回到了中国，他差不多一落脚就碰上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指控，说美国飞机轰炸了他们驻在四平街的军队。但是，马歇尔执行部能够证明，这些飞机虽然是美国制造的，却属于国民政府所有。

四五间，我一直收到共产党在满洲取得胜利的报告。经过热烈的战斗之后，他们占领了省会长春，又在没有遭到国民政府军队的抵抗的情况下占据了满洲的北部工业中心哈尔滨。蒋介石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在满洲实行停战的建议，尽管他显然无法压制他们。敌对行动蔓延到了中国内地，到了汉口附近和南京近郊。

马歇尔的停战小组急忙赶到冲突地区去制止这种趋势，停战命令在某些重要省份生效了。事实上，直到 5 月下旬马歇尔认为可以将在中国有可能重新实现和平的迹象报告我的时候，情势才有好转。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似乎承认让共产党军队占领满洲的大部分。他不再坚持要收复那些已失去了的城市，他似乎在考虑让马歇尔执行部的三人小组来接管长春，认为这是一个可能实现的折衷方案。当然共产党是不愿意放弃那个重要城市的，他甚至还不愿意交给中立机构来管理。

这种政策上的显著改变只是一时的，可是，当蒋介石在沈阳和其他重要城市同他的将军们磋商之后，他又重新拾起了早先的老
方案。他要求共产党恢复被他们切成好几段的华北的交通线，以示他们的诚意。他又提出问题说，他怀疑马歇尔个人是否准备为共产党的诚意打保票。

马歇尔第一次发出了低沉的调子。

他打电报给我，说：“我是在逆时而行，不然的话我是很有希望的。事实上，成功不是建立在谈判问题上，而是建立在战场的发展上。”

只是由于马歇尔的坚持，才找到了一些和平解决的基础，最后，达成了在一顶在满洲暂时停火的协议。6月7日，双方答应休战十五天，由马歇尔的参谋长杨凌德将军率领的小组到长春去监督停火。

马歇尔写信告诉我，他希望在这段暂时休战的时期内，取得一个较长期的解决方案。但是两方面似乎都非常不愿意这样做。国民党政府在满洲的司令官一再扬言说，他准备十五天之后立即重新向共产党的阵地进攻。另外一方面，共产党拒绝国民党政府的计划，认为它只是过分的要求。不幸的是，蒋介石的建议中有三个建议是，当中国双方无法取得协议时，停战小组中的美国成员应有最后决定权。自然，共产党只是把这个提唱看成是指控的根据，说美国是站在国民党方面的，他们不理解这个计划。

国民党政府的要求是，共产党除了从满洲之外，还应该从华北的某些地区退出，共产党对此也加以拒绝。当国民党政府宣称已把两个军派往这些地区时，马歇尔断言说，“现在我们已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当时有一些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人物颇有信心地认为可以在战场上打败共产党，这种估计在马歇尔看来是极端错误的。他认为蒋委员长的军队不但不可能很快地取得胜利，而且还失去了这种立即取胜的机会之后，他们会发现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得到苏
联支持的共产党。最后，失败的只会是蒋介石——要不然就是美国进行全面的干涉。

但是由于马歇尔的耐心坚持，终于使得共产党接受了国民党政府所提出的给予停战小组的美国成员以决定权的建议，由于消除了这个障碍，谈判才再度显得较有希望。暂时休战延长了十天，以便可以有较长的时间来进行谈判。

在这个时候，由于国会里提出了几个提案而且注明要通过，马歇尔感到非常棘手，提案的内容是，不规定以蒋介石与马歇尔将军进行合作作为条件就延长对蒋介石政府的租借法案和给予其他的援助。这是令人伤心的事，并且给马歇尔将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自然，我不能阻止在国会里谈论这类的话。正如以后几年所一一出现的，中国政府企图从其他方面施加压力来从我国政府取得好处。

每逢一些人在华盛顿或我国其他地方发表演说，号召对蒋介石进行“全力援助”时，中国的“死硬派”便增加了新的信心，并且阻挠马歇尔为和平而进行的努力。接着，共产党自然就把这样的声明说成是美国人两面派的证据。由于我国某些人说话比较随便，马歇尔的伤脑筋的工作就增加许多困难，这些人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但是他们在帮助“死硬派”而已。

在中国，反共宣传、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都在有增无已。这些行动一方面是被共产党同时也可以说是被国民党的中极派所激起的。

7月间，我任命司徒雷登博士——北平燕京大学中的一位美国名教授——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博士是在中国出生的，他的成年时期大半在中国度过。深入了解中国的人不多，受到中国人尊敬的西方人也很少。我认为他对马歇尔是会有很大帮助的。他的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当然会使得同各方面的领袖人物的商
談更加容易些。

但是7月間發生了激烈的和大規模的戰爭。正如馬歇爾報告上所說的，“國民黨人責備共產黨人在江蘇和大同地區發動戰爭，而共產黨人則責備國民黨人在江蘇、山東和湖北發動戰爭。”同時，國民党中央政府開始發動了一個殘酷迫害人民中的自由分子的運動。秘密警察把他們中的許多人置于嚴密的監視之下，昆明有兩位教授——民主同盟的盟員——就遭到了暗殺。

蔣委員長的態度審慎而鎮靜。實際上他告訴馬歇爾說，一切"都會安然無事。然而只要戰爭繼續下去，共產黨人是不願意恢復談判的。他們對自己軍隊的控制顯然是放鬆了，7月29日，一些共產黨武裝人員向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一小隊進行攻擊，打死了三個，傷了好幾個。

中國事件的變化使我感到頭痛。南京國民黨的學生團體的反美遊行示威，迫害自由人士的殘酷的新政策，蔣介石要在戰場採用自由行動——所有這些事情說明，國民党中央政府是與我維護中國和平的努力背道而馳的。

當我閱讀馬歇爾的報告時，國民党和共產黨雙方都有一些人願意根據一個和平解決方案來共同努力。但是雙方也都有一些極端分子不願談判，決定要拿武力來解決他們國家的命運。蔣介石委員長自己則似乎介於這兩類人之間。在今春以去，他周圍的溫和派的影响无疑是占了上風，他同意作些讓步，尽管還表現出了不十分心甘情願的樣子。然而，現在看來好像是極端的軍人集團得勢，他不再願意聽取馬歇爾的忠告了。

在馬歇爾的同意之下，我決定親自向蔣介石發出呼喚。8月10日，我讓中國駐美大使將下列信件轉交給蔣介石。

“自從我派遣馬歇爾將軍到你處充任我的特使以來，我一直在密切地注視着中國的局勢。非常遺憾的是，我不得不得出結論，他
的努力显然是徒劳而无益的。

“我确信，马歇尔将军在与你的会谈中，已把美国政府和消息
灵通的美国舆论的全面态度和政策正确地反映了出来。

“近数月来，中国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已引起美国人民严重
的关怀。在您的领导之下，美国一直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强大和民
主的国家；但是，如果我不把最近的情势发展迫使我得出的结论说
出来的話，那我就是不诚实的，这个结论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双
方的极端分子的自私利害妨害了中国人民的愿望。

“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达成协议时，美国曾赞扬这是具有
远见的走向达成国家统一和民主的步骤。美国对于你们没有以具
体措施来实现这些协议所达到的失望，逐渐变成了我们对中国看
法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美国，愈来愈多的人认为，鉴于冲突日益扩大，特别是鉴于
压制新闻自由和箝制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的趋势日益加强，我们
对待中国的全面政策就必须重新加以考虑。人们并沒有忽视最近
在昆明杀害著名的中国自由主义人士的事件。不管这种残酷杀害
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它所导致的结果却是使美国人密切注意中
国的局势。人们日益相信，你们是在企图用军力、军事或特务，而
不是用民主方法来解决主要的社会问题。

“最近的事件使我们对中国人民和平与民主愿望的信心受
到了震动，但我们的信心并没有破灭。美国政府和人民仍旧坚定地
希望帮助中国在真正的民主政府下获得持久和平和经济安定。然
而，人们日益感到，中国人民的願望遭到了军国主义者和一些反动
分子的阻挠，他们不理解这个时代的自由趋势，而是在阻碍着这个国
家走向富强康乐。美国人民强烈地反对这种情况。

“除非在和平解决中国国内问题上，确保在短期内有着真正的
进展，否则就不能期望美国舆论会继续保持以无私的态度来对待你
们
的国家。而且我有对美国人民重新说明和解释美国的立场的必要。

“我真诚地希望在最近的将来，得到阁下的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以期促成我们共同宣布的目标。”

当蒋介石收到了这封信时，他便邀请马歇尔到他避暑地同他一起住。他没有提到我给他的那封信，只是告诉马歇尔将军说，他认为共产党已决定采取暴力政策。他否认他的政府的行为有任何地方表明他实行一种实力政策，即使是在共产党人改变了态度时也没有这样做。

马歇尔报告说，“目前，蒋委员长似乎已清楚地倾向于把实力政策看成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他又说，他已再度促使蒋委员长注意实行停战为政治协商扫清道路的重要性。马歇尔指出，如果让战火普遍燃烧下去，占便宜的只是共产党。

蒋介石在给我的回信中完全把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

“我衷心地感您 8 月 10 日的来信，从这封信里知道您是真正关怀我国的幸福的。

“自从乔治·马歇尔将军来到中国之后，他便不遗余力地为我们和成我们的共同目标——中国的和平与民主——而辛勤地工作着。我也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尽管在与他的努力合作之间还有不少的障碍。

“但是要求和平的愿望应该是相互的，而对共产党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以武装夺取政权、推翻政府和建立一个有如目前蔓延于东欧的极权政府的政策。在我国维持和平的最低要求，即是放弃这种政策。共产党在 1 月间签订协定以后，进攻并占领了东北的长春和山东的德州。在 6 月停战期间，他们进攻了苏北的徐州，山西的大同和太原。最近几天，他们以徐州和开封为目标，对陇海铁路发动了一次广泛的攻势。
“当然，政府方面的若干下级人员也有错误，但是与共产党方面肆意违反协定的情况相比较，这些错误还是比较小的。政府方面任何时候发现任何错误，我们对犯错误的人总是严惩不贷的。

“我在 8 月 14 日的对日战争胜利日文告中，宣布了加速扩大政府基础的坚定政策，并为此邀请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来实现 1 月 30 日政治协商会议中所通过的和平建设纲领。我衷心地希望中国共产党和会接受我们的观点。政府方面将尽最大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在我国实现和平与民主。

“我正竭尽全力和马歇尔将军合作，以期实行作为我们共同宣布过的目标的政策。我们的成功必须建立在共产党真诚地响应我们呼吁上。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期望能继续得到您的支持。”

我在答复蒋介石的信中，欢迎这种进一步努力来解决中国问题的表示，并希望立即停止武装冲突，以便我们能够帮助中国完成其恢复和重建的任务。

事实上，蒋介石也的确答应要在政治解决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然而，和马歇尔的看法相反，他要在他同意停战之前先达成政治协定。与此同时，共产党发出了一个在他们的地区内动员一切可利用的人力的文告。在共产党看来，这是一种防御措施。而在蒋介石看来，这是共产党侵略意图的明显的证明。

僵局似乎是不可打破了。每一方面都在指控另一方先发动战争，两方面都不愿意在对方没有放弃在停战期间所取得的任何或全部利益之前停手不打。

马歇尔现在要求两方面坐下来和司徒雷登博士谈谈，以便设法打破僵局。其目的在促使成立一个包括四十个成员的国民政府委员会，这个国民政府委员会将是走向政治统一的第二步。

蒋介石提出了一系列的条件，他说，要他同意停止敌对行
动，共产党就必须答应这些条件。在马歇尔看来，政府军队是可以取得一些暂时的胜利以迫使共产党接受这些要求的。马歇尔认为，共产党人事了解到这一点的，因此就设法取得他们可以从局部胜利中获得的一切有利之处。

马歇尔于8月30日向我报告说，“两方面都有一些军事领导人物暗地里持有某种中国式的看法，认为要想有一个可以接受的调整方案，少不了就得打几个月仗，千百万受难的人民在这期间的遭遇被忽视了。苏联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来进行干涉，也被忽视或没有被提到。”

蒋介石自己似乎希望战争继续延长到秋天。他认为共产党必须定于11月召开的国民大会提出他们的代表候选人名单，他把这看作是任何停火谈判的一个条件。他告诉马歇尔说，他打算宣布他希望于10月10日召开的国民政府委员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的代表名单。换句话说，他打算至少要把战争继续打到那一天为止。

另一方面，共产党却不希望着手筹备召开国民政府委员会，除非他们得到保证同时采取步骤来停止敌对行动。蒋介石曾于5月里问马歇尔他是否能担保共产党有诚意，8月里周恩来却希望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来保证蒋介石和他的政府是否有诚意。

9月18日，马歇尔报告说，“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受到两面夹攻。”他们唯一的希望似乎是周恩来和共产党人会认为战争的矛盾是在指向他们，因而可能对蒋介石的要求作最大的让步。

10月2日，马歇尔写来三封信，大意是说，他认为他的使命已处于绝境。他请周恩来回来，不要再独自留在上海，但没有成功。他也曾有能从蒋介石那边得到任何让步，他现在公开地宣布他要占领张家口。共产党在一个声明中回答说，向张家口进攻将被看作是政府要发动一个无限期内战的信号。因为张家口是政府于6月间同意交给共产党一个城市。
馬歇爾向我報告說，他認為必須向蔣介石提出一個直言無諱的備忘錄。在這個報告里他很清楚地說明，他對共產党和國民黨雙方都不同意。此外，他还進一步列举了他对两方面都不同意之点，然后得出結論說要勸告蔣介石，让他知道，除非立即在停戰方面取得達成協議的基礎，否則他就需要請求結束在中国的使命。早些時候，他曾以同樣的坦率語句告訴過共產党，除非他們在報紙和宣传中不再对他進行人身攻擊，否則他便將放棄這個調停工作。

在这个时期里，我准备让馬歇尔回来。

蔣介石經過勸告之后便对共產党提出了一項建議，虽然这个建議並不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样令人满意。实际上，蔣介石之願意採取这个步驟，只不过是想不让馬歇尔公開宣布調解已归失敗而已，这一点是比較清楚的。然而，共產党是不会听信蔣委員長的任何主张的，除非他們得到取消对张家口进攻的保证，而且他們还希望能夠保证恢复 1 月份达成最初的停戦協定時的相對間的軍事状態。当然，这就意味着要國民党方面放弃在这段时期里所取得的一切进展，这个条件蔣介石委員長是不会接受的。

馬歇尔这时写信告诉我说，他的結論是，美国政府不能够卷入这个两党以武力来打交道的斗争中去，他再度坚持說，除非首先停火，否則談判是不会取得成就的。10月 5 日他报告說，在他看来他在中國已經沒有什麼用处了，因此，把他召回是合适的。

当蔣委員長听说馬歇尔已經提出了結束在中國的調解使命时，他便建議在张家口战役中停止十天，同时关于政治和軍事問題的討論仍在进行。馬歇尔一向热切地不放过任何可以导致停战的机会，答应把这个提議轉交給共產党。

共產党的回答是，他們同意停火，如果沒有時間上的限制的話，他們也同意召開會議，如果議題事先不加以限制的話——这个处境馬歇尔是难以摆脱的，因为共产党的协商代表批评美国的政
策偏袒于国民党，也即暗指马歇尔本人有偏心。

10月9日，马歇尔亲自跑到上海去劝说周恩来，但是这位共产党领袖的态度非常强硬。他显然是不愿意作任何让步，还怀疑这是蒋介石所授意的。最后，他告诉马歇尔说，他认为美国帮助中国政府是不适当的，他认为马歇尔关于最后的建议向公众所作的解释是歪曲了事实真相的，对共产党是不利的。这种指责使得马歇尔作出了以下的答复，既然他已不再被看成是不偏不倚的，那末他就将从一切谈判中退出来。

这时中国的事态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马歇尔只是一个关心的旁观者。司徒雷登大使和少数党派的代表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这些少数党派形成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中间力量。其中像民主同盟和共产党站在一边，而其他一些少数党派像中国青年党，则极力争取独树一帜。这些少数党这时已进入舞台作为调解的临时中心。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没有参加这些会议。然而，这个“第三党”组织却把会议的进展情况告诉他们。

周恩来在这些调解者的劝告之下回到了南京，他这一次来的不幸恰巧碰上蒋介石长久已计划好的台湾之行，共产党把这种行动解释为故意回避。中央政府的进攻满洲的安东和山东的烟台更增加了共产党的怀疑，同时也打击了“第三党”组织的情绪。而且，蒋介石从台湾归来时又重新提出了他以前的要求，而共产党则再次重申他们过去的拒绝。

与此同时，蒋介石接受了“第三党”的劝告，答应把国民大会的开会日期延迟三天。这个会议结果在11月15日开会了，但是参加这个会议的非国民党成员只有几个。

共产党把这看成是最后的决裂。在他们看来，政治协商会议在1月里所签订的协议规定了必须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组织国民政府委员会，并把政府的权力移交给这个新委员会。中央政府又
先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自然就被共产党看成是对一月协议的最彻底的破坏。

周恩来回延安去了，只留下了少数几个代表，但是在他离开之前，他告诉马歇尔将军，他预料蒋介石政府不久将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战役来占领延安。周恩来对马歇尔说，这意味着用谈判方式来取得和平的一切希望全都破灭了。

共产党因此就放弃了谈判。蒋介石似乎很有信心地认为，他的军队可以征服共产党。马歇尔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毫不犹豫地向蒋委员长指出，共产党能够打持久战，而当蒋介石的军队想继续占领城市时，共产党能够任意地切断国民党的供应线和交通。

马歇尔提醒蒋委员长说，如果俄国援助共产党，他们的供应线就要比他本人的供应线短得多，而且很不容易受到攻击。他用尽了一切办法企图使蒋介石相信，在一次纯粹的军事冲突中，不论目前看来对他多么有利，他将无法获得对这个国家的永久的统治。

尽管对他作了这样的警告，蒋委员长仍旧自行其是。他深信共产党决没有合作的诚意，只有在军事上打败他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也根本没有把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放在考虑。例如，马歇尔对他提到了中国不安定的经济状况，对此他说，中国已经习以为常了，事实上是把马歇尔的话顶了回去。

尽管在对前景的看法上存在着这些公开的分歧，蒋委员长仍请求马歇尔留在中国做政府的顾问，马歇尔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他认为，被国民党的极端分子煽动起来的反美情绪，以及这些人对政府中居于显要的地位，将使任何美国顾问的处境感到困难。

12月28日，马歇尔将军向我提出建议说，如果关于当时正在筹划的谈判的第二次努力归于失败的话，他就应该被召回华盛顿。从他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甚至在没有作这种努力之前，这种努力就已注定是要失败的了。我决定不等到这种事情发生之后
再作处理。1月8日，我下令让国务卿召回马歇尔，以商谈关于中国和“其他事务”。

“其他事务”的范围包括整个国务院的活动。因为当他还在横渡太平洋的归途中，我便宣布他做国务卿了。

我派马歇尔将军去中国去是为了设法制止战争，以帮助国民党与共产党签订协定，组织一个联合政府。他建立了一个执行部，战争是暂时被制止了。中国人就在他们之间开始了这些永无休止的、东方式的谈判, 只有精通棋艺的能手才能跟得上他们。谈判是这样进行的。一方面提出了一个建议，对方接受了，但是附有三个条件。这方面接受了这三个条件，但是却对每个条件又提出另外三个条件。中国人的老办法是要保证万无一失。可是，到1946年战争又爆发了，蒋介石当时就决定要占领华北和满洲。马歇尔将军反对这种主张，魏德迈将军也反对这种主张，但是他不听。我们供给他以装备、金钱和到满洲去的船只，他便将他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和装备很好的优秀军队运到沈阳去。直到最后大势已去了，他们还留在那里，而且投降了。他们向华北地区作了一系列的延伸的活动，并在有城墙的城市里修筑工事。蒋介石的司令官是很不中用的。他们有一种想依靠筑有城墙的城市的变法心理。他们认为空旷的地区是危险的。空旷地区本是他们应该驻扎的地方。但是他

们认为一个有城墙的城市妥当，因为他们能够看见人们进来。自然，没有人来，他们就住在城里。共产党切断了他们的交通线，破坏了他们唯一的铁路线，因此对他们来说是不利的。1947年初，马

歇尔将军是承认失败了。他说两边都不愿意执行协议。蒋介石没有倾听这个历史上海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的忠告，他是输给共产党了。

毫无疑问，马歇尔的使命没有能取得我和我所希望得到的成

就。战火很快地蔓延到了全中国，直到共产党成了大陆的主人，蒋
介石带着残兵败卒逃亡台湾，这场战火方告熄灭。

马歇尔的使命之所以未能获得成功，是由于蒋介石政府得不到中国人民的信仰和支持。蒋委员长的态度和行动和一个旧军阀差不多，他和军阀一样没有能得到人民的爱戴。我毫不怀疑地认为，只要蒋介石稍微迁就一些，本是可以达成一项谅解的。我是不相信事后聪明的价值的。我派遣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去这件事做得是否对，是不应该根据某些人现在的认识那样去考虑的。这应该根据在1945年我们所能认识到的去判断。在那个时候，一般人都认为，中国各种不同的势力是能够被说服使这个国家统一起来的。当然，争夺政权的斗争还会继续下去，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国民党政府就不能在这个斗争中取得胜利，正如欧洲的非共产党政府那样，如果它是关心人民和国家的基本需要的话。这在当时看来，还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据我的了解，赫尔利和魏德迈是这样想的，我们的军事和外交专家也是这样想的。而且这些专家中还有人相信，美国能够强迫中国统一——实际上，那就是说，我们能够“强迫他们接受”。当然，持有这种态度的人是不适宜于担任这项工作的。在我心目中马歇尔是最合适的人，因为他有深厚的民主素养，而且真诚地相信要让人民去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他深信应相信人民，不应迷信武力的原则。这个原则不仅可以应用于美国，而且对于任何国家的幸福都是很重要的。

我非常了解马歇尔将军。在参议院国防计划审查委员会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每星期举行例会，从这些频繁的接触中，我对生了崇高的敬意，认为他是一个人物，一个杰出的军人。他清楚地懂得我希望在中国所要达到的目的。他完全依照我在他临行时告诉他的政策纲领行事。

马歇尔和我都没有被中国共产党只不过是“土地改革者”这样一种说法所欺骗。马歇尔将军知道他是在和共产党打交道，他知
道他們的目的是什么。当他3月里回到华盛顿时，他告诉我，他們的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曾经很坦白地宣布说，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坚定地相信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和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马歇尔从中国的来信中也指明，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定会得到俄国人的支持。

我也沒有为斯大林在波茨坦的谈话所欺骗，他说中国共产党不真正是“道地的”共产党，后来他在哈里曼的声明中又说，他认为在中国打内战是愚蠢的。我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从事争夺中国的政权已几乎近二十年。我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是想看到中国变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共产主义不受人民大众的欢迎，因为人民的需要，以及人民的呼声，已经得到了满足和回答。

我知道，世界和平不是靠多打几次仗可以取得的。更重要的是，我一直知道，有两片广阔的土地是任何近代的西方军队所能征服的，那就是俄国和中国。要以武力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这两个巨大的地区，在过去是愚蠢的，在现在也是愚蠢的！

在1945年和1946年整个两年中，这样的思想甚至还沒有表达出来便遭到美国人民的拒绝。那个时候华盛顿的国会议员同声高喊着要“让青年们回来”，同时，随着成百万的美国士兵被复员站送回美国之后，我们在全世界以及中国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

我們唯一的希望是有机会给中国以经济援助，以恢复这个国家的元气，这样，我们便能够削弱共产党的号召力。但是这样的援助只有当该国秩序安定下来才能给予，同时也只有当该国政府享有足够的威信，能够让人确信这种援助不会落入军阀和奸商的口袋时，援助才会起作用。

自然，蒋介石最后由于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和美国的援助而被打败了，因为他的将军很多都带着由我们的武器所武装起来的军队投到敌人的阵营里去了。只是当这样的投降开始大量出现时，我
才决定停止继续把物资运到中国去。

可是，当马歇尔在中国时，取得重大的军事成就的却是中央政府而不是共产党，虽然马歇尔在分析这些胜利时把它们看成是虚假的胜利，并且正确地预言蒋介石在军事上最后要失败。但是在我看来，国民政府的这种失败主要是由于他们拒绝倾听马歇尔的忠告。

有必要再次说明，马歇尔是去做顾问工作的，不是去做指挥工作的。我派他到中国去不是去干涉哪个国家的事务，而是去对那个地方的和平事业提供我们所能提供的帮助。他被派到那里去不是去替蒋介石做工作的。如果马歇尔将军在他的使命中没有取得成果回来，那是因为两党都不是真正地希望按照协议组织一个联合政府来统一中国。

我试图通过马歇尔来实现的解决办法，就是要使蒋介石不需要美国全面的军事干涉而可以拯救他自己的唯一的办法。要给马歇尔的使命以正确的和公正的评价，就必须记住，在他出发到中国去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共产党之间已签订了一个争取国家统一的正式的书面协议。这个协议是以前在赫尔利大使——当时他领导着我们驻在华的外交使团——的帮助下达成的，如果没有这个协议，那我就不会派马歇尔去中国了。我派他去的唯一的目的是帮助实现那个为中国领袖们所乐意接受的方案。我们的本意决不是将我的意志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第七章
援助希腊和土耳其

1946年初，俄国人在伊朗的行动威胁着世界和平。

俄国和英国于1942年曾和伊朗签定了一项协议，该项协议允许俄国和英军军队在战争结束后驻在伊朗领土上六个月。在1945年9月的伦敦外长会议上，英美和苏联都同意这个协议意味着一切外国军队均应在不迟于1946年3月2日之前撤出伊朗。

可是，在11月里，国务院收到了可靠的报告说，俄国人不但不准备撤退，而且还在增兵。报告又说，俄国人还对德黑兰政府镇压该国北方——特别是阿塞拜疆省——的叛乱分子，正进行干涉。

11月28日，我让国务卿贝尔纳斯把这件事提到内阁会议上讨论。贝尔纳斯那时候就建议赶紧把美国军队撤出伊朗。原来我们是根据与英国、俄国和德黑兰政府的协议而利用伊朗作为援助俄国的供应线的。这就是说，我们要在该国保持几千名军队。由于这仅是一支比较小的军队，我们便决定树立一个撤军的榜样，然后要求俄国人同意在1月1日从该国撤出一切外国军队。

我们对俄国提出的建议就是以这一点作为基础的，但是俄国人于12月3日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几天之后，莫斯科电台就向全世界报道说，一个革命政府已经在阿塞拜疆省成立了。伊朗政府立刻指责说，这个叛乱分子的政府是依靠了俄国人才存在的，它受到了俄国军队的支持。

当12月下旬贝尔纳斯还在莫斯科参加外长会议时，俄国人甚至拒绝讨论从伊朗撤军的问题。
1月19日，伊朗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控告俄国干涉它的内政。但安全理事会无能为力，因为俄国辩称，安全理事会这个机构无权处理这个争端。俄国人简百就宣布说，任何人想起关于伊朗的事，他们都将置之不理。于是安全理事会只好同意让俄国和伊朗直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当苏联军队仍旧占领着伊朗的土地时，它怎能拒绝苏联的要求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谈判桌上是不会有平等可言的。

3月2日是俄国人与英国和伊朗妥协撤退军队的日子，这一天是过去了，但俄国人并没有离开伊朗。相反地，莫斯科宣布说“某些军队”将无限期地留在伊朗。

这严重地违背了已签订的协议。这也意味着伊朗必须在炮口之下和俄国人谈判。我决定将我们对国际关系中的这类行动的感觉告给俄国政府。我让国务卿贝尔纳斯将关于伊俄情势的一切现有的文件带到我俩的每周例会中来。

在3月4日的这次会议上，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并且还检查了这个问题的许多危险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结果，贝尔纳斯给莫斯科送去一个照会，虽然这个照会带着外交礼节上的措词，但却很清楚的表明，我们对俄国人在伊朗的所作所为表示欢迎，特别是，尽管克里姆林宫一再作出了庄严的诺言，说他们将在不迟于3月2日之前退出伊朗，但是俄国的军队仍旧留在那里。

我们代办乔治·凯南于3月6日在克里姆林宫递交的照会中有这样一段，“苏联政府决定将苏联军队留在伊朗的时间，超过了三国条约所规定的期限。美国政府，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以及1943年12月1日关于伊朗宣言的一个参加国，对于这种情况不能保持缄默。……美国政府，本着美国和苏联在反对共同敌人的协同努力中发展起来的友好精神，以及两国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诚恳地希望苏联政府实践自己的诺言，立即从伊朗领土上撤退苏
联的军队，以促进国际信任。……”

这个照会没有得到官方的答复。然而，俄国的报纸却报道说，是国务院的“误会”，在伊朗并没有俄国军队在调动。接着克里姆林宫便改变了策略，并且开始接二连三地攻击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耳敦的演说，还攻击我说我支持这个演说。丘吉尔是在富耳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第一次公开谈到“铁幕”政策的。当俄国人不希望别人看得太清楚时，他们便采用老一套的放烟幕的障眼法。

但是我们继续报道关于俄国军队在伊朗出现的消息。伊朗人进入了那些俄国人声称他们已经撤退了的地区，发现道路已被俄国军队封锁了。报告说，有三支很大的俄国军队正在前进中，一支开往首都德黑兰，一支向东移动，开往土耳其和伊朗的边境。种种迹象很清楚地说明，俄国已决定一意向东，而且拿定主意不把美国和联合国放在眼里。

据我看，这牵涉到三件事。第一件就是土耳其的安全。俄国人几个月来在向土耳其施加压力，要求取得一些特权和土地上的让步。土耳其人拒绝了这些要求，如果俄国或俄国的傀儡国家能在东面包围它，那末他们的处境肯定地便将困难得多。

第二个问题是控制伊朗石油资源。没有问题，俄国是在觊觎这片广大的石油矿藏，如果俄国人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伊朗的石油，那末世界的原料平衡将会发生一个极大的变化，这对西方世界的经济说来将是一个严重的损失。

然而最使我感到不安的是，俄国若无其事地漠视小国的权利和它自己庄严的诺言。如果国际义务被置之不顾，而联合国也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那末便谈不到国际合作了。

我把这三点都告诉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海军上将李海。接着我让贝尔纳斯给斯大林送去一封坦率的信。3月24日莫斯科宣布说，所有的俄国军队将立刻从伊朗撤退。对土耳其的威胁是消除
了，虽然它还没有消失，而且还需继续加以注意。伊朗能够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与俄国人谈判了。的确，伊朗国会后来拒绝了政府所签订的协议，这便是恐惧已从这个国家消除的一个清楚的证明。

全世界现在更能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联合国身上。但是俄国人的野心却不会因友善地提示他们所作的谣言而有所收敛，哪里暴露出了弱点，俄国人便向哪里进逼，而我们也就不得不去对付那里所产生的压力，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俄国人和全世界都了解的。

隔了不久，同样的问题又在世界的同一个地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土耳其和希腊受到来自苏联集团的沉重的压力。他们都向英勇地设法给这些压力以反击，但是目前他们的力量已日趋削弱，他们很需要援助。

自然，土耳其是俄国人早已虎视眈眈的对象。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继承沙皇政府的衣钵，当时它想设法控制这个阻碍着俄国通往地中海的地区。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曾提出了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但是艾德礼和我却坚决要遵守蒙德会公约所规定的规则，即这个海峡应该对一切国家的商用船只开放。基于这个原因，在波茨坦会议上关于这个问题就没有作出什么决定，大家只是同意每个国家都可以直接和土耳其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决定是完全恰当的，因为根据条款，这个协议到1946年就要重新加以审查。

我们把我们关于修订这些条款的意见写在1945年11月2日送交土耳其政府的一个照会中。我们通知土耳其政府说，我们希望对公约的任何修正意见都遵守下列三项原则：（一）该海峡在任何时候都对任何国家的商船开放；（二）该海峡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让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通过；（三）除非得到黑海沿岸国家的特别许可，或者遵照联合国的授权行事，非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在任何
时候都不能通过该海峡，但是在和平时期经大家同意的一定限度的吨位的军舰不在此列。这份照会的副本送给了苏联——它没有加以回答——和英国，英国接着也对土耳其政府送出了同样的声明。

然而，与此同时，俄国人除了设法通过伊朗包围土耳其外，还开始对土耳其施以压力，要求取得领土上的让步。1946年7月，莫斯科给安卡拉送去一份关于调整达达尼尔海峡使用规定的照会，按照苏联的建议，一切非黑海沿岸的国家都将受到排斥。换句话说，我国和英国都将被排除于未来的任何协议之外，而土耳其将被迫承受三个共产党国家——俄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联合力量。其次，苏联这个照会的更其不怀好意的部分是，把该海峡置于土耳其和俄国的共同保卫之下。

这的确是要控制土耳其的一个公开表示。如果俄国军队在强行联合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的表面要求下进入土耳其，那末，过不多久，这支军队就会被用来控制整个土耳其。从过去两年的经验中，我们深深地认识到，苏联的干涉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占领与控制。让俄国人在中国达达尼尔海峡建立军事基地，或者将军队开进土耳其，表面上好像是为了保卫海峡，结果就一定是希腊和整个中东陷入苏联的控制之下。

土耳其政府征求我们意见，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就这件事向我请示。我责令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详细研究这个情势。国务卿和两位部长及三军参谋长很快地加以研究，一致建议我们应采取强硬的态度。我和国务卿及参谋长们围绕着我的办公桌上地图充分地讨论了局势的发展，对中东的形势作了估计。我批准了他们所提出的建议。我们与我们的盟国交换了意见，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并且立即通知了土耳其政府。同时，土耳其政府还得到英国和法国方面的同情和支持。
此外，我还让助理国务卿通知我国驻安卡拉的大使用外交词令口头向总统送信，告诉土耳其的领袖说：“这个答复是只有在最高级的领袖们对这件事加以充分考虑之后才能作出的”。我们没有作出什么特别的许诺，我们指示我们的大使建议说，我们认为土耳其对莫斯科的回答应该“合理而又坚定”。

递交俄国的照会清楚地表明，如果达达尼尔海峡变成了俄国的侵略目标，那末“所造成的形势将构成对国际安全的威胁，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方面显然将会对此事采取行动”。

土耳其政府受到美国态度的鼓励，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并且表示，如果俄国诉诸暴力的话，土耳其政府将决心进行抵抗。土耳其的军队虽然数目是不少，但装备很差，和久经战场锻炼的克里姆林宫的军队相比，那就远不是他们的对手了。

更其严重的是连年的庞大军费开支，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所造成的耗费。1946年年底，我国驻土耳其大使从安卡拉来信说，“土耳其将无力维持为了对付苏联而采取的无限期的防御措施。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来说，这个负担是太大了，它维持不了多久就要垮台。”

我国驻俄国大使比德耳·史密斯将军证实了这个估计。史密斯大使在他的1947年1月9日的报告中说道，毫无疑问，克里姆林官定会再度侵犯土耳其的主权，他认为，除非从美国和英国方面取得长期的援助，否则土耳其就要灭亡了。

土耳其的困境完全是由于俄国战后的趋于极端所造成的，而希腊的情况则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占领时期开始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腊受到了惨重的损失。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墨索里尼的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最后德国和意大利的联合力量击败了希腊的军队。

然而，全国都在继续进行抵抗，不久，所有的军队都集中在两
个主要的集团周围。其中之一即共产党和统治下的民族解放阵线，另外一支军队继续效忠国王，王室政府当时流亡于国外。由于德
国占领军的罪恶行径以及它和抵抗军队的不合作，希腊的正常生
活实际上就停止了。田野和工厂都闲置了。人民挨饿，死于疾病
者不计其数。

1944年10月，德军撤退。英军登陆希腊，流亡政府也跟着回来了。但是这个被战败破坏了的国家既没有获得和平也没有获得繁
荣，内阁一再更迭，但是没有一届内阁能够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
民族解放阵线退入北部的山区，拒绝缴出武器，不久便与政府公开
对峙起来。政府方面似乎也在助长不负责任的右翼集团的气焰。
许多地区都发生了冲突，经济几乎一点也没有得到恢复。

自然，共产党人就在这种接踵而至的苦难、饥饿与经济遭受破
坏的情况下活跃起来。莫斯科和巴尔干半岛上的卫星国家对民族
解放阵线进行公开的支持。据我所收到的情报说，许多叛乱者都
在希腊境外的各种军事里受训和武装起来。报告说，在苏联的指
使之下，希腊的北邻——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正
在进行建立共产党和希腊的运动。

在希腊所建立起来的一点安全与秩序，基本上是靠四万名英
国军队以及英国给予希腊政府的忠告与支持才得到的。但是早在
1945年秋季，英国就向我们建议说，他们希望我们援助希腊，特别
是给希腊政府以财政上的援助。

我授权国务院与英国商讨关于经济援助希腊的问题，我们也
很想肯定地知道希腊的情况到底是否宜于接受我们可能给予的贷
款。为了这个缘故，我于1946年1月批准了一个送交希腊政府的
照会，敦促该国政府提出一个稳定经济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我
们既提供顾问也提供基金。

然而，由于希腊的右翼与左翼的极端分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

111
大，局势毫无进展。国王回去之后只是火上加油而已。最后，在1946年12月，希腊政府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说叛乱集团正在受到外界的帮助。联合国派了一个调查团前往希腊调查情况。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希腊政府接受了我们提出的关于他们的经济问题的长远的技术建议，我派前物价管制局局长保罗·波特尔作经济代表团团长。

然而，波特尔还没有能够来得及从他的现场观察中得出结论，事变的发展就迫使我们作出决定，波特尔的代表团——以及我们早先处理希腊问题的办法——已过时了。

2月3日，驻雅典大使麦克佛给国务院的一个电报中说道，谣传英国将从希腊撤军，至少是要撤一部分。2月12日，国务卿马歇尔给了我一封麦克佛写来的信，他要求我们立即考虑提供援助给希腊的事。大使说，英国甚至连他们目前所做的一点工作也无力再继续了。

2月18日，美国调查团的马克·埃思里季来电说，一切迹象都说明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动向，共产党人要篡取这个国家。2月20日，我国驻伦敦的大使提出报告说，由于英国自己的财政情况恶化，英国财政部反对对希腊作任何进一步的援助。

但是危机比我们想像的还来得快。2月21日（星期五）下午五点钟左右，英国大使要求会见国务卿马歇尔。马歇尔当时出城去了，去参加普林斯顿大学二百年校庆纪念会。会见原定在星期一举行，国务院收到了一份英国大使行将递交国务卿的一份官方照会的副本。照会上通知我们说，英国军队必须在不迟于4月1日以前撤出希腊。艾奇逊立即用电话把照会的内容告诉我，我要求我们所面临的形势加以研究，艾奇逊提醒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联合委员会，在周末他们便准备好一份建议我们应如何做

备忘录。

112
2月24日（星期一），国务卿马歇尔将他在那天早晨正式收到的英国大使的官方照会带来给我。这份照会中指出了联合王国在履行海外任务时所遇到的困难，并且通知我们说，到1947年8月30日，联合王国不得不停止对希腊的一切供应。

马歇尔将军和我同国防部长福莱斯特尔和派特逊讨论了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三军各部都加紧研究了形势的各个方面。国务卿马歇尔在与英国大使的谈话中得知，一旦这个工作顺利地完成，英国便准备从希腊撤退他们的军队。

我们在雅典与莫斯科的代表的来信强调了形势的紧迫性。史密斯将军表示，他深信只是英国军队的出现才使得希腊迄今为止没有被苏联的虎口所吞食。麦克佛大使从雅典的来信，描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希腊的若干领袖甚至都想引退了，他们看来似乎只有立即得到援助才能挽回这个局势。麦克佛大声疾呼说，争取时间乃是当务之急。

2月26日（星期三）下午三点钟，马歇尔和艾奇逊将我们的专家们研究的结果带交给我。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联合委员会在那天的早晨召开了一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总的政策建议。艾森豪威尔将军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提出了一个备忘录，从军事观点来支持他们的结论。

副国务卿艾奇逊陈述了研究结果，我非常仔细地加以倾听。外交家和军事家也详尽地草拟了这个方案，但是他们的结论与几个星期前的信件与报告纷纷飞来时我所作出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希腊需要援助，需要得很急迫，而且数量很大。否则希腊便会陷落，铁幕便会从东地中海伸展过来。如果希腊陷落了，土耳其将成为共产主义大海中的一个无法防守的哨所。同样地，如果土耳其送给苏联，希腊的处境将十分危险。
但是形势比这个还要复杂得多。波兰、罗马尼亚和东欧其他卫星国家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苏联占领而落入共产主义阵营。我们曾劝告苏联给予这些国家以政治上的自由，但是毫无效果；除非我们准备进行战争，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迫使他们放弃他们的控制。

希腊和土耳其是内外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自由国家。这两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英勇的斗争，来维护他们的自由与独立。

美国不能也不应该让这些国家孤立无援。这样做将在中东、意大利、德国和法国树立一个鲜明的榜样。我国的理想和传统要求我们去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要求我们让全世界知道，我们的政策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如果自由受到威胁，我们就要加以援助。

一个大国必须担当起从事这样一种可能遭到风险的事业，如果这个国家真正热爱自由的话。马歇尔和艾奇逊带来给我，并经我们一起研究过的这个方案很清楚地表明，我们所冒的风险是十分之大的。但是不这样做，我们的安全以及任何自由国家的安全均会受到重大损害。

在俄国极权主义的威胁面前，自由世界应该采取什么方针，这是去年我与对外政策顾问们一再商讨的一个问题。为了使我们的思想有长远的打算，我批准在国务院内建立一个政策计划参谋组。由我们的一位最有名的俄国问题专家乔治·凯南领导这个小组。

总统很少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问题，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总是愿意把我的思考转到这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上来。

为了打败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墨索里尼的专横和日本军阀的野心，我们经过了大长期的战争，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可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新威胁似乎与纳粹德国及它的同盟者所造成的威胁同样严重。  

114
我再也忘不了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孤立主义者在我国所拥有的势力。我在参议院任议员期间，每年都听到有一位参议员念华盛顿的告别辞。它向孤立主义者们指出说，华盛顿为了达到保卫国家的伟大目的，曾拟定了适合于他的时代的一个办法，现在虽然形势与我们的国际地位都变了，我们的政策的目的——和平与安全——却仍然如旧。这种说法一点用处也没有。在孤立主义者看来，这篇演说辞就像圣经一样。1939—1941 年的“美国第一”组织、三K党、保华和他的银衫党徒——他们全都引证第一任总统的话来支持他们各种各样的目的。

我很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孤立主义的复活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显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如果没有美国的参加，就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对付得了俄国。如果我们置世界事务于不顾，像希腊这个被战争削弱和分裂的地区就会在俄国人费多大气力之下陷入苏联虎口。俄国人在这个地区的胜利和我们公开表示不关心，就会使得在欧洲国家（如法国和意大利等）内已形成很大威胁的共和党更其壮大。袖手旁观、撤退和“闭关自守”的观念，只会把地球上现在属于俄国人的广大地区拱手奉送给俄国。

现在是把美国明确地与自由世界列在一起的时候，而且美国应站在最前面。我知道这与乔治·华盛顿、亨利·克莱以及所有其他孤立主义者的先哲的精神是相抵触的。但是我深信，我所宣布的这个政策的确是我所处的时代的情况所十分需要的，正如华盛顿的政策适应他那个时代的形势和门罗主义适应门罗所面临的情况一样。

在发表一项政策声明之前，有许多人在为此辛勤地进行工作。自然，总统既不能和他们之中的每个人谈话，也不能亲自听到他们每个人的意见。但是当他们的工作一旦结束时，总统的工作就来了，因为那时他必须作出决定。他们只是研究一个问题就得花上
若干天，甚至于几个月，而总统却每天都有一大堆事情要作出决定。为了说明这个情况，我想把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陈述一下。当我正在考虑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时候，欧内斯特·贝文发表了一个关于我们对巴勒斯坦政策的公开声明，这在我们和英国的关系上投下了一个阴影。第八十届国会的企业界集团扬言要从预算中削减大量的政府计划，包括海外新闻事业费用；国务卿马歇尔准备去出席他的第一次外长会议；我们需要对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许多事情作出决定；参议员麦克拉德地反对批准戴维·李察塞尔做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以此来阻挠原子能计划；海军空军统一指挥的议案需要最后交给国会批准；报界要求我宣布1948年的计划。在总统必须加以处理的这些要求中，他必须克尽元首所担当的职责，不管是礼仪上的也好，或者是非正式的也好，自然，他决不可以拒绝公众，甚至更不能拒绝报界。

可是，像这样的决定决不能匆忙地作出，凡是重要的决定我都作充分的准备工作，仔细研究和详加考虑。我总是尽可能地多倾听人们的意见。自从第一次碰到了那次结束租借法案的惨痛教训之后，我从没有不加慎重考虑就在一张纸上签字批准。

由于民主党不再能控制国会，我行将作出的这个重要的决定就复杂多了。我一方面盼望得到像范登堡、新泽西州众议员伊顿这样的两党交涉的热心支持者的帮助，另一方面我也认识到形势要比民主党在国会中占优势时要险恶得多。因此，就需要将形势的严重性和我必须作出的这个决定的性质，尽快地征求国会领袖的意见。我请国务卿马歇尔和艾奇逊在次日十点钟回来，同时我邀请了国会领袖们来到这里。2月27日早晨十点钟，参议员布鲁奇斯、范登堡和康纳利，众议院议长马丁和众议员伊顿、布卢姆和雷朋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我也邀请了国会议员泰伯，但是他没有能来。但是他下午来了，我和他讨论了局势。
我向他們解釋了美國提出關於希臘問題的主意後我們所處的
環境。英國內閣關於從希臘撤軍的決定還沒有公開宣布，因此，還
沒有一個國會議員知道我們即將突然遭遇到的危機是多麼深重。我
對他們說，我已決定給予希臘和土耳其以援助，希望國會設法使
援助及時而充分。

於是馬歇爾將軍把外交上交換意見的經過和局勢的詳細情況
說明了一番。他很清楚地指出，我們的抉擇是，要末行動起來，不
然就放任不管而遭到損失，我特別強調我同意這種看法。我回答
了國會領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最後并向他們解釋了我們準備採
取的方針政策。

國會領袖們似乎感受很深。他們其中某些人不願意把錢花在對
外援助計劃上。有些不久以前還是直言無諱的孤立主義者。但是
在我辦公室中的這次會議上，當我把我認為我國應采取的態度加
以闡明時，會上沒有一個人發言反對。

隨後的幾天裏，国务院的專家們忙着研究形勢的各个方面。經
濟部門則設法估計希臘在經濟上需要多少援助，並如何加以有效
地運用。政府官員們則忙着和英國、希臘和土耳其的代表們進行
磋商。立法官員們則在準備起草必要的法案。其他部門也都把希
臘問題列在第一位。海軍部長福萊斯特特別積極，他和艾奇遜
長談了好幾次。後來協助完成這項計劃的是副国务卿。馬歇爾將
軍打算不久就到莫斯科去，他正集中精力擬訂參加那里的外長會
議的計劃。

我得離開華盛頓幾天到鄰國墨西哥去作一次國事訪問——這
是美國總統第一次訪問墨西哥。

我于3月6日下午五點鐘左右回到首都，收到了一份有關各
種情況發展的詳細報告，其中也談到了影響希臘的局勢的情況。希
臘政府正式向美國要求援助。我国駐希臘大使館和波特爾代表團

117
都請求趕緊考慮這個要求。

我原打算到基韦斯特去住幾天，避開日常來訪的打擾，以便安安靜靜完成几項工作，但是後來還是決定留在華盛頓，以便在國會開幕時去請求國會批准給予希臘和土耳其所急需的援助。

要做的事情太多，而時間卻很少。其中第一件要做的就是把這件事提交到內閣會議。會議預定在 3 月 7 日召開，我用了大部分時間談希臘的局勢。我把援助希臘的決定告訴給閣員們，我希望大家對用什么最好的方式進行援助提出意見。艾奇遜把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作了概括的論述。他回顧了英國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們撤退之後可能引起后果。然而，他告訴閣員們說，英國已同意繼續再給希臘政府三個月的支持。

我向他們解釋了一下準備請求國會撥款二億五千万美元援助希臘和一億五千万美元援助土耳其的計劃，我認為這還僅是個開端而已。

閣員們都同意了。但是勞工部長施維倫巴赫有一些政治上的顧慮，他懷疑國內的反英分子會攻擊我們“又在”為英國火中取栗。有几个閣員強調希臘政府改組的必要性。我們對采取什么最好的辦法來向美國人民說明所涉及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討論。

最後，我讓財政部長斯奈德領導一個委員會去準備向我提出建議。這個委員會第二天就開會了，成員有艾奇遜、福萊斯特爾、哈里曼、派特遜、克林頓·安德遜、施維倫巴赫和約翰·斯蒂爾曼。委員建議，為了強調時局的嚴重性，我應該親自出席國會聯席會議。

我已經於 3 月 10 日邀請若干國會領袖在我的官邸舉行了會議。這次的人數比我在 2 月 27 日所邀請的要多些。會議包括參議員巴克萊、康納利、塔夫脫、范登堡和懷特，眾議院議長馬丁和眾
议员布尔姆、坎农、伊顿、哈勒克、麦考马克、雷朋、肖特和泰伯。延
安·艾奇逊也出席了，他和我同立法者在一起花了两个小时讨论
了希腊的局势。范登堡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我回答了与第一
次会议上议员们所提的类似的问題。对于必须执行的这项工作没
有一个人表示异议。

与此同时，国务院在着手起草我将向国会提出的咨文草案。第
一个方案并不完全使我满意。起草人在演讲词中堆满了各种各样
有关希腊的背景材料与統计数字，把这篇报告弄得听起来好像一
份调查意见书。我把这份草稿退还艾奇逊，并附上一个条子，要他
再强调总的政策声明。国务院起草人于是又重新撰写了一篇包括
一项总的政策声明的演讲稿，但是在我看来，还是冷冷淡淡的。例
如，主要的句子写道，“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应当是⋯⋯”。我拿起
了铅笔，划去了“應該”二字，改为“必须”。在其他几处也作了类似
的修改。在这篇稿稿中我不希望有模棱两可的字眼。这就是美国
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它必須清清楚楚，不允許留疑
或自相矛盾。

1947年3月12日（星期三）下午一点钟，我走上众議院大厅的
讲台，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了演说。我请求参議员和众議员会集
在一起，以便我能在他们面前説明我所认为极端严重的局势。

为了对付这个形势，我建议国会立即采取行动。我也希望向
全世界説明，美国在这个新的极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的立场。这
项政策声明很快地便开始被称之为“杜鲁门主义”。我相信，这是
美国外交政策的轉捩点，它現在宣布，不論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
間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

我向国会和全国的无线电听众説，“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
支持那些正在抵抗依靠武装暴力的少数人或外来压力的奴役阴
谋。”
“我认为，我們必須幫助那些以他們自己的方式來挽救他們自
己命运的自由人民。

“我认为，我們主要應該是經濟和財政的援助，因為這對經濟
穩定和有秩序的政治進展是必要的。”

我的這篇演說发表了之后，世界各地的反映证明，这种做法是
正确的。全世界都发出了赞助声，而共产党和他們的同盟人则疯狂地對我进行攻击。界限是划得清清楚楚的。我在演說中說道，
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对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

我说，“我們的生活方式，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它突
出地表現为：自由的制度，由代表組成的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
自由、言论、宗教信仰自由和没有政治迫害。

“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为基
础的。它所依靠的是：恐惧和迫害，对报纸和广播的控制、指名的
选举和对个人自由的压制。

“极权制度的种子，”我在结尾中說道，“是靠灾难和匮乏发育
滋长的。它們散布在貧窮和不和的泥土中，并在其中长成。当人
們要求改善生活的願望破灭时，它們便大大茁壮起来了。

“我們必須使那种願望永不熄灭。

“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們都在期待我們的支持，以维护他們的
自由。

“倘若我們的领导表现出举棋不定，我們就会使全世界的和平
受到危害——我們也必定使我国的幸福受到危害。”

当我的演說完毕时，国会議員们象一个人一样站立起来鼓掌。
大厅里只有一个人，維托·馬坎托尼奥，这个美国勞工党纽约州代
表，沒有站起来。次日国会就开始立法工作，以便把这项计划付诸
实施。与此同时，由于我能不經国会的特別批准而提供援助，内阁
議員们就赶紧对希腊提供这样的援助与鼓励。海军部长福莱斯特
尔根据我的命令，派遣了航空母舰《利维号》和其他九只军舰访问希腊。以表明我们的决心，希望说服英国人继续留在那里，至少等到我们对希腊的援助发生效用时再撤退。

驻希腊大使麦克佛、驻土耳其大使埃德温·威尔逊和保罗·波特尔都奉召回华盛顿，陈述他们在当地的见闻，并提出他们的意见。

4月5日，在杰斐逊纪念日午宴会上，我把我在国会中所发表的那篇演说的论点又进一步加以强调。

“我们知道”，我說，“只要我们还是自由的，托马斯·杰斐逊的精神就永远活在美国人人心中。他的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我们感到欢欣鼓舞的是，一百五十年前燃起的这盏明灯，今天仍然在美国发出光芒。它甚至比他那时照亮得更明亮更清晰。当时这个未经受考验的信仰今天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但是我们知道，杰斐逊的原则不是哪一个阶级、哪一个党派或哪一个国家所垄断的。从被压迫的人民的沉默无言和失去自由的人们的失望中，向我们发出一种愿望的表示。杰斐逊曾经在许多谈话和指示中把男人、女人和儿童对于自由的要求宣布为不可剥夺的权利。

“当我们听到国外要求自由的呼声时，我们就从托马斯·杰斐逊的话里得到了鼓舞。在他给门罗总统的信中，主张采取我们现在所说的门罗主义，他写道：

“‘干涉别国的内政，都是侵略侵犯别国的权利，这种情况也是不可容忍的，我这里建议我们对此提出抗议’。

“像杰斐逊一样，我们看到了别国权利受到残暴的侵犯。

“我们也把这些情况看作是不可容忍的。

“我们也提出了抗议。

“我們必須通过援助那些自由遭到外国压力的威胁的人们，使
得这种抗议发生效力。

“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立场。仅仅说，‘我们不需要战争’，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及时采取行动——走在时间前面——及早扑灭可能蔓延到全世界的战火。……

“今天全世界都期待着我们的领导。

“形势迫使我们担当起这个任务。

“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危险时期。自然，我们接受这个以世界为己任的新概念是一个艰巨和痛苦的过程，它的代价一定是很大的。

“但是推卸责任不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有一种构成我国伟大源泉的传统。我把它称之为美国人的精神与性格。

“我们把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安德烈·杰克逊、亚伯拉罕·林肯、伍德罗·威尔逊和弗兰克林·罗斯福贡献给全人类。

“我们不仅热爱自由，在必要时还以生命来保卫它，而且还认为别人和别国也有权与我们共享自由。

“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为争取人权而进行斗争时，自由的美国人民，对于这种结果是不可能忽视或漠不关心的。

“在我们致力于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我们有许多东西要加以保持——许多地方需要改进——许多道路需要开辟。……

与此同时，国会对援助希腊的议案进行着深入与谨慎的辩论。我希望它能在3月31日以前通过，这个希望没有实现，但是参议院在4月22日批准该项议案，众议院于5月9日才投票，结果以二百八十七票对一百零七票获得通过。1947年5月22日，我签署了这个法案。由于国会制定了这个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法案，美国便向世界说明，共产主义的扩张是不可能轻易取得胜利的。

自然，在希腊国内搞叛乱的共产党和他们北部边境上的同谋
者知道，美国的援助一到，他们就要失败了。因此，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在我军的援助发生效力之前取得胜利。毫无疑问，叛乱分子是由卫星国家指挥的。1947年5月23日，联合国巴尔干调查团正式下结论说，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支持反希腊政府的叛乱。调查团内投票表决的结果是八比二，自然，俄国和波兰是“投反对票的”，法国弃权。6月初，希腊北部的政府军队的处境日趋恶化。6月9日，我国大使馆报告说情况“显著地恶化”；16日，希腊政府请求赶紧装运援助物资，它还要求那些答应给予的援助物资大部分为军事装备。

7月9日，英国外交部告诉我们驻伦敦的大使说，他们调查非常担心希腊的局势，认为前景暗淡。7月16日，马歇尔将军送给我一份关于希腊局势的备忘录，开头一句便写道，“过去三天来希腊的局势急转直下。”数量相当可观的游击队从阿尔巴尼亚那边越过边境而来。看来他们的目的就是在占领一些较大的地区，作为“人民共和国”的中心。

我见了海军部长，问起我们在地中海的舰队有多大一部分能够调到希腊港口去。福莱斯特尔部长告诉我，以紧急命令来调动大部分的地中海舰队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他相信，这样一种访问对共产党游击队的行动是会产生一些抑制作用的，但是他不乐意对美国公众的反应作出估计。

与此同时，我所任命的援助希腊计划的执行人德怀特·格里斯沃德（前内布拉斯加州州长）已经到达了那里。他花了很大的力气着手建立起一个机构，负责接收和分配供应物资事宜。然而，希腊政府还是表示对军事装备最为关心。他们需要装备、训练和金钱来扩充他们的军队，如果我们将他们自己去支配的话，他们就会将我们所给予的一切援助用在军事方面。麦克佛大使和格里斯沃德都在不断地劝导希腊政府扩大政府基础，取得最广泛的
人民的支持。

因此，甚至当我们支援希腊经济，帮助他们对付共产党叛乱时，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这样的问题，即他们要把我们的援助用来加强政党目的，而不用来解决国家前途。美国对欧洲政策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似乎是提醒欧洲人要以最远大的眼光来看待局势，而不要以一种狭隘的国家观点甚至党派成见来看问题。实在的，当我们为希腊问题所困扰时，马歇尔将军已经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哈佛大学演说，“马歇尔计划”就是在这篇演说里提出来的。
第八章
马歇尔计划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曾经遇到过像美国今天所面临的那样巨大的任务——恢复和援助战胜国和战败国。轴心国家的无条件投降并没有给我国人民带来喘息的机会。他们必须正视并准备作出保证和平所必需的任何新的牺牲。这次战争是历次战争中破坏性最大的一次。所谓战线是不存在的，老百姓不幸同武装部队一样地成为军事目标，因为他们是总体战中的工业和经济中心的一部分。

对工业区的攻击，对运输、公用事业和其他设备的轰炸，使得已经为最终边境的武装部队的需要所吸干的经济生活到了快要解体的地步。

必须帮助各国（即使不是各洲的话）从这次灾难中站立起来。除非这些国家的经济生活得到恢复，否则就不可能重建世界和平。

在日本投降后的头两年中，美国拿出了一百五十亿美元以上的贷款和赠与来救济战时难民。我们以慈善为怀，尽一切可能来防止饥馑、疾病和痛苦。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援助来帮助恢复交通和运输，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帮助各大国重建遭到破坏的经济组织。

一个战胜国愿意复兴战败国和帮助它的同盟者，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是美国的态度。但是我们却有一个同盟国对胜利采取了征服者的态度。

俄国人要索取二百亿美元的赔款，但是我在波茨坦会议上告诉他们，我们不愿意支付这笔赔款，因为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在这一方面已拿出了很多钱。但是现在，这是俄国人能够筹集恢复费用的唯一办法，因为他们已经承认了。我们承认我们的同盟国甚至过去的敌人进行赠与来帮助他们恢复。恰恰相反，俄国人则不承认，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就从他们所占领的国家抢走所有能够运走的东西。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是鲜明的例子，它们由于帮助了忘恩负义的俄国人，而却得到了上述的后果。

我们所给予的援助，使世界上许多地区避免了严重的悲剧，并且开始向着恢复的道路前进。这种帮助符合美国的特质，也符合美国的新历史使命。帮助遭受灾难的人民不仅是我国的传统，而且也是我们的安全所必需。我们的重建欧洲和亚洲，也就是帮助建立世界和平所必需的健全的经济均势。

然而，到了1947年，也就是经过了两年巨大的紧急援助（虽然这种援助是零零星星的）之后，可以明显地看出，为了重建欧洲的经济，还须要一个更大、更广泛的计划。这个计划必须赶快进行，因为那时西方正面临日益加强的共产帝国主义的压力。同时，我觉得，美国的援助不管如何巨大也不能使欧洲得到永久性的恢复，除非欧洲国家自己也能够帮助医治它们自己经济方面的长期创伤。我怀着这种想法，着手寻求措施，希望以此鼓舞欧洲人民，实行一种最后能够达到有效的自力更生的联合计划。

1946年秋，我要求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的联合委员会参与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行动方案。当时我认为，我们对希腊—土耳其的援助计划，为了我们制定一个对我们困难重重的盟国进行经济援助的计划打下了基础。

1947年3月12日，我发表了一篇政策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我力图概括地说明，在任何对自由国家的独立和安定存在着威胁的地方，美国所要采取的立场。

126
几天以前，我在得克萨斯州华科的贝勒尔大学，曾经表明了这种信念：自由的世界贸易是世界和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说：“我们的对外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不能说，我们在这一方面合作而不愿意在另一方面合作。”我引证了三十年代的经济战争，当时各国扼杀了正常的贸易，存款人丧失了他们的存款，农民失掉了他们的土地。我说，历史的教训是很清楚的：国际间的自由贸易将为持久和平提供必要的条件。我的顾问们着手寻求更切合实际的办法来加强经济事务方面的国际合作。

我们曾经把粮食运到欧洲，但是那里仍然有几百万人民得不到足够的粮食。我们曾经贷款给欧洲国家，但是战争已经把那里的贸易和经济结构破坏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致我们贷款给它们的数额远远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我感到很忧虑，因为我们给英国的贷款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我们的政府机构每天把有关国外情况的详细报告送到我的办公室来。许多有代表性的外国领袖所提出的要求如雪片飞来。事实上，他们对经济情况都表示了重重忧虑，认为如果不改善这种经济局面，共产主义很可能取得胜利。4月26日，国务卿马歇尔带着一种悲观的情绪从莫斯科外长会议回来。他满怀希望到莫斯科去，以为能使俄国人相信美国是在为和平而努力的。然而，俄国人只关心他们自己的计划，他们冷酷地决定利用欧洲这种一筹莫展的情况来发展共产主义，而不顾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合作。

马歇尔的报告坚定了我的信念：必须刻不容缓地找出复兴欧洲的办法。马歇尔将军是我们所熟悉的最机敏、最有远见的人之一。每当问题提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似乎都能马上提出最基本的解决办法，而这个办法往往就是他的幕僚后来所建议的最好的方案。他很少发言，总是仔细地倾听别人说的每一件事情。有时候他会
略有表情地或毫无表情地坐上一个钟头，但是当他充分地听取了
他人的意见以后，就会针对讨论中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他的
看法经常是击中要害的。

作为国务卿，马歇尔必须比当参谋总长时更多地听取幕僚的
意见。他会倾听很久而自己一言不发，但当他的幕僚们之间的
争论似乎无休无止而他已不能再忍耐时，他就说：“先生们，不要争
论问题，要决定问题。”维安·艾奇逊曾经告我一个说明马歇尔
的特点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马歇尔最初担任国务卿的时候。
当时马歇尔要求艾奇逊留下来继续担任副国务卿，他说：“我需要
你告诉我最完全、最坦率的事实，特别是关于我自己。”维安·艾奇
逊回答道：“是这样吗？将军。”马歇尔说：“是的。我没有什么感情，
仅有的那一点点感情也是留给马歇尔夫人的。”

马歇尔在国务院幕僚们提交给他的计划中，只抓住欧洲经济
统一的重要性。如果能够引导欧洲国家把欧洲的经济问题看做一
个整体而不是看作不相关联的各个国家的问题，来寻求自力更生
的办法，并实行互相合作，那么美国的援助将更为有效，同时恢复
后的欧洲的力量也更能持久。

这恰好就是我心中的想法。马歇尔和我完全一致。我感到，
除了经济上的考虑以外，这个实行合作的主张将在欧洲国家中激
起新的希望和信心，从而提供生动的论据来对抗共产党的那种自暴
自弃的态度。

这个主张是解决欧洲问题的一个办法。它最初由维安·艾奇
逊在一篇可以称为马歇尔计划的开篇白的演说中公开表示出来，
这篇演说是在1947年5月8日在密士府州克利夫兰发表的。原
来计划由我在那次会议上发表这篇演说，因为我有别的事情，所
以叫艾奇逊出席这个会议。艾奇逊的演说包括了建议的基本部
分，一个月之后，马歇尔对这个建议作了充分的发展，并作了全面
128
的陈述。

艾奇逊演说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强调欧洲的重建问题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他着重说明了粮食和自由的相互关系。他说：“直到世界人民能够重新解决自己的衣食问题，并且对前途抱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战争才算结束。”他接着把我们过去进行救济的努力所收到的效果算了一笔账，并进一步指出，更广泛的财政援助是必要的。这样使用我们的经济和财政资源将有助于维护我们自己的自由和民主制度，因为这样做将加强我们的安全，从而扩大经济领域，人类的尊严和国外的自由制度正在这种经济领域中进行生存斗争。

艾奇逊的演说虽然是后来马歇尔国务卿在哈佛大学提出的建议的一个开端，但当时它并没有得到应得的重视。国务卿马歇尔于1947年6月5日对参加毕业典礼的听众概述了美国对付欧洲危机的行动方针。

这篇演说对马歇尔说来是典型的。这是一部实事求是的、朴实的、简洁扼要的演说。他首先对欧洲的经济形势作了简要的回顾。

然后开始谈到行动方针，他说：“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社会状态，这是合乎逻辑的。否则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经济和有保障的和平。我们的政策不是反对任何国家或任何主义，而是反对饥饿、贫穷、冒险和混乱。我们的政策的目的应该是在恢复世界上的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由于各种危机的发展，我们决不能把这种援助放在零星供给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将来给予的任何援助应该是根治疾病的药品，而不应该是暂时止痛的镇静剂。任何愿意帮助完成恢复工作的政府都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合作。任何力图阻挠其他国家复兴的政府就不可能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外，任何企图延长人类的痛苦以便从中获得政治或其他方面利益的政府、政党或集团，将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

接着他谈到了计划的关键部分：“事情很明显，在美国进一步努力来改善形势和帮助欧洲走上复兴的道路之前，为了使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能够收到适当的效果，欧洲各国之间必须就形势的需要，以及它们自己将担任什么任务取得一定程度的协议。如果片面地由美国政府来筹划一个复兴欧洲经济的计划，那既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可能生效的。我认为，欧洲必须首先提出倡议。至于美国的任务，应该在拟定欧洲计划时给予友好的协助，然后在我所实际能做到的范围内，支持这个计划。”

我们的建议就是，欧洲各国应首先就一项合作计划达成协议，以便利用欧洲大陆上的全部生产资源，然后我们尽力给予物质上的支援，来使这个计划获得成功。

当僚属们还在会议中讨论这个方案时，我就称它为“马歇尔计划”，因为我愿意马歇尔将军获得最大的荣誉，他在制定这个计划方面有着辉煌的贡献。正是马歇尔构思出这个建议的全部轮廓。他看出了这个建议的鼓舞作用和经济价值。历史必然永远会正确地把他的名字同这个计划联系在一起。这个计划帮助欧洲避免了一次经济灾难，并把它从俄国共产主义奴役的阴影中拯救出来。当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说中发表了他的主张以后，“马歇尔计划”这个名词立刻就在美国和世界各国的报纸和广播中变成了通用的名词，我很高兴看到他的名字同这个计划连在一起。我相信马歇尔所享有的世界地位使得根据这个政策而作出的建议很容易被采纳。在美国政府中，马歇尔是那些与美国在全世界的战时活动的逐日发展保持密切联系的极少数中的一员。作为军事战略家和外交家，他在国外是同美国历史上很少几个人一样地享有盛誉和受到尊敬的。在国内，不管一般公民的政治信仰如何，他们都
信任他，尊重他，同时也深为国会领袖们所钦佩。马歇尔的整个品格引起人们对他的信任。我回忆起1944年初诺曼底登陆以前的那一段令人忧虑的时期。当时国会里有许多人对于一般所期待的通过英吉利海峡的进攻，抱着疑虑。可是马歇尔来到了国会大厅，对大约四百五十个议员发表了演说。他的冷静而坚定的态度和对形势的一切实际情况的全面掌握，消除了每一个人可能存在的任何疑虑。最值得注意的是，到会的每一个人都遵守了这位将军要求我们保守的秘密。这就是马歇尔影响那些了解他的人的典型态度。毫不奇怪，所有近来对马歇尔进行诽谤的人，既不知道怎样去衡量马歇尔所负的责任，也不了解他完成这种责任的态度。

在战争时期，他在华盛顿的许多岁月，使他全盘熟悉和了解国会的作用。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庞大军队的首脑，他处理了空前繁重的行政问题。在他专心致志地把他在哈佛大学的演说中提出的计划付诸实施时，这些经验证明具有无可估计的价值。

然而，马歇尔的演说像电流一般地立刻获得自由世界的反应。最先响应的是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紧接着是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他们contrue马歇尔说，他们准备采取马歇尔所建议的那种主动的态度。伦敦和巴黎对西班牙以外的每一个欧洲国家发出了邀请，建议召开一次会议，设法草拟一个广泛的复兴计划。

俄国的反应也是迅速的。马歇尔的建议有一度看起来好像不仅可能收到复兴经济的结果，而且也可能产生揭开铁幕的结果。有点令人奇怪的是，莫洛托夫先生竟同意参加贝文和皮杜尔建议确定全体大会的议程和程序的预备会议。但是，比德耳·史密斯大使从莫斯科正确地报告我们说，莫洛托夫并没有参加任何建设性工作的意图。他打算做的是利用这种局势来达到俄国自己的宣传目的。他企图使贝文和皮杜尔要求美国答应一个欧洲所期望的全部援助的具体数额。当然，这样一来，美国国务院就会被迫作出
我們不能以任何形式承担义务的答复，于是，苏联就可以向全世界宣称我們不打算实现我們的建議。

正如一位法国外交观察家所说的：“苏联想使美国处于这样的境地：美国要末就在真正的计划成立之前把援助全部拿出，要末干脆拒绝支付任何贷款。”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告诉我们的大使说，“莫洛托夫显然不希望这件事搞成，但是在另一方面，他的饥饿的卫星国却伸长脖子，渴望从你们那里得到一些钱。很明显，莫洛托夫陷入了尴尬的处境。”

事实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接受了参加会议的邀请，并且迫切地希望参加会议。但是，克里姆林宫采取了一个戏剧性的行动，命令他们放弃参加会议的诺言，同时，莫洛托夫在离开巴黎时把资本、主义和美国骂了一通。

1947年7月12日，十六个国家在巴黎参加了会议的开幕式。这些国家是：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土耳其和英国。西德虽然没有正式参加，但是会议考虑了它的需要和它对于任何全面计划能够作出贡献的能力。

9月22日，关于这个会议的报告送到了国务卿豪威尔那里。两天之后，豪威尔把它连同许多有关文件送给我研究。报告叙述了欧洲的经济情况以及与会各国认为依靠它们单独的和联合的努力所能解决的问题的范围。报告在考虑了这些进行复兴的努力之后，便对这十六个国家必需进口而又无法付款的物资的范围作了估计。

于是，我发表了三个独立的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这三个委员会是我指定去调查我们自己的自然资源情况，对外援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以及能够用于对外援助的物资的性质和数量。9月29日（星期一），我还邀请了国会和政府许多领袖在我的办公室举行会
議，就當時我們應該採取行動的計劃進行了討論。被邀出席的有：
国务卿和副国务卿（罗伯特·罗穆特已于 7 月 1 日在迪安·艾奇
逊为副国务卿），农业部长和商务部长，以及下列国会议员：参议员
布里奇斯、康纳利、卢卡斯、范登堡和怀特，众议员艾伦斯、布卢姆、
伊顿、哈勒克、雷朋和华尔柯特。

我把上述研究报告的详细内容通知了议员们，并且告诉他们，
看来在明年 3 月 31 日之前，为了应付欧洲的迫切需要大約需要五
亿八千万美元，因为所提出的计划最早要到明年 3 月 31 日才能生
效。我要求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外交委会会和撥款委员会主席，对
于迅速援助西欧的必要性，予以认真的考虑，我們还研究了召开国
会来討論这个问题的可能性。

10月 1 日，我发出了给两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的信，要求他們把
这个问题当作一件最紧的急的事情来考虑，特别是要考虑到日益恶
化的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况。11 月 17 日，国会将召开一次特别会议。
10月 23 日，我曾会見国会领袖们，告诉他們我要求这样做，一部分
原因是为了使国会可能采取步骤来制止国内螺旋形上涨的物价，
主要是为了对付西欧的危机。

10月 24 日晚上，我在白宫发表了一篇广播演說。我说，当我們
在考虑一个帮助欧洲复兴的长远计划的时候，我們必須帮助某
些国家渡过目前的危机。“法国和意大利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如果
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崩溃了，人民屈服于分歧主义的压力之下，那
末，它们和我們都无法指望它们获得复兴，而它们的复兴对于世界
和平又是那么重要。”

在国会特别會議上，我以同样的思想发表了演說。我强调说，
用以阻止情况恶化的援助不可能代替广泛的长远计划，但是，如果
我們不愿意在我们计划实施之前，看到它的基础毁灭的话，就必须
立即給与援助。
1947 年 12 月 19 日，我送交国会一份咨文，说明美国在一个复兴欧洲的广泛计划中所应担当的角色。

“在拟订这个计划的过程中，我们始终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第一，制訂这个计划是为了使欧洲在一定时期内能够获得真正的复兴，而不仅仅是漫无止境地继续进行救济。

“第二，制訂这个计划是为了保证我們提供的基金和物资最有效地用来复兴欧洲。

“第三，制訂这个计划是为了使美国的财政负担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也防止长期无法偿还的毁灭性的财政负担加在欧洲国家身上。

“第四，制訂这个计划时，适当地考虑到保存美国的物质资源，并且尽量减轻由于援助欧洲对我国经济所起的影响。

“第五，这个计划必須同我国的国际关系和其他方面的责任协调一致。

“第六，执行这个计划是为了明智而有效地实现我国外交政策上的伟大事业。”

我向国会建议，希望整个计划的执行能够在四年左右之内大体上达到复兴欧洲的目的。估计在四年多的时间内，全部代价要达一百七十亿美元。我要求国会批准这个数字，并且在 1948 年 4 月 1 日以前在这个数字中拨出六十八亿美元作为最初的也是最危险的阶段（到 1949 年 7 月 30 日为止的十五个月）的应用。

听起来，一百七十亿美元是一笔庞大的数目。当然，事实上也是这样。但是单单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财政支出比较一下，这个数字就显得很小了。我們准备用来重建欧洲相当高的生活水平的錢，只等于我們为了打败轴心国家所花费的錢的5%；如果与这个计划实施期间我国的全部国民收入相比，則还不到 3%。根据专家們的估计，美国人民完全能够负担得了的。
我沒有忽略联合国和我們對它承擔的義務。我在致国会的咨文中說："我們對復兴欧洲的援助是同我們對联合国的援助完全一致的。联合国的成就是有赖于会员国的独立的力量以及它们坚持包括在联合国宪章中的理想和原則的决心与能力。欧洲复兴计划的目的一和联合国宪章的目的——通过自由国家的共同努力来保证世界和平——是完全一致的。任何国家如果为了自私的目的，而企图阻挠或破坏欧洲的复兴，显然与这些目的背道而驰。"

"这个复兴计划不可能只通过联合国来实现。因为五个参加欧洲复兴计划的国家现在还不是联合国会员国。此外，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并没有参加这个计划。美国对欧洲复兴计划的支持，将使欧洲的自由国家能够把它们的巨大力量用于恢复经济。而这些国家人民的较高生活水平的恢复，健全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对个人自由与正义的理想的支持等等，……都有赖于綏济的恢复。"

"美国同一部分欧洲国家的这个联合计划，是忠于联合国的原则的。它证明，自由的人們能够有效地联合起来抵抗极权主义的压力，保卫他們的自由制度，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

国会根据我的請求迅速采取了行動。不过議員們沒有同意所建議的全部数额。三个半月以后，即1948年4月2日，我签署了国会通过的“欧洲复兴法案”。过了三天，我宣布任命保罗·霍夫曼为经济合作总署署长，职位相当于部长。

功勳应当归于參議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阿瑟·范登堡和众議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查尔斯·伊顿。他们在一次旨在削减税收和政府支出的国会会议中，以真正的两党合作的态度为这个计划进行辩护。在接着举行的另一次国会会议上，改变了这个计划的管理机构，并把它同军事援助计划合并成立一个共同安全署。

經济恢复工作胜利地完成了，它所花的代价比我們原来所预
計的寥少得多。我曾告訴國會領袖們，在四年多的時間內用一百七十億美元可以勝利地完成經濟恢復工作。結果只花了一百三十億美元就完成了。

馬歇爾計劃將作為美國對世界和平的最大貢獻而載入史冊。我相信，全世界現在已經認識到，如果沒有馬歇爾計劃，西歐是難以避免共產主義的專制統治的。
第九章
柏林的封锁

马歇尔计划对俄国是个出其不意的打击。莫斯科很快就认识到，马歇尔计划一开始执行，他们就会失去利用西欧的经济困难来使它共产主义化的机会。由于无法阻止各国进行合作来复兴欧洲，俄国就企图采取两个行动进行报复。第一，是在俄国的主持下，为它的卫星国家建立一个与马歇尔计划相抗衡的计划。这个计划旨在切断已经恢复了的东西欧之间的贸易往来。这个计划也要阻止这些欧洲国家恢复正常战前贸易往来。这种贸易对这些国家是极其重要的。

第二个更富于挑衅性的行动是在柏林发动一次军事冒险事件，目的在试探我们的决心和耐心。英国、法国和美国军队在柏林同俄国人近在咫尺。柏林的每一个单独的占领区都完全处在苏联所占领的德国领土的包围之中，同时所有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人員和供应物资都得通过一条为俄国人所控制的走廊，才能到达我们在柏林的占领区。按照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的协议的规定，管制德国的军队政府是在柏林联合执行任务的。

关于东西德的划分的来由问题，曾经有过许多讨论。我们的军事专家过去就充分认识到，一旦我们进攻德国的部队把德国的力量从东线吸引过来，俄国的力量就能够深入德国。因此，在战斗结束之前达成协议的界限，正反映了盟国的军事计划人员所预料到的在战争结束时俄国的军队会伸展到什么地方。

在战后的第一年中，英国人和美国人曾尽一切努力来实现联
合管制计划。可是俄国人，法国人在法国人的大力支持下粉碎了我们的努力。法国人怕德国。当然，由于在七十年中受到德国三次侵略，法国人有充分理由怕德国人。但是，他们这种分割德国的愿望，使他们阻挠了许多联合管制的措施，而这种合作在当时也许还是可能实到的。

至于俄国人，看来他们决心把他们的德国占领区实际上当作苏联所征服的领土来处理。他们切断了苏占区和英、美、法占领区的一切联系，使得在西德的三国政府的官员们没有旋转的余地。因此，必须作出安排以便恢复某些正常的经济活动，而为了顺利地实现这一点，就建立了一个包括英美占领区的“双占区”联合机构。后来，法国也参加了这种安排。

在我所接到的许多关于德国情况的报告中，有一个简要的报告是当时的商务部长阿弗里耶・哈里曼送给我的。哈里曼在访问德国之后，于1947年夏末说道：“我们给予的援助太少，太晚了。结果，在我们直到目前为止所花费的钱当中很大一部分是白白浪费了。德国的经济一直是靠人力和物资的匮乏力量维持着的，它目前仍在继续衰退中。我们必须增加目前的支出，以便减少今后几年中总支出。……”贮备物资正在迅速地消耗着。农业肥料不足，工业零件和原料即将用罄。运输部门拆散了旧的机车和货车来装配另一部分机车和货车，使它们能够行驶。除非我们立刻采取步驤把走下坡路的趋势扭转过来，否则，我们将面临接踵而至的许多危机。……除非我们准备马上采取行动把德国的生活从目前的可怜而又混乱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我们就不可能达到我们的基本目标。德国的粮食供应和工业生产远远落在西欧各国之后。如果德国不能作为一个健全的生产和消费单位，而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就不能够重建自给自足的西欧经济。”

这就是战后德国达到最糟糕的地步的情况。但是不久对德
国的援助款就增加了，西德的需要也列入马歇尔计划的预算之内。“双占区”联合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某些工业活动的恢复。

可是，与此同时，俄国人却愈来愈不好对付。在1948年3月20日，他们的代表终于退出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就大部分德国来说，这个行动只不过是从战后一段时期内已经很明显的一件事实正式化而已。这个事实就是四国管制机构事实上早已无法工作下去了。但对于柏林来说，这个行动倒是一次严重的危机的序幕。

3月30日，苏联方面的副军事长官德拉特温将军通知我们驻柏林的军事长官说。在两天之内，即从4月1日开始，俄国人将检查所有通过他们占领区的美国人员的证件，并检查所有货运和除了私人行李之外的一切物品。

我们的军事政府当局拒绝了这些要求。他们指出，当我们的军队从萨克森和提林根撤退到自己的占领区时，曾经得到自由通行柏林的保证。可是俄国人说，没有达成过这种协议。他们宣称，他们完全有权利控制他们在占领区内的一切交通运输。当我们的火车开到占领区边境，车长按照命令拒绝接受检查时，他们就阻止我们前进并要我们往回开。从4月1日到7月1日，俄国下命令切断了所有来往柏林的公路、铁路和水路交通。俄国人提出的理由是“技术上的困难”

这些“困难”的真相不久就很明显了。6月18日，英国、法国和美国宣布，三国的西德占领区即将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原来，俄国人保有在占领初期就开始通用的货币图版，他们在东德印制货币，大量流入西方占领区，有目的地使阻挠德国复兴的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因此，我们便改变了货币的图版，但是俄国人继续操纵东德马克。我们的货币改革旨在使德国有一种健全的马克，以便在西德通用。这种可靠的西德货币当然受到全体德国人的欢迎。俄国人反对我们的货币改革，因为这一改革揭露了他们的货币根本
就不稳固。货币改革也是围绕柏林问题而进行的谈判的主要争论之一。俄国人对于这一行动的重要性估计很快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们建议，如果西方国家取消货币改革，他们就重新开放通往柏林的交通。

俄国人当时想达到的目的是要把我们赶出柏林。最初他们坚持说，我们从来没有驻在柏林的合法权利。后来他们又说，我们虽有这样的权利，但我们已丧失了这种权利。

四大国在柏林的整个组织机构，包括我们从规定由俄国占领的地区撤退，都是由四国当地的将领们作为军事问题协商解决的。刘歇斯・克莱将军事后责备自己没有坚持把协议用文字确定下来。可是，我认为，有没有书面协议对俄国人说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柏林的斗争是为了德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为欧洲，而并不是为了合法权利，因为我们的立场在国际法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克里姆林宫看到我们开始实行马歇尔计划，就企图迷惑欧洲人民，使他们相信我们所关心和支持的只限于经济事务，在碰到任何军事冒险时我们就会缩回去。

我在6月25日的内阁会议上说明了这一形势。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报告说，一种严重的局势正在发展中。他同驻在德国的克莱将军保持接触。我问罗亚尔问克莱，局势是否严重到需要考虑撤出在柏林的我方人员的家属。克莱认为这样做是不聪明的，因为这会引起心理上的影响。克莱被迫采取了紧急措施，把必需的供应从空中运到柏林，因为当时柏林的水陆两路实际上已经被俄国人封锁了。

6月26日，即我们在内阁会议上讨论了柏林危机的第二天，我命令这种临时采取的“空运”措施应在全面组织的基础上进行，同时我们的欧洲司令部能够获得的一切飞机都必须服役。我们希望采取这种办法能够供应柏林所需的粮食直到外交僵局打开为止。
后来谈判移到莫斯科去举行。在 7 月 6 日，西方三国的代表以我国大使比德耳・史密斯为发言人，向俄国人把问题摊开。苏联在 7 月 14 日提出的答复中，放弃了所谓“技术困难”的借口，极其清楚地表明了俄国封锁柏林事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和宣传行动。当时苏联拒绝就柏林问题进行谈判，除非把它当作整个德国问题谈判的一部分。他们拒绝了我们提出在任何谈判举行之前先解除封锁的条件。

我发出一道命令，叫克莱将军及他的国务院顾问罗伯特・墨菲回华盛顿来作汇报。

很显然，俄国人决心要强迫我们退出柏林。他们最近在意大利、法国和芬兰遭到的挫折。他们的最强大的卫星国南斯拉夫突然产生了一种主张独立行动的倾向，同时欧洲复兴计划正在开始获得成就。封锁柏林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反攻。克里姆林宫所选定的目标——德国的故都柏林——也许是欧洲最敏感的地方，因为它过去是、现在也是德国人的象征。如果我们不能保持在柏林的地位，共产主义就会在德国人中间扩张势力。我们在柏林的地位是风雨飘摇的。如果我们想要留在那里，我们就必须显示一下力量。但是，俄国人对于我们的行动的反应又经常存在着引起战争的危险。我们必须正视俄国有可能蓄意选择柏林来制造战争的借口，而更大的危险是以杀人取乐的俄国飞机驾驶员或头脑发热的共产党人坦克指挥官可能制造一个偶然事件而燃起战火。

1948 年 7 月 23 日，克莱将军来到白宫，并参加了当天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我要他报告一下德国的局势。

下面就是他谈的大致情况，放弃柏林将对我们西德计划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它将推迟欧洲的复兴，而欧洲是否能够复兴则决定于更多的生产，特别是西德的生产。一般德国人对于我们撤
离开柏林的可能性比盟国更为关心。我們应该尽一切努力争取局势的和平解决，但是我們必须留在柏林。

克莱又說，德国人民的态度在某些方面简直令人不敢相信。組成市政管理机构，并将总机关設在苏联占领区的柏林政党领袖们曾坚决拒绝接受苏联的控制。柏林人民决心坚持下去即使这样做会遭受更大的困难。

他報告说，每天空运平均约二千四百——二千五百吨，这个数字足够供应粮食的需要，但还不能包括必需数量的煤。为了維持柏林的需要，使不发生极大的困难，估计最低限度每天需要四千五百吨。在夏季，每天三千五百吨可能够用，但是在冬季就需要更多的吨数。

那时參加空运的包括五十二架 C—54 型飞机和八十架 C—47 型飞机，每天来回两次，降落二百五十次以上。如果再有七十五架 C—47 型飞机，我們每天就能够运入三千五百吨。

我问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为了动用这些飞机，将会发生什么问题，他告訴我，假如把更多的飞机用于柏林空运，軍事空运处就要解体。而且我们还会发现至少需要在柏林再有一个小型的飞机场来容纳货物，同时在另一端至少需要一个小型的保养航空站。

范登堡将军在答复国务卿马歇尔提出的一个问题时說，最大限度的空运必然要使用原来备用紧急之用的飞机，而其中很可能在发生敌对行动时被毁。这样就会对我们进行战略性战争的能力发生不利的影响。如果我們的大部分飞机遭到袭击和毁灭，就會阻碍我們供应部队和防守海外基地的能力。范登堡将军还指出，通往柏林的航路是我們和俄国人共同使用的，如果我們把空运增加到他們认为他們被挤出航路的程度时，国际纠纷就可能产生。

接着，我問克萊将军，如果我們试图用武裝护送的办法，把供应物资运入柏林，会发生什么危险。克萊将军說，他认为俄国人的
头一个反应将会是路上设立障碍。在俄国人不进行干涉的情况下，我们的工兵能够清除这种障碍。但是克莱将军认为，俄国人可能采取的第二步，即是用武装部队来对付武装护送。

陪同马歇尔国务卿一起来的罗伯特·罗维特问克莱，他是否认为俄国人可能试图以战斗机巡逻或其他办法来阻止我们的飞机。克莱说，他认为俄国人除非决定发动战争，否则就不会攻击我们的飞机。

我问克莱将军，他是否知道有什么迹象说明俄国人要发动战争。他说，他认为没有这种迹象。他们的目的似乎是要把我们赶出柏林，以取得一次重大的胜利。他们打算不是在目前，而是在秋后利用冬天的气候迫使我们削减空运，又不致于扩大冲突。

我们讨论了如果冲突更加严重时，我们可能从我们的盟国方面得到什么援助。我说明了我的判断，如果我们撤出柏林，我们会丧失我们正在为之斗争的一切。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继续留在柏林而又不至冒全面战争的危险？

范登堡将军再次发言说，他觉得为了把所需的一切供应空运给柏林而将必要数量的飞机集中起来，将意味着在其他地方在飞机和人员方面削弱我们的空运力量。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会使我们暴露在无法收拾的形势下。

可是，我不同意空军参谋长的意见。我问他，他是否愿意让我们试图从陆路护送供应给柏林。再说，如果俄国人阻挠我们这样做，并且发动世界大战，难道空军就不需要贡献它的一份力量来保卫美国吗？接着我自己答复道，空运比陆路武装护送危险性较小。因此，我命令空军对供应柏林问题尽量给予充分支持。

范登堡将军回驳道，除非在柏林另外再修建机场设备，这个办法就不可能实现。但是克莱将军指出，他早已选好了修建新机场的地方，修建工程可以利用德国的人力马上开始。于是范登堡将
軍向我保证，空军将尽全力执行命令。

談到这里，我因事不得不离开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例如能够马上投入空运的飞机数目以及留在柏林的家属的数目等。

我們必須准备把空运扩大到最大限度，同时继续同俄国人进行谈判，看看是否能够通过协议解除封锁。7月30日，史密斯大使同他的英法同僚們把盟国对于俄国7月14日的照会的答复交給苏联外交部。我們宣称俄国的答复并沒有提供任何建设性的建議。局势充滿着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为此，三国大使要求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举行会谈。

8月2日晚上九点，他们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往常一样，斯大林表现得比他的僚属們较为通情达理，因此，会谈的结果使气氛缓和了一些。斯大林暗示，如果就东西德的货币能在全柏林流通这一问题作出安排，他愿意撤销运输方面的限制。他已不再坚持关于在取消封锁之前必须解决德国问题举行会议的意见，但是他希望把苏联政府的“坚决的願望”载入纪录：盟国延期执行下一个步骤——合并西方占领区计划。

然而，当史密斯大使和他的同僚们准备同莫洛托夫就这一谅解写成正式声明时，俄国的立场又一次变得顽固和强硬了。四次长时间的会谈都没有达成协议。我们的代表們反对俄国提出的草案中所包括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实质就是要我们承认，我们只是由于俄国人宽容才重新被允许留在柏林的。而莫洛托夫则拒绝接受西方国家提出的草案，因为这个草案宣称我们留在柏林是一种早经确定的权利。俄国的草案說，在宣布货币改革之后实行的运输方面的限制将予撤销，但是由于货币改革直到6月下旬才生效，因此在此以前，实行的許多限制将不包括在撤销之列。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签署了这项声明，我们就是同意俄国人的論点，封
犠犠柏林是为了对付我们的货形改革而采取的一种“防御”措施。此外,根据俄国的建议，在柏林通用的两种货币将由一家完全由俄国控制的银行来管理，同时柏林的全部对外贸易也将由一个为俄国所控制的机构来监督。

同莫洛托夫举行的这些关于起草声明的会谈毫无成就，因而我们指示史密斯要求同斯大林本人进行另一次会谈。这次会谈在 8 月 28 日举行，斯大林再一次表现出比莫洛托夫有更大的兴趣来获得互相谅解的基础。在撤销限制的范围问题上，莫洛托夫再次坚持声明中规定只限于那些在 6 月 18 日以后采取的限制。但是斯大林认为，声明中写作“最近实行的限制”比较妥当，同时认为可以获致谅解。如果在 6 月 18 日以前曾采取任何限制的话，这种限制也将被撤销。斯大林还同意，将管理柏林的两种货币的苏联银行置于四大国的控制之下。

根据达成的协议，由四国军事长官拟订协议的细节。但是，当外交官们着手起草公报及对驻在柏林的四国军事长官发出整套的指示时，事实又一次证明莫洛托夫很顽固。事实上，到了最后，甚至连向公众发表一个关于技术问题已经由柏林方面去解决的临时性公报都不可能，因为莫洛托夫除了他自己提出的条件之外，拒绝接受任何别的条件。

四国军事长官之间的讨论始终不能顺利进行。俄国代表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很快就采取了同斯大林对三国大使明确保证的完全相反的立场，他宣称不考虑撤销在 6 月 18 日以前实行的任何限制。事实上，他这时还力图对空运实行新的限制。他还断然声明，由四大国来控制发行货币的银行是完全办不到的。在柏林进行一星期之久的技术性问题的谈判甚至比在莫斯科一个月的谈判还无济于事。

与此同时，空运一直在增加着。8 月 20 日，陆军部长罗亚尔
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说，英美联合空运量平均每天为三千三百吨，一天的最大空运量达四千五百七十五吨。英国人利用了他们能够利用的一切力量，用运输机空运到柏林的物资，在上述吨数中占三分之一。柏林的库存物资逐渐增加了；那时在柏林已积存了二十五天用量的煤和三十天需要量的粮食。9月9日，空军部长薛明顿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说，从8月初起，每天平均空运量已达到四千吨，如果指派更多的运输机参加空运的话，可能达到每天五千吨。

就在9月9日举行的这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我们详细地讨论了这次同俄国人谈判所遭到的明显的失败的意义。马歇尔和罗维特在回顾了过去一个月来的外交事件后，得出结论说，除了把问题提交联合国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副国务卿罗维特要大家注意一个事实：苏联已经宣布要在包括我们的空运航路在内的广大范围内举行空军演习。但是我们已通知俄国人，我们将不停止我们的空中活动。

国务卿马歇尔指出，目前的时机对苏联是有利的。虽然我们能够继续进行空运，并且增加空运量，但是，即使在这一点上我们获得了比原来所预期的更大的成就，俄国人还是可能用新的办法来试探我们的耐心的。比方说，就在最近，柏林西方占领区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暴动，使局势严重到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

在美国，有人提出了同俄国绝交的要求。这些人不了解我们只能在谈判和战争之间选择一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的。只要俄国人愿意继续谈判，不管谈判是怎样的无所得，就不会发生战争。

史密斯大使奉到指示，交给莫洛托夫一件备忘录，其中列举了柏林谈判失败的详细原因，并且以最直率的语气说明了我们的立场。但是，莫洛托夫的答复还是老一套。他把所有的过失都归咎
于我們，除非我們完全接受蘇聯的立場，就不可能獲致任何結果。

那时候，法国、英国的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正在巴黎举行会议，他們在 1948 年 9 月 26 日发表了一项声明，认为苏联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同时宣布这个问题即将提交联合国。我当时正在全国各地进行一次至关重要的政治竞选旅行，但是，我仍經常与局势的全部发展保持密切联系。电信和文件都送来给我批准。代理国务卿罗伯特・罗維特和馬歇尔将军一样精细，保证总统經常了解情况的发展，并且在采取重大步骤或发表重要声明之前一定经过总统的批准。

美国对苏联的指控，是在 9 月 29 日由华伦・奥斯汀大使交给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一个照会中正式向联合国提出的。照会要求注意“由于苏联政府对德境西方占领区和柏林之间的交通运输片面地采取限制措施而引起的严重局势”，并且指控这一行动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是对和平的威胁。照会还明确指出，美国认为苏联的行动是一种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压力。

但是，苏联政府认为，如果西方国家当初接受了苏联的意见，就不会发生封锁事件。此外，华西斯基先生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辯解，从传统的国际法的意义來說，并不存在什么封锁問題，因此，也不可能存在对于和平的真正威胁。他說，苏联將不参加安理会关于封锁柏林問題的任何討論。

在这场爭辯的全部过程中，我們在安理会的发言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菲利普・杰克普教授。他是国际法的权威之一，由于他在联合国中代表西方国家提出这个指控時，表現了政治家的风度，因而获得国际上的尊敬。

可是，由于戏剧性的空运部队一天接着一天地飞向柏林，使外交斗争黯然失色。到了 10 月中旬，克萊将军就可以坚定不移地下結論說：空运已不再是一种試驗。即使最不利的天气，也不能阻止
我們的運輸供應的飛機從西方占領區飛向被封鎖的前德國首都。

克萊將軍在 1948 年 10 月 22 日舉行的另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作了這樣的報告，他不僅向我們說明了空運在技術上的成就，同時也指出我們在柏林的行動在德國人民中所起的影響。德國人民加強了團結，以新的活力從事重建德國的工作。我們的行動使他們強烈地反對共產主義。德國過去一直在消極地觀望着，不知道應該把自己的未來命運寄托在哪一方面，可是現在它正調轉船頭，向西方國家駛來。

1948 年末，蘇聯的領袖們進一步企圖引誘柏林人民削弱他們靠攏西方的决心。11 月 30 日，由於蘇聯的陰謀，造成了柏林市政委員會的分裂，這樣，柏林市在實際上就分裂成為兩個部分。他們還實行了一種新的檢查證件制度，使得東西柏林的接觸幾乎成為不可能；他們還改變了電力分配制度，這在實際上扼殺了運輸系統。

与此同时，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設立了一个技術委員會來擬訂解決貨幣僵局的建議。我們對於這些建議的反應是：我們與俄國人打交道的經驗迫使我們拒絕任何規定由四大國共同實施的計劃。我們已經知道，俄國人常常在原則上同意，但很少在實際上執行。我們需要一個解決辦法，但是我們不能接受實際上使柏林人民完全受蘇聯人和他們的德國共產黨僕從支配的解決辦法。

這就是 1948 年末和 1949 年初的情況。我們已經把俄國人想把我們趕出柏林的企圖打退了。封鎖繼續愈久，空運的技術效能就愈加改進，德國人民就愈加指望西方來加強他們保持自由的決心。柏林已成為美國和西方國家獻身於自由事業的象徵。

克里姆林宮開始看到他們想把我們趕出柏林的努力是注定要失敗的。俄國在柏林問題上所表現的粗暴和野蠻，使得許多歐洲人認識到，西方國家之間必須建立密切的軍事支援，而這一點又導
致最后討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柏林問題對一切的人都是一個教訓。

1949年1月底，克里姆林宮发表了斯大林对一位美国記者所提問題的一系列答复。斯大林曾經在其他問題上利用这种手法以及記者来暗示态度或政策上的改变。这一次，他在回答一个关于封鎖柏林的問題时說，如果西方三国和苏联所实施的限制同时撤銷，就不会有解除封鎖的障碍。

迪安·艾奇遜（我在1948年竞选胜利后已任命他为国务卿）在斯大林答記者問公布后到白宫来作例行晋見。我們非常仔細地研究了俄国部长會議主席的答复。我們发现，从1948年6月以来，在俄国的声明中这是第一次没有把封鎖柏林同货币問題联系在一起。艾奇遜建議，指示杰塞普向苏联駐联合国代表打听一下苏联这样做是不是有意識的，我批准了他的建議。

1949年3月15日，当联合国的代表們正在休息时，杰塞普找到了一个非正式的机会同苏联駐联合国代表馬立克先生說了几句话。杰塞普对馬立克指出，斯大林的答复中沒有提到柏林事件中的货币問題。这一忽略有什么意义？馬立克說，他不清楚，但是他愿意問一下。整整过了一个月之后，他得到了答复：这一忽略“不是偶然的”。这个例子說明，用率直的态度同俄国人打交道是如何困难。

俄国人仍旧坚持我們必須停止建立西德政府的行动。但他们已不再坚持必須在他們撤銷封鎖之前实行这一点。现在他們同意撤銷双方在1948年3月1日以后对进出柏林的交通所加的限制，然后召开四外长会議来討論“柏林的局势所引起的問題及影响整個德国的問題”。至此，俄国人已准备退卻了。5月4日，发表了一项公报，宣布四个有关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同意，从5月12日起结束柏林封鎖。
自从俄国人最初采取限制措施以来，已经过了十四个以上，用空运的办法供应柏林也有一年多的时间。

空军的成就值得大大表扬。从技术上来说，对柏林进行空运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任务，甚至连空军的领导人本身在最初也深深怀疑这是否能做到。可是，它证明是欧洲各国人民的指路灯。

当我们拒绝被赶出柏林的时候，我们向欧洲人民证明了，当他们的自由受到威胁时，我们就会在他们的合作下行动起来，而且是坚决地行动起来。从政治上来说，对柏林进行空运使欧洲各国人民更加靠拢我们。

封锁柏林事件是试探我们进行抵抗的能力和决心的一种行动。这一行动和他们过去想夺取希腊和土耳其的企图，都是俄国人刺探在他们周围的西方盟国阵地弱点的计划的一部分。
第十章
巴勒斯坦问题

希特勒主义下的犹太牺牲者的命运，是我个人所深切关怀的问题。我常常为人们悲惨命运深感不安，他们由于种族、肤色或宗教信仰的缘故而成为偏见和狂热的牺牲者。这种事情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是不容许存在的。在近代史上，俄国和波兰，曾经是犹太人的骇人听闻的迫害者，在莱因河东部犹太区成为一种制度，其中有些犹太区从中古时代就建立了。但是，纳粹党对于在德国的犹太人的有组织的暴行，却是历史上最令人触目惊心的罪行之一。从希特勒德国疯狂的灭种政策下侥幸生存的受难者的悲惨境遇，是对西方文明的一个挑战。我以总统的身份着手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在人们所提的建议中，有一个解决方案是成立一个犹太人国家。

巴勒斯坦作为犹太人的祖国的问题，应追溯到英国人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中对犹太人许下的庄严诺言。这个诺言曾经引起这些被压迫的人民的希望和梦想。我觉得，这个诺言应该实现，正如负责的、文明的政府所作的一切诺言都应该实现一样。

我第一次正式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我担任总统以后几天，当时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在任何有关团体可能同我接近之前，给了我一封信，提供了关于巴勒斯坦的简要情况。他说，某些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很可能很快作出努力来自我这里获得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诺言。这个计划的目的是犹太人无限制地移入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斯退丁纽斯说：“在近东一直存在着紧张的局势，这主要是由于巴勒斯坦问题所引起的。在这个对美国极其重要的地区里，有我们的利益，我们认为，这整个问题是一个应以极其慎重的态度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去处理的问题。”

两个星期之后，当时因斯退丁纽斯不在，代理国务卿职务的约瑟夫·格鲁送给我一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更详细的备忘录，报告我“虽然罗斯福总统曾多次表示同情某些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但他也对阿拉伯人作了某些保证，阿拉伯人对这些保证作是我们这方面的明确义务。在过去几年中，罗斯福总统曾屡次授权国务院以他的名义向近东各国政府首脑保证，‘美国政府认为，不经过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充分协商，不应作出改变巴勒斯坦基本形势的任何决定’。他在今年年初同伊本·沙特国王会谈时，更进一步向沙特国王保证，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他不会采取敌视阿拉伯人民的行动，也不会帮助犹太人来反对阿拉伯人。

“现附上摘录罗斯福与伊本·沙特谈话内容的备忘录抄本一份，会谈的原始记录大概保存在罗斯福先生的档案中。在那次会谈之后，这个备忘录曾经过总统和国王双方的批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有根据的文件。在4月5日，即在罗斯福先生逝世前一个星期，他签发了一封致伊本·沙特的信，重复了他在会谈时所作的保证。这封信的抄本也一并附上。

“不仅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且整个近东地区的阿拉伯人都不讳言他们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仇视，他们的政府宣称，要想阻挠他们武装保卫他们心目中的阿拉伯世界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罗斯福总统完全理解这一点，因为就在不久之前的3月3日，他在中东之行回来之后，还告诉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在他看来，一个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国家（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只有用军事力量才能建立和维持。
“如果我能够向你提供任何更多的内幕材料，我一定很高兴这样做。……”

我充分认识到阿拉伯人对于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仇恨情绪，但是，正如许多美国人一样，我为欧洲的犹太人的悲惨境遇而感到不安。我为犹太人有机会在巴勒斯坦重建家园的贝鲁特宣言。在我看来似乎是同伍德罗·威尔逊的崇高政策完全一致的，特别是民族自决的原则。在我任参议员时，就曾对我的同僚纽约的参议员华格纳和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塔夫脱说过，我拥护参议院通过一项赞成迅速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决议。

但是，国务院所考虑的，主要是阿拉伯人的反应，并且认为现在提出巴勒斯坦问题不是时候。在1945年6月16日的另一个备忘录中，代理国务卿说，根据国务院的看法，巴勒斯坦问题应该在战后通过联合国解决的问题之一，而且，不经过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充分协商，没有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作出有关这个问题的决定。备忘录在结尾时就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可能来找我的问题，提了善意的建议：“因此，您除了对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可能交给您的一件材料表示谢意，并向他们保证您将慎重考虑他们意见之外，似乎没有必要作更多的答复，除非您愿意这样做。”

阿拉伯各国在致国务院的信中，提出了他们反对建立犹太人国家和增加巴勒斯坦移民的理由。埃及总理诺克拉西直接写信给我说：“……深为遗憾的是，在过去半个世纪多以来，欧洲某些国家的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特别是在独裁主义出现以后更为加深的痛苦，竟被某些政治家利用来发展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一种族理论，并呼吁全世界支持他们的计划。不幸得很，他们的努力的矛盾集中在巴勒斯坦，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在历史上一向对犹太人表现极大的容忍甚至优待，可是现在阿拉伯人却成为宣传、压力以及
完全无法忍受的掠夺行为的牺牲者。为什么一个只有百万人口、住在一小块领土上的小国竟被迫在二十五年之内接受了一种外来民族的几乎达到自己人数的50%的移民？从完全客观的立场来看，这是很难理解的。容纳这么多外国人所造成的困难是如此严重，以致阿拉伯人坚决反对再增加移民。这一原则已得到一份英国白皮书的赞同。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最严重的方面。现在，这些阿拉伯人座上的客人竟宣布，不论如何，他们都要大批移入自己的宗族，占领阿拉伯人的全部土地，并且依自己的意志进行统治。就是这个建立犹太国家的计划，激起阿拉伯人不惜任何牺牲进行反抗的坚强决心，因为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阿拉伯人不是被降为一个少数的劣等民族的地位，就是要抛弃自己的家园。”

下面是我对埃及总理的答复，

“……我希望向您保证，我根据您提出的意见已经得到我的密切注意。我充分地理解，阿拉伯国家深切地关怀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我愿意重申您的政府前此曾经获得的保证，即美国政府认为，未经过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充分协商，不应由巴勒斯坦的基本形势作出任何决定。……”

对于以相同情绪写信给我的其他阿拉伯国家政府的首脑们，我也给予了类似的答复。我的立场是：民族自决的原则需要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进行协商。向阿拉伯人保证，同他们进行协商，与我同情犹太人的愿望的态度决不矛盾。

我相信，公正地满足长期受迫害的犹太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的解决方案，终究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巴勒斯坦地区的极端主义者的行动，我都加以谴责并感到遗憾，不问他们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但是我也感到，对于要求以人们所公认的民主方法来推进自己事业的犹太人给予一定的鼓励也是必要的。

我已决定，在波茨坦会议上，巴勒斯坦问题是我要提出来同丘
吉尔进行讨论的问题之一，因此在7月24日，我向丘吉尔提出了下列备忘录，要求他同我讨论这个问题。

“在美国，人们对巴勒斯坦问题十分关心。1939年5月英国白皮书加强在犹太人移民问题上的严密限制，正继续引起最关心巴勒斯坦和犹太人问题的美国人的激烈抗议。他们强烈地要求取消这些不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限制；他们受到纳粹的残酷迫害，他们被赶出自己的家园，而巴勒斯坦又是他们许多人要求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

“我知道您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有着深切而同情的关怀，因此，我不揣冒昧向您表示希望，英国政府立刻撤销白皮书中对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所下的限制也许是可能的。

“虽然我认识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获得一个肯定而满意的解决方案是有困难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期望在这次会议中详细讨论这些困难，但是我怀疑，长期拖延下去是否能减轻这些困难。因此，我希望在您方便时及早把您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意见通知我，以便我们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条件。”

但是，在丘吉尔能够答复这个备忘录之前，克莱门特·艾德礼已继他出任英国首相。7月31日，我接到艾德礼的一个简短的照会，他表示已看到我给丘吉尔的备忘录，并答应予以注意。

当我从波茨坦回来后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时，一个记者问我，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美国政府在柏林采取了什么立场。当然，在波茨坦会议上并没有正式讨论到巴勒斯坦问题，但是在私人交谈中曾谈到过。我当时对记者们说明了我的立场如下：

“美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看法是要尽量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问题将来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同英国人和阿拉伯人一道求得解决，以便在和平的基础上，在那里建立一个国家。我并不想派五十万美国军队到巴勒斯坦去强制维持和平。”

155
但是，国务院仍然认为我们应当置身于可能得罪阿拉伯人的任何活动之外，因此国务院近东事务司在1945年9月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备忘录。

这个备忘录专门讨论进一步向巴勒斯坦移民问题。在1939年，英国曾发表一个白皮书，想在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求巴勒斯坦向犹太移民打开大门的愿望和阿拉伯人反对在巴勒斯坦再增加犹太人这两者之间找出一个折衷的办法。白皮书一方面答应发给犹太人一定限额的移民“许可证”，同时则又答应不再多发。

由于欧洲战事的结束，对“许可证”的要求突然增加。当时可以明显地看出，1945年秋初，上述移民限额就要达到了。除非取得阿拉伯人的同意，否则就不可能作更多的移民。这个备忘录说，既然要获得阿拉伯人的正式同意是难以想像的事，英国将面临一个进退维谷的局面；或者坚持白皮书的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停止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或者制定一个新的临时政策，让犹太人移民至少在目前继续进入巴勒斯坦，直到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结束修订并提交联合国解决时为止。备忘录还说，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求尽快允许一百万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

备忘录继续说：“任何政府都不应主张大规模移民的政策，除非它准备协助提供必要的保安部队、船只、住宅及失业救济……鉴于上述情况，英国在目前时期不应支持大规模移民巴勒斯坦的政策。但是，可以支持这样的移民政策，限制移民的数目和范围，并考虑到人道主义、巴勒斯坦的经济福利和政治情况。英国政府作为委任统治者，应对这种政策负主要责任，并且负责执行。”

但是，在我研究了这些结论之后，觉得这样做法并不能解决基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巴勒斯坦是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战后成了英国委任统治地。——译者
本的人数问题。在欧洲的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当然他们只占被希特勒屠杀的几百万中的极小一部分）的命运是最令人关心的。在几百万由于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中，他们比任何其他部分的人都遭受到更多更长期的痛苦，可是战争结束以来，他们的情况还几乎没有改善。

1945年6月间，我派遣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厄尔·哈里逊负责到欧洲去调查那些被称为“无处送逃”的流离失所的人的情况。8月下旬，他交来一份报告。这个报告说明，这些人仍旧住在集中营里，依然前途茫茫，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这个报告还指出，这些犹太人中只有极少数愿意回到他们原来居住的国家去。

哈里逊写道：“如果对于这些劫后余生的人的遭遇抱有任何真正同情的话，那么，把1939年的英国白皮书的限制合理地放宽一些或者作某些修改，应该是没有太大困难的。对于某些欧洲的犹太人来说，除了巴勒斯坦之外，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接受的或者甚至合适的办法了。这句话是完全站在人文主义立场说的，就巴勒斯坦来说，它不含有意识形态的或政治上的理由。

“我根据可靠的情报了解到，巴勒斯坦移民证明书到这个月（1945年8月）底就要发完了。以后怎么办呢？任何访问过集中营或同那些绝望的幸存者谈话的人，想起巴勒斯坦的大门竟很快地要被关上，只有感叹而已。

“巴勒斯坦犹太人管理局已送交美国政府一份请求书，要求再发给十万张移民证明书。与请求书一起送去的一份备忘录，对于巴勒斯坦目前吸收移民的容量和目前实际上缺乏人力的情况，作了令人信服的说明。

“虽然在上述证明书（这种证明书在目前情况下也许被认为是合理的）的具体数目上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毫无疑问，请求书中提出的请求如果获得批准，将大大有助于合理解决目前尚在德国
和奥地利的犹太人和其他犹太难民的前途问题，因为他们既不愿留在那里，也不愿回到原来已取得国籍的国家。

“因此，在德国、奥地利以及在其他地方的饱受集中营的恐怖迫害的犹太人看来，没有别的事情比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更重要的了。”

哈里逊的报告是一份很动人的文件。不能允许其中所描写的悲惨情况再继续下去。我写了一封信给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求他尽可能改善集中营的情况。我还在1945年8月31日就巴勒斯坦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艾德礼。

“由于美国政府本能地关心那些在德国流离失所的人们（可以证明是无国籍或无处遣返的人）的目前情况和未来的命运，我们最近派遣了厄尔·哈里逊先生到欧洲去进行调查。

“哈里逊先生过去是美国移民归化局局长，现任国际难民委员会的美国代表。正如您所知道的，联合王国和美国对于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积极而关心的。

“我们指示哈里逊先生对于那些流离失所的犹太难民的问题以及他们的需要进行特别调查。

“哈里逊先生不仅访问了德境美国占领区，也在英国占领区呆了一些时间，在那里他受到第二十一集团军的殷勤招待。

“我已经接到了他的报告。鉴于我们在波茨坦的谈话，我相信这个报告的某些部分会引起您的关心。因此，附上这个报告的副本一份。

“我希望您注意第八页以下的结论和建议，特别是关于巴勒斯坦的部分。看来现有的巴勒斯坦移民证明书即将发完。有人建议，额外批准十万张这种证明书，将大大有助于合理解决目前尚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的前途问题，以及其他不愿留在目前所在或由于可以理解的理由不愿意回到他们原来居住的国家去的犹
太难民的前途问题。

“根据我所得到的这些以及其他情报，我同意这样的信念：对于那些经历了十多年集中营的恐怖生活的人们来说，没有别的事情比解决将来巴勒斯坦移民的问题更为重要。不幸的是，希望移民到巴勒斯坦去或合乎移民到那里去的规定的人，已经没有像纳粹分子开始实行种族政策之前那样多。正如我在波茨坦时对您说过的，总的说来，美国人民坚决相信，移民到巴勒斯坦去的大门不应关闭，根据欧洲遭受迫害的犹太人的愿望，应该允许合理数额的犹太人移民到那里去。

“我知道您同意这样的意见：欧洲的未来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们设法合理地解决那些流离失所的和过去被压迫的人们所面临的问题。没有别的事情比那些多年来惨遭迫害和奴役的人们的要求更值得支持的了。

“主要的解决办法似乎是迅速地把尽可能多的无处可去的人，希望移民到巴勒斯坦去的犹太人遣送到那里。如果这样做有效的话，这种措施就不应长期地拖延下去。”

当时贝尔纳斯国务卿正要动身到伦敦去参加四外长会议，我就请他把这封信带给艾德礼。

艾德礼首相在他的复信中争论道，实际上，发出的许多证明书，犹太人并没有利用。他还认为犹太人坚持完全撤消白皮书，立刻允许再发十万张移民许可证，不管这样做对中东局势将发生什么影响。他在第二封信里更进一步否认在英国占领区内的难民集中营里存在任何歧视犹太人的现象，并建议说，如果需要进行救济，在北非的菲利普维尔和费拉达的二个集中营可供利用。

艾德礼首相说，关于巴勒斯坦问题我的前任罗斯福总统、我自己以及丘吉尔先生都做过庄严的保证，即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要同阿拉伯人进行协商，他认为任何其他途径都将使“整个中东燃起
奋战”。不过，他向我保证，英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在“问题尚未解决阶段”来处理巴勒斯坦移民的问题，但他极力主张在联合国负责处理这一局势之前，我们不作进一步的尝试。

哈里逊的报告在9月下旬发表，同时还公布了我写给爱森豪威尔的那封信，信中我要求他尽一切可能改善德境美国占领区内的难民的情况。

与此同时，英国人则执行他们的法律，并且严厉阻止未经批准的移民进入巴勒斯坦。还穿着集中营制服的人们，由于没有许可证，当试图在巴勒斯坦登陆时就被拦了回来。

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向我国人民下决心地促使我的当前目标很快实现。他们不仅要求较容易实现的移民工作，他们更要求美国政府支持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我的态度是，对于希特勒的种族迫害的牺牲者被剥夺建立新生活的机会这一点，美国不能袖手旁观。但是，我也不愿意看到一个最后会引起冲突的政治结构强加在近东。我的基本方针是，巴勒斯坦的长远的命运问题是必须由联合国组织来解决的问题。不过，在最近，需要对欧洲的犹太人给予一些援助，帮助他们寻找能够合理生活下去的场所。

国务院对于阿拉伯人的反应继续给予比对犹太人的痛苦更大的关心。10月初，贝尔纳斯国务卿开始向我建议，我们应公布罗素总理在临死前给伊本·沙特国王的信，因为他考虑到这样做可以向美国公众表明我们是不会赞成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计划的。事实上，他已为我准备了一个重申罗素所说过的声音，他要求把它同罗斯福4月5日的信一起由白宫发表。

我决定让美国人民了解我们希望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保持友谊是适当的，因此我授权贝尔纳斯由国务院发表该信。但是，我看不出，我应该通过一个公开的声明，在一件我认为应该由联合国
解决的事件上表明态度的理由。

10月5日，我接到艾德礼的一封信，表明英国人正在进行重大的努力，以便提出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办法。首相告诉我，他和他的内阁对于帮助欧洲犹太人的方法和巴勒斯坦问题予以深刻的关怀。他还指出，这两个问题并不一定是同一件事，但是两者都充满了困难。接着，在10月19日，英国人递交国务院一个正式建议，主张英美两国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联合调查。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英国人所面临的困难，以及他们希望避免立即作出任何决定的愿望。文件说，英国政府认为：“促使犹太人回归他们原来居住的那些国家的其他民族一起，在建立这些国家的生活中起积极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英国人建议，一个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应该作为一桩紧急事件立即成立起来，在轮流担任的主席的领导下，调查在欧洲的英、美占领区内的犹太人的境遇；估计该委员会确定可能回原来居住的国家去定居的那些犹太人的数目；调查用移民到欧洲以外国家去的办法来缓和欧洲的处境的可能性，并考虑应计当前形势的需要的其他有效方法。

英国的计划是，该委员会首先应该对欧洲的英、美占领区进行调查，以便了解和这个由战争造成的难题的性质和规模。这样做了以后，再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些可能接受他们的国家方面去。然后，该委员会根据调查情况，向两国政府提出临时性的建议，直到能够向联合国提交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去的问题只是委员会将要考虑的许多问题中的一个。英国的照会接着说，委任统治的条件要求他们支援犹太人移民，并鼓励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下来，但同时又要保证其余部分的居民的权利和地位不受歧视。照会说，这个对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方的双重义务，就是造成过去二十六年来在巴勒斯坦所经历的困难的主要原因。照会补充说，英国人曾经尽一
切努力，设法作出某些布置，以便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并为了国家的幸福进行合作，但是所有这种努力都没有成效。任何一方认为可以接受的安排一向遭到另一方面的拒绝，而被认为不可能接受。

英国的照会说：“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即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是势不两立的。他们的宗教和语言不同；他们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正如他们的民族理想一样，都很难互相协调。最后举出的一些不同点是和平的最大障碍。双方都要求占有巴勒斯坦；一方的根据是曾经占领过巴勒斯坦一千年，另一方的根据是历史上的联系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给予它的保证。”

英国人建议，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要实地调查政治、经济和农业情况，因为这些情况是那时限制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理由。英国人希望分三个阶段来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第一，他们要同阿拉伯人进行协商，目的是要作出一个安排，保证暂时不阻碍犹太人移民按照当时每月的比率进行。其次，他们要同主要的有关方面寻求在获得永久性的解决办法以前，设法作出其他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的临时性安排的可能性。第三，他们要向联合国提出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但是，在最近，英国政府已经决定，唯一切合实际的途径是维持目前的移民部署。他们说，他们担心“在阿拉伯人的反对之下决定的任何过激的政策，将不仅对英王政府提出的失去信用的指责提供根据，而且可能会在整个中东造成包括大规模军事行动在内的严重的动乱，此外，还会在印度引起普遍的忧虑”。

我指示贝尔纳斯准备一个答复，其中表明我们愿意参加所建议的调查委员会，但是我们要求把力量集中在迅速获致效果上。此

① 按指英国政府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译者
外，我建议，巴勒斯坦应作为调查的重点，而不仅仅是许多调查地区中的一个。我想表明，我将不放弃我在8月31日致艾德礼的信中所采取的立场。我不希望美国成为任何拖延策略的伙伴。

英国人对于我们的反应并不感到很高兴。贝文写信给贝尔纳
斯，坚持调查应该包括除巴勒斯坦之外的可能供欧洲犹太人居住的其他地区。但是，为了避免调查无休止地拖下去，我们坚持了我们的观点。后来，当建议中的会议召开时，这个观点占了优势。
第十一章
巴勒斯坦的分离

华盛顿和伦敦之间曾经交换电报，计划由英美共同对欧洲的无家可归的犹太人问题进行调查，很快就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了。10月31日，我接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表给我的一封电报，其中一部分说：

“……我们从报上获悉英国和美国政府正考虑关于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的建议，这个委员会将重新调查欧洲的犹太人的情况和他们进行移民的需要，并将不顾哈里逊提出的报告，重新决定他们的之中有多少人愿意到巴勒斯坦去，多少人能够被安置在其他地方。……

“但是，需要的是政策，而不是进一步的调查。鉴于许多年来痛苦的经验，我们敢冒昧地断言，成立这个委员会并不能使问题得到进一步的解决。恰恰相反，它将使局势更加复杂化，造成无止境的拖延，并且引起严重的混乱。

“在过去的七年中，除了我们自己的战时难民委员会（成立于1944年，已经解散）之外，还有过三个主要的国际会议和委员会力图解决犹太难民问题和犹太人移民问题。这三个组织包括：罗斯福总统于1937年在埃塞俄比亚召开的国际难民会议，作为这次会议的结果而产生的国际难民委员会，以及1948年召开的百慕大难民会议。所有这些努力都遭到了悲惨的失败，这种失败是由于一个重要的武断主张造成的。英国政府根据它在1939年白皮书所列的条文非法地禁止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大门，现在，巴勒斯坦的大
們必須繼續關閉。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移民到其他國家去的可能性上。但是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接受大批猶太難民。如果過去巴勒斯坦的大門一直是開啟的，那麼千千萬萬已經死去的猶太人可能今天還活着。

"我們請求您不要在人們繼續付出生命和遭受痛苦的代價下，进一步贊助成立委員會和進行調查，這樣做只能证实早已众所周知的事實罢了。

"現在所迫切需要的並不是另一個跑去跑去的遠征隊，也不是浪費時間的調查，而是立即採取符合早已確立的、並經有效的國際協定明確了的政策的具體措施……因此，我們謹提出迫切的要求，

"(一) 正如總統先生所要求的，立即允許十萬猶太人移入巴勒斯坦。這是一個迫切的需要，這種需要能夠、而且應該得到滿足，而不致影響‘基本局勢’……

"(二) 英國政府立即撤回或廢除 1939 年的白皮書。這個白皮書的公布是英國政府破壞委任統治制度的片面行動，它是違反國際聯盟常設委任統治委員會明文規定的要求，而且也沒有得到美國的贊同。廢除這個白皮書是英國政府應該獨自承擔的責任。

"(三) 由英國和美國政府發表一項聯合聲明，表明它們願意支持和謀求一種符合於傑弗遜宣言和巴勒斯坦委任統治制的本來目的和基本意圖的巴勒斯坦政策。

"(四) 在上述聯合聲明發表之後，最有效的辦法是組織一個聯合委員會，按照各自所關心的問題和責任，探討已宣布的政策的方式和方法。我們還希望，美國能夠在不僅有利於巴勒斯坦人民、有利於使猶太人可能向該地地區移民的經濟計劃方面，而且在有利于整個中东各民族的經濟計劃方面實行合作，因為中东民族的國家飽受貧窮和不發達的痛苦。

"最後，我們願意進一步強調，繼續拖延和迴避這個重要的、無
法逃避的问题的危险性。这个问题就是履行对犹太人民所作的国际诺言，它根据犹太人民与巴勒斯坦在历史上的联系，帮助他们在那里定居和重建他们的国家。很明显，委员会不可能代替已经明确地表示了的行动。

“我们再次向我们的政府呼吁，利用它的全部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影响，使正义和人道获得胜利。

“我们谨向您，总统先生，表示我们最崇高的敬意。

“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紧急委员会主席
斯皮茨·瓦伊斯特·阿巴·西耶布”

我们的一个主要困难问题是，巴勒斯坦并不是一个可以由我们自由处理的地方。国际联盟采取了行动将巴勒斯坦合法地委托给英国管理。我们不是国际联盟的成员，而事实上英国人又占有巴勒斯坦。

我认为，对于寻求解除难民的痛苦的办法，这个更加迫切的问题来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个阶段强调关于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目的是次要的。

由于外交家在商讨拟议中的调查委员会的范围和目的时，碰到许多困难，这个问题直到11月中旬艾德礼到华盛顿来时才再次提出来。同艾德礼会谈的结果，使我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达成了谅解。英国人了解到我不愿意改变原来的立场，便同意了国务院为英美联合委员会计划好的调查范围。我在11月13日宣布了这一协议，同时发表了我在8月31日给艾德礼的信，其中要求他同意十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

12月10日，我宣布了这个联合委员会的美国成员，他们是由下列一些人组成的：法官约瑟夫·赫契森，他是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一位深受人们尊敬的联邦法院法官，他被任命为美国方面的主席；前斯华斯摩尔学院院长弗兰克·埃德洛特博士（现任普林斯顿高
级科学研究所主任); 《波士顿先驱报》主笔弗兰克·巴克斯特; 我们的外交界前辈威廉·菲利普斯; 曾任国际联盟难民高级专员的詹姆斯·麦克唐纳; 前北卡罗来纳州州长马克斯·加德纳。由于加德纳未能接受这一任命，我指定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检察官巴特桑·克鲁姆担任这个职位。这个委员会开始工作，于 1946 年 1 月 4 日在华盛顿举行公开讯问，然后到欧洲和中近东进行实地调查。这个委员会在 1946 年 4 月 22 日由美国方面的主席赫契森法官向我提出了一个报告。委员会一致建议发给十万张向巴勒斯坦移民的证明书，同时尽快地推进实际移民工作。

至于巴勒斯坦本身，委员会极力主张把它变成一个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不加以统治的地区。他们的建议采纳下列三个原则：

“(一) 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将不统治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也不统治犹太人。

“(二) 巴勒斯坦将不是一个犹太国家，也不是一个阿拉伯国家。

“(三) 最后建立的政府形式将在国际保证之下，充分保护和保存圣地的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的利益。”

然而，委员会的结论说，目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非常紧张，以致任何建立国家的企图都会引起内战。根据这一理由，他们建议委任统治应予继续，并且最后应与联合国成立一项托管协议。这项协议的条款应以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接近为目的。

委员会还有这样的建议：应使犹太人得以充分移民，那些保护阿拉伯人而没有同样保护犹太人的土地法应予废除或修改。

委员会的报告是谨慎而全面的。赫契森法官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件极其善良的工作。我觉得委员会的方向是正确的。4 月 30 日我发表了一个声明，表明我同意他们的建议的内容。但是，现在还需要说服英国人按照这个报告采取行动。我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并同迪安·艾奇逊及其他顾问（贝尔纳斯当时在巴黎）商議之后，写给艾德礼一封信：

“总统致艾德礼首相阁下：

“我一直在考虑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应该采取的下一个步骤。我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建議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举行协商，因为我们的两国政府都对他們负有义务。我认为英美联合委员会的报告提供了这种协商的基础，我打算采取下列程序，我欢迎您对这些程序提出意见：

“在最近的将来，由美国政府促使下述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組織以及与美国政府保持关系的阿拉伯国家政府注意这个报告，并且要求他们在一定期間内，如在二星期之内，提出对报告的意见。美国政府在接到这些意见之后将同英国政府进行商量，然后决定对整个报告的态度，并发表一项公开声明，說明两国政府准备在什么程度上接受这个报告作为巴勒斯坦政策的基础。

“我想英国政府是願意采取一致行动的，我很高兴知道这一假定是否正确。鉴于围绕着委员会所建議的允许十万人进入巴勒斯坦这一問題的紧迫情况，我誠懇地希望能够尽快地提出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进行协商的倡议，并达成这一協議。

“上面提到的有关組織和团体是：美国犹太人复国主义者紧急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美国犹太人会議，美国犹太救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大会，阿拉伯美国事务研究所，美国犹太建国协会，美国新复国主义者組織，犹太人管理局，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高级委员会，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埃及、外約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政府。

“1946年6月8日”

艾德礼立刻回了信，要求允许他有时间与外交大臣贾文商討，因为和贝尔纳斯一样，当时贾文正在巴黎。三天以后，我接到艾德礼
礼的一封比較長的信。英國人希望在宣布任何政策之前，尽可能地把能够預见到的困難全部加以解决。艾德礼在1945年①5月10日給我的第二封信里說，英國同意尽快開議和犹太人及阿拉伯人进行協商。但是他指出，英國那时正在同埃及进行重要而复杂的談判，因此建議延期到5月20日或以后举行。艾德礼还认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只有二星期时间来准备开会是太短了，最好是一个月。他又說，應該作出某些規定以便研究有关涉及財政和軍事义务的最終情況。

与此同时，我們听到了阿拉伯各国的意见。阿拉伯各国駐华盛顿的外交使团拜訪了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对委员会的建議提出了抗議。

我能体会到艾德礼的困难，但是我不願意承认有再拖延下去的必要。因此，我同意了他的意見，把給阿拉伯人的通知延遲到5月20日发出，我希望到那时能看到整个問題的迅速进展。5月16日，我同迪安·艾奇逊举行了一次关于巴勒斯坦問題的长時間的會談，会后，我向艾德礼发出如下信件：

“我已仔細地考慮过了您关于巴勒斯坦問題的两封来信。当我注意到您和您的同僚们在关于我們两国政府的紧密合作方面和我們的心情相同时，我感到很高兴。我們正在为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协商进行安排，以便給他們的通知能够在5月20日发出。我希望您同意这一点，并希望贵国政府采取一致行动。我仍然非常迫切地希望协商会议能尽早完成，但是，鉴于您认为两个星期的时间太短促，我同意把期限延长到一个月。我們正在起草一件说明备忘录，准备在要求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对于委员会的报告提出意見时交给他們的代表，同時我們将先把这件备忘录的副本送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1946年。——譯者

169
給貴國政府。我們相信英國政府也會讓我們得到一份它決定採用的任何説明性報告的副本。

“至於我們兩國政府的專家就報告所引起的某些事項進行研究的問題，我們正在着手組織一個由兩國政府官員組成的適當的小組。但是，正如國務院已經通知我們的，我們不認為，兩國政府的專家在要求阿拉伯人和猶太人表示意見之前舉行這種討論是適當的。我們相信，同他們的協商能夠澄清有關問題和縮小專家們舉行討論的範圍。但同時，我們相信至少在向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提出請他們表示意見的要求之後，就可以立即召開專家預備會議。在這一方面，如果我們能盡早取得貴國政府認為應該作為這種討論的基礎的某些啟示和任何更詳細的建議，將有很大裨益。

“我們已注意到您提出的关于最后举行一个包括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代表的會議的建議。我們相信，這是我們兩國政府在同有關方面進行協商時應該記住的事情，如果同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協商的結果顯示舉行一次會議是有幫助的話，至少在適當的時候召開這種會議是可能的。目前，我覺得關於這個問題，無法給您更肯定的答复。”

對那些用個人名義打電報給我，表示支持他們的公使的各阿拉伯國家首腦，我分別發出類似下述致伊拉克國王的私人電報：

“伊拉克王國賜政王阿卜杜勒·伊拉親王閣下：

“我很榮幸地通知您，我已接到您 1946 年 5 月 9 日給我的電報，並且注意到其中提出的貴國政府對於英美聯合委員會報告的意見。

“您會回憶起，美國政府曾在許多場合下通知阿拉伯國家政府：美國政府認為如果事先不與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領袖進行協商，不應改變巴勒斯坦的基本局勢。
“因此，您完全可以放心，在未与伊拉克政府协商之前，我们决不会就联合国委员会的报告作出决定。

“我愿意趁此机会向阁下致意并祝贵国人民幸福。

“哈里·杜鲁门

“1946年5月17日”

英国官方对于英美联合委员会报告的反映并不令人高兴。这个报告一经发表，艾德礼就告诉下院说，英国政府在根据报告采取行动之前，将要求美国政府分担他认为将会产生的额外的军事和财政责任。他又说，在非法的犹太人武装部队被取缔之前，大规模向巴勒斯坦移民的行动不会恢复。

接着有几个月，英国报纸唱出了一种显然很不友好的调子。许多报纸说出或暗示，外交大臣宣布后来在6月12日的演说中所说的话，即我们所以对帮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感到兴趣，是由于我们不愿意让犹太人住在美国。

我认识到要使英国人采取行动是困难的，而美国的舆论却叫嚷得采取一些措施。可是美国既不打算也不准备承担可能需要我们使用军事力量的风险和义务。不过，我还是想获得对所涉及到的军事因素的充分估计，因此请艾奇逊去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

参谋长联席会议力主在执行委员会的计划时，美国武装部队不要卷进去。他们建议，贯彻这个报告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不应采取足以在巴勒斯坦引起英国军队无法控制的反抗的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注意到，如果产生使用任何美国部队的问题的话，也只能从我们正在进行的任务中抽调出极有限的部队。这种部队的人数也许有助于安定巴勒斯坦的局势，但是他们认为，随美国武装部队在中东重新出现而产生的政治上的震动，会不必要地在整个中东地区引起严重骚乱的危险，而这种骚乱将远远超过任何巴勒斯
坦本地的困难。

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认为以武力实现报告中的决定，会损害英国和美国在中东许多地方的利益。他们认为，这种情况如果发生，苏联就有可能取代美国和英国在整个中东的影响和势力。对这一点他们补充说，控制中东石油是值得多加考虑的问题，因此，他们作出结论：不应该采取促使美国使用武装部队或使中东人民脱离西方大国的行动，因为那里对于我们的安全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这个报告记录了我们军事领袖的见解。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中东的石油，并从长远的利益来考虑，西方在巴勒斯坦的行动会激起阿拉伯人的反抗，因而有危险会使阿拉伯人同俄国人的行动一致。特别是后一种问题，它是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忽略的。对土耳其所施加的压力和伊朗所发生的事件都极其清楚地指明，俄国人欢迎阿拉伯人进入他们的阵营。

5月27日，英国首相提出一份他认为两国政府专家举行联合会议时应该加以讨论的问题的项目。英国人根据委员会的十项建议提出了不下四十三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他们认为必须交专家们进行讨论的。我的反应是，这个程序只会拖延我们所期待的给予十万名无家可归的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救济。因此，我答复道，对这些犹太人的问题应该毫不迟延地加以讨论，甚至应当在专家们准备讨论英国人提出的其他问题以前讨论这个问题。我提出美国可以对这些移民的运输和临时住处给予帮助，我重复说明，我最关心的就是允许这十万人进入他们希望在那里建立家园的地方，以便解除他们的痛苦。

但是，首相对我的建议的答复却是否定的。英国人不愿意只讨论十万名移民问题而不谈巴勒斯坦问题的各个方面。我在给艾德礼的回信中告诉他，我能够了解他的观点，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在立刻允许十万名移民进入巴勒斯坦这一问题上作出全面
安排，使得在专家们一旦就更广泛的问题达成协议后，不致再有更多拖延。随后艾德礼在6月14日来电说，他已经任命了一个代表团同我们的代表团对委员会的建议进行讨论。

与此同时，我已经指示国务卿、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连同他们的代表组成巴勒斯坦问题内阁委员会，以便同英国人进行协商。亨利·格雷迪被任命为首席代表，他在希腊进行大选时曾经率领美国观察团到希腊去，现在已经回到美国。

代表们对英国人提出讨论的问题的全部论点作了仔细的研究。6月下旬，艾德礼来信说，他已经准备好开始共同讨论。

如果恐怖主义者没有在巴勒斯坦采取越来越多的行动，我力图说服英国人放松巴勒斯坦移民限制的努力也许能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可是，当时在巴勒斯坦存在着极端分子的武装集团，它们犯下了无数暴行。6月16日，靠近外约旦边境的八座桥梁被炸毁了，同时在海法发生了两起爆炸。次日，犹太人和英国军队在海法发生激战。爆炸后所引起的大火使那里的铁路停靠站遭到很大的破坏。英国官员被绑走了。其余的英国人受到自首驶过该的汽车上抢劫。爆炸愈来愈多，英国人破获了一个极端分子集团企图绑架英国驻巴勒斯坦总司令的阴谋案件。

因此，英国政府决定采取断然行动，艾德礼在6月28日给我的私人信中把计划事先通知了我。他说，英国高官专使已经授权采取他认为驱散非法组织所必需的步骤，包括逮捕那些证据确凿、应对目前暴动负责的人。他写道，他很遗憾，在我们讨论英美联合委员会的报告时，这种行动竟成为必要，但英国政府被迫得出结论：他们“为履行委任统治政府的职责，不能再容忍这种公开的反抗，在关于巴勒斯坦前途问题的讨论正在进行的时候，法律和秩序必须加以维护”。

1946年7月2日，我答复艾德礼说：
"对您6月28日的来信兹致复如下：在我们正讨论英美联合委员会的报告时，我们认为政府认为有必要采取断然行动。我和您一样感到遗憾。我也同样希望，在为了实现一项长远的政策而努力的时候，巴勒斯坦居民能遵守法律和秩序。"

由于巴勒斯坦的暴动，英国人迫切希望尽早地举行联合委员会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我满足了艾德礼的要求，于7月10日，即比原定日期早一星期，用总统专机将格雷迪和他的率领的小组送到伦敦。

在此后的两个星期中，联合内阁委员会在伦敦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由于艾德礼和我都知道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对有关问题是多么敏感，于是双方同意在协定公布之前保守秘密。可是，消息显然越来越多地透露出去，7月25日，美国报纸刊登了委员会的建议的相当详尽的内容。

实质上，委员会所提出的计划，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种类似联邦的制度，其中包括两个自治国，但是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大约一千五百平方英里土地（总共为四万五千平方英里）将属于一个犹太国家。中央政府将控制耶路撒冷、伯利恒和巴勒斯坦的南部部分即格夫。巴勒斯坦的其余部分则将成为一个阿拉伯国家。

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个计划规定，中央政府保有极其广泛的权利，因而有待建立的两个自治国除了纯粹地方性的事务之外，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控制权。移民问题也属于中央政府管辖的事务之一。

各省府将包括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但议长由英国人任命，不经这些负责的官员的同意，任何提案不能成为法律。执行机关采取行政委员会的形式，人选也由英国人任命。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不欢迎这个计划，没有对它表示满意。阿拉伯人甚至反对报告中的建议，该建议说，为了帮助完
成过渡阶段，美国应直接提供五千万美元来援助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局势并未好转。就在几天之前，犹太恐怖分子炸毁了耶路撒冷大王旅馆，造成许多人死亡。对于犹太人需要建立家园的问题和近东越来越严重的动荡局面，都必须找出解决办法。我仔细研究了在伦敦提出的计划。但是，除了更严重的动荡之外，我看不到这个计划能够产生什么效果。计划规定允许十多万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的条件是必须得到阿拉伯人的同意，因此在这方面也一直没有提供缓解局势的办法。这个计划也不是我所希望产生的那种计划。它似乎比今年早些时候英美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完善建议后退了一步。因此，我感到必须通知艾德礼，美国政府无法同意英国的步骤。

我在8月12日的信中说：“在进一步研究了英美代表的建议，并同我的内阁成员及其他顾问进行讨论之后，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不能正式支持目前形式的英美联合计划。

“美国国内对这一计划的反对非常剧烈，以致现在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要想动员足够的舆论力量来拥护这一计划，从而使美国政府给予有效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鉴于巴勒斯坦的紧急局势和欧洲无家可归的犹太人的绝望处境，我认为应该继续寻求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办法。因此，我已指示我国驻伦敦大使同您及英国政府的适当成员讨论早向我们同时也向您提出的某些建议。

“如果把即将举行的会议扩大，使能充分考虑这些建议，我就相信希望，这个会议能使贵国政府作出决定，采取这样一个方针，即使我们能获得国内和国会的必要支持，从而能够在经济上和道义上给予有效的支持。”

艾德礼接到了我的信，在8月18日给了我一个比较详细的答
复。他说，我们不支持专家代表团所提出的计划，使他大为失望。他希望将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举行的会议“能获致某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即使不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所完全接受，但是实行起来不致使巴勒斯坦或整个中东的和平遭到严重威胁”。

但是，到了1946年秋天，正如我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所写的，局势看来已“无法解决”。我在这封信里写道：“不但英国人已将几件能事地把局势弄到无以复加的混乱地步，而且犹太人自己也使得别人无法插手帮助他们。”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官方喉舌——犹太通讯社——刚刚宣布过，他们甚至是和英国人坐下来讨论他们的建议都不愿意。与此同时，犹太极端分子在巴勒斯坦继续进行恐怖活动。在美国的高级犹太人领袖则对我施加各种压力，要我代表犹太人的愿望在巴勒斯坦使用美国的势力和军队。

我了解英国政府的处境。他们在整个帝国内部受到巨大的压力，他们无法获得金钱和军队来履行他们的义务，但是又焦急地希望尽可能地保持他们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他们花了许多年的功夫和千百万英镑在阿拉伯世界培养友谊，为的是维持帝国的生命线，苏伊士运河和中东的石油资源。不难理解，他们是不能够触怒阿拉伯人的。

阿拉伯人也和犹太人一样丝毫不肯让步。他们表面上是参加了1947年1月下旬英国人召开的圆桌会议，但是他们坚决不从他们的立场上退让一步。他们坚持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国家，而且应该永远是阿拉伯人的世界。因此，谈判在1947年2月4日宣告破裂，于是英国人决定把整个问题提交联合国。这一决定2月14日在伦敦发表。当然，这样做引起了各方的抨击，特别是针对交大臣贝文处理局势方式的抨击。他在一次工党干部会议上说，过失在于美国的复国主义者，后来又在下院宣称，如果不是我坚持要让
十万名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的意见，破坏了他的计划的话，
一切都会很顺利。毫无疑问，他这种说法是无补实际的。

当然，他是指我在1946年10月4日发表的声明而言，那一天恰
巧是犹太人的赎罪节。总统常常在这个节日发表声明，因而选择
这一天丝毫不足奇怪，我所指的也只不过是重复重申了的立场，
就是说，我希望允许十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过了几天，杜威
州长说，应该允许几十万人进入巴勒斯坦，那时具文就对美国下
院说，我发表这一声明是为了要满足杜威的需要，换句话说，我只
是为了政治上的原因才采取这种态度的。

这是作为英国政府的外交大臣对美国总统所作的非常不合外
交礼节的(几乎是不友好的)声明。因为他知道我的态度一直是这
样。

当然，美国总统不能把他的时间花在回答人身攻击和讽刺上。
如果他这样做，他就完全不能做其他事情了。因此，虽然具文先
生的指责使我感到气愤，但我只是说查尔斯·罗斯从白宫发表一项
十分温和而非个人的声明，指出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写信给艾
德礼以来，让十万名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一直是我们在巴勒斯坦
政策的基础。

1947年4月2日，联合国接到英国要求联合国大会讨论巴勒
斯坦问题的正式请求。英国人同时建议立即召开一次特别会议，
以便组成一个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来进行初步研究。具文先生在4
月18日曾向议院说，"冲突既然存在了两千年，拖延十二个月不能
算是长期的拖延"。这一声明的冷酷无情及其对于人类痛苦的漠
不关心，在英国本国就激起了反对，人们提出了迅速采取行动的强
烈要求。

5月14日，联合国大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定名联合国
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没有所谓各大国参加的情况下，同意结束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并且在联合国的主持下，最后使巴勒斯坦获得某种形式的独立。因此，委员会的多数建议，巴勒斯坦的独立应采取两个独立国家的形式，一个是犹太人的国家，一个是阿拉伯人的国家。但在经济上结成联盟。耶路撒冷市则应置于联合国的直接托管之下。

犹太人怀着复杂的心情欢迎这个建议。他们有些人希望整个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犹太国家，但是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个划分为两个国家的计划是在他们渴望已久的“祖国”建立犹太国家的梦想得以实现的机会。

阿拉伯人的反应是十分明显的：他们不喜欢这个计划。他们明白表示，除非经过他们的强烈反抗，这个划分计划就不可能实现。阿拉伯领袖们的公开声明是充满敌意和挑衅情绪的。10月9日，我获知阿拉伯联盟理事会已指示其成员国陈兵巴勒斯坦边境，准备以后使用。

我指示国务院支持这个划分计划。
第十二章
以色列的诞生

我认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分治方案是可以为这两个民族开辟和平合作的道路的。尽管在目前的环境下很难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隔在一起，但我们可以预测根据联合国所提出的方式，使分治地区在经济上合作。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终归可能像邻居一样生活下去的。

好多年来，我一直对这个伟大地区的历史感到兴趣。我知道这个地区曾经一度是世界大国的中心，它哺育过千千万万的人民。正像尼罗河流域的拉美西斯二世王国一样，尼布甲尼撒帝国和大流士帝国都曾经充分利用过这个地区肥沃的土地和富饶的资源。但是，在这些伟大的帝国消逝以后，这个地区便四分五裂，内战频仍，以至普遍走向没落。除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以外，阿拉伯人从来没有把这个地区恢复到过去那种威震四方的地位，尽管它仍然拥有某些潜力。我觉得可以制订一个发展计划，使犹太人能够建立一个巨大的工业体系，使这个地区的生产潜力得以发挥，那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会得到好处。整个地区都有待开发，如果能像我们开发西奈群岛那样来开发这个地区，那么它就能供养两千万到三千多万人。为这样一种前途开辟道路，实在是一件具有建设意义和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事业，而且还可以履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作的诺言。

这就是我对这个地区的前途的一些想法，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分治的建议使我感到是朝这个方向前进的最为切实可行的道
路。我总是希望能够在不流血的方式下找到解决办法。毫无疑问，要是为了拯救几十万人的生命而去杀害几十万人的生命，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不值得一提的。

我当时和后来的目的是为了促使贝尔福宣言所提供的保证能够实现，同时也为了至少拯救一些纳粹主义下的受害者。我并沒有承当巴勒斯坦处在怎样的情况下就能成为国家，或者按照一个具体的时间表来完成它的任务。美国的政策是要通过和平方式来建立一个为各族所应许的犹太人的祖国，为为欧洲的流离失所的犹太人铺平一条建立自己祖国的平坦道路。

但是，很多犹太人却希望我们的巴勒斯坦政策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的争取建立一个以色列国的标准是一样的。当他们看到并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指责我们已经站到亲阿拉伯的立场上去。当然，阿拉伯人认为我们则是更加带有成见和敌意的。

事实很简单，我们的政策是美国的政策，而不是阿拉伯人或犹太人的政策。其所以是美国的政策，是因为这个政策的目的是要采取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世界纠纷中心的问题。其所以是美国的政策，是因为这个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愿望，实践诺言，解除人类的痛苦。

但是这个问题纠缠着政治问题，不但牵连到我们，也牵连到国外。犹太人赞成分治，但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赞成分治。阿拉伯人反对分治，但是反对到怎样一种程度，却又得不出一致的意见。而英国人呢，看来至少有这样一致的看法：决心袖手旁观。

这件事的前景实在令人灰心。我给我的一个参谋的信中曾经这样写道：“我确知希望全能的上帝赐给以色列儿女一个以赛亚①，赐给基督徒一个圣保罗②，赐给以实玛利③的子孙有听到‘登

①《圣经》上的先知之一，见《旧约全书》以赛亚书。——译者
②如扫罗，耶稣的得力使徒，见《新约全书》使徒行传。——译者

180
但是这个问题已经被交给联合国来处理，而我相信联合国是要大家来促使它行动的，我相信在联合国这个问题一定能有办法解决。

这就是我在那个时候对一切向我呼吁的人所作的回答。联合国大会正在辩论这个问题，而大会的决议将反映世界各国的意志。11月19日，当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德高望重的领袖查姆·魏兹曼博士来拜访我的时候，我便是本着这种想法和他谈的，几天以后，我收到他的一封信，信中揭露了当时的一些问题。

“亲爱的总统先生：

“11月19日（星期三）您接见我时的那种诚挚态度，增加了我在那个紧急的时刻向您写信的勇气，在这个紧急的时刻，我是非常不安和痛苦的。根据可靠的消息，目前正流着两个无稽的谣言，而对我们来说，这种谣言是很不公平的，也可以说是很有害的。

“在华盛顿，人们纷纷传说，我们的人民曾经不适当地和过分地向某些代表团施加压力，因此他们认为‘过火’了一些。我不能够替那些非权威人士说话，但是，亲爱的总统先生，我可以向您保证，就我们的代表团来说，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代表团同各代表团的接触的次数非常有限，他们曾经力求把情况据实向各代表团陈述。他们从来没有超出法理的范围，他们一向是采取温和的说服方式。有些代表团，如希腊代表团和利比里亚代表团，我们在这次大会中只同它们会谈过一次。

③ 阿拉伯人的祖先。——译者
④ 指耶稣的教训：“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译者

181
“还有人害怕我们在巴勒斯坦的计划会在某种程度下被利用作为共产主义思想侵入中东的通道。再没有比这更加背离事实的话了。我们来自东欧的移民正是那些从共产主义国家出走的人，他们不愿意被共产主义同化。如果不是这样，他们根本就不会出走。要说苏联人极力想通过我们的移民来散播共产主义的影响，那他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很容易地就可以这样做。巴勒斯坦的每次选举和其他一切事物都证明共产主义对我们那个社会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受过教育的农民和掌握技术的产业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很高，是决不会接受共产主义的。只有在那些尽是文盲和贫穷的社会，才存在着这种危险，而这样的社会同我们的社会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1947年11月27日于纽约”

不幸的是，魏兹曼博士的话只是对他的那些比较接近的同僚来说才是正确的。事实是，不但联合国不断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就连白宫也经常受到攻击。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受到像这次这么厉害的针对白宫的压力和宣传。少数极端激烈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的纠缠不休使白宫感到不安，感到恼火；这些人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采取了政治威胁的手段。他们有些人甚至建议我们向一些独立自主国家施加压力，使它们在联合国大会中投赞成票。对人也好，对国家也好，我从来不赞成那种以强者意志强加于弱者身上的办法。我们曾经援助过希腊。我们实际上曾经缔造过菲律宾的独立。但是我们这样做并没有把它们变成附庸国，也没有强迫它们同我们一道投票赞成巴勒斯坦分治的计划，我们没有强迫它们做任何其他事情。凡配得上称为美国政策的政策，决不会把任何其他国家看做附庸国。民主人民的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点是他们尊重旁人的意见，不管这些人是强是弱，是富是穷。一些向我写信的人
士所采取的那种“直接打交道”①的办法是决得不到我的认可的。

联合国大会在 1947 年 11 月 29 日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的分治计划，尽管它并没有把这种分治计划付诸实施。大会只是赞成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的建议，并要求安全理事
会负责执行这些建议。接着便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处理这个以和平方式实现分治的问题。但是联合国大会并没有为执行这些建议规定一个日期或制订一个程序。

我之所以要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许多报纸给人造
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好像联合国大会已经通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蓝图，而实际上大会仅接受了关于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至于采取怎样的方式把这个原则变为实际行动，那还有待研究。而我所一贯希望的则是采用和平方式。

然而，不用流血而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的希望是很渺茫的。英
国人一直在说他们愿意“接受”联合国的决议，但唯有在犹太人和
阿拉伯人双方都同意之后才能执行这个决议。而现在，12 月 3 日，
他们却宣布他们认为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要到 1948 年
5 月 15 日才告结束。同一天，阿拉伯人向全世界发表声明，他们要
保卫自己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每天都可以听到在这一圣地上发生新的暴乱事
件的消息。1948 年 1 月 15 日，犹太人管理局向联合国提出建议，
建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来实现分治计划。但是当时并没有这
样的 
警察部队，而要建立这样的部队，就必须在当时各国已达成的协
议以外再达成一个协议。但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还是同意应当有
这样一支警察部队，联合国秘书长特赖佛·赖伊当时便请各有关
方面就着手建立一支警察部队进行了多次的讨论。

---

① 意指直接向美国总统提出要求和施加压力，这样来解决巴勒斯坦问
题。——译者
犹太人在看到获得国际强制执行的希望不大的时候，便宣布他们打算建立犹太人的民兵组织。而英国人则说只要巴勒斯坦还在英国统治之下，他们便不会允许这样做。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则在制订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全民性的行政机构的计划，而邻近巴勒斯坦的各阿拉伯国家的武装部队则越来越公开地开始进入这个地区。2月13日，我们在这地区的外交使团向我报告说，阿拉伯人在3月下旬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我于是向阿拉伯领袖们发出呼吁，希望他们维护和平，克制自己的行动。而他们竟断然拒绝，还指责美国不该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事业，以至助长了近东的骚乱。这是1948年2月17日的事。当时国务院提出一项建议，希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充分发挥其排难解纷的力量，我批准了这项建议。在巴勒斯坦，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已越来越严重，而且冲突双方都不肯让步。我们希望和平解决，同时也满怀希望地争取做到这一点。

在联合国就分治问题投票以后，犹太人对白宫所施加的压力并没有减轻。有些是以个人名义，有些是以团体名义，都向我提出要求，而且往往是用一种吵嘴的方式，言词激烈，要我制止阿拉伯人的行动，阻止英国人支持阿拉伯人，要我派遣美国军队，要我做这做那。我认为我可以婉转，我坚信我的政策的正确性的，不为某些犹太人所动摇。我所说的“某些犹太人”，当然是指那些极端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我知道，大多数信奉犹太教的美国人，尽管他们都希望恢复犹太祖国，他们认为，而且一直认为自己首先是个美国人。

当压力越来越厉害的时候，我感到有必要发出指示，说明我不想再接见任何为极端犹太复国主义的事业说话的人。我当时感到很伤脑筋，甚至连魏兹曼博士也拒绝接见——他在回到美国以后曾经请求见我。我的老友埃迪·雅各布逊来自宫看我，劝我接见
魏兹曼博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艰苦岁月里，埃迪是同我在一起的，他从来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在华盛顿的整个期间，他从来没有为他自己向我要求过什么东西。他信仰犹太教，他对外国的犹太人所遭受的痛苦深表同情。在我担任总统以前和以后，他曾经偶尔向我谈起他所知道的有关这方面情况的一些具体事例，但并不是经常谈到。3月13日，他来白宫看我。

我一直是很高兴见他的。我们不光是在过去有着很长一段共同的生活，而且我一直对他怀着深厚的感情。很难找到比他更忠实的朋友。埃迪说他想要同我谈谈巴勒斯坦问题。我对他谈最好不要谈这个问题，因为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在联合国里得到解决。

在我和埃迪的整整三十年的友谊中，我相信我们中间谁也没有说过什么重话，遗憾的是他这次竟然提起了这个问题。

埃迪自己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但他还是谈了下去。他提醒我，从前同我的某些赞成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士，都只是以个人的身份，并不代表任何负责的领导者说话。

我告诉他，我很尊重魏兹曼博士，但如果我接见了他，那只会引起更多的误解。

埃迪指着摆在我办公室里的安德鲁·杰克逊小雕像说，

“他是您一生所崇拜的英雄，是不是？所有关于安德鲁·杰克逊的书也许您都读过了。我记得当我们在开铺子的时候，您喜欢阅读有关杰克逊的书。您在堪萨斯州修建杰克逊县法院的时候，就曾在法院前面立了他的塑像”

我不知道他要扯到什么地方去，但他还是说下去。

“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我终生崇拜的英雄。但我曾经研究过他的历史，正如您研究过杰克逊的历史一样。他是当前最伟大的一个犹太人，也许还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犹太人。你自己也对
我说过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位正人君子。我所说的是魏兹曼博士。他年岁已经很大，而且多病。他跑了好几千里路来看您，而现在您竟不肯见他，这不像您平日的为人。"

埃迪走后，我便吩咐尽快安排一个时间，让魏兹曼博士到白宫来。但是他的这次拜访完全是不公开的。根据我的特别指示，魏兹曼博士可以从东门进入白宫。报刊上并不报道关于他的这次访问，也用不着宣布这件事。

魏兹曼在 3 月 18 日来到白宫，我们几乎谈了四十五分钟。他谈到巴勒斯坦局势发展的可能性，谈到他和他的助手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而这种科学研究成果总有一天会被应用到他所规划的犹太国的工业活动中去。他还谈到为了安顿今后的移民，就必须有土地，他还使我体会到在南部纳格夫地区建立任何未来的犹太国家的重要性。

魏兹曼博士是一个有卓越贡献和伟大人格的人物。他的一生为两个理想而奋斗，一是科学，一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已经年逾七旬，健康情况很不好。他经历了许多挫折，但他从中学到了耐性和智慧。

我尽可能坦率地告诉他，我先前为什么拒绝见他。他很了解这一点。我向他解释说，我对犹太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最关心的是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做到公平合理。当他离开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我感觉他已经对我的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而我知道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关于这一点，在第二天证实果然就是这样。在这一天，我们驻联合国的代表奥斯汀大使在安全理事会宣布，美国政府希望巴勒斯坦暂时成为托管地区。有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发言人便斥责我们这是背弃美国的政策。但是魏兹曼博士却同其他少数几个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来谴责美国的政策。
我确信他了解美国政策的真正方针是什么。第二天上午，罗森曼法官为另一件事情来看我，临走的时候我要他去看看魏兹曼博士，告诉他我同他所谈到的关于美国的长远政策，并没有任何改变，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我一直察觉到并不是所有我的顾问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看法都和我一样。这当然不是什么正常的现象。就军事顾问来说，他们的重要性，在考虑问题的时候，首先而且总是要从军事的角度出发。而外交人员的看法则是——或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决定于我们跟其他国家的关系。财政部长则是根据预算和税收情况来考虑问题。除了总统身旁的一些职员以外，总统的每一个顾问都有而且应当有他自己业务部门的一套看法。

根据巴勒斯坦的局势，军事人员一直在讨论的头两件事：一旦巴勒斯坦发生纠纷，我们不可能派遣军队到那里去；另一件是关于中东的石油资源。福莱斯特尔部长曾经一再同我说到关于敌视我们的阿拉伯人可能会不让我们取得他们的石油宝藏的危险。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好几次提出备忘录，说明我们除了能派一支象征性的部队到那个地区以外，再也不能派出什么部队。

国务院的近东问题专家差不多毫无例外地对建立犹太国家的主张抱着不友好的态度。他们的想法是：英国过去是靠了培植阿拉伯人来维持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地位的；现在它似乎已不可能继续保持这一地位了，而应当由美国人来接替它，但要接替就必须完全按照过去的方式去做；如果阿拉伯人同我们闹对立，他们就会投到苏联的阵营去。

我从来不相信外交人员的这一套论调。但是，我想说一句，尽管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白宫和国务院之间存在着这些分歧意见，但决没有任何关于由谁作出决定和谁应当听从谁的政策的问题。我们外交人员中有些人，特别是近东部门的先生们，表示了不同的
意見，但这种不同只在于我們向前推进的速度問題，而不是整個方針政策問題。

我在2月間曾經同意应当努力促使联合国恢复巴勒斯坦的和平局势。因此我們在成功湖的代表团便建议在2月25日由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举行会谈，探讨一下我們在巴勒斯坦所面临的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已經达到何等严重地步。

英国代表团对于这次会谈仍然采取避諱的态度，但其他四个代表团还是进行了磋商，并指出在英国当局撤离巴勒斯坦的时候——5月15日，这个地区将没有一个实际的政府，而联合国也还没有作堵塞这一缺口的准备。事实上，要为各方面找到和解的任何基础，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犹太人迫切地要求分治；阿拉伯人则激烈地反对分治，而英国人则决心要从这一整个纠纷中摆脱責任。

在这种情况下，同时看到巴勒斯坦内部愈来愈多的暴乱事件，安全理事会就须决定是否要接受联合国大会1947年11月29日的决议，把它作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們的国务院在1948年3月19日提出建議：除非能够找到和平过渡到分治局面的办法，英国原先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应当置于联合国托管委员会之下。这并不是否定分治，而是設法推迟实行分治的日期，以等待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能建立自己政府的适当时机。

我的关于巴勒斯坦的政策并没有說要规定什么日期或条件，它是服从于履行国际义务和解除人类痛苦这双重理想的。从这个意义来看，国务院关于托管巴勒斯坦的建議和我的政策并不矛盾。

但另一方面，国务院里的任何人都一定会知道——而且我确信個別官员还算正希望——犹太人在聽到这项建議的时候，将认为我們已經完全放弃了他們寄于莫大希望的分治计划，而阿拉伯
人也会像犹太人一样，认为我们将是反对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解决方案。从这个意义来看，托管巴勒斯坦的主张是跟我的态度和我所制订的政策有分歧的。

然而，把这场辩论由安全理事会转移到托管委员会，在策略上讲是有好处的，因为前者可以使用否决权，而后者只要获得多数票就可以作出决定。此外，当时距英国人撤离巴勒斯坦的日期不过几星期，而这却会使整个局势有所改变。在一种不可避免的暴乱事件发生以前，联合国往往能找到解决办法，因此在这个期间容许就这一建议进行讨论似乎是适宜的。

用联合国托管的办法来接替委任统治，这个建议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但是，许多人对这个建议表示了多的怀疑，外交界人士认为这就是不让实行分治和建立犹太祖国的一种手段。

国务院里有些人认为，要不触犯阿拉伯人，贝尔福宣言是不可能实行的。正同英国大多数外交人员一样，我们的一些外交人员也认为阿拉伯人人数众多，同时他们控制着那么巨大的石油资源，因此我们应当对他们采取姑息态度。我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些人中间有些也是有反犹太人情绪的。

国务卿马歇尔，副国务卿罗维特，还有驻联合国奥斯汀大使都和我的看法一致。奥斯汀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有过长期的经验，他对于联合国的理想坚信不移。他过去是参议院中最能干的领袖之一。他不是那种嚣张取宠的角色，但他善于在幕后发挥他的作用，使不同的意见趋于一致。我经常为自己感到幸运，因为我能够找到像他那样有能力的人来担任联合国的那种棘手的工作。

我在5月14日得到消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管理局正准备在当晚巴勒斯坦时间十二点钟，也就是在英国的委任统治宣告结束的时候，宣布建立犹太国。我曾经向同我的一些顾问谈起过，一
一旦实行分治，我们将采取怎样一种行动，而大家总是认为我们将归
应当承认任何由犹太人建立的负责任的政府。当然，分治的局面
并不是按照我所希望的那种和平方式演变的，但实际情况
是，犹太人控制了犹太人居住的地区，他们准备自己来治理，并保
卫这个地区。而另一方面，我也很清楚国务院的某些“专家”是要
阻挡我们承认犹太国的。

现在，犹太人准备成立以色列国了，尽管有人要阻挠，我还是
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宣告美国承认这个新国家。我命令我的一个
幕僚把我的这个决定告诉国务院，同时准备把这个消息传给在
纽约的驻联合国的奥斯汀大使。大约三十分钟后，也就是在以
色列国宣布成立以后刚刚十一分钟，我的新闻秘书查利·罗斯便
向记者们宣布了美国在事实上承认以色列临时政府的消息。

有人告诉我，国务院的某些职业外交家对于这个消息感到很
惊讶。要是这些人忠实地拥护我的政策的话，他们原是用不着惊
讶的。

对政府的许多职业外交官员来说，他们的问题在于把自己看
做是真正制订政策和主持政府工作的人。他们把选举出来的官员
看做只是临时担任某项职务的人。在我国历史上，每一任总统都
要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防止职业外交家对于总统的政策采取
阳奉阴违的态度。职业外交家往往力图贯彻自己的主张，而不想
执行政府既定的政策。有时候，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便设法去
影响总统所任命来执行他的政策的一些重要人物。在陆军部和海
军部就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将军和海军上将等等并不是为部长服务，
听命于部长，而是要部长为他们服务，听命于他们。国务院也有这
种情况。

有些总统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便在自己的周围建立一个小型
的国务院。罗斯福总统就采取了这个办法，他自己直接跟丘吉尔
和斯大林联系。我倒不想遵循这种办法，因为成立国务院的目的就是要处理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題，而国务院也应该负起这方面的责任。但是我希望把握住这一点讲清楚，负責制訂外交政策的是美国的总统，而不是国务院的三流角色，而且，任何人都不卖得破坏总统的政策。公务人员、将军、海军上将和外交官都无法制訂政策。他們只能以政府雇员的身份办事，因此他們必須按照由人民选举出来制訂政策的那些人所确定的政府政策去做。

至于巴勒斯坦的局面，正如罗維特副国务卿在宣布承认以色列以后对我所说的，“他們几乎把您給坑了。”

新成立的以色列国立即开始建立自己的政府机构，1949年1月25日，它举行了第一次民主的选举。美国随即在1949年1月31日正式承认了这个政府。

阿拉伯人对建立以色列国这件事是很气愤的。埃及政府在6月15日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它的军队已越过巴勒斯坦边界，为的是要去“恢复秩序”。不用说，这就是阿拉伯国家联盟所一贯采取的威胁手段，它不顾一切地要阻止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于是联合国立即采取了行动来制止这场冲突的扩大。联合国派遣了一个调解员到巴勒斯坦，他终于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同意暂时停战四星期。后来又继续停战了一个时期。这就使总的战斗停止下来了，但并没有使比較带地方性的冲突停止下来，因为事实证明，这个新成立的以色列国的某些年轻的领袖，也是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领袖们一样好战的。

我的希望是，通过联合国调解员的努力，也许能够找出一个解决办法，使犹太人获得可以安安稳稳建設自己未来生活的祖国。至于究竟是怎样一个祖国，照我看来，1947年11月通过的分治决议已有规定。在民主党1948年的竞选纲领中，有一个关于以色列的声明，这个声明清楚地表达了我的想法。
声明说：“我们同意以色列国对联合国11月29日决议中所划定的疆界的要求，并认为只有在为以色列国完全能够接受的情况下，才能变更这个疆界。……我们将在联合国范围内继续支持耶路撒冷的国际化，保护巴勒斯坦的圣地。”在草拟这一声明的时候，曾经取得国务院的同意。这个声明表达了我的深刻信念：不但贝尔福宣言中的一般性诺言应当遵守，就是联合国决议中所提出的特殊诺言也应当遵守。我曾经向魏茨曼博士保证这些诺言会得到遵守。犹太祖国不应当仅仅是一个形式，而应当给予地盘，给予条件，使它名副其实。

联合国调解员、瑞典的伯纳多特伯爵随后在9月间提议说，应当采取另一种分治的方式：他赞成把北部的加利里划给以色列，而让南部的纳格夫归阿拉伯人所有。我不赞成这种变动。在我看来，这有点像把牌很快地洗来洗去，一下又将纳格夫地区交给阿拉伯人，而这个地区的问题还完全是有待解决的。但是，如果只从地图上来看两个分治方案，那末伯纳多特的方案似乎是更进了一步；因为这个方案似乎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长幼的疆界上引起摩擦的地方减少了一些。不管怎样，马歇尔国务卿还是通知了联合国，说是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公正的好建议。

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国务院的各个部门都是亲阿拉伯的，他们立即声称这是美国政策的又一次向后转。有些人甚至说这个伯纳多特方案本来就是国务院草拟出来的。不但犹太复国主义者反对伯纳多特这个建议，阿拉伯人也反对这个建议，因为它将承认“一个叫做以色列的犹太国家”。

在马歇尔对这个新建议发表意见以后，我在9月28日和幕僚们进行了会谈。当时我们是在奥克拉何马城，在我的竞选运动的专用列车上。我分析了当时的情势，大家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我很清楚，伯纳多特方案跟原来那个分治计划有很大的
不同，如果不改变政策，那就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方案。因此我对他们说，我想发表一个声明，重申民主党竞选纲领中关于以色列问题的看法，我并且要他们立即着手草拟这样一个声明。我将在跟马歇尔或将休特商议后，在较近的一次演说中用到这个声明。

当马歇尔国务卿在10月9日从巴黎回来向我报告关于联合国的各项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讨论其他问题外，还讨论到了这个问题。马歇尔解释说，他对伯纳多特方案提出意见，其用意主要是为了鼓励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进行谈判，借此表明实际上分治计划并不是完全不容更改的。因此，我便决定在这个时候不必就以色列问题发表声明。我对马歇尔国务卿能够了解我的立场感到满意，再则，只要在总的政策上大家一致，我并不想把某些具体问题上的任何分歧意见传扬出去。

但是，几天以后，英国代表在中国代表的附和下，在联合国提出了一项措辞非常激烈的反以色列议案。该议案要求在巴勒斯坦停火，但它却把罪过片面地推在犹太人身上，它要求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都撤出纳格夫，而当时这个地区大部分是在犹太人的手里。当时马歇尔在我的要求下正在希腊和意大利访问，因而他不能亲自领导我们在联合国的代表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好确定不要就这项新的议案随便发表意见。因此我将以下的一份备忘录交给罗维尔转给马歇尔。

“发交者：总统
“收交者：国务卿

在没有得到我的具体指示以前，在任何声明的内容没有得到批准以前，我们在巴黎的代表团的任何成员都不要就巴勒斯坦问题发表声明或采取行动。

“1948年10月17日”
在1948年的竞选运动中，我一直不想把外交政策问题牵涉进去。我希望全世界都能了解，不管美国人民对内政问题的看法是如何分歧，而在对待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则完全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我希望在两党外交政策中，而在竞选运动中完全不谈这方面的问题。可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州长却选择了这个时机针对我们的巴勒斯坦政策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在这个声明中力图暗示我已经被民主党的纲领，他这种做法事实上就是对我的正直的品格进行了攻击。

对于这种攻击，我不能置之不理。我通过罗维特通知马歇尔，使他了解现在我为什么必须发表一个前些时候我们业经同意未发表的声明。当时已没有其他办法可想，除非我愿意让人相信杜威的政治攻击属实。我深信对待巴勒斯坦的政策过去是正确的，将来也是正确的，因此我不能不重申我的立场。

我在10月28日于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所发表的演说中宣布了这个声明。声明中所用的字句，差不多就是前个月前在奥克拉何马城的列车上商谈后所草拟的声明中的那些字句。

我说，“以色列问题不应当在一场政治运动中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解决。我从来不肯在这个问题上玩弄政治手段。我之所以不肯这样做，是因为：第一，我有责任使我们的以色列政策符合我们对全世界的外交政策；第二，我想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强大、繁荣、自由、独立和民主的国家。这个国家必须强大、自由到足以使他们的人民能够自给自足，能够保障自己的安全。”

在我写给现在是以色列国的总统魏兹曼博士的一封私人信中，我把上面的这番意思表达得很清楚。魏兹曼博士在一封充满了热情的长信中向我祝贺选举胜利。11月29日，我回了他一封信。我在信中从许多方面概括地叙述了我对犹太人的困境和这个新国家的紧张局势所抱的同情和态度。
“私人文密

“亲爱总统先生：

“今天是通过分治决议的周年纪念日，这是回复您上次 11 月 5 日来信的最恰当的时候。

“当我读到您的信时，我深深为您最近所经历的事情所感动。关于我们那种说已经无望了的失败事业，我们两个都遭到所谓的现实主义的专家们的鄙弃。但是我们两个还是继续追求我们确信其为正确的东西——事实也证明，我们两个都是正确的。我在 11 月 3 日早晨所感觉到的那种得意情绪①，大概就是一年前的今天和 5 月 14 日②以及随后一些场合中您自己所感觉到的那种情绪。

“但是，顽强和机灵的敌人在被击溃以后，是用不着多久就会重新集结其力量的。您以色列已经面临这种局势，而我呢，大概也快了。因此我很了解您要制止敌人破坏您那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的焦急心情。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关于纳格夫问题的谈话，您上次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完全同意您就这个地区对以色列的重要性所作的估计，我对于任何企图夺走以色列的纳格夫的主张深表遗憾。我想全世界对于我所抱的态度都是很清楚的，特别是看到了民主党竞选纲领中的措词以后。但是也还是有人没有把这当一回事，认为这‘不过是竞选运动中的另一次诺言’，而在选举以后就会忘掉。我相信这些人最近总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把我的这次重新当选看做是美国人民给我的一项委托，叫我执行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其中当然也包括解决以色列问题的主张。我准备照着这样作。

① 指竞选总统获胜。——译者
② 以色列国成立日。——译者
“自从您写了那封信以后，我们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我们将坚决反对对11月29日决议中所规定的疆界作任何的改变，这种改变为以色列国所不能接受。我相信联合国大会在这个基本立场上会支持我们的。

“我们已经表示愿意通过财政上和经济上的措施来帮助你们建设这个新国家。您知道，进出口银行正在积极考虑根据一定的计划给予以色列大量的长期贷款。我也知道，您的政府目前正在草拟这种计划的具体项目，以便送交银行审核。就我个人看来，我甚至愿意把这种财政上和经济上的援助的范围更加扩大，使整个中东都能受益。这要看彼此是否能够有效的合作而定。

“十分感谢您对重新当选总统的热烈祝贺。我很高兴地获悉以色列的首次选举已定于1月25日举行。这就使我们有了一个确定的日期来正式承认您的政府。

“最后，我想告诉您我在看到新成立的以色列国所取得显著进步时是多么高兴和感动。您从全世界友谊之手中所得到的比您所应得的要多得多。但是您已经极充分地发挥了您所得到的东西的作用，在这点上我很佩服您。我相信目前这种不稳定的局面和这种局面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将很快被消除。我们将尽力促使希望迅速获得和平解决的双方直接进行谈判。

“您忠诚的哈里·杜鲁门

“1948年11月29日”
第十三章
再次参加竞选

假若我考虑我家庭的愿望，在我第一任总统结束的时候，也许就打定主意离开白宫了。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没有采取步骤和行动来阻挠任何人来担任下届总统的候选人。就我个人而言，像在1944年一样，我不想仅仅为了满足个人野心而参加一次全国性政治运动。我当美国总统已经三年半多了。

1948年我决定参加总统竞选的主要动机是同我在1944年的动机一样的。在美国历史上民主党执政已经十六年了，政绩卓著，但仍然有很多工作有待完成。自1932年以来经过艰苦奋斗实行的一些改革使美国各阶层有更多的人改善了生活，这些改革在四十年代正在巩固下来。这些成就很容易遭到反动派政治上的攻击，如果不由一个富于警惕性的民主党政府来加以保障，这些成就就有可能丧失掉。

我从来不想仅仅为了得到一个显要职位而为个人奋斗或者去反对别人。假如我能继续作为一个县法官为社会服务，我会感到很幸福。当一个参议员我会更高兴一些，同白宫全无关系也会感到心满意足。我接受副总统的提名并没有胜利的感觉，而是由于不能在参议院中继续起积极作用而感到遗憾。

在1944年曾经有人问我，在为罗斯福竞选第四届总统的时候，我采取什么做法，因为我一向认为任何人连任总统都不应该超过两届。

回答是很简单的——我知道在1944年那个极关紧要的时候
如果罗斯福和他的理想不能继续下去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在那个国内外事务都在剧烈变动的紧急时期，如果反动势力得势，我明白在战后时期只要几个月的时间，罗斯福在民主党人在过去十六年中曾为之艰苦奋斗的开明的社会纲领，大部分都要付诸流水。虽然总统身体不好，他还是有把握受到自由主义势力的拥护，我愿尽最大的力量来帮助他竞选总统。

在1948年，我对所谓行动也是毫无疑义的。世界正处于大变动当中，革命正在大多数“无所有”的国家中蔓延开来。共产主义正在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它向来是利用这种贫困状态而得到发展的。自由的方针再次受到挑战——这一次是来自一个新的强大的地区，即苏维埃俄国。

根据我同所知的俄国外交人员的谈判的经验，我懂得，要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从实力出发。我们必须重新武装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盟国，同时以这样一种态度同俄国人打交道，决不让他们认为我们软弱。

在我国内，我看到许多好心肠的集团单为“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而竞选，与此同时也为俄国人的侵略行动辩解，说那只是俄国对我们的强硬政策的反应。许多可尊敬的美国人同意这类想法，而没有认识到这种想法正是我们曾经为之艰苦奋斗的我国的安全和自由陷于危险。

在1948年，我感到，正如我在参议院的那几年受到的锻炼来担任总统职务一样，我在第二总统任总统的这几年也使我受到锻炼来贯彻我们提出的国内发展和对外安全的纲领。我还感到（在这方面倒并没有什么非分的自私想法），让一个没有经验的新人来执政还不是时机，那会使我们的国内纲领不能贯彻，使我们好不容易协商一致的外交政策有遭到破坏的危险。

在1946年到1948年期间，在第八届国会任期内，很多事情
表明，一项进步的施政纲领会有怎样的遭遇。第二十三届国会的破坏性的反动态度使我深信，在政府中迫切需要更多的自由主义而不是少一些。我觉得，我的责任是投入战斗并尽我所能来制止这股反动的浪潮，一直到“新政”和“公平施政”的基本目标被采纳、执行和实现。

在共和党人控制第二十三届国会期间，表明他们不想要，事实上也不了解什么是开明的政策。他们不了解工人、农民和老百姓。他们缺乏理智，感情用事地反对进步。任何改善全体公众状况的关于工作条件、健康保险或是长远社会保险的立法建议，都遭到他们的反对。他们当中许多人真正认为，繁荣的确已开始趋于顶点，到适当的时候，便会逐步逐步地使全国人民得到好处。

在外交方面，共和党的领导仍然受到孤立主义的影响。自从国际联盟被“十二个一意孤行的人物”拆台以来，共和党的领导显然很少学到什么东西。假若没有参议员阿瑟·范登堡通情达理的自我转变和聪明睿智的领导，以及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查尔斯·伊恩的领导，我们在外交事务方面决不能实现两党一致的政策。假若没有这些开明的共和党人的领导，在那两年里，联合国、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其他一些方案，即使不致于完全停顿，也会受到自私的共和党多数的阻挠。

因此，许多事情加起来使我深信，我必须同这样一些事情进行斗争——俄国帝国主义的共产主义正在造成的威胁，所谓华莱士进步党人鼓吹的为和平而缓和局势的徒张一时的谬论；传统的共和党孤立主义的巨大障碍；南方民主党人和北方共和党人的联盟，他们企图强行取消许多“新政”的立法，从而回到萧条年月之前的放任理论。必须击败这些势力，否则我们的国家将会倒退到那个反动的艰难时代。

我常常从历史教训中得到安慰和教益，我认识到我在 1948 年
的处境从历史上来看并不稀奇。当托马斯·杰斐逊在1800年竞选总统的时候，他的决定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联邦派人士正在窒息这个新共和国的真正的民主概念。在他当选之后，他把他们赶出政府，并且恢复了自由主义。当安德鲁·杰克逊在1812年倡导联邦政府的反动势力发动一次革命的时候，他又撕下了那条被打断的自由主义的线，而这自由主义在约翰·亚当斯执政时期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

从1828年开始的杰克逊进步的开明时代由于威廉·哈里逊和约翰·泰勒在1840年当选而被打断。惠格一共和党（Whig-Republican）的保守主义长期统治了这个国家，虽然亚伯拉罕·林肯真正同情老百姓，对他们忠心耿耿，但直到1884年政府的自由政策才再次有机会为人民服务。这种情况在本杰明·哈里逊和威廉·麦金莱的所谓“早年的好日子”开始以后的四年当中又不见了。我相信威廉·布雷恩具有杰斐逊和杰克逊那样的远见，特别是在1896年他领导南部和西部起来反对保守的东部金融集团的时候，但这时共和党的保守势力已经强大到使它无能为力了。

西奥多·罗斯福这位卓越的共和党总统使进步主义在美国生活中得以继续保持下去。在他执政期间，美国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在保存自然资源方面。西奥多·罗斯福执政七年所实行的英明政策由于塔夫脱的当政而遭到破坏，联邦政府再次落入当时反动保守的共和党人手中，直到伍德罗·威尔逊实行了“新自由”——一个真正自由的民主党的进步时期。

在1916年，威尔逊面临一项抉择：把他所创造的有利于全体人民的事业继续下去，或者放弃自1912年以来他所取得的成果。民主党人接受了这个挑战，从而能够进行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今天被认为是对于我国生活方式最宝贵的贡献的一部分，虽然在1920年至1932年期间，当国家事务再度为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的时候，许多
改革都已被他們取消。

1932年及以后年代所发生的事情是最近的历史。在指兰克林·罗斯福任总统期间，全国政治制度焕然一新，这个政府致力于把国家的财富和权益为全体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这期间我本人有幸参加了的。我看到他制定一项国际外交政策，使美国居于世界领导的地位。在民主党国会的支持下，他在美国政府組織中扎扎实实地貫彻了自由进步主义的精神，使它空前强大。

在美国历届总统的历史上，一系列强有力的开明总统曾为自由主义而奋斗，为普通老百姓的美好生活而奋斗。他們是：杰斐逊、杰克逊、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山杰逊、弗兰克林·罗斯福。这个传统传给了我，我不能草率地放弃1948年落在我身上的这个机会和责任。我必须努力使这个传统继续下去。如果我能使这条线不被打断，我认为理所当然地应当参加总统竞选去努力做到这一点。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考虑任何其他行动。

为个人的舒服和利益所要做做的事情是不重要的。为国家利益作出贡献才是重要的。我必须参加1948年的总统竞选。

我觉得，在1948年，反对派所唯一可能提出的要选民们把行政部门交给他们的理由是：民主党执政已经十六年了，选民们愿意换一换。但选民们在1946年的行动已经使共和党的国会控制了立法，而我在竞选总统时要说服选民换一换还不到时机。很明显，第八十届国会是一个最伤脑筋的问题。这是我首先要拿出本领来加以克服的障碍。

由于第八十届国会对农民不实行维持价格的灵活的制度，拒绝我所建议的保证农产品充分消费和使农民有更稳定前途的纲领，农业遭到了损害。

在1947年11月我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上，由于共和党的第
届国会不恢复物价管制，本应于 1946 年就可以克服的通货膨胀的威胁更加严重了。国会专门为少数人着想，而不是为多数人的需要着想；对少数人说，物价越涨就意味着利润越大，而对多数人来说，防止物价飞涨而不损害生产的行之有效的武器是物价管制。

第八届国会不顾我的反对，于 1948 年春通过了一项还税法案。这项法案把减税的 40% 给予每年纯收入达五千美元以上的人数不到 5% 的纳税人的。国会还提议联邦政府取消遗产税，以鼓励建立免税的乐园；这样，大富豪们就可假借名义建筑住宅，以逃避对他们的财产应征的赋税。

第八届国会于 1947 年制定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是企图约束美国的劳工，同时给雇主以极大的权力。共和党多数把劳工部弄得分崩离析，使该部的职能残缺不全，简直很难完成共关怀、促进和发展工资劳动者的福利的使命。

在美国已经建议把联合国的地址设在美国之后，第八届国会却未能因此通过必要的立法。这种泼冷水的做法使我国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为和平而共同奋斗的国家的关系蒙受损失。这是一种典型的孤立主义表现，其情况正同国会不愿意——几乎是拒绝——支持欧洲复兴计划，以及对我所提出的关于继续执行贸易协定计划的要求置之不理一样。

十四年来第一次控制了全国立法的第八届共和党国会，力图取消民主党的健全的政策，如集体谈判、社会保险、房租管制、物价管制以及政府为保证大多数人权利平等而执行的措施。非但如此，国会还无视总统——再提出的建议，并且在住房、物价、赋税、农业、劳工、工业关系、对外贸易以及国内外政策的一切重要方面都屈服于特权集团的压力或者为特权分子的院外集团所收买。

简言之，第八届国会表明共和党过去一向是，并将继续是特
权集团的政党。正因为如此，我在每次竞选演说中都说明一点：选民投票实际上只是决定一个问题，即在特殊利益和公共福利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我相信，如果美国人民了解全部事实，他们就会同意我的意见。然而我知道共和党控制的报刊和广播电台反对我，因此我同人民联系的唯一希望就是亲自把情况告诉他们。

在1948年的竞选中，这个国家的通讯设施是另一个问题。数字表明，几乎90%的报刊和广播电台反对我，支持其他候选人。这是在预料之中的，因为绝大部分报刊和广播电台是由那些一向从共和党的经济政策得到好处的私人集团所拥有和经营的，或者是受他们津贴的。即使是那一部分不为反政府的集团所直接控制的报刊和广播电台，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靠那些富有而往往自私的私人集团的广告而得到收入。例如，拥有强大势力的公司花费成百万的美元买下了报纸和杂志的篇幅，用来攻击联邦政府的公用事业计划。其他院外压力集团，如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也经常以登广告或以某种发起人的名义给报刊和广播以补助。

我所反对的主要还不是共和党人收买报刊和广播节目，因为这些东西也同样卖给民主党人。我真正感到气愤的是报刊发表歪曲的社论和刊载有倾向性的标题这类老一套的做法，以及专栏作家和评论员天天发表那些公然颠倒黑白的文章。最使人恼火的是发表捏造和歪曲事实的消息。

假如报纸和广播发表的消息符合事实，我就感到满意了，至于某些专栏作家和评论员在表达意见时的方式如何，甚至进行人身攻击，我是并不在意的。但是，我看到，危险在于把事实和纯粹的揣测夹杂在一起，这样一来读者和听众无疑会误入歧途和受骗。那些专栏作家和评论员写些诽谤性的无聊文章，其意图通常是很明显的，因而也是无关紧要的，但当那些严肃的分析员和“象牙之
塔”的批评家歪曲了事实的时候（他们往往是这样的），公众就有受骗的危险，因为公众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有信任的。人所共知，不管什么事情，只要报纸上出现一个声明，就可以使许多人相信。

我深信大部分新闻广播机构已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能如实反映事实和忠实地表达意见。我觉得许多报刊和广播的老板、发行人和专栏作家在对美国人民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时期简直是存心不负责任，他们享受宪法规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而不履行因享受这种权利所应该履行的职责。在我看来，它们已经出卖给特殊利益集团，因此在我的竞选演说中我把它叫做“御用报刊和被收买的广播”。

许多候选人都惧怕报刊和广播的势力，乞求它们发善心，好像选举结果如何就取决于它们。但是我从我的政治生活中懂得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在我所居住的那个州，我经常遭到绝大多数报刊的反对。每一次我都战胜了它们，我从不重视报刊的所谓政治影响。多少年来我都未改变我的意见。任何一个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正确纲领的政治家都有能够面临激烈的反对而取得胜利。

我熟悉过去总统竞选的历史，这也是我在1948年遭到报刊的反对而并不感到烦恼的另一因素。自1800年杰斐逊当选总统以来已进行过三十六次总统竞选，在这些竞选运动中报刊都曾经被认为起重要作用。这当中有十八次报刊支持了失败的候选人，另外十八次是支持获胜的候选人。这是我所需要的一个最明显的证据，证明我对于报纸以及广播这种新的宣传工具的影响可以不必害怕。

这就是1948年夏天我面临的情况。在期中国队选中得势的反对党早已通过第八十届国会表明了它要彻底破坏民主党在过去十六年中为增进人民的福利和保障所建立起来的机构。与这种威胁同时存在的是敌对报刊的影响，它们鼓吹共和党的政策，并对
我的政府的政策极尽诽谤和破坏的能事。

我所面临的情况是不令人鼓舞的，但我生来就不是一个面临一场正义的斗争面临障碍的逃兵。说我不如胜的那些所谓科学的预言丝毫也没有使我感到担心。

作为美国的榜样，民意测验在1948年夏天达到了顶峰。有几个民意测验如乔治·盖洛普和埃尔莫·罗珀民意测验所，其准确程度是素负盛名的，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许多政客、新闻记者、商人和劳工领袖已开始注意这些民意测验的结果，把它们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在1948年民主党代表大会之前所举行的民意测验几乎一致表明我是受到美国人民欢迎的，现在则表明我的威望已空前低落。这是美国报刊对我进行歪曲、对我的纲领、政策和人员极力诋毁的结果。测验图表表明，我在刚继任总统的时候，全体居民中约有70% 是拥护我的，在1948年春天已经下降到大约占32%。

我个人对于民意测验并不在意，因为据我判断，这些民意测验并不能真正代表美国的民意。我不相信我国社会的主要成分如农业、行政管理和劳工界人士是充分发挥意见的。我也知道民意测验没有表明事实，而只不过是推测。我总是把我的信心寄托在已经了解到的事实之上。

虽然我个人并没有因为民意测验的结果而感到苦恼，但是我
知道有些民主党领袖由于预言家们所描绘的暗淡前景而感到
沮丧了。我看到，新闻界在广泛散布那些预言，说什么选民们在下
次选举中将抛弃我和我的政府，而且根据我的经验我懂得，虚假的
宣传能够使最明智、最善良的人迷失方向。

我明白，对于民意测验者和共和党控制的报刊联合起来以它们
的统计数字和宣传来麻醉老百姓这件事，我是必须采取某些行
动来对付的。就连我最亲近的朋友和顾问也劝我改变心意，不参
加7月间的提名。

6月初我有了一个主意——批评家也许只承认这个主意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为了遏止民意测验所和报界的虚伪宣传所散布的那种暗淡悲观的气氛，我决定亲自旅行全国各地以总统身份直接对人民讲话。这就是说，要坐火车旅行几千英里，沿途随时停下来向聚集起来的群众讲话，使他们听到事实。而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过去有两位总统曾经作过我设想的这种旅行。一位是安德鲁·约翰逊，他曾经在芝加哥到华盛顿这一段路上“转来转去”，寻求选民们对他的重建计划的支持，这个计划当时是遭到国会激烈反对的。约翰逊在旅途很多地方发表演说，向人民说明他的复兴东南部的计划是以林肯的建议为基础的，是为了全国的利益，而国会所发起的不成熟的计划则对北方和南方的繁荣和发展都有害处。他遭到当时的急进分子和抱有党派成见的报刊的残酷的打击，他的旅行以沮丧和失败而告终。我相信，假如约翰逊在批评面前不放弃他的计划而且也到其他地区亲自进行竞选活动的话，他的计划本来是可以实现的。

伍德罗·威尔逊在1920年旅行全国为国际联盟的事业辩护也以不幸而宣告结束。当时他的身体垮台了，他不能继续出现在群众面前，当列车把他载回华盛顿的时候，那辆列车实际上是一辆丧车了。

像约翰逊和威尔逊一样，我在1948年6月打算作的旅行是要告诉人民，面对着当时正在传播的捏造的报道，总统和他的政府正在做些什么。我想让各偏僻地区的人们有机会亲眼看到他们的总统，听到他的讲话，以便他们根据自己的印象而不是根据民意测验和宣传得出对我和我的纲领的看法。

我的目的是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人们说明美国的外交政策的
执行情况和国内问题的现状。我还感到有必要向人们说明第八十届国会所起的阻碍作用。我深信，美国的老百姓不完全了解事实真相，因而我有必要离开华盛顿，花足够的时间同人民直接讨论这些情况。

我旅行到西海岸又折回来，在沿途的城市乡镇和乡村作了七十六次演说。我从来没有像我周围的一些人那样丧失信心，而且在这第一次旅行中沿途各车站大批群众的反映使我受到了新的鼓舞，增强了信心。他们似乎很高兴看到我，并且急于想亲自听到我要向他们讲话。

我试用了一种新的讲话方式，这种方式除开在非正式场合以外我从来不曾用过。在这次旅行中我作了七十六次演说，其中就有七十一次是不用讲稿的。为了使我的发言适合当地听众的兴趣，有时候我也使用发言提纲，但这种提纲决不超过几行字，而且通常只是在我开始演说前分把钟左右交给我。

我第一次发表即席演说的正式经验是在 6 月间我开始每站必停的旅行之前几个星期取得的。4 月间我曾根据讲稿向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了一次演说，随后我就决定不用讲稿来谈美国与俄国的关系。我用了大约三十分讲解完之后，出乎我意料之外，听众报以最热烈的掌声；而听众主要是共和党人，我从来不曾受到他们如此热烈的欢迎。

5 月 14 日当我向华盛顿青年民主党人的一次集会讲话时，我又一次尝试不用讲稿发表演说。纽约的一家报纸把这次演说称为“杜鲁门以新的姿态发表的战斗性演说”。我决定，如果事先不准备讲稿或者在演说时离开讲稿能够更有效率地表达我的思想和感情，那末我在未来的旅行中在列车旁边发表演说时就采用这个办法。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时，以及从劳工节到 11 月选举这期间的绝大部分竞选演说也都采取这种
方式。

1948年政治形势还有另一种情况使我的绝大多数拥护者和顾问感到沮丧，这就是民主党在公民权利上面临分裂的威胁。自从我作为总统在这个受到严重误解和歪曲的问题上第一次采取立场以来，南方某些州背叛民主党是我早就预料到的，这些州主要是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从我任总统的最初几天起，就坚持一项切实可行的公平就业实施纲领，坚决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

这个分裂的反对派早在1946年12月5日就开始出现了，当时我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就美国公民权利的状况进行调查并提出报告。我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在战争刚刚结束以后屡次发生反对少数民族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有些家庭遭到侵犯，财产受到损失，有一些无辜的人遭到杀害。报纸上这类消息司空见惯，多得惊人。我想知道这些不尊重个人和团体权利的事件的真相，必要时加强法治以充分保护全体公民，使他们受到公平的待遇。

我发出指示，委员会的调查不应只限于某一少数民族集团的问题，而应调查所有存在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的地区。这是民主社会中的一个老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然而那些具有“白人至上”思想的领袖们却立即发动了一个愚蠢人心的运动，企图抵消我为实施联邦政府的保障以反对种族歧视所作的努力。这一运动的结果就造成了1948年南方集团的一部分以“州权民主党人”这一欺骗的名义而脱离了民主党。

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是1941年6月25日根据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命令成立的，其目的在于“鼓励全体公民……不问种族、信仰、肤色和民族如何，充分参加国防计划”。这个委员会根据全国战时机构拨款法一直到1946年6月30日才结束，该委员会停止工作我是不赞成的。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表明，战时的大部分案件，雇
主和工会的歧视行为，只要有一项坚定的国家政策，就可以通过简单的协商减少或者消除。

然而，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管辖的一些没有解决的案件表明，在有组织的反对面前，单是行政权力还不足以保证他们服从。我认识到，要制止这类非美行为还需要立法权力。公民权利委员会的建立就是要搜集事实并尽可能广泛地宣传立法的必要性。

在成立这个委员会的行政命令中，我指出，这个国家正在丧失公民权利的基础，维护这些自由权利是州、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每一部门和每一官员的职责。宪法规定保障个人自由，并保证依据法律给予同等的保护。如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剥夺或者不能实施这种保障时，很明显联邦政府就负有责任采取行动。然而，我觉得，联邦政府受到不充分的公民权利法令的阻碍，而司法部也缺乏贯彻这类法令的工具。这种状况正是我想加以纠正的。

1947年1月15日我在白宫对公民权利委员会的十一位委员讲话时说：“我希望我们的权利法案能够切实执行。我们力图做到这一点已经有一百五十年了。咱们有一些进步，但是进步还不够快。这个国家很容易遇到1922年那种曾经发生过的情况。”当然，我所指的是那一年三K党恐怖主义的再次出现。

六个月以后，1947年6月28日，我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年会上发表演说时，再一次说明了我的公民权利纲领的动机。

我断言：“作为美国人，我们都应该按照他的愿望自由地生活。他所应当受的唯一限制是他对自己的同胞所负的责任。假如这种自由不仅是梦想，那么每个人的机会平等就应受到保障。一个美国人的成就大小只应取决于他的能力、勤劳和性格。”

这年10月，公民权利委员会提出了报告，报告表明有必要制定法律来保障美国少数集团的权利。报告列举了十项重要建
議，這些建議是：

（一）建立一個經常性的公民權利委員會，一個兩院聯席公民權利委員會，在司法部門設立一個公民權利司。（二）加強現有的公民權利法令。（三）聯邦政府採取保護措施以防止私刑。（四）更充分地保護投票權。（五）建立一個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以防止就業上的不公平的歧視。（六）修改聯邦歸化法，凡有申請作為美國公民者，不管種族、膚色和民族如何，均批准其公民籍。（七）賦予哥倫比亞特區的居民以地方自治權和選舉總統的權利。（八）把夏威夷和阿拉斯加改為州並使我們的島嶼得到更大程度的自治。（九）給予居住在美国的人以同等化為美國公民的機會。（十）解決日裔美國人的撤退要求。

我在1948年2月2日致国会的咨文中要求制訂有关公民权利的專門法律，把上述建議納入法律之中。同時我还呼吁全國行政官員和私人公司的職工在使用交通工具方面廢除隔離和歧視。

此后，我把這些建議列入1948年的民主黨綱領。

一個政党的綱領是對公眾的諾言。一個人除非信守他本党的綱領，並在當選以后竭力去執行它，否則他就不是一个誠信的人。

一切競選演說如不以一定綱領中所表達的原則和內容為依據，那就純粹是騙人的花言巧語。當一個政黨沒有堅定的原則和主張的時候，那就不可避免地開個人糾紛，玩弄騙人的把戲，而忽視進行一項政治運動所唯一应当依據的基礎。

在1934年、1938年和1942年，我是參與制訂我那一州的民主黨綱領的人之一，也是1936年、1940年和1944年的全國性綱領的制定者之一。我相信這些綱領中提出的原則，而當我被選為總統之後，我力圖實現綱領中所作的諾言。所有這些綱領中的基本原則是為了那些在華盛頓沒有勢力的普通人的利益。對我來說，党的綱領就是同人民訂立的契約，而且我一向把它們看作是必須執
行的协定。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甘愿在1948年冒失败的危险，而依然坚持我的纲领中关于公民权利的部分。

当然，在我周围有些人迫切希望防止民主党内部出现分裂，并且进行工作来缓和在公民权利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然而，在这样一个极关重要的原则问题上我不赞成讲些模棱两可的话，而坚持把话讲得清清楚楚。内阁的阁员们和其他一些人提醒我，假如我坚持我给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的命令，不停止我为制订公民权利的法律所作的斗争，我就要遭到失败。但是，我所需要的是在坚持我的纲领的前提下取得胜利，或者是由于坚持纲领而失败。

早在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之前我就有理由断定，南方将要分裂出去，至少是一部分要分裂出去。南方人对军队中的黑白一体政策所持的态度是人所共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气候条件适宜，几乎所有训练军队的兵营都设在南方，所以黑白一体的想法遭到强烈的反抗。在雇佣建筑工人为政府修建兵营方面原是没有什么种族歧视的，而南方人对在建筑工人中实行的黑白一体的政策特别感到恼火，他们还对政府关于公平就业的命令很不高兴。我预料到会出麻烦，而这些麻烦很快就在1948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有了发展。

军事机关——特别是海军——曾经强烈反对我在武装部队中实行黑白一体的政策，但我强行贯彻了一这一政策。后来他们发现执行这一政策并没有造成困难。黑白一体是建立有效的战斗组织的最好的办法，在这种战斗组织中人们可以并肩作战。前线的经验证明，哪个部队不歧视黑人，那个部队的战斗力就加强了。

我还觉得，采取其他任何方针都不符合我们的国际使命和义务。我们在国内承认肤色界限，而还想望领导亚非各民族的广大群众，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所宣传的东西必须见诸行动，我力图做到这一点。
自1932年以来，民主党的每一项纲领都强调我们的党忠于宪法上关于公民权利的理想，但现在引起很多南方人不满的正是我要把这个宪法上的保证付诸实施。当南方人在1948年看到我想实行这一保证的时候，他们背叛了党。南卡罗来纳的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是这次背叛的首领，他在费拉特尔费亚城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同他的追随者一起戏剧性地离开了会场。当时有一位记者请他说明他的立场。

“杜鲁门总统只不过恪守罗斯福所提出的纲领罢了”，记者这样指出。

瑟蒙德答道：“我同意，但杜鲁门真想实行这个纲领。”

公民权利委员会对它所发现的情况和提出的建议是曾经作了明确的说明的，我也曾鼓励就这一问题进行广泛地宣传，尽管如此，政客们蛊惑人心的言论和报刊上的宣传仍然对我坚持列入纲领的那个方案进行无耻地歪曲和诽谤。我主张每一个美国公民具有平等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这同每个人的个人关系或者社会关系、或者个人选择朋友的权利是毫不相关的。我提倡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这种主张曾遭到蓄意歪曲，说这包括或意味着种族杂交和种族通婚。而我的目的只不过是使各个阶层的美国人在法律面前都能得到同等的机会和保障。

“州权民主党”声称这不是背叛民主党。他们说他们是真正的南方民主党人。这是背叛。这也是抱有成见的一种表现。1928年当阿耳·史密斯按照民主党的纲领竞选总统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与此类似的反对现象。当时我在杰克逊县的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我尽最大的努力使这个县投他的票。但是由于反对天主教徒的偏见，这个一向拥护民主党的县还是以三万票的多数使史密斯落选。由于这种偏见得到胜利，当时人们相信，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天主教徒、犹太人或者黑人能够担任高级政府职位。这是二
十五年前的事情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那么明显，虽然还有待于克服。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大大唤醒了美国人，使他们认识到假如让偏见支配政府的行动，就可以造成极为危险的后果。

我决不相信绝大多数南方人会同意南方民主党人少数集团的观点。我个人早年也是一个抱有极强烈的成见的南方人，我相信绝大多数善良的南方人都明白，老几辈人那种盲目的成见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中是不能再继续存在下去的。在公民权利方面的许多进步措施是南方自相地采取的，我的纲领的目的也正是要帮助加速这种进步。正是因为他们明白这一点，过去曾经组成联邦的那十一个州的通情达理的民主党人，没有退出民主党代表大会，没有加入分裂派。

我并没有忽视由于失掉一向投民主党票的南部各州所造成的困难，因为这关系到我在选举中取胜的机会。我知道这可能是我在11月间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也知道，假如我背弃民主党纲领中关于公民自由权利的主张，我是能够挽救这种分裂局面的。但我从来不曾拿原则来换取选票，我也不愿意在1948年破例这样做，无论这对选举有多大的影响。

我深信，选民们将会看清楚，南方民主党人不根据现实而仅凭虚构是不能形成一个纲领的。由于我抱有这样的信心——在我周围似乎很少人有这种信心——我依然坚定不移，宁愿冒总统落选的危险。

虽然有许多总统候选人曾经不得不设法应付党内的分裂，但我在1948年的处境在美国政治史上却是没有先例的。我所面临的不是民主党内部一个重要派别的背叛，而是两个相当大的派别的背叛。其中一派正在准备撤销对我的支持，转而支持另一个根据“州权民主党人”纲领竞选的候选人。除这一派人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是民主党人亨利·华莱士所领导的所谓进步党人。
在罗斯福总统任内，华莱士曾经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农业部长之一，而在罗斯福任第三届总统的时候，他作为副总统享有很高的个性威信。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对手，而人们预言，他将得到很多选票。

我任总统之后，当我发现他在干涉我的外交活动的时候，我就觉得有必要同亨利·华莱士分手。当时我觉得他抱有一种理想，有可能在国内吸引一批人跟着他走，选举他为总统。1948年成立的进步党就是华莱士及其拥护者想把这个愿望变成现实。

有些好心的老实人鼓吹不惜任何代价与俄国保持和平，他们认为华莱士是他们的这种观点的代言人。华莱士始终认为我对苏维埃人太强硬了，并认为如果我们态度更缓和一些，和平是可以保持的。他曾于代表罗斯福多次出国访问，到过中国、南美、俄国，包括西伯利亚，这些活动使他成为世界闻名的人物，因而也造成有很多人热情地追随他。

然而，在华莱士的活动中也有危险的一面。它为共产党人渗入美国的政治生活和散布混乱提供了机会。进步党是一个新成立的政党，赤色分子迅速而巧妙地进行工作，力图控制代表大会，操纵党的各个委员会和党的纲领，许多党员并不了解这个情况。

华莱士本人似乎已经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狂热到近乎执迷不悟的程度；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人在利用他的“进步”运动达到什么目的。我一向觉得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一个忠诚的公仆，但他就是不懂得真实的情况。

根据我个人与俄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我知道华莱士的绥靖梦想是没用的，假如这种梦想得以实现，那将是一个悲剧。我学到了一点：俄国人只懂得武力。华莱士不认为这是真的，但他没有同苏联人打交道的那种经验。
我认识到进步党人会抢走我一部分选票，但正如南方民主党人一样，他们所维护的原则是我必须拒绝的。

在1948年我能否被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还受到党内第三种运动的挑战。这年春天随时有可能开展一个蓬勃有力的运动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竞选。

有些人宣传我不如继续其回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他们当中有前总统罗斯福的儿子詹姆斯和埃利奥特，内阁成员詹姆斯·贝尔纳斯和哈罗德·伊克斯，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克劳德·佩珀。还有很多人觉得，既然报刊和民意测验所的反映表明我在这次竞选中得胜的机会已减少到几乎等于零，民主党就应当提别人来担任总统候选人。

艾森豪威尔将军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功卓著，当时声望极高，因此对于那些想寻找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候选人来代替我的人来说，艾森豪威尔似乎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候选人。然而想提他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的职业自由主义者却表明了他们不熟悉历史和一套政治常规。当总统还在白宫的时候，他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来不曾违背他的建议来决定候选人或是制訂大会所应执行的纲领。

按照传统，总统是他的党的领袖。他对于全国委员会有很大影响，而且通常这个党为代表大会指定的一位主席应当对总统抱友好态度，并且得到总统的同意。无论有多少诽谤者，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总是由主席来控制的。代表大会应按照主席和总统的意志办事。

像西奥多·罗斯福这样一个威信很高的人，在1912年也不能从当时在职的总统塔夫脱手中争得总统提名的权利，虽然塔夫脱自己的党内有一半以上的人反对他。因此，特迪·罗斯福只好脱离共和党，以“雄麋”候选人名义竞选，结果遭到失败。然而
在1908年，当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的时候，他就能够挑选党的候选人，正如塔夫脱在1912年能够控制总统候选人提名一样。威尔逊在1916年的情况也是一样。

在1948年，我所处的地位使我能够控制总统提名。当我下定决心参加竞选的时候，党内那些反对我的人没有办法阻止我这样做。正因为如此，瑟蒙德和华莱士不得不脱离民主党而煽动一批人跟着他们走。假如艾森豪威尔也来参加民主党的提名，那末民主党就要分裂为四派，但如果他不这样做，情况就不会发生变化。总统控制代表大会是一个政治原则，在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违反过的。

为艾森豪威尔竞选的热潮在1948年没有发展下去，因为艾森豪威尔将军拒绝了那些想要改变他的决心的人。假如艾森豪威尔在1948年宣布参加竞选，结果如何的确难以预料的。为艾森豪威尔竞选的狂热没有得到其他任何分裂集团的支持。进步党人毕竟是反对美国由军人领导和军人执政的，而南方民主党人不支持哪一个具体的人或哪一桩事——他们只不过是反对我在公民权利问题上的纲领。

关于艾森豪威尔将参加竞选的谣言很可能是来源于白宫。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时候有一次来访问我，我们两个讨论了政治和军事界的英雄人物。我问他想不想参加总统竞选。他告诉我，他不想参加竞选，并且引用了他写给一位朋友的信，在这封信里他说明了他决意不参加竞选的理由。那封信于同年1月份公布，其中说：“军人服从文官是必要的，明智的。当终生的职业军人不谋求高官显职的时候，这一原则才能得到最好的保

(1) 西奥多·罗斯福，特指为西奥多的别名。——译者
(2) 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脱离共和党后，组政党，‘雄鸡’是该党的标志。——译者

216
证。"

艾森豪威尔把这封信拿给我看，我告诉他，我认为他是很有远见的。我说，我不认为他还能对他的光辉业绩再增加一分光彩；他参预政治的结果只会损害他的名誉，像格兰特将军受人欺骗而参加竞选的结果一样。我对艾森豪威尔说，政治地位同军事地位大不相同，一个军事组织的首脑不会受到他的部下的攻击，但一个总统并没有部下，他就必须期待来自各方面的攻击。

我个人认为，尽管艾森豪威尔在 1948 年有机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众议院议长塞缪尔·雷朋最有效地概括了当时的形势，他同那些职业自由主义者一起为艾森豪威尔将军竞选总统。雷朋这样说道：“不，我不这样做，他是好人，但选他是错误的。”

当然，我认识到为艾森豪威尔竞选的热潮以及进步党人和州权民主党人的背叛在选举那天会占去我一部分选票。但是，我知道我有责任来继续贯彻民主党的纲领，这个纲领曾经使国家摆脱萧条的深渊而达到繁荣和居于世界领导地位；我也相信，只要让美国人民了解事实，他们也会愿意继续实行这个纲领。因此，我决心把事实告诉他们。
第十四章
費拉特尔費亚代表大会

自从西部旅行归来于 6 月 18 日回到白宫之日起，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于 7 月 12 日开幕之日止，我几乎没有时间从事政治活动。我主要忙于联邦政府的行政事务。至于我个人的事和我在政治上的责任，只能根据情况作适当的安排。

然而，总统有可能在白宫里的电视上看到代表大会开会的情况，这还是第一次。我能在不离开工作的情况下亲眼看到在費拉特尔費亚进行的一些重要事情。其他一些通知民主党全国总部的通知，也使我能经当地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因此，那里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是我不知道的。

根据安排，在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开过之后，密苏里州州长唐纳利将在最后的一次会议上提名我当候选人。我计划于 7 月 14 日出席代表大会，亲自接受这次提名。

在我看来，一次全国性政治会议的工作往往是一种巧妙的操纵。对执政党来说，会议大体上如何进行，早已由总统、主席和执政党的领导事先就计划好了的。

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宣布代表大会开会以后，便选出大会职员。三个主要的职位是：常任主席、大会秘书和议长（Parliamentarian），后者的职权是使代表大会有秩序地进行。下一步便是任命一些负责资格审查、规则、纲领和决算以及常设机构的委员会。委员会的议事程序和众议院中的议事程序相同。

任命了委员会之后，接着便展开工作，允许发表演说，在代表
大会中间对他們各自的候选人进行一般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旦資
格审查委员会作了报告，規程委员会也就大会議事程序作出了报告
之后，下一步的重要工作便是通过纲领。这项工作要到撰写纲领
的决議委员会对大会作的报告准备好丁的时候来做。
如果决議委员会对纲领中的某些条款有不同的意见，少数派
将把这个问题提交大会討論。当然使得 1948 年的民主 党 代表大
会陷入最热烈的論战的乃是有关民权的条款。而且在第三天，这
还促使南方各州的三十五名离开会場而另行組織州权民 主运动。
纲领通过后，便要进行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在总统候选人提
名时往往伴之以非常热闹的場合，发表演说、列队示和热情高
呼。在各州和各领地都提名之后，便开始唱名投票。当然，如果没
有一个被提名的候选人获得多数票，那就得再举行一次投票。投
票一直繼續下去，直到有一个候选人获得多数票时为止。1936 年
采用了简单多数票制，那一次便将民主党代表大会长期来一直沿
用的三分之二多数票的规定取消掉了。
总统提名被通过之后，大会接着便进行副总统的候选人提名。
副总统候选人选出之后，大会休会，这个党便出去进行竞选了。
在 1948 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誰可以做副总统候
选人，当时是有些问题的。全国委员会主席霍华德·麦格腊从費
拉特尔费亚打电话告诉我他，代表大会主要成员无法決定候选人，
虽然他说，他們大多数希望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做候选人。
麦格腊要我设法劝説道格拉斯接受这个提名。
以前，我曾經有一次設法让他对政治发生兴趣，在1947 年 2 月
请他接替伊克斯充任内务部长。道格拉斯当时說，如果我坚持一
定要他干，他将接受，但是他已下定决心把最高法庭当作他的事
业。他说，“当罗斯福总统指派我到法院工作时，我起初还不太乐
意，但是，一年之后，我逐渐喜欢这个工作了，这个工作适合我，对
我的胃口，我下定决心把它当作我的终身事业。”道格拉斯对我讲，
他想和最高法院院长哈伦·斯通商讨一下这件事。以后，道格
拉斯告诉我讲：“最高法院院长说，我们在法官席的任期未满，他担心
我可能接受这个职位。”当庭，最高法院院长未发表，以他那么温和
的语调对我说：“请您不要打搅我的法院好吗。”我以同样温和的语
调回答说：“您应该让比尔去作决定。”一星期以后，道格拉斯法官
来到白宫告诉我讲，在和最高法院院长商谈过这件事之后，他已决
定留在法院工作。

当道格拉斯法官行将离开时，他讲：“您知不知道，在1944年
罗斯福的候选人名单中，您是我提出的接替華莱士当副总统的候
选人?”我问过他：“你知道我提出的候选人是谁吗?”道格拉斯回答
说：“当然，您提的是杰米·贝尔納斯。我认为我在那件事上的判
断要比您的判断正确些。”

麦格腊电报要我提出一名副总统候选人，接到这个电报
后，我便给道格拉斯法官接上电话，他当时是在俄勒冈州的洛斯
汀十六英里的野营地休假。我对道格拉斯说，我希望他做我的候
选人名单中的副总统。电话声音很差，我能听得很清楚的只是，他要
和他的家里人和朋友商量一下，并于第二天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
打电话给我。第二天是星期六，道格拉斯从俄勒冈州波特兰的本
逊旅馆打电话来。我們大约谈了十分钟，道格拉斯问及他是否可
以在星期一给我作最后的答复。道格拉斯说：“我愿意做副总统候
选人，虽然，正如我去年所说的，我已决心留在最高法院里工作。”
我告诉他我将一直等到星期一。星期一，他打电话给我说：“很抱
歉，但是我已决定不进入政界。我想我不应该拿法院来作为踏脚
石。”我回答说：“我很失望。这太不幸了。”道格拉斯法官后来来看
我，并说：“外面流传着不公正和恶意的传说，说我使您，总统先生，
为了等待答复而焦虑不定。那是不真实的，我非常难以作出决定。”
我在感情上是完全愿意做您的副总统候选人的。我拒绝您的唯一的理由，正如您要我参加您的内阁做内务部长时所决定的。我的愿望是想留在法院里工作。"

就在我知道格拉斯拒绝参加候选人名单的前后，参议员多数党领袖、参议员巴克莱从费拉特尔赛亚打电话来。参议员秘书莱斯利·比弗尔正在与巴克莱通电话，但是还是这位肯塔基州的参议员自己来问我，如果他试图被提名为副总统，我会不会反对。比弗尔接着补充说，如果我同意，他确信巴克莱能被提名。

我对巴克莱说，‘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希望当副总统呢？我是同意的啊。’这次谈话以后，这两个月就去进行工作，到时候大会便提名巴克莱。

我赞同巴克莱做我的竞选伙伴并非是一时的冲动。长久以来，我便把他尊之为参议院中最能干的辩论家。他是一个勤奋、诚实的政治家，是民主党中最孚众望的人之一。由于巴克莱是深受南部欢迎的候选人，他便成了 1948 年同我一道参加竞选的位理想的朋友。

7 月 14 日，我和家人以及白宫的工作人员一同登上了总统专用火车。在我去费拉特尔赛亚的路上，我在无线电里听到唐纳利州长在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时所发表的精采的演说，到达费拉特尔赛亚之后，在火车上吃了中饭，便同党的一些党员一道到代表大会大厅去。

当我到达时，大会正在进行最后的激烈的辩论，投票还没有开始。巴克莱和我被带进大会下面一层的一套专用房间内。这是一小套房间，供演说者化装之用，有一个可以眺望费拉特尔赛亚全城的阳台。远处是特拉华河，但是宾夕法尼亚铁路车站的货栈就在眼前，而城却分散在周围各处。

这是一个闷热而粘湿的夜晚，尽管阳台上还是舒适的。当我
坐在那儿，等待着代表大会最后的议程结束和来通知我去接受提名时，与往常一样，我让我的思路追溯到美国的一个世纪以前的政治生活。我沉思于在我以前的三十一位总统中某几个的经验，沉思于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和竞选运动中的情景，那种情景浮现在我眼前，就像我目前所遇到的情况一样。我是被迫坐在那个阳台上在等待中度过那漫长的四小时的，因此有时间来进行回想。而且，四周围是异常地安静，我似乎远远地离开这个时代拥挤的大厅的代表大会的喧嚣和吵杂声。我现在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涌现在我脑海里的那些情景。

我没有感到不耐烦，当我在等待着那个最后终会叫我到代表大会大厅里去的迟迟不来的通知时，我在思考着我国的早期历史，那时根本没有政党提候选人的代表大会。当我坐在阳台上时，我就眺望着费拉特尔费亚的市政大厅和大厅的高高塔顶上的威廉·潘恩①的塑像。这使我想起了威廉·潘恩所建立的这个“友爱之城”中所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想起了东面那个座落在切斯特纳特大街上的独立大厅。

乔治·华盛顿由于在革命战争中的军事贡献，是远远走在他在同时代人面前的一位领袖。在革命战争之后和他出任总统之前，他在费拉特尔费亚这儿主持了立宪会议，因此在建立我国政府的形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样，他可以说是在两方面是我们的“国父”。这可以说明为什么人们对几乎没有什么党派成分，至少在他总统任内初期是这样的。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和他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这位伟大的美国人是出类拔萃的。他并不是一位职业军人，而是一位最优秀的公民和军人。他是在志愿军部队里从最低层经过艰苦奋斗而升到最高职位上的。

① 威廉·潘恩（1644－1718），为宾夕法尼亚州的奠基人。——译者

222
当我的思绪转到华盛顿和早期的共和国时，我忆起人们是如何开始受到制宪宪法的困难。那就是使宪法成为人民的工具而不是成为特权者的工具。在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政府任内，对宪法解释的趋势是愈来愈支持那些控制土地和银行的人。但是托马斯·杰斐逊却主要是通过个人通讯联系，激起了舆论上的高潮，在与阿隆·伯尔经过长期而复杂的联合选举之后，而于1800年当选。

杰斐逊当选总统之后，他继续运用其组织才能，并很快地就能通过各委员会主席和两院中最有影响的人控制国会。他是一位干练的政治家，这有助于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袖。一个总统必须是一个政治家，以便使大多数人追随他的纲领。

当杰斐逊卸任之后，詹姆斯·麦迪逊继续实行他的政策，接着下来便是门罗的没有党派可言的“和谐时期”，因为，大约有二十四年的一段时间，民主党人——当时被称为共和党人，因为他们主张实行共和政体而不主张实行君主政体——从上至下完全控制了政府。

我心中念念不忘的事情之一是，作为党的首领，我要留下一个蓬勃勃勃的局面，把它作为一个最受大多数人民欢迎、坚持原则的坚强的党而移交给我的继承者。

在那个费拉特尔费亚阳台上，我回忆起1824年的三个方面的斗争。当时，国会党团提名会那种旧制度被废除了，代之以现代的代表大会。这一运动是在田纳西州开始的，这个州通过决议，号召结束党团提名会这个办法，理由是这种做法不合乎宪法，不明智。当时党团提名会在开会，并提名威廉·克劳福德当总统，而在州代表大会上很快又提出了另外三个候选人——田纳西州是杰克逊，俄亥俄州是克莱，马萨诸塞州是约翰·昆西·亚当斯。

这在许多方面来说是个不平常的选举年。每一个州都有它自
己的选举日，从开始投票到得知最后结果要花费六个星期的时间。而且，候选人中没有一个获得大多数选票，三个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则交众议院，由它选出总统。

克莱是获得选票最少的一个，因此，他可以自由地运用其影响，以确保其他两个候选人中的一个当选。有人指控他与亚当斯做了一笔交易，他要求在亚当斯内阁里担任国务卿一职，作为取得他的支持的报酬。然而，我是从来就不相信这一点的。不过，安德鲁·杰克逊却是那些认为克莱卖身投靠亚当斯的人之一的一个。的确不错，虽然杰克逊在选举团投票时获得九十九票——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一个——但他却在众议院里落选而败给亚当斯了。自然，他是个党派观念很强的人，他也怀疑约翰·卡耳豪恩在1824年那次选举运动中被收买了。若干年后，当杰克逊离开白宫时，有人问他，他是否认为有什么事未做完毕，据说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原要绞杀卡耳豪恩和打死亨利·克莱！”

我国早期的真正政治斗争发生在1828年，当时，近代化的政党已以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形式组织起来了。杰克逊被称为是“人民的人”，像杰斐逊那样，主张广泛地解释民主。亚当斯再度出来竞选，支持他的是那些控制合众国银行（United States Bank）的人以及那些反对在没有私人企业集团监督下而移民新西部的人。亚当斯还得到反共济党（Anti-Masons）的支持。他常常断言，杰克逊是在共济会的支持下赢得1828年选举的。亚当斯在后半生是一个剧烈的反共济党党員。

---

1. 反共济党（Anti-Masons），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全国共和党（National Republican）已渐趋式微，该党利用共济会会员威廉·摩根因心怀不满而被其所属组织杀害一事所引起的民愤，来组织一个名为反共济党的新党，以反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杰克逊（因为他是个共济会会员）。在1828年的大选中，反共济党声势日大，取代了全国共和党。到1836年，该党大多数党员即并入废党。

——译者

224
我始终喜欢杰克逊的两件事情是，他把基本问题提得非常明确。人们知道他主张什么和反对什么，“杰克逊将军的朋友”——他的支持者们这样称呼他们自己——一直认为他是代表美国普通人民的利益的。在选举中击败了亚当斯之后，他履行了他竞选纲领中的诺言。他使得合众国银行破产，并彻底击败了联邦党。据说，许多联邦党的领袖，包括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内，是支持合众国银行雇用的。

由于杰克逊在1828年当选并且又在1832年再度当选，提名代表大会便作为选择总统候选人的永久性的办法而被建立起来。而且，各州总选举日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由于采用了这种群众大会的办法，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小党派，如反共济党、“无所知党”①、平等权利派（Equal-Righters）以及其他一些党派。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杰克逊的领导下，民主党的面貌焕然一新，党的自由理念得以付诸实施，而有利于人民。

同时，惠格党②成立了，它反对民主党的主张。在1836年，他们的候选人是威廉·哈里逊，但是杰克逊在巴尔的摩召集了一次民主党人全国代表大会，提名马丁·范·伯伦作总统候选人，这位“小魔术师”的提名大会通过，而且大部分是依靠杰克逊的影响。

① 无所知党（Know-Nothings），1843年成立，原名美国入党，成员主要是持狭隘主义的北方蓄奴拥护者。它反对当时向美国移民，反对外国出生者，反对天主教徒和黑人。该党是一个秘密组织，党员遇到有人询问时，自管以“我不知道”，因此有“无所知党”的称呼。该党因1856年大选失利开始解体，1860年正式解散。

② 惠格党（Whig Party），1824年由少数人组成小组，1834年正式定名为惠格党。在三十年代与反共济党等联合起来反对杰克逊的民主党，主要代表北方工商企业集团利益，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制，维护国会权利。1840年该党赢得“哈里逊在大选中获胜，当选总统。到1852年，该党在奴隶问题上意见分歧，陷入分裂状态，加之该党主要领袖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大选中先后死去，1854年终于解体，其党员大部分参加了于1856年新成立的共和党。

——译者

225
而当选为总统。

我想起了 1840 年的选举，这次选举之前的竞选活动是我国历史上最奇怪的竞选之一。惠格党又推举哈里逊为候选人，他们根本就没有纲领。只不过是以一些口号为基础的低级宣传运动而已，其中主要一条是“苹果酒和小木屋”，甚至连哈里逊自己也从来没有住过小木屋。他是弗吉尼亚一个富翁的儿子，他个人几乎没有参加竞选运动。然而范·伯伦的竞选工作也做得很差，由于他自己的表现，也由于惠格党提出“提珀卡努① 和泰勒②” 这个口号和 1837 年的大萧条，他遭到了惨败。

泰勒由于哈里逊的突然去世而在当选副总统后一个月内便当上了总统，我把他称之为惠格—民主党人。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曾经宁肯从参议院辞职，也不愿意投票赞成从档案中撤销对杰克逊总统的谴责。但是他在惠格党人中是不孚众望的，因为他不愿意让他的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和亨利·克莱管理政府。韦伯斯特企图使泰勒做个“代理总统”，但是泰勒说，他是作为总统而就职的，他要做个总统。他组成了一个新内阁，但不让阁员们吩咐他做些什么。

常常有人指责我有点儿固执。我的这种固执或许来自泰勒，因为他是我祖先的近亲。无论如何，他对总统这一职务的看法我是完全同情的。不管人们对我还要说些什么，我还是要清楚地表明，只要我在白宫一天，那就要把政府的行政部门管起来，除了担任总统职务的那个人外，任何人不得以美国总统的资格行事。这招致了若干困难，如果我不那样做，这些困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① 1811 年，威廉·哈里逊在提珀卡努（Tippecanoe）和印第安人作战，因采取坚决战术而获胜。这里系以该地名来称呼哈里逊。— 説者
② 约翰·泰勒被惠格党认为是南方各州选民最有吸引力的人，因此提名他作副总统候选人，以期号召。— 説者
但是，我像泰勒一样，决不愿做一个“代理总统”。

我想起了泰勒的继任者詹姆斯·波耳克。他是巴尔的摩民主党代表大会开了很久的会以后才提出来的候选人。在这段时间内，代表大会无法在候选人上取得一致意见。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黑马”①候选人——是众议院的议长，他非常积极支持杰克逊。附带说明一下，他是我国历史上大大被忽视了的一个人。当他竞选时，他就声明说，他不想参加下届总统竞选。他在四年的任期中实现了他的纲领，退职后两个月零十一天便去世了。

波耳克必须对付的主要问题是并吞得克萨斯和解决与墨西哥的纠纷。他建议以四千五百万美元收购所有那片美国土地包括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但是他没有能使墨西哥同意这笔交易。结果，美国为了边境土地问题和墨西哥进行了解战，然而，在战争结束后与墨西哥解决这个间题时，波耳克还是保证付给墨西哥人一千五百万美元，以交换那一片极大的土地，使其成为大陆美国的一部分领土（购买路易斯安那除外）。

波耳克是一个有魄力的人。他提出得克萨斯和俄勒冈问题等作为竞选口号，在代总统任期期满之前，他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墨西哥战争产生了一位军事上的英雄，惠格党根据他在军事上的功绩将他选进了白宫，这就是托卡里·泰勒尔。他对政治一无所知，而且没有一套处理政府事务的手段。结果由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来管理政府。韦伯斯特正好在哈里逊和泰勒两位总统任内一样，仍然是国务卿，并且在泰勒尔死后仍然担任这个职务，泰勒尔是在他当选总统一年半之后逝世的，他死后总统一职由副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充任。据说，泰勒尔是在7月4日独立纪念日那天因西瓜吃得太多和饮樱桃酒过量而死去的。

①“黑马”原为赛车中用语，意谓实力难测的马，这里指出人意料的有力后选人。——译者
富兰克林·皮尔斯是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位美男子，他并不需要为1852年的总统职位努力。惠格党人因为奴隶问题而势力衰落了，他们的重要领袖克莱和韦伯斯特也在同年死去了。民主党人提名皮尔斯为候选人，他在竞选运动期间呆在家里，而惠格党的候选人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则走遍全国发表竞选演说。当时的形势是，斯科特的支持者分裂了，而皮尔斯尽管没有竞选纲领，却获得了北方和南方人的欢迎。斯科特被完全击败了。

外表长得漂亮在美国总统的选举中往往起着积极作用。像哈定一样，皮尔斯之所以被选上，部分原因是“他看起来像一个总统”。在墨西哥战争中皮尔斯是斯科特手下的一个陆军准将。皮尔斯是个志趣盎然，斯科特则是个正规军人。两者被提名为候选人都是因为他们的军事上的功绩使他们出了名。我从来不认为名气和长得漂亮是决定政府行政首脑的基本条件。一个总统必须知道他往何处去和为什么往那里去，他必须对他的所作所为有信心。

纵观历史，那些竭力想做好事的人往往遭到迫害、曲解甚至暗杀。但是他的主张终究会占上风，并为人民所接受的。

一个人为选票所左右，或者害怕他作出的决定会损害自己的威望，那他就不能算作是一个代表我国福利的人。如果他是对的，不管报纸和特定的利益集团是否喜欢他的作为，还是对他骂些什么，都没有什么关系。我一向认为，大多数人民希望做正确的事情，如果总统是正确的，并能使人民了解，他总能说服他们。以我个人而论，当时90%的报纸是同我作对的，如果把这些报纸作为传达工具，那实在是问题，所以我不得不作许多次长途旅行，以便能让人了解我。

一个总统不能总是受人欢迎的。他必须要能够说个“是”和“不”字，而且对那些为了这件或那件事常常拉白宫后腿的党派集团和特定利益集团所提出的大多数建议要能够多说几个“不”字。
如果一个总统易为人所左右和热心于同报纸和选民保持一致，那他便是一个十足的庸人。我国历史上每一位伟大的总统都有他自己政策，而这种政策竟然获得了人民的支持。

我想起了詹姆斯·布坎南，他是一个妥协时期的妥协候选人。1850年的妥协方案早在六年之前就提了出来，作为南方和北方间在奴隶问题上避免发生战争的一种尝试，但是这只是把问题拖延了一下。民主党人由于斯提文·道格拉斯参议员提出的堪萨斯一内布拉斯加法案而开始分裂了。在争论的大部分时期内住在英国的布坎南，由于人们认为他同争论的双方没有联系而成了1856年最“有当选希望的”候选人。

这次竞选运动产生了共和党。惠格党人散伙了，他们的残余分子在新党中又因推行联合反对奴隶制的路线而重新恢复了力量。这个新党在费拉特尔费县举行了第一次候选人提名代表大会，并选出了约翰·弗里芒特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人在1856年秋进行的，以“自由土地、自由言论和弗里芒特”为基础的竞选运动，与惠格党人在1840年进行的“苹果酒与小木屋”竞选运动的戏剧团式的表演有类似之处。这个新党在选举中只差一筹而败给民主党人，但是它不断积聚力量以争取1860年的胜利，当时亚伯拉罕·林肯是候选人。

对于我来说似乎很巧，当我坐在那儿等待代表大会的传呼时，我所面临的政治形势或许与1860年民主党的分裂最相近似了。在1948年那个时候是南方民主党员同进步党的背离。在1860年，在南卡罗来纳的查理斯顿召开的代表大会经过了五十七次投票之后没有能一致选出一个候选人而休会了。南方民主党人退出会场并在他们自己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选出了约翰·布雷肯里季当候选人。北方和西部的民主党人在巴尔的摩重新召开代表大会，最后选了斯提文·道格拉斯做他们的候选人。在保守分子中
有一个分裂出去的小党名叫宪法联合党，候选人是约翰·布坎南。但是共和党轻而易举地通过了这个裂口，林肯以多数选举人票但却以少数选民票而当选总统。

因此，在1850年代的后期，两党制垮台了。南方民主党分裂出去，共和党人在内战时期和内战之后，从1860年到1884年一直保持者对政府的控制。战争年代对林肯来说是困难的。如果联邦军队没有在1864年取得胜利，他就很有可能要输给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克卢伦，后者是以“停止战争”的纲领为基础来进行竞选的。但是林肯再度当选。在3月份总统就职典礼后不久林肯被刺身死，他的竞选伙伴安德鲁·约翰逊便成了总统。约翰逊与其说是共和党人，还不如说是一个民主党人。他在林肯的建议下以林肯的“美国联邦”政纲来参加竞选，充当边境州州的代表，以弥补总统在那里的威望不足。林肯曾因南北州的汉尼巴尔·汉姆林缺少联邦政纲而把他解职。林肯在1864年是靠美国联邦政纲而不是靠共和党政纲当选的。

约翰逊是所有总统中最受虐待的一个。报纸几乎对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包括以七百二十万美元购买阿拉斯加一事——都加以无情的攻击。报纸把这块新领土称之为“约翰逊的俄国仙境”和“西华德的冰箱”①，约翰逊政府受到报纸舆论和激进共和党的夹攻，是我国历史上处境最恶劣的政府之一。我对他很表同情，因为我碰到了许多类似的反对意见。

如果一个人没有背景和在政治上没有经验，而又打算竞选美国总统，那就必须有另外一些有利条件。一般来说，军事事业是政治事业的前奏。华盛顿是革命战争时期的英雄，杰克逊在新奥尔良赢得1812年战争②中仅有的伟大胜利，虽然他在和约实际

① 威廉·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 1801—1872)，1865—1869年为约翰逊总统任内的国务卿，购买阿拉斯加的当事人之一。——译者

230
签订之后才获得这次胜利的。泰勒尔由于布纳西-维斯塔一役而出名。内战产生了四个后来成了总统的将军——格兰特、海斯、加菲耳德和本杰明·哈里逊。

格兰特是典型的军人总统。他对政治上的一套一无所知，但是他能以一向由军事胜利所带来的威望而走进白宫。当战争以胜利而结束时，人民往往怀着感恩和兴奋的心情，他们曾一次又一次地将最高的政治职位的荣誉赐给那些军事英雄们。

格兰特在他的一生中只在1866年投了一次票，他当时是投了民主党的票。事实上，他是民主党在1868年必然的总统候选人。但他同约翰逊总统的决裂使他看起来像一个激进共和党人。他犹豫了很长一个时期，对两党都不谈他的意向，最后改变了他的政治主张，以共和党的政纲参加了竞选，赢得了微弱的选民多数票。

威望和长得漂亮只是赢得总统选举胜利的部分因素。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运气。以我而论，我的运气就一向不错，虽然我从来没有意思要让事情为我开路。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企图要使自己当总统，他就很少能达到目的。亨利·克莱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他对他当选总统是这样有信心，以致他两次拒绝了副总统的职位，而在这两次，由于总统的去世，他本来是可以继承这个最高职位的。另外一个这样的人是詹姆斯·布朗森。我深信，当我坐在那里等待着被召去参加代表大会时，托马斯·杜威是另一个这样的人，他为了做总统作了极大的努力，他的愿望将永远不会得到实现。

一个总统管理政府需要有政治智慧，但是他可能没有这种智

---

(6) 1811年英军策动印第安人与美国的边疆部队发生冲突，1812年6月，美国两院先后通过对英宣言。1813年大败英军。1814年1月到7月杰克逊曾在佐治亚州多次打败印第安人，强迫他们签订和约，掠夺了印第安人在亚拉巴马州的大部分土地和东、西佛罗里达州的毗邻地带。——译者

231
慧而当选。人民在挑选他們的总统时，往往受到許多因素的影响。在格兰特第二次被选为总统时，主要因素是金钱。他没有进行任何竞选活动，而他的助手却在每一个能为他获取选票方面都花了大量的钱。尽管自由共和党人背叛了他，提名《纽约论坛报》总编辑霍勒斯·格里利为总统候选人，他还是在辛辛那提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获胜了。

格里利曾得到某些民主党人的支持，而纯粹的民主党人则支持第三个候选人查尔斯·奥康纳。格里利的失败由于托马斯·纳斯特(共和党党徽大象的作者)的漫画而加重了。这个可怜的老头儿在选举后三个星期便死去，是参加总统竞选的人中受打击最惨重的人。我一向认为，新闻工作人员不是政治类型的人，正如政治家不是新闻界的人物一样。

1876 年的选举是最混乱的选举中的一次。塞缪尔·提耳登—民主党提出的候选人—被选出来了。但是，在共和党控制下的南方三州的佛州州的选举人票发生了争执。提耳登仅只需要再多一张选举人票就行了，但是，膳禄福德·海斯是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当国会违反宪法而任命了一个选举委员会来决定选票归属时，他被宣告当选了。

格兰特总统对当时的形势非常忧虑，因此使海斯在 8 月 4 日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即就职典礼的前一天，宣誓就职。民主党人威胁说，“提耳登或流血”，但是提耳登却说，他不会驱使他的追随者为选举而作战，因为他认为美国的前途是会光明的。海斯是一个好总统。他命令联邦军队从南方撤回去。

在 1880 年的代表大会上，民主党人提名一位体重二百五十磅的将军温菲耳德·斯科特·汉考克当候选人。他曾经在第一天就扭转了盖特斯堡战役的战局，使其对北方有利。在 1880 年，共和党人严重地分裂了，一部分人支持格兰特，另一部分人支持布莱恩，
还有一部分人则支持约翰·薛尔曼。詹姆斯·加菲耳德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出色的演说，提名薛尔曼为候选人。代表大会陷于僵持不下的局面中。据说，腊瑟福德·海斯与代表大会主席保持了接触，根据为提名薛尔曼作候选人所发表的那篇演说，建议提名加菲耳德作候选人。

加菲耳德当选为总统，切斯特·阿瑟当选为副总统。曾任海关税务员的阿瑟之所以被提名是出于权宜之计，但是加菲耳德并不是这样的了。后者虽然是内战中的一位将军，却成了一位好总统。我深信，任何一个愿意地想要履行其总统职责的人在总统任期内是不会有这一番作为的。然而，加菲耳德却没有时间来施展其鸿图，因为在他就职典礼后不久的6月里便不幸遇刺，并于同年9月去世。

民主党当时已有许多年不执政了。这个党于1884年在格罗弗·克利夫兰的领导下加强了阵容。他的对手是共和党候选人、素以“缅因州的高尚的骑士”闻名的詹姆斯·布莱恩，但是克利夫兰当选了。然而，这次的竞选运动却是很剧烈的。报纸毫无掩饰地极尽谩骂之能事。这还不算，这种谩骂和批评在其后的四年一直没有断过。克利夫兰在1888年又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在那一年的选举中实际上比他的共和党对手本杰明·哈里逊获得了更多选民的选票。尽管如此，他却在选举中失败了。在竞选运动中把关税作为一个问题的哈里逊，尽管获得少数票，还是当选为总统。四年以后——1892年——克利夫兰进行第三次竞选运动，再度被选为总统。克利夫兰是依靠“十亿美元”国会再度当选的，这届国会再次会议中花费了十亿美元，据说这便导致了1893年的恐慌。克利夫兰为一系列的罢工和骚动所纠缠，但在他的第二次任总统期内民主党与往常一样，是站在自由这一边的。可是总统就不是这样了。他成了一个极端的保守派。他的大儿子在马里兰的
巴尔的摩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共和党人。

1896 年的竞选运动是我个人非常注意的第一次竞选运动。四年以后，当我十六岁时，我在堪萨斯市民主党代表大会中当一名侍应生，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第二次提名威廉·詹宁斯·布雷恩当总统候选人。

在 1896 年的芝加哥代表大会上，布雷恩发表了那篇“金十字架和带刺的王冠”的著名演说，从而赢得第一次总统候选人资格，他那时只不过三十六岁。他是我心目中的一位英雄。我还记得，当布雷恩在堪萨斯市古老的会议大厅中发表演说时，大厅里一共坐了一万七千人。没有扩音器，一个人必须得有一个真正的声贯遐迩的嗓门，才能使得整个大厅听到他的演说。在 1900 年的代表大会上，另一个人想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这就是俄亥俄州的贾德森·哈蒙。他登上了讲台，即将发表演说。这时布雷恩走上讲台，每个人都站起来欢呼。布雷恩说：“你们为什么不给俄亥俄州的州长以发表演说的机会？”哈蒙又试了一次，但是喧嚣之声不停，他就只好下去了。布雷恩接下去演说，代表们对于这位伟大的演说家的热情是如此之高，以致他立即就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用口头表决方式。他那一天的魅力是我有生以来从未听说过的。他有一个声贯遐迩的嗓门，而且深知如何运用它。

1896 年，尽管布雷恩在人民中很有威望，共和党和“金”民主党人①还是选举了他们的候选人。四年以后，麦金莱再度当选，1901 年宣誓就职，同年 9 月遇刺身死。

麦金莱有时被描绘成为“马克·汉纳扶植的总统”。汉纳是克利夫兰州一个拥有百万家财的参议员，他实际上是收买了这次选

① 布雷恩当时的竞选纲领是“自由地铸造银币”（free silver），遭到民主党党内一部分坚决主张保持金本位的人反对，这些人称为“金”民主党人。
举的，而麦金莱则呆在家里，只是对那些常常到他家里来的一些代表们发表谈话。这是第一次“走廊”竞选运动。我不赞成“走廊”竞选运动。他不是走出大门，亲自和人民见面，争取他们的选票，我从来不喜欢看到这样的人被选入白宫。

威廉·麦金莱的继任者——特迪·罗斯福是我生平所看到的第一个总统。那时是1904年，罗斯福在麦金莱死后继任总统的期限即将结束，他希望凭他自己的权利竞选总统。那时他在横贯中西部的旅行中到达堪萨斯市，我则正在国民商业银行中工作。我跑到第十大街的拐角处，只是为了去看一下总统是个什么样子。罗斯福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说。我失望地看到，他并不是一个巨人，而是一个因为穿了一件长的阿耳伯特王子式的外套而显得高了一些的矮个子。我当时对总统以后，时常回想起那个时候的事。我发现，人们往往是跑去看“总统”而不是看他本人。几十年以前，我同样跑去看“总统”，当时的总统是特迪·罗斯福。

1912年帮助民主党人重新回到总统宝座上来的，是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在1908年挑选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做他的继任者。然而在塔夫脱任期未满之前，特迪便对其政绩表示不满，他想自己被提名作总统候选人。对一个共和党人来说，特迪是很左的——但是就民主党人来说，他还是中间偏右的——并且把保存自然资源和限制“大富豪罪恶分子”之类的许多自由观点付诸实现。塔夫脱则是一个极端的保守者，并偏袒特殊利益集团。他是不愿意运用总统的全部权力的。

虽然塔夫脱遭到了他的党友以上人的反对，但是他在职总统，就凭这一点，他就控制了1912年的代表大会。甚至连拥有大批追随者的罗斯福本人也能够改变那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事实。他撤开了共和党代表大会，使自己列入“雄鹰”候选人名单。这次塔夫脱被击败了，民主党人由于选出了我们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伍德罗·威尔逊而得以重新执政。

威尔逊在他的第一届总统任内实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如联邦商业委员会、联邦储备银行、关税改革，以及其他许多对公众有利的改革。在他的第二任总统开始后不久，美国便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是非常反对卷进欧洲冲突的，并且尽了最大的努力置身于其外。他在1916年间查尔斯·休斯的竞选就是以下列口号为基础的：“他使我们置身于战争之外”。他依靠这个口号和他的“新自由”成就而获胜。

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一个总统能够使我们既置于战争之外而又仍旧保持美国政府的主权。1918年，通过他的“十四点”演讲提出了一项争取公正和平的计划，的确使战争停止下来了。停战协定签订以后，直到他的任期结束，威尔逊把全部时间都用来从事于建立国际联盟，以确保世界和平。由于他在参议院中遭到反对，他竟因操劳过度而最后得了致命的中风症。

在1920年的竞选运动中，人们厌倦战争，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华伦·哈定争取“恢复正常状态”——不管那意味着什么——的诺言感到兴趣。哈定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人物，是由保守主义者和私有财产势力选出来保护特殊利益集团的。他是在前届代表大会上所选出的最差的马之一。他之被提名不但对他来说，而且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出人意外的事。这次的角逐本应该是伦纳德·伍德将军和弗兰克·斯登州长之间的事，但是在选举无法表明究竟对这两个人中的哪一个有利之后，政治首脑们便聚拢来，并选择了哈定，“因为他看来像一个总统”。这次代表大会产生了一个名词“烟雾弥漫之室”，讽刺代表大会的后面有人在拉线操纵。“烟雾弥漫之室”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但是哈定之被提名，却戏剧性地表现了这个陈腐用语，使它永远流传下去。卡耳文·柯立芝由于当马萨诸塞州长时在波士顿指挥了一次警察罢工，被选为哈
定的竞选伙伴。

那一年，共和党人获得了一次大胜利。作为民主党竞选人而参加竞选的是俄亥俄州长詹姆斯·柯克斯和海军部威尔逊的部长助理弗兰克林·罗斯福。柯克斯州长是一个出色的议员，俄亥俄州有才能的州长。他本是可以做一个好总统的。

当柯立芝因哈定逝世而于 1923 年继任总统时，他宣布他将在下一年做总统候选人。他的竞选口号是“一切照旧”，虽然维尔·罗杰斯是另外一种表达法：“同柯立芝一道保持冷静，不要轻举妄动。”1924 年，在一次多年来最混乱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代表们一次又一次地投票表决，设法在威廉·麦卡杜和艾尔弗雷德·史密斯两个人之间决定一个，后者是弗兰克林·罗斯福提名的。根据第一百零三次投票表决，代表大会最后提名约翰·戴维斯作为一个妥协性的总统候选人。我记得，当我在杰克逊县当县法院的东区法官时，在收音机中收听了这件事的全部过程。民主党发生了巨大的分裂，柯立芝取得另一次的共和党大胜利。

我回忆起 1928 年在蒙斯頓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那一年有两三个当地人被提名，其中包括密苏里州的吉姆·李德。但是阿耳·史密斯却被提名为候选人，这就抵销了历次政治运动中一向是罪恶的反天主教徒、反犹太人和反黑人运动。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三 K 党恢复活动以来，其影响几乎已达到了顶点，不断进行的诽谤与中伤比所记得的任何时候都要剧烈。

共和党人那年在堪薩斯市举行了代表大会，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应付他们的开支。作为县法院的审判长，我附带地帮助照管局势，因为大会使人们来到堪薩斯市和杰克逊县。因而我比共和党的某些领袖有更多的代表大会入席券。当胡佛被提名时，我是在场的。安德鲁·梅隆控制了代表大会，正如马克·汉纳在提名麦金莱时一样。
在之后的选举中，南方对阿耳·史密斯的反对使胡佛获得南方许多州的支持，他毫不费力地取得了这次胜利。然而，在两年后的考试中，几乎所有那些参加南方公职选举并支持胡佛的人都被击败了。这就是他们必须为1928年“放弃应有权利”而付出的代价。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标志着共和党统治的结束。弗兰克林·罗斯福和民主党人在1932年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白宫。

在1936年的总统选举中，罗斯福所获得的多数票在全国性选举中是空前的，选举人票除八票之外其余全部为他所得。堪萨斯州的阿耳夫·兰登是失败了的共和党竞争者。这是自华盛顿以来我所看到的第一次总统选举。这一年之前，我开始在美国参议院服务。

由于希特勒侵略西欧诸国，罗斯福便决定打破先例，竞选第三届总统。罗斯福选择了亨利·华莱士作为他的竞争伙伴，虽然杰西·琼斯、保罗·麦克纳特、吉姆·法尔利、威廉·班克特德也被提名了。但被定下来的却是华莱士。

1944年，华莱士再度想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人花了很大的工夫才使他不再被提名。罗斯福决定让我做副总统，虽然他事先并没有告诉我，但是他又不迷信公开拒绝华莱士。他是世界上心肠最好的人，从来不想伤害任何人。他会用各种各样的巧妙办法来免除他不需要的人，而不是他自己去撵他们走。

在费拉尔特费亚，现在已经过了午夜。从议事厅里传来了信息，代表们和朋友们川流不息地进进出出。我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了。1948年7月15日清晨，在我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自从1944年的代表大会上我又被提名为副总统以来竟发生这样重大的变化。然而，我将要在1948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座，接受提名作美国总统。置身于这种形势里，正如我在白宫里所经历到的每次重大事件一样，我感到与美国的政府和政治历史

238
是呼吸与共的。1948年以前的四十次全国性选举的预选会和代表大会对我的真实感，与我行将出席的这一次代表大会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和发展了一百六十多年的极好的自治制度。我能够积极地参与这种发展，对于我既感到骄傲也感到微小。

当然，代表大会制度是有其缺点的，但是我却想不出一个挑选总统候选人的更好的办法。关于需要召开一次总统预选会的提议很多，但是在美国，没有人能够负担得起预选会和竞选运动两者的费用。单说体力消耗也是个需要考虑的不小的问题。这种说法在理论上很难很有些道理，但是美国的一些人口密集的中心在实际上控制了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可是，根据我的经验看来，“年轻的乡下人”有时比大城市里出来的专家更能了解美国政治上的需要。

除非联邦政府自己负担起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和选举的费用，如同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在参议院所主张的那样，否则个人将没有办法应付这些必不可少的竞选运动的费用。我必须于1934年并再度在1940年在密苏里州为美国参议院进行两次竞选运动，那是一笔极大的费用。我想参议员的预选是对的，但是一个通往总统预选会的实际可行的途径迄今尚未设想出来。

代表大会制度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如果不是成功地进行，就没有根本无法进行下去。这个制度还没有产生出我们所说的“坏”总统。

对于所有的候选人——地方的、州的和全国性的——来说，理想的情况是，美国所有的人都能在国家的通讯设备面前在公开的基础上听到他们的演说，以致没有人由于个人财富，或由于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方面的影响或偏袒等等原因而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当人民消息灵通时，光是靠钱就决不会对政党发生作用。购买官职的观念并不是人民所喜欢的，这一点特别运用于总统。那
就是为什么要对竞选运动的捐款加以限制的原因。

实际上，如要使我们的选举制度实行起来不受到阻碍或危害，那就必须克服两大缺点。在两党中，旧的“老板”制度便是一种邪恶安排。像克利夫兰的马克・汉纳、辛辛那提的吉姆・柯克斯、芝加哥的比尔・桑普森、堪萨斯市的托姆・潘德加斯特、孟菲斯的艾德・克朗普以及其他几十个人，对选择候选人施加了不正当的影响。但是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对政治的害处都不比如今的广告——报纸这一工具的害处更大。

广告界的专家们特别擅长于制造“弥天大谎”的技术，很长一段时期，共和党曾得到强有力的广告商、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支持。这种力量的结合能够起到挫败人民意志的作用。

代表大会努力设法让十点钟完成总统和副总统的提名，但是到午夜过后投票才开始。第一次唱票时，我以九百四十七张选票选为被提名者。一位忠诚的民主党人、佐治亚州的参议员查德・鲁塞尔得到那些拒绝与南方各州的民主党党员一道背离代表大会的南方人所投的二百六十三张票。保罗・麦克纳特获得了另外的半张票。接着，艾尔本・巴克莱在欢呼声中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

大约在清晨二点钟，通知来了。代表大会正准备听取我接受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演说。
第十五章
竞选运动和胜利

清晨两点，我在好些人的簇拥护卫下走进了楼上的大会堂并登上讲坛。这个巨大的厅堂挤满了疲劳和冒着汗珠的代表，他们已经在这个闷热潮湿的地方呆了三天三夜了。可是，他们仍然有本领大肆大叫，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来欢迎我。

然而，我清楚地知道，反对党为了不让我取得获胜机会所进行的宣传工作——加上我们自己党内分裂——已经收到了效果。民主党人精神沮丧，气势已衰。我立意要用一些话语使他们振奋起来，使他们知道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来参加竞选。由总统亲自跑到会场来接受总统提名，这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第一个这样做的是弗兰克林·罗斯福，他在1932年被提名后乘飞机来到了会场。我想，这两次的效果是一样的。1948年的这一次使全党得以重新振奋起来，正同1932年那次的情况一样。

首先由同我一道走上讲坛的巴克莱简短地作了接受提名的讲演。然后由人介绍我同到会者见面。我曾经研究过其他两位总统——主要是罗斯福总统的接受候选人提名的演说，我决心在这篇演说中为这次竞选运动先来一个惊人之作。

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是在代表大会提名以后或闭幕会上的一项正式程序。被提名的人如果有意参加竞选，就必须发表这样的演说，正式表示接受。

我曾经在火车上草拟我的发言提纲，就在大会护卫委员会的成员来到楼下那个房间引领我出席代表大会之前片刻，我又仔细
地看了一遍。我的发言提纲是写在一个黑色的笔记本里，当我等待大厅安静下来听我发言的时候，我把它放到了讲桌上。

我只用了短短的两三句话，就使代表们振奋起来。这几句话是：“参议员巴克莱和我一定会赢得这次选举的胜利，使这些共和党人乖乖地认输，你们可不要忘了这一点。”这些话全是出乎我的本意，我口里所说的也就是我心里所想的。这里不可能有什么错误。我是立意要取得胜利的。

民主党人一直在等待有人肯定地告诉他们说，我们将取得胜利，这种话对他们所起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他们看到，就在此时此地，有一个身为党的领袖的人，将为捍卫民主党的原则而进行战斗。这就给了他们所迫切需要的武器。

我从6月间那次旅行中了解到，在人们为争取或反对任何事情而进行斗争以前，他们希望知道事情的真相。我感到，在大会代表中间所引起的意义，将同围绕着火车的群众在听到美国总统直接地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以后所引起的反应一样。我并不是在愚弄他们——他们是要知道这一点的。

我作了一次措词强硬和富于战斗性的演说。我叙述了历届民主党政府为人民所赢得的好处。我说，“在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共和国、任何王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农民，过着像美国农民这样欣欣向荣的生活；如果他们不对民主党尽他们的义务，那么他们就是世界上最忘恩负义的人了。”

我指出，工资和薪金已经从1933年的二九百九十亿增加到1947年的一千二百八十亿以上。我还说，“这就是劳工的情况，而劳工在政治方面除了有一个朋友外，是从来没有什么朋友的，这个朋友就是民主党人和弗兰克林·罗斯福。我要对劳工讲一句我对农民说过的话：如果他们今年不投民主党的票，那他们就是世界上最忘恩负义的人了。”
然后我痛斥第八届国会，强调指出“共和党所照顾的是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而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这个党从一开始就被控制在特权人士的手里，这一点在第八届国会中得到了具体的证明。……从他们所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得到证明。……”

我详细地列举了在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所遭到的种种失败的事实，我一点也没有放松我的敌人。然后，在演讲将告结束的时候，我打出了我的王牌。我宣布：
“7月26日那天，也就是我们在密苏里州称之为“罂粟节”的那天，我将把国会议员全部招回来开会，要求他们通过关于制止日趋高涨的物价和应付房屋危机的立法——而这些事情，他们在自己的纲领中是表示赞成的。

“同时，我还要请求他们通过其他一些迫切需要的措施，如拨付补助教育事业的经费——他们说他们是赞成这一点的；制订一个全国性的保健方案；制订公民权利法——他们说他们是赞成这样做的；增加最低工资——这一点我非常怀疑他们会表示赞成；扩大享受社会保险者的范围，增加福利——这一点他们也是说他们表示赞成的；根据我们关于提供公用动力和廉价电力的计划，拨付兴建各项工程所需要的经费。这个第八届国会企图间接地破坏合众国已经奉行了十四年的动力政策。动力院外集团正同阻挠房屋法案获得通过的不动产院外集团一样坏。

“我将请求为流离失所的人制订足够的和合适的立法，来代替那项由这个第八届国会所通过的反对大人的反天主教立法。

“朋友，如果共和党的竞选纲领中包含任何一点真实性的话，我们就应当从第八届国会的短期会议中看到某些行动。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在十五天之内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办好。然后他们仍旧会有时间离开国会，去参加竞选活动。

“他们企图逃避自己的责任。他们打算尽其所能地在这次竞
选运动中布满迷惑魂阵，但是我在里要对大家说，巴克莱参议员和我是不会让他们滑过去的。" 

宣布召开国会特别会议这件事震撼了所有到会的人，使他们的信心和热情都达到了新的顶点。我告诉这些民主党人说，我们准备接受共和党的这个反对党的挑战，我们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来和他们进行搏斗。

当然，我知道，这次特别会议在立法方面是不会取得什么结果的。但是，我认为有理由把议员们召回华盛顿，让他们向全国人民证明一下，共和党的竞选纲领没有任何真正的价值。我认为每一项同国家的福利事业具有重大关系和包含在共和党竞选纲领中的立法，都必须毫不拖延地制定起来。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不会根据他们的纲领办事的。

果不出我所料，国会的“熊熊节”会议从开幕到散会，对我所提出的关于制定在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已作出诺言的建设性的立法的要求，没有任何反应。共和党的领袖们对我所提出的关于美国人民希望在选举以前看到某些行动的警告充耳不闻，对我在 7 月 27 日长达六页的咨文中所提出的建议不予理睬。在毫无所为的两个星期过去以后，特别会议散会了。

现在，准备开展 1948 年热烈的总统竞选运动的舞台已经布置妥当。我定在劳工日——9 月 6 日那天发我开始竞选总统的信号，我的大多数对手也选择了这个日子。在这个战场上，除了共和党的托马斯·杜威，进步党的亨利·华莱士和州权民主党的斯特罗姆·瑟蒙德以外，还包括一些占次要地位的候选人如社会党的诺曼·托马斯等。

我知道，南部的反对分子和华莱士派人士将会搞掉民主党的那部分选票，但是我的对手还是共和党。这次竞选运动是以这样
一个问题为基础上，即维护由民主党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来反对由共和党所代表的和从第八十届国会记录中所表明的那种特权利益。我就是把宝押在这个问题上来参加总统竞选的。

我在劳工日在底特律的卡迪拉克广场所发表的演说，为以后各次的竞选演说定下了基调。我对全国的听众说：“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有时候我的话说得很直率。事实上，有时候我的话说得很粗鲁。今天我打算说一些既直率又粗鲁的话。目前是劳工和一切参加工作的人的严重关头。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此时此刻，劳工的整个前途都决定于一个简单的问题。

“在这次选举中，如果你们获得一个对劳工友好的国会和政府，你们便大有希望。如果你们获得一个对劳工不友好的政府和国会，那就够你们担心害怕的了，你们最好是小心一点吧。……

“如果让那班制訂劳工法－－工部法的国会人士继续当权，如果让这些家伙由于选出一个共和党总统而进一步得到鼓励，你们劳工界人士便将遭到一连串切肤之痛的打击。如果你们像在1946年所做的那样，坐在家里不出来投票，而让这班反动家伙继续当权，那你们就是罪有应得。……

“必须记住，今天的这个反动家伙是一个狡猾的人物。他从许多方面来说都要比二十年代的反动家伙狡猾得多。他是一个心计多端的人物。他从其他国家的一些欺骗家和反动家伙的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知道怎样来进行他的宣传鼓动工作。他现在在报刊和广播电台上都拥有许多有力的同盟者。

“如果你们把这个国家的政府置于那些憎恨劳工的人的控制之下，那末，要是政府今后采取措施来摧毁劳工的势力、威信和赚取工宣的能力，那你们能怪谁呢?

“我告诉你们，今天，劳工界人士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利不受损失，就必须比以往进行更加艰苦的斗争。……
“我从我自己同劳工领袖和工会组织接触的经验中，认识到劳工使自己受到锻炼和与国内其他团体进行合作的能力，都在逐步增长。

“在战时期间，当我作为参议员调查委员会主席就美国工业进行调查的时候，我了解到劳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了解并尊重工人和工会领袖们的想法和精神。我接见他们，同他们交谈，曾经在好几个地方访问过他们的家庭。我曾经在成百个工厂中亲眼看到他们如何工作。⋯⋯

“劳工界人士一直是不得不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的。你们现在正在为劳工运动的整个前途而斗争。我们大家都是在为了反对那些狡猾的和富有的对手而进行一场艰苦的和顽强的斗争。他们知道他们是得不到你们的选票的。他们的唯一希望是你们根本不去投票。他们把你们估计错了。我知道我们会赢得这场争取权利的圣战的胜利！”

9月17日，我开始了那次历时较短的竞选旅行。我向准备同我一道进行这次旅行的人和记者提出了警告，我这次出访，目的是要赢得选举胜利。我对巴克莱参议员说，“我将竭尽全力来进行这场战斗。”“我要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在今后的六个星期中，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将将在旅途中度过，凡是有希望见到我的地方，我们准备随时停下来和他们见面。

最初，关于我的这次竞选旅行的评论是，这是一场“单人马戏”，认为它不如共和党人所展开的竞选运动那么来得有力量和受到重视。但是，当一群群涌向我的火车的人民群众越来越多，比聚集到杜威的火车周围的人更多的时候，我的对手们开始着急了。

经过俄亥俄州从辛辛那提到克利夫兰的这一段旅程，是在白

① 在卡迪拉克广场上，到会的人民群众达十万人以上，我为他们的响应所鼓舞。这是竞选运动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天经地古城，汉密尔顿和戴顿铁路度过的，这要通过一连串小
城市，在这些地方聚集起来的群众多得很。州长劳希，这次俄亥
俄州的州长候选人，刚在哥伦布城南面的一个地方登上火车，又想
要到哥伦布城去。在他上车的那个小时，群众有六千到八千
人，接下去的一个城镇群众更多。而到哥伦布城以后，群众是那么
拥挤，以至劳希和他的随行人员无法下车进入车站。

“难道一路上群众的情况全是这样吗？”劳希州长问道。
“是的，”我说，“不过这里的群众比我们在大多数其他地方所
见到的群众还少一点。”
“原来这样，”他说，“可是这是我在俄亥俄州所曾见到过的最
大的群众场面。”他和我们一起坐车到了克利夫兰。他答应全力支
持我们的竞选。

另一段有意思的旅程是从阿尔巴尼到布法罗。当我们在早
从阿尔巴尼车站开始这次旅行的时候，遇到了倾盆大雨，可是聚集
在那里的人民群众仍然很多。一路上大雨一直不断，而每到
一个车站，群众总是拥挤不堪——即使是在那些为共和党国会人
士所掌握的地区，情况也是如此。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情况，就同在纽约的情况一样。

6月间，当我旅行到西部的华盛顿州参加大库里水坝的落成
典礼的时候，我看到大批大批的群众来听我演说。我认为，如果人
们对竞选运动所表现的关心，像他们在帕特、蒙大拿、大库里和萨
克里门托等这样一些地方所表现的那样（在萨克里门托车站，清晨
七点钟的时候就聚集了一万人，在洛杉矶，有人告诉我，大街上
有一百万人），他们就不可能受报刊的欺骗。

这的确是一次竞选运动。我一直促使我的随行人员紧张地工
作，几乎把他们都累坏了。有时候我也曾经把他们全都打发去睡
觉，只留下我自己，但尽管我是那样长时间地紧张工作，在这次竞

247
选运动中，我的体重还是增加了。记者们的报道工作我也督促得很严。

另一方面，一些主要的民意测验机构，通过报刊和广播电台，直到举行选举的那天，还继续在那里预言我的失败。只有农业部的一位经济学家路易斯・比恩和其他少数几个人在推测民主党有获胜的机会。

我在那些小火车站所采取的办法是简单的和开门见山的，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骗人手法”和修辞学上的技巧。我拒绝接受别人的“指导”。我只是用我自己的话老老实实地告诉人们最好认清清楚这个事实；这是他们自己的斗争。

我强调指出，如果他们不出来投票帮助我赢得这次斗争的胜利，那么共和党人很快就会再一次来鞭打农民和工人。我直率地和诚恳地向他们讲出这样的话，警告他们说，如果他们愚蠢得愿意再一次挨共和党人的鞭打，那他们实在是活该。

我还把共和党人努力把选民弄得糊里糊涂的一些问题加以澄清。当我向他们讲话的时候，我是把他们看作是具有真正的情感和对某些事情感到恐惧的活生生的人。我向他们谈到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家庭，谈到生活费用的问题。我不是把他们看做笼统地的一大群人，而是把他们看作是生意人、佃农、家庭主妇、已婚的退伍军人、劳动者、教师以及我作为总统应当对他们表示真正关怀的其他各式各样的人。

在竞选运动中我力图避免谈到的一件事情是关于外交政策的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破坏美国所执行的两党外交政策——特别是在进行全国大选的期间，更不应当。我甚至曾经要求在杜威的火车上听装一部打字电报机，以便使这位共和党候选人能够随时直接获得有关外交事务发展的情况。我就是这样做的，因为我不想助长那种从党派和政治的利益来考虑外交政策的观点。
向。我曾经尽量使杜威获得我所知道的关于国际事务这一方面的
重要文件。
当时的外交关系方面存在着许多充满危险的地方。犹
太人、阿拉伯人、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已经在摩洛哥进行热战，
我正在极力要使这些人达成一项协议，来停止这场战争。同时，我
们还在尽一切努力，使欧洲的一些自由国家得以进行合作，以便对
付苏联那种要接收自由世界的威胁。我们正在为争取裁军而努
力。为争取正当地控制核子能并使其用于世界和平的目的而努力，
任何从党派利益出发来改变这些政策的做法，就会在国内和全世
界其他地方造成混乱。我特别关心的是这种变动将给全世界其他
地方带来的影响。

在总统专用的火车上，政府的行政事务还是照常进行。正同
我每次离开华盛顿的情况一样，长时间也好，短时间也好，每天总
有邮袋从白宫寄到我手里。我经常在我身边保持一批正规的工作
人员，这样一来，不管总统走到什么地方，白宫的事情都可以随时
处理。我还通过装设在火车上的通讯系统用电话同许多人通话，
我一直同政府各部门保持着全面的和密切的联系。

做一个总统是不可能摆脱那些紧急的和永无休止的公务的。
在一场政治运动中也还是摆脱不了，而且更要加重总统的负
担——1948年的情况尤其是如此。我不得不在这年的秋季来进行
这场政治运动，这对我来说，可能是最坏不过的一段时间。这因
为我们当时正在同那个冥顽不灵的和可疑的俄国极权政府就外交
政策方面的问题进行谈判。

我们很快地就把一切传统的谈判方法都用尽了。联合 国讲
坛——建立这个联合国组织原是为了交换意见和消除分歧——遭
到俄国人的破坏，他们想把它变成一个宣传工具，由于俄国人的蛮

249
不讲理，我们正常的外交途径受到了阻碍，遭到了挫折。

许多由商业界人士、工业家、教育家和高级军官组成的专业性使团，都未能对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作出贡献，而且连可能改善的迹象也一点都看不到。我追述每一个可能想得起来的先例，以便求得某种新的和比较有希望的办法。

我想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的时候，有迹象表明，在英美关系上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局面。造成这种紧张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些是微不足道的，而主要是牵涉到我们的远征部队的问题；在美国的好些重要地区，特别是首都华盛顿，都显示出对英国人的某种冷淡态度。

正当这种彼此以冷淡相待的态度发展下去的时候，有一位高贵的客人来到了美国，而且开创了外交史上的新纪元。他就是英国的首席法官里丁子爵，他不动声色地和本着一种令人感到愉快的坦白和直爽的精神，把彼此间存在的大大小小的疙瘩，大部分都给解开了。

里丁子爵来到美国的消息是没有公开的，没有人像平常那样事先为他做好宣传工作。他静静地离开了美国，而他的这次行动，却大大地增进了解两国的情感。当时很多人都感觉到，他这次使命之所以获得特殊的成功，是由于他访问得很及时，由于他完全摆脱了那种日常的外交活动和政治活动，以及由于他本人的态度。

我认为，我们所迫切需要的就是一种彻底彻底的新方式——而由一个恰当的人来运用这种方式。当前这场竞选总统的政治斗争却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因为尽管国务院和国防部置身于竞选运动之外，它们却是我的行政机构的一部分。我们也不可能从其他政治集团中随便找人，因为这个人如果是杜威的同党，那也同样于事无补。
另一方面，华莱士的进步党人在竞选运动中针对两个主要的政党大唱反对“战争贩子”，以此来扩大自己的声势。他们的这种宣传路线，恰恰就是共产党人所采取的宣传路线。这既使得一个本来已经不妙的局面更加不妙了。华莱士所宣扬的这种姑息政策在一些占次要地位的政治集团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些集团不惜任何代价，把那颗诱人的和平丸药天真地吞吃下去。我认为华莱士个人也是他自己那种天真的想法的牺牲者。

由于这样一些原因，我觉得即使是正当竞选运动进行高潮的时候，也还是应当立即停止已经安排好的活动，以便制订出某种新的办法来同克里姆林宫打交道，争取紧张局势的缓和，并就许多没有谈妥的问题继续同俄国人进行谈判。我想派最高法院院长弗雷德·文森到莫斯科去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让他同斯大林非正式地交换意见和谈谈彼此的想法。

我在10月3日（星期日）打电话给文森法官，请他来和我商讨一件极为紧急的事情。

文森来到白宫以后，我把我的想法扼要地告诉了他。当我讲完以后，他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他说，他完全了解局势的严重性，并且希望他能够担负起这一重大的使命。但是，如果光是叫他接受这么一个决定，他将不得不加以拒绝。

文森认为，法官们应当把他们的工作限制在法院职责范围之内，而不是问其任何方面的活动，特别是在举行大选的时期，更应当如此。他还说，作为最高法院院长，他不能破坏自己的规定，即使碰到这样一个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问题，那也不成。于是我只好静候文森说出我早就料到他所要说的话。

“总统先生，”他说道，“作为最高法院院长，我不得不拒绝担当这项前往莫斯科的使命。但是，如果您把它作为总统提出的一项请求，我就可以有明确的职责可以履行了。”
“弗列德，”我说，“我拿这样的事情来麻烦你，实在抱歉，但是，为了国家和世界和平的利益，我不得不求你走一趟。”

文森的回答是：“我将在几天之内就作好准备。”

下面是我向文森法官提供的情况：

俄国人简直不了解——或者不愿意了解——我们的和平意图和我们想通过联合国进行合作，使大家得以朝创造和平气氛的道路上前进的真诚愿望。我们不想，也从来没有打算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在俄国人或其他任何人的头上，正同我们要极力抗拒把另一种制度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任何企图一样。我想搞搞清楚，究竟我们能不能够略微增进一下彼此间的了解，是不是应该在我们两国之间十分不够的通讯联系工作方面作些努力。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是作过努力的。如果俄国人不想让世界的前途和现有的文明归于湮灭，他们也应该作出努力。

我向文森指出，我们曾经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同俄国人打交道，从罗斯福一直到赫尔、霍普金斯、戴维斯、纳尔逊、赫尔利、哈里曼、贝尔纳和马歇尔，都有过这方面的经验。通过这些人所作的努力，我们也曾获得某些充满希望的征兆，只是后来又在猜疑和不妥协的气氛中消失了。俄国人时常弄得我们忍无可忍。但我们总是极力克制，一直在争取同他们和好相处。

在我们同俄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认识到，我们必须以实力为主，任何软弱的表现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但是，这决不表示我们所采取的是一种好战的态度。我们曾尽一切努力来同他们讲道理，同他们进行合作，而我们是真心诚意要做这样的。可是由于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得最清楚的一些原因，他们既不可能、也不愿意相信我们。

我们当前的重大国际问题之一，是由联合国成立一个机构来
处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以及现在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正在热烈展开争论的那个带有关键性意义的观察问题。苏联集团对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规定所采取的不肯妥协的立场，使得我们无从希望和共产党集团就控制原子能问题达成一项切实可行和必须遵守的国际协议。

我对文森说，根据俄国的发言人所表现的态度，他们似乎想要破坏联合国提出的关于处理原子能问题的任何明智的建议。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够把我们的立场和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向俄国的最高领导人讲清楚。我提醒文森说，俄国人是既不相信我们，也不相信他们自己可以来进行一次自由和坦率的交谈的。我希望这次采取这种新的方式，可以为斯大林提供一个表白自己意见的机会，我很想这样尝试一下。

总之，最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文森的这次出使，也就是不按照一般的途径来和斯大林进行接触，可以使俄国的这位独裁者更好地了解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所抱的态度和我们国家对整个世界所抱的和平愿望。我总觉得如果斯大林能同我们本国的最高法院院长交谈一下，他可能消除使他在心理上遭到压抑的某些因素。

我要文森向斯大林指出，另一次战争的那种愚蠢的和悲剧性的后果，将形成一次民族性的自杀行为，而除了牵涉到国防问题外，任何一个大国的头脑清醒的领袖，连想都不可能再想到战争。的确，在下一次战争中，也就是在一次原子战争中，不可能有什么胜利者，而广大地区的整个归于毁灭，其情景是令人可憎的，也是不可想象的。

这就是对全世界领袖们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是我们为什么建立联合国的原因。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继续进行谈判，而为了确保未来的世界得以存在下去，我们必须无保留地谈判长久的原因。

我对文森说，你顺着他的调子弹吧。不过要使斯大林从一开
始就弄明白，这可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外交上的刺探手腕。要交代清楚，这是在最大限度程度上所进行的一次交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态度，把有怀疑、恐惧和警惕的问题，甚至各人的野心，都自由地和无所抑制地谈出来。

只要我们能使斯大林对我们这边的某一个人感到放心，使他感到他可以完全信赖，我想我们也许能够取得某些进展。但是，毫无疑问，如果俄国人坚决要在所谓的统治、所谓的毁灭的基础上来使这个共产主义化并且控制这个世界的话，那我们就不可能通过谈判的途径来进行什么工作。而即使到了这一地步，正如我对文森所说的，我们也还是要采取一切可能设想的方式来进行接触，我们应当继续进行这种尝试。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文森到莫斯科去走一趟的原因，看他能不能使斯大林表明一下自己的意见。

当然，我要这位最高法院院长放心，他这次担负的使命，并不是对国务院和联合国，尤其肯定不是对我们盟国的一种越权行为。

我向他解释说，“我打算在你动身去莫斯科以前，就这次出使的目的进行一番讨论，以便取得我们盟国的充分同意。我还打算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国的人民。但最重要的是，在把这件事作为任何公开宣布以前，一定得及时地关照一下各有关人士。我们必须在各个方面都小心谨慎，不然就可能使这一炮打不响，或者被人误解为一种单方面的行动。在我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施以前，我将在星期一早晨从地图室拍电报给在巴黎的马歇尔。我相信他一定会支持这件事，因为他一直是赞成采取任何建设性的行动来推进和平事业的。”

在同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文森和我就这个问题作了第二次会议，我们就这次出使任务的范围、时机、出使手续和发表公报的形式等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星期天下午，我命令新闻秘书查理·罗斯通知各广播电台安
排半小时间来宣布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公报。我同时关照副国务卿罗伯特·罗维特，要他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办好出使手续，使文森在到达莫斯科以后能受到斯大林的接待。我还告诉他，我准备写一封介绍文森的私人信给斯大林。此外，我还向各有关部门发出命令，要他们极其严格地保守秘密，并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防止把消息过早地透露给新闻界。

但是在这架复杂的国际机器得以开动起来以前，在一切有关出使的手续办妥以前，这个消息却不幸被泄露给了另一家态度很不友好的报纸，然后其他报纸和通讯社也跟着大喊大叫起来，说这是“姑息”，是“玩弄政治手腕”，是一种“单方面的行动”。这样一来，文森出使的这件事情，甚至在还没有来得及同有关各国充分进行探讨以前，就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像往常一样，报刊上的各种叫嚣大部分是由于消息来源的不正确，由于牛头马假的传闻和对事实真相的故意歪曲。

在这个议案中的文森出使莫斯科的计划过早地公开以后，产生了一系列的复杂情况，迫使我不不得不重新考虑这次出使是否适宜的问题。我同在巴黎的马歇尔国务卿又通了一次电话，我发现他由于看到其他国家对这次出使的目的有所误解而感到不安。当时似乎产生了这样一种情绪，认为我采取这个行动，也就是越过了联合国的权限，而这是有损联合国的威信和权力的。其实这正是我所要加以避免的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坚决认为，在正式宣布文森出使的性质和目的以前，必须极为慎重地同一切有关政府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但是损害已经造成了。现在再来进行这项计划业已毫无用处。因此我把马歇尔国务卿召回华盛顿来和我进行一次会商，以便弥补一下这方面的损害，并趁此机会把从当前对文森出使问题的纷纷议论中所产生的某些流言蜚语加以澄清。
我同马歇尔国务卿会商后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中列举的事实有助于消除对这次出使事宜的许多误解。

声明说，“马歇尔将军在我的邀请下回到了华盛顿。向我汇报关于联合国在巴黎的各个机构的工作进展情况。我同他在今天上午、接着又在今天下午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向我详细地叙述了在巴黎发生的各种事情的情况，我和他就有关本政府将对各种带有争议性的事宜所采取的方针政策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于今晨报刊就最高法院院长文森可能赴莫斯科一行所作的报道这件事，事实经过如下：上星期二，当我同马歇尔国务卿通话的时候，文森告诉他，我始终迫切地希望看到在全球建立起巩固的和平，我这个时候特别关心的是苏联代表们对原子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我说，我怀疑这些苏联代表所抱的态度是不是当真反映了苏联领袖们在思想上存在的一种误解，以致从维护世界普遍和平的观点来看，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可以想得到的足以消除这种误解的办法，那我们就会再一次遭到失败。我问国务卿，为了争取使苏联领袖们了解美国人民对这些事情所表现的严正关心和衷心诚意的愿望，派最高法院院长文森到莫斯科去一趟是不是会收到有益的效果。马歇尔国务卿向我叙述了我们在巴黎所面临的情况，由于听到了他的报告和避免任何一种单方面的行动——不管这种行动从另一方面讲是如何需要——在当前所可能引起的误解，我决定不采取这个步骤。

“我同马歇尔国务卿进行的这次谈话使我感到很欣慰。我从他的报告中高兴地听到，在我们自己的代表和在巴黎的法、英代表们之间，对于处理柏林危机的问题，在各个方面都是团结一致的；而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则在尽最大的努力，来为其他许多一直使世界各地人民感到不安的问题谋求解决办法。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能向他保证，我国人民决心尽自己的努力来谋求通向和平的
道路。”

按照计划，我将在 10 月间在迈阿密举行的美国军团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我打算在这次大会上谈谈关于文森出使的实质性问题，我希望利用这次机会来发表一篇关于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讲。我并希望利用这次机会来消除可能由于华莱士的竞选活动而给我们造成的任何损害。在他的竞选活动的煽动下，某些少数派集团认为本届政府并不是在尽一切可能来维护和平的利益。它们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便来歪曲我们为和平而努力的种种事实，歪曲我们的外交政策。它们是十分错误的——它们所想象出来的污蔑这个政府是战争贩子的说法，是有害的。文森出使这件事竟也成为它们玩弄这种政治手腕的一个把柄。

我在美国军团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演中说：“不幸的是——我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才这样说的——不幸的是在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出现了一层互不信任的阴霾，使我们的关系遭到损害，变得很不正常。很明显，只要存在这种浓厚的互不信任的气氛，要来解决西方国家和苏维埃俄国之间的争执问题是难以取得进展的。

“如果要驱散这种不信任的气氛，就需要针对长远的和平目标采取实际的行动——通过这种实际行动，能使世界摆脱战争的恐惧，减少军备的负担，使大家得以集中力量来开展有益的经济活动。”

“我最近曾考虑要派遣一个专使到莫斯科去，我的目的是想获得斯大林总理的合作，大家来驱散目前笼罩在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进行的谈判上面的那种充满不信任的含毒的气氛。我派出的专使就是要去表达美国人民渴望和平的严肃态度和真诚意愿。”

“这一建议同目前在联合国或外长会议范围内进行的谈判没有什么关系。派遣专使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要超越这些谈判，而是为了改善谈判必须赖以进行的气氛，从而有助于产生丰硕的和平
成果。

“趁这个时候，我想把事情彻底说清楚，我一点也没有放松我要利用一切机会来为和平而努力的决心。只要得到适当的机会，我就一定要在我同我们盟国的关系的基础上和在联合国的职责范围内，采取行动来推进和平的利益。

“我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将继续为和平而努力。

“我们的国家和苏联都负有一项根本任务——提高我们两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

“我们必须记住，过去有许多次严重的危机都不是通过战争来获得解决的。我们必须记住，国际间争取生存的斗争，同个人之间的争取生存的斗争一样，是无论什么时候都在进行的，它的表现方式很多，并不一定是战争。我们必须记住，国家之间的敌对状态是自古有之的。历史表明，敌对的国家可以在世界上和平共存。

“忍耐应当成为我们的口号。当全人类的命运都处在危险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尽全力运用我们所有的忍耐工夫。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来加强联合国组织，使它得以担负起摆在它前面的伟大任务。

“全世界人民都在翘首望他们领袖为他们驱散当前有碍于维护和平的那种互不信任的阴霾。在目前这个时刻，我只想补充这样说一句话：我们的国家从来就是能够光荣地和忠于自己理想地克服它历史上的巨大危机的。”

参加美国军团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的反应是十分热情的。全国的反应也同样是令人鼓舞的。事情很快变得十分明显，许多为华莱士的和平攻势所吸引并认为这种攻势挺不错的人，现在已开始认识到，争取和平的希望，最好还是交付给这个民主党政府的手里。

我一直认为，尽管文森的出使和它的崇高目的，由于一家报纸的播弄而变成了一场灾难，但它实际上仍然是起了
作用的。尽管我认为如果这次使命得以完成，那将更好，但是即使没有完成，这个出使计划仍然具有它的意义。它向一切听到和了解这个计划的人表明，我们将采取任何光荣体面和实际可行的办法来进行和平谈判，而且毫无疑问，当我们这样做时候，我们是不会“单干”或者企图在联合国组织之外来进行活动的。

即使在竞选运动进入高潮期间，我也不允许我们对外交政策所抱的这些基本态度受到压抑或被抹煞。我们政府的各项工作必须不断地进行下去。在华盛顿，我们拥有白宫的全体工作人员来从事这些活动，而内阁阁员们则各司其职并经常同我保持联系。在我的内阁阁员中，除了有人问到与他们所主管的部有关的某些特定问题外，很少有人发表过任何政治讲演。

当竞选运动越来越紧张的时候，我也加紧进行我沿途停下来发表演说的计划。总结起来，我大约旅行了三万一千七百英里，发表了三百多篇演说——确切地说是三百五十六篇演说。我一向是习惯于艰苦工作的，干这一行对我倒挺合适。我的竞选活动一共进行了三十五天，平均每天要作十次讲演。有一天我讲了十六次。

在横贯全国的大大小小的火车站，聚集起来的大大小小的人群有一千二百万人到一千五百万人。有时候我还让我的夫人和马格丽特——这是她俩生平第一次和我作这样的旅行——到讲演台的后面同群众见面。有时候我只是单独一个人趁火车要开往下一站之前，对群众讲几分钟的话。

我这次单枪匹马的出征收到了效果。当大选的日子愈益临近的时候，人们对我的反应也越来越热烈。我从不怀疑他们将投我的票，尽管我的顾问们始终认为未可乐观，而民意测验机构则继续在那里推波助澜地叫喊什么我没有当选的机会。我相信，当人民

① 杜鲁门的女儿。——译者
自己了解事实真相以后，他们就会作出正确的决定；尽管有人认为，在今天的社会，竞选要依靠报纸、电台和其他通讯设备，但人民还是宁愿根据自己的直接观察来自行决定投哪些候选人的票。

1948年10月31日，我从我一生中历时最长、也最艰苦的一次政治运动的吵吵嚷嚷的气氛中回到了独立城我那安安静静的家。多少个星期以来，一直是在闹哄哄的发表演说、握手和日以继夜地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的生活中度过的，这种情况在10月30日晚间在圣路易举行的一次规模巨大的群众大会上达到了顶点。我感到我已经在选民们的面前为他们清楚地指出了何去何从的道路。从美国农民中所引起的反应是如此强烈，看来是会把我送回白宫再当四年总统的。

11月1日，也就是大选前夕，我又作了两次讲演。第一次是在下午对堪萨斯市会堂中的阿腊腊特神龛会友所作的政治性讲话。晚上，我从我家里的卧室中通过四大广播公司向大约七千万美国听众发表了演说。副总统候选人巴克豪在肯塔基州帕杜卡城他自己家里通过广播为我作了介绍。

这是我向选民们发出的最后一次呼吁，请他们在要一个维护人民利益的党还是要一个维护特权利益的党这一原则问题上作出决定。我警告全国人民说，他们所投的票不光是为了某一两个人，而是同每一个人及其家庭在今后多少年中都有关系。

到此，我的事情算是办完了。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可做的，只是在等待结果。

大选这天的下午四点十分，由白宫秘密警察分遣队正副队长吉姆·娄利和亨利·尼科耳森驾车将我从家里送到密苏里州的埃克塞耳西奥温泉的埃姆斯旅馆，这里是一个休息胜地，离堪萨斯城东北约三十英里。我们避开了这一天整夜都在极力想找到我的那些新闻记者。他们不断地向独立城我的家里打电话，希望获得
一些消息。我在埃克塞西欧温泉洗了一个土共产澡①，然后在
六点半钟回到我楼上的房间，吃了个火腿夹心面包和一杯牛奶，
便打开收音机收听关于东部各州投票结果的消息。接着就上床睡
觉去了。据当时的报道，我大概以几千票领先。

我在后半夜醒来以后，又一次收听了卡顿波恩先生的广播。
我当时领先了约一百二十万票，但是据这位广播员说，我仍将毫无
疑问地被击败。

清晨四点左右，妻利走进我的房间，建议我再收听收听卡顿波
恩的广播。我换开了收音机，获悉这时候我已经以两百多万票领
先，但是这位广播评论员还是在那里说，他看不出我有什么当选的
希望。

我对妻利和尼科耳森说，我们最好还是回堪薩斯城去，因为看
来我们已完全有可能要再干四年了。我们在11月3日（星期三）早
上六点钟左右到达堪薩斯城。十点半，我收到了杜威州长祝贺我
当选总统的电报。

最后的数字表明，我一共获得了两千四百一十万零四千八百
三十六票，在二十八个州中获胜。杜威获得了两千一百九十六万
九千五百票，在十六个州中获胜。华莱士和瑟蒙德各得一百万票
多一点。我在南部的四个州中败于南方民主党党员之手，这四个
州是南卡罗来纳、密苏里、加利福尼亚、衣阿华、伊利诺、得克萨
斯、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星等七个大农业州中。我都获得了胜利。要
不是纽约州的美国劳工党的五十万票投给了华莱士，我在杜威自
己的这个州里就把他打败了——比他多三十万票。实际情况是，
他在纽约仅仅比我多六万票获胜。

① 即一种蒸气浴。——译者
我在选举人中所获得的多数票的比重大。尽管我在下列各州中被瑟德德赢去了三十八票，即南卡罗来纳八票，密士苏必利九票，亚拉巴马十一票，路易斯安那十票，我获得的选举人票仍然有三百零四票（最后变为三百零三票，因为在田纳西州深了三票）。在选举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两个州是俄亥俄和加利福尼亚。那天晚上，这两个州的票数始终是起伏不定的，一直到最后一时刻，才使民主党的优势稳定下来。如果不能在俄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获胜，那么我有把握获得的选举人票数只会有二百五十四票，比必需的二百六十六票尚少十二票。

1948年的大选证明，民意测验家和预测家的话是如此的错误和不可靠，以至直到今天他们的名誉还没有完全恢复，而他们的影响也大大削弱了。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差不多还是一致在预测我将落选。接着他们又预测说，这次选举将交付众议院来决定，因为没有哪一个候选人将获得多数选举人票。

像我一向所作所为的那样，我在1948年所极力要做的是使民主党成为一个为维护和争取人权而斗争的生气蓬勃和奋发有为的政党。我希望它成为一个代表普通人民的政党，不管有人在怎样诽谤它，也不管有人曾经多少次企图从内部来破坏它。尽管出现了两个分裂集团，我们的努力还是获得了成功，几乎赢得了大多数选民的投票。

最大的一项成就是；我们是在党内没有最激进的分子和没有南部的顽固分子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一个政治家通常会说，他希望获得他所能够得到的全部选票。但我却是由一个既不依靠极端的左翼分子也不依靠南部集团的民主党推选出来的当总统的，对此我感到十分愉快和满意。当然，我也不需要投给我的共和党对手的那些反对票。1948年竞选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民主
党能自己站立得住，使它不受任何损伤。这个目的达到了。

这是党的一个历史性胜利。民主党重新获得了原来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的大多数席位，还取得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权。我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反对第十八届国会的活动，使得选民们相信这次非彻底改变原状不可，我这次用一个民主党占据大多数的国会，来代替了那个两年来一直阻碍政府在内政方面取得进展的国会。

大选两天以后，我乘总统专用火车回到了华盛顿。在圣路易的联合车站，有大规模的群众队伍来欢迎我，当我抵达首都的时候，我看到了在华盛顿出现过的最大的庆祝胜利者归来的群众场面之一。

当副统当选人和我乘汽车经过法国大街驶向热烈鼓掌的巨人群的时候，我在《华盛顿邮报》报馆的房屋前面看到一幅标语，“总统先生，您什么时候把老鸭这道菜端出来，我們便准备什么时候吃老鸭。”①

我寄语这家大报馆，我可不想要任何人吃老鸭，我可不是那么洋洋得意，或者要向任何人夸耀胜利。我说，我感到再执政四年是我的重大责任，我希望依靠全体人民的支持，来实现我认为他们已经委托给我来加以完成的计划。

一到白宫，我就举行了一次内阁会议和一系列其他的会议，来计划如何立即取消塔夫脱一哈特莱法，像在竞选运动中所许下的诺言那样。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迫切地希望着干起来。但是，在医生的劝告下，我于 11 月 7 日离开华盛顿前往基韦斯特休息了两个星期，不过在此期间，我仍然每天和新当选的副总统以及党的其他领袖举行会议，以便为第八十一届国会于1949年1月开会以前，制定出一个纲领。

① 吃老鸭为美国俗语，是盘剥民众的意思。——译者
第十六章
第四点计划

......

我走上讲坛，开始我的就职演说，这照例是就职典礼的一部分①；

“副总统先生，最高法院院长先生和同胞们，我以谦卑的心情
接受美国人民赐与我的荣誉。我以最大的决心来接受这一荣誉，我
要竭尽全力为我国的繁荣和世界和平效劳。

“在我任职期内，需要诸位的帮助和祈祷。我请求你们给予鼓
励和支持。我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但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能完
成。

“我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特殊困难。现在我们所面临
的困难与以往的困难同等重要。今天不仅标志着一个新政府的开
始，而且，对我们和全世界来说，也标志着一个多事的也可以说是
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的开始。

“我们也许注定要经历人类悠久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同时在很
大程度上，我们也应该实现这个变革。本世纪上半叶已打下了对
人权空前野蛮的侵犯和有史以来两次最可怕的战争的烙印。我们
这个时代最高要求是要人们学会和睦相处。”

我提出请大家注意世界所面临的动荡局势和美国人民一向皈依
的信仰。我提到已在全世界盛行的虚伪哲学，它已将许多人引入

① 杜鲁门于1949年1月20日宣誓就任第二届总统职位。——译者

264
歧途，并给他们增添了忧虑和困难。

我说，“那种虚伪的哲学就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以这种信仰为基础的，即认为人类是懦弱低能的，是不能管理自己的，因此需要强有力的统治者来统治他们。

“民主主义的信仰基础是，人类具有道德的和理智的能力同时也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能够合理而公证地管理自己。

“共产主义逮捕一个人没有合法的理由，不按法律程序，惩处个人不经审讯，并将个人当作国家的工具，强迫他劳动。个人接受什么知识，进行什么艺术创作，追随什么样的领导人物和想些什么，共产主义都一一予以规定好了。

“民主主义主张，政府是为个人利益而建立的，并负责保护个人的权利和发挥个人才能的自由。”

然后我谈到我们对未来所抱的希望是：在联合国、欧洲复兴计划和其他旨在改善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措施的范围内来改进世界。

我说，“为了使我们能够利用现有的先进的科学和发达的工业来改进和发展落后地区，我们必须着手拟订一项新的大胆的计划。”

我提出四点主要的行动原则。第一，继续支持联合国和有关机构；第二，继续执行世界经济复兴计划；第三，加强爱好自由国家的力量以防御侵略的威胁。

接着我概述了第四点：“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口正濒于悲惨的境地。他们食不果腹，疾病缠身。他们的经济生活是落后的，停滞不前的。他们的贫困对他们的自己和比较繁荣的地区来说，都是一种障碍和威胁。

“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掌握了能够解除这些人痛苦的知识和技术。
"美国在工业发展和科学技术方面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虽然我们所能提供援助其他各国人民的物资是有限的，但我们在技术知识方面的无尽资源是不断增长和用之不竭的。

我认为，我们应当使我们丰富的技术知识为爱好和平的人民造福，帮助他们实现改善生活的愿望。并与其他各国合作，我们应当奖励对需要开发的地区投资。

我们目的应是帮助世界各国的自由人民通过他们本身的努力，增产粮食、布匹、房屋建筑材料和机械动力，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我们吁请其他各国把他们的技术资源投入这种事业。他们的贡献将受到热烈的欢迎。这应是一项合作事业，在这一事业中一切国家应通过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任何切实可行的事情上共同努力。为了获得和平、繁荣和自由，必须全世界共同努力。

在我国企业、私人资本、农业和劳工的合作下，这个计划能够大大增加其他国家的工业活动，能够真正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这种新的经济发展的设计和控制，必须对被开发的经济地区的人民有利。对投资者利益的维护不得超过投入了自己的资源和劳力的当地人民的利益。

为在外国寻求利润而进行剥削的老牌帝国主义与民主的公平交易毫无共同之处。

一切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将因这个更好地利用世界上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建设计划而得到大的好处。经验表明，我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随着各国工业和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提高生产是致富繁荣与和平的关键。而提高生产的 关键 则是更广泛地和大力地应用现代的科学技术知识。

"只有帮助最不幸的成员自力更生，人类的大家庭才能获得相
当的富裕生活，而这正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产生动力，鼓舞世界各国人民成功地行动起来，不仅去反对人类的压迫者，同时也去反对他们的老敌人——饥饿、悲惨和绝望。”

我指出，“我们的盟友是千百万如饥如渴地追求正义的人。

“等到我们的国家趋于稳定，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民主制度的好处，共同来享受日益富裕的生活时，我相信今天还反对我们的那些国家会抛弃他们的妄想，参加到自由世界国家的行列中来，共同合理地解决内部纷争。

“形势的变化已为我们美国的民主制度带来了新的影响和新的责任。这些事变考验我们的勇气、忠诚和自由的信念。

“我们始终不渝地信奉全能的上帝，我们将向人类自由得到保障的世界迈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将献出我们的力量、资源和坚强的决心。在上帝的庇荫下，未来的人类世界将在一个公正、融洽、和平的世界里。”

中午十二点五十分，典礼结束，我偕同巴克莱副总统登上了漫长的游行队伍的领队汽车，沿着宾夕法尼亚大街前进。

在我的就职演说中，我希望明确这一点，如果自由国家不掌握维护自由制度和国家完整的机器以抵御强大的极权主义加在人们头上的侵略行动，那末自由国家是得不到持久的自由和独立的。集权政体的种子会靠灾难和匮乏来发芽滋长。它们在贫困和不满的土壤里蔓延滋长。当人民要求改善生活的希望破灭时，它们就成熟了。

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接受已经落在我们肩上的领导责任。1947年3月12日，我要求国会批准援助受到苏联威胁的希腊和土耳其。我也请国会答应希腊和土耳其的要求，批准派往这两个国家的文武官员名单，协助它们的复兴工作和监督使用我们所供给
的资源。

当时要求捐款的数字相当于美国为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所付出的代价约三千四百一十亿美元的千分之一强。不言而喻，我们应该爱护这笔投资。

美国人民的传统一向是利他主义的，从最初的时候起，甚至在大家除了艰难困苦之外，还没说过什么共享幸福的时候，这种互利精神已成为我们社会的特点了。

当然，在手头宽裕时要做到慷慨解囊并不难。我知道美国人会响应第四点计划的，就像他们响应一切请求援助的实际呼吁一样。这个计划完全是切实可行的，因为它给所有国家带来发展和繁荣的新机会。

我要求对希腊、土耳其进行援助这件事，引起了全世界争议了三个月之久，争论完了，美国的方针也就确立了。

根据这个计划，美国提供人员和经费在工业、农业、财政、对外贸易、公共行政、航运和劳工等方面援助希腊。我们已着手拟定了关于希腊的公路、桥梁、铁路和飞机场，房屋建筑基地的筑筑，矿业、炼钢、纺织、渔业、灌溉、重新植林、食品加工和公共关系等方面的建设、复兴或开发的计划。

前往希腊的美国代表团已拟定了这样一项计划，提供农民使用和保养农业机械的知识和除草、树木接枝的技术。其他的计划包括在希腊训练护士，卫生部增设肺病防治机构，并派遣希腊医生一名到美国，五名到丹麦学习防治肺病疗法。

在土耳其，也实现同样的计划。训练三百八十多多名土耳其人为重型筑路机驾驶员。此外，美国援土代表团还协助土耳其公路桥梁局改进组织机构和使工作程序现代化。

援助希、土的计划，正像马歇尔计划一样，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但是也像马歇尔计划一样，它仅仅是一项紧急援助计划，它的有效
期限局限于给与援助的款项总额之内。然而，这两项计划使全世界认识到美国的目的在于领导自由国家，加强他们维持自由的力量。这两项计划还提示了一个新的概念，这就是建立一种长期给予世界落后国家以技术援助的计划，这种计划将使他们自力更生地成为日益繁荣而强大的自由盟国。两年以后，这个新的概念就得到了证明。

这种新的概念在我的就职演说中，首次提到过，它与马歇尔计划和援助希、土计划是迥然不同的。我已说过：“为了使我们能够利用现有的先进的科学和发达的工业来改进和发展落后地区，我们必须着手拟定一项新的大胆的计划。”

于是我们便开始拟定仅仅在几个月内就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第四点计划”，因为它是在就职演说中所讲的四个重要的行动原则的第四点。

把它称为“新的大胆的计划”，毫无夸张之处。这是一项有史以来任何国家都不敢提出的大胆的计划。这项计划在1949年1月20日宣布后，引起了人们的莫大兴趣和兴奋。我在六天以后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复问题时又一次强调了这计划的新颖和大胆。

有位记者问道：“总统先生，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产生第四点计划的背景吗？”

我回答说：“关于第四点计划的想法，自从马歇尔计划实施后，已在我和同僚们的脑子里存在了两三年了。它是和援助希、土的建议同时产生的。此后一直在继续研究中。我用了大部分时间来详细研究世界那一边的情况，力图寻找获得世界和平的途径。”

又有位记者问道：“您能告诉我们，您准备怎样实行这项计划吗？”

我回答说：“这是政府今后四年的政策，也是一个将要普遍加
以推行的计划。我已请国务卿召集政府各部门领导人会商并草拟初步的执行这个计划的方案。我不能明确地告诉你们具体内容，以及在哪里推行和怎样推行。但我知道我要做的是什么。"

我研究了美国的历史，认识到我国是依靠英、荷、德、法等国的外国投资才发达起来的。这些国家在修筑我国的铁道，开发我国的矿藏，开采我国的油田和发展我国的畜牧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这包括经营畜牧场，饲养牲畜和罐头食品工业。第一家罐头食品公司设在密士麦必河西岸，是一位拿破仑麾下的法国伯爵开办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国家把美国当作军火和原料的仓库，在两次世界大战后，英、荷、德、法在美国的投资就减少了。德国的资本已被没收。

据我看，如果我们能协助非洲、南美和亚洲的落后国家的政府稳定下来，我们也能使用美国积累的一部分资本去开发那些地区。如果美国的投资能有保障，不被没收，如果我们能说服资本家，使他们认识到对外国投资不是为了剥削，而是为了发展这些国家，这样才能对有关各方都有利。

第四点计划的想法，大约与马歇尔计划的概念同时产生的。但是它与马歇尔计划毫无关系。马歇尔计划完全是为了复兴西欧国家，这些国家的生产和经济都遭到了战争的破坏。第四点计划是一项世界规模的长期计划，利用美国经过试验和得到证明的技术知识帮助落后国家自立。

我是从身居自由世界领导地位的我国的对外政策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在罗斯福和我执政期间，已经证明建立一个完善的经济制度，使大多数人民都能获得高度生活水平的有效办法是：从特殊的利益集团手里收回国家资源归人民所有。

这是我们的对内计划，我要使它成为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持久不变的部分。
第四点计划的目的在于使落后国家的千百万人民能从殖民主
义下的水平提高到自力更生的水平和最后走上欣欣向荣的道路。
我从世界上这些地区所获得的全部报告都说明，许许多多人的生
活仍落后时代将近一千年。在多个地区，这种情况是由于为了满
足外国的利益而进行长期剥削的结果，这些地区的发展只是为了
外国利益而不是为了当地人民的利益。这是殖民主义的祸害，我
是一贯主张消除这种祸害的。

我希望第四点计划能完成的是提供技术援助，从而使这些国
家的人民用我们小额投资就能开发本国的资源。支出的主要项
目是我们技术人员教会这些国家的人民如何促进自己的技术。

在我国，我们既无资本，也有技术知识。我认为我们所能遵循
的唯一道路就是将这两笔大资本用到落后地区去，以便帮助他们
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向全世界繁荣与和平的前夜迈进。否则，在
我看来，就只能继续让这些广大的地区走向贫困、绝望、恐惧和人
类其他的种种不幸，而这些都是培育无休无止的战争的温床。

第四点计划是我们在共产主义统治威胁的国家援助的具体
表现。第四点计划是和我们保证这些国家在衣食住等条件方面得
到适当改善，从而防止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的政策相辅相成
的。第四点计划所致力的不仅是为这些人民带来民主的理想，而
且要通过明智的合作为他们带来美好生活的实际利益。

因此这个计划既现实又理想。普通常识就可以告诉我们，发
展这些国家将使我国工厂的生意兴隆。像美国不达米亚、伊朗、
印度、北非和南美广大的地区的资源几乎都没有碰过，而开发这
些资源对美国贸易和这些地区本身都是有利的。这将使许多地区
的人民靠贸易生活，而不是靠援助来生活。

这就是我再度执政之初所倡议的理想，一般都认为是一个
美好的理想。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个理想付诸实施。
我立即布置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如何最有效地推行第四点计划，并命令国务卿负责领导推行这个计划所需的策划工作。我又委派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威拉德·索普调整实行这个计划的步骤，同时又通过对外经济政策委员会建立各部之间的协商制度。

在实行第四点计划中，我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利用私人和政府的一切现有机构。美国海外大企业和非盈利性质的私人组织，像洛克菲勒研究所或国际教育研究所，都能提供许多宝贵的资料和援助，使落后国家得到技术上的帮助。除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外，可利用的政府服务机构有各专门间的科学研究合作委员会、美洲各国间事务学会，经济合作总署，以及进出口银行。

1949年6月24日，我向国会提出一份特别咨文，要求拨款四千五百万美元，开展这个计划。这笔款项包括已在1950年预算①中为同样活动而申请批准的二千万美元；所要求的这笔拨款，计划供供给美国参与国际机构和直接进行援助之用。

我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扩大对世界上落后地区的技术援助计划和一项鼓励私人资本对这些地区投资，以发展经济的实验计划。这种发展将加强联合国，并有助于世界和平。发展这些地区，已成为我们对外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9月27日，国会提出了实施第四点计划的立法手稿，但是在10月休会以前并未采取行动。在这期间，我利用一切机会说明实现这个计划的可能性。1949年10月20日，我在商界人士举行的一次宴会上，非正式地发表了谈话，我说单单在美索不达米亚流域这个一个地区恢复伊甸园②就能养活三千万人，只要适当地加

①1950年预算于1949年1月向国会提出，财政年度从上一年的7月1日开始。

②根据《旧约圣经》创世记第二章的记述，伊甸园是上帝创造给人类的第一对夫妻亚当和夏娃居住的地方。——译者

272
以开发就可供给全部近东人民的粮食。我详细地说明了非洲的三比西河流域和巴西南部一块同样的区域怎样能够变成堪与我国田纳西流域媲美的地区，只要那些区域的人民能够得到我们所拥有的专门技术的帮助。

1950年1月4日的国情咨文，催促国会通过已经提交给国会的关于扩大对落后地区的技术援助和资本投资的立法。“如果要使自由和民主制政府的理想在上述地区——特别是远东——实现，那么让这些地区的人民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体验科学和经济进步的好处，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咨文指出，这一计划要求各工业国家，特别是美国，拿出大量资金输往世界上的不发达地区，以供生产之用。最近发生的世界事件，使得迅速采取这种行动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我说，“这一计划是符合所有国家人民利益的——它和上一世纪的老的帝国主义或新的共产帝国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1950年年初，这个计划已提交联合国。1950年3月4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都同意了这个计划，并否决了几项建议，这些建议在下半年获得通过。这是就第四点计划的意见首次通过的正式议案。


在为上列各项用途所拨的款项中，供技术援助计划之用的款项是三千四百五十万美元。特殊拨款包括在1951年的总预算法案内，这项法案于1950年9月6日通过。

273
拨归技术援助之用的款项与需要比较起来是很少的，比所要求的最低数额还少一千零五十万美元。然而，这只是一个开端；对那些饱受共产主义宣传的国家来说，第四点计划正象征着希望。共产主义向他们宣传说，自由国家不能为地球上落后地区的千百万人提供合理的生活标准。这一笔钱与其他国家的捐助合起来，在增进这些人的福利上，将收到积少成多的效果。

按照国家开发法案我在1950年9月8日发布一项行政命令，责成国务院实施第四点计划，并设立国际开发咨询委员会。设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考虑适当的方案，以实现第四点计划的目标和政策。该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是纳尔逊·洛克菲勒。

国务院在承担推行第四点计划的任务之后，国务院很快就召集技术人员成立了众所周知的技术合作署。1950年11月14日我任命亨利·贝奈特博士出任技术合作署的署长。贝奈特博士原为专科学院的校长，在联邦政府委员会的三项国外使命中，都作出卓越的成就。1945年他任美国代表前往魁北克参加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第一次会议；1949年代表美国占领军在德国参加农业调查团；1950年4月任埃塞俄比亚政府的顾问，按照美国农业学院的形式在埃塞俄比亚组织农业训练中心。

贝奈特博士是实际贯彻第四点计划的灵魂，但仅仅一年以后他就在伊朗因飞机失事死去。他死的不是时候，对第四点计划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由于实际的接触，他了解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形势。他对技术合作署的整个概念胸有成竹。

这样，在我就职演说后的两年内，实行第四点计划的最基础的机构成立了，并准备开始工作。

我们没有浪费时间。1951年3月，也就是第四点计划的第一次预算经国会通过只六个月，约有三百五十名技术专家在二十七个国家内进行一百多种技术合作的设计。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
的三十五个国家的政府根据第四点计划要求美国政府给予特别援助，解决它们的问题。

1951年3月，又有来自三十四个国家的二百三十六名第四点计划的受训人员在美国深造。根据计划，在以后的六个月中，还要有更多的人来美国学习。

3月末，美国已与世界上落后地区的二十二个国家缔结了第四点计划的一般协定。主要重点放在粮食的供应上，因为粮食是一切生产力的关键。此外在第四点计划中占重要地位的是疾病的预防、基本的和职业的教育、运输、矿藏原料的发展和消除病虫害剂等。

到了1951年年底，第四点计划已扩展到三十三个国家。1952年1月9日的国情咨文总结了计划的发展情况，指出美国在1951年利用数百万蒲式耳的小麦救济了印度的饥荒。但从长期来看，更重要的事是美国在印度所作的帮助印度农民自己增加谷物生产的工作。

“这是我们的第四点计划的工作情况。这个计划不仅在印度，而且在伊朗、巴拉圭、利比里亚等全世界的三十三个国家发生了作用。我们向这些地区派遣了技术人员。我们需要更多的这种人员。我们需要更多的经费来加速他们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全部外交政策中，再也没有比这项工作更重要的了。再也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明显地说明我们所主张的是什么和我们能做到的是什么。”

由于国会日益明显地看出这个计划的价值接着又制定法律，为执行这个计划提供了款项。在1952年的财政年度中，从原来的三千四百五十万美元的预算是增加到一亿四千七百九十万美元；这一数字在1953年的财政年度里，又增加到一亿五千五百六十万美元。

1952年，有必要在人事上和组织上进行改革；因为计划的范
围与活动继续在扩大。在贝奈特博士逝世后，农业部的一位前任官员斯坦莱·安德鲁斯继任技术合作署的署长。1951年底，洛克菲勒辞去国际开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专门从事私人组织的技术援助工作，1952年1月，他的职位由前经济稳定局局长埃里克·琼斯顿继任。

在1952年整理的现行援助计划下，东南亚和太平洋的技术和经济援助由阿弗里尔·哈里曼领导的共同安全署办理，而国务院的技术合作署则继续在中东、亚洲南部、美洲各共和国以及非洲的独立国家内进行经济和技术的援助。

在我于1953年1月卸任总统职位时，第四点计划推行还不到三十个月。但在这短短的时期里，这个计划已在世界许多地区适当救济了饥荒，已使造成许多地区贫困的根源——疾病的减少。另外也使许多国家走上用自己力量和本国人民工作来提高生活水平的道路。

例如，若干年代以来，秘鲁的契姆玻特就是一个痼疾传染区，而现在实际上已被清除了。缅甸掸邦境内的痢疾病患已从50%减少到10%。伊朗布坎地方的伤寒症不能再蔓延，并将这种病菌扑灭了。在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里已开始实行强调职业和技术训练的一整套学校制度。

在沙特阿拉伯推行了货币、赋税和银行制度。在好几个国家建立了医药、卫生和护理学校。在海地的阿尔蒂沃尼特流域有一个七万五千英亩的灌溉工程正在进行。在墨西哥的米却肯州建筑了一座多项用途的大水电站。在约旦的灌溉工程已在兴工，它将开垦出十二万英亩的可耕土地，可以供养每户拥有61/4英亩土地的家庭二万一千户，计十万零五千人口。

在伊朗，特别是在阿塞拜疆的阿尔德比耳一阿汉地区，用改良种子播种已获得了丰收，那里四年来第一次由于推行栽培耕种
紧急措施的结果而获得丰收。我们以拖拉机供给埃及农民，帮助他们把三百万英亩干季放牧时期过长而变成沙漠的地区改造成可耕地。在印度，提高粮食生产的五十五项农村发展计划供应饮水、修建沟渠、推广肥料、教导读书和写字、改良工具、改革农村作坊以及改善土地所有制等。

在三十五个国家内的二千四百四十五名美国技术人员实行上述各种计划。三十四个国家把它们最有希望的青年专家二千八百六十二名送往国外，其中绝大部分送到美国，按自己的专业在研究院进行深造。他们和来自他们训练出来的技术人员，可使美国技术代表团卸下责任，到其他地区去进行开拓工作。

我们发现就是在反对美国的国家内，美国技术人员和当地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是极好的。实施中的第四点计划具有解除敌对宣传者的武装和制止共产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进展的效果。

在计划的执行中当然也遇到一些巨大的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内外自私自利的集团企图改变计划的性质，要改变重点从技术援助转到财政援助上去。我们并没有把第四点计划当作一种借贷计划或施舍方案。它的基本目的是传播知识，支援别人去改进自己。

美国的纳税人赞成第四点计划，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对计划的普遍支持。对政府支援其他国家去改进它们自己的努力，新闻记者也少或根本没有反对。在我看来，第四点计划继续获得成功的唯一的危险威胁可能来自反动派和孤立主义分子。

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计划。有人估计过，亚洲和非洲的生活水平只要提高2%，就可以使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工厂开足马力运转一个世纪，而这也不过只能应付对商品和服务的增长了的需求。

在对待世界事务上，只有美国能够采取这种独特的方式。我们的人口同其他大国不同，我们是由世界各种族的血液混合起来
的；当我们变成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时候，我们力图实现我们已经写在宪法和独立宣言里的关于一切种族和民族的理想的规定。

美国对待世界事务的方式，已由我们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待战败国家的态度作了最好的说明。我们设法为战败国人民提供衣食，并照顾医药的需要。我们对于战败的国家，并没有打算维持它们的战败和屈辱的地位，而重重建它们的国家。我们没有要求赔偿。

在各国历史中这是一件新鲜事。传统的作法一向是战胜国掠夺战败国，并拿走所有的战利品。我们的想法是恢复被打垮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繁荣，希望它们能够觉悟到使用侵略作扩张和发展的手段是徒劳的。我们必须摒斥传统的主张：一个国家必须用侵略和军事手段来获得市场。

根据我们从铁幕后面所能获得的资料来看，俄国的仆从国家是世界上最不幸福的地方。这些国家与古巴、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其他和我们毗邻的国家形成极鲜明的对照。我们的邻国没有一个惧怕我们，它们喜欢和我们做买卖，因为它们接受它们的竟争，不要求它们屈服。

技术援助计划并不是反对共产党的手段。要是俄国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把它包括在这个计划之内。早在波茨坦会议的时候，也就是在1945年的7月和8月，我就准备向俄国人提供援助，以医治他们的战争创伤。当然既然无法进行合作，我们就无法帮助他们，使他们自力更生了。

因此，第四点计划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或反对任何东西的计划。这是一种自利的积极政策，任何国家只要有需要就可利用它。这个计划承认这样的历史事实：殖民主义已走完了它的历史路程，少数受惠的国家已再也不能使它发生作用了。

然而，就这个计划的目前和长远的效果来看，在迄今已采用的
方法中，它是对共产主义最强烈的消毒剂。这个计划的创造与设计，是要在永恒的基础上，为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指出改善生活的道路，也就是指出走向持久和平的道路。所以，在谋求和平中，第四点计划是一个极重大的发展；而和平正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
第十七章
北大西洋公约組織

1949年4月4日，当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代表美国在一份公約上签署时，我正站在他的身旁；这个公約是美国自从有了宪法以来在和平时期締结的第一个军事联盟。在我国的早期历史中（在还没有制订宪法以前），北美殖民地曾与法国締结过一项军事同盟。艾奇逊签字的那个文件就是北大西洋公约，是在首都华盛顿的勞工部会议厅举行的。这件大事是在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的开幕式仪式中发生的。

北大西洋公约，加上联合国宪章、希土援助计划和馬歇尔计划，是我国对外政策的进一步发展。由于有了馬歇尔计划，西欧的经济在很短的时期內就开始显示出复兴的气象。但是欧洲的許多問題并不只是经济方面的問題。欧洲还存在着对于侵略的恐惧，从而对未来缺乏信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争期间，欧洲的大量資金曾經轉移到海外，而现在西欧正需要这笔資金来重建它的城市与工业。然而，資金不可能流入受到共产主义经济威胁的一些国家中去。

1947和1948年，共产党人在欧洲大肆扩张。甚至在马歇尔计划已开始实行的时候，他们还夺取了匈牙利的政权。这是欧洲战事停止以后，在俄国的公开支持下共产党人第一次夺取政权。接着在下一个月克里姆林宫就命令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放弃参加馬歇尔计划。

1948年初，还有其他一系列事件冲击着自由世界。捷克斯洛
伐克长期以来一直是中欧的民主堡垒，但残暴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在俄国军队边境的支持下，要求取得该国政府的全部政权。爱德华·贝奈斯，这位伟大的马萨里克的卓越的继承者，坚持了四天，最后才被迫屈服。1948年2月25日，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为期不过九年，终于再度沦入极权主义的铁蹄之下。两个星期以后，扬·马萨里克，这位捷克共和国缔造者的儿子，同时也是西欧国家许多政治家们的好友和伙伴，在微妙中死于布拉格，这种微妙意味着其中有卑鄙的勾当。他的逝世是一种戏剧性的象征，表明在他的国家里，自由已悲剧性地被葬送了。

在波兰，俄国军队在大战结束的时候，已经建立了一个共产党的政府，现在俄国人已把所谓“波兰主权”这个幌子完全抛弃了。一位俄国红军元帅被派去统率波兰军队。大约在同一时期，斯大林“邀请”了小小的芬兰与苏联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如果芬兰不接受这项“邀请”，就会产生如此这般的后果。对于刚刚开始为马歇尔计划所鼓舞的欧洲人民来说，共产党的这些举动，看来活像是俄国“猖狂进攻”的先声。

我本来打算在3月17日纽约的一个圣帕特里克节庆祝仪式上发表一篇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演说。然而由于欧洲的这些重大事件发展如此迅速，使我感到有必要首先通过国会向全国提出报告。于是我就要求众议院议长约瑟夫·马丁为我安排一个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以便发表演说，日期我建议在3月17日。

我对国会说：“自从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战争结束后，现在差不多又过了三年，可是和平与安定还没有在世界上出现。我们都很清楚，战事结束并不会自动地解决大战中所产生的问题。在战后缔造和平永远是一项困难的工作。而且，纵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所有盟国都能在缔造公正的、光荣的和平这一愿望下团结起来，但要取得和平究竟应采取哪些途径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困难。
“但是，今天世界的形势根本不是大战以后随之而来的那些必然产生的困难的结果。困难主要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就是有一个国家不但在建立一个公正的、光荣的和平上拒绝合作，而且更糟的是，它还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

“有一个国家……经常滥用否决权，顽固地阻挠联合国的工作。……

“事情还不止于此，自从敌对行动结束以后，苏联和它的代理人已经破坏了中欧和东欧的一系列国家的独立和民主特征。

“正是这种残暴的行径和企图把这种行径扩大到欧洲其余的自由国家的阴谋，造成了目前欧洲的紧张局势。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悲剧性的灭亡，震撼了整个文明世界。现在又在向芬兰施加压力，使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遭到威胁。希腊正遭到叛乱者的直接军事攻击，这些叛乱者受到共产党统治下的邻国的积极支持。在意大利，议会中占少数的共产党正在积极而坚决地争取控制这个国家。方法尽管不同，但是行径却是太明显了。

“在面临这种日益严重的威胁之下，也出现了令人鼓舞的现象，欧洲的自由国家为了本国的经济利益，为了共同捍卫自己的自由，正日益团结起来。……

“就在我向你们演说的时候，有五个欧洲国家正在布鲁塞尔签订一个为期五十年的经济合作与共同防御侵略的协定。

“这一行动具有伟大的意义，因为这个协定不是按照一个强大的邻国的命令而强迫接受的。它是几个代表本国人民意志的独立政府的自由抉择，而且是遵循联合国宪章的条款的。

“它的意义远远超过协定本身的具体条款，这是欧洲为了维护本身的文明而团结的方向大大迈了一步。这种发展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加以支持。我深信，美国将以适当的方式，根据形势的需要，给予
这些自由国家以支持。我毫不怀疑，我們能助欧洲自由国家进行
自卫的决心不低于他們自卫的决心。”

接着我提议国会完成欧洲复兴计划的立法手续，并且规定通
过普遍军训和恢复选募兵役制以加强国防。

那天晚上，在我向纽约圣帕特里克友好儿女协会发表的演说
里，也强调了这些见解。

“每一地方的自由人们都在问：‘这种形势究竟要把我們引
到哪里去？究竟什么时候才到头？’

“今天晚上，我无法给你们简单、轻易的答案。

“但是，我可以问你们表示我的坚强信念：在这个历史时刻里，
美国的信念和实力就是防止战争、缔造和平的强大力量。

“我們必須把我們的信念和实力原原本本地向全世界表白清
楚。”

早在1948年1月18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就曾
通知国务卿馬歇尔说，英国正打算向法国以及所謂比、荷、卢(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国家提出建议，签订一系列双边防御协定。他考
虑中的条约形式类似敦刻尔克条约。敦刻尔克条约是战后签订的一
项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大不列颠和法国同意，一旦德国重新发
动侵略，两国要在防御上互相声援。

馬歇尔将军把贝文的函件交給我看。我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
开端，是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了一步。如果西欧国家准备为了它们
的共同防御而組織起来，那将是对世界和平的一项重大贡献。

贝文在这封信中询问我们对这个新的同盟持什么态度。我
曾授权馬歇尔通知英国外交大臣說，我們同意西欧各国所迫切需
要采取的一致步骤。正如对欧洲复兴计划一样，我們欢迎欧洲人
的倡议，并且对于他们的事业寄以由衷的同情，美国将尽一切可能
协助欧洲各国来实现这个以及类似的计划。

283
由于获得美国的支持，英美便向法国和比、荷、卢国家提出了建议。可是这三个小国却提出一项反建议，主张缔结一个区域性的协定来代替一系列双边条约。比利时外交大臣斯巴克先生在这个改变上起主导作用；后来条约就按这个形式签订。我认为，使欧洲人参加这个条约的功绩，应该归于斯巴克。

但是，纵使布鲁塞尔公约已经签订，事情仍很明显，必须采取更具有意义的政治行动来消除西欧各国间所存在的恐惧，从而恢复它们的信心。国务院已经作了某些广泛的研究，并拟出了几份可能采取的行动方针。我毫不怀疑，为了替欧洲的抵抗和支持复兴的意志打气，必须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我永远记住1920年威尔逊失败的教训。我的意思是说，要争取国会的合作。我们的欧洲朋友们显然也记得国际联盟这件事的；他们不但极其迫切地盼望总统就政策发表宣言，而且也要求国会表示支持。

副总统罗兰特和共和党外交政策发言人参议员阿瑟·范登堡起草了一个国会政策宣言，这表明参议院赞成“在经常的和有效的自助和互相支援的基础上”缔结区域性协定，并且正式记录在案。

这就是参议院第二百三十九号议案，这个议案在参议员范登堡巧妙的掌握下，在参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在1948年6月11日最后付诸表决时，只有参议员投票反对。双方弃权的和缺席但却表明态度的参议员统统计算在内，赞成这个议案的共有七十九票而反对的仅有六票。

参议员范登堡是深知参议院的工作，而且懂得如何取得效果的。他能够借用别人的意见（在这种情形下大多是来自国务院的），然后在实质上不加变动的情况下，再加上一两点意见，作为他自己的立法标志。接着，他就会为这些主张一直战斗到...

284
世之后，共和党里就再也沒有人能够继承他了。

与此同时，国务院正在为我們对“西方联盟”的支持制定細节。“西方联盟”是对布鲁塞尔条约部署的一个名称。这个计划被送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去作进一步的研究。在1948年4月22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會議上，羅維特宣称，为了使这个计划和他与范登堡当时正在起草的參議院决议案中的語气更加接近，这个计划正在重写。

4月23日，羅維特带着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貝文拍来的一封絕密电报前来见我；电报中概略地叙述了北大西洋地区国家形成一个正式的条约組織所能引起的危险。他说他曾竭絶密地与艾德礼首相和他的几个最亲密的同僚討論过这些危险，他們一致认为，由美国政府召开一个会議来討論北大西洋地区的防御部署，是目前对和平最有效的保证。我指示国务院将这份电报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传閱，随时供他们参考。

貝文说，組成一个防御性組織，可能引起的主要危险是，俄国人可能大为震惊，从而采取輕率手段，把世界推入战争。在这一点上，我們的专家同意英国人的看法。另一方面，如果一个集体安全体系能够有效地建立起来，那么俄国人很可能会重新估计形势，变得更合作一些。

英国外交大臣同时指出，大西洋安全体系可能是使法国同意重建德国的唯一途徑。这样一个体系将会給予欧洲所有自由国家以必要的信心，来建立世界和平与繁荣。

貝文认为，为了取得成效，这个安全协定必须对自由欧洲各国提出真正的保证。貝文提醒我們說，英国政府在1940年就知道美国总统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同情，可是他们又不得不在无法确定美国会给予什么帮助（如果给予帮助的話）的情况下进行作战。接着，貝文表示說，除非有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明确制訂的集体抵抗侵
略的协定，否则，英国人或其他自由国家就很难挺身而出，抵抗新的侵略。

在1948年5月20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副国务卿罗维特解释说，要是范登堡建议案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就更有利于我们同西欧国家讨论加强他们的和我们的国家安全措施。他指出，我们的计划里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我们要避免只要求我们为外国效劳，而得不到任何报酬的单方面的协定；第二，根据我们的宪法体制的规定，我们不需要任何自动生效的、无限制的条约。我们不能同意任何相当于保证的协议。但是，我们必须对于那些感到经常处在苏联沉重压力下的欧洲国家给以充分的保障，从而鼓舞他们的信心和信念。

接着国务卿马歇尔又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说，那天早晨，他接到贝文的一份电报，声称有必要拿出事实证明美国愿意承担一定的义务，同时贝文认为应该由华盛顿来倡议这次会谈。

陆军部长罗亚尔代表军事当局提出意见，他报告说，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在我们没有弄清内容以前，我们不应对任何防御协定承担义务。根据这个理由，我们只应该派遣观察员参加西方联盟国家计划7月在伦敦召开的军事会谈。罗亚尔建议说，所达成的任何协定都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将来能使西班牙、德国和奥地利参加。

国防部长福莱斯特尔指出，法国人似乎认为，任何区域性安全计划中的第一项条文必须规定重新装备二十五个法国步兵师。然而，我们的参谋长们却认为，首先应当充实我们自己的力量。但是他们认为，如果采取这样的方针，法国人要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才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罗维特先生说，除非是在紧急情况下，否则实际上不可能使国会同意把大量的军事装备运往其他国家。他还说，如果国会认为我
們是在考虑恢复租借法案,那么,国防军事拨款就将大大地削减了。

接着, 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我提出建议。总的说来,国务院所提出的行动方针应予以采纳, 但应适当重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和参议院在讨论范登堡决议案时可能提出的修改意见。

7月2日,我批准了此项政策声明。这个声明说, 范登堡决议案应尽可能地彻底执行, 国务院应立即着手进行布鲁塞尔条约国家所建议的初步会谈。

同时, 美国的军事代表应以非会员国的身份前往伦敦,参加在那里召开的五国军事会议。而且, 即使美国要等到以后才能正式承担义务, 我们也应设法说服布鲁塞尔条约的国家立即着手进行军事会谈。此外, 国务院还要试探一下把挪威、丹麦、冰岛、意大利, 甚至葡萄牙和瑞典都包括在这个协议中的可能性, 并使还要建议以后还可以把西班牙、德国和奥地利或者这两个国家的西方占领区也包括在这个条约内。如果加拿大愿意参加, 国务院就要作好准备, 让加拿大出席这次伦敦军事会谈。

如果和布鲁塞尔条约国家的外交会谈结果能使我深信, 在目前为了鼓舞西欧公众的民气与信心而需要我们进一步承担某种政治上的义务的话, 那么我们就应和这些国家着手讨论这种组织。这就是防御计划的基础, 但是这一点如果不能取得两党充分谅解, 美国就不能承担任何义务。

同时, 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某些建议,这些建议经我批准以后就成为共同防御援助计划。

共同防御援助计划和布鲁塞尔条约国家这两个建议结合起来是相互补充又是各自独立的。过去国会曾数度批准对某些国家提供军事供应和技术援助。共同防御援助计划就是打算利用一个广泛的计划来代替这种零打碎敲的办法, 这个计划将使我们能够从广泛的军事和政治观点来观察形势, 从而确定对那些战略地位
对美国安全极端重要的国家的防务提供援助的时间和数量。

这个计划是一个从长远利益去考虑的方案，而不是一个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的措施。但它也不应妨碍参谋长联席会议所确定的
我国武装力量的最低需要。这个计划应与欧洲复兴计划受到同样
限制，即两个计划加在一起不致于妨碍我们国内经济的稳定。为
了避免生产重叠现象，应鼓励参加这个计划的国家把武器与物資
一律标准化。

这时正是1948年的夏天。柏林被封锁了，空运会不会成功，
也还不敢肯定。欧亚两洲自由的人們迫切地需要抵抗侵略，他們
再也不能等待将来再拿出武器，否则就要误失时机了。的确，这个
援助方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保证我们的支援不会形成另一方面助
长希特勒称霸欧洲的那种由于“太少了也太晚了”所引起的悲剧。

国务院很快就和布鲁塞尔条约的国家进行会谈。会谈的第一次
会议是在7月6日举行的。副国务卿罗維特是美国代表团的团长，
大不列颠、法国、荷兰、比利时以及加拿大的驻华使领馆的大使代表
本国政府出席会议（比利时驻美大使同时也代表卢森堡）。

这些会谈是在极端秘密中举行的。当时采取了一种特殊保密
制度，所以散发的文件材料减少到不能再少的程度。各种文件都
是由特别信使传送的。会议中讨论的事情绝对禁止在电话中交
談，而无线电通信也减少到最低程度。一切有关文件只由极少数
人员处理。

这个保密制度与布鲁塞尔条约国家进行会谈时所采用的制度
相同，目的在防止把情报泄露给苏联的间谍。

由于这些会谈极端重要，因此我需要确实掌握全部情报。
副国务卿罗維特，定期带着每次会议的记录前来见我。这些会议的
特色是交换意见完全开诚布公，有时甚至达到非常坦率的地步。
一群代表六个不同国家的外交家们围坐在一个桌旁，这样开诚
布公地发言，是常见的。

除了罗维特以外，荷兰大使范·克鲁芬斯算是这群人物中最卓越的一位。他似乎具有种罕见的本领，能抓住事物的要领，并且能够在恰当的时机说出恰当的话。他头一个表示希望范登堡决策案中所重视的那种组织能采取“北大西洋公约”的形式。

最后，经过各个工作委员会开了无数次会议以后，终于制订出一个大家一致同意的声明，准备提交各国代表的本国政府。以下是这个声明中最重要的几点。

第一部分论述了影响安全的欧洲形势。从这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联的扩张是这次大战的直接结果，在大战中德于势力曾经横行的中欧和东欧产生了真空地带。苏联人的行动被说成是公认的最无理的扩张霸权和势力的公开攻势的一部分。在现阶段，苏联有可能凭借武力把它的统治扩张到欧洲大陆。

与会各国代表注意到，虽然还没有迹象能证明苏联人制定了武装侵略的时间表，但是由于国际紧张局势而造成的事件的危险性是经常存在着的，而苏联的惯技之一就是哪里有利可图就在那里施加压力。一个细小的事件发展起来，很可能引起一次大战，很容易让苏联征服欧洲大陆。

主要的关键是：

马歇尔计划虽然带来了一些慰藉，然而苏联的难以捉摸的行动所造成的经常性威胁，却在西欧人民中间产生了一种不安全和恐惧的气氛。欧洲人民害怕在有效的援助未能来到之前，他们的国家就要遭到苏联军队的蹂躏，要消除欧洲人民的这种恐惧，还需要采取某些步骤。只有一个包括各国在内的安全体系才能消除这种恐惧。

下一个问题就是哪些国家应该包括在这个体系里。有人指出，如果敌人占领挪威、丹麦、冰岛、爱尔兰和葡萄牙（以及它们
在大西洋区域的属地，如格陵兰和亚速尔群岛）的领土就会形成对
西欧安全的威胁。会议注意到所有这些国家可能不愿意或者不准
备承担这种组织的义务。因此，有人提出建议，可以有不同类别的
组织，从而有各种不同程度的义务。

大家一致同意，有些国家虽然在地理上不属于大西洋，但是它
们对于大西洋防御计划可能非常重要，因此大西洋国家应与这些
国家联合起来。意大利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经大家同意的那份声
明中，就这样写道，美国代表团曾特别坚持要以某种形式将意大利
包括到任何拟议中的条约中去。

声明决定，西班牙和西德的问题最后必须加以确定，但是在这
个特殊的时候企图确定这种问题为时还嫌为时。会议的报告中附
有一份拟议中的北大西洋安全条约的条款提纲。

布鲁塞尔条约国家要求北大西洋公约宣布，如果一个成员国
受到袭击，其他成员国将尽力提供所有的军事及其他方面的援助
与支持。这当然意味着参战。我们的代表团奉命采取的立场是，
根据我国的宪法，我们不准备承担这项义务。

加拿大提出了一项折衷方案。这个方案规定一个成员国一旦
受到袭击，其他成员国应该认为这是对它们自己的袭击。但为了
不立即被卷入战争，这个折衷方案规定，希望各成员国根据本国的
宪法程序向被侵略者提供援助。通俗点说，这就意味着有义务提
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但要根据各国的宪法程序办事。

在这个条约最后获得通过时，这个折衷方案实际上就成为条
约的关键条款——第五条。

10月13日，加拿大通知国务院说，它准备遵循9月9日一致
同意的声明中所提出的总的方针加入条约。两星期以后，接到通知
说，布鲁塞尔条约国家原则上同意就这个北大西洋公约进行谈判。

在加拿大和布鲁塞尔条约国家作出这些决定以后，各参与谈
判的国家再度聚集一堂，很快地就提出了一个条约草案。1949年1月6日，在我出席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形势的时候，副总理费罗维安对于这次会谈中所体现的精神倍加赞扬。

很显然，每个政府都有它本身的问题。法国人急于要把它们的北非属地包括到这个条约里去。英国人不太愿意把意大利人包括进去。正如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讲的，这种不愿意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必须记住，英国人在近年来曾吃了意大利一些苦头。但是我问，如果人们把全部时间都花费在考虑缺点和顾虑困难上，那就一事无成。制宪政策就是要作出决定。我们必须满怀信心地朝前看。

在制定北大西洋公约时，我们作出了真正的巨大决定。正象我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解释的，我们可以称它为“维持北大西洋区域和平而又没有自动参战规定的进攻性的防御同盟”。

北大西洋公约和与其相适应在里约热内卢签订的西半球协定，证明了我们的决心；支持自由国家抵抗来自任何方面的武装侵略。我认为这一点对于我们在中国的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基本意义，因此我在1949年1月20日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曾把北大西洋公约连同坚守联合国、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等看作是我们对外政策的基础。

这时，外交官们差不多已经完成公约全文的拟订工作。当时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为了要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要人员熟悉这个文件和其中的问题，曾经花费了不少时间。

这个公约是在1949年4月4日在华盛顿正式签字的，我在签字仪式上的讲话中曾说，这个公约是个真正的睦邻措施，而且我还把十二个国家看作十二个国家，他们相信他们之间既有这么多共同之点，那么更正式地联合起来，对大家都有好处。

我认为，这个公约本身既简单又直接了当。我们希望，用它
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肯定地说，如果在1914年和1939年有这样的公约存在，那么曾把世界推入两次战争浩劫的侵略行为就不会发生了。

这个公约重申我们对和平事业和对联合国组织所代表的和平解决争端的理想的贡献。这个公约是一个反侵略、消除侵略恐惧的盾牌，是一个能够使我们进行真正的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的屏障，这些工作就是为我们的全体公民创造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

4月12日，我把这个公约连同一份咨文提交参议院，要求予以批准。我向议员们说，这是向和平道路迈进的一大步。为了使和平向前进展，我们必须采取事态所需要的实际而又必要的步骤，继续不断地工作。我们为共同防御而采取的与北大西洋区域国家结成同盟的步骤，是世界未来和平再好也没有的基石。

参议院对北大西洋公约进行了唯有这个伟大的审议机构才能做到的彻底审查。批评者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任何能考虑到的反对意见都经过讨论，并得到答复。辩论在7月21日结束，有八十二位参议员投票赞成批准这个公约。这个数目远远超过了宪法规定的批准条约得有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数。有一位参议员没有投票，有三十三位在唱名时回答“反对”，其中有十一个是共和党人。

7月25日，我签署了公约批准书，于是美国参加这个公约的手续就完成了。1949年8月24日，已有足够法定数目的国家批准了公约，而使公约生效。这天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成为事实的一天。

当然，我们认识到，为了证明这个新的协定有效，还要做许多事。条约一经批准，我立刻要求国会拨款约十四亿美元，对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和像希腊、土耳其和菲律宾等国家，进行军事援助。这个计划中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的援助。第一，我们需要帮助与我们友好的国家增加它自己的军事生产。第二，我们将把某些必不
可少的军事装备移交給这些国家。第三，我们将派出若干专家到
国外去帮助训练并装备它们的武装部队。

在国外战争退伍军人第五十届野营年会上，我对军事援助计
划的目的作了这样的解释：

“军事援助计划的目的是防止侵略。我们的北大西洋公约合
伙们今天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有效地进行自卫的地步。战争结束以
来，他们一直集中力量重建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我们把某些军
事装备移交给他们，并和它们组成一个共同防御计划，既加强它
们，同时也加强了我们自己。军事援助计划是以互助和相互支援
的原则为基础的，它也是欧洲复兴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的基础。

“我们武装自己和我们的朋友并不是要和任何人作战。我们
建立防务就是为了使我们不至于被卷入战争。

“我们的援助仅限于装备机动防御部队所必需的物资。这些
部队对其他国家的独立不至于构成威胁。民主国家没有侵略的意
图；它们只想有足够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国家。……

“这个计划所要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可观的，然而它是对安全所
作的投资，这笔投资比它本身的价值不知要大多少倍。这是和平
代价的一部分。为了拯救和平而付出一些开支，或是把我们的全
部资源和财产投入另一次战争，作孤注一掷，究竟是哪一条道路好
呢？”

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规定，它的行政机构很快就建立起
来了。1949年9月17日成立了一个北大西洋理事会，各参加国
的外交部长成为这个理事会的成员。几个成员国负责防务的阁员
组成了一个防务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下面的、由所有十二个国
家的陆海军高级将领组成的军事委员会立刻就开始了工作。

第一项重大任务就是在如何制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地区的
防务计划上达成协议。到目前为止，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防务计
划，但是现在有必要把整个地区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这并不牵涉到特定国家的防卫地位问题，而是涉及全盘的战略途径问题。这项计划很快制订出来了，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于1950年1月6日予以批准。

国务卿艾奇逊把这个计划交给我。我在外交、军事、和经济顾问们的协助下，仔细地把它研究了一番。我认为这是一个对美国十分有利的好计划。1950年1月27日，我正式批准了这个战略计划，这个战略计划将要控制我们防务的主要部分，并且占据我们防务力量的大部分。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是建立在“均衡力量”这个观念上的，这就是说，在使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御力量时，每个国家必须提供出它的一份力量。但这就是问题之一。比方说，荷兰人有悠久的航海与探险的传统，因此他们不顾限制自己的海军，可是计划却要求他们集中力量来建立某种类型的地面部队。差不多全体成员都表示，他们理解其中所涉及到的基本原则，就是说，要是能够避免力量的重叠，就能完成更多的事业。然而，也还有这样的想法存在，即希望有自己的均衡的防务，以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旦失灵。这种想法有其显露出。换句话说，这还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一个克服不坚定和疑虑的问题。

在国会里，也有人要求拿出证明来说明欧洲人愿意承担共同防务中相应的一份义务。而在欧洲，正如人们所理解的，除非美国确凿无疑地加入这个组织，否则人们都不愿甘冒危险、担负它的开支。

此外，欧洲的内部还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就使得这个工作错综复杂。法国不愿放弃任何对德国防御的成见。比、荷、卢三国要求明确一下不但法国，而且连英国在内都要承担它们那个地区的实际防务部署。斯堪的纳维亚人感到他们处在侧翼，并且是危
险地暴露在这条战略弧线的末端。英国企图保存它的实力以便维护它的帝国的残存部分。这只不过是一系列问题的开头而已。

通过一系列会议，国务卿埃奇逊用极大的耐心与技巧使大家明确一点，除非在共同防御和互相支援上真正做到通力协作，否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没有任何意义。埃奇逊的论证取得了胜利。可以背，没有埃奇逊，也就不会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事情很快就证明，德国参加欧洲防御的问题是这些讨论中的主要问题。德国人民被分割为东西两部，在希特勒被击败和摧毁以后，他们仍然处在被占领状态下。但是，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却是欧洲的心脏，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多少世纪以来都证明，他们具有保卫这块土地的意志和能力。没有德国，欧洲的防御不过是大西洋岸边的一场后卫战。有了德国，就能够有一个纵深的防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来自东方的侵略。

这种形势背后的逻辑推理是非常明显的。任何地图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只要懂得一点算术就可证明，把德国的人力加进去，对欧洲联合防御的实力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把德军人放进欧洲防务部署中去，和鼓励欧洲人自己进行最大的努力，这是推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起作用的和必需做的两件主要工作。德军人在防御计划中获得地位以前，首先恢复他们的全部主权。可是法国人却一直坚持，德国必须受到管制。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这个僵局看来却无法打破。

埃奇逊参加这些会议时，每天打电话给我，扼要地汇报了当天的全部情况。这种汇报和代表团秘书为了供国务院应用而整理的报告不同。它是由国务卿亲自口授的，专门给我个人的报告。这样，我就可以逐日知道有关紧闭下会议进行的情况。埃奇逊总是让我充分了解他准备采取的每一个步骤。

在一系列极端重要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议中，有一次是
1950 年 9 月在紐約召开的。

我曾把在欧洲遇到的困难情况重新研究了一遍，因此我认识到，我們必须考虑我們欧洲盟国面对着远东的形势发展而流露出的焦京。我們有很多人担心我們会把大部分注意力转移到朝鲜去，而把欧洲防务降到次要地位。为了证明我們对欧洲防务真正关心，我們决定增派美国军队到欧洲去。这些美国部队是包括德国人在内的均衡欧洲防御力量的一部分。最后一定要成立一个最高司令部来指挥这些力量。

当艾奇逊前往紐約和法国外交部长舒曼、英國外交大臣貝文一道参加 9 月 12 日的预备会谈时，他就带着这项计划。这两位政治家立刻就看到我們在鼓舞欧洲人的行动这一点，已经跨了相当大的一步。可是法国政府给舒曼的指示要他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建立一支德国军队的部署，以及可能作为这样一支军队的雏形的任何措施。贝文立刻注意到最高司令这个想法。他认为委派一个最高司令，特别委派一个美国人出任最高司令，将比任何其他事物更能激励欧洲人的行动。我們对于这个问题的想法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組織登陆部队时的做法一样，先成立一个联合参谋部来进行准备工作，然后在有了具体指挥对象时再委派一名最高司令。

艾奇逊报告当时的情况说：

9 月 15 日，上午 12 时 15 分。

“艾奇逊致总统密电

“会議开了两天，由于在欧洲防务这个中心問題上相互坚持不下，遭到失败。我要求并已召开了一个只有我，贝文，舒曼以及三国驻德国高级专员参加的秘密会議。这次会議的目的是要摆脱那些咬文嚼字的次要的障碍，而真正探索這個問題的实质。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并且，其结果虽然目前令人很沮丧，但我认为我們还
是会有进展的。

“我指出，您已根据国际形势的实际情况，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我们准备采取我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步骤，在欧洲驻扎相当数量的部队，把这些部队加入到欧洲防御的整体力量中去；同意设立一个指挥机构，同意有一个最高司令，参加欧洲统一生产计划，在经济方面则采取长远的步骤；然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这样一个指望上，即别人也要尽自己的分内义务，这样整个计划总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至于和平的希望会无比地加强；如果事与愿违，战争一旦爆发，我们就会有打赢战争的最好机会。接着我又说，这就牵涉到欧洲的防御要尽量向东方伸展，而且，如果不正视德国加入的问题，不作出明智的决定，那么这个防御就不可能实现。我指出，在我们的讨论中，英国人和法国人已经准备接受我们的援助，但对他们自己应作的贡献却一字不提；而且断然拒绝在任何方式下考虑德国加入防御的问题。因此我想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这个问题，看一看我们目前的处境。

“在接着举行的讨论中，非常清楚地暴露出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个是，贝文虽然实际上同意我的见解，但是他的政府却封住了他的嘴，不准他发表任何意见。这是由于下院最近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辩论的缘故，在这次辩论中，工党政府对丘吉尔抱有一种病态的恐惧，不敢发表任何意见，因为害怕会泄露到美国报纸的手中，从而被丘吉尔在辩论中利用。我希望，这种情况不是永久的，希望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澄清。

“在舒曼这方面，困难就更大。他的态度是，除非同盟国的部队在欧洲大大加强，从而使法国政府能够应付由于德国武装力量的建立而产生的心理反应，否则作为政府的发言人，他不能或不愿意对德国加入的问题作出任何决定，甚至连原则上的决定也不可能。
“当时的事情很明显，他们谁也没有自由裁决的权力，因而争论也不能马上解决问题。于是我提议研究一下他们每个人所采取的立场，目的只为了澄清我们的思想，而在他们重新有伸缩的余地时，我们就能知道我们各人对于这些不同的论点究竟是怎样看的。

“我认为，可以公正地说，这次讨论是有好处的。它彻底地推翻了要等到联合国军队完全配好以后，才开始组织德国部队这一主张的实际意义。我认为，这次讨论粉碎了他们的恐惧的任何逻辑基础，他们害怕，一旦让德国人加入联盟，在西方建立武装力量，就会更加引起俄国人专门为反对建立联盟的实力这一事实而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我认为，我们已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同德国政府打交道，并不是作为一个祈求者，只不过是同意阿登纳所已提出的要为欧洲部队提供部队的建议，并由于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而促使他接受条件而已。

“这一切都是有益的；然而这次讨论结束时有一个情况是很明显的：他们准备接受我们所给的东西，但是他们却不准备接受我们所提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现在正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并不是把什么特定条件强加在他们身上，但是在他们的态度没有进一步明确以前，我们就不能再进行这个讨论。结果我国代表团无法按他们准备同意的事项发表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文件。我们在这次三边会谈第一阶段结束时所发表的公报中，无法宣布任何决定，只是说，我们将在理事会里继续进行讨论，我们将于下星期恢复会谈。

“我打算在理事会的会议上把这些问题重述一遍，并且已经获得欧洲较小国家的有力支持。看来在星期六晚间以前，我们还不大可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但是可以肯定，英国人和法国人有点越来越坐不住了。我们以后还必须作进一步的会谈。在事态没有新的发展以前，我也许有必要回来向您作进一步请示。就目前
情况来说，您无需担心，但消息很可能已经泄露给新闻界，并且把一切并不顺利的情况广传开了，我认为您必须考虑这一情况。我只是有把握地认为，我们会成功的，问题是谁最能沉得住气，并采取适当途径来解决罢了。

“我现在亲自口授这个电报给您，使您充分了解我的想法，并希望您认为我可能做错的地方给予指正，或者给予任何必须遵循的指示。我将同您密切联系使您全面了解一切情况。”

贝文接到本国政府的指示，要他和艾奇逊一道为有德国参加的联合防御力量工作。由于艾奇逊的努力，除德国以外的所有成员国都接受了联合部队的建议，虽然像挪威和比利时这些处在联盟外围的国家对这一点并不像比、荷、卢那样热心。可是总的来说，在建立一个有效的西欧防御的道路上，只有法国人在阻挠了。

在北大西洋理事会休会期间，同法国人和英国人的会谈仍在继续进行。三国的国防部长也与外交部长们一道参加了会谈。法国派来了儒勒·莫克。从伦敦来了伊曼努尔·辛威尔，而我则指派了乔治·马歇尔。他是刚被我说服，离开了理应享受的退休生活，在这个危急的时期出任国防部长这一重要职位的。

在这些人的坦率会谈中，看来非常明显，法国人同我们或英国人一样地认识到，如果想使欧洲有效地得到防御，就需要德国的人力。他们深信，在一支欧洲防御部队真正建立起来以前，法国议会是决不会同意任何把德国武装起来的建议的。法国国防部长莫克先生非常坦白地说，在他对德国人加入拟议中的联合部队这一点拿定主意以前，有三个问题需要得到解答：

（一）计划要建立几个德国师？
（二）派遣到欧洲去的美国师究竟有多少？
（三）美国如何派遣这些师？
当我听到馬歇尔将军和辛威爾先生能说服法国国防部长，使他同意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具体答案以前，还是可以在原则上取得一致意见时，我感到很高兴。馬歇尔列举十几项工作，这十几项工作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可以立即着手做的，而且又不会影响莫克要求回答的那些问题以后所作的决定。馬歇尔敦促道，最重要的是要在原则上取得谅解。譬如，美国可以声明，它将迅速地增派军队到欧洲去，但是，由于目前朝鲜正在打仗，它还不能确定具体日期。同样，法国人也可以表示同意，为了保卫欧洲应该建立一支联合部队，而且应该把德国的人力包括在内，虽然在目前阶段还不能说明德国人所承担的部分究竟有多大或者多小。我认为馬歇尔的这个典型的明智的办法很有道理。

在以后一次分别举行的会谈里，艾奇逊和馬歇尔向舒曼和英国保证，我們愿意和法国人討論在经济上帮助他們军事计划的问题。在这个保证下，法国人才愿意同意艾奇逊早先向贝文和舒曼所提出的一般原则。因此，9月26日，在纽约发表了一項公报说，北代西洋理事会已同意建立一支保卫欧洲的统一武装部队。这样就留下了許多事项有待取得协议。法国总理普利文先生出面提出了一项计划，这个计划允许德国人参加欧洲防御部队，但只是作为现有作战部队的补充部队。即使这个计划不能使人人满意，但它至少是进一步讨论的依据。

我們一致认为，最重要的是着手筹划这个统一部队。各有关方面都谅解，行将指派出来的最高司令将是一个美国人。事实上，在我們筹备这个计划时，我就一直考虑到艾森豪威尔是承担这项特殊任务的当然人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欧洲盟军统帅的时候，他统率一个由好几个国家军队组成的作战总司令部，表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他在欧洲有很高的威望，让他出任欧洲防御司令部的首脑正表明我們使这个共同努力获得成
功的决心与愿望。

10月19日那天，我在一封致艾森豪威尔的函件后面亲笔写了这些附语：“我希望你一到华盛顿就来看我。如果我请你来的话，那就会使那些无事空谈的先生们胡乱猜测了。”

10月28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到白宫来见我。我把我考虑要他担任的工作告诉了他。他一言不发地听完了我的话，然后说，他愿意接受这个任务。艾森豪威尔对我说，他所以愿意接受这个任务，是因为他是一个军人，而这是要一个军人服役的召唤。但是，他又对我说，他乐于接受这个职务，因为这是一桩急待进行的工作。他说，他坚信把欧洲国家联合起来而且迅速地联合起来，是非常重要的。

两天以后，我接见了北大西洋公约各国的国防部长与国防负责人员，并且暗示他们说，有一位最高级的将军将出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而且我已经和他商量过这件事。

这项任命直至12月18日才正式发表。这样做是为了使北大西洋理事会能够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我委派一位美国将领担任欧洲盟国最高司令。同时，迪安·艾奇逊从布鲁塞尔的理事会会议给我发了一封函电，报告说，理事会会员国一致表示希望我能委派艾森豪威尔将军。我立刻回答说，我委派的正是艾森豪威尔将军。

这位新任的最高司令于1951年1月前往欧洲，旨在迅速考察局势。随后他回到华盛顿向我作了全面的报告。我建议他把欧洲的局势向国会报告，同时通过广播向全国报告。我认为，这些报告会起作用，因为它都是极为坦率而诚实的。

艾森豪威尔向我，后来又向一次内阁会议报告说，虽然他发现大家在欧洲统一防御的原则意见普遍一致，对这个防御可能成功地组织起来的意见也是一致的，但是他发现，在要求各国提供力量上要获致谅解却大为棘手。他说，在他最近所作的视察旅行中，他
在每个停留的地方都要问：“你们准备做些什么？你们必须准确地告诉我，你们准备做些什么，以便我向美国政府作报告。”

艾森豪威尔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总是离不开一个冷酷无情的事实。这就是西欧的贫困。艾森豪威尔说，他发现，这种贫困就意味着不可能用同一尺度来衡量各国的贡献。举例说，我们不能指望西欧人在防卫上像我们所花费的预算百分数那样来动用它们的预算。他们是这样的贫因，以至于有些国家已不能承担现在多花一些钱。

艾森豪威尔在内阁会议发言时说，主要的工作是使这个“联合的实力作螺旋形的上升”。他说，“这些国家的人民是信赖这一事业的。现在，他们已开始相信自己了。他们已开始相信能够胜任这一工作了。我们能给予他们这种信心的办法是运送装备和派遣美国军队到欧洲去激励士气。”

艾森豪威尔完全同意我的欧洲政策。从他被任命为最高司令那天起，一直到1952年他回国投入政界为止，始终是孜孜不倦、忠诚不渝地为这个政策而努力。在他留驻欧洲的整个期间，他常常直接地或通过阿弗里尔·哈里曼写信给我，而且他在欧洲的每件工作始终获得我的充分支持。

艾森豪威尔驻欧洲将近一年的时候，在1952年1月初给我写了一封详尽的长信，汇报第一年的工作。他回顾在建立一支欧洲军队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且讨论到一些有待完成的重大事项。他主张这些欧洲大陆上的联盟国家，必须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巩固而工作。英国很难与这样一幅图画相适应，他同意英国人的意见，就是他们应当和即将中的欧洲防御集团结合起来，但并不直接加入。据艾森豪威尔的看法，温斯顿·丘吉尔可能重新在英国组阁，这就意味着将会更加强调政治上的联盟。艾森豪威尔敦促我趁即将到来的丘吉尔访问华盛顿的机会，说服他发表一个“响亮的声
明，这个声明将尽量不谈英国的不参加政策，而强调英国在道义上、政治上以及军事上支持欧洲军。"

丘吉尔的访问是一次值得欢迎的旧友重逢，也是我所期待的一次访问。虽然他脱离政府已经六年了，但是我们还是经常保持私人联系。当他再一次作为英王陛下政府的首脑时，我来欢迎他，感到特别愉快，尽管我知道我们两人以及我们的随员之间还有许多困难的问题有待解决。

在和丘吉尔的三天会谈中，我们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其中之一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丘吉尔解释说，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在这个共同事业中承担的重任，他说，联合王国将尽它力所能及承担一切。然而，他指出，他们近年来对于岛上的五千万人民的生活与精力已经取出殆尽，他又说，他们还失去了海外的大量投资。他说，英国有许多许多可以追溯到过去的问题。现在的关键是，联合王国如果现在还要假装它能承担自己力所不及的重负，也是徒然的。

我回答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五十年中，英国人和法国人以及德国人在我国家里曾经投资达许多亿美元。其中一部分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英国人和法国人偿还战争赔偿费掉了。当然德国的赔偿已经作为遗产被没收了。我说，"你们在这里的后备金，现在实际上已成了财政上的剩余资金，我们希望能根据第四点计划或其他方法把它重新投资到国外去。自由世界的复兴也是我们必须做许多极重要的事项之一。我们要使自由世界形成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

我提醒首相说，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我们已经把近六百亿美元送到海外去，但是要记住一点，今年是大选年，国会在选举临近的时候，很不乐意增加国外费用的。

丘吉尔说，他当然了解选举对于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立场有
什么影响。去年，他们在英国有过两次选举，当英王陛下政府的政治前途动荡不定的时候，就很难采取坚决的行动。可是他认为，他们目前在英国，“至少在几年内”，已经无需再为选举奔忙了。

1952年总统选举日益临近，在各友好国家的首都引起了莫大的焦虑。在公约没有签定以前和艾森豪威尔将军还没有被派去组织防务以前所流行的那种疑虑和恐惧又在各地重新出现。我们发现其他国家的政治家们所处下前，因为他们需要肯定，他们不是向投票选举孤立主义政府的美国人承担责任的。

我们的外交官们报告说，当他们获悉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都基本上相信需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防务的人物时才放了心。美国对外政策所存在的一个事实就是华盛顿政府的变动不定，总是使我们的国外朋友忧虑不安，使我们的敌人产生了希望。那些负有责任的人物必须牢牢记住这个事实。他们在没有忘记在哈定接替威尔逊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对世界来说，又是多么严重的灾难。

当轮到我把政府的大权移交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时候，我也移交给他一些计划；我完全了解，他能领会我拟定这些计划的动机并且持有相同的看法。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是这些计划之一。总而言之，他在这个计划中起过极大的作用。

对德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尚待完成。我们曾经希望这些条约能够在1952年年度被批准。可是到了11月，在法国和德国（在德国的程度要轻一点）都突然爆发了反对计划中的条约的抵抗运动，因此条约的批准很可能进一步拖延下去，虽然这种拖延仅限于事情的延长时间上和某些重点上，而不是原则上的。

西欧防务的架子已经建立起来了；它之所以能够建立主要是因为我们决心打破传统，加入了一个和平时期的军事同盟；因为我们决心不仅承担我们应尽的职责，而且还在联合部队的形成过程
中起领导作用；因为我们认识到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欧洲对于世界和平是有极大好处的，因此欧洲的统一和欧洲的实力是防止另一次大战的最有效的保证。
第十八条

美国农业计划

我是在农场里长大的，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帮助我父亲工作。我的老家密苏里州主要是一个农业州，我的弟弟维文直到今天还在经营农场。我知道农民有些什么问题。当我还
在一家银行里工作时，我就知道农民的富裕对于国家的福利是多么重要。

每逢秋收，银行就遇到两种情况：农民提取他们的存款，接着
许多农民以土地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当农民遭受灾害的时候，批发
商和零售商也要受到损失。这种景象的发生，就是经济上的根
本教训。农民富裕，国家也就富裕，农民贫困，国家也必贫困，这是
一个实际的例证。

1921年农产品的价格惨跌，在整个二十年代中，农民仅仅能够
勉强维持生活。过了不久，1932年，民主党获胜。接连实现了许
多正确的政策，恢复了农村的繁荣，因为新政认识到，要使整个国
民经济趋于稳定，必须使农业收入稳定。水土保持、三A法案①、农
村信贷的实施、乡村电气化等等以及其他措施都有助于农业恢复
繁荣。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有力地把这种繁荣的趋势向前推
进了一步，由于美国的谷物运往海外资助我们的同盟国，而且国内
就业者大大增加，因而使国内粮食的消费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即
使在战后，救济物资外运和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仍然继续需要美国

① 三A（Triple A）是农业调整法案（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的简称。——译者
的农产品。

在这些年中,政府保证了农产品的价格固定在一定的水平上;粮食方面的继续不断的量的需要,使政府保证的差价降到了最低限度。结果1948年美国农民的经济地位超过历史上任何年代。

农业上的现金收入,每年达到三百亿美元,而1932年却不到五十亿美元;同时以农田作抵押的贷款从1941年以来已降低了25%。农民在银行中的存款和储蓄有二百二十亿美元,这是我国历史上最高的数额。

这种农业上的繁荣固然部分地是由于战后一些特殊因素所造成,但是从1932年以来所采取的有关农业的正确的立法,为农业的持久繁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更加有利的基础。例如,1932年我们就没有什么水土保持计划,没有价格补贴计划,也没有学校午膳计划,有的只是一个有限的农业研究计划。

虽然如此,农民仍然会发生恐惧。例如像1921年的那种突然变化,就可能使农产品价格大跌。我曾打算尽我所能避免农业不景气的发生。当时我感到,农民在战后有权获得真正的保障,以避免粮价的暴跌,而且整个国家也必须得到保障以免农业不景气的发生。当时我需要一个行动计划,以保证1932年以来所获得的利益能够保持下去,并且保证在美国农业有组织的、持久的和现实的繁荣基础上,把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向前推进。

对于那些没有适当分享美国生活发展成果的许多农民家庭,我是非常关怀的。正如我的报告所指出的,在绝大多数的乡村社会中,住宅问题、医疗事业和教育设施仍感不足。有些农场由于道路不便仍然处于孤立状态,另外一些农场则缺乏电力供应。

我坚信,联邦政府在建立持久的农业富裕和使农村生活能吸引后代的美国人民方面,是责无旁贷的。过去十六年中的那些正确的、影响深远的立法,为农业不断的进步打下了最良好的基础,
但是在我们的农业计划上许多地方需要扩大和改进。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有一项永久性的农业商品价格的补贴制度。我相信，全国应该得到保障，以免受到市场价格巨大波动的影响。这在过去曾经引起过经济上的不稳定，使我们全国都受到影响。再者，我们都需要有一项更强大的水土保持计划，而重要的是，应当采取步骤维持农产品的足够市场，以及改进将这些产品分配给消费者手里的办法。

为了解决上述种种问题，我曾要求农业部长查尔斯·布兰南将农场情况加以全面研究，并草拟具体的建议书，因为布兰南和我曾在三、四次不同的场合下讨论过各种计划和主张。当他的报告最后写成时，他前来白宫同我逐条加以审阅。

这个方案的目的在于保证农民有稳定的收入，实现这一方案所要采取的办法我很赞成。让每种有关的商品在市场寻找它的价格水平。假设这种价格水平低于农民的正当收入，政府在预定时期的结尾就直接付给农民一种差价，这种差价就是他在某一销售期间商品所得的平均价格和用一种公式计算出来的合理价格之间的差额。

这种办法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1937 年和 1938 年就曾首先用它来补贴棉花的价格，也曾用来维持糖的价格，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实行。美国的每一个甜菜和甘蔗的生产者只要所售出的农作物的价格低于法定公式所定的价格，每年都要从政府收到一张补偿差价的支票。关于羊毛，也有类似的立法，而且实施时间也同样久。

确切地说，布兰南要求我批准的那个计划，可以使容易腐烂的商品，如肉类、乳制品、鸡鸭和蛋类等，在市场上按消费者可以负担的价格出售。这个方案首先要用于乳制品，因为许多市场研究资料都表明，牛奶价格和牛乳消费量是紧密相连的。在牛奶价格下
降时，牛奶消费量就相应地上升。这样我们差不多就可以明白指出，牛奶在某一较低市价时能够更多地售出多少升例①；并且，这种方法也作为其他商品提供了一项可靠的指数。

这项计划的基本观念，并不是像以往的那样从农业的观点出发来处理农业经济，而是从生产和富庶这一点着眼的。我们要使农业生产日益有利可图，同时又使消费价格水平保持在一般人民有能力购买这一点上。如果没有这一类的政策存在，农业产品的价格水平将成为恶性循环的一部分：农民种植越多，所得越少，他所能消费的也就越少；农民消费愈少，非农场商品购买量也就愈少；非农场商品销售量愈少，用来付给农民所要出售的东西的金钱也就愈少。不久以后被称为“布兰南计划”的这个计划，就是为了打破这个循环所设计出来的一幅蓝图。

布兰南指出，“农民的价格补贴办法，相当于劳工的最低工资、社会保险以及集体议价。”如同劳工一样，农民在谈判桌上是不平等的。他所付出的产品价格一般都是确定了的，这种价格往往都是由垄断者或制造商之间的默契而确定的。但个体农民的作物一旦上市就得不脱手，结果是他必须接受人们所给予的价格。我记得许多年前，小麦低到四角四分一蒲式耳②，而其他的时候又高到三块美元一蒲式耳。我知道玉蜀黍一蒲式耳的价格曾经在二角二分与二元八角八分美元之间波动，裸麦一蒲式耳的价格曾经在三角与四块美元之间波动，而棉花一磅的价格曾经波动于五分与四角之间。

陈腐的自由贸易理论家们会对我们都讲，答案就是把生产单位削减到最适宜生存的地步。但是这种理论是不人道的，因为这在人情上说，意味着家破人亡，把一家一家的田庄交给那不照面的地

① 一升约合 1.14 公升。——译者
② 一蒲式耳约等于 36 公升。——译者
主或公司組織的主人。任何名副其实的美国政府决不会让这种事情每隔二十年左右发生一次。农民的安全意識是美国生活基础的主要部分。

布兰南计划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价格补贴的重点从商品购买上转到生产支付上面。根据当时的法律条文规定——我很遗憾地说，现在还是这样规定——农产品价格不是用政府平价水平贷款就是由政府在公开市场上购买予以补贴。结果是，当价格低于国会所规定的保证标准时，大量的剩余农产品就积存在政府的金库中，而消费者都得不到过份供应的好处。这种办法产生一种螺旋式的后果：消费者由于价格较高购买较少；同样道理，农民受到鼓舞而生产更多；这种不平衡状态就更趋恶化了。

然而，根据布兰南计划，如果包括在计划内的某种产品价格降低到补贴水平以下，那么农民所接受的价格和补贴价格之间的差额则由政府直接补贴农民，而消费者却能享受到较低价格的好处。消费者因此会受到鼓舞而多多购买，而这种需求的增加将会使价格再度提高。根据这个办法，对农民的补贴就将变成自己补偿自己了。这句话更确切地说，就是对一般的福利将有所贡献。

我們建議实施价格补贴办法所采取的方式也有另外一种重要变化。正如我一向所认为的，农业价格补贴办法只有一个真正的理由，那就是要使普通农家能够维持一种相当美好的生活标准。但是，根据商品购买计划，巨额支付却是交给（现在仍然如此）大量经营土地的公司，它们显然成为大量生产的工厂。然而这些公司并不是那种需要政府支持以维持地位的农场主。这种农场经营在我们的经济中可能具有一定的地位，但是这种经营对于国家的生活和福利来说，还不能像千万家家庭的工作那样有着重大关系；因为他们常常累得“汗滴禾下土”。

布兰南计划中有一项规定，任何一个农场的生产超过某种限
額或在某种限额以上的则不付给生产补贴。这种限额定为一千八
百个生产单位，按 1949 年的价格计算，也就是，有关商品的价值
实际上达到两万美元左右的，就不给予生产补贴。

生产单位定为十蒲式耳的玉蜀黍，或现金相等的其他农作物。选
择玉蜀黍作为基本谷物的理由当然是很明显的：我们的农业经
济实质上就是玉蜀黍经济。这不仅是由于我们生产了大量玉蜀
黍，实际上我们全部的家畜和乳产品也都是依赖玉蜀黍作为主要
饲料的。

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把整个农业经济放在玉蜀黍上。这一点
可以拿史实来说明。美国每年产玉蜀黍约三十亿蒲式耳，我们所
有的家禽、蛋类、牛肉、猪肉、以及我们的一切牲畜生产都是依靠玉
蜀黍的。当然也有其他谷物饲料，但是所有我们的农村畜牧业生
产，从小鸡到健壮的牛马，主要是依靠玉蜀黍的。

以玉蜀黍来确定生产单位，其他一切需要补贴的农产品的关
系都可参照玉蜀黍的价格而予以稳定了。比方说，如果一千八百
个生产单位的玉蜀黍可以换得二万美元，那么，生产价值二万美元
的小麦或棉花或马铃薯的，也就是说一千八百个生产单位。一千八
百个生产单位是发给生产补贴金的最大限额。

小农协会的代表们抱怨说，这个限额太高了，那些需要最迫切
的小土地经营者却得不到这种提案中补贴办法的好处。但是，重
新分配财富并不是这项计划的目的。我需要一个能够为农场服务
的农业计划，而且这项计划的制対要避免使农业公司利用这一计
划牟利自肥。规定的单位限额，只实际应用于美国的农场经营主
中的 2％左右，但是他们所生产的却占全国农产品的总额的 25％
（以金元计算）。

布兰南部长向我提出警告说，这种有利于所谓家园式的农民
的建议，将会被指摘为含有政治意图而受到攻击。他说，对于农业
经济来说，这是一项新的和不寻常的建议，因而难免要被人批评过于激进，或者被当作一种政治姿态。但是，这并不要引起我的忧虑，因为我曾经仔细而谨慎地研究过这种规定。

“呃，查尔斯，”我说，“这是对的，是吗？”

布兰南回答说，他认为这的确是对的。

“那就把它保留在里面吧，”我对他说。

非常有趣，单位限额这一点几乎丝毫没有受到批评。我以为其中的道理是：这项计划的批评者们看到限额政策所依据的论点是驳不倒的。

这项建议刚刚公开发表，新闻记者立刻为之嚷然，许多作家在报纸上大加责难，认为布兰南计划含有社会主义的和政治性的意图。布兰南部长在1949年4月7日的众议院农业委员会和参议院农林委员会的联席听证会上解释了这个计划，此后，两院两院曾因这个计划引起许多激烈的争论。

我曾预料到这样的批评。对布兰南计划所发出的叫嚣，同美国医药协会对医疗保险计划所作的怒吼完全一样。美国农村联合会对价格补贴计划展开了攻击，这个联合会以阿兰·克林为主，代表享有特殊利益的农民。他们所持的理由，同私营公用事业公司反对政府将公有电力供应人民的一切努力，及美国医药协会反对有利于全民健康的计划所持的理由完全相同。

对于反布兰南计划的运动我并不介意，这个运动一年之中就花费了农村联合会会员们的五十万美元以上的美元。我知道农民们自己的愿望和需要是什么，因为我在1948年曾亲自与成千上万的农民谈过这个问题。我对于那些大批花钱的国会外的巨大实力派在华盛顿大谈农业、地产、电气、医药或任何其他问题，向来不感兴趣。他们并不能代表那些真正进行工作的人的意见。他们所代表的都是自私自利者的特殊利益，那些人支持这些实力派替他们进
行立法斗争。

我必须战胜的是对于像“社会化”、“社会主义”和“给与补贴”等这些可怕字眼所持的传统态度。许多年来，工业和商业一向以邮运许可证、运费率，以“保护”一词作掩饰而图谋特殊利益的关税，工厂建筑的租税特权等等形式，要求联邦政府予以津贴。在我们这个时代，农业依靠这一类的援助并不逊于工业、劳工或商业。平价办法努力的唯一目的是把农业提高到经济中的其他部门所享有的水平。

布兰南计划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它和每届民主党政府的政策是一致的，民主党政府一直试图通过价格补贴以及旨在加强和稳定这种基本职业所进行的其它种种努力，从而提高美国农村人口的生活标准。

反对党一直想使农民相信，他们正被置于各种管制之下。为了使这种平价立法得以贯彻，农民必定同意这些管制。罗斯福当政以来的每届选举中，共和党人一直试图诱导农民投票否决这些管制，这样价格就可以找到它自己的水平。如果农民最后接受了这种劝告，价格必将惨跌，而他们也必将回到1920年的光景。

我希望看到农民能够达到比罗斯福和我执政期间所享受到的更高的繁荣水平。这只有通过像布兰南部长所制定的这种积极计划，才能实现。不幸的是，国会竟拒绝把这项计划变成法律。
第十九章  
共产党的颠覆活动和政治迫害行为

我一生都在同偏见和狭隘进行斗争。
当我在年轻的时候，看到某些人对其他种族和宗教的态度感到不安。以后虽然年纪大了，但我始终不能理解，人们怎能忘记他们自己的自由是怎样得来的，而又是多么幸福。

有些人把人权法案看作理所当然的事，对于这种人，我看不下去。宪法修正案头十条中所包含的人权法案，是每一个美国人的自由的保障。

在法律面前，机会均等和法律平等，并不是老生常谈，或漂亮的词句。它们是一个曾经反抗专制政治的民族的活生生的成就。多少世代的人们为了逃避本国政府的压迫，跑到美国来。竟有些自称为美国人的人变成了压迫者，这件事始终使我迷惑不解。

制定宪法的老老少少都知道他们究竟在干什么。他们饱尝乔治三世君主专制的苦头。他们了解压迫和压迫的含义。

有人说，如果宪法里没有人权法案，他们就不拥护宪法，杰斐逊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位。

人权法案中最重要的保障之一，就是有权要求免于“自陷于罪”(1)。这是我们自由的基础的基础，而且在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中有明确规定。

(1) "自陷于罪"（self-incrimination）是美国法律中的一个术语。指于“自陷于罪”的权利，意指当事人对一切有可能使自己陷于罪责的问题，有权利拒绝回答。——译者
随着共产主义的出现，世界就开始有洗脑筋的暴行。根据这种方法，男男女女，无论有罪无罪，一律被迫作自我招供。

在警察国家中，任何人都免不了受迫害。被迫洗脑筋的人失去了希望，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的权利。

在美国，人人都得到人权法案的保障而不受迫害。

近年来，有人竟肆无忌惮地企图破坏人权法案中的某些保障，这使我惊讶不已。麦卡锡之流的做法，使人觉得只要要求享有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权利，那就是犯罪。麦卡锡甚至猖狂到这种地步，把那些想援用宪法权利的人说成是援用第五条修正案的共产党人。他曾指控说，这些见证人滥用第五条修正案。

事实上，滥用宪法修正案的并不是援用第五条修正案的人，而是把那些根据修正案要求权利的人说成是当然罪犯而实际上又无法证明这个人是犯罪的人。

当然，我们必须了解，出于政府的需要，在调查罪行或颠覆活动的时候，调查当局必不可少地从他们不能透露的方面获得情报。但是根据我们的诉讼程序，如果任何人被控犯罪，他就有权利同控告他的人对质。

如果政府不能在法庭上提出证人，那就不能提起公诉。如果法庭对一个人不能提起公诉，那么，他就不应受到参议院或众议院的委员会的迫害。这是我的理论。当然，每个政府都在尽最大努力清除每一个忠于祖国的工作人员。但是我们不应该用足以损害一个人名誉的方式来对待其余99.9%清白而诚实的公务员。当然，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希望这样做。

在联邦政府中供职的二百三十万人中，坏人和品质不好的人当然是有的。政府中的工作人员，也像其他的人一样，容易受到交际和引诱的影响，这种交际和引诱有时会毁掉其中的一些人。但是我不赞成用捕风捉影的罪名去控诉任何人，特别不赞成拿这种
罪名去控诉具备充当公务员的资格的人。

常常有人把道听途说的东西当作事实真相，并且以这样的方式利用这种东西来攻击政府工作人员，致使被害者无法自白。这正是共产党干的事，也是麦卡锡干的事，也是众议院的所谓非美活动委员会干的事。这样做同人权法案毫无相同之处。

剥夺个人根据宪法所享有的权利的任何举动，不论它采取什么方式，都是对人民自由的危害。

以国家监护者自居的人和顽固不化的人，居然对我们的学校、大学和教会进行攻击。有些州议会纷纷组织了“小型戴斯委员会”，调查的流行病也传染到了学校的董事会和市府的议会。

我不认为学校教员需要进行特别宣誓。

我以为在公立学校中，教师进行像其他公务人员那样的宣誓就职，声明拥护美国宪法和教师所居住的那一州的政府就够了。

教师不讨论或不讲授自由教育制度中应该讲授的题材，那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有讲授和学习的自由，教师讲授可以学习的任何事物，并不等于说教师是不忠诚的。知识是没有限制的。人要活到老学到老。

在教育中，我们不应该限制培育思想的机会。人的心智一定要有研究的自由才能得到进步，否则教育制度就没有用处了。如果人人都千篇一律，学的也完全是一成不变的老一套，结果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庸庸碌碌的民族。具有见解的人只能在教育自由的天地中表达那些见解。

如果我们像以往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统治之下或是像今天的俄国和西班牙那样，到了互相监视的地步，我们当初建立的那个共和国就变了样了。如果我们不信任我们的邻人和教导我们儿童的教师，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出了毛病。

人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当然使心怀叵测的人有可
乘之隙。但是如果你看见了坏人，还不知道他是坏人，那么，你就是咎由自取。

我认为美国并没有被人从内部颠覆的危险。

1930—1953年，我们没有利用暴力就实现了我们历史上空前的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这是根据宪法，由大多数人通过选票有条不紊地进行的，并没有削减个人的权利。当然，有些人是不喜欢这个巨大的社会变革的，尤其是那些希望美国有一个高等阶级和低等阶级的社会的人。但是，今天，一般人的生活比以往更好，国家也更富裕，而且不管怎么样，人民也不允许被分成阶级。

但是不管实现了什么样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真正的民主制度总是要保护少数人以防多数人的侵害的。

在联邦、州、县和市的各级政府中，除非掌政的人以保护人民的宪法权利为己任，否则你谁也不知道你首先就会看见三K党、黑衫党和像德意志同盟之类的团体，他们在采取直接行动或争夺政权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这时，人民将被控诉、被治罪而没有自白的机会。

三K党最猖獗的时候，侵犯人民的私宅，把人浑身涂上柏油、裹以羽毛，然后推逐出境。三K党是反天主教、反对犹太人和反对黑人的。我记得那时候在墨西哥的某些市镇中有这样的标语：“黑人，不许在这里让日光照到你们的身上。”

我们的有关自由的思想来自许多民族。这个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政府，是由原来我司海岸寻找自由的各族人民的理智、活力和思想所产生的；他们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国人、瑞典人、荷兰人、德国人、波兰人、犹太人、意大利人等等。

我们不警惕，不让我们的人权法案中所包含的那些自由，被那些煽动恐怖和破坏国家的人以及侵犯人权的人所破坏。

在影响到国家安全的危险存在之秋，政府当然要采取特别措
施，保护政府不受破坏和不忠诚的行为的危害。政府的工作，以及它的许多国防和外交机密，必须加以保护，不使落入外国奸细之手。

但是，我始终相信，如果我们要维护我们的共和国，使它同人权法案的精神一致，政府的最大责任就是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受不公正和专制所侵害。

我回忆起美国群众性的歇斯底里时期，这种歇斯底里导致了政治迫害事件。煽动家和不负责任的人总是利用危险时期，煽动违背理智和情感上的恐惧。于是种族的、宗教的和阶级的仇恨就沸腾起来了。在虚假的爱国主义和仇恨外国事物的名义下，给许多无辜的人扣上了罪名和提出控诉。

在这种群众性的激动时期，政府中的某些个人是他们特别选中的攻击对象。近年来，迹象在其他时期一样，有些罪名是由于政治斗争而造成的，有些则是由于雇员的损人利己行为所引起的，而受害者往往就是他们的上司。在这样的气氛下，如果发现个别的雇员有不忠诚的行为，于是煽动家就利用这一毫无牵连的偶然事件来加强歇斯底里，并且大有加罪于政府中所有雇员的趋势。在我们当中有些无可救药的偏激的人，只要他们发现一个罪犯，立刻就加罪整个民族、整个宗教团体、整个工会或整个政党，这种罪名满天飞的行为既损害政府的威信，也损害国家。

我认为，在政府中身负重责的人民，应该知道这些群众性歇斯底里时期的历史背景，以及引起歇斯底里的事件。

举例来说，当法国革命高潮，雅各宾派在法国掌权的时候，杰斐逊就被人控诉为雅各宾党人，因此也就是不忠于祖国的。1798年，国会通过了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因为他们认为法国的革命人士企图控制我们的政府。

要实施镇压叛乱法，就只好把人权法案扔出窗外。当人们的头脑清醒过来以后，大多数还有效的法案都被废除了。
后来在1919年，又有密契尔·帕麦尔以首席检查官的地位，滥用政府的权力侵害许多公民权利的时期。那是一桩骇人听闻的事，也是当时共产党的歇斯底里的阴谋。

在其他歇斯底里时期，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是在完全违反人权法案中的各项保障的其他借口下进行的。但是，我们毕竟从这些时期中清醒过来了。而且我们今后也必然会从每一次的旧病复发中清醒过来，因为我们有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有自由的教育制度，同时也因为我们自己选举中的投票权给予了我国人民控制和更换政府的权利。在我们的歇斯底里发作的时候，就像有人在大庭广众前发了精神病一样，我们清醒以后总是感到非常羞愧，作为一个国家，在我们恢复理智以后也是这样。

这正是我们不信任我国政府会被共产党从内部破坏或推翻的原因。政府的保安机关完全能够不动声色而有效地对付那些潜入政府中的共产党员，而不必求助于盖世太保的手段。

保安的工作是高度专门化的工作，需要熟练的技术人员、专家和经常的警惕。保安工作往往需要秘密行动，而不是公开的措施，因为公开的宣传事实上对保安工作是有害的。

一直到1938年，我们才承认苏联。我认为，罗斯福总统在外交上承认俄国是正确的。他在承认苏联时，曾提出一些苏联应当履行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俄国同意停止在美国进行的革命煽动或共产主义宣传的一切活动。

我们很快就发现俄国并没有遵守这个协定，颠覆性宣传并没有停止。苏联继续利用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作为推行革命政策的工具和战线，推诿说它对第三国际的活动无法控制。我知道，美国也有一些政客，在企图破坏协定时，也说无法控制他们的党徒。

在这个时期，美国人民正在经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和
财政危机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我们有些青年和知识分子，似乎被俄国以共产主义为基础的建设新经济的实验所迷惑。这些青年和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不久就发现他们是受了欺骗，以为俄国的确在努力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以为这种制度会消灭压迫、失业、饥饿和战争。他们很快就发现，一群残酷而手段巧妙的狂热者正在制造一种大骗局，他们用类似国家宗教的一切装饰建立了独裁政体。这种新政府给俄国带来的不是什么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而只是另一类型的独裁制度。个人在永久的奴役下变成了国家的奴隶，而且，正像俄国人自己不久发现的，压迫、失业、饥饿和战争并没有被消灭。

苏联的权力主要来自千百万被奴役的劳工和丰富的资源，它集中力量建立庞大的军事机器。这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威胁，因为这是巨大的军事力量和革命力量的结合，目的是通过颠覆、革命阴谋和第五纵队来征服世界。

负责领导我国政府的保安工作的人，都充分警惕和了解共产主义危险的新威胁。

在同一时期，法西斯主义开始在欧洲发展起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利用抵制共产党的威胁作为夺取权力的手段，开始威胁和平。由于这种国际紧张局势的结果，共产党和法西斯的活动和阴谋就在我们国内加强了。

为了制止颠覆活动的蔓延，政府有必要制订特殊的法律。

国会于1939年3月21日通过了哈奇法案，根据这个法案，政府中的任何雇员参加以推翻美国政府宪法形式为目的的政党都是非法的。哈奇法案规定，调查的职责属于联邦调查局。

在这种国际恐怖和阴谋的气氛下，某些煽惑家企图利用这种局势，作为政治资本是十分自然的事。1939年，在我当第一任参议员任期快要届满的时候，得克萨斯州的众议员马丁·戴斯开始大
声疾呼说政府中有共产党。他提出了许多粗暴的控诉，以后他成了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我在参议院的议席上曾斥责他进行间谍的方式本身就是非非的。出席该委员会的证人常常受到威胁和诽告，既没有机会知道他们被控罪名的来源，也没有机会证明被控罪名不符。事实上，人民是由国会的委员会审判，而不是由法院审判。这是滥用国会的调查权达到危险的地步，这种权力原来仅仅是为了帮助制订法律的。戴斯委员会采取的方法开了一个先例，从此以后这种做法就传遍了整个国会。

我记得，副总统加纳——乌发尔德\(^1\) 的哲人——当时就对我说，“对美国政治的前途，戴斯委员会的影响比国会任何其他委员会都大。”当时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不相信，人民会长期被这类肆意攻击的指控迷惑住，也不会长期受这种处理如此重要问题的不合理的程序的影响。可是，不幸的是杰克·加纳的预言应验了，而我是错了。众议员戴斯以及他在国会调查中的继承人所用的方法，牺牲了美国公正无私的作风的部分品质。

1939年，欧洲继二迭三地发生了危机。9月间欧洲爆发了战争，法西斯党徒和共产党人虽然据说有不共戴天之仇，但希特勒和斯大林却违反常情地签订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作为战争的序幕，同意两国共同瓜分波兰。这使西方国家大为震惊。

当俄国出兵波兰直达寇松线，随后又侵入芬兰的时候，美国的舆论对共产党极为愤怒，激昂的程度超过共产党统治俄国以来的任何时期。

我们的政府用哈奇法案武装了自己，现在警惕更提高了。

俄国和德国对波兰的海盗式的瓜分产生了历史上最有戏剧性的讽刺剧——德国进攻俄国。希特勒为了统治世界，不顾一切。

---

\(^1\) 乌发尔德(Uvalde)为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县。——译者
事前不动声色，突然掉转矛头来进攻苏联。于是世界的均势再一
次改变了。随着均势的改变，我们也改变了对俄国的态度。

出于本身的需要，这时俄国不得不随同英法两国对纳粹作战。
丘吉尔立刻把俄国当作为共同事业而奋战的同盟国来欢迎它；其
他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作战的国家也同丘吉尔一样欢迎俄国为同
盟者。

由于希特勒的危险越来越令人震惊，美国人民这时就更加以
同情的态度来对待俄国了。

俄国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工业资源很不充裕，难以抵抗高度机
械化和迅速挺进的德国军队。斯大林竭力呼吁我们援助他们，要
求供应原料、粮食、机器以及军事和运输装备。我们的政府乐于给
予帮助。

正是在我们对俄国的同情逐渐增加的时候，许多极端分子和
亲俄的拥护者开始鼓动对苏联进行全面援助。对于俄国既然有这样
强烈的感情，负责我国安全工作的人就有责任采取更多的防范措
施，来保护我政府和国家的重大利益。

俄国人以典型的共产党的两面手法利用了这种同情，搅乱了
许多方面的同情者的心情，又欺骗了许多别人。

当时，我们有些最爱国的公民，包括军事和政治的领导人
内都相信，在建立世界的持久和平上俄国的支持是可以信赖得过
的。

随后就发生了日本突袭珍珠港的卑鄙事件以及希特勒和墨索
里尼向我们宣战，这一切最后把我们拖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俄
国人现在成了我们的积极盟国，每个俄国士兵都在为俄国打仗，正
如同美国人很快就要为俄国人在二战中一样。

在这次反对最强大、最残酷的敌人，争取生存的共同作战中，
我们实行了一项庞大的计划，把我们能够拿出来的一切物资都供
俄国。我们开始牺牲我们自己的需要，把大量的食物供给他们。我们展开了广泛的海空计划，并且在努力突破德国潜艇封锁的时候，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俄国人的生存虽然需要依靠我们的援助，但是他们却表现了一些令人捉摸不定的现象。他们不顾我们的军队交换情报，不让我们的飞机在他们的后方降落，即使这些飞机是送交给他们的。也是这样，他们要求把飞机和其他物资运往北部的港口，或者送到高加索以南的伊朗基地。

当胜利的浪潮开始上涨时，俄国人的态度也就更加明显了，俄国人在沿他们的战线追击德国人。

但是，我们还是继续援助俄国，竭尽全力同他们相处。我们这样做有几个原因。同俄国人的交手的敌人每增多一个，同我们对垒的敌人就减少一个。太平洋战争的胜利还很渺茫，我们需要俄国人在那里帮助我们。如果没有俄国人的参加，世界和平就不可能实现。

正当我们努力同俄国人的合作的时候，我们的安全和安全的专职人员也都没有放松警惕。他们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绝不给任何值得怀疑的人以可乘之隙。

从1940年开始，罗斯福总统下令由联邦调查局、海军情报局和陆军情报局成立一个组织，负责对有关颠覆、间谍和破坏活动等方面的调查工作。

1942年罗斯福总统发布一项战时指令，授权文官委员会停止忠诚受到合理怀疑的任何人在政府工作。

1943年2月5日罗斯福总统颁布了第九三零零号行政命令。

根据这个命令，任命了由各部组成的五人委员会，被控参加颠覆活动的雇员的问题应采取的行动，进行考虑并向政府各部提出建议。陆军部和海军部不在此例。这两个部有自己的调查机构，但也可以征询五人委员会的意见。
五人委员会有权接受联邦调查局根据向他们提出的控诉所作的一切完备的调查报告，并对各部门和各机构就应当采取的程序和行动提出建议。反过来，委员会得向联邦调查局报告各部门所采取的行动。

这道行政命令明确规定，五人委员会不得采取任何动用到限制各部门和各机构根据法律停止任何雇员职务的权限；又规定，如果司法部认为立即逮捕和把案件移交给法院审理的措施是正当的，该委员会也不得阻止这种措施。

因此，从1942年以来，政府就在考核政府雇员的忠诚。由于这个制度出现缺点，曾经过修改和改进，阿瑟·弗莱明领导下的文官委员会所进行的调查工作已由联邦调查局加以扩大。

1946年，我下令彻底研究有关政府调查忠诚的程序，为的是要加强安全计划而又不致违反人权法案。

1946年11月25日，我颁布了第九八零六号行政命令，设立总统临时雇员忠诚委员会。我命令这个委员会：第一，研究对于政府雇员人员或向政府申请职业人员进行调查时的标准和程序；第二，研究关于不忠诚或颠覆分子的撤换或撤职的条件；第三，对现行的关于忠诚调查的立正和行政程序的改进办法提出建议；第四，明确忠诚案件中的行政责任，确定忠诚标准，以保障政府不致雇用不忠诚或颠覆分子；第五，拟定诉讼程序标准，保证被控告的人受到公平的审讯。

我任命下列人员作为各机构的代表参加委员会：
德维尔·瓦尼希，司法部部长特别助理（主席）；
约翰·普里弗伊，国务院负责行政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
爱德华·弗莱，财政部助理部长；
肯尼思·罗亚耳，陆军部副部长；
约翰·沙利文，海军部副部长；

324
哈里·密契尔，文官委员会主席。

1947 年 3 月 20 日，该委员会向我呈递报告。报告指出，从历史上来说，文官委员会是不准调查雇员或未来雇员的政治或宗教的主张或来历的，而且在非政党的公务员中，这一点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直到 1939 年哈奇法案通过以后，才肯定“有危害性的政治活动”的范围是可以正式加以禁止或侦查出来的。接着委员会的报告追溯了 1939 年以来旨在取缔政府工作中不忠分子的立法和行政活动的发展情况。

该委员会根据对政府各机构的广泛调查，作出结论说，事实上，行政方面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步骤并不一致。判断的标准同办理程序一样，也因机构的不同而不同。至于究竟哪一种计划能更好地达到目的，意见也有很大的分歧。

该委员会完全同意我们需要有某种计划来打击政府内部的破坏活动。他们听取了政府各种情报和安全机构的证言，这些机构向委员会明显提出了国际的形势，以及对我国政府进行渗透活动的可能尝试。关于后一点，委员会报告说，它虽然相信“雇用不忠诚或颠覆分子对于我国的政府制度并不仅仅是一种凭空设想出来的威胁，但是它（委员会）根据各方提供的事实，还丝毫不能肯定地宣称，这种威胁的作用究竟是多么深远。”

该委员会宣称它认识到，在有关雇员忠诚的整个问题上，歇斯底里、感情用事和不负责任的想法都易于造成危害，我们需要理智的、现实的和实事求是的处理方式。委员会建议各部门和各机构应制定自己的审查忠诚的程序，但审查的最低标准应由行政命令加以规定。凡是在任何部或机构任职的人都要经过忠诚调查，在大多数情况下，调查应由文官委员会执行。目前一切雇员的姓名要与联邦调查局的卷宗核对一下，因为该局的资料对它们忠诚的情况也许有相反的反映。
委员会建议，决定忠诚案件的程序，应包括各机构内的忠诚委员会和交官委员会内的忠诚审查委员会。这个忠诚审查委员会在调查雇员忠诚的范围内应该作为各机构政策的协调者，作为总统和各机构在这些问题上的顾问，同时又作为各机构忠诚委员会处理案件的上诉委员会，但根据法律有权立即作出撤销处分的机构不在此例。

被控为不忠诚的雇员，应该有权得到书面的控诉通知和受到行政审讯，包括由本人自己选择的辩护人代表出席的权利。

委员会建议，“在忠诚案件中，拒绝任用或者撤除任用的基本标准应该是：根据一切证据，具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牵涉在案件中的人对于美国政府是不忠诚的。”接着委员会又列举了许多可以作出这种决定的因素。

我非常仔细地研究了委员会的报告。一般说来，我认为委员会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公正合理的。在少数问题上，我觉得委员会的意见还可以说得更具体些。在颁布已经参考这些建议的行政命令以前，这些部分都按照我的愿望做了修正。例如委员会建议，未经许可有意地泄露机密资料，可以构成不忠诚的根据之一；我想到这容易被人滥用，于是我要求增加一句话，大意是这一条款只有在情节证明不忠于美国的时候才适用。在另外一条中，司法部长得奉命开列颠覆性团体的名单，我补充了一个条件，即任何团体未经事先调查，并正式肯定它的颠覆性质以前，不得列入这种名单。

我在1947年3月21日颁布的行政命令（第九八三五号）中，曾强调了两个事实，我认为这两个事实应该贯彻到忠诚调查计划中去：

（一）虽然绝大多数政府雇员的忠诚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政府工作中出现任何不忠诚或颠覆分子，对于我们民主程序就
构成了威胁。

（二）美国政府必须获得最大限度保障，以防不忠于祖国的人渗透到政府雇员的队伍中去，同时对于政府内忠诚的雇员也应当给予同样的保障，以防他们受到毫无根据的不忠诚的控诉。

我觉得，通过这个新的行政命令，我们已加强了防范颠覆性渗透的措施。同时我们也设立了机构，保护个人不受谣言或捕风捉影的传闻的诬告。

我发现这个忠诚调查计划在实行时有很多缺点。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办法。但总的说来，这个计划曾给予任何被控的人以当时舆论倾向许可的公正的机会，使他的案情得到裁决。

根据1947年的行政命令，如果有人被控隶属颠覆性团体或者从事可以称为颠覆性或不忠诚的活动，初审就由忠诚委员会执行，并且许可他的辩护人出席。

被告要收到一份被控的罪行摘要，凡认为属于机密的东西在摘要中都被删掉了。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原告愿意出面的话，被告可以要求同原告对质或知道谁是控告者。

被告首先要在由部长任命的部内的忠诚委员会里出庭。

委员会的报告和决定要送部长。部长可以批准委员会的建议，也可加以拒绝。但是，无论如何，如果被告是正式的文官就有权向忠诚审查委员会上诉，如果他仅仅是临时工作人员则有权向区委员会上诉。

区委员会是文官委员会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如果被告不满意区委员会的决定，他有权再向忠诚审查委员会上诉。忠诚审查委员会是最高级的机构，委员会的委员都由我任命。

我选拔这个审查委员会的二十三个委员，是根据对他们才能的了解和各种职业的代表性。他们是行政人员、律师、商人和各行业中的领导人。
塞思·理查逊被任命领导这个委员会。他是一位知名的保守
派共和党人，在进行工作时与司法部密切合作。

忠诚调查计划的缺点之一，是一个人只要经忠诚委员会或最
后经忠诚审查委员会证明无罪以后，有关这个人的一切资料都保
存在卷宗内。经证明无罪的雇员每调换一次工作，他的卷宗就要
审查一次，因此他就不得不一再对同样的罪名进行答辩。而实际
上，他要屡次三番地被证明无罪。这是与美国公正无私的传统不
相符的。这个缺点，我们在开始时并没有认识的。

1947年年底和1948年，共和党控制了第八十届国会，有些众
议院委员会的主席，提出议案，要使国会参加忠诚调查计划的执行
工作。有一次，众议院行政部门经费委员会打算通过拨款法案的
追加条款，获悉文官委员会中关于政府雇员的秘密报告。

文官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报告，都包括许多毫无根据、
未经调查和未经鉴定的控告，决不打算拿来公开利用或传播的。
有关任何雇员的秘密报告，必然包含根据怀疑、谣言、偏见和恶意
而写下的项目；如果发表，就会损害许多无辜人民的名誉和前途。

1948年3月28日，众议院行政部门经费委员会提出联合决议
案，要求政府各部门对国会中需要情报的委员会，提供它们已有的
情报，不论这些情报是机密的或者不是机密的。

这个委员会在要求通过这项决议案的时候说，委员会需要这
条法律，是因为我曾经令行政部门保持忠诚调查计划卷宗内机密
情报的秘密。

我在给各部的命令中宣布，

“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福利，有必要保持情报的机密性质和
提供情报的来源，同时有必要保障政府人员不受毫无根据或已证
明并不真实的谣言到处传播的害处，这种秘密情报是必需的。”

因此我下令各部把国会对于这种情报的要求，送交总统办公
厅，“以便总统就具体案件作符合公共利益的答复”。

1948 年 1 月和 2 月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行动充分说明了颁布这一命令的根据，那时委员会正在调查国务院的安全程序。该委员会是在考虑国务院要求拨款的过程中进行这种调查的。

国务院对委员会的调查员给予充分合作，甚至到了允许他们检查有关个人的秘密卷宗的资料和作摘要的地步。这些卷宗包括并无事实根据的传闻和怀疑，以及已被证明的事实，并且详尽地说明调查员在每一案件上的进展。

委员会完全不顾他们保障这些卷宗秘密的义务，把这些卷宗的摘录做出公开记录，只是没有公布姓名和代号罢了。这种程序的危险是，帮助了真正进行颠覆活动的人了解哪些人正在受监视，政府了解他们的情况。这也会损害无辜的雇员，使他们由于公布丁的记录很容易被其他雇员认出来。

通过这种程序，委员会把整个国务院置于怀疑之下，因为这样作就好像对在一间房里的一群人说，“你们中间有个骗子”，但又没有把罪犯指出来，也没有拿出证据证明哪些罪行。结果是那间房里的每个人都是嫌疑人，直到问题澄清为止。这就是煽惑家在公共言论中所用的伎俩，这些言论引起人民对政府中的一个部门进行不公允的谴责。国会的委员会，除了特殊情况外，不应该未经鉴定的私人秘密情报，是有充足理由的。

1949 年国会开始在各种拨款法案内包括附带条款授权各部会首长根据安全的理由辞退雇员，雇员不得上诉。这种权力首先用于国务院和国防部。

这项立法授权给一个部的部长在安全案件中可以自行裁决，根据任何理由辞退雇员，而不必提出“安全”以外的任何说明。事实上，国会正企图取消我在 1947 年行政命令中所规定的有关个人权利的保障办法，因为这样一来，所要做的只是把忠诚案件说成是
安全案件，再也无需在部外进行检查了。

关于这种权力的运用，大多数部门的首长都是非常审慎的。但是白宫也收到了某些武断处理个别案件的报告，在这些案件中用毫不足取的借口，而以安全为由把人辞退。

有些报告指出，根据伪证把某些人辞掉了。这些报告使我深感不安，因为我急于看到，任何个人都免于遭到不公平的处理，个人权利不致被无故剥夺。

1950年8月8日，我向国会递交一份咨文，建议弥补有关雇员忠诚和安全法律中的某些缺点的法律。这是咨文的一部分：

“三年多以前，行政部门修订和完善了处理有关雇员忠诚和安全问题的程序。这些新的程序，在保障政府不致雇用不忠诚分子和雇用后对于安全构成危险的人这一点上，证明是有效的。⋯⋯

“最近几年以来，我们根据现行的国内安全法，在法院中成功地控诉了几百起案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应用这些法律方面获得了很多经验。我们在现行的法令中也发现了一些缺点，其中有些是关系很小的，也有些是非常重要的。鉴于当前的局面，弥补这些缺点就成了很重要的事。因此，我现在建议国会把本届会议休会以前，制订某些有关这一方面的法律。”

向国会提出的第一项建议，就是弥补有关间谍、外国奸细的登记和国防设备的现行法律中的缺点。这一点，应把有关间谍法律中的某些条文加以明确，作出更具体的规定；应把有关限制和平时期间谍活动的法令的三年期限加以延长；应使接受外国政府或政党命令进行间谍或颠覆性活动的人根据外国间谍登记法案进行登记；授予总统更广泛的权力，制订有关保护军事基地和其他国防设备的安全规定。

第二，我建议国会制订法律，授权司法部长对于应予驱逐出境的外国人进行监督，要求他们定期报告他们的行踪和活动，凡有违
反者即应受刑事处分。

我提醒国会,我一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态度是:
“我决心使美国安全。我也同样有决心使我们保持我国传统的自由。……”

但是,国会处在感情激动的气氛中,它宁肯跟那些主张采取极端措施的人一道走。

1950年9月23日,国会制订了颠覆活动管制法案。这一法案在二十四小时内就推翻了我的否决而获得通过。我否决这一议案,是因为司法部、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都通知我,这个法案会严重地损害它们所负责进行的安全和情报工作。

我也相信,这个法案给予政府官员很大的权力,使他们可以为难我们的一切公民,使他们不能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政府对于自由发表意见加以窒息,是朝权威主义迈进了一大步。关于美国的自由,再也没有比这一句家喻户晓的说法更能说明它的基本原则,即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我们惩罚人是为了他们所犯的罪行,而决不是为了他们所持的意见。

这个法案的不良后果很快显示出来了。共产党现在都匆匆转入地下。他们都出了很多对策,例如改名换姓、化装、改行、迁移等,这就增加了我们的侦探追踪他们的困难。

但是这一法案既已成了我国的法律,于是我宣布颠覆活动控制委员会,任命塞思·里查逊为主席。我又任命另一位共和党人——海勒姆·宾加姆——代替他任忠诚审查委员会的主席。他过去是康涅狄格州参议员。

美国的安全计划被煽惑家和耸人听闻的报纸恶意地用来恐吓和迷惑美国人民,这真是我们时代中的一个悲剧。

像麦卡锡、麦卡伦、詹纳尔、帕纳耳·托马斯、维耳德之流的人进行了疯狂的攻击,使人民对政府中大多数雇员的忠诚都发生了
怀疑。

如果同样的方法和标准也应用在私人的机构中，例如应用在银行中，那么，发现一两个不诚实的出纳或会计，就连银行中所有的雇员和高级职员也都受到谴责。显然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如果所有的银行都受到这样的攻击，结果必然会人民对我们的银行制度失去信心，使银行和国家都受到严重的损失。

因此，在政府驱逐少数不良雇员的时候，不管怎么说，也不应该用这件事来煽动对政府中所有人员的怀疑。更应该受到指责的是，煽惑家根据捏造的罪名和道听途说对不喜欢的人进行非法的迫害。由于一再散播这些纯属于虚假的罪名和控诉，人机关法和保障的这些人的神圣权利就遭到了蹂躏，或不断受到威胁。

我们作为世界的强国，政府雇员的数目也随之增加，就像增加了私人商业的雇员一样，同时这也使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工作推广到全世界去。我们的政府成了全国最大的雇主。

如果政府要对国家和人民尽职尽责，它就必须保持高昂的士气，同时也要维持高水平的能力。

煽惑家对政府雇员的忠诚的攻击，大大地阻碍了政府执行任务的效率。很多优秀的人宁可离开政府，而不愿意在可能遭到损害的气氛下工作。这种无情的攻击使吸引优秀人士参加政府工作的事业碰到加倍的困难。

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政府的重要雇员必然会失去思想瘫痪的趋势。他们的职责是发挥诚实的判断，但是他们不敢这样，因为一旦气氛和环境改变了，那些同他们意见不一致的人也许会控诉他们不忠诚。我们的国家受不了而也不应当允许这种思想上的控制。

早在1951年我就请求尼米兹海军上将主持一个由一批重要公民组成的委员会，对整个忠诚调查计划进行全面而彻底的研究。
要求委员会建议，政府需要做什么，才能对个人的权利提供更大的保障，同时对政府的安全又能保持密切的监督。

我选择尼米兹海军上将担任这个工作，是因为我以前同他讨论的时候，他对于充分保护每个人的权力的需要表示得非常热情。他不仅是我们在太平洋上最伟大的海军战略家和人民的总率领，而且也是一位虔诚的爱国者，不管给予什么任务他都随时准备响应祖国的号召。他比国内任何人都更了解安全和忠诚这类问题。

我任命下列人士同尼米兹海军上将一道参加国内安全和个人权利委员会：

俄亥俄州杨兹敦副主教埃梅特·华尔希博士；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州主教卡尔·布洛克博士；首都华盛顿的安·斯特劳斯女士；纽约的鲁塞尔·勒芬韦尔；纽约的查尔斯·西弗先生；首都华盛顿的约翰·达纳赫议员；俄亥俄州阿克朗的小哈维·费尔斯通先生；以及首都华盛顿的威廉·利海先生。

1951年1月23日，我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委员会的任命，声明中有一段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特别关怀的是共产帝国主义势力的活动对我国政府和国民生活所造成的威胁……同时，我们也关怀为保证不受这些危险而采取的措施，会侵犯我们宪法所保障的自由，而窒息自由的气氛，长期以来我们就在这种自由的气氛中表达我们的思想和处理日常事务。……”

我希望说清楚，我决不容忍受政党政治的干涉：“为了使这些问题不至于被卷入党派斗争的漩涡，我是在不分党派的基础上任命这个由著名的公民组成的委员会的。我相信，我国人民将从他们获得有关这类问题的权威性的决定，这些决定是根据事实，从国家的利益出发而拟定的，并不考虑政党的利益问题。”
在我遇见尼米兹海军上将的时候，曾告诉他，眼看迫害政府雇员的狂热一天天在增加，我感到非常不安。我认为迫切需要的是，关于政府工作人员的一套公民权利计划。如果我对这种大吵大闹屈服，同意随便把受攻击的人开除掉，我可以使许多批评我的人无话可说，但是这种作法的代价却是毁掉许多无辜的人的名誉。

当尼米兹海军上将开始为委员会安排职员的时候，他发现有些法令对于雇用人员规定了很严厉的限制。例如，法令限制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在离开委员会以后的两年内，不得从事他的专业活动。这些法令也缩减了我委派的商人的商业活动。国会最近的好几件事中都提出了所谓利益冲突的限制，尼米兹海军上将要求在这一事件中不援用这些限制，使委员会可以招募能够担任该会高级职务的工作人员。

众议员华尔特为了这个目的提出了一项议案，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这项议案作出了同意的报告，而于 1951 年 3 月 15 日在众议院通过。这种措施以后就送交参议院，然后又转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审查。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是参议员麦卡伦，他阻挠议案的通过和制订不良的法案的记录是只有少数反对分子才能和他媲美的，这个议案就在他领导下的委员会中搁浅了。麦卡伦的这个阻挠行动扼杀了这个议案，使尼米兹委员会不能在不分党派的基础上公正地研究政府的忠诚—安全计划。

这是麦卡伦企图阻碍行政部门的计划，也是鼓励国会中煽惑家的另一步骤。这使得尼米兹委员会一事无成，只好全体辞职。

1951 年 10 月 26 日，我写信给尼米兹海军上将说：“既然国会没有完成国内安全和个人权利委员会为有效行使职权所必需的立法程序就宣告休会，我就只好勉强地决定接受委
員們的評定。⋯⋯

“我原来指望，国会会像我这样迫不及待地要确保我们为维护政府部門安全而采取的措施能顺利推行。我原来指望，国会会像我这样迫切地在我们急于扑灭顛覆活動的同时，确保人权法案不受损害。⋯⋯”

早在1951年6月6日，顛覆活動控制委员会主席塞思・理查遜因健康关系被迫提出辞呈。在他的辞职书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医生劝告我，我必須立即住院进行广泛、緊急的外科診治。

“顛覆活動控制委員会，目前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正进行一次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审讯。我认为无限制地继续让我担任不起作用的委员和主席，对国家，对自己都沒有好处。⋯⋯

“我是一个生来就好争論的共和党员，我衷心感謝您对我的信任和推重，给我从事重要的非党派工作的机会。这项工作不含任何政治动机，直接影响全国忠诚調查这一重要领域。”

在答复理查遜时，我写道：“自从你1947年11月11日在政府中复职，担任忠诚审查委员会主席以来，你一直在保卫我們的安全，免遭顛覆活動的毒手，并保护我們立宪政府的传统。

“你给联邦忠诚調查计划带来了公平而慎重的判断，而且在你的领导下，消灭了政府中的犯罪分子，同时又始终保护那些无辜的人。你在忠诚审查委员会的卓越成就，使我在去年10月任命你出任顛覆活動控制委员会的委员兼主席。

“你把自己說成是‘一个生来就好争論的共和党员’，我听了不禁暗自失笑。我要求你担任的职务需要具有正直、謹慎、正确的判断以及超然而客观地观察各种极其复杂的问题的能力。这些品质你完全具备。最难能可貴的是你遇事沉着⋯⋯”

由于參議院司法委员会的拖延以及沒有采取措施使尼米茲委員会展开工作，使我感到焦慮，因而我決定把这个計劃的研究工作
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办。

1951年7月14日，我把下面的信交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小詹姆斯•累伊：

“亲爱的累伊先生：

“最近我听到了一些关于执行现行法律规定的情况的报告，这些法律授权各部门负责人，根据对安全可能造成危害的理由，解雇政府的职员，或拒绝申请就业的人参加政府工作。我听了这些报告以后非常关切。

“如果这些法律的规定能达到保护政府安全的目的，而又不致非法地侵犯个人权利，那么，就要运用最大的智慧和果敢来执行这些决定。我们决不能忘记，政府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而政府的一项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在本身的职务范围内去维护这些权利。

“目前的情况对完善的行政管理是不利的。在有关的各个部门和机构中，都没有可供遵循的统一的标准和程序，此外也没有像在政府雇员忠诚调查计划中所规定的那样，制定出中央检查的规则。这是我要求国内安全和人权委员会承担的工作范围内的一个问题，但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没有就国内安全和人权委员会委员和职员不受利益冲突的法令约束的立法情况提出报告，因而后者的工作也就拖延下来。

“我认为，目前牵涉在政府雇员安全计划的实施中的问题这样严重，以致不应再继续等待国内安全和人权委员会，而应对这个问题作初步的考虑。因此，我希望国家安全委员会能利用各部问国内安全委员会、协同文官委员会对此项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调查，并向我建议需要怎样进行更动。我特别希望考虑应否规定统一的标准和程序，以及应否规定各部和各机构内部作出的
决定由中央进行检查。

“在国内安全和个人权利委员会恢复工作时，当然会有助于按照这种要求去完成的工作。

“我正要求各有关部门和机构对此项研究工作给予充分合作。

“你的诚挚的，

“哈里·杜鲁门”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最后这项工作由各部间国内安全委员会所完成，这个委员会由各有关部门担任保安工作的官员和技术人员组成，包括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国务院的保安官员和国防部的一位将军。

1952年4月29日，我接到该委员会的报告，这是一份广泛而详尽的研究报告。它提出了许多关于改进程序的建议，并指出所有为了安全而对雇员进行的检查应有统一的标准。另外还建议文官委员会对有关机构所作的关于危及安全案件的决定进行检查。

1952年8月8日，我在仔细考虑这个报告之后，曾写信给文官委员会的主席罗伯特·腊姆斯佩克表明我的最后意见，信中有一段我这样写道：

“现在最理想的办法是把这些忠诚、安全和称职等计划合并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消灭目前显然存在的重叠和混乱的现象。我的理解是，在职雇员忠诚调查计划已非常完善，因此完成这项工作的障碍一定不大，或根本没有障碍。……

“……然而，与此同时，已具备雇员安全调查计划的各部门和各机构，应重新检查一下它们的程序，并用适当的程序来辅助它，使所有受安全调查计划审查的人得到保护。”

简单说来，我要明确说明，要是一个雇员因不称职而被解雇（而不是由于非法活动），则不应给它打上不忠诚或危险分子的烙
这是那些信口开河的批评家和煽动家对许多由于正常原因而离职，或被政府辞退的人的一种恶毒歪曲。

政府的忠诚调查计划是一个巨大的事业，需要很多政府重要官员拿出很多时间和做许多工作。协助这个计划的委员会的成员有两党的领袖人物。他们参加会议，审查计划的执行情况和提出变革的建议。

世界共产主义及其侵略是一个全国性的，而不是某一政党的问题。我感到遗憾的是，在国内搜查共产党而在全世界击退他们的威胁这一工作，竟成了政治问题。

在反共问题上，国会和政府之间，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根本不应该有竞争。我也从来没有把它当做政治问题来看。事实上，我任命有声望的共和党人领导忠诚调查计划。我已尽到我的责任来防止它变成政治问题。

对于防范共产党的代理人和受共产党利用的人所实施的渗透和背叛的新伎俩，我们一贯保持警惕。但是，我们那些相信我们国家制度的人决不是因为恐惧或害怕这些敌人能够成功才采取这种措施的。

美国是苏联间谍活动的主要目标，而不是它唯一的目标。由于我们一向和其它受共产帝国主义威胁的国家进行合作，所以我们要的警惕必须越过我们的国境线。

我们对外政策的目的是保卫和平，我们到处用许多方法去反击共产党的威胁。我们力图建立一个自由世界，从而使人类有希望摆脱饥饿、疾病、剥削和帝国主义扩张等等灾难。

有些人错误地称我们的外交政策为遏制政策。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的目的要广泛得多。我们正在为一个统一、自由和繁荣的世界而努力。
然而，共产党人却另有一套想法，他们企图统治世界。他们利用叛变、渗透和颠覆的手段已掌握了千百万无依无靠的人民。我们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在历史的最重要关头阻挡并制止了这种倾向，而且，我们的盟国一道，挽救了西方的文明。

那些政治煽动家、狂人和职业爱国者，有了向美国人民制造恐怖的机会，他们发动了一个恶毒的文字攻势。在他们的谩骂和攻击下没有一个政府官员是干净的。

很多善良的人民实际上都相信共产党统治我们的危险已迫在眉睫，而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的政府也到处被共产党人所渗透。

这个攻势的范围如此广泛，似乎每个人都免不了要受攻击。这是我们的这个时代的悲剧和耻辱。

我从来没有对美国人的敏锐的辨别力丧失信心。我知道这种歇斯底里的时代终会结束的，正像我们历史上的其他不愉快的时代一样。

以往，我们有过和目前正在经历的情况相似的局面，过去有过萨拉姆事件、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反共党、“无所知党”（反天主教的组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三K党”、1884年的“罗马、天主教和叛乱”以及1920年、1924年和1928年的三K党。1928年阿尔·史密斯被反天主教、反犹太人和反对人的三K党所打垮。

我们的国家有理由为我们的保安机构而自豪，并信赖他们。在战争期间，它几乎使我们完全没有受到破坏和间谍活动的影响。所有被我们逮捕的外国间谍都是由我们的情报机关搜出来的，凡是被怀疑为间谍或颠覆分子的人也都受到上述机构的无时或瞬的监视。

我们有些秘密是由善良的公民无意中泄漏出去的，这倒是有讽刺意味的事。

许多影响国家安全的危险的泄密，是从新闻报道中透露出去
的，而这些报道的人的忠诚和爱国心却是没有问题的。

例如，某位专栏作家曾给一个全国性的期刊写过文章，泄露了我国原子装备的地点。我们的情报人员一定也希望有同样容易的方式从苏联方面了解原子装备的地点。在未来可能发生战争中，原子装备将是第一个遭受到攻击的目标。而我们的一个刊物居然将这么重要的消息供给了苏联。

其次，我们的某一系的报纸曾经将我国许多大城市——华盛顿、纽约、底特律、芝加哥和其它一些城市的整套空中照相当作第一版新闻刊登了出去。

我记得，为了杜绝这些有关国防的泄密，国防部长福莱斯特尔曾邀请了六位或八位报刊发行人会谈，看看是否能说服他们自动地做出新闻检查的部署。而这些报刊发行人却告诉福莱斯特尔说，“制止你们的人不向报刊透露消息，那是你们的责任。”某些发行人似乎忘掉了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他们的责任，而且国家的毁灭就是他们的毁灭。

另一个例子是一家商业杂志竟把我国最机密的有关空军发展的情报刊登了出去。我指示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人要从编辑那里查明他怎么把这样的消息刊登出去的。从我得到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项情报是我国某一军事机关中的高级军官供给这位编辑的。这位编辑说：“你怎么能指望我比你自己的人更加小心呢？”进一步的调查表明，这位军官为了使国会通过某一笔预算才这样做的。

争取国会的注意和支持，是向新闻界泄露许多机密的一部分原因。“风头狂”也使人们特别希望看到自己的大名在报刊上出现。

风头竞赛竟达到这样热烈的地步，甚至某些官员要当众吹嘘他们的绝密的成绩。
我指示各有关部门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制止任何政府官员向报
界泄露这些秘密。

我发现有必要发布命令建立一个中央检查所，确定什么消息
可以透露，以限制新闻的来源。报界和广播电台说这种措施是
一种新闻检查，甚至指责说这样做是为了掩饰错误。事实当然不是
这样。

国会委员会的讯问程序也是机密新闻来源的富饶园地。某一
高级军事领袖在国会委员会的执行会议上就机密问题作证以后，
听到机密泄露的情况大为恼怒，以致他威胁说他拒绝再出席这些
委员会作证。泄密的事干得如此迅速和周到，以致在委员会的执
行会议上泄露情报的人往往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情报就已
经上了新闻收报机了。

我下令我们的情报人员研究一下，国会记录中的演讲和发言，
究竟对外国提供了多少极其重要的情报。这个百分比高到可怕
的程度。

这都不是昏头昏脑的受骗者和共产党的同情者泄露出去的情
报。这些人都得不到这样的情报，因为他们无法取得机密的资料。
这种情报都是些爱说长道短的政客泄露出去的，竞争使他们忘了
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在这一方面，华盛顿的政客和报纸、杂志的发
行人都是一样的类型的。

对于我们的保安机构，政府的一位最能干的高级情报人员曾
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在反对颠覆、间谍和破坏活动方面我们已
做到无微不至的地步。这些工作战时做了，战后做了，目前仍然还
在做。至于政府人员，目前还存在着某些早期纠正的模糊不清的
情况，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初期曾遇到困难的。

“政府中执行安全工作的专职人员虽然了解这些问题，并且非
常警惕，但是有些经验不多的政府官员却不能辨别好心肠的自由
主义者和捣乱的激进分子。从极端的激进分子中，要分辨出误入歧途的狂热者和不忠诚的人，往往是很不容易的。事实上，专职的保安人员也很难证明在嫌疑犯中是否有真正的共产党员。很难指出他们有什么不是。我相信政府也没有办法把他们找出来。

“必须记住，所有这些所谓不可靠的人，从把俄国人当作我们的盟友，转变到把他们当作我们的敌人是有困难的。比方说，在保安人员的圈子里就有一种感觉，他们认为甚至在艾森豪威尔将军负责管制德国的时候，在他的参谋人员中就有些可疑分子，于是我们不得不派特工人员去澄清这个问题。

“一个国家曾竭尽全力帮助一个盟友，后来又掉转头来说这个盟友是敌人，在改变这种态度时，不可能不发生一些混乱。这就是我们走过的道路。”
第二十章
氢弹

美国的安全和自由世界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们在核能方面的领先。

我们应当深深感激那一小批科学家，他们使核能成为现实。世界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这些献身于这一科学的少数人的手里。在1945年和1946年，他们没有争先恐后地回到平民生活中去，他们都毅然决然地留在洛斯—阿拉谬斯进行发展原子能的研究工作。他们认识到原子的发展才刚刚开始，而愿意留下来做这项工作，因为他们了解其他国家一定会竭力和我们争夺这方面的领先权。

他们都信，除非我们沿着在洛斯—阿拉谬斯和其他美国的实验室里所获得的许多零散的继续进行研究，否则我们的地位和安全就必然会受到威胁。

我们正处在重大发现的开始，我急于使我们在核能发展的工作上取得进展，以便生产任何足以保卫我们军事地位的新武器，从而加强我们保卫和平的力量。我恳求尽一切可能来鼓励这些科学家们继续为政府工作，并建立我们的庞大的实验室，热核反应的知识就是在这些实验室里发展起来的，这种知识使我们很快就能制造超级炸弹——氢弹。

1946年12月31日午夜，一个非军事机构——原子能委员会——接管了美国的原子能研究与生产工作的上层管理工作。这个委员会是由五个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批准的委员组成的。总
統指定一位委員担任委員会的主席，並提名一位管理主任，該管理主任須經參議院批准。

原子能委員會在本身工作的範圍內擁有廣泛的樞機和全面的控制。這個委員會負有領導原子能領域內的全部研究、發展以及生產工作。但是，原子弹須經總統批准方許使用。只有總統才能決定應否制造哪种性能的原子弹。只有總統才能決定是否應進行原子弹爆炸試驗。只有總統才能批准原子弹運輸或儲蔵的地点和時間。事實上，連生產原子弹和原子弹原料的年产量都由總統決定。

可是，總統也同樣關心為和平目的而发展和应用原子能。通過對預算的掌握，總統能夠指示和鼓励委員會的工作。

為了協助原子能委員會運用它的權力，根據法律，設立了一個兩院原子能聯合委員會，該委員會由九名參議員和九名眾議員組成，而原子能委員會得隨時向兩院聯合委員會全面汇报原子能委員會的活動。

根據法律又設立了一個軍事聯絡委員會，該委員會委員由國防部長委任，由海、陸、空三軍各派兩名代表組成，另外還設有一名主席，軍人或文職官員均可出任。這個聯絡委員會經常向原子能委員會“全面汇报国防部所進行的一切有关原子能的活動”，反過來原子能委員會必須經常向軍事聯絡委員會了解它在軍事方面的全部活動。軍事聯絡委員會“有權就有關軍事應用方面的情況，向原子能委員會提出書面建議”。在軍事聯絡委員會與原子能委員會之間發生分歧時，根據法律规定，軍事聯絡委員會可通過國防部長將爭執問題提交總統。總統有最後決定權。法律最後一項規定是成立了一个由九位委員組成的一般諮詢委員會，委員由總統“在非公職人員”中委任。這個委員會向原子能委員會和軍事聯絡委員會提供科學和技術意見。
我接到了很多关于派原子能委员会的人选问题的建议。这是我最后选拔出的原子能委员会的第一任委员，戴维·李漮塞尔（被任命为委员）、罗伯特·巴彻尔、萨姆纳·派克、路易斯·斯特劳斯和威廉·韦马克。

在选拔原子能委员会的人选时，我没有注意他们政治立场。事实上，在最初的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中，根本就没有一位是民主党员。李漮塞尔一向自称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其余四位全是共和党人。我一向遵循政治和原子能不能混为一谈的原则。

摆在新成立的原子能委员会面前的是一批极其艰巨的任务。它必须把一个庞大的事业从临时性的战时工作改变成为范围要大得多的永久性的工作。曼哈顿区是为了生产以缩短战争的原子弹而建立的战时工程。这就是它的用途。而且，在原子能委员会建立以前，政府一直在军事秘密的幕后管理原子弹生产设备的。但是现在它除了受总统的管辖外，还得受国会的监督。今后原子能委员会必须对国会各委员会报告它的工作。

国会在批准委员会的人选以前，立即展开了广泛的辩论，这表现了国会对该委员会非常关心。参议院费了三个月的时间才作出最后决定，通过了我所任命的五位委员。但是，甚至还在等待国会批准人选时，原子能委员会就已经开始承担原子计划的工作。他们所作的第一件事是对目前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调查，并在三个月后向我作了报告。在他们的工作报告里，我发现，从国防和国家安全的观点来看，这项工作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原子弹的数目少得令人失望，而且已有的原子弹还没有装配起来。受过装配训练的有高度技术的平民雇员已经分散到裁员优厚的私人企业去了。而军事人员从事装配工作的训练又没有完成。

虽然在1946年间，为了战略目的曾在比基尼进行了几次试验
验性的爆炸，但手头的更新型的原子弹还要等待试验。此外，在原
轴的供应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大部分的原轴是从此届刚果来
的，而且供应不足。

因此，首要的任务是使整个生产计划趋于平衡。这意味着要
停止某些设备的工作，而加速其他一些设备的工作。

当然，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并不单纯由于高度技术性的问题，
而且还有其他原因，这些原因是俄国人用巨大代价去了解的。参
众两院的议员们对生产表示关心，他们有些人似乎认为，任何一种
原子计划的扩展，特别是原子武器计划的扩展，都是值得进行的。
当然就事实来说，为了将来制定一个健全的计划，比较慎重的办
法是正如科学家和军事当局所劝告的那样不把全力集中在任何一个
单一的方向。

况且，原子计划必须和我们的国防以及对外政策相配合，而
我，作为总统的责任就是要经常在这些和其他因素之间维持均
衡。

国会成立了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对原子能委员会的活动进行
经常性的监督。这个委员会的民主党共和党的高级成员布里
恩·麦克马洪参议员和伯克斯·希肯鲁普参议员，很快地就使自己
成为专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特别辩护人。

1945 年底和 1946 年，当原子能委员会的立法程序还在进行
时，我和布里恩·麦克马洪一起，度过了不少时间，他对原子能问
题的掌握和理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1947 年 1 月），希肯
鲁普参议员出任联合委员会的主席，他和我进行了多次和他的新
职务有关的建设性的会谈。

要让某些国会议员了解他们所处理的问题多么复杂是不容易
的。比方说，有一次希肯鲁普参议员打电话到白宫来，说他的委员
会急需某一件非常专门的文件。他完全肯定，如果没有这一文件，
他們就無法進行工作。

我請他到白宮來，當他來了以後，我領他到內閣議事室，把文件交給他，請他閱讀。這個文件很长，一點半後，他才回到我的辦公室。他顯然是後悔了。

他說：“現在我可希望你當初還是不讓我看這個文件好，我寧願對這件事一无所知。”

我說：“現在你弄明白為什麼這份文件不能拿到你們委員會里去了吧。”

然而，主要的是，不論誰當聯合委員會的主席，麥克馬洪也好，希肯魯普也好，我都以同樣的坦白而直率的態度同他交往。就我个人來說，政治政治與原子能是兩回事。看到聯合委員會的委員們小心翼翼地遵守有關原子能的保密制度，我感到很高興。然而由于重要的秘密泄露出去而造成公開的爭吵的危險總是有的。

聯合委員會主要關心的是原子彈的發展情況，它經常催促增加生產。某些委員有把這問題过分簡單化的傾向，而認為原子計劃所需要的一切只是讓軍事當局通知原子能委員會“我們要多少多少原子彈”，然後原子能委員會就如數交出就行了。但是，讓軍事當局用這種方式來控制原子彈不但不明智，而且也不可能在軍事需要的基礎上來安排生產。當時就沒有足夠的原料來滿足我們的需要。

我們當時所得到的那一部分鈾來自比屬剛果。不過，在1944年，我們與英國訂了一項協議，決定以共同的努力尽量地多取得鈾（還有其它一些稀有原料）。當戰爭仍在進行的時候，我們在分配這些原料上並沒有什麼困難。整個核能計劃當時都集中在美國，而且，除了微不足道的小量鈾以外，英、美、加聯合起來所能找到的全部鈾都分配給了美國。但是在戰後，這些安排就不得不加以改
变了。战时作为客人而留居美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现在都已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并建立了自己的实验设备，需要铀供自己的实验之用。

与此同时，我们自己的需要大大地增加了。在和英国人进行一个时期的谈判以后，我们在1946年7月达成一项临时协议，规定我们与联合王国平分全部比属刚果所出产的铀。但是根据这个办法，英国人现在所得到的铀超过了他们实际的应用，而我们却感到不足。为了纠正这种困难，更合乎比例地分配这些铀，我们在1947年末又重新进行谈判，会议是在华盛顿召开的。

1948年1月7日，两国又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这个协议修改了铀的分配，但仍属临时性的。这个“临时办法”，（我们在以后的谈判中总是这样称呼它）规定比属刚果在1948至1949年间所生产的铀全部归美国使用。除此以外，我们从英国的储存中还可以取得一部分铀。

我们同意向英国人公开有关核子的九类特殊资料方面的数据，作为这个重要步骤的交换条件。这种同意是与原子能法案的条款规定及其精神是相符合的。有关原子武器的资料明确限定同样不向英国人公开，同时两国同意不将任何资料转告任何其他国家。对新西兰则作了一个很小的破例，因为新西兰的科学家们在建立英国原子能机构上做出了贡献。

1947年末，一群不平凡的专家交给我一份关于我国原子进展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由一个咨询委员会写的。这个委员会除其他委员外，包括有罗伯特·奥本海默、詹姆斯·康南特、李·杜布里季、恩里科·弗米以及I·腊比等这些卓越的科学家。

下面是奥本海默博士报告他们第一年工作情况的信。
“一般諮詢委員会

致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

首都华盛顿

“首都华盛顿
白宫
总统

“亲爱的总统先生：

“自从您委派我们出任一般諮詢委员会员，以便就‘与原料生产、研究和发展有关的科学和技术問題’向原子能委员会提出建議，已经一年了。当时我們就了解委員会的工作对美国的福利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非常热誠地担负起我們的顧問的職責，我們在这些职责上花费了很多時間，并进行了研究。在一年内先后举行了为期至少共十五天的会議，我們全体委員都出席了这些会議。我們与原子能委员会、它的人員以及军事联络委员会，經常进行认真的討論，并向該委员会提出七份詳細的报告，在报告中我們尽力提出了建議，这些报告自然都具有高度的专门性。

“我們今年的工作不仅反映出我們深深感到这一科学领域成功和发展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原子能委员会在承担它的責任时所面临的困难，和它所继承下来的工作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我們很快就发现在与共同防御和安全有重大关系的各个技术領域里，既沒有适当的发展，在那些与未来和平利用原子能有关的技术領域里情况也是如此。有关技术方针的重大問題沒有作出决定，而且在許多方面尚未拟定出来。龐大的設備和实验室中的工作都在毫无目的而混乱的情况下进行，对摆在他們面前的技术問題的重要性和紧要性也缺乏足够的理解。我們的原子武器不論在质量上或数量上都不能令人满意，而进展的速度一直都緩慢到危险的程度

349
度。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成立原子能管理机构，以及随着战争结束而来的，不可避免的方式的预算和目标上的混乱。那些战时设备和实验室为早期军事上的应用，在发展原子武器上，卓越地完成了最初的任务。但在技术问题的性质已经改变的情况下，以及在战时的工作状态转变到平时工作状态，已经改变了原先可能进行快速生产的条件下，这些设备和实验室大部分都不适于继续进行工作。上述事实更增加了实际工作困难。

“因此，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原子能委员会制定短期的和长期的技术方案。这些技术方案主要针对三个目标：

“(一)发展、改进和增产原子武器。

“(二)为各种不同目的而发展原子反应堆。

“(三)支援与原子能领域有各种关系的物理学与生物学。

“至于我们在原子武器方面的改善，我们高兴地向您报告，今年有了很大的进展，而且我们预料在不久的将来看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从一开始，我们就同意原子能委员会的意见，认识到骄傲自满对我们在这一科学领域中的工作有极大的危险。我们对太平洋试验场的建立表示高兴，在那里能够对改进了的原子武器的性能进行现场实验和计算的试验。虽然有很多任务尚未完成，虽然有关原子武器的长期计划刚刚开始，我们仍然相信，为改进我们的情况所已采取的步骤，以及其他在时机成熟时将要采取的步骤，已把这个活动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原子反应堆有多种用途。它可以生产用于原子武器或作为其它反应堆的燃料的分裂物质。它可以成为物理学、生物学以及工业科学研究工作的有效工具。它可能在十年内发展成为供特殊用途的动力来源，例如供少数海军舰只的动力。它可能在一个很难作可靠的估计的不太短的时期内，发展成为提供一般工业的动力，从而对我们的整个工业和经济生活作出重大的贡献。由于具
有多种多样的目的，这门科学的新颖和只有极少数的人受到过从事
这一工作的训练，使得原子反应堆的发展很难获得真正的进展。在
过去一年中，原子能委员会已采取了许多措施鼓励这门科学的活
动，邀请工业界参加工作，对有价值的特殊计划的完成与建设进行
奖励，以及聘请有资格的专家参加工作。其中包括认为还有许多
工作有待完成，新的人力和有才智的人必须作出贡献，而且要在
很多年后我们在这门科学中的工作才能强大到足以证明它的重要性。
作为委员会的辅助机构，为了达到不同的目的，我们在系统
地描述有关原子能的前景，并估计所必需的努力的性质，已经作了
尝试。我们相信，更广泛地了解问题的本质，工程师能够而且必须
作出的贡献，以及工业界能够起辅助作用的参加方式，对于有关原
子能发展方面的努力是有重要意义的。

“为了支持这门基本科学，我们欢迎对原子能委员会所承担的
任务作广泛的解释。我们在详细地研究了一份最近被采纳的建议，
该建议主张提供某些放射性同位素供生物学和医学研究，而且不
仅供应国内，也要供应国外。在这个建议中，我们看到一个审慎而
起鼓舞作用的范例，它把由解放原子能而产生的利益推广给别人，
这种推广必然丰富我们的知识和加强我们对自然力量的控制。

“在过去一年中，我们经常遇到一个我们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
考虑的问题。当我们在研究执行技术政策可能采用的方式时，我
们不得不承认，保密以及不可避免地随着保密而带来的误会和错
误，对工作的进展发生了影响，因而也就对共同防御和安全发生极
其不良的影响。我们相信，在这门基本科学的领域里，原子能委
员会从曼哈顿区继承了一个本质上是开明的政策，而且还继续维持
这种政策。甚至在技术的领域里，在工业的应用上和在军事问题
上，保密的结果造成了误解、愚昧和冷酷无情。美国政府应重新考
虑下面这个问题，究竟是明智地泄露秘密所引起的危险大，还是
为了保密而无疑造成错误或停滞不前所造成的危险大？只有通过
这种重新考虑，才能使原子能对保障和平和对我们文明财富的
持久和发展作出最大的贡献。

“詹姆斯·康南特
李·杜布里季
恩里科·弗米
I·腊比
哈特莱·威尔
格伦·西博格
西里尔·史密斯
胡德·沃辛顿
J·奥本海默(主席)

谨上

“J·奥本海默 代表
委员会签名
“1947年12月31日”

这是一封最有参考价值和具有挑战性的信，除了其他有趣
的论点之外，它还提出了保密的问题。我对于把原子能利用于军
事的保密问题的立场是始终不变的。我坚决反对向任何其他国家
政府公开军事上的原子能秘密。

原子能委员会向我提供的材料非常详尽。有些材料具有高度
的技术性，因而我必须经过仔细的研究才能理解它。当然，我从不
擅自对技术意见下判断。我在批准任何重大决定以前，总是征求
各方面的意见，甚至在技术问题上也是如此。

按法律规定，我必须每年规定下一年应该生产的分裂物质的
数量。为了作出这一决定，我需要看到国防部和原子能委员会的
聯合建議。這個建議總是保密的。為了保守機密，我們採取了特殊的保密措施。举例来说，任何人都在我的办公室、在原子能委员会、或在政府任何部门的文件里都找不到关于现存的或将要生产的原子弹的准确数字，或计划生产的分裂物质的准确数字。

要是任何人偶然碰见一份关于原子武器生产的文件，他会发现，原来应当有确实数字的地方不是密码就是一处空白。其中的数目字都记录在单独的、分开的纸上，这些纸受到特殊方式的保卫，并且只有极少量的副本。

虽然在那些日子里，与原子能政策有关的一些机构间有若干尚未调整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没有影响到试验所里研究工作的持续。在实验室里从一开始就着手的广泛研究领域里，有一项是氢原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原子计划首次开始进行时，科学家们就把目前的力量集中在“重元素”上，特别是铀。在1947年至1948年期间，我们把重点集中在铀和钚上，把这两种元素当作原子动力的来源，但与此同时我们对“轻元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氢）的研究也一直在进行着，从未停止或中断过。

到了1949年，原子核这一科学部门中的许多发展需要我们对它加以注意，而且还必须作出许多重大决定。1949年年初，原子能委员会已把原子计划中的大部分复杂问题解决了，于是我们在原子能的整个领域里获得了进展。

为了在解决政策上与事实上的重大问题中得到帮助，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这个特别委员会的成员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以及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戴维·李维塞尔。

我指定这个委员会首先研究的问题是关于我们在原子能问题上和英国、加拿大和其他友好国家的关系。我在1949年2月10
日指定该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尽管我们与英国所签订的协议将在1949年年底届满，我们还得继续与它合作。

特别委员会于1949年3月2日向我汇报研究的结果，建议我们采取一种新的策略，以便把原子弹的原料与制造尽量集中到北欧大陆上。该委员会说，这将意味着这三个国家——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要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就像在战时的合作中所形成的合作一样。

我批准了这个试图达成这种安排的建议，同时向该委员会表示，我有意在我们同英国人和加拿大人进行任何谈判以前，首先将我们的意图详细告诉国会两党的主要成员。为此，我于1949年7月14日傍晚在布莱尔大厦召集了一个私人会议。除了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主要委员和副总统奥尔本·巴克莱以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的三位委员也出席了这个会议。艾森豪威尔将军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代理主席的身份出席；在出席的国会议员中有参议员：麦克马洪、希肯鲁普、泰丁斯以及范登堡和众议员：萨姆·雷朋、卡尔·达拉姆和斯特林·柯尔。

我在会议一开始时就对与会者说，我们与英国就分配铀而达成的协定即将期满，而英国人正要求我们恢复在原子能问题上的全面合作，因为这种合作关系已经中断。我指出我们必须获得铀，而英国人则需要我们某些科学材料，我又说，英国与美国的团结是世界和平的基石。在英国，不论两个主要政党中哪一个掌握政权，总有一个高度负责的领导权。

英国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他们在制成第一颗原子弹上曾作出很大的贡献，毫无疑问他们会很快地发展自己的原子弹。我指出，英国科学代表团曾广泛地参加了洛斯一阿拉谬斯的原子弹研究与发展工作，后来又参加了原子弹的制造。此外，他们曾参加比
基尼斯试验的准备与计算工作。类似的科学家代表团曾参加了在欧克
里季的分裂铀—235 的研究与发展工作。此外，英国与加拿大的
科学家曾在芝加哥的金属实验室与我们的科学家商讨过在加拿大
白里河建立重水反应堆的设计。

我陈述了，在 1947 年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如何采取统一的制
度来处理共同建立起来的资料。1948 年 1 月，三国政府就一个临
时措施取得协议，规定不仅在原料问题上合作，而且也在交换某
些指定领域中的科学和技术情报的合作。不过，现在这个协议即
将到期，我提议根据原子能法案的规定，缔结一个建立在充分合作
基础上的新协议。我认为，如果把现有的铀都运到美国来处理和
储藏，这一点是可以办到的。然后英国和加拿大的科学家就能够
加入到美国同行中来，和他们一起工作。为了防止美国人可能抱
怨他们被排斥在原子武器的领域之外，我们可以设法把一些未装
配成的原子弹存放在英伦三岛。

艾奇逊、约翰逊和李连塞尔作了很详细的发言支持这个方案。可
是，范登堡参议员却尖锐地反对这一建议。他认为，英国人应该
接受我们在原子能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并且举出两点理由来说明
他的观点。

首先，他叙述了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来，我们给予英国的帮助。其次，他表示他相信任何其他途
径都将导致力量的重复，这种力量的重复正是北大西洋公约共同
防务方面所要防止的。

希肯鲁普参议员也反对这一建议。他反对的主要理由是，他
不信任英国的保安工作，并且他认为我们不应在这种事上冒险。

其他出席的议员们大多赞成这个办法，但是他们一般都认为，
国会中的大多数人将拒绝这样做。

按照我的习惯，我没有宣布最后决定就休息了。我已经尽可
能地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而现在我必须自己来作出结论。我认为，保持两党对原子计划的支持比坚持一个为国会中有力分子所反对的计划更为重要。因此，我指示参加即将在9月间举行的试探性会谈的我方代表团做出一个不包括共同掌握原子武器资料的部署。

到了1949年的春天，我们必须在不同的形势下考虑原子武器。我们现在有了储备，但我需要知道我们手头所有的原子武器，以及计划要生产的原子武器在数量上是否足够，同时我们是否赶上了技术的发展。

7月间，我再次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叫他们估计一下我们再原子计划上的进展速度。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其中的一个就是如何分配我们的国防经费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在考虑如何更好地武装我们自己，从而使我们的国防力量均衡，避免因过于重视一方面的防御而削弱了其他方面的防御。

由于我的请求，特别委员会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应该加速原子武器的生产。与此同时，他们建议除原子弹以外，应优先生产新设计出来的B-36型轰炸机，因为B-36型轰炸机是为了运输我们新型原子弹到世界任何目标而设计出来的远距离轰炸机。

在这以前，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于1949年4月20日向我详细地报告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计划。通过地图和图表，他准确地向我指出战争一旦爆发，战略空军司令部将怎样行动。我是在听到空军的这个简略的报告以后才将下面备忘录送交国防部的。

“昨天下午，我十分关切地听取了空军当局准备在战争一旦爆

356
发时，对可能的敌人进行的战略轰炸计划。我希望参谋长联席会议针对计划中的轰炸可能成功的机会、以及轰炸的后果作出估价，供我审阅。”

国防部长约瑟逊在答复中向我报告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进行这种估计。这些负责我们军事计划的人永远不能满足他们的准备工作和结论。他们的计划始终不是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他们一直在变动和改进他们的计划，以便赶上世界的进展和力量的巨流。偶尔有些新闻记录有某种军事计划存在，便把它们当作一成不变的政府的见解报道出去。在我担任总统期间，常有这种事发生，而这种报道不但往往不正确，而且也常常带来危险。

在政府中，研究改进的措施，估价新的方案是永无止境的，而且再也没有人比总统更能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能看到政府的机器是怎样在运转的。

当我要求政府各部门对某些问题作详细的研究时，它们的答复，甚至包括对最困难的问题的答复总是迅速而详尽的，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总统，我一向坚持在作出决定以前，尽量要有全面的了解，而且我也不希望掩饰分歧意见的含糊不清的报告。

在我意见不统一时，我总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但更重要的是，我要知道在我的顾问中所存在的分歧意见。如果总统只依靠他周围少数人同意了的建议，而且这些又被压缩成简单的报告，呈上来供他批准的建议；那么，我认为这是总统的左右没有对他尽到责任。

在军事部门里，这样做也许有效率，但是在政府的最高机构里就不能这样办。从长远来说，对不同的看法作充分的研究，让赞成与反对的意见进行反复的辩论，才能得出最好的结果。我总是在
清晨和深夜花费很多时间去细读代表各方面意见的文件。有许多时候，在我自己的脑子里已经肯定了哪一条路线是正确的，但我在做最后决定以前，仍然要对形势的各方面作全盘的研究。

就原子计划来说，我与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们既有过单独的讨论，也有过集体的会商。我和科学家和军事顾问们商谈过。我也召见过对外政策的专家，听取他们的意见。当然，他们的意见并不经常是一致的，但在我的脑子里我却牢牢地抓住一个前提，那就是只要在国际上原子能管制问题上还沒有达成协议，我国就必须跑在任何可能的竞争者的前面。我深信只要我们在原子能发展上，把握住领先地位，这个巨大的力量就会帮助我们维持和平。

在我和原子能委员会打交道的全部过程中，每当结束一次讨论，经常告诫大家，我们必须领先。但是我们垄断的结论比专家们所估计的提前了。1949年8月，俄国进行了一次原子爆炸。

从事情报工作的专家们对此曾有过不同的看法，但总的说来，他们没有一个人预料到俄国能在1952年以前能设计出任何原子爆炸。幸运的是，空军的远距离侦察系统在1949年初已充分地发展了起来，通过这一侦察网，我们才能清楚地发现发生了一次不是由我们控制的原子爆炸。

1949年9月3日，一架远距离侦察系统的侦察飞机收集到确凿无疑的放射性空气标本，于是整个远距离侦察系统立刻以最高速度进行工作。美国空军跟随着这种带有可疑物质的云朵，从北太平洋一直飞到英伦三岛附近，在那里，英国空军也发现了这种云朵。从一开始，中央情报局即发现的情况随时报告给我。

接着科学家就开始工作，并分析了数据。空军方面和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们和从大学召集来的顾问们对现有的资料进行了研究。随后，一个由范尼伐尔·布希、罗伯特·奥本海默、罗伯特·巴彻尔、以及W·帕森斯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重新研究了这些发现。
这时毫无怀疑的余地了。在 8 月 26 到 29 日间，在亚洲大陆某处发生了一次原子爆炸。

9 月 21 日，作为空军参谋长直接负责远距离侦察系统的霍伊特·范登堡将军向我汇报了这些事实。俄国人能以出乎我预料的速度作这样进展，当然使我震惊。

在有关这一时期的报道中，有大量的讹传和有意的歪曲。在这一方面，这种现象对国家并非没有好处，而且谁也没有从这些不可靠的报道中得到帮助。科学家们在工作上所发生的坦率的意见分歧被歪曲了，使人看上去似乎是个人的争执，这使科学家们感到难堪。政府官员发现，自己不是被描绘成坏蛋，就是被渲染成英雄，这得看你听的或是读的是哪一位广播评论员或专栏主笔的高论。

美国政府对俄国的原子爆炸并不是毫无准备的。美国并不仅仅因此而张惶失措，因而也无须采取任何紧急措施。这是我们预料迟早要发生的事件。的确，它发生的得比我们专家所预料的要早，但这并不需要修改我们的计划的方针。

在我发表公开声明之前，我首先要把俄国发生原子爆炸的消息通知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委员们。于是我请该委员会的主席麦克·洪参议员和该委员会的共和党主要人物希肯鲁普参议员在第二天（即 9 月 22 日）到我的白宫办公室来。希肯鲁普不在华盛顿，因此麦克·洪一人单独来了。

我把空军当局送来报告和科学家的估计给他看。我们讨论了这事件的意义，随后我告诉他，第二天我将发表一项公开声明。

9 月 23 日上午十一点，也就是在我刚刚向内阁例会宣布了这个消息以后，我通过白宫新闻秘书罗斯发表了下列公开声明：

“我认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原子能领域中的一切发展情况，这是与我们的国家完全一致的。这就是我作如下公开声明的原
我们所获得的证据表明，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发生了一次原子爆炸。

自从人类首次释放原子能以来，其他国家在这种新力量上的发展本是意料中的事。我们过去一直就估计到这个可能性。

“将近四年以前，我曾指出‘科学界几乎一致地认为，这一发现的基础——主要的理论知识——早已广泛地传播开了。实际上，大家还一致认为，外国的研究工作能及时赶上我们目前的理论知识。’而且美国总统、联合王国首相和加拿大总理在1945年11月15日发表的三宣言中，就已强调指出，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垄断原子武器。

“如果确有强调的必要，那么，最近这一发展再一次强调，对原子能进行真正有效的国际管制是必要的，我国政府和联合国的绝大多数成员国都拥护这种国际管制。”

俄国原子爆炸的一个积极后果，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实验室和我们的伟大科学家，使他们加紧进行对氢弹的研究。

到了1949年初秋，“超极炸弹”——热核子或氢弹——的发展已进行到几乎可以把理论变成实际的阶段了。我相信，任何能保证我们在国防原子能发展的领域中获得领导权的东西都必须进行试验，但是一个极复杂、极难以解决的问题却产生了，而其他的办法又非常渺茫。

第一个要决定的是，对一个初步的、标志着氢弹能否成功的试验，原子能委员会究竟应该投入多少人力和物力的问题。为了做一个试验，势必要挪用现在生产子弹用的铀。可是，为了对一个可能会失败的方法进行试验，我们究竟能把一个现在工作得很顺利的计划（铀一钚法）削减多少呢？
在这个时候，与氢弹有关的一切东西都还不能肯定。一切都是理论和假设。甚至连科学家和原子能委员会的意见都不一致。除此以外，我们所关心的这些事，不仅与科学知识有关，而且也和我们的防御战略和对外政策有关。这一切都必须加以权衡。

在原子能委员会里，主席戴维·李连塞尔、萨姆纳·派克、以及罗伯特·巴彻尔是赞成慢慢试验氢弹的政策的。而戈登·迪安和路易斯·斯托夫斯却认为没有理由拖延，要求立即着手制订试验计划。

原子能委员会向我全面报告了各种分歧意见，还有个别的委员分别写信表示自己的见解。我再一次向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委员迪安、艾奇逊、路易斯·约翰逊以及戴维·李连塞尔征询意见。11月10日我致函特别委员会写道：

“我最近接到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提出美国应否着手进行制造‘超级’原子武器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原子能委员会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应予考虑的因素，而且也涉及国务院和国防部所注意的因素。

“为了协助我对这一重大问题作出决定，我特指派国务院、国防部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组成特别委员会，就这一问题向我提出建议。我建议委员会各成员在自己的机构中指定适当的咨询人员在各自的监督下进行必要的研究。我要求特别委员会分析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包括技术、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并就美国是否应着手进行‘超级’原子弹武器的发展和生产，和以何种方式进行，提出建议。在这些建议中，我也希望委员会就应否将这一问题公开和在什么时候公开提出意见。⋯⋯”

1950年1月31日十二时三十分，特别委员会委员们带着报告
告来到了白宫。这是一位由三位委员——迪安·艾奇逊、路易斯·约翰逊以及戴维·李奇维尔——共同签署的一致建议书，建议的要点是：我应指令原子能委员会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来决定我们是否能够制造和爆炸一个氢武器。与此同时，特别委员会建议从外交和军事两方面，重新审查我们的对外政策和战略计划。

我批准了这些建议，并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

“作为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我的一部分职责是使我们的国家能够保卫自己，抵抗任何可能的侵略者。

“因此，我已命令原子能委员会继续进行包括所谓氢弹或超级炸弹在内的任何形式原子武器的工作。

“与原子武器领域中的所有其他工作一样，这项工作正在并将继续在同我们的和平与安全计划的全部目标一致的基础上进行。

“我们将继续这样做，直到令人满意的国际控制原子能的计划实现为止。我们必须继续审查一切影响我们的和平计划和国家安全的因素。”

大约一个月以后，在2月24日，国防部长与参谋长联合会议提出了一个“立即全力发展氢弹以及氢弹的生产与运输工具”的建议，以便促进我们的计划的实现。

军事当局的首脑认为氢弹试验可能成功，因此，他们建议批准有关设备、器材以及适当的运输工具全面生产的计划。

我将这一建议送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审查，该委员会对各方面的情况作了彻底的研究，并在3月9日送来一份详细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获悉遵照我1月31日（给原子能委员会）的指示，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已把全部力量投入到一个能使我们尽快地试验热核子武器的研究和发展计划，而且他们认为
在1951年内能进行氢弹装置的初步试验。

如果初步试验成功，整个装置就可能在1952年末准备好进行试验。特别委员会报告说，在仔细审查全部情况后，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进一步加速试验计划，还没有其他可以采用的已知步骤。"

在得出这些结论以后，现在就需要决定原子能委员会应否在试验可能成功的假定上，着手进行生产热核武器所需的原料的计划。

这就牵涉到对许多问题的考虑，其中之一就是经费。这些试验估计需要用九千五百万美元，而铀一235炸弹计划部件的变更需款更为可观。供生产用的工厂以及氢弹所需的主材料，至少初步要花费两亿美元。与氢弹直接关系不大的发展计划也需款约一亿美元。

很显然，要作出这样的决定，必须研究许多许多事实。还有，把所有的观点跟全部能找到的事实综合起来，加以权衡，正是总统的职责。他不能偏向任何一边。他必须使军事和对外政策取得平衡，同时又必须使这两者与国家的经济取得平衡。

在研究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时，我曾注意到氢弹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生产设备，也可以供我们目前原子弹计划和国防生产的其他部门的使用。因此，即使这个装置失败了，也不至于全部损失掉。不过，这一切都无法肯定。

1950年底和1961年初，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乌莉姆博士和特勒博士获得了改变这一情况的新发现。但是，在1950年3月，能否分裂像氢这样的轻原子尚未得到证实。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3月10日，我宣布说氢弹的研究是"最紧急的任务"，这于特别加强了这方面研究工作。同时我指示原子能委员会立即作出大量生产的计划。这样，当我们将知道氢弹是
可能的时候，就可以尽快地把它投入生产。

这个决定的后果是，原子能委员会的庞大的萨凡那河工程开始动工，同时原子能委员会的其他工厂设备也加以扩充。

与此同时，国务院的政策制订者和国防部的计划制定者已集中力量重新审查我们目标，这是我在1月31日的指示中要求他们作的。4月7日，我接到这两个部门所得到的结论初稿。

这份报告首先对世界形势作了分析。它指出，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看到了发生在俄国和中国的两次重大革命，又看到了五个帝国的灭亡和美法两个主要帝国的急剧衰落。这些事实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上的力量对比，到现在只剩下美国和苏联两个主要力量中心了。

报告继续说，美国已明确了自己基本目标。美国宪法的序言用简练的不容误解的文字列举了美国人民的目标——“……组成一个更完善的联邦，确立正义，保证国内安宁，设立共同防御，促进普遍福利，并为我们自己和后代子孙谋自由”。

总而言之，我们的基本目标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保证我们所处的自由社会的完整和持久，这一社会是以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为基础的。

而在另一方面，苏联的基本目的却是要建立一个受克里姆林宫的意志所统治的世界。这就使得美国成了克里姆林宫的主要目标，也就是说，在苏联人能够达到它的目的之前，我们是苏联人必须消灭或击败的敌人。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讨论了形势中的危险之点，密切注意了俄国的原子力量，因为这种力量很可能在最近几年内发展起来。

我们对政策的目标是迅速地建立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联合力量。

对于谋求世界和平来说，原子的力量是极端重要的。原子在
发展动力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它能为和平的世界带来幸福和繁荣。但是反过来，一个像我们几千年所处的接近战争边缘的世界里，原子能掌握在不适当的人手里，就可能招致人类的毁灭。然而，掌握在适当的人手里，它能被用作抵御侵略和债权发动战争的强大力量。因此，我一向坚持，我们要以均衡的安全制度和均衡的经济作为本钱，在原子能事业上走在全世界的前列。

氢弹的发展是我们在掌握领导权的一个方面。我们也能使原子弹适用于新的用途，甚至可能达到制造原子炮，把原子弹头装在导弹上，以及把原子发动机装在潜水艇上。

但是，在我们把原子能的原理应用到新用途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像英国和美国的这样遥远的地方进行必要的试验是有困难的。1950年夏，继李连塞特出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戈登·迪安向我建议，在美国中西部建立一个试验场。他介绍了美国西部的拉斯维加斯以北七十五哩左右的地方，但他又告诉我，少数曾和他讨论过这件事的政府高级官员对这个建议表示很大的怀疑。有一位直率地告诉他：“美国人民将永远不能容忍在自己国家爆炸原子弹。”

我问他：“戈登，从时间上看，如果我们建立了这个试验场，它真能有助于我们的武器计划吗?”

迪安向我保证会有帮助的。

“以不伤害任何人的方式进行试验能行吗?”我问他。

迪安说可以采取一切预防措施。

于是他让他着手进行。不过，我建议最好不要过于宣扬，并且要悄悄地通知试验区范围内的高级官员。

到1952年末，在犹他滩地的内华达试验场上已经进行了二十次单独的原子爆炸，并且有其他很多地区也做了试验。部队也被调来试验防御装备和战术，而陆军的几个师已配备了能发射原子
炮弹的新型大炮。不仅于此，1952年6月14日，在利用原子能的发展中竖下了新的里程碑，在那天我们安装了《红鱼号》的龙骨，这是第一艘利用原子能推动的潜水艇，也是任何种类的远洋船只中第一艘利用原子能推动的船只。

与此同时，和平时期利用原子能的科学部门仍然受到重视。每当李連塞尔或继任的戈登·迪安与我商谈这个问题时，我都要他们报告在研究和发展工业发展上所作的努力。原子能能够而且应该成为对人类有巨大益处的动力，当然，除非人类愚蠢到用这种力量去毁灭自己。

这个时期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发展之一，就是在爱达荷州阿尔科地方建立了“原子弹反应堆”，这个反应堆所生产的分裂物质比装进去的还要多。这一试验的成功对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未来发展应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意味着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利用原子能的道路已经被铺清了；这意味着“原子能为和平服务”已经成为一件现实的事情来谈论，而不再是一种希望了。

尽管原料缺乏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拖延，热核能的发展依然在进行。1951年3月，一个决定性的试验在核反应堆成功地实现了。这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因为它证实了科学的计算是正确的，掌握了这种知识就有可能作出更进一步的具体计划。不久以后（1951年6月），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召开了一次拟定计划的会议。这个会获得了巨大的进展，所提出的最重要的意见是关于大量生产氢弹的新计划。

6月12日，戈登·迪安给我带来了关于这次会议以及大家同意的计划的详细报告。他说，如果我现在就批准这个计划，估计在1952年初秋，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一次热核武器的全面试验，我把迪安的报告带回，作深入的研究。

一星期后，他得到了我的批准，照计划行事。
有一件与这次氢弹试验纠缠在一起的事情，我们当时没有料到，这就是天气和美国政治的关系。当1952年的秋季来临，准备工作接近完成的时候，原子弹委员会要求为恩尼威托克岛试验场作一次气象预报，以便决定试验的准确日期。但太平洋那部分地区气候是这样特殊，以至在秋季，每月只有一两天的气候条件是合乎理想的，而进行试验的最合适日期结果是11月1日，离大选只有三天。

戈登·迪安跑来见我，对我说他和某些原子弹委员会的委员认为，在距离选举日这样近的日子里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氢弹试验也许不太好。他们认为，爆炸肯定不能一直保守秘密，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手段。我问戈登·迪安是否知道有其他合适的日期，如果延期试验将有什么损失。他告诉我。接着我指示他撇开政治，不管哪一天，只要气候条件适宜就在那一天试验。我想他在来以前就知道我的答复是什么，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听我说过，在国家的原子弹计划中，决不能掺杂政治成分。

第一枚氢弹的试验是一次富有戏剧性的成就，它是在11月1日进行的。爆炸的威力如此巨大，以至于整个岛屿都被炸掉了，还在珊瑚礁上留下一个大弹坑。这是一种新力量的可怕的实地表演，而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件事全面通知新当选的总统。于是在选举后的第一天我就要求原子弹委员会设法把我们的整个核武器计划和试验的结果扼要地报告给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

到新政府接管的时候，我国已经历了七年半的原子时代。我们在核能的研究和发展上投资七十亿美元。到1953年，我国已经有了原子弹的储存，还有把这些原子弹运到目的地的运输工具。我国也有了一支日益丰富的、使用原子弹头的战术武器的武器库，一艘正在建造中的、用原子弹推动的潜艇艇和一种已试验成功的氢弹以及生产这种氢弹的设备。到了1953年，原子弹已成功地应
用到医学和生物学的领域，而且正在进行研究有利于经济的和平利用原子能。此外，我们首先倡议联合国管制原子能。为了和平的利益，我们不因俄国人的阻挠，坚决主张国际管制。

一切功劳必须归于那些科学家们、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们以及在实验室和工厂里献身于这一事业的工作人员。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它的工作人员以及顾问团的名单念起来就像是献身于公务的最优秀的人物的名单一样。他们有些人由于说了心里话并拒绝在原子能计划中掺杂政治而受到了非难和辱骂，但是使民主获得胜利的正是这些人。

在原子能发展的进程表里，我把和平利用原子能和军事利用原子能并列在一起。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种世界里，我们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是一个实际需要；但是我一直在殷切地盼望，原子能为正当的用途——全人类的福利——服务的一天早日到来。

如果我们的原子能国际管制计划能够实现，如果世界上科学家的全部努力都能够集中在寻求使原子为人类的需求服务的方式和方法上，那我将感到非常高兴。我一直在祈祷，希望世界将原子当作一个有用的能源源泉和重要的治疗疾病的力量的源泉，而永远不再去挖掘潜藏在这些原索里的可怕的毁灭力量。
第二十一章

三八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许很少美国人知道或者注意朝鲜，顶多是把它看作是远在亚洲的一个神秘地方而已。直到1945年夏季末我国的占领军在那儿登陆以前，除了极少数传教士以外，美国人是没有机会见识这个“像清晨般宁静的地方”的。

朝鲜这个一度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中国的王国，在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以后受到了日本的统治。随后在1910年，日本人撕掉一切假面具，吞并了这个国家，把它当成一个被征服的省份。

在1945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蒋介石和丘吉尔首相曾经同意“怜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他们并且“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后来在德黑兰，在罗斯福和斯大林的会议中也讨论了朝鲜的前途问题。斯大林说他看到了开罗宣言，并且说朝鲜应当获得独立，那是正确的。他还同意在朝鲜能获得完全独立以前，需要有那么一段准备期间，也许需要四十年。

在1945年2月举行雅尔塔会议时，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在非正式的谈话中又讨论到朝鲜问题。罗斯福总统提出了一般的托管问题，并且说，以朝鲜而论，应当由苏联、中国和美国三个国家的代表来负责托管。他举菲律宾为例，来说明要使朝鲜能完全自治，将需要一段多么长的时间。菲律宾群岛花了四十年，朝鲜也许只需要二十或三十年。斯大林说，托管期间愈短愈好；他还认为应当请英国一同来策划托管事宜。此外，在我继续总统以后，他还肯定了
这项谅解，他在1945年5月28日告诉哈里·霍普金斯说，俄国应当执行四国托管朝鲜的政策。

在我同俄国总理和英国首相在波茨坦举行的会议中，莫洛托夫曾经提到朝鲜问题，但没有进行讨论。然而，在波茨坦公告中，清楚表示了不容许日本继续拥有朝鲜的意思。而且，在我们三个国家的军事首长举行会议的时候，大家同意在俄国参加太平洋战争以后，应当在朝鲜整个地区对美国和俄国的空军和海军的作战范围划一条界线。至于地面上的作战或占领区域，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因为当时没有人想到，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苏联的地面部队，会在短期内进入朝鲜。

国际会议上从来没有讨论过以三八线作为在朝鲜的分界线这个题目。由于日本战争机构的突然崩溃，在朝鲜造成了真空局面，我们提出“三八线”，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在那里没有军队，没有可供我们部队在这个半岛的南半部好几个地方登陆的船只。国务院极力主张在整个朝鲜的日本部队应由美国受降，但是我们要以必要的速度把军队送到朝鲜北部，那就无法保证我们在日本抢先登陆。鉴于斯大林已经同意共同托管的主张，我们希望把这个国家划分为两部分只是为了便于接受日本投降，然后再使整个半岛受到共同的管制。

但是，俄国人却立即开始把三八线当做一条永久的分界线。他们不允许在这条线上有交通往来，除非每次都得到他们的明文批准。由于大部分为数不多的工厂都在三八线以北，而大部分肥沃土地都在三八线以南，把这个国家这样分开以后，就打乱了它的正常的经济生活，增加了人民的痛苦。

我们驻朝鲜军队的司令官约翰·霍林与德国的司令官进行谈判，但他每次的建议总是遭到拒绝。在占领朝鲜三个月

——译者
以后，霍季将军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朝鲜情况，他认为由俄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一个在三八线以北，一个在三八线以南——来占领朝鲜，势必使我们的占领使命难于完成，这个使命就是建立良好的经济基础和为朝鲜将来的独立准备条件。在南朝鲜，人们把分裂的局面归咎于美国，这个地方的人越来越憎恨一切美国人。霍季将军报告说，朝鲜人十分了解，在目前这种由两个国家占领的情况下，关于真正的自由和独立的谈判，纯属空谈而已；然而朝鲜人希望自己获得独立，他们已开始怀疑盟国的诺言是否具有诚意。霍季说，按西方的标准，朝鲜人还不够独立的条件，但是日益明显的事实是，在两国占领局面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他们的自治能力是不会有很大增长的。

根据霍季的看法，朝鲜人极其厌恶盟国所采取的托管这个暂时解决办法，以致“如果现在或将来任何时候要强制实行的话，相信朝鲜人一定会拿起武器来反抗。”

霍季将军最后总括起来说，“在目前这种条件和政策下，美国占领朝鲜一定会把我们冲到政治和经济深渊的边缘，在这个深渊里，美国在远东的威信就无以挽回了。为了不再朝这个方向流去，就必须在国际方面采取积极的行动，或者在最近的将来由美国在南朝鲜取得完全的主动权。目前特别迫切需要做的是：(一)取消三八线这个障碍以统一朝鲜。(二)明确发表关于前日本财产的地址以及关于任何这类财产的赔偿问题的政策声明。(三)在采取上述行动的同时，重申盟国关于给予朝鲜独立的诺言。(四)应在新闻界，在社会人士，在国务院和陆军部以及在各盟国的心目中，把朝鲜同日本完全划分开来。

“在目前还不会很快采取纠正办法的情况下，我很想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让我们认真考虑一下，同俄国达成一项协议，由美国和俄国同时从朝鲜撤退各自的军队，而让朝鲜自己去想办法，让它
为了自行清理内务而去蒙受那场不可避免的内乱。”

这个问题已经决定由两国政府派遣最高级代表进行谈判。当时贝尔纳斯国务卿在1945年12月前往访问莫斯科时，朝鲜问题就是他同莫洛托夫谈判的问题之一。

在第一次外长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议程的名目是双方同意：“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朝鲜政府而建立一个统一的朝鲜行政机构”。贝尔纳斯国务卿在11月8日给莫洛托夫的一封信的副本交给了其他外长。在这封信里面，哈里曼请求授权在朝鲜的苏军司令官同美军司令官进行商谈，以便就交通、商务、货币和有关朝鲜的其他悬而未决的事项等这类共同的问题作安排。

莫洛托夫先生立即显出他是一位多么难以对付的人物。他说，这封信所提的不属于政府行政机构的事项，因此与议程上的题目无关。他希望讨论的内容限于行政机构和托管方面的问题。

第二天，贝尔纳斯先生发表了美国对朝鲜的政策的声明。这个声明首先回顾了开罗宣言，宣言中曾强调指出我们必须使朝鲜获得独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建议立即采取行动，取消各自为政的军事行政区，而建立一个统一的行政机构，作为联合国委托四国托管的暂时的，但是必要的初步办法。我们说，我们希望在五年内可以给予独立。

莫洛托夫要求给予时间来研究我们的声明，而他一直到12月20日才重提这个问题。他当时承认苏联已经同意关于四国托管的办法，但是他说，这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即待解决的问题。然后他代表苏联政府建议，应当在朝鲜设立一个临时政府，以便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发展朝鲜的工业、农业、运输和朝鲜人民的民族文化。由苏军司令部和美军司令部的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应当协助成立这样一个临时政府，同朝鲜的各民主党派和社
会团体磋商，并提出自己的建议供各自的政府考虑。委员会还应当提出关于托管的建议，以供英国、中国和美国共同考虑。同时，朝鲜的美军和苏军司令部的代表应当在两星期内举行会议，来商讨有关南北两个地区的紧急问题，并拟定方案，以期两个司令部在行政和经济事务上的永久协调一致。

贝尔纳斯国务卿在第二天通知莫洛托夫先生说，除了两处小的修改外，我们可以接受这个建议。这个建议还写在莫斯科会议的公报里。

这是贝尔纳斯在回到美国的时候向我报告的。

朝鲜的美军司令官和苏军司令官按照莫斯科的协议在1946年1月16日举行了会议，但是差不多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双方的谈判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俄国人坚决认为，这种会议除了能就两个地区之间的次要问题作些调整安排外，无权讨论其他任何问题。我们的代表则认为，应当讨论有关两个地区最后如何统一的问题。到2月5日，最后只就交换邮件、无线电频率的安排、人和货物越过三八线的规定等一类问题达成了有限的协议。即使是这样一些协议，后来证明也是难于实现的，因此双方司令官会谈的真正结果，只限于偶尔交换邮件和互派人数不多的军事联络小组。

莫斯科协议中规定设立的联合委员会于1946年3月20日在朝鲜的古都汉城开始工作。这个委员会无疑是莫斯科会议制订的计划中的一个主要部分，但是这个委员会几乎刚开始工作就陷入了僵局。我们认为，所有的朝鲜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联合委员会应当听取朝鲜的任何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的代表所愿意提出的意见。但是俄国人却坚决认为，只有那些曾经充分支持莫斯科协议规定的朝鲜人才允许向委员会提出意见。然而事实上，在我们这个地区进行活动的一切政党派，都曾对推迟获得独立的期限和先要经过一个托管阶段的做法表示过失望，而按照俄
国人的标准，这样它们就没有资格向联合委员会提出意见。朝鲜的共产党人当然不可能去公开反对莫斯科协议的，这样一来，如果按照俄国人的办法，就只许共产党人代表朝鲜人民说话了。

联合委员会于是在5月8日无限期地休会，一点也没有接触到关系这个国家的重大问题。霍桑将军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还作过几次努力，希望同苏军司令官寻求达成协议的基础，但无结果。

这时候，极少数被允许进入朝鲜俄国占领区进行考察的美国人当中，有一个向我提出了一个报告。这就是作为总统的代表，以大使级头衔派赴朝鲜负责赔偿事宜的埃德温·保罗。他在1946年5月29日到6月3日巡视了北朝鲜的俄国占领区，俄国当局派人陪同他考察了那里的工厂。他还在朝鲜的我军地区盘桓了一个时期。在考察朝鲜的工作完毕以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我，把他所看到的情况归纳如下：

“下面是根据我自己和我的随员在朝鲜亲身考察后所获得的关于朝鲜情况的一些观感、结论和建议。我在朝鲜接见过我们占领军里面的一些人，也接见过北朝鲜的人和苏联占领军里面的一些人；他们的意见我也曾给予考虑。

“坦率地说，我非常担心我们在朝鲜所处的地位，而且我觉得我们并没有给予这个问题应有的注意和思考。尽管朝鲜是一个小国，从我们的整个军事力量来看，我们在这里担负的责任并不大，但是这个地方却是一个进行思想斗争的战场，而我们在亚洲的整个胜利就决定于这场斗争。就在这个地方将测验出来，究竟民主竞争制度是不是适宜于用来代替失败了的封建主义，或者其他某种制度——共产主义，还更弱一些。

“从苏联人的行动中可以看出，他们无意立即撤离朝鲜，理由如下：

“(一) 关于同美国采取共同行动设立托管的问题，关于建立
任何临时政府之类的机构问题，以及关于采取任何可能妨碍他们在北朝鲜进一步巩固自己的行动，苏联人显然都采取了拖延的办法。

“（二）他们正在扶植共产党和鼓吹苏联式的纲领，通过这种纲领，将使效忠于莫斯科成为效忠于朝鲜的最高形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对一切反对他们或者仅对他们的那种哲学提出疑问的政治党派横加摧残。例如，在北朝鲜的街道上，就张贴了苏联的标语和宣传画，其中大多数都是为苏联政府作宣传的，包括斯大林和列宁的巨幅画像。

“许多标语的字句如下：

“‘苏联和朝鲜的友谊万岁。’
“‘苏联政府是民主的最高形式。’
“‘我们要更高地举起红军的光荣旗帜。’
“‘为了祖国，为了党，为了斯大林贡献出我们的一切。’
“‘我们的胜利的缔造者斯大林万岁。’
“‘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战士必须加倍提高警惕。’
“‘红军战士的第一位老师就是他的班长。’

“从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联政府是不想让美国独家使用‘民主’这个字眼的。‘民主’对苏联人来说是另一回事，而对美国来说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对我们来说，‘民主’尤其是指言论、集会和新闻的自由，而苏联人对‘民主’的解释则是指人民群众的福利。

“在考虑苏联的宣传对朝鲜人所产生的效果时，必须记住在目前朝鲜的二千七百万人口中，大约有70%是小农和渔民。其中只有少数人投过选举票，甚至可以说只有很少一些人有投票权。他们对本国的或者国际的经济事务一无所知，这些人是很容易被甜言蜜语和诺言所迷惑的。

“（三）共产主义在朝鲜几乎要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具
备更好的条件来开始它的第一步。这里的铁路，一切公用事业包括水和电在内，以及全部主要工业和自然资源，都是归日本人所有。因此，如果这些东西突然一旦划归‘人民委员会’（共产党）所有，那末他们用不着费任何周折就可以取得这些东西，也用不着为了发展这方面的事业而进行任何工作。除非能保证在这里建立一个民主（资本主义）形式的政府，美国不应当放弃它对日本在朝鲜的国外资产的所有权的要求，这就是理由之一。

“(四) 虽然苏联人也许运走一些储存在目前生产的一些物资，但是他们并没有大量地把机器装备运走。

“(五) 他们正在大力恢复北朝鲜的经济活动，可能他们的目标是要用同苏联的新的经济联系，来代替已经中断的同日本的经济联系。

“(六) 苏联军队显然是在作长期留在朝鲜的打算。军官的眷属已经带来。事实上北朝鲜的铁路就是由军队在那里经营管理，从高级军官发表的谈话中，也看不出有任何撤离朝鲜的计划，甚至看不出他们希望撤离朝鲜的表示。……

“1946年6月22日”

那年秋季俄国人在他们的占领区举行了当地的“人民委员会”选举。99.3％的选民前往投票处投票，热烈地表示他们对新政权的“忠诚”。按照苏联的办法，选民用不着为挑选哪些候选人为主，因为只有一个候选人名单。

在我们南朝鲜这边，主要的口号是“需要教育而不需要教训”。我们的军政府容许充分的言论自由，即使朝鲜人批评美国占领军也无妨。当然，大多数朝鲜人既不希望美国士兵，也不希望俄国士兵留在自己的国土上，而共产党人就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排外情绪。1946年秋季，在我们占领的地区曾经发生过几起骚乱和示威运动，在少数情况下，我们的军队还不能不向进行威胁的群众开枪射
击。

朝鲜人民是从不知道什么民主政府的，因此我们需要采取的一些办法常常引起误解。当我们的军政府极力想听取一下各方面的意见的时候，人们就指责我们优柔寡断。当军政府提出警告不要采取暴力行动的时候，人们又指责我们不公允。争取朝鲜独立的老战士李承晚就曾指责霍季将军和我们的军政府“力图建立和扶植朝鲜共产党”。

1947 年 1 月，霍季将军报告说，除非美国和俄国合作来寻求解决这个国家的间题的办法，朝鲜事实上可能会发生内战。在经济方面，这个国家的情况似乎每况愈下。黑市造成了物价的飞涨，也使得市面上的物资供应陷于枯竭。水灾，罢工和战争造成各项设备的普遍损坏，交通运输几乎完全陷于停顿。

1947 年 2 月 24 日，霍季将军在白宫亲自向我作了报告。他对我说了朝鲜的经济困难和政治骚动的情况。他说了我们军政府曾经进行的一些工作，为我们在占领区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准备条件，但仍再度建议由俄国和美国共同寻求办法解决朝鲜的间题。早在霍季从汉城司令部书面提出了这个建议，促请立即采取措施通过外交方式来打开美苏在朝鲜的僵局时，麦克阿瑟将军就批准了这个建议。

我根据霍季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的这些报告，批准了国务卿马歇尔关于再一次努力促使联合委员会进行工作的计划。1947 年 4 月和 5 月，国务卿和莫洛托夫就朝鲜问题交换了函电，看来苏联政府已愿意改变它原来的立场。因此双方作了一些安排，准备联合委员会在 1947 年 5 月 21 日于汉城恢复工作。

这一进展又遭到一部分朝鲜人士的坚决反对，这些人不想重提托管的问题。李承晚是这帮反对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霍季将军很清楚李承晚会利用极右集团来破坏联合委员会的工作。
我们美国参加这个联合委员会的高级代表是艾伯特·布朗少将。委员会最初进行得似乎很不错。俄国人已愿意听取任何朝鲜社团的意见，不管这个社团过去的立场怎样，只要它现在表示支持莫斯科协议中所制定的政策。但是，7月初，苏联代表团又回到了它在1946年联合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上所采取过的立场。俄国人再一次坚持说，凡是曾经反对莫斯科协议中关于托管规定的党派和个人，都没有资格参加协商。于是关于言论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提上了日程，而在这点上，我们的代表是不能让步的。尽管这样，我们的代表团还是继续努力，想跟对方采取某些共同行动，可是没有哪一个建议能获得俄国人赞同。

1947年8月26日，我们向俄国人提出，由负责托管朝鲜的四个国家——英国、中国、苏联和美国——在9月8日于华盛顿举行会议，来商讨如何执行莫斯科协议的办法。在发出这项邀请书的同时，我们提出了七点建议：

（一）早日举行选举，以便选择俄国占领区和美国占领区各自的临时立法机构。投票应当采取秘密方式，并且应该是在普选的基础上实行多党候选人制，至于选举程序，则可按目前朝鲜南北两个地区各自的立法机构所规定的法律办理。

（二）这两个地区的临时立法机构，应当按两个地区的人口比例，选出相应数目的代表，由这些代表组成全国性的临时立法机构。这个立法机构应于汉城开会，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朝鲜临时政府。

（三）这样产生的这个统一的朝鲜临时政府，应当同讨论朝鲜问题的莫斯科协议有关的四个国家的代表在朝鲜举行会议，来和他们讨论应当给予怎样的支援和帮助，以便使朝鲜的独立能在巩固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之上，并讨论按照怎样一些条件来给予这些支援和帮助。

（四）在上述各个阶段中，都应当邀请联合国的观察员列
席。……

（五）朝鲜临时政府和有关国家应当协议规定一个日期，撤退朝鲜的一切占领军。

（六）应当赞助两个地区的临时立法机构起草临时宪法，以便将来全国性的临时立法机构在制定全朝鲜所遵行的宪法的时候，可以拿它作为基础。

（七）在一个统一和独立的朝鲜建立以前，应允许南北地区的朝鲜公私机构同联合国所建立的或所属的国际机构联系。……

俄国人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们坚决认为莫斯科协议已经规定成立联合委员会为朝鲜走向独立的第一步，任何其他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都将违反协议的。他们说我们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

这就使我们再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只能认为直接同俄国人进行关于朝鲜问题的谈判，是不会获得成功的。因此我指定国务卿马歇尔把这个问题提到将在纽约成功的联合国大会上去。马歇尔阐述了我们这方面在这场争执中所持的理由，他请求联合国去完成那项由于“两个国家无力达成协议”而至今受到阻碍的任务，也就是恢复朝鲜的统一。

俄国人为了对付这一着，便在9月26日联合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建议：1948年初的某个时候，所有占领军队同时从朝鲜撤退。联合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团回答说，它没有商讨这样一个协定的权力。俄国人随后还一再地通过正式手续把这项建议提到国务院。代理国务卿罗维特回答说，当联合国还在就主要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商讨单独的协定。

但是，我们还是考虑了关于撤退军队的问题。同战时的最高数目比起来，我们的武装部队已经大大地减少，而在国会中，也还是有一股很大的压力，要求进一步削减军事开支。我们承担的义
务很多，但我們的部队却有限。我命令国务院和国防部权衡一下，我们在各方面所承担的义务，考虑一下我们可以从哪些地方安全地撤退我们的军队。

参谋长联席会议从军事的角度就部队从朝鲜撤退的问题作了仔细的研究，在1947年9月提出报告说，在这个国家保持着我们那些人员不足的占领部队，并没有什么战略价值。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成员除了李海将军之外，还有艾森豪威尔将军、尼米兹海军上将和斯波茨将军。他们的意见都写在下面的备忘录里面，这份备忘录原是致送给国务卿的，他把它转给了我。

“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从军事安全的观点来看，美国保持目前在朝鲜的军队和基地，并无战略价值，理由如下：

“在远东一旦发生战事的时候，我们目前在朝鲜的部队将成为在军事上的一个负担，而且在战事发生以前，如果不大量地增加授军，那是不可能保得住的。而且，美国所可能希望在亚洲大陆进行的任何进攻，多半会绕过朝鲜半岛。

“相反的，如果敌人能够在朝鲜半岛建立和保持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基地，那么他们就可能干扰美国在中国的华东、满洲、黄海、日本海和邻近岛屿的交通运输和军事行动。敌人要进行这种干扰，就必须在一个地区保持大量的空军和海军力量，而这样的力量将会为空中的敌对行动所抵消。利用空军来抵消敌人力量要比大规模的地面作战更容易办到，花费要更少一些。

“在当前这种严重缺乏兵源的情况下，保持在南朝鲜的两个师——共约四万五千人——是可以很好地用到别的地方，把这些部队从朝鲜撤退，不会损害我们远东司令部的军事地位，除非苏联因此在南朝鲜建立足以向日本发动攻势的军事力量。

“在目前，占领朝鲜需要耗费巨大的开支，而这笔钱主要是为
了防止疾病和骚乱，这种疾病和骚乱可能会危害到我们的占领军，而对于美国安全的长远利益，如果有，也是微不足道的。

“根据朝鲜方面可靠的报告，在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朝鲜这个问题上，还是不会有进展，除非制订一个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进行恢复工作的计划，那末很可能会造成一种情况，包括暴动在内，使得美国占领军站不住脚。在这种局势下，慌慌忙忙地来撤退我们的军队，就会降低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威信，而且很可能会对我们其他地区同别人进行合作的关系上产生不良的影响，而这些地区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则是更为重要的。

“1947年9月25日”

当三军参谋长草拟这个报告的时候，他们已经获悉关于艾伯特·魏德迈中将的考察旅行的结果。魏德迈将军是我请他去作这次旅行的，关于他的这次旅行，后来谈论的人很多。魏德迈将军当时负责陆军方面的计划和作战工作，他曾亲自去考察了1947年夏季的局势，关于美国军队撤离朝鲜的问题，他的结论如下：

“当苏联军队仍然占领着北朝鲜的时候，美国就必须把它的军队留在南朝鲜，不然的话，就等于向全世界承认‘精神上的退却’。这样，美国的军事地位就会随之降低，不但在远东会是这样，在全世界也会是这样。……

“除了上面所指出的一点，以及由于美国军队的占领南朝鲜，就可以使一个潜在的敌人无从使用不冻港，也不会有机会在这个半岛上建立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基地以外，美国在朝鲜保持自己的军队或基地是没有什么军事价值的。一旦在远东发生大规模的战事，我们目前在朝鲜的部队很可能只会是一个军事上的负担，因为照我们目前的军事力量来看，这些部队在那里是维持不下去的。

“在朝鲜的美国占领部队有三条路可走：

381
“一是立即撤退，这样就会在北朝鲜人民（共产党）军可能发动的压力下，放弃南朝鲜，把它让给苏联，因此从战略的观点来看，这种办法是不可能接受的。

“其次是无限期地占领下去。这种做法，在苏联军队撤走以后，不可能为美国的公众所接受，而且会使美国受到国际的谴责。

“最后是和苏联占领部队同时撤退。”

魏德迈将军最后建议最好是在同俄国人达成协议的基础上，走第三条道路，而在我们军队撤离以前，由我们来帮助南朝鲜建立和训练它本国的国防军。

为了想同俄国人就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我批准了一个提交给联合国大会讨论的详细方案。我们建议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于1948年3月31日前在南北朝鲜两个地区举行选举，以此作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府的第一步。我们主张这个全国性的政府应当建立自己的保安部队，组织政府机构，然后同占领国商议撤退他们的军队问题。为了监督选举和促进以后各个步骤的进行，我们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

俄国人的回答是否认我们违反了莫斯科协议，因为我们竟首先把这个问题提到联合国。然后他们提出要求立即撤退占领军的议案。这个议案在第一次会议和大会的全体会议上都没有获得通过，于是苏联代表宣布，如果成立联合国朝鲜事务委员会，苏联将不可能参加它的工作。

在大会上代表美国发言的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大会终于通过了美国关于朝鲜问题的提案，弃权的只有苏联集团。

接着便成立了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委员会在1948年1月12日在汉城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尽管北朝鲜的苏军司令官不让这个委员会的人进入三八线以北地区。苏军司令官甚至拒绝接受委员会寄给他的信件。
联合国大会临时委员会于是命令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在它所能到达的朝鲜任何地区展开工作。这个委员会后来负起了监督1948年5月10日举行的自由选举的任务。尽管共产党人组织地极力制造骚乱，破坏这次选举，南朝鲜五分之四的合格的选民都履行了登记手续，而这些登记了的选民，有90％以上的人投了票。这是朝鲜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正如后来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的报告所说的，这次选举是“委员会所能到达的地区的选民的自由意志的确切体现，而这些地区的居民将近占全体朝鲜人民的三分之二。”

美国占领区的人民选出的国民议会在1948年5月31日举行了一次会议。大会选举李承晚先生为主席，然后进行草拟大韩民国的宪法的工作。这项工作在7月12日宣告完成，7月17日便公布了朝鲜的新宪法。7月20日，李承晚被国民议会选举为大韩民国的总统。

遵照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案，建立大韩民国的下一个步骤是把政权从南部地区的占领军司令部和民政机构移交到新成立的大韩民国。我们军政府的官员在过去三年中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政府机构，其职员几乎全是一朝鲜人。这就使得移交工作十分顺利。

我指令国务院尽快地进行这项工作。朝鲜人民希望有自己的政府，而他们也有权利得到这样一个政府。因此，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便正式宣告成立，美国军政府宣告结束。9月11日，我们就新政府接管几个警察和安保部队的问题作了安排，同时在财产和财政问题方面获得了解决办法。

9月9日，北朝鲜的苏联占领当局针对大韩民国的建立，在平壤宣布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十天以后，苏联外交部告诉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馆说，所有苏联的部队将在1948年12月底从朝鲜撤退。后来还告诉我们，这一计划已如期完成。
我們當然贊成撤退軍隊。我一向相信，再沒有比不需的軍隊——外國的也好，本國的也好——駐扎在一个地方更加容易引起敵對情緒。我們南部各州的人民在凄苦的改造時期就具有這種情緒，當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小孩的时候，我就从我的父母和家庭的亲友处听到許多关于南方进行反抗的种种情况。正同我母亲一样，我的父亲就是一個沒有改造過的人。

但是，我們知道俄國人在北朝鮮建立了一支“人民軍”。我們知道共产党渗透到南朝鮮的情況很严重。我們知道李承晩的新政府如果一旦遭到攻擊，一定難于作有效的抵抗。可是，我們的专家們就新成立的大韓民国的生存問題作了仔細的估計，他們的結論是，“只要這個國家能繼續從美國取得大規模的援助，那末它的生存是可以认为有希望的”。

1948年春，國家安全委員會向我報告說，我們可以在下列三個办法中選擇一個：放弃朝鮮；或者繼續負起對這個國家的軍事上和政治上的責任；或者擴大我們對朝鮮政府的援助來訓練和裝備它本国的保安部队，同時給予大規模的經援助，以免這個剛剛誕生的國家陷于崩潰。但是委員會建議我採取第三個辦法，我批准了這個辦法。

陸軍部長羅亞爾說，1949年2月初他同賴克阿瑟將軍談話的時候，賴克阿瑟將軍表示贊成赶快把我們的軍隊從朝鮮撤走。此外，當國家安全委員會在1949年3月22日研究朝鮮局勢的時候，它還獲得了賴克阿瑟的一個報告，說是大韓民国新建立的保安部队所受的訓練和它的戰鬥意志，都已達到一定的水平，現在已經有理由把美國軍隊全部撒離朝鮮，而對我們在朝鮮的地位不利產生不良結果。

这个时候，南朝鲜人已經組織了一支約有六万五千人的軍隊，这支军队訓練的速度很令人滿意。幫助这支军队执行任务的是由
我們軍隊抽調的約五百名官兵所組成的顧問團。除了這個顧問團以外，我們的軍隊全部在1949年6月29日撤离了朝鮮。

在朝鮮的軍事撥款（1949年會計年度）期满以前不久，我致送国会一个咨文，请求以一亿五千万美元作为援助朝鮮的经济援助。不幸的是，国会竟拖了四个多月才批准了这笔费用，而当我请求为了同一目的另以六千万美元列入1950—1951年度预算中的时候，这个请求实际上被众议院否决了，大多数反对票来自共和党人。这笔经費后来虽然作为朝中援助联合法案中的一部分而获得通过，就总的情况来看，国会对于总统所请求的援外法案，可以说是抓得不紧的。

为了巩固朝鲜的军事地位，我批准了在1950年1月26日签订的一个防务协定。但是，我們对南朝鲜的国内局势和经济情况还是很关心。我之所以批准撤退军队的政策，理由之一——尽管只是一个次要的理由，是当时存在着一种危险，那就是我們可能会被卷入这个年轻国家的政治纠纷中而无以自拔。李承晚总统是一个自信心很强的人，而对于具有不同意见的人则不能容忍。自从1945年他回到朝鲜的那天起，他就吸收了一批具有极端右倾观点的人，而对那些不怎么太走极端的政治领袖的意见则坚决拒绝。軍政府的撤退，使他可以肆无忌惮地以专断手段对付他的反对者。我倒不在乎李承晚的警察采用怎样一种方法来捣乱政治集会和压制政敌，我深切关心的是李承晚政府竟然不顾席卷全国的严重通貨膨胀。然而他們除了支持李承晚，再没有选择的余地。从1905年以来，朝鮮就受到日本人的摧残和蹂躏，它没有机会培养出其他的领袖人物。

我們知道，如果北朝鲜的军队发动一次全面进攻，李承晚的政府就会遇到严重的威胁。因此，我們要求他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地区巩固起来；此外，我們还要求他设法使农民过繁荣幸福的生活，使他們不至于受共产党的鍾惑。
第二十二章
朝鲜受到侵略

1948年春，当我和我的顾问们讨论朝鲜政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苏联控制下的共产主义世界可能会选择这里作为进攻地区之一。但是，从挪威经柏林到的里雅斯特到希腊、土耳其和伊朗，从北大西洋到印度支那和马来亚、凡是东西方有接触的地方，我们都可以作同样的估计。

当然，每一个司令官都认为他那个地区的处境最危险。很明显，关于部队和物资的分配，不能由一个地区的司令官、而必须由高级统帅部来作最后决定。

1950年春从朝鲜获得的情报，说明北朝鲜当时正在不断地建立武装部队，并不断地派遣游击队到南朝鲜。

沿着两军对峙的三八线上，也不断发生事件。

在整个春季期间，中央情报局不断报告说，北朝鲜随时都可能把零星星星的袭击变为全面的进攻。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北朝鲜在任何时候都有发动这种全面进攻的能力，但是，究竟是不是一定会发动这种进攻，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却没有可靠推断的情报。但是，这也不仅是朝鲜是这样，就是这些报告还一再地告诉我，在全世界其它许许多多的地区，俄国人都“具有”进攻的“能力”。

1950年6月24日，我同我的一家人在密苏里州独立城度周末，并打算料理一些家务。

晚上十点左右，当我们围坐在北特拉华街我们家的书室里
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这是国务卿从马里兰州他家里来的电话。

“总统先生，”迪安·艾奇逊说，“我有极共重大的消息告诉您，北朝鲜人已经进攻南朝鲜。”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必须赶回国去，我把我的打算告诉了艾奇逊。但是，他解释说，详细情况暂时还不清楚，他认为我走不着赶回去，等他再打电话来提供更多的消息后再说。同时，他向我建议，我们应当请联合国安理会立即召开会议，宣布大韩民国受到了侵略。我对他表示我同意这个意见，并要他立即请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他说他将在第二天上午再和我通电话，报告情况，如果获得更多的有关朝鲜事件的情报，也可能会提前来电话。

艾奇逊的第二次电话是星期天上午十一点半左右打来的。他报告说，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召开紧急会议。他从朝鲜收到了更多的情报，该地区无疑已经发生了全面进攻。艾奇逊说，安全理事会可能会发出停火的命令，但是鉴于北朝鲜人和他们的大盟友过去完全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的态度，我们不能不设想联合国的命令会遭到忽视。因此必须立即作出其他决定，如我国政府愿意对大韩民国给予多大的援助或鼓励。

我要艾奇逊同意海陆空三军部长和参谋长立即开始进行研究，以便在我回来以后提出建议。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在视察远东之后，正在返国途中。我通知国务卿说，我马上就回华盛顿。

总统的《独立号》专机上的机务人员的工作是出色的。他们在接到通知后不到一小时就做好了起飞前的准备工作。由于我走得这样匆促，以致有两个随从人员竟没有赶上，因为他们没能及时获得通知赶到机场。

飞机在下午两点从威斯市飞机场起飞，三小时多一点就到
达了华盛顿。我利用在飞机上的时间进行思索。在我们这个年代，强者向弱者进攻，这并不是第一次。我想起了早些时的事件：满洲事件、埃塞俄比亚事件和奥地利事件。我记得每当民主政治没有能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怎样助长侵略者的气焰。共产党人在朝鲜的所作所为，就如同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人在十年、十五年和二十年前的所作所为一样。我深切地感觉到，如果听任南朝鲜沦丧，那末共产党的领袖们就会越发狂妄地向更靠近我们海岸的国家进行侵略。如果容忍共产党人以武力侵入大韩民国，而不遭到自由世界的反对，那末，就没有哪一个小国会有勇气来抵抗来自较为强大的共产主义邻邦的威胁和侵略。如果对这种侵略行动不加以制止，那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如由于类似的事件而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我还清楚地认识到，除非这次对朝鲜的无理攻击得到制止，联合国的基础和原则将受到威胁。

我吩咐飞机上的无线电报员给迪安·艾奇逊一封电报，叫他和他的亲信顾问们以及国防部的高级首长到布莱尔大厦来参加晚餐会。

当《独立号》飞机着陆的时候，在机场迎接的有国务卿艾奇逊和刚刚回国的国防部长约翰逊。我们匆匆地赶到布莱尔大厦，会见了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士，他们是：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海军部长弗朗西斯·马修斯和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陆军上将奥马尔·布莱德雷、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和海军作战部长福莱斯特尔·薛尔曼海军上将。随同迪安·艾奇逊来的还有副国务卿韦伯、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约翰·希克森，以及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

时间已经不早，我们立即入席就餐。我请大家在晚餐准备好和布莱尔大厦的工作人员退出以前，不要进行讨论。我首先请迪安·艾奇逊详细地报告了当时的情况。他宣读了国务院在昨天晚
上九点二十六分收到的我們駐朝鮮漢城的大使發來的第個報告：

“根據朝鮮軍隊的報告（此项报告已部分地为朝鮮軍事顧問團的觀察顧問的報告所证实），北朝鮮的部隊今天清晨已向大韓民國領域的好几个据点进犯。开始行动的时候大约在上午四点。釜津遭受北朝鲜炮火的轰击。六点左右，北朝鲜的步兵开始在釜津、开城和春川等地区越过三八线；据称水陆两用部队已在东海沿江陵的南部登陆。开城据说已在上午九点陷落，北朝鲜大約有十辆坦克参加这次战斗。北朝鲜部队以坦克为前锋，据称已向春川逼近。江陵地区的战斗详情不明，但似乎北朝鲜部队已将公路切断。我今天上午正在同朝鲜軍事顧問团的顧問們和朝鮮的官員們进行会商，研究当前的局势。

“从进攻的性质和发动这次进攻的方式看来，这似乎是对大韓民國的一场全面攻击。

“穆乔”

除此以外，穆乔大使还拍来了一些电报，告诉我们更多的情况，但无一不证实一次倾其全力的进攻已經开始，而北朝鲜人还在广播中发表了一个文告，这个文告实际上是一份宣战书。

先是艾奇逊星期天晚间报告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九对零的票数，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北朝鲜的行动破坏了和平，并命令北朝鲜人停止行动，撤退他們的部队。

我于是要艾奇逊提出已由国务院和国防部准备好的建议。他提出了要求立即采取行动的下列各项建議：

（一）麦克阿瑟应将美国人——包括美国軍事顧問团人員的眷属——撤离朝鲜，为此，应当守住金浦和其他航空港，击退对这些地方的一切进攻。在履行这項任务时，麦克阿瑟的空军部队应当留在三八线以南。
（二）应当命令麦克阿瑟以空投和其他办法把军火和给养供给朝鲜军队。

（三）应当命令第七舰队进入福摩萨海峡，以防止战争扩大到该地区。应当命令第七舰队立即从甲米地①北上。我们应当发表一项声明：第七舰队将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而福摩萨也不得进攻大陆。

说到这里，我想进一句说，应当立即命令第七舰队北上，但是在该舰队到达指定地区以前，我希望暂不发表声明。

这个报告作完以后，我便依次向每个人征求意见，是否同意，是否还有什么补充意见。在这次讨论中，有两点是搞清楚了的。一是到会的每一个人几乎一致地默认，凡是为了应付这次侵略所必须做的，就必须做。任何人都没有提出说联合国或美国可以置之不理。这是过去五年来关于集体安全的一切谈判的一次考验。其次是关于怎样进行援助方面存在着分歧意见。范登堡和萨尔曼认为给予空军和海军方面的援助就够了。柯林斯则说，如果朝鲜的军队当真被击败，那就必须使用地面部队。但是谁也不知道星期天晚上朝鲜军队的确切情况。不过无论如何，大家都认识到情况是极为严重的。

于是我指示有关部门发出命令，立即执行那三项建议。

在继续进行讨论的时候，我说，北朝鲜人是否会重视联合国的命令，在这点上我不抱什么希望。也就是说，联合国如果想使自己的命令得到贯彻，那还得使用武力。

布莱德雷将军说，我们总要在什么地方划一条分界线。他认为俄国还没有作好战争准备，但在朝鲜，他们显然是在向我们进行试探，而现在就应该把这条线划好。

① 位于菲律宾群岛，美国的一个海军基地设此。——译者

390
我說，我極其堅決地認為，應該把這條線划好。

柯林斯將軍報告說，他曾經和麦克阿瑟將軍通過打字電報機
作過一次會談。他告訴我們，他們遠東司令部已經準備好，一旦得
到放棄的綠訊號，就把軍火和給養運往朝鮮。

我說，我认为俄国人估计我们不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
会抵抗，企图违反協議把朝鮮搞到手。我认为我們依然是占上风
的，尽管占上风占到什么程度，还很难說。

我問三軍參謀長，柯林斯，范登堡和薛尔曼，关于俄国在远东
的武装力量，他們有些什么情报。然后我问薛尔曼海军上将，第七
舰队現在什么地方。他说舰队开出日本两月，現在靠近菲律宾群
岛。我接着问他，把这一支舰队調到福摩薩海峡需要多少時間，他
回答說需要一天半到两天。

我問柯林斯將軍我們在日本駐扎了多少師，把两三个师調到
朝鮮需要多少時間。他提供了这方面的情報。

然后我問空軍部长芬勒特和范登堡將軍，我們目前的空軍是
怎样部署的，增援我国在远东的空軍部队，需要多少時間。

我指示三軍参谋長作好必要的准备，以便联合国一旦号召向
北朝鮮采取行动的时候，立即发出命令，使用美国的部队。同时，
我还指示麦克阿瑟将军派遣一个調查组到朝鮮去，看哪一种援助
最有效，和应当怎样使用这位远东司令官所能使用的武装部队。麦
克阿瑟将军还应当以他所能提供的军火和装备供应大韩民国。我
并且授权他使用空軍和海軍的掩护，以便确保这些供应品的运输，
同时保护从朝鮮撤出的美军眷属。第七舰队也交给麦克阿瑟指挥，
它的基地設在日本的佐世保。

散会以后，艾奇逊交给我一封电报，这是刚从朝鮮回到东京的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拍給他的。杜勒斯曾經为国务院就准备对
日和約工作过一段时期，看来他对我們所必需采取的行动，也沒有
什么犹豫。他的电报如下：

“很可能，南朝鲜人自己能够抵挡和打退这次进攻。如果这样，
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但是，如果看样子他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
们认为应当使用美国的部队，即使这样做会招致俄国人进行反击
的危险。坐视朝鲜在无缘无故的情况下遭受武装攻击的蹂躏，就
将产生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从而极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我们建
议安理会代表联合国组织，根据第一○六条号召五大国或五
大国中愿意响应的国家采取行动。”

到星期一，从朝鲜来的报告显得情况不妙，令人沮丧。其中有一
个是李承晚用国务院电报体发来求援的：

“从 6 月 25 日清晨起，北朝鲜的共产党军队便开始向南部进
行武装侵略。朝鲜和美国国会当已知道，我国人民预见到会有像
今天这样的事件，为了成为东方的民主堡垒，为世界和平作出贡
献，曾经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力量。我们要一次感谢您在使我们获
得解放和建立我们的民主所给予的必不可少的援助。在我们面
临这一民族危机并进行英勇战斗的时候，我们向您发出呼吁，求
请您更多地给予我们支持，同时给予我们有效和及时的援助，以便
制止这种破坏世界和平的行动。”

把李承晚总统的这封求援信交给我们那位朝鲜大使，显得很
是忧虑，几乎要掉出眼泪来。我试图安慰并鼓舞他，我对他讲，这
场战斗还只进行了四十八小时，而其他国家的一些人，在情况恶劣
得多的条件下，为了捍卫他们的自由，坚持抗战到最后一死。我要
他坚持下去——援助的东西很快就会到达。

但是，大韩民国的军队完全抵偿不了北朝鲜的坦克和重武器。
李承晚政府的首都汉城看来就要完蛋，共产党的坦克部队据说已
兵临城下。李承晚把他的政府迁到了汉城以南约一百五十英里的
大丘。

392
星期一那天，朝鲜的局势急转直下。当晚我在布莱尔大厦召集了另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也就是前次会议的原班人马，只有海军部长马修斯没有到，而助理国务卿马休斯则代替了腊斯克。麦克阿瑟最近的一个电报是十分令人吃惊的。

“南朝鲜第三和第五师零零星星地投入汉城附近战斗的结果，并未能阻止敌人的入侵，这种入侵被认为是过去两天中敌人行动的主要努力，其目的在于夺取首都汉城。敌人的坦克正进入汉城近郊。政府已南迁大丘，并已开始与朝鲜军事顾问团的部分机构建立通讯联系。大使和朝鲜军事顾问团的主要负责人还留在汉城。在当前这种迅速恶化的局势下，远东司令部派出的向前朝鲜的军事调查组已下令召回。

“南朝鲜的部队抵挡不了北朝鲜的猛攻。敌人的有利因素完全在于拥有坦克和战斗机。作为战斗情况的指标来看，南朝鲜的伤亡人数表明缺乏足够的抵抗力，也缺乏战斗意志，据我们估计，很快就将全部崩溃。”

现在是一点疑问都没有了！大韩民国立即需要援助，如果要使它不遭受蹂躏。更加严重的是，如果共产党在朝鲜获得成功，那就会置日本于容易受到红军和飞机攻击的距离之内，而冲绳岛和福摩萨就会腹背受敌。

我对你们说，目前朝鲜局势的发展，在我看来，就像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共产党人总是找我们军事上的弱点进攻，我们必须对付他们的攻击，以免被卷入世界大战。

我指示国防部长同麦克阿瑟将军通一次变换频率无线电电话，把我的各项指示亲自送达给他。我命令他使用在他指挥下的空军和海军部队去支援大韩民国，但只限于三八线以南地区。我还命令他把第七舰队开到福摩萨海峡去。这一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共产党人向福摩萨进攻，同时防止蒋介石向大陆骚扰，后者的目的
是为了避免共产党人采取报复行动，而扩大冲突地区。

我还批准了关于加强我们在菲律宾的武力和增加对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的援助的建议。同时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于 6 月 27 日通过了关于号召联合国各国成员国援助南朝鲜的决议。

就在今天（星期二）上午，我召集了国会的领袖们开会，以便向他们说明最近几天来的局势和我们所作出的决定。除了“四巨头”（巴克莱、麦克法兰、雷明和麦考马克）以外，与会的还有康耐利、维利、亚历山大・史密斯、乔治、泰丁斯、布里奇斯和犹他州的托马斯等参议员，基、伊顿、文森和肖特等众议员。艾奇逊、约翰逊、佩斯、马休斯、芬勒特、三军参谋长以及他们的一些助手也在座。

我请国务卿把局势概括地叙述了一下。然后我指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行动，而且极其迅速地采取了行动的是联合国。我在会上宣读了一项声明，这项声明原是早就准备好打算在这天会后向报界发表的。我征求诸位国会领袖对这个声明的意见。

参议员维利问，截至目前为止，麦克阿瑟将军派遣了什么样的部队。约翰逊部长确切地告诉他，麦克阿瑟一接到命令，就立即派出了他的空军和海军部队。

参议员泰丁斯说，他所领导的兵役委员会已经在那天上午决定延长征兵法的期限，并授权总统召集国民军的权力。

参议员史密斯认为，我们在朝鲜应当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而不是单独一个国家来行动。我说这个意见很正确，但指出，我们对朝鲜所采取的行动，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而不代表联合国。

约翰・麦考马克想从薛尔曼海军上将那里知道海军是不是不需要扩充。约翰逊部长回答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业已开始就扩充所需要的三军部队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原来的平衡计划还是要保持。
众議員基、參議員康納利和国务卿就联合国决议案的措词问题提出了一些建仪，杜威・肖特表示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在这个问题上支持联合国。

国会领袖们都同意我所采取的行动。就在这一天，共和党的领袖托馬斯・杜威也保证完全支持我的行动。

下面是我同国会领袖们会晤后向报界发表的声明。

“总统的声明”

“在朝鲜，为了防止边境袭击及维持国内治安而武装起来的政府部队，遭到北朝鲜进犯军的攻击。联合国安理会会要求进犯军停止敌对行为，并撤退至三八线。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地反而加紧进攻。安理会要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给予联合国一切协助以执行此决议。在这种情况下，我已命令美国的空海部队给予朝鲜政府部队以掩护及支持。

“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它违抗了联合国安理会为了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发出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部队的占领福摩萨，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

“据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攻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还要求福摩萨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行动。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福摩萨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

“我并已指示加强对东的部队，及加强对菲政府的军事援助。

“我同样也已指示加速以军事援助供给在印度支那的法国及
其联邦成员国的部队，并派遣军事使团，以便与这些部队建立密切工作关系。

“我知道联合国的一切会员国将仔细考虑最近在朝鲜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侵略行为的后果。在国际事务中恢复强力统治将有广泛影响。美国将继续支持法律统治。

“我已命令美国驻安理会代表奥斯汀大使向安理会报告这些步骤。

“1950年6月27日”

我们的盟国和海外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当时的心情是：必须坚决制止这种对一个自由国家实行武装侵略的行动，这对保持和平十分重要。我们向大家宣告，我们认为朝鲜的局势关系很大，因为从这种局势中可以看出西方的力量和决心。目前，要想制止世界其他地方的新的行动，唯一的办法是采取坚决的行动。根据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行动保护一个在我们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并且由联合国采取行动来保障它的自由的国家，那末，不但在亚洲，而且在欧洲、中东和其他地方，靠近苏联的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信心都会受到极不好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坚决地和胜利地回击对南朝鲜的威胁，那么就会继续我们在伊朗、柏林和希腊反对共产党人的侵略行动的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以后，第四次获得胜利。我们提醒我们的盟国，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都会使苏联人在采取这种行动的时候不能不更加小心一些，而自由世界的和平就愈有保障，和平的前景就更加光明。

关于最高政策的讨论在6月28日星期三那天继续举行，这一天我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研究了朝鲜方面报来的局势的最近发展情况。我对有关部门说，我希望重新彻底研究一下我们对邻近苏联地区所采取的各种政策。约翰逊部长和艾奇逊国务
卿报告说，由于朝鲜局势所引起的某些紧急问题，业已开始研究。

这个时候，副总统巴基斯坦也赶来参加了会议，他原来因国会方面事务不能脱身，可是这也有好处，使他能够带给我们一个消息；参议院已经一致通过了关于延征兵法有效期的决议。

国务卿艾奇逊指出，对我的政策的一致支持，可能不会持久。我们在朝鲜所已经做的事情，其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但是随之而来的责任也是同样巨大的，因为在过去三天中所做的事情，很可能最后把我们卷入一场全面的战争中去。

我回答说，这件事所包含的危险很明显，但是，我们不能放弃朝鲜，除非其他地方的军事情况要求我们这样做。

刚从欧洲回国的阿弗里尔·哈里曼说，欧洲人士都耽心得很，就怕我们对付不了朝鲜的这次挑战。他说，在我作出的决定宣布以后，人们普遍感觉松了一口气，因为大家认为，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一定会引起一场灾难。他还说，欧洲人都充分认识到我的决定的深刻意义。

副总统提到，他曾经听到一个参议员表示怀疑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是否愿意帮着干。我说，我们刚才还获得了英国所提供的具体帮助，它将以海军支援我们。我请约翰逊部长向副总统提供比较详细的情况，以便他能这方面消息告诉参议院诸议员。

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提出了关于在华盛顿和东京的远东司令部之间取得相互谅解的问题。他认为通过个人的接触，将有助于避免错误，他并且建议派我登堡将军到麦克阿瑟将军那里去，以便更加具体地告诉他华盛顿方面的想法。

但是我认为在当前这个时候，非常迫切地需要把三军参谋长留在华盛顿。而另一方面，我也懂得在华盛顿和东京之间，必须取得相互谅解。我还表示我认为遗憾的是，我屡次召请麦克阿瑟将军回国，没有一次不遭到他的拒绝，而且短时间回国一趟都不
行。他一直没有机会来看我这个总司令。我认为如果朝鲜的冲突延长下去，我希望能见一见麦克阿瑟将军。

陆军部长佩斯报告说，他已经向各军事情报部门发出命令，要它注意苏联参加朝鲜战斗的任何迹象，他并且想知道，除朝鲜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地方应当进行特殊的情报工作。我回答说，除朝鲜以外，我们的战略情报机构还应注意其他地区，我认为苏联在南斯拉夫一带，尤其是在保加利亚一带，以及在北欧一带所进行的活动，应特别加以警惕。

陆军部长还报告说，他已经作出安排，准备向国会作一系列有关军事情况的报告。在这一点上，我对副总统说，我希望这些报告一定要是两党性质的报告，我并且希望他去确定听报告的人。

国家安全委员会于星期四再度举行会议，国防部长约翰逊提出了一项发给麦克阿瑟将军的指示的建议。但是，在他建议的这个指示的最后一段里，却含有我们正在计划同苏联作战的意思。因此我十分明确地说，我不希望含有任何这样计划的意思。我希望的是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迫使北朝鲜人退回到三八线以北去。但是我希望我们能保证不致于过深地陷在朝鲜，以至我们照顾不了其他地方可能出现的类似情况。

佩斯部长认为，对于授权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的问题上，我们应当特别慎重，而且我们应当对这种行动明确地加以限制。我同意这一点，并指出凡是在三八线以北所进行的军事行动，应当仅限于破坏军需品的供应，因为我希望大家都明确地了解，我们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是为了恢复那里的和平，恢复原来的疆界。国务卿艾奇逊说，空军在执行任务时不应当受到那样的限制，不应把三八线作为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来严格遵守。但是他希望我能保证做到一点，那就是采取防御措施，使空军部队不要飞越朝鲜的边界。他建议在发给麦克阿瑟的指示中，包括应付苏联万一进
行干涉的一些办法，内容大致是他应当如何捍卫自己的据点和我们的部队，并立即向总统报告请示等等。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要艾奇逊和约翰逊共同草拟这个文件。

接着国务卿评论了苏联对我们向它发出的关于协助停止朝鲜战事的呼吁所作的回答，艾奇逊认为，拿北平所发表的一项声明①来同苏联的回答联系起来看，似乎表示苏联人不在于自己出面干涉，而可能会使中国共产党来进行干涉。艾奇逊建议把我们致苏联的照会和它的复照公开披露，我批准了这项建议。

国务卿还报告了关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荷兰所提供的援助。我说我希望援助南朝鲜的部队能够真正成为代表联合国的部队。

在散会前，我要国防部长以我的名义草拟一个发给麦克阿瑟将军的指示，命令他每天就远东的局势作一次详尽的报告。

这一天的稍晚一些时候，国务卿艾奇逊回到白宫，除其他事项以外，我们讨论了关于中国政府要求在朝鲜方面的援助的问题。蒋介石曾经指示他的大使转告我们说，他愿意派遣为数达三万三千人的地面部队，但是他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因此必须由美国协助，把福摩萨的地面部队输送到朝鲜，并供应它们给养。

我对艾奇逊说，我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应当接受这番好意，因为，正如我今天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说的，我希望看到尽可能多的联合国成员国参加对朝鲜的行动。艾奇逊指出，国民党中国的情况与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情况略有不同。福摩萨是最可能遭到攻击的地区之一。这就是我们已经把第七舰队派到那里去的原因；一方面花美国的钱去保卫那个岛屿，而另一方面……

① 指1950年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就杜鲁门的声明所发表的声明。——译者
面这个岛屿的理所当然的保卫者却跑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做多少是有些矛盾的。他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委员会的军队在进入现代化战斗以前，是否还必须由我们给他重新大大地装备一番。

我请艾奇逊在第二天同国防部长约翰逊和三军参谋长会议时提出这个问题。第二天一早，我还是倾向于接受中国关于出兵朝鲜的请求。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在早晨五点钟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刚刚同麦克阿瑟用无线电打字电报机作过长时间会商的柯林斯将军谈过话。麦克阿瑟将军在乘飞机视察朝鲜前线归来以后，立即要求举行这样一次会商。麦克阿瑟说，他相信只有靠美国的地面部队，才能阻止北朝鲜军的前进。他请求准许以一个团的兵力马上投入战斗，同时尽可能迅速地建立两个师。

陆军部长向我表示处理办法。

我要佩斯立即通知麦克阿瑟将军，我同意他使用一个团的兵力投入战斗。

上午七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位上校官员来向我汇报昨晚从朝鲜收到的情况报告。他汇报完毕以后，我立即通知佩斯和约翰逊，叫他们准备在上午八点半钟开会，讨论关于麦克阿瑟请求授予权使用两个师和蒋介石提出的关于派兵前往朝鲜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我所召集的也就差不多是上次我从独立城赶回后当晚在布莱尔大厦举行会议时到会的那些人。我对参加会议的人说，我已经批准使用一个团的兵力，现在我想请大家讨论一下是否可以再增加两个师的兵力。我还请大家讨论一下，关于中国方面提供的援助，是否值得接受，特别是因为蒋介石曾经说，他的三万三千人的部队在五天之内就可以上船出发，而争取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我请他们仔细考虑一下其他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
比方说，毛泽东会有什么行动？俄国人到巴尔干半岛、伊朗和德国会有什么行动？

国务卿艾奇逊说，如果福摩萨的中国军队在朝鲜出现，北平的共产党人就可能决定参战，因为他们可以趁此打击蒋介石委员长的军队，以削弱蒋介石的力量，以便他们试图进攻福摩萨时蒋介石难以自卫。

三军参谋长指出，蒋介石委员长所提供的三万三千人，尽管他自己说是他的最精锐的部队，却很少现代化装备，其情况恐怕会同李承晚的军队无法对付北朝鲜的坦克一样。

此外，如果把他提出的运输力量，用之于把我们自己的供应品和增援部队输送给麦克阿瑟的任务，可能更好一些。

我还是关心，以我们所能使用的为数很少的部队，是否有抗衡敌人的能力。但是在继续进行讨论以后，我接受了别人的看法——事实上参加会议的人差不多都是这种看法，那就是应当婉言谢绝蒋介石所提供的援助。接着我决定应当授予麦克阿瑟将军全权来使用在他指挥下的地面部队。

第一批派遣到朝鲜参加战斗的美国地面部队是第二十四步兵师的一部分。我们用海上和空中的运输力量，迅速地把这个老练的战斗部队送往前线，来延缓共产党军队的前进，这个部队的战斗事迹将永远是美国军事史上光荣的一页。这些来自第二十四步兵师和大部分没有战斗经验的青年士兵，在卓越的战斗指挥官威廉·乔治·安德将军的领导下，完成了军事史上最漂亮的一次后卫战斗。

我密切注视着前线的战事情况，办法是由布莱德雷将军或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一位官员每天向我汇报。我还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每周举行一次会议，会上由布莱德雷将军自己或他的助手报告朝鲜的局势。这个办法是美国军队参加地面行动后，于
1950年7月6日举行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开始实行的。当时布莱德雷将军叙述了第二十四师的困难处境，他报告说，原来也是驻扎在日本的第二十五师已经准备就绪开往朝鲜，但是远东的海运情况很严重，要使这一增援部队到达前线，恐怕还需要一个星期。

副总统问道：我们是否知道参加战斗的北朝鲜人到底有多少？布莱德雷将军回答说，根据我们的情报人员的估计，共有九万人。副总统于是再问，我们这方面有多少人投入战斗？布莱德雷告诉他，当时大约有美军一万人，大韩民国的正规军二万五千人。巴黎还提到正在急速运往朝鲜的一种新式的反坦克火箭炮，其目的是要给予我们的军队一种能够阻止北朝鲜军所使用的俄国制重型坦克的武器。

海军部长马修斯想知道北朝鲜的部队是否有增加的可能。布莱德雷将军说，根据远东的情报，除了可能由满洲增加部队——朝鲜人或中国人——以外，北朝鲜的敌人还有两个师没有投入战斗。

布莱德雷在回答斯奈德部长提出的一个问题时说，北朝鲜的师编制要比我们的小，大概是一万人，但是皮斯部长补充说，据情报部门的估计，满洲的共产党军队有二十万人。

皮斯继续说，除此之外，三军部长都深深感觉到，我们必须重新估计一下我们未来的整个“军事形势”。我同意这个意见，并补充说，据我了解，约翰逊部长已经在进行这种重新估计的工作。

他说“军事形势已经重新作了估计”，这是一种骗人的简单化的说法。我们许多坐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把战争看做好像只是地图上的玩意。

一个国家能够做些什么或者应该做些什么，要看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愿意和是否能够担起那个重担。在1945—1946年，美国人民决定缩减自己的军事力量。我当时反对那样急促地和过分地
进行复员工作，我并且曾经公开表示我反对那样做，当时担任陆军参谋长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反对那样做。但是报刊和国会的呼声却把我们的意见压倒了。

跟着便产生了在国会和人民愿意支持的范围内维持怎样一种军事力量的问题。当今的军事领袖几乎全部都是技术专家，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所专长的一门在国防中占着最重要的位置，这原是十分自然的。在国防力量的地理分布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每一个地区的司令官都认为使自己地区的利益首先受到重视是自己的责任，而往往不考虑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

我早就了解这样一种想法。当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炮兵营“D”中队队长的时候，我觉得整个战争中最重要的就是我这个炮兵中队，因此我总是向营部的长官力争，要求给我更多更好的装备，希望更多更好地重视我的供给问题。在我担任参议员的时候，通过我所进行的调查工作，使我看到了各个战场那种非常争吵的情况，大家都想更多地获得军需品。在我担任总统的时候，我总是在批准我认为处理得最恰当的事情以前，力求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当朝鲜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也没有忘记采取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共产党人在朝鲜向我们挑战，但他们也能够在许多地方用类似的方式向我们挑战，而更加严重的是，如果他们决定要那样干的话，他们能够把我们和全世界拖进另一场可怕的战争中去。

每当我就朝鲜战争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候，我总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它将给我们的文明世界带来可怕的毁灭。这就是说，我们不应当做出任何可以为苏联人找到借口的事情，以至把自由国家拖进一场全面的大规模战争中去。我不能同意像蒋介石那种人所主张的那种策略和办法，蒋介石在1950年7月3日的一次讲演中，曾经要求联合国谴责俄国应对朝鲜的冲突负完全责任，并要求莫斯科停止这场冲突。这种粗暴的叫嚣肯
定只会把事情弄僵。如果照他的这种建议做去，苏联人置之不理——他们是极可能不理的——那末联合国不承认自己的软弱，就只有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起来。

我的政策是加强那些自由世界防御力量薄弱的地区。伊朗、希腊、柏林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都是向共产主义作斗争的据点。同样，我们要增加对印度支那和菲律宾的援助以及把第七舰队调去保卫福摩萨，也是为了周旋面临共产党压力的地区。但是每当采取这样一个步骤的时候，都不能不看到其他许多可能发生问题的地方，也不能不看到如果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孤注一掷时所要遭到的危险。

克莱门特·艾德礼和他的内阁也对全世界的形势持有类似的看法。在艾德礼的建议下，我们同意7月初在华盛顿举行英美会谈。我指派布莱德雷将军和杰奎普大使为代表，而英国方面则由它的大使奥利佛·弗兰克斯爵士和驻华盛顿的联合军事代表团团长、英国空军总司令泰德勋爵为代表。他们在会谈中研究了全世界一切的危险地区，以便决定一旦共产党进一步实行侵略时我们两国所必须共同采取的政策。我们的代表说，我们的政策是要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苏联的主要意图。根据与会者的意见，朝鲜事件已经大大增加了全面战争的危险。这也反映了我自己的意见。我曾向布莱德雷和杰奎普以及其他政府领袖表示过这个意见。如果继朝鲜的严重打击之后，又来一次严重打击，那就意味着不可能避免地会发生世界大战。也就是根据这一点，我们才没有允许采取某些人所建议的进行空中摄影的办法。在7月6日，有一些空军参谋人员曾经建议派出飞机在大连、旅顺、海参崴、樫太岛和千岛群岛进行高空摄影。但是幸而在空军人员中有人看到了这种做法所牵涉到的政治问题，并向国务院报导。迪安·艾奇逊便来问我。我对他讲，我认为任何这类做法都是极其严重的。我要他去
找空军部长萨勒特，告诉他，我希望他向远东的空军司令官们说清楚，进行某些可能危及苏联的正当活动，都是违反我们的政策的。进行这种活动的结果，将会是我们的一些进行空中摄影的飞机被俄国人打下来。而这当然会制造出新的、更加严重的局势。

远东的空军司令官们想进行这种空中摄影工作，原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样所得到的情报对他们所处的环境会有帮助。但是我们要从全面考虑问题，而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因此我们决定不采纳这类的建议。

为我准备研究材料的那些机构也有这种看法，我的决定就是根据这些研究材料作出来的。

麦克阿瑟将军当然在专著应付朝鲜的局势。他差不多在一接到援助南朝鲜反抗侵略者的命令，就需要了一个战略计划，并立即开始调派所需要的军队来执行自己的计划。

他的关于增派军队的请求应该受到优先的考虑。除了已经准备开往朝鲜的第一陆战师以外，我还批准命令第二步兵师立即准备出发，同时指示国防部长约翰逊命令兵役署调配武装部队的人力，以充实一些基本单位和舰队。然后我命令柯林斯将军和范登堡将军飞往东京同麦克阿瑟将军会商。

几天以前，我还批准了由国务院和财政部联合草拟的两项建议，建议在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案：在朝鲜成立一个统一的司令部，并由我们推荐一个总司令，同时授权在朝鲜使用联合国的蓝旗帜。7月7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这项决议案，第二天，我提请任命麦克阿瑟将军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务。

7月12日，华尔顿·沃克中将到达朝鲜，建立了他的第八军司令部，并接替指挥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这个时候，我们的部队仍旧担任后卫战斗，向釜山滩头城市节节撤退。
美国报刊就这次退却作了加油添醋的报道。有的消息说某些部队已整个被歼灭，把溃败和混乱的情况加以夸大。事实的真像是，一帮为数不多的勇敢的年轻小伙子，在几位优秀的将军的指挥下，终于扭转狂澜，使得抵抗力很薄弱的后方，能够集结力量，准备回击。事实上，在国内的人要比在朝鲜的士兵更加惊恐。

但是，这个时候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制订了进行反攻的基本计划。7月7日，麦克阿瑟将军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他的基本作战计划是阻止敌军前进；尽量利用对海空方面的控制；采用水陆并进的办法，打击敌人密集的地面部队的后方。

这些重大的计划就是柯林斯将军和范登堡将军同麦克阿瑟将军会晤时所讨论的题目。他们还讨论了如何在国家政策的全部需要的范围内来满足远东司令部的需要问题，以及使用在朝鲜的同盟军问题。

麦克阿瑟将军同意同盟军划归他来指挥使用，尽管他认识到把许多不同国籍的军队编在一起将会给自己的工作带来更多的困难。但是，的确曾有建议不要接受蒋介石所提供的三万三千名中国国民党中央的。他的意见是，这些部队在朝鲜将起不了作用，因为都是步兵，没有大炮或其他辅助武器，而且还还不知道素质怎样。他还是这些部队还必须由我们的兵站给予大量的给养，事实上在好几个月内会象沉领一样拴在我们的脖子上。此外，他认为把这些部队从福摩萨调到朝鲜，将使那个岛屿空虚，可能引起敌人的进攻。他建议由他亲自去福摩萨一趟，向蒋介石说明这种情况。

至于反攻计划，柯林斯将军似乎感到十分担心。根据麦克阿瑟的计划，是打算在两师人在汉城附近的仁川登陆，另外空投战斗部队一个团到该地区。同时，北山等处的部队则向北进攻。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需要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来执行。

但是，要实现这个计划，就必须大力进行武装部队的重建工
作，这位远东司令官每次和我们联系的时候，差不多总是要求增加军队的数量。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些意见都予以仔细的审查，然后向国防部长提出建议。关于军队的调动，当然不用每一次都要请示我，但是，由法律规定应当由我负责的一些基本决定，往往是必须由我批准的。因此，7月31日，我批准了关于征调国民军四个师参加联邦军队的战斗任务的建议。

早在7月19日，我就曾经请求国会取消对武装部队数量的限制，并呼吁制订立法，规定对某些物资的优先权和分配权，以便防止囤积，并保证征发必需的供应品。我并且说，还必须增加赋税，限制消费信贷；国防费用也必须增加一百亿美元。

关于这些事项的余文，我预先寄了一个副本给麦克阿瑟将军，告诉他我们在国内所采取的方针。对于这一点他曾经以一封极其客气的电报向我道谢。
第二十三章
在威克島與麥克阿瑟的會見

7月31日，麥克阿瑟將軍飛往福摩薩，當柯林斯將軍和范登堡將軍訪問東京時，他曾和他們討論過關於該地區的問題。

我們對福摩薩的政策曾經是7月27日國安委員會在華盛頓舉行的一次會議的論題之一。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們曾向委員會提出建議，給予中國國民黨人以全面的援助，使他們能抵抗共產黨方面對該島的可能攻擊。局勢的其他很多方面也曾加以討論。我批准了三項具體的建議：給予國民黨中國以廣泛的軍事援助；由麥克阿瑟總部對蔣介石軍隊的需要作軍事方面的調查；計劃在中國海岸作偵察飛行，以確定對福摩薩的攻擊的緊迫性。

這些決定由參謀長聯席會議在8月3日通知了麥克阿瑟將軍，同一天也通知他說，我即派阿弗里爾·哈里曼到東京去和他討論遠東的政治局勢。關於哈里曼和麥克阿瑟的會見和談話情況，他向我作了如下的報告：

（為了軍事安全和簡要起見，我刪去了哈里曼的備忘錄的某些部分。）

我們在1950年8月6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到達羽田機場，麥克阿瑟將軍在那里歡迎我們。他和我一同乘車去大使館的迎賓館。因為在車子里他的副官和司機與我們之間的玻璃是敞開的，我們的談話是一般性的。

“他敘述了自从我上次訪問日本以后日本政治方面的令人满意的发展情况。他談到日本人民的优良品質；談到日本人在工作
中表现的令人满意的情况；他还谈到他对工作的热爱和对工作神圣的尊重。相形之下，他对美国国内只图更高的享受和更少的工作的风气表示不满。

“他认为共产党渗入日本生活决不至于构成一种威胁，因为共产党的观念并没有引起日本人的共鸣，而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的观念还贴着有俄罗斯的标签。日本人既害怕而又憎恨俄国人。

“我们在朝鲜的行动在日本人中间所引起的反应我们可以安心的，因为他们把这种行动解释为我们在俄国侵略的时候强有力地捍卫他们。他们并不为我们的暂时的困难而感到恐慌，因为他们知道军事上的困难是由于突然的袭击所造成的。他们的自豪感是由于‘他’对他们的信任而激发起来的。这种信任表现在美国撤出了大部分的驻军。他可以撤出所有的美国部队而在日本不至于有任何骚动的危险。⋯⋯

“他为我和我的随员安排了参加早晨十点半在总部举行的简短训话，并且约定我在十一点半到他的办公室里和他会见。

“那天上午我和麦克阿瑟有过为时两小时半的会谈。我同全体人员与麦克阿瑟及其夫人共进了午餐，然后在下午五点半至七点半又进行了两小时的会谈。

“在星期二上午，在我自朝鲜回来和我离开日本之前，我们又进行了四个小时的会谈。

“前两个半小时讨论军事方面的问题，参加的有李奇微将军和诺斯塔德将军。阿耳蒙德将军也在座。

“我不打算按会谈的日程来详细叙述，只扼要地照会谈的内容来谈。

“我们在星期天上午的第一次会谈包括了他对军事局势的看法。

“我对他说，我将要转告他，总统想知道麦克阿瑟需要什
么，并且准备全力给予支持。我问麦克阿瑟他对朝鲜的决定是否明智有无怀疑。他回答说，‘绝无怀疑。总统的声明是非常伟大的。这是一个可以把世界从共产党统治下拯救出来的历史性的决定，而且也会这样地载入史册的。使用我们的地面部队是非常必要的，胜利一定会很快地到来。’

“麦克阿瑟申述了他对北朝鲜的武装应尽早予以摧毁，而不应容其慢慢建立的坚强信念。他强调了这一行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危险性，和可能来自联合国——包括美国在内——的阻碍，以及对东方人民和对中国共产党人与俄国人的影响。他害怕俄国和中国共产党可能大大地加强北朝鲜的部队，时间是最主要的，否则的话，前途即使不是灾难，也会是严重的困难。……

“他并不相信俄国目前有意于直接干涉，或卷入一场大战。他相信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俄国人民组织并装备了北朝鲜人，并且曾在红军中作过战的苏联籍朝鲜人中抽调出一些受过训练的人来支援北朝鲜。中国共产党也配合行动，把一些在满洲作过战的士兵调了过去。这些士兵不是按照原来的编制过来的，而是在满洲兵役，到北朝鲜后，重新编进北朝鲜部队里去的。他们的领导是坚强的。一批俄国军官充当观察员，但毫无疑问，是他们在指挥。他们的战术是灵活的；在军事经验方面，他们和任何军队一样是有能力而顽强的。

“他叙述了东方人和西方人对死亡的不同态度。我们厌恶死，我们仅仅是出于责任心和道义感才去冒险；而对于东方人，死是新的开始。他们静静地死去，‘两臂交抱着，就像鸽子收起双翼一样，无牵无挂地死去。’

“麦克阿瑟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上次大战许多服役人员中征调有经验的军官，而他对于有经验的军官是这么迫切的需要。他认为我们可以用快速的舰只和飞机来迅速地运送迫切需
要的部队。一想到我们竟办不到这一点，他说，‘就使我感到恶心。’（这些事情都是他在星期二上午说的。）

“麦克阿瑟希望拥有尽可能多的联合国地面部队，数目可达三、四万人。目前他认为只要能迅速地派出仅仅携带轻武器的几个营（一千人）前来支援，他也就满意了。重炮当然是受欢迎的，但是需要是这么迫切，因此他认为只要有轻武器就可以了。他认为英国应该从香港或马来亚调来一个旅，另外可以从联合王国调派部队来接替这个旅。法国可以从印度支那抽调些部队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要是能派一个旅来，那是最好不过了。加拿大也应该派些部队来。他虽然认识到东方国家部队的价值，可是他不能肯定菲律宾目前是否能够派出任何武装部队。

“他认为一旦获得胜利，政治后果是不容置疑的。在东方，胜利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朝鲜人是渴望自由的。当李承晚政府重新在汉城建立起来的时候，联合国监督下的选举就可以在两个月内举行，而他毫不怀疑非共产党的政党会取得绝对的胜利。在确信没有俄国或共产党的干涉的时候，北朝鲜人也会投非共产党和政府的票。他认为目前没有必要修改宪法，宪法规定北朝鲜占一百个席位。朝鲜能够成为稳定东方非共产主义运动强有力的影响。

“麦克阿瑟对穆乔大使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他们全面地、有效地在一起工作。

“在我和麦克阿瑟的第一次谈话中，我对他讲，总统希望我告诉他，他绝不应允许蒋介石成为发动对大陆上的中国共产党战争的导火线。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我们卷入一次世界大战。他回答说，作为一个军人，他将遵守总统的任何命令。他说在他到非洲摩萨旅行期间，他和委员长商讨的只限于军事方面的事务。每当委员会长企图讨论任何政治问题的时候他就加以拒绝。委员会长曾经提议把中国国民党军队交给他指挥。麦克阿瑟回答说这样做是不妥当
的，但他願意提供軍事方面的建議，如果委員長要求他这样作的話。……

“由于一些相当难以解释的原因，对于我們所认为应如何对待福摩薩問題以及我們和委員長之間的關係問題，我不认为我們获得完全一致的看法。他接受了总统的看法，并将遵照执行，但是信心不足。他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他认为任何人只要願意和共产主义作战，我们都应该给予支持，虽然他提不出理由，为什么由委員长来打共产党，就对付得了中国的共产党。我向他指出，在福摩薩的将来，也就是在防止福摩薩落入敌人的手中的問題上，美国和委員長立场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利益冲突。也許最好的办法是通过联合国来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而蒋介石相反的，雄心勃勃，只希望把福摩薩当作重新进入大陆的跳板。麦克阿瑟明知道这种野心无法实现，然而他认为不如让他登陸，就这样摆脱他，未始不是一个好主意。他好像沒有想到我們支持蒋介石这一行动的负担将压在我们在东方的负担上。我非常詳細地解释了为什么說蒋介石是一个负担，在对待中国共产党和福摩薩政策上，联合国的团结很有分裂的危险，英国、尼赫鲁和一些像挪威那样的国家的态度，他們对抵抗俄国的侵略虽然具有坚定的决心，但却不愿在其他方面寻衅生事。我指出了在友好国家之間維护联合国的团结的巨大重要性，以及在中国和福摩薩問題上任何的錯誤步骤都可能导致情况的复杂化。

“麦克阿瑟主张永远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甚至使用否决权不让共产党加入。他认为让中国共产党加入只会增加毛泽东政府在中国的威信，而破坏了他所认为的我們的目的，促使毛泽东目前的支持者的分化和増强抵抗运动的发展。他不相信中国人願意接受俄国的統治。他們有反抗来自北方的侵略的历史传统。至于在中国内部制造更强烈的分裂，我們应当采取比过去更积极的行動。……
“我强调获得中国共产党支援北朝鲜的进攻和参加目前作战行动的证据的重要性。下届联合国大会上，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席位问题将会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我解释如我们能得到中国共产党直接支持北朝鲜的真凭实据，那我们就有理由根据所牵涉到的道义问题，阻止共产党取得席位。

“总而言之，我不敢说他完全认识到了在委员长驻节福摩萨的情况下，我们要在中国境内采取任何行动，这不论是在全世界还是在东方，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困难。他认为我们的一些政策对委员长不利。他有信心他能够使委员长去作要他作的任何事情，他随时准备着对付政治方面的问题，但是，除非总统进一步给他命令，他将忠心耿耿地只应付军事方面的问题。……

“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目前不企图进犯福摩萨感到满意。他所掌握的材料和照片表明他们没有集结过多的部队，虽然他们在建造飞机跑道。他相信第七舰队加上驻在菲律宾和冲绳的喷气式飞机和在他指挥下的 B-29 型飞机和其他类型的飞机能够摧毁任何可能进犯的企图。他相信中国国民党军队可以经过组织而有效地作战，并且足以摧毁任何渡海过来的共产党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试图这样蛮干的话，那在远东历史上将会有一次浴血的胜利，并将鼓舞东方的士气。……

“他谈到了靠近大陆的金门岛时，委员长声称要有七万士兵驻在那里。万一要在大陆登陆的话，这是重要的，但是这对于美国并无价值。委员长认为福摩萨是中国的一部分。截至目前为止，甚至在和他谈过话的福摩萨人当中，麦克阿瑟也看不到要求独立的迹象，也许在现阶段这是很自然的。在那儿街上看不到士兵，晚上也不戒严，没有证据足以证实来自国务院的悲观的报告。……

“麦克阿瑟认为我们把蒋介石踢来踢去并没有改善我们的处境，并且希望总统想些办法来缓和国务院和委员长之间存在的紧

413
张局势。他建议总统可以重申他以前威胁中国共产党的声明，如果中国人继续修建机场或建立他们的据点，他将撤销攻击大陆飞机场的禁令。我告诉他如果他希望向总统作这样的建议，那是他的事，但我向他保证我会坚决地建议总统反对他这样作。我强调保持联合国团结的重要性，而这样作只会造成更多的困难，给俄国人一个钻空子的机会。

“麦克阿瑟极力赞成在欧洲发展强大的部队，他还认为我们应该更加强有力地加强武装部队，以抵抗东方的共产主义。他相信中国共产党不会把自己的部队向南移动，但将训练印度支那人，缅甸人，装备他们，并且用渗入和支持装备良好的当地共产党部队的办法来制造分裂，以便希望最后获得这些地区。他认为尼赫鲁对共产主义的威胁是存有戒心的，但是他认为容忍是个有效的办法，因而采取了错误的行动。‘我们应该在每个地方打击共产党——狠狠地打击他们！’他认为杜鲁门主义是‘伟大’的，应该更加强有力地加以推行。就像我们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那样的做法，我们应当在东方也组织经济援助。这并不需要大量的金钱。这种援助要好好的地加以管理。我们应当设法使人民得到援助，防止贪污中饱。

“当他到机场为我送行的时候，他大声地，使所有的人都听得到地说，‘你这次访问的唯一缺点是逗留的时间太短了。’”

哈里曼的私人报告中附来一份李奇微将军草拟的军事讨论备忘录。这就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个半小时的谈话中所提出的要求增派美国和联合国地面战斗部队的摘要。

我派哈里曼访问麦克阿瑟，使这位将军能够了解华盛顿的政治计划的第一手情报。在这之前已经有好几位高级军事将领访问过东京，并曾与麦克阿瑟讨论过远东局势的战略问题，但是在我所有的顾问当中，哈里曼对经济恢复计划最为了解，他特别有资格把我的对于外交政策总的看法传达给麦克阿瑟。

414
麦克阿瑟将军在7月31日的访问福摩萨曾经引起全世界新闻界的各种猜測。蒋介石的侍从武官们放出消息说，远东司令部和他
们的领袖对于将来采取的行动的步骤意见完全一致。言外之意
是——我们虽然有些报纸就是这样报道的——麦克阿瑟拒绝接受我
的使福摩萨中立化的政策，并且倾向于采取更激进的办法。

在哈里曼向麦克阿瑟解释了政府的政策以后，他曾经答应他
将作为一个良好的军人来接受它。我再一次放了心。我告诉报界
说在福摩萨问题上这位将军和我的见解一致。

为了更加明确起见，参谋长联席会议，经我的批准，于8月
14日通知麦克阿瑟将军说，要他保卫福摩萨的指示的意图是，美国在
那里的行动只限于辅助性的行动，实际上不在于使用武装部队。不
能答应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在福摩萨承担驻扎战斗机中队的义
务，也不在福摩萨陆地上驻扎任何种类的美国部队，除非得到参
谋长联席会议的批准。

我以为这事到此可以结束，而麦克阿瑟将军也会接受他
的总司令所制定的对福摩萨的政策了。但是我错了。在月终以
前——8月26日——白宫的新闻处给我送来一份麦克阿瑟将军致
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主席的声明。这项文件在8月28日以前还
没有人看到，但是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公共联络机构在几天以前已
经把它交给了新闻记者，当我在8月26日早晨第一次听到这件事的
时候，一家又一家地把它全文的期刊已经邮寄给了我了。

这封长信的内容是：“鉴于福摩萨和我们太平洋方面战略潜
在意义的关系所流行的错误观点”，这位将军认为有必要就这个问
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的论点是东方人的心理状态要求“进取的、
果断的和有力的领导”，“再没有比那样一种人所主张的，如果我们的
保卫福摩萨就会自绝于亚洲大陆，因而主张在太平洋方面采取姑
息政策和失败主义的陈腐论调更为荒谬的事了”。换句话说，他要
求采取一种以福摩萨为据点的军事侵略政策。电讯的整个调子正是和他最近告诉哈里曼他所拥护的政策针锋相对的。我觉得毫无疑问全世界会这样来理解的，而且电讯的出发点也就是这样的。

我认为这项声明只会使全世界对于我们的福摩萨政策感到迷惑，因为它同我的6月27日的声明相对抗，也和我在国会发表的政策相抵触。此外，就在前一天，在我的指示下奥斯汀大使致联合国秘书长特赖佛·赖伊的一封信重申了我们的政策。

福摩萨问题曾由俄国的代表提交安理会议会，他们攻击我们援助蒋介石是一种侵略行动，而我批准了国务院的建议，发表一项声明，表示我们完全赞同联合国调查福摩萨局势，来对付这种攻击。俄国的代表马立克先生企图使安理会议会相信我们把第七舰队置于福摩萨海峡的行动等于把福摩萨吞并到美国的势力范围以内。奥斯汀致特赖佛·赖伊的信明确地表明了我们只有一个目的，缩小远东的冲突范围。麦克阿瑟将军的信——使全世界误解为美国的政策的表白——与这一点相抵触。

自然，我绝不至于否认麦克阿瑟将军或其他任何人和我持有不同的见解的权利。然而美国的官方立场应由总统的声明和决定来确定。在对外关系方面，只允许一个人发言，来说明这个国家的立场。这是具有根本性的宪法意义的。麦克阿瑟将军除了是重要的美国司令官外，还是联合国在朝鲜的司令官。事实上，他是代表联合国的。联合国那个时候正在辩论福摩萨问题，而联合国的会员国——甚至那些在苏联集团以外的国家——在福摩萨问题上也有着尖锐的分叉。作为一位联合国的代理人对于该机构正在讨论的问题擅自发表主张很难说是恰当的。

我理解到这事已经造成了损失，而麦克阿瑟的信已经在新闻界的手里。事实上，发表这封信的刊物已经摆在那里摊子上。

我严肃地考虑到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远东战区指挥官的职务
而代之以布萊德霍將軍。占领日本的职务仍然可以交给麦克阿瑟，而把朝鲜和福摩薩自他的手中拿过来。但是仔细地衡量了以后，我决定不采取这个步骤。这样做法难免有降级处分之嫌，而我是不愿意损伤麦克阿瑟将军个人的。我唯一关心的是要让全世界知道他的声明不代表官方的政策。

我和迪安·艾奇逊，路易斯·約翰逊，約翰·斯奈德，阿弗里尔·哈里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在预定的8月26日，星期六的上午，举行了一次会议。我向他们宣读了麦克阿瑟的声明，并且询问他们每一个人是否预先知道这件事。他们对这件事都感到很惊讶和震动。我于是命令国防部长约翰逊以他个人名义致电麦克阿瑟告诉他我要求他撤回他的声明。我知道，这样做法已不能阻止这项声明的传播，但是这会使人清楚地知道它不代表官方意见，而由撰写人收回了。

1950年8月26日，国防部长約翰逊把下面电报拍给麦克阿瑟：

“美国总统指示你收回你致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全国联合会的信，因为关于福摩薩的各項論点是和美国的政策以及美国在联合国中的立场相冲突的。”

麦克阿瑟将军立刻遵照这个指示做了，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的政策我还须要加以更詳細的說明，来补充国防部长约翰逊的电报。我們对福摩薩的立场在奥斯汀大使致特赖佛·赖伊的一封信里已有扼要而明确的說明，于是我决定唤起麦克阿瑟注意这封信。我知道该信的副本已經抄送给他的总部，但是这个副本也很可能和其他自华盛顿送到那里的文件放在一起。我想我私人的信件肯定可以使他看到。下面就是我写给麦克阿瑟将军的信：

“兹附上我于8月27日致奥斯汀大使的信的全文，供你参考。
我确信你细看过这封信和奥斯汀大使于8月25日致特赖佛·赖伊的信（我听说当晚有一份副本抄送给你的总部），你会了解为什么我在26日采取行动，指示你收回你致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全国野营会的信是必要的。

“柯林斯将军和薛尔曼海军上将已经向我呈递了一份关于和你会谈以及他们访问目前在你指挥下的在朝鲜作战的联合国军的全面报告。他们的报告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它使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前面提到的我致奥斯汀大使的信的全文如下:

“正如我在今天早晨在电话中告诉你的，我要向你致贺。自从大韩民国一市被侵略，你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里就很好地代表了美国政府的观点。在全部讨论过程中，你以极大的效率，完全按照我的指示代表了这个政府。

“你于8月25日关于福摩萨问题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巧妙地综述了我在6月27日所申述的，和我在7月19日致国会的咨文所提到的本政府的基本立场。你在那封信里明白地提出了问题的核心和实质。你忠实地表明了我在那个时候和目前的见解。

“为了使对美国政府关于福摩萨的立场不致有所误解起见，这里有必要重申你在致赖伊先生的信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的七个要点。

“(一) 美国并没有侵占中国的领土，美国也没有对中国采取侵略行动。

“(二) 美国对福摩萨的行动是在这个岛成为和大陆冲突地区的时候采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公开威胁说，将来更严重的冲突会发生。这种冲突会使安全理事会委托为了抗议对大韩民国的侵略而在朝鲜作战的联合国部队的安全受到威胁。中国共产党当局威胁要将冲突扩展到太平洋地区。

“(三) 美国的行动对福摩萨岛上的军队和对大陆上的军队
同样是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行动。这是为了维护和平，因此，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的。正如杜鲁门总统所明确声明的，我们对福摩萨并无任何企图，而我们的行动也不是企图使美国获取特殊的地位。

“（四）我们已经明白地声明美国的行动对于今后政治解决该岛地位问题没有任何偏见。这个岛的实际地位是一块由于盟国部队在太平洋地区的胜利，取自日本的领土。像其他同类的领土一样，在国际行动未决定它的命运以前，它的法律地位是不能够确定的。中国政府受盟国的委托，接受岛上的日军的投降。这即是中国人之所以现在在那里的原因。

“（五）从历史记载上看，美国对中国人民历来是友好的。我们仍然对中国人友好，相信千百万的中国人也会以同样友谊回答我们，我们和其他国家在上届联合国大会上倡议通过一项统一中国的决议。除苏联和它的卫星国家不赞成这项决议。

“（六）美国将欢迎联合国考虑福摩萨问题，我们将赞成联合国的全面调查，不论是在这里或实地调查。我们相信联合国的考虑会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和平的而不是强制性的解决办法。

“（七）我们不认为安全理事会需要或必要转移对大韩民国受到侵略的考虑。朝鲜的和平遭到了破坏。侵略者发动了攻击，受到了谴责，联合国的联合部队正在为反击侵略而战。

“福摩萨目前和平无事，除非有人要诉诸武力，它将保持平静。

“如果安全理事会要调查福摩萨问题，我们将予以支持，并给予协助。同时安全理事会主席应该履行他的职务，按照议程所列项目进行讨论，议程上列的是控诉侵略大韩民国案件，尤其是承认韩国民大使参加的权利和投票表决使朝鲜冲突地区化的美国议案等项目。
“‘以上七点正确地说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
‘在安全理事会即将进行的问题讨论中，你将继续得到我的全力支持。

‘‘你的诚实的，
‘‘哈里·杜鲁门’”

我在致麦克阿瑟信中所谈到的柯林斯将军和薛尔曼海军上将的访问日本和朝鲜，表明了我们在朝鲜问题的努力的一个重要阶段。在8月初，我们在那里已经建立了一支六万五千人的地面部队，已经足够守住釜山滩头，有足够的兵力为进攻计划打气。在8月10日国防部长告诉我已计划在9月25日前再送近两个师的兵力到朝鲜去。海军和空军部队也同样地增加了，进一步的增援也在准备中。

为了给麦克阿瑟将军派遣他所要求的部队，我们从美国大陆，从波多黎各，从夏威夷抽调了兵员，甚至从在地中海舰队服役的海军陆战队里调回一些人来。

柯林斯将军和薛尔曼海军上将在8月19日赴东京和麦克阿瑟将军就进攻计划进行了详细的会谈；在他回来的时候，他们把计划交给我，使我有个了解，并且告诉我，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批准了这项计划。这个计划具有大胆的战略思想。我对其成功抱有极大的信心。

我在9月1日向全国广播的时候表示了我的信心。我说：‘两个月以前，共产帝国主义一变它经常采取的渗透和颠覆的战术，转向向大韩民国，这样的小国家，发动野蛮的进攻。全世界友好的国家的面前摆着两条道路：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外交上的抗议而让共产党侵略者吞并下他的牺牲品呢，还是用武装部队来对付军事侵略。自由世界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这样世界上有史以来，很多
国家的人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之下为了维护法律的原则而战。这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

我声明我们的目的和意图可以归纳为八点：“(一) 我们信赖联合国，誓将通过这个组织来寻求和平与安全。(二) 我们相信朝鲜人有获得自由、独立和统一的权利。(三) 我们不希望朝鲜战争扩展成为一场大战，这场战争将不至于扩大，除非共产帝国主义将其他军队和国家拖入反对联合国的，侵略性的战争。(四) 我们特别希望中国人民不会被错误地引导或强迫来对联合国和一直是，仍然是他们朋友的美国作战。(五) 我们不希望苏联或亚洲的任何部分成为我们的领土。(六) 我们相信远东各国都将获得自由。(七) 我们不相信侵略或防御性的战争。(八) 我们的士兵今天在朝鲜为和平而战，我们在联合国里和在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首都，为了和平而坚持不懈地工作着。”

在朝鲜采取攻势的决定，使我们有必要从高一级政策的水平上考虑我们应采取的下一个步骤。这个问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讨论过，最后的结论包含在我在 1950 年 9 月 11 日批准的政策声明中。

国家安全委员会估计我们的行动路线可能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联合国内友好会员国磋商的结果；以及大战的危险。

授权麦克阿瑟将军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把北朝鲜人赶回三八线以北，或者击溃他们的部队。如果没有苏联或中国共产党的分子的武装部队进入的迹象或威胁，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麦克阿瑟将军把军事行动延伸到三八线以北，并作出占领北朝鲜的计划。然而，如果苏联或中国共产党进入朝鲜，就不要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地面军事行动。

一项由我批准的，基于这个建议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于
9月15日远交麦克阿瑟将军。

9月15日是开始进攻仁川的日子。第一陆战师和陆军的第七步兵师在那里登陆，并建立了一个桥梁堡。于是这两支兵力，包括阿尔蒙德少将指挥的第十军团，为了解放占领下的朝鲜的首都 Marx 向汉城推近。抵抗是剧烈的，但是在9月28日完成了这座城市的解放，在9月29日李承晚将他的政府迁了回来。不久以前，9月26日——突破釜山地带的第八军第一骑兵团的部队和来自仁川地区的第七步兵师的部队举行了会师。敌军溃不成军，斗志大为动摇。

我致电麦克阿瑟将军，表示祝贺。

“我代表全国人民对于在你领导之下在朝鲜获得的胜利，向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无论是在以空间换取时间，积聚力量，待机出动，或是在解放汉城战役中用兵如神方面，在军事史上只有少数的战役可以和它相比。我对你们的陆、海、空、海合作的成就感到特别的满意。我希望你向各军的指挥官——华根顿・沃克中将、查尔斯・乔埃海军中将和乔治・斯特拉特梅耶空军中将转达我的谢意和祝贺。由你和他建起的协同作战，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我想每个自由国家的人民遥向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为自由而战的，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你们英勇的部队——陆、海、空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致以谢意。我向你们全体致敬，并代表你们在国内的人们祝贺你们全体，‘你们成功地完成了崇高的使命’。”

我已经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于9月27日传达给麦克阿瑟的新指示。这个指示告诉他们，他们的军事目的是“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为达到这个目的，批准他们进行军事行动，如果在执行这种行动的时候没有大量的苏联或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入北朝鲜，没有要进入北朝鲜的声明和俄国或中国共产党没有恫吓要对我们的军事行动进行抗议的话。训令还指出无论在
任何情况下，他的部队都不准越过朝鲜和满洲的边界，或朝鲜和苏联的边界。作为一种策略，非朝鲜的部队一概不准在和苏联接壤的各道或在满洲边境使用。同样严禁对满洲或苏联领土使用空军或海军，以支持他在三八线南北的军事活动。

这项指示并进一步命令所有远东司令官，在苏联或中国共产党部队参加作战时，他应采取的行动。原文是这样的：

“万一敌人在三八线以南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中国共产党部队，只要你的部队的抵抗有成功的机会，你就应该继续你的军事行动。”

遵照这个指示，麦克阿瑟将军提出了他在三八线以北的作战计划。计划由第八军沿西海岸走廊向北挺进，而由第十五军团在北朝鲜的东海海岸的元山进行两栖登陆。参谋长联席会议于9月29日批准了这项计划。

9月30日我上了《威廉斯堡号》游艇在波托马克河上作一周的游弋。据说总统最难有时间让他清理一下思路。我一直认为只要有时和更多的公民谈话，便应该向他们敞开总统办公室的大门，和人民接近，倾听他们的困难，让他们分享白宫丰富的传统，这是总统工作的一部分。但这就要打乱这天的工作，虽然我总是起得很早，经常比工作人员早开始工作，还要把公文带回家夜间批阅，而事情总好像做不完似的。

我不知道作一个总统有什么更简便的方法。整天的工作还是不够的，难得有松口气的时候。我把总统的游艇和在基韦斯特的白宫作为游憩使用要比作为避避使用的时候少得多。在我希望在点工作，或是在我需要和我的工作人员商量事情而不受打扰的时候，这两个去处是非常有用的。

即使这样，在这种旅行期间每日的公文处理工作还是不放过我。例如，要我上了《威廉斯堡号》游艇，每天早上就有一架飞机，
通常在九点或九点半的时候，送来邮件和报纸。艇上强大的无线电设备使我能够和白宫的任何人通话，或者通过白宫的中继台和任何人通话。

这样，当我在9月30日登上《威廉斯堡号》后，我仍然和时局的演变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我听说麦克阿瑟在10月1日曾经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要在越过三八线的时刻发表一项戏剧性的声明，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制止了他这样做。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这样的声明是不明智的，并且命令他继续军事行动，不要使他的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这一事实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

10月2日麦克阿瑟报告说大韩民国的陆军部队正在三八线以北活动，进展很迅速，并且说似乎没有遇到敌人的什么抵抗。10月8日国务院收到了许多封电报，报告同一件事情：中国共产党威胁着要参加朝鲜作战。中国共产党政府现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召见印度驻北平大使潘尼迦，并且告诉他，如果联合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就要派遣军队援助北朝鲜人。不过，如果只是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采取这种行动。

这个电文立刻转达给麦克阿瑟将军。

从莫斯科。斯德哥尔摩和新德里也打来同样的报告。不过，这里却有一个问题，和这个报告有关的潘尼迦先生在过去总是经常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家伙，因此他对的电报当作一个公正观察家的话来看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罢了。建议采取一切适当的步骤。以稳定全朝鲜局势的议案，在联合国大会的政治安全委员会里悬而未决。这个议案如果得到通过，那么联合国司令官就肯定有权力在北朝鲜作战。这个议案在第二天就要投票表决，看来周恩来的声明只是对联合国的恫吓，扬言要在朝鲜进行干涉。

中国对朝鲜的干涉的可能性当然不能不加以考虑，因此我训
今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一项给麦克阿瑟将军的指示，以应付这种可能发生的变故。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9月20日接替路易斯·约翰逊为国防部长的乔治·马歇尔提出他们的建议，我批准了如下的致麦克阿瑟将军的电文：

“鉴于中国共产党军队可能在北朝鲜进行干涉，兹特对我们9月25日的指示作如下补充，希遵照执行。

‘今后中国共产党要是不事先声明就在朝鲜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你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只要在你控制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要对中国境内的目标进行任何军事活动，都必须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

这项指示在10月9日送给麦克阿瑟将军。而在这段时间我又作出了另一个决定。我希望和这位将军面谈一次。我想和麦克阿瑟将军会面的主要原因很简单，我们始终没有过任何的个人接触，而我认为他应该认识他的统帅，而我也应该认识在远东的高级战区司令官。我一直对麦克阿瑟在日本任职期间不满意，甚至短时期的，回美国的多次邀请而感到遗憾。他应该回来熟悉一下国内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向主张我们的外交人员每四年应当有一年留居国内的理由。这样他就会了解国人的想法了。

从6月以来多次的事件可以看出麦克阿瑟在去国的多年中，他和国家、人民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联系。他在东方至今将近十四年，而他的全部思想都贯注在东方。我曾通过哈里曼和其他人士努力使他放宽眼界看看全世界，以期和我们在华盛顿对世界的看法取得一致。但是我感到，我们的努力不大成功。我想如果我能直接和他谈谈，他也可能比较容易改变一些。

从北京传来的中国共产党扬言要在朝鲜进行干涉的报告是我要和麦克阿瑟将军面谈的另一原因。我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第一手
的情报和判断。

经过一段短时间的考虑，我想飞赴朝鲜向我们在这里的部队作一次短时间的访问。我理解到麦克阿瑟一定认为在这些危险的日子里他不应远离他的部队，他一定会认为远涉重洋，仅仅是为了几个钟头的谈话而感到踌躇。因此我提议我们在太平洋的什么地方会面，结果同意在威克岛最为合适。

我宣布我要在10月13日至17日的那星期的最后几天去会晤麦克阿瑟将军。我选择这几天因为我已答应10月17日在旧金山发表演说。在五年多以前，当联合国宪章签字的时候我也曾在旧金山发表演说。上次在10月24日，已经安排好我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自然，我希望能在这次演说里把联合国军司令官的第一手的材料包括进去。在这个意义上，我计划中的这次旅行也可以说是为了联合国。

10月11日下午我乘《独立号》总统专机离开了华盛顿。头一段路程只飞到圣路易。在那里逗留了一夜，12日下午二点三十分继续飞行，六小时又三刻钟以后，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费尔菲尔德—苏森空军基地降落。

越过大洋的长途飞行的第一部分在当日的午后以后开始，但在一部份以前就上了飞机，在起飞前就入睡了。早晨五点钟左右我醒来——至少从我的表上看是那个时刻。在我走到飞行员的机仓的时候，我才发现当地时间才三点。我用过早点，然后又走到前去，坐在副飞行员的座位上，那时飞机飞近夏威夷岛。天色仍然很暗，但是间断地可以看到下面舰只的灯光。那是为了防止飞机发生毛病。海军派驱逐舰在我的航路上防护。飞行员威廉斯上校说那天早晨的能见度特别地好。无论如何，我看到了一脉相连的岛屿，从西方的天际慢慢地显现出来，使我叹为奇观；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我简直不会相信这些岛屿在因望无际的碧蓝的海洋中
中只是一个个小黑点。随后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慢慢地显现了出来，然后清楚地看出岛屿来了。最后飞机越过了金刚石顶，在珍珠港上空低飞盘旋了一圈，在希克姆空军基地降落。

我受到由斯坦巴克总督，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德福海军上将率领的高级文武官员的欢迎。

随后，在雷德福海军上将陪同下，当天早上我乘船巡视了珍珠港。他指给我看 1941 年悲剧的日子里留下的残迹，他也指给我看今天作为我们强大的太平洋舰队基地的良好设备。我在珍珠港的军官俱乐部里用餐，并向客人们作了一次简短的演说。下午我访问了特里普勒陆军医院，并和几位从朝鲜回来的伤病员谈了话。从珍珠港到医院我好像从历史的一个时期到了另一个时期，虽然 1941 年到现在还不到十年。

《独立号》在 10 月 14 日，星期六的午夜过了几分钟就离开了希克姆机场。我还是在飞机起飞之前就就寝了，在大部分的航程中我是在睡乡里。在我睡着的时候，我们飞过了子午线，我也不知道由于顺风，我们竟超过了预定的时间，因而飞行员不得不减低速度，使我们不至于在预定到达的时间以前飞到威克岛。

我在降落的前一小时起来了，和几位随行人员共进了早餐，六时三十分，飞机在威克岛的机场上着陆滑行，然后停了下来。正是破晓的时候。按照当地时间，那天是 10 月 15 日，星期日。

在我要下飞机的时候，麦克阿瑟将军已经等候在扶梯上了。他敞着衬衣，戴着一顶看来自经戴了很久的军帽。

我们热烈地互相致意。在摄影记者们照例乱哄哄地拍了一通照片之后，我们坐上一辆两门的老式轿车到该岛的民航管理处去。

我们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讨论了日本和朝鲜的局势。

---

(1) 植雪山常温的山名。——编者
这位将军向我保证朝鲜的战局是赢定了。他还告诉我中国共产党不会进攻，日本也准备接受和约。

然后他提起他向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全国野营会发表的关于福摩萨的声明。他说他感到抱歉，如果他曾使政府为难的话。我告诉他我认为这件事已成过去。他说他希望我能谅解他绝不是在搞政治，他在1948年上了敌客们一次“当”，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事不至再发生了。

我告诉他一些关于我们加强欧洲的计划；他说他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并肯定在1951年1月有可能从朝鲜调一师人到欧洲去。他再次肯定朝鲜的冲突是赢定了；而中国共产党参加战争是不大可能的。

这位将军好像真的感到高兴能有这次机会和我谈话。我发现他是一位使人感到十分高兴、有趣的人物。我们的谈话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可以说比我所预期的要友好得多。

七点半过一点，我们来到另外一所小建筑物里。我们的随行人员都聚集在那里。除我和麦克阿瑟将军外，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雷德福海军上将，穆乔大使，陆军部长佩斯，布莱德雷将军，菲利普·杰森普，国务院的迪安·腊斯克，阿弗里尔·哈里曼和布莱德雷的参谋长布伦上校。

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杰森普大使的秘书维尔尼斯·安德逊小姐躲在隔壁，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命令便把谈话速记了下来。这事在麦克阿瑟将军被撤职以后，在出席作证的时候，才被揭露出来。对于这件事我深感震惊。我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我，也不是杰森普先生，更没有任何人命令安德逊小姐作记录。事实上，她的随行并不是要她作记录，而只是随带几名秘书，好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起草一项对外发表的公报。

安德逊小姐作记录的事后真相大白了，而这次在威克岛召
开的扩大会议上的谈话已经发表在书报上了。因此我在这里只说说这次讨论的几个要点——这几点当时给我深刻的印象，因此即使没有记录，我也能记得起来。

麦克阿瑟将军说，他坚信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前结束。他说，这样他就能够在圣诞节把第八军撤回日本。他将留两个师和其他联合国国家的部队在朝鲜，直到那里举行了选举以后。他认为选举最迟可以在1月份举行，那时侯就有可能从朝鲜撤出所有的非朝鲜部队。

接着大家对冲突一旦结束，复兴朝鲜所需的援助讨论了一番，麦克阿瑟将军和穆乔大使都对我和我的随行人员所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当陆军部长佩斯问麦克阿瑟将军需要陆军和经济合作总署给他什么帮助的时候，这位将军毫不迟疑地说，在军事史上没有一个司令官有比他自华盛顿各部门得到更全面、更足够的支持了。

我记得我们谈到我们的部队所俘获的战俘，这位将军说他们是最朝鲜人中最幸福的人了。他们吃得很好，穿得很干净，虽然他们是作为北朝鲜的“共产党人”而被俘的，事实上他们和其他的朝鲜人没有区别。

接着我让麦克阿瑟有机会对大伙重复说说他和我私人谈话中说过的一些事情。

我问：“中国和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如何?”

这位将军实际上分作两部分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他谈到中国人。他说他认为他们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很小。最多，他们可能派三、六万人进入朝鲜，但是他们既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惨重的伤亡”。

其次，他谈到俄国干涉的可能性。他谈到俄国空军的实力，但是他肯定他们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的素质都比我们的差。他看不出俄国在冬季到来以前可能调出大量的地面部队。他以为因此就
可能使中国和俄国联合起来进行干涉，用俄国的飞机来支援中国的地面部队。他认为这不足为虑。他又说，“俄国空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地面部队根本就配合不来。”

后来，大部分的时间是用来讨论日本问题。麦克阿瑟表示坚决赞成对日缔结和约，他特别赞同国务院的和约草案。在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他还说他认为搞一个太平洋公约为一个好主意，但是这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亚洲国家都没有军事力量，因此任何像这样的协定，就像一条单行线，美国给予太平洋国家以保证，而得不到任何回报。他认为由总统发表一项声明就能够达到在这个地区订立公约的效果。

这次正式会晤在九点钟一点半结束。然后麦克阿瑟将军和佩斯部长及布莱德雷将军就技术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商谈，同时穆乔大使和随行的国务院的官员们进行了讨论。

麦克阿瑟将军急于要回东京，因此我们决定在午饭以前离开威克岛。如果按照我的计划，我将留下来，共进午餐，那么由于威克岛和东京两地的时差，这位将军就要在夜间才能回到东京。

我在麦克阿瑟将军的优异服务勋章旁加上了第四枚橡叶勋章，同时也授予穆乔大使一枚勋章。然后我和将军审阅了布莱德雷将军和杰森普大使起草的公报。麦克阿瑟将军在这上面署了名，以表示这份公报表达了他的看法。

在我们回到我们座机旁边的时候，我告诉麦克阿瑟说我认为我们这次的会晤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我希望下一次的会面为期不会太远。我握过手，在我登上《独立号》专机的时候，他祝我，“平安着陆”。

在我们回夏威夷的途中，我们又一次飞越了午线。我们离开威克岛的时候是10月15日，星期五，但是当我再次在希克姆空军基地下飞机的时候，却是10月14日，星期六。因此，虽然我在
威克島剛渡过一个星期天，而第二天又是星期天。

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准备我将在旧金山发表的演说。我们是在海滩午宴上进的午餐，下午驱车游览了岛上的几处风景区。10月16日，星期一，我便自夏威夷回到了旧金山。

第二天晚上我在旧金山歌剧院发表了演说。我向美国人民报告了威克岛会谈的情况，并表示朝鲜是联合国行动的象征。

我说，“我才从威克岛回来，在那里我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进行了一次非常令人满意的会谈。

“我知道外面对于我这次旅行一定有很多的猜测。其实这并没有什么神秘。我去了，是因为我要和麦克阿瑟将军见面，谈一谈。和他见面，谈一谈，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他约定在一个什么地方会晤。

“战区司令官由于亲临其境，最了解当地情况，所以再没有人比和他谈话更解决重要的了。他掌握大量的情报，这对我们的所有人，在这个危急的关头，正确地决定政策都会有帮助。

“我之所以到威克岛去会晤麦克阿瑟将军，是因为我不希望使他远离朝鲜，在那里他正得心应手地指挥着非常重要的军事活动。那里事态的发展是很快的，我认为他不应该离开他的岗位太久。

“同时，我相信我的威克岛之行会加强联合国在朝鲜所采取的实质性行动的意义。因为朝鲜已经成为人类共同抵抗侵略的象征。

“我还觉得迫切地需要通过我和麦克阿瑟将军的会谈来明确，我们外交政策的目的和行动是完全一致的。

“这次会谈归来更增强了我的心，我们有维护世界和平的持久能力。

“在威克岛我们谈到了远东的局势和它对世界和平的关系。我征询过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依他看美国怎样才能在太平洋地区最有效地帮助联合国促进和维护和平与安全。
“我們討論了日本問題和早日締結對日和約的需要問題。我們都對一個和平、繁荣的新日本抱着莫大的希望和信心。

“麥克阿瑟將軍告訴我朝鮮的战斗情况。他描述了在他指挥下的聯合國部队的光辉的成就。和大韓民國的部队一起，他們打退了侵略的浪潮。越来越多的战斗人員正从全世界的自由的国家里赶来。我坚信这些部队不久将恢复全朝鮮的和平。

“我們在美國国内的人們自然对我们自己的陆、海、空和陆战部队战士的卓越成就特别感到自豪。他们在军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新的一頁。我們所有的人会为他們感到驕傲。

“聯合国要求我国为联合国軍提供第一位司令官也是我們莫大的光荣。我們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完成这个使命其是全世界的幸运。这个人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軍——一个非常伟大的战士。

“現在，我希望威克島能成为為維护世界和平而团结一致的象征。我希望能看到環繞威克島以西的所有地区实现世界和平。我希望看到環繞威克島以东的所有地区实现世界和平。我們正在赢得和平!

“聯合国在朝鲜的行动对全世界人民来说都是极端重要的。

“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希望和平的国家在一个国际組織的旗帜下拿起武器来制止侵略。在那面聯合国的旗帜之下，他們正获得成功。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法治的长久斗争中，这是一个巨大进步。⋯⋯

“今天，由于朝鲜斗争的結果，聯合国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坚强。我們現在知道联合国可以运用維护和平的权威来创造一种国际秩序。

“在我和麦克阿瑟将軍会見的时候，我們討論到怎样完成給朝鮮带来和平的任务的各种计划。我們聽到按照联合国大会的决
議，在那个国家建立一个‘統一、独立、民主’的政府的各项计划。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們的政策就一直在为朝鲜争取达到这些目的。

我們唯一的目的就是在朝鲜建立和平和独立。我們的部队留在那里将不超过联合国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需要他們的时间。我們对朝鲜或其他地方都没有获得领土或其他特权的野心。我們对朝鲜或任何其他远东地区，或任何地区都沒有侵略企图。我希望全世界完全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任何真正希望和平的国家沒有任何理由对美国存有戒心。

“我們所寻求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和平的胜利。

“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正获得惊人的进展。然而在那边的战斗尚未结束。北朝鲜的共产党人仍然拒絕承认联合国的权威。他們繼續进行着顽强的，但是徒然的抵抗。

“联合国军的力量正在日渐增强，目前他們比敌对部队远远处于优势。朝鲜共产党人的有效的抵抗力量不久必将告终。⋯⋯

“五年以前，在旧金山这个城市里，我們希望苏联会跟我們合作，为建立持久和平而努力。

“但是共产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作。苏联不但不和其它国家的政府在互相尊重和合作之下工作，反而企图扩张势力，控制其它国家的人民。走上了苏維埃型的新殖民主义的道路。这种新的殖民主义已經使一些过去曾經是自由的国家完全遭受它的控制和剥削。苏联不但自己拒絕合作，而且不允许它的卫星国家同它所不能控制的其他国家合作。

“在联合国組織里，苏联坚持反对的立场。它拒绝参加为联合国宪章所认可的，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它竟然好几个月拒绝参加安全理事会。⋯⋯
“苏联的殖民地卫星拥有数量和力量都很大的武装部队。在欧洲和亚洲，他们的大量的军队形成了对世界和平的一个经常性的威胁。只要他们还坚持拥有这些部队，并用以威胁其他国家，世界上的自由人民就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如果他们还想过自由日子的话。他们必须以武力对付武力。

“这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任务。这是自由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担负的任务。而自由的国家正在共同担负起这个任务。

“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联合国里曾提出了一项‘为和平而团结起来’的计划，使联合国大会在任何新的侵略发生的时候有可能迅速而有效地行动起来。⋯⋯

“现在，苏联可以改变这种局面。他只要提出具体确切的保证，表明它有为和平而努力的诚意。如果苏联真正希望和平，它不应该再用闪烁的诺言和虚伪的宣传，而是用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来证明它。

“如果苏联真正希望和平，它可以——而欧洲自去年6月25日起没有一天不可以——和其他联合国国家联合起来，呼吁北朝鲜立刻放下武器，来证明它的和平愿望。

“如果苏联真正希望和平，它可以和北朝鲜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可行的集体安全体系来证明它。这种体系将使销毁原子弹和大大地削减并调整其他武器或武装部队成为可能。

“但是在苏联作这些事情以前，在对自己的和平愿望提出真正保证以前，我们有决心建立起一支自由世界的共同防御的力量。这就是我们已作的选择。我们坚定地，又有决心地作了这种选择。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喜欢作这种选择。我们不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我们没有征服的野心和炫耀我们武力的愿望。⋯⋯”
第二十四章
共产党的干涉

朝鲜战争在10月里获得了良好的进展。北朝鲜的首都平壤在10月19日拿了下来，麦克阿瑟的部队天天都在前进。

在他指挥下的这些部队，现在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质。在10月中旬，除了美国和大韩民国的部队外，在朝鲜的还有澳大利亚，英国和菲律宾的地面部队。一支瑞典的战地医疗队也参加了活动。泰国和土耳其派来的步兵正在朝鲜的港口登陆，准备参加战斗。派遣海军协助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哥伦比亚、法国、英国、荷兰、新西兰和挪威。此外比利时、哥伦比亚、加拿大、埃塞俄比亚、法国和希腊也正在准备派遣地面部队到朝鲜去。一天又一天，“联合国司令部”越来越成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把出钱、出物資的国家都算在内，截至现在一共是四十二个国家向联合国提供了它们的援助。

我能理解这样一支由许多国家拼凑成的军队会给它的司令官增添一些新的问题。麦克阿瑟将军和接替他担任指挥官的李奇微将军和克拉克将军，在证明可以把来自很多国家的战士组成一支能够打胜仗的军队方面，得到人们给予的最高评价。

在这个多国家的成分里面，朝鲜人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到要发动进攻的时候，朝鲜的陆军还是些没有战斗经验的新兵。它的军官不懂得现代军事技术，而它的高级将领也缺乏训练和阅历。在那时，麦克阿瑟将军对朝鲜的陆军并没有很大的信心。参谋长联席会议曾经训令麦克阿瑟将军在向北推进的时候，不要把非朝鲜的部队部署在满洲和苏联的边境。但是这位将军在他给他的将
領的命令中，指示由美國軍隊領頭向北推進。等打到辮境以後，在
“可能的”地方，再由南朝鮮人來接替他們。參謀長聯席會議對這
樣做法表示擔憂，要求麦克阿瑟報告這一種變更的理由。

麦克阿瑟將軍在他的答覆中說，大韓民國的部隊還沒有足夠
的力量來取得北朝鮮初期的安全，他認為使用更多的經過鍛煉和
有經驗的司令官是必要的。麦克阿瑟說他看不出在他的命令和他
所得到的“我們希望你在向三八線以北進中，在战役上和戰略上
都不会感到有什么束縛”的指示之間有何沖突。麦克阿瑟补充說，
“我完全了解你們的指令的基本目的和意图，而且在這種前提下，
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預防措施。不過，要是不照我所指示的，而采取
其他行動的話，那就會產生相反的結果，甚至在戰術上會陷于危
險。整個問題在威克島會議里我都談過了。”

在麦克阿瑟的部隊沒有遭到太大的抵抗而向北移動時，就有
很多关于中國共產黨看来是会在北朝鮮進行一些活動的猜測。10
月 20 日中央情報局送給我一份備忘錄，說他們接到报告說中國共
產黨將向足以保證供應他們電力的水丰电厂和鸭綠江畔的其他設
備安全的地方移動。國務院對這個報告的反應是建議麦克阿瑟將
軍發表一項致聯合國的聲明，表明他並不打算切断水丰和其它電
厂的供电。參謀長聯席會議认为，从军事观点来看，这样的声明是
不妥当的。当这种情况摆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命令參謀長聯席會
議把國務院的建議轉告麦克阿瑟，并征求他的意见，看他是否不同
意發表這樣的声明。但是麦克阿瑟认为他不願意这样束縛住自己
的手脚，因此也就沒有发表声明。

不过，发表了声明是不是就会产生什么不同的效果是非常值
得怀疑的。正如我們后来所知道的，中國共產黨已經開始进入北
朝鮮，虽然直到 10 月 31 日我們才获得证据，他們已經进入战区，
实际上已經在和联合国的部队作战。
这个消息最先由在北朝鲜元山地区的第十兵团司令部报告上来。10月26日和以后所俘获的战俘认为是中国人，经过审问，证明是有组织的中国部队的成员。战俘们供称他们的部队在10月18日就跨过鸭绿江，这是在麦克阿瑟将军在威克岛向我提出保证的第二天。将军保证说，如果任何中国人进入朝鲜，他们将肯定地面临灾难，但是他认为他们不至于尝试那样愚蠢的事。我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叫麦克阿瑟提出对局势的最新估计。11月4日收到麦克阿瑟以下的答复，

“目前还不可能对中国共产党在北朝鲜进行干涉的实质性作出有力的估计。根据来自前线的战斗情报，各种可能性都存在。

第一，中国共产党政府打算以其全部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干涉，在它认为适当的时机公开宣布这一行动。第二，它将隐蔽地给予军事援助，但是为了外交上的理由，尽可能地掩藏起事实的真相。第三，允许外籍使或多或少也算是志愿的人员源源不断地越过国境，加强并援助北朝鲜的残余部队使他们能够为在朝鲜保留一个名义上的立足点而继续斗争。第四，这样的干涉，也是存在的，是因为他们相信除了南朝鲜部队外，联合国部队是不会在朝鲜的极北地区使用的。他们一旦了解到这样的兵力是不足以达到目的的，就很可能学到一点乖，趁早从破船上捞回点东西。

“第一种或然性代表一种具有最严重国际意义的重大决定。一方面，这种可能性已经很明显，而且很多外国专家都在推测这样的行动。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和这种看法相反的逻辑上的基本理由，而且也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使人能够很快地同意这种看法。

“目前看来，其余三种或然性，或者三种或然性合在一起，似乎是最可能的。

“我建议在条件可能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不要率地作出结论。我相信最后的估计还有待于更全面地积累军事情报。”
这样，麦克阿瑟将军警告不要轻率地采取行动，特别是不把中国共产党干涉的可能性看作“新战争”。因此不到二天，他撞起警钟的时候，不免使人大吃一惊。

11月6日我正在堪萨斯城，正好是选举的前一天，像往常一样我打算在独立城投票。那天早晨我接到迪安·艾奇逊的紧急电话。国务卿是在和国防部分副部长罗伯特·罗维特在华盛顿的会议中给我挂的电话，他们觉得情况非常严重，需要立刻作出决定。

下面就是艾奇逊在电话里向我报告的局势及其发展情况。艾奇逊说，国防部副部长罗维特在早晨十点钟到他的办公室来，告诉他他才收到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梅耶尔中将的电报。麦克阿瑟曾命令他执行一项炸毁横跨鸭绿江上朝鲜新义州和满洲安东之间的大桥的任务。九十架B-29型轰炸机已预定在华盛顿时间一点钟起飞去执行这项任务。罗维特曾告诉艾奇逊说，从战术观点来看，他怀疑所要达到的目的比起可能炸中安东或满洲其他地区的危险来，是不是值得。

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指出我们和英国人有约在先，未经和他们磋商，不得采取可能涉及攻击鸭绿江那边的满洲的任何行动。他还告诉罗维特说，国务院已把麦克阿瑟关于中国共产党进行干涉的报告递交联合国，并已请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若努力通过一项呼吁中国共产党停止在朝鲜活动的决议；为了争取联合国支持我们进一步的行动，这样做是必要的。腊斯克先生还提到了涉及苏联的危险，尤其是鉴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存在着互助条约。

艾奇逊继续说他和罗维特已同意，在我们获得关于那边局势更多的事实以前，这次轰炸任务应该暂停执行。罗维特接着和马歇尔通了话，马歇尔也认为除非发现敌人集结过江，威胁我们部队的安全，这次轰炸是不明智的。然后罗维特又和空军部长芬勒特

438
先生通了电话，训令他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腊斯克所说理由，并告诉参谋部联席会议说他（罗维特）和艾奇逊都认为在他们能够获得我的决定以前，这种行动必须暂缓执行。

我告诉艾奇逊说除非对我们部队的安全有严重的和急迫的威胁，我才会批准这种轰炸的任务。艾奇逊说自从上次报告以后，从麦克阿瑟那里还没有收到新的情况；上次的报告并没有说是否有部队过江，而只提到中国方面的后备力量。我告诉艾奇逊说我们必须了解麦克阿瑟为什么全然认为有必要采取这种行动，并且告诉他让罗维特照这样发出命令。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华盛顿时间十一时四十分，距离飞机自日本基地起飞的时间只差一小时二十分，发出一份电报，传达了我的指示。在这份电报里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政府正在对朝鲜局势作焦急的考虑，并告诉他和英国有关在先，未经和他们磋商以前，不得对满洲采取行动，在收到进一步的命令以前，所有离开满洲边境五英里以内的目标，都应暂缓轰炸。在这个期间，他应该对局势的估计提出报告，并说明他命令轰炸鸭绿江所有桥梁的理由。

麦克阿瑟的答复如下，

“大队的人马和物资正自满洲通过鸭绿江上所有的桥梁。这种移动不仅使我指挥下的部队陷于困境，而且使我军全部被歼的危险。过江的实际移动可以在黑夜的掩蔽下进行，而鸭绿江和我们防线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近，敌军可以不必十分顾虑空袭的威胁，展开对我军的攻击。唯一阻止我军增援的办法就是发挥我们空军的最大威力，摧毁所有的桥梁和在北部地区所有支持敌人前进的设施。每小时的迟延都将付出大量的美国人民和其他联合国人民的鲜血。新义州的主要渡口要在最近几小时内加以轰炸，
而且这个任务实际上已经准备就绪，我是在我所能提出的最严重的抗议之下勉强进行这次袭击，并执行您的指示。我所命令的行动是完全符合战争原则和联合国所得到的决议和指示的，而且并不构成对中国领土任何轻微的敌对行为，虽然肆意违反国际法的行动是从那里来的。我不愿过分夸大您所加于我的限制将在物质上和心理上造成严重损害的后果。我希望这事件立即引起总统的注意，因为我相信您的命令很可能要导致严重的灾难，如果不是总统亲自和直接了解这种情况，我是不能担当这个责任的。时间是如此的紧迫，我要求立刻重新考虑您的决定，在等待您的决定时，自然完全遵照您的命令行事。

“1950年11月6日”

布莱德雷将军在电话里把电文读给我听。对这么靠近满洲和苏联领土的目标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轰炸有着严重的危险。一个立功过于心切的飞行员很容易会引起报复的行动；受伤的飞机也可能被迫降落在我控制以外的地区。但是既然在场的是麦克阿瑟将军，而他又痛切地感到局势非常紧迫，我告诉布莱德雷就让他“干去吧”。

参谋长联席会议拍给麦克阿瑟的电报如下：

“从你11月6日的电文所描的情形和你11月4日电文的最后一句所报告的看来，局势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你的11月4日的电文是我们在收到的你最后的一个报告。我们同意摧毁鸭绿江的桥梁对于保证你指挥下的部队的安全会有重大的帮助，除非中国共产党把这种行动解释为对满洲的进攻，而激起更大的努力，甚至苏联也投入他们的力量。其结果不仅危及你的部队，还会扩大冲突地区，而陷美国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然而鉴于你11月6日电文的第一句所说的情况我们授权你
按照你的计划，轰炸朝鲜边境，包括在新义州的目标和朝鲜这一头的鸭绿江桥，如果在你收到这封电报时你还认为这种行动对你的部队的安全是必要的。上述命令并没有授权你轰炸鸭绿江上的水坝和发电厂。

“由于必须和联合国的政策、指示保持适当的关系，也由于把战争限定在朝鲜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着重大的关系，所以应极端注意避免侵犯满洲的领土和领空，并把从满洲方面来的敌对行动及时呈报，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认为经常把重大的局势变化在它发生的时候通知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我们11月6日要求你作的估计告知我们。”

就在11月6日这一天，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发表了一项公报，他声明他的部队现在面对着一支斗志旺盛的新军队；这支军队有着大量的后备和充足的供给；敌人可以就近得到增援和补给，而敌人的后方却在我们目前军事行动所能达到的范围以外。

中央情报局也在那时根据他们的情报来源给我提供了一个对局势的估计。报告估计说在满洲的中国共产党部队可能有二十万人之多，他们的进入朝鲜可能阻止住联合国的前进，而事实上可能迫使联合国更向南撤退到防御阵地。估计最后指出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由于进入朝鲜，中国共产党不仅把他们的一部分部队而且把他们在亚洲的威信作为赌注押上了。必须估计到他们是知道他们所冒的是什么样的危险；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准备应付一次大战。

麦克阿瑟将军对时局估计的两封电报都在11月7日收到。在第一封电报里麦克阿瑟重新提到了他最初(11月4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干涉的估计，并且断定说他肯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没使用出全部力量来进行干涉。他承认干涉的兵力可能加强到“使
我們的繼續進攻成為不可能的程度，甚至迫使我們往后退却。” 他說他正在計劃採取主動，以便“正確地試探……敵人的力量。” 他接着又說，“我認為必須執行討論中的目標的轰炸，因為這是防止敵人大量增援軍力到威脅我軍安全程度的唯一方法。這種把敵人前進的戰線阻止在朝鮮境內的行動，分明是防御性的，要是說這種行動會使局部性干涉的數量增加，或者說它本身會挑起一次大戰，那是很難以想像的。

“自从敌对行动开始以来，本司令部就把滿洲和西伯利亚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当作一个主要的负担，而所有来自那里的，經過证实的敌对行动都及时地加以报告。从来也没有要炸毀水电設備的企图。全日的情况将照常逐日报告給你們。”

麦克阿瑟的第二封电报如下：

“敵人的飞机自鴨緑江以西的基地起飞，襲击我們在北朝鲜的軍队。飞机的数量越来越多。鴨緑江和主要战线之間的距离是那么近，以致于几乎不可能有效地对付敌人目前所使用的打了就跑的战术。目前对我的战区所施加的限制使敌人飞机一过北朝鲜和滿洲的边境，就进入一个十分安全的避难所。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对空军和地面部队的士气和战斗效率的影响是严重的。

“除非很快地采取正确的措施，这种因素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怎样应付这种危急的新局势，恳請指示。

“1950 年 11 月 7 日”

自然，每一位軍事指揮官和每一位政府文職官員都有权发表他的意見。的确，如果我们希望所有的公僕都是一个想法，或者只有一种想法，那我們的政府不会是一个好政府。我尊重麦克阿瑟发表己見的权利。參謀長聯席會議也是如此。毫無問題，我对麦
克阿瑟的军事判断力是非常重视的。但是作为总统，我不仅要听取军事方面的判断，我所作的决定不仅要根据一部分的活动而必须根据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更全面的情况。

我们是代表联合国，而且是以联合国的名义在朝鲜从事活动的。我所委托给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统一指挥权”是联合国的指挥权。如果我们行动越出了联合国大会所赋予我们的任务范围，那他和我都无法为自己辩解。

在我的脑子里，毫无疑问，我们不能让朝鲜的行动扩大成为一次大战。全面进攻中国的军事行动必须避免，不要说别的理由，只因为它是一颗巨大的地雷。

中央情报局对时局的估计是：俄国人不愿自己参加战争，但是他们希望尽可能把我们纠缠在亚洲，以便他们放手在欧洲行事。

我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干涉及其军事意义提出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建议如下：

“（一）应该不遗余力地通过政治途径，包括重新向中国共产党保证我们的意图，最好是通过联合国。通过我们的盟国或联合国的临时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政府直接谈判，或其他可以利用的方法，把中国共产党干涉朝鲜作为紧急事件加以解决。

“（二）在进一步明确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目的和他们企图干涉的程度以前，对于委托给联合国军总司令的任务应该经常加以检查，但是不应予以改变。

“（三）美国应该根据世界大战的危机加剧的形势，扩大它的计划，并加强准备。”

马歇尔将军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同意这些结论。

在11月9日的一次会议上，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参谋长联席会
議的這些意見和中國干涉所產生的一般性問題進行了全面的討論。我沒有能夠出席這次會議，但是會後得到了會議進行情況的報告。

布萊德雷將軍在這次會議上說，中國共產黨可能有三種企圖，我們應加注意。第一，中國人可能只希望建立一個緩衝地區，以保護他們在鴨緬江沿岸電力設施的利益。如果是這樣的話，談判可能有結果。第二，中國共產黨可能希望迫使我們和他們進行消耗戰，使我們的部隊損耗到一定程度，一旦蘇聯發動一次世界大戰，我們就有失敗的危險。第三，我們必須在我們的計劃中考慮到中國人的目的可能要把我們完全趕出朝鮮半島。参谋長聯席會議認為最後這個可能性就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戰，因為單靠中國人還發動不了，而蘇聯一旦進行干涉就不可避免地會把戰爭擴大到東西方每一個接觸點。

布萊德雷將軍說，據他看來，我們應該能夠保住我們目前在整个地區的陣地，但是越來越嚴重的問題是，如果我們不進攻滿洲基地，我們究竟能不能受得住多大的壓力。然而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這種對滿洲的攻擊要由聯合國來決定，因為它超出了作為聯合國部隊行動依據的決議內容。

布萊德雷將軍談到，麦克阿瑟將軍大概是認為轟炸鴨緬江上的橋樑會阻止中國共產黨部隊涌入朝鮮。然而布萊德雷自己卻認為這種想法太樂觀了。

國防部長馬歇爾在這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指出，我們在朝鮮的東面防線拉得太長，兵力單薄，而這就更增加了一層危險。布萊德雷將軍的答复是，麦克阿瑟將軍這樣做，自然是为了執行他的指示，指示要他佔領全朝鮮，並舉行選舉。

中央情報局比德爾·史密斯將軍說，在十五天到三十天之內鴨緬江就會封凍，有沒有橋樑都可以通行。
国务卿艾奇逊同布莱德雷将军说，从军事观点来看，有没有比现有的更好的防线。布莱德雷回答说，从纯粹军事观点来看，越靠后的防线越容易防守。然而，他又说，他意识到只要我们部队向后转移，我们就会失去人心，我们就会使南朝鲜人失去战斗意志。

国务卿艾奇逊表示他有一种感觉，俄国人对纵深防御特别有兴趣。因此他建议在朝鲜东北部建立一个缓冲区，由联合国委派的警察部队而不由联合国武装部队来维持秩序。艾奇逊说中国人所关心的有二：第一是牵制住我们，其次才是边境与电厂。他认为我们应当私下试探有没有可能搞一个二十英里，鸭绿江两岸各十英里的非军事区。他接着说，自然任何这类建议行不通的理由是因为共产党会坚持所有外国军队统统撤离朝鲜，而就此把朝鲜送给共产党。

在他总结这一次讨论的时候，国务卿艾奇逊指出，会议同意麦克阿瑟将军的指令现在不应加以改变，并且同意在军事方面他可以相机行事，但是不得轰炸满洲。在这个同时，国务院应设法试探是不是可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虽然我们和北平政权在外交上没有直接联系还是一个问题。

必须指出，朝鲜局势并不是共产党中国借端寻衅的唯一事例。事实证明印度支那的共产党叛军正在更多地接受北平的援助和建议。同样的，在10月底，共产党中国又向古老的奉行神权政治的西藏进军。

我们在印度支那和西藏看到一件在时机上配合在朝鲜进攻的类型，这是对西方世界的挑战。这是共产党的一次挑战，目的在于加深多数亚洲人排外情绪的郁积。

我们的英国盟友和许多欧洲的政治家们认为这是中国人迫使美国停止对重建欧洲的援助的诡计。他们知道再没有比美国的政策——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马歇尔计划，坚守柏林的决
定，北大西洋公约組織——对世界共产主义更有害的了。只要遵循这种政策，而美国随时坚决给予支持，克里姆林宫就永远不能使欧洲共产主义化。苏联外交政策的第一条信条一直是分化苏联的敌人，而美国的领导在欧洲所形成的团结便是世界共产主义攻击的最主要对象。

我不打算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而无须于苏联始终不变的目的和阴谋。我知道在我們这个时代，拥有千百万熟练工人、工厂和交通网的欧洲仍然是世界和平的钥匙。

在美国，过去有过，而现在还有这样一些人，有时是善意的，有些是听信了错误的宣传，有些是恶意的，他們要我們相信我們应该把我們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亚洲人民，甚至不惜以放弃欧洲为代价。这样我不能同意。但是持这种见解的是一帮人嗓门很大，而且他們有宣传自己见解的工具。參議院就是一个大吼大嚷的讲坛。在參議院中或其他场所鼓吹亚洲第一的演说得到很广泛的传播，而我们国外的朋友們不免经常为之心急不安。在我当总统任內，我們的政策絕不听命于其他国家，不論这个国家对我们是多么的友好。我們堅持献身于和平的理想，也就是通过联合国獲得的和平，跟和我們有共同的目标和态度的人們合作而獲得的和平。

因此，1960年11月，关于朝鲜，我們要采取三个措施。其中之一是向我們欧洲的盟友，尤其是英国和法国，重新保证我們无意于扩大冲突，也不会因为在亚洲新的牵扯而放弃我們在欧洲所承担的义务。第二，我們在联合国内，为了制止中国干涉朝鲜，寻求最大的支持；不过，又要不至于迫使联合国对北平进行军事制裁，因为制裁就意味着战争。第三，要弄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实力、方向和目的。

麦克阿瑟将军在11月24日以他的第八军发动了一次主力进攻。他声称这是一次“结束战争的……总攻势……”，他要他的一
位指挥官告诉士兵们他们可以在圣诞节回家了。前此不久，就在 11 月 6 日和 7 日，他来电向华盛顿报告，好像大难即将临头。但是现在，很明显，严重的危险并不存在，因为甚至在未动一兵一卒之前，他就宣布了胜利。

但是就在这同一天，中央情报局搞了一份给麦克阿瑟的全国情报简编，说中国共产党将“在最低限度以内”扩大朝鲜战争，希望我们的部队，使我们陷于长期的消耗战，以便维持北朝鲜政府的现有局面。简编还提到中国人有足够的力量迫使联合国军撤退到原来防御阵地。

这个情报简编所作的估计证明是正确的。11 月 28 日，事情终于明白了，第八军撞上了大量的敌军，而在东海岸的第十兵团，按照公报作者的说法，是处在一种“绝对状态”，这时新闻发布会对于他所不能肯定的情况的说法。

现在说来并没有一个人因为 11 月攻势失败而责备麦克阿瑟将军，肯定是没有责备他的意思。事实上由于众寡悬殊，不应苛责于他，正如不能因为腹地战役① 所受的重大损失而过分地非难艾森豪威尔一样。但是——1944 年的艾森豪威尔和 1950 年的麦克阿瑟之间究竟有些区别——麦克阿瑟企图为了自己的过失辩护的态度我是不能原谅的。第一，他没有必要宣告这一次是“结束战争”的攻势。如果他知道敌方的兵力不足以抵挡他的前进，那么他早先拍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几封电报就肯定是错了。但是如果他在 11 月初的估计是对的，那么他现在就几乎不可能想轻易赢得胜利。

也许这类前后矛盾的事情是意料得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① 腹地战役（Battle of Bulge），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于 1944 年 12 月 16 日在西线发动的最后一次反攻，当时德军试图插入盟军的腹地——比利时的北部和东部，1945 年 1 月被盟军击退。——译者
中，正当他的部队还在硬抗苦战之中，麦克阿瑟早曾多次宣告过胜利。但是在攻势刚刚失败，他现在又开始对某些人士发表声明，那是不可原谅的。在四天之内，他居然有时间用四种不同的方式发表了他的一个看法：他之所以倒霉仅仅是因为华盛顿的命令把敌对行动限制在朝鲜境内。他谈到什么“军事史上没有前例的”啰，“惊人限制”啰，他推得很干净，他和他的部下没有一点过失。

然而，记录表明，麦克阿瑟将军自己在11月6日和7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中国人以强大的军力进入朝鲜，进行干涉。他自己曾向我们提供情报说，在鸭绿江彼岸有大量的后备部队。他要求——要求被批准了——允许他摧毁所有的桥梁，因为通过这些桥梁敌人的后备部队源源涌入朝鲜。

自然，他并没有得到轰炸满洲基地和“穷追”自朝鲜逃入满洲的敌人权力。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同意，这种政策最好得到联合国的允许。因此，在我的批准之下，所有往朝鲜派遣部队的联合国会员国征求了意见。所有的国家无例外地，表示强烈的反对。的确，他们还强调，希望不要把非朝鲜部队配置在靠近鸭绿江地区，如果我们的攻势必须深入到这样的地区的话。

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到了必须作出严重决定的地步。如果我们决定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我们就必须防备敌人的报复。北平和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在条约上，都是同盟者。一旦我们进攻共产党中国，那么我们就必须预防俄国出面干涉。当然，我不希望发生任何规模的战争。但是我们和全世界也都不愿意受共产党的奴役。而目前的问题是，我们遭受奴役的威胁是这么严重，但是否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以致于我们必须采取毁灭城市和屠杀妇女、儿童的行动。

我只能假定麦克阿瑟将军是作这样想法的，而那些希望他的计划见诸实现的人也是作这样想法的。在我们轰炸满洲基地以后，
共产党中国投入全面战争不是不可能的。我相信俄国也会行动起来。

然而麦克阿瑟的一再声明使国外很多人士相信我们的政府会改变政策。他们不能允许这种混乱的情况继续下去。因此在12月5日我向政府所有机构发布了一项命令说，“在接到我的进一步的书面通知以前，不得未经国务院许可发表有关外交政策的演说、新通讯或其他公开的声明。”第二个通知警告，“驻外官员，包括军事指挥官和外交代表在内，对公开声明必须极端审慎，只可以发布和本部门有关的例行声明，避免直接透露有关军事和外交政策的消息给美国国内的报纸，杂志和其他宣传机构。”

几个月以前曾经有过一个高级官员突地谈论外交政策。那件事发生在海军部长弗朗西斯·马修斯在8月25日发表演讲的时候。马修斯先生在波士顿发表谈话时，我们应该打“预防战”。我一直是反对这种战争的，甚至不愿意想到它。再没有比以战争制止战争的想法更愚蠢了。除了用和平以外，用战争什么都制止不了。

自然马修斯先生是受了海军上将们以及其他高级海军官员们的包围，而他在对付这一类人物方面又没有更多经验。他告诉我，他听到他们之中那么多的人在谈论“预防战”，而他也就重复了这句话。没想到竟使他离开了我的政策这么远。在我请他来谈，并向他解释，我之所以不让我的政府中的成员在国内到处宣扬和政府的正式政策完全相反的看法的时候，他十分后悔，并且感到非常遗憾。

麦克阿瑟所犯的错误更为严重。他在记者招待会和新闻公报中，有时暗示，有时直说，如果他的建议被采纳，那么朝鲜方面就会万事大吉。

第一，他自然是错了。如果当时或后来采纳了他的意见，如果
我們放手千去，炸了滿洲的基地，那我們就已經公開和紅色中國作戰了，甚至和俄國公開作戦也不是不可能的。第三次世界大戦很可能已經發生了。

第二，麦克阿瑟將軍自己曾說過中國干涉的危險不存在。在威克島，他曾經肯定地告訴我說，他沒有發現任何大規模干涉的威脅即將到來的跡象。更重要的是，他曾經告訴我說，如果中國共產黨果真進入朝鮮，他能夠很容易地對付他們。他曾經說如果來自中国的共產党企圖奪回平壤，那他們簡直是自投死路。

甚至在他動那 11 月 24 日的倒退攻势以前，他仍然以那麼一切都不成問題的口氣說話。但是一旦事情不是這樣的時候，他就向全世界宣告，他本來是可以打勝仗的，只是我們不讓他照他的辦法幹下去。

事實根本不是這樣的。我們根據什麼理由制定的我們的政策，我們全部告訴過麥克阿瑟將軍。他曾經告訴很多到過東京，訪問他的办事處的人們包括哈里曼，並且在威克島他也告訴過我，這些理由他了解，不過他不以為然。自然，每一个國民軍了解他那一排應該作些什么，只要上級和他的看法不同，他總認為上級根本不瞎子。但是麥克阿瑟將軍一定是--也是應該這樣的--把向記者發表不同意見的少尉提交軍事法庭問罪。

我当时就應該將麥克阿瑟將軍免職。我沒有这样作的原因是我不願意使外界以為他之所以被免職，是因为攻势失敗。我一向认为不應該落井投石，因此現在我也不打算這樣作。我也不願意譴責這位將軍，但是應該告訴他，他所發表的那種公開聲明是違反紀律的。

以上就是 12 月 5 日命令的背景。

在那個時候，麦克阿瑟將軍和国防部几个部长之間又發生了意見分歧。11 月 28 日，麦克阿瑟將軍報告說，他正在按照給他的
指示改攻势计划为防守计划。在报告改变计划的电报中，他声称，“我們正面对一次全新的战争。……”他的电报说，“形势的发展带来了个全新的局势，这种局势扩大了从全世界范围来考虑问题的可能性，不再是本战区司令部所能决定的了。本司令部，已在它职权范围之内，作了人力所能做的一切。但是目前所面对的局势却超出了它的力量和控制。”

第二天，麦克阿瑟将军提出一项建议，要我們回转来接受六个月前蒋介石提出的，要援助朝鲜三万三千名中国国民党军队的建议。当时他自己就建议不用这些军队。自然，他现在的建议是和他认为朝鲜行动已成为和中国共产党作战的看法相一致的。經過一次由国防部和国务院参加的冗长的会议之后，我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促使麦克阿瑟注意他的建议所牵涉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11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了如下的电文：

“你的建议我們已在考虑。這個建议的后果牵涉到全世界。我們必须考虑到在联合国内和我們合作的，各国的团结一致的关系遭到分裂的可能性，而使我們陷于孤立。大英联邦国家可能完全不願意他們的部队和国民党中国在一起作战。敌对行动也可能因此扩大到福摩薩和其他地区。附带提一提，我們的远东领导地位在联合国内已受到很严重的损害。应当极端审慎，避免使这个組織内的主要联合阵线陷于分裂。”

自然，朝鲜的局势在我的办公室内很多次冗长的、焦急的討論题目。我們的政策，不仅是在亚洲，在欧洲也是这样，其是危如累卵，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寻求我們面前的巨大问题的答案，而不仅仅是为了麦克阿瑟将军的不够谨慎而操心。

在11月28日，当来自朝鲜的坏消息从謠传进行抵抗到证实失败，我召开了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别会议。关于我們部队遭受中国人打击，以及损失的情况，我首先是在那一天的六点十五
分，布莱德雷将军从电话里告诉我麦克阿瑟将军的一份电报才知道的。布莱德雷将军和三军的参谋长前天在肯会，研究局势，他们认为局势虽然严重，但怀疑是不是严重到像我们报纸所说我们相信的那样——灾难性的失败。

然而，布莱德雷将军强调如果共产党决定使用他们的空军可能引起危险。根据我们的情报，在满洲边境的几个机场至少有三百架轰炸机。这些轰炸机，无论是直接我方空运，或者是突然袭击我们拥挤在朝鲜机场上的飞机，都会使我们受到严重的损失。即使是这样，布莱德雷将军说，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不应授权麦克阿瑟将军轰炸满洲机场。

我问是不是有办法减轻共产党突然空袭可能给我们造成的损失，范登堡将军说除非把我们的飞机调回日本没有别的办法。这样，我们的军事行动自然就要慢得多了。

我征询国防部长马歇尔对时局的看法，而他报告说由于朝鲜局势的发展，陆海空军三个部的部长们也曾整日开会讨论。他们曾经谈到局势的发展对人员征集和物资供应所提出新的要求。第二次追加军事预算已经拟好了，按照马歇尔那一天早上向我表明的意见，这个预算应立刻转送给国会。因此我能够在会上宣布，这事我已经指示预算局局长照办了。

马歇尔将军接着谈到了外交方面的形势，他说美国必须和联合国采取一致行动来解决朝鲜问题，尽管和联合国采取一致行动对我们会有一些困难。他说他认为我们同联合国步伐一致很重要。他强调这一点，他说陆、海、空三军部长也同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论我们是单独的，或者是和联合国一起，我们都不应卷入和中国的一场大战。马歇尔说，他认为联合国大概不至于要我们陷入这样进退维谷的境地。但是他认为我们应当承认，国内倒有一些人主张采取全面行动反对中国。
布莱德雷说这也反映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看法。如果我们的卷入对中国的一场大战，那么我们在欧洲的兵力就不可能继续壮大。佩斯部长补充说，与会的每人都应该了解现在国内能拿出去的只有第八二空运师，而已征入联邦军队的国民军在8月中旬以前还不能投入战斗。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说到这里，副总统巴克利插入了一句。副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是不常发言的，这表明了和他每日相处的参议员们对这件事的忧虑和关心。巴克利希望知道的是，麦克阿瑟将军是否真的发表过“士兵们圣诞节可以回家了”声明，巴克利并且说，这似乎无法使人相信。他问：麦克阿瑟是不是了解当时的情况？像他那样地位的人怎么可能犯这样冒失的错误？

罗维特副部长和佩斯部长解释说：麦克阿瑟“正式地”否认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毫无疑问他是说过的。佩斯部长在威克岛听他说过类似的话，布莱德雷也听到过。罗维特说，有一份速记的副本可供查考。麦克阿瑟曾经声明，他的话被“曲解”了；布莱德雷为麦克阿瑟辩解说，他认为这个声明原是说给中国共产党听的，向他们表示我们在朝鲜并没有长远的打算，也不打算继续战争。

巴克利仍然很激愤。他感慨地说，“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我告诉他，不管我们对这个声明怎么个看法，我们都应该很慎重，不要拆将军的台。我们实在不应打击麦克阿瑟的威信。但是巴克利仍然感到非常不安。

随后我们讨论到麦克阿瑟可能需要补充多少兵员，而我们可能补充给他多少。柯林斯将军说他认为在朝鲜有一道防线可以守住。在东边的第十兵团处境很危险，但是也许可以撤回到底安全地带。

我要求迪安·艾奇逊，就从他的角度谈谈他对时局的看法。这位国务卿在开始时说，过去几小时的事件已经把我们推到大战
的边沿。自然，过去我们就常发现有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的迹象，不过现在我们碰到了公开的，强有力的攻势。他说我们必须记住，中国人和北朝鲜人的每一行动都有苏联在后面支持，我们不得不把所有发生在朝鲜的事看作世界性的事件。我们不应忽视我们在全世界各地都面对着苏联这个事实。

艾奇逊继续说，自然，如果我们要挽回苏联侵略，联合国就会解体。如果我们要站出来，指责苏联，那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我们对它没有什么办法。我们提出控诉而又无可奈何，那只会削弱我们在世界的地位。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我们要对克里姆林宫采取行动，我们可能找不到同盟者，而陷于孤立。

至于中国共产党，艾奇逊继续说，我们必须划出一条界限，不要这边走走，那边走走。否认他们和我们作战，那是无用的，因此我们最好也给他们找点麻烦。除了和蒋介石搭成以外，有的是办法。

至于朝鲜冲突，国务卿的意见是，我们应该设法结束它。如果我们要进入满洲，并且轰炸那边的飞机场。即使捞到点便宜，那“俄国可用借口加入了”。我们的外交政策的整个意图就是指望能把俄国困住，而在他们企图突围的时候，我们成功地把他们打了回去。如果我们现在让他们把我们引入他们的圈套里面，我们就冒被陷入无底洞的危险。这种战事没有个结束的日子，它会把我们的血放干。俄国人曾经一再再地引诱我们进入他们的圈套。这一次不同于以前各次的是，圈套更大些罢了。

参加这次会议的阿弗里尔·哈里曼说，我们应该严密地注意自由世界的反应。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领导地位；为了证实这一点，应该迅速任命一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总司令。如果自由国家能够肯定我们是不会背弃他们的，他们也就会靠拢我们。

我说过，只要我们有些报纸不是那样热衷于寻找反证的话，要
使自由世界相信是比较容易的。我说，我们的三家大出版商正在使我们的人心离散，并且引导世界人民以为美国人民对自己的政府都没有信心。我们的很多报纸竟相造谣中伤，歪曲事实，这正是苏联最大的一笔财产。

我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我最初曾想我应该到国会里去，对特别会议作一次演说，但是现在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朝鲜是联合国的事情，我国不应单独采取行动。

在这次会议休会以后，接着内阁就开会，朝鲜问题又提出讨论。布莱德雷将军和迪安·艾奇逊对内阁阁员们简短地介绍了朝鲜局势的最近发展情况，我们再次讨论到最近政治活动中轻率的攻击和造谣生事给我国的国际地位所造成的损失。

在以后的几天里面，为了重新审查我们的计划，并准备要采取的下一步骤，我们作了很多艰苦的工作。源源而来的政府高级官员占去了我接待临时来访的时间。在 11 月 30 日，星期三，举行记者招待会上，我发表了一项旨在表示我们的关切和我们的决心的公开声明。

这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如下：“朝鲜最近形势的发展使世界面临一次严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已经自满洲派遣他们的部队到朝鲜，对在北朝鲜的联合国部队进行一次强烈的、组织得很好的进攻。虽然经过长期的、认真的努力，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相信联合国或美国没有侵略中国的企图，他们还是这样做了。由于美国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历史友谊，一想到中国人竟被迫和我们联合国指挥下的部队作战，不免使我们不寒而栗。

“中国人使用了大量的军队对我们也进攻，而这种进攻仍然在继续进行。结果联合国部队大部分被迫撤退。目前，战场上的情况是不稳定的。我们可能要节节败退，就像我们前次所遭受的失败一样。但是联合国的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
“联合国派遣部队到朝鲜去是要扑灭一场侵略战争，它不仅威胁了联合国的整个组织，而且也威胁了人类对和平和正义的希望。如果联合国向侵略力量屈服，没有一个国家会有安全和保证。如果侵略行动在朝鲜得逞，我们可以预期它将从亚洲，欧洲一直蔓延到这个半球来。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和生存而在朝鲜作战。

“通过联合国，我们已经献身给正义与和平的世界秩序的事业。我们坚决地为这种事业而奋斗。

“我们将从三方面来应付新的局势。我们将继续通过联合国，以协调一致的行动来阻止这次对朝鲜的侵略。我们将加倍努力，帮助其他自由国家加强他们的防务，以应付其他地区的侵略威胁。我们将迅速地加强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

“在联合国里，第一步是由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来阻止这次侵略。华伦·奥斯汀大使正在敦促采取这一行动。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联合国对朝鲜局势施加全部压力。

“有些人曾经希望通过联合国所提供的正当的、和平的途径和中国共产党目前在成功湖的代表，顺利地进行讨论和谈判。然而，看不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愿意进行这种讨论和谈判的表示。他们避而不谈实际问题，却以效苏联代表为了阻止安全理事会的行动所采取的惯技，进行猛烈抨击，假话连篇。

“我们希望中国人民将不再被迫或被诱来为俄国的亚洲殖民政策的目的服务。我确信，如果现在在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人民可以自由地为自己讲话，他们将谴责这次反对联合国的侵略行为。

“在朝鲜的新侵略行动只是对世界上所有自由国家的全世界性威胁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必要，以非常快的速度增加自由国家的联合军事力量。我们认为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有必要立刻在欧洲建立起一支由最高司令部指挥的联合部队。”
“关于我們自己的防务，为了扩充我們武装部队的规模和提高效率的迫切需要，我将提出追加拨款的请求，这项请求除了包括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大量军费外，还要拨给原子能委员会的一大笔款项。

“我准备在明天和国会的领袖们会谈，要求他们对这几项新的拨款给予紧急的考虑。

“这是所有我們的公民把分歧的意见搁在一边，紧密团结，互相支持，为我們的国家和全世界的自由事业尽最大努力的时候。我們的国家是人类对和平与正义的希望的基石。我們必须表示我們是在共同目标和共同信仰的指导下一致行动。”

第二天，12月1日十一点，国会议员们在内阁会议室和我会晤。参议院出席的，除了副总统外，还有麦克拉、康纳利、卢卡斯、泰丁斯、鲁塞尔、犹他州的托马斯、惠里、布里奇斯、葛尼和维利；众议院出席的有议长，和众议员麦考马克、文森、理查兹、坎农、马洪、泰伯、伊顿、肯特、哈勒克和艾伦兹。和我一起出席的政府官员有艾奇逊、马歇尔、罗维特、布莱德雷、哈里曼、预算局的劳顿、比德耳，史密斯、索尔斯海军上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詹姆斯·累伊。

布莱德雷将军对国会议员们就朝鲜的最近军事局势作了全面的报告，我请他们向这位将军提出了问题。参议员康纳利、参议员葛尼、参议员维利和参议员布里奇斯先后相继提出以下问题：在朝鲜有多少飞机？从这里到朝鲜有多少路程等等。然后参议员惠里希望知道为什么我們的情报机构没有估计到这次攻击的发生，布莱德雷怎么解释他也不满意。他的情誼抵触，态度鲁莽。

史密斯将军于是摊开一幅苏联和它的卫星国以及邻近地区的大地图。他指出朝鲜事件和欧洲事件怎么联繫在一起。俄国人刚刚举行了一次有五十万人以上参加的、大规模的演习。他們集中作了渡河和空运的演习。俄国人最近还整顿了他們的西伯利亚部
队，统一了他们的指挥。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平常的，值得注意的事件。

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接着提出一些数字来说明俄国和它的卫星国的人力以及这几个国家部队的训练和装备情况。除了惠里以外，所有的国会议员们看得出是很受感动的。这位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满脸的怀疑和不相信，希望知道史密斯怎么得到这些情报的。他是否使用了所有的情报来源？都是哪些来源？史密斯非常委婉地把这些问题又开了，但是当他谈到朝鲜和中国，惠里又是件件都要寻根究底。

在这种交换问题和情报中，时间过得很快，我只好请史密斯将军结束他的报告，以便我好和与会者讲几句话。我指出自6月以来，在国防上我们一直非常努力地工作着。为了加强武装部队的力量，我们已经作了很多事；过去追加过一次军事拨款，现在我还要提出另一次追加军事拨款的要求。这是在中国干涉以前作出的预算，毫无疑问，由于朝鲜发生的事件，我们的时间表必须重新修订。

于是我又向与会的人宣读了我准备送交国会的咨文摘要，并且把要求追加的拨款数目告诉了他们，附带声明我和我的政府成员准备回答任何人对拨款要求提出的任何问题。但是我希望强调一点，如果这些新条款在目前紧张的国际局势之下对我们还有些用处的话，迅速拨发是重要的。

我说我们的全部努力是旨在阻止朝鲜事件扩大为一大规模的亚洲战争。我们不打算承担大规模战争的负担，但是最最主要的是，我不愿意参加千百万无辜者的大屠杀，如果战火任其蔓延，大量流血是不可避免的。

与此同时，朝鲜的局势并没有任何好转。12月3日，麦克阿瑟报告如下。

458
“麦克阿瑟致参谋长联席会议：

“第十兵团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撤到咸兴地区。第九军的情况愈来愈危急。沃克将军报告说平壤地区守不住了，敌人一旦施加压力，没有疑虑，他将被迫撤到汉城地区。我同意他的估计。企图把第九军和第十兵团的兵力会合在一起，不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会因而产生任何好处。这两支部队在数量上都处于绝对劣势，他们的会合不但不能加强实力，实际上反而削弱了由于两条分开的海上补给和调动的后勤路线所带来的自由活动的便利。

“正如我以前所报告的，因为考虑到设防地区的辽阔，防线的两部分必须就近从每个地区的海口取得供应，防线又被从北到南的、崎岖的山岳地带分割成两个区域，我们的兵力就显得单薄，所以搁置在朝鲜建立的一道防线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条防线从空间计算大约是一百二十英里，从地面计算大约是一百五十英里。如果把我所指挥的七个美国师布置在这条防线上，那就是说一个师将不得不负担起防守一条长约二十英里的前线。而其所对付的敌人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在山地里敌人夜间渗透具有很大的威胁可能性。这样的防线如果没有纵深的后方就不会有什么力量，而且从防御的观念来看，这样的防线必然招致敌人的渗透，结果是被包围歼灭或是被各个击破。对付较弱的北朝鲜部队这样的战略思想是可行的，但是对付中国陆军的全部力量就不行了。

“我不相信由于中国陆军公开地进入战斗所造成的根本变化已为人们所全部理解。估计已经有二十六个师兵力的中国部队投入了第一线战斗，另外在敌人后方，至少有二十万人。北朝鲜的残余部队也正在后方休整，自然，在所有这些后面，还有共产党的全部潜在的军事力量。

“至于切断敌人的供应系统，山岳地带减低了我们空军发挥配合效能，而对敌人的分散战术却很有利。加上目前国际界线的
限制，这就大大地减低了我们空军优势可能产生的正常效果。

“由于敌人集中在内陆，因而大大减低了海军可能发挥的威力，两栖活动不再可能，而有效地使用海军炮火配合作战也受到了限制。

“因此，我们各个兵种的联合作战的力量大为减低，而双方的力量对比愈来愈决定于地面部队战斗力的对比。

“因此，非常明显，如果没有最大数量的地面部队的增援，本军不是被迫节节后撤，抵抗力量不断削弱，就是被迫困守在滩头堡阵地里，这样做，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延长抵抗时间，但除了防御外，没有任何希望。

“这支小小的军队，在目前的情况下，事实上是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面对着整个中国，除非积极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实力不断地消耗，以致最后全军覆没，那是可以预期的。

“截至目前为止，本军还是表现了旺盛的士气和显著的效率，虽然本军已经进行了五个月几乎不曾间断的战斗，精神疲惫，体力耗损。目前在我们指挥下的大韩民国的部队的战斗效率是微不足道的，作为警察和保安部队使用，他们还有一定的用处。其他国家的陆军分遣队，不管其战斗效率如何，兵力微少，只能起很小的作用。在我指挥的各个美国师，除了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以外，现在大约都缺额五千人，这几个师本来就没有任何补足到规定的名额。中国部队是新投入战斗的，组织完善，训练和装备都很优良，很明显他们正处在斗志高昂的状态。此间对局势的全面估计认为必须从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

“我所执行的指示原以北朝鲜部队为对手；由于新事件的发生，这个指示已经完全过时了。必须清楚地了解这样的事实，我们比
較小的部队现在面对的是由苏联大量供应物资所加强了的共产党中国的全面攻势。以前那么成功地用来指导和北朝鲜陆军作战的战略思想，现在继续用来对付这样的强国便不行了。这就需要重新制订可行的，足以应付有关现实问题的政治决定和战略计划。在这一方面，时间是重要的，因为每一小时敌人的力量都在增长，而我们的力量却在削弱。

“1950年12月3日”

我批准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给麦克阿瑟阁下一封电报。我所采取的立场是：我们绝不应该牺牲人。在联合国决定支持大规模的行动之前，似乎最好把我们的兵力集中到我们能够防守的一些滩头堡里。

“我们认为目前应该主要考虑保全你的实力。同意将部队集结在几个滩头堡里。”

同时，我命令柯林斯将军立刻飞赴东京，从那里、从朝鲜收获最近情况。在11月30日我收到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的一封电报，他问他是否可以到华盛顿来，亲自和我讨论我们应该怎么对付朝鲜事件，以及我们今后可能采取的行动。
第二十五章
艾德礼首相在华盛顿

联合国成员国中，最先参加我们的在朝鲜行动的是联合王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虽然共产党在马来亚的活动对英国的人力是一个严重的消耗，这几个国家还是参加了。但是，英国人对于冲突可能扩大，还可能把苏联拖了进来，危险表示非常担心。

当我们的空军8月初轰炸北朝鲜的温口罗津的时候，就可以看出这种担心的一些征兆来。这座城市不折不扣是一个军事目标，因为重要的化学和军火工厂都在那里。但是它离苏联边境只有十七英里，而国外和我们国务院里都有些人顾虑俄国人可能会认为这次轰炸是以他们为目标的。

在最初发现中国干涉的迹象，接着麦克阿瑟要求授权对来自满洲基地的攻击他的部队的空袭给予回击之后，国务院曾经征询英国及其他有部队在朝鲜的国家的意见，以便了解他们的反应。不仅是英国，所有的国家都强烈地反对。

在11月15日收到一份来自北平的，极密的电报之后，我们的盟国更明白地表示了他们的焦虑。电报称，一位驻北平的俄国高级外交人员说如果满洲的机场受到联合国飞机的轰炸，苏联空军将坚决回击。

中国人阻止麦克阿瑟进攻的大规模反击，对国外的人可能比我们在国内的人更为震惊。外国报纸引用我们一些参议员剑拔弩张的谈话，并提到麦克阿瑟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不加掩饰的不满为根据而对美国的反应公开地进行猜测。有人竟然这样公开推测,
我們將不顧聯合國的反對，而直接投入對中國的戰爭，甚至對任何國家作戰，只要這個國家站在中國一邊。

自然，戰爭的可能性對剛剛從上次大戰的廢墟中恢復過來的巴黎和倫敦的居民來說，是比他們的城市未曾受到破壞的大部分的美國人民可怕得多。歐洲人一般都认为新戰爭將是一場原子武器的戰爭，一提到原子弹他們就要發抖。自然，我們絕不應忘記，保卫歐洲是我們所承担的严肃义务，这一决心还有待美国向欧洲人提出保证。由于報紙似乎經常就只喜欢报道坏消息，大多數的歐洲人只听到有人反对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反对派遣军队到欧洲去，甚至反对給予他們任何其他东西，而这些东西他們认为在他們受到攻击时可能对他们有帮助。

全世界变得多么的敏感、紧张，只要看我在11月30日新聞記者招待会上提到“原子弹”这几个字时的反应就明白了吧。

在那次招待会上我说，“正如我們往常一样，我們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对付军事局势”。

“那是不是包括原子弹?”一个记者问。

“包括我們所有的各种武器，”我回答。

發問者急忙追問道，“总统先生，您說‘我們所有的各种武器’是不是說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我告诉他，“我們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它。我不希望有朝一日使用到它。它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應該用来对付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他們和軍事侵略无关。可是原子弹一旦使用，这种情况就无法避免了。”

為了使我說的话确切不至于为人误解，我授权我的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在記者招待会后，另外发表一项旨在澄清觀听的声明：

“总统希望，”这个声明說，“他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使用原子弹所作的回答肯定不至于引起誤解。自然，從朝鮮的敌对行为爆发以来，我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这种考虑就跟我們的部队
在作战的时候考虑使用所有的武器一样。

“考虑使用任何武器也就暗示掌握有那种武器。

“然而，应该着重指出，按照法律，只有总统有权批准使用原子弹，而直至现在还没有发布这种命令。如果到了该发布这种命令的时候，他将授权战区军事司令官负责战术上投送这种武器的任务。

“总之，今天新闻记者在招待会上对问题所作的答复，并不表示上述情况有任何的改变。”

虽然作出了这样的保证，使用原子弹仍然要由我批准，而我还没有作出这样的批准，新闻报道却坚持说我威胁要在朝鲜使用原子弹。在伦敦，一百名工党议员联名写信给首相艾德礼，抗议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在一次我们的大使称之为“自1945年工党执政以来，在下院进行的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当中，这是最严重、最焦虑、最负责的一次”，不仅是安奈林·比万的追随者，而且还有丘吉尔、艾登和巴特勒都表示了“忧虑”，他们普遍地表示希望得到朝鲜事件不至于把全世界搅进一场大战的保证。保守党的领袖巴特勒的论调恐怕是最典型的了，他说“全体英国人民都希望得到保证，在他们的命运（由于战争扩展到中国）被决定之前，还是让他们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下院结束这场辩论的时候，艾德礼宣布说他准备飞到这里来和我进行会谈，因而大大地减轻了紧张状态，他的声明引起了下院两方面的议员的欢呼。任何人读到这次辩论的记录都不可能不看到英国忧虑重重的这样一个事实。

12月4日克莱门特·艾德礼来到华盛顿，我们在当天下午四时到五时三十五分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

会谈开始时，我致了短短的欢迎词，然后就请布莱德雷将军概括地讲讲朝鲜的军事局势。艾德礼问我到朝鲜的空间控制，布莱德
雷向他保证说，这方面到現在為止沒有问题，我們有五艘航空母舰
和七个良好的朝鲜机场供我們作战时使用。

国防部长馬歇尔指出，了解以下的情况是重要的。敌人是在不
顾一切损失的情况下使用人力，同时由于他们是在沒有卡車，沒有
机械化装备之下作战，他們的行动就比我们的容易隐藏得多。

我说我們所面临的情势要求我們作出非常严重 的軍事決定，
但是作出政治決定也不是沒有困难的。然而，我表示希望我們能
够开诚布公地进行自由討論。我說我們在 东方 和西方都负有义
务，但并不打算偏废哪一方面，虽然乘顾所有的义务可能会有些困
难。我表示相信我們應該首先討論中国共产党干涉的问题，并且
征求艾德礼的意见。

艾德礼首先說到維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威信是重要的。他指出
美国是維护联合国的主要支柱，联合王国正在尽一切可能給予支
援。但是联合王国在最近几个月内将不可能增派军队到朝鲜去。
根据布莱德雷的报告来看，艾德礼說，他了解到危机可能到来得更
快。

这位首相說，联合国的意见以及欧洲、亚洲和美洲国家的意见
都應該加以考虑。在这一时期，他一直和亚洲方面的成员国的成
員国有密切的接触，他还建議我們也應該從中国共产党的角
度来看問題。他們正因为胜利而洋洋得意，他們既不是联合国的
一分子，絕不会願意按照联合国所宣布的原则來解决問題。他們
希望試試他們的力量，試試独立的感觉。因此，即使俄国人想結束
战争，也不見得就能说服毛泽东。

艾德礼提出这样一个問題：共产党可能要在什么代价之下才
肯停火？有这么一种危险，如果我們表示妥協，代价就可能上涨。
而他认为我們应该討論討論，我們准备搞到什么地步，我們打算談
判哪些问题，什么地方我們應該坚持。他说不管我們达成什么样
的决议，总不免不合一些人的口味，但是我们应当记住西方是不能
弃置不顾的，西方仍然是我们反对共产主义阵线的主要据点。

关于首相提到的问题我要求国务卿艾奇逊谈谈我们的立场。
国务卿指出，首先必须记住我们的重要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朝
鲜行动完全出自莫斯科的唆使。毫无疑问，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间
有过一些安排，因此中国人相信他们有强大的俄国作为后盾。在
他们的进攻很顺利的时候，他们要做的事情似乎不大有止境，如果
他们能够把我们赶出朝鲜，他们一定会这样作的。没有人能够估
计他们的野心要发展到什么地步。

至于全面进攻中国问题——包括陆、海、空军的行动——艾奇
逊向与会的英国人保证说，“愿意总统采取这条路线的顾问并不多”。
然而，他又说，他认为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的前景未可乐
观。在进行谈判和卷入战争之间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事实上，
目前我们已经被卷了进去。

艾奇逊分析了谈判的问题。从军事上着眼，他认为尽快地得到
停战对我们似乎是有利的。但是，对我方有利的，自然就意味着对
中国人不利，因此他们很可能不愿意接受。从政治观点来看，考虑
到世界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停战会有些好处；但是如果举行了谈
判，对方拿什么价钱的问题就会产生。似乎可以断定中国共产党
会要求承认他们的政府，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席位，要求在福
摩萨问题上的让步。他们甚至会坚持有关和平解决日本的任何问
题都必须得到他们的同意。

国务卿继续说，我们必须记住这次对朝鲜的干涉不是一种自
发的军事行动。它是有预谋的。如果我们将纠集在亚洲，俄国就
会在欧洲放手干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和共产党，譬如说以福摩萨
为代价解决了争端，那么整个亚洲就会以这个事实为例，群起反对
我们。他说他不相信中国的行动只是中国军事狂的爆发，或者我
們把福摩薩給他們，或者作其他的讓步，他們就會變得又安靜又和平。相反的，如果我們讓了步，他們只会更加得寸进尺。如果我們对中国共产党屈服，对日本人和菲律宾人的影响将是严重的。如果我們不进行谈判，也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們可能再在朝鲜打下去，尽可能的给中国人以更多的惩罚，而我們的情况也不至于更糟。他认为，我们應該把不承认敌人的占有作为我們的政策。

说到这里，艾德礼首相問，对中国共产党起骚扰作用，而对我们又不至于有太大损失的滩头堡，可能守多长的时间。布莱德雷将军和馬歇尔部长都回答說，东面的滩头堡可能守不住，但是西面以仁川和釜山为根据地的滩头堡可能坚守一些时候，尤其是如果可能从东面撤出的部队增援这一地区的話。

首相問，如果我們在继续遭受损失的情况下继续坚守滩头堡的話，美国公众会有什么反应。会不会要求对中国进行全面战争？

我回答說，这种要求現在就可以听到。我們正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并且已經撈付了大量的款項。我希望我們能够守住朝鲜的战线，直到談判的机会因局势的进展而有所改善。我承认所有我的军事顾问都告訴我沒有可能守住这条战线。但是我仍然希望試一試。

艾德礼談到，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克里姆林宮的卫星的情况，有不同的意見。

我說依我看中国共产党就是俄国的卫星。我們面對的问题是整個模型的一部分。在朝鲜之后，接着就是印度支那，然后是香港，然后是马来亚。我說我不希望和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作战，但是，照我看来，局势是很黯淡的。我相信，中國共产党已經下定决心要爭取到一些东西，包括联合国的席位和福摩薩，不然就不惜一战。

艾奇逊說，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卫星，实际上沒有多大关系。不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他們很可能都要采取同样的行动。但
是，他认为如果指望着他们发善心，那将是错误的。他讲在国务院的官员中有一种说法，你不能指望共产党政权发善心，他们每天晚上都要结账的。

马歇尔将军回忆他到中国担任特使时，和毛泽东、周恩来几次会面。他说周恩来有一次在餐桌上非常郑重地告诉马歇尔夫人说，毫无疑问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而对于人们仅仅把他们说成土地改革者表示不满。马歇尔说他们毫不企图掩饰他们和莫斯科的亲密关系。他们认为俄国人是和他们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而且把这种感情透彻地灌输到他们的部队里去。

我告诉艾德礼说，我认为马歇尔将军的判断是可靠的，尤其是因为他和这些人有过一年的紧密接触。我还要对艾奇逊所谈到的，我们避免和中国作战的愿望再加以强调。因此我详细叙述了我和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谈的经过，特别指出我曾告诉麦克阿瑟避免在满洲对中国，在海参威对俄国进行挑衅，我还说我们不不愿意参加这次行动，只因为我们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接着我给首相宣读了由国务院和国防部共同拟定的并经我批准的备忘录：

“(一) 在最近的情况下，假定提出的条件不是太难于接受的话，要是能够设法停火，在军事上将是有利的。这可以保证得到联合国的全面支持。停火的安排不得附带危害联合国部队安全的条件，也不得以在其他问题上达成协议为条件。如福摩萨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等。

“(二) 如果停火实现了，局势因而可能稳定，联合国应该继续使大韩民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得到稳定，同时继续努力通过政治途径寻求朝鲜的独立和统一。

“(三) 如果中国共产党拒绝停火，便驱使主力向三八线以南
移动，联合国部队势将被迫自朝鲜撤退。自动放弃我们盟友朝鲜的结盟将是这样的，即任何联合国的撤退必须完全全出于军事的必要。”

念到这里，我停了下来，再一次着重地指出我们自动撤出将不成问题。所有被我们撤下、曾经效忠于联合国的朝鲜人将面对死亡。共产党是视人命如草芥的。把这一点讲清楚了，我又继续念下去：

“（四）如果出现前面一段所说的情况，联合国应立即采取行动宣布共产党中国为侵略者，并应运用一切可用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对北平施加压力，并声明联合国绝不承认侵略的决心。此外，还可能采取不断骚扰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也可能下点工夫，鼓励中国内部的反共活动，包括利用国民党的潜在力量。

“除了上述办法以外，美国和联合王国应立即商量采取其他步骤，用以加强非共产党的亚洲。这些步骤将包括：

“（甲）使日本恢复相当的自治，加速努力达成对日和约，加强日本自卫的能力，更有效地利用它的生产能力，以加强自由世界的力量；并尽速使日本加入国际组织。联合王国对以上三点不乐意采取行动，在新的危急的情况下，只有被淘汰。

“（乙）在能够互相有效支援的东南亚国家之间作些适当的军事安排。

“（丙）加倍努力使非共产党亚洲认识到亚洲所面临的威胁的性质，并促使有关的政府相信对付共产党在这一地区的侵略，亚洲人必须采取消化的行动。

“（丁）加强经济和军事援助，对组织起来抵抗共产党侵略的行动予以鼓励。”
“（戊）加强反对所有共产党政权的心理的和隐蔽的活动以及
在亚洲的活动。”

谈到最后两项时，我说我曾经考虑到在东南亚也搞一个类似
马歇尔计划的东西。经济合作总署已经在这个地区作了不少很好
的工作。为了稳定菲律宾的局势，正在考虑一项特别计划，我表示
希望这个计划能够很快地得到国会的批准。我说，这一类计划应
该加以考虑和讨论。

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奥利佛·弗兰克斯爵士接着巧妙地总结了
我们讨论过的问题。在同意给记者发表的一项简短的声明以后，
就暂告休息。

第二次会议是在第二天，即1960年12月5日，在总统游艇
〈威廉斯堡号〉上举行的。在午餐以后（有几位国会领袖也在座），
昨日下午参加会谈的几个人再度集会。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
我的老朋友，也在座。这就可以说是他最后一次执行公务。当天傍
晚，当查尔斯还坐在办公桌旁的时候，心脏病突然发作而死。我们
从中学时代就是朋友，他的去世，使我如失亲故，感到非常悲痛。

12月5日，〈威廉斯堡号〉上会谈的前一段时间，主要是讨论提
交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全文。当这件事次要分歧消除以后我
谈到。朝鲜的军事局势是我深为关心，也是我最最焦急的事。

我又说我已经决定我们将不撤出，万一我们撤了出来，那一定
是被迫撤出的。我们肯定不能够朋友，因为他们曾经效忠于我
们。我说我了解我们正在把我们的舰队、我们的空軍暴露给来自
满洲的突然袭击。我说，“我们并不是为了挨打而参加战斗的。我
们将为制止侵略而战斗到底。我不打算将朝鲜局势的军事指挥权
拿过来——我把它交给将军们——但是我希望搞得十分清楚，我
们不能在困难的时候背弃我们的朋友。”

470
我談着談着，有點激動起來，但是克萊門特·艾德礼回答的時候，態度的熱誠也不下于我。他說，“我們和你們站在一起，我們一定支持你們。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將站在一起。我們能夠守多久，只是看法上的問題。”

我又說，無論我們採取什麼行動，但不會是自動撤出朝鮮。我堅決地說，“只要有希望不走，我就不願撤出。”

艾德礼重複說，“我可以向你們保證，我們是和你們站在一起的。我們的整個計劃就是和你們站在一起。”

我感謝他所表示的態度和保證。忠于原則和朋友，忠于条约义务，是英国的态度，也是我們的态度。

艾德礼接着回到昨天討論的問題上来，首先他談到在哪些問題上他認為我們已取得了協議。他認為我們已經有過協議不要陷入和中國的大戰中，并禁止轰炸中國的工業中心。然後他重新提起艾奇遜的建議，即在被迫退出以前我們應該留在朝鮮，不進行任何談判。對此他有兩種反應是：第一，要使聯合國採取任何看來是針對北平的行動，或者很可能會引起报复的行動，那將是困難的。第二，他認為我們不一定能夠制勝中國，而中國倒可能使我們受到很多的損害。他說，依他看來，我們要結束這次事件，不是大戰一場，就是坐下來談判。

艾德礼接着提出了英國政府的看法。他的意見是，中國共产党的“铁托主義”已經到了時機成熟的時候。他不認為中國是完全控制在俄国人手里，因此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分化俄国人和中国人，他們在遠東是天然的敵手。

“我想，”他說，“我們所有的人都應該設法使中国人不要認為只有俄國才是他們唯一的朋友。我希望中国人能和俄国人散伙。我希望他們能夠在遠東和俄國抗衡。如果我們不接受這個見解，如果我們把中國看作蘇聯的衛星國，我們就上了俄國人的當了。”
国务卿艾奇逊用一个措词很得体的问题回答了首相的看法。他问道，从长远看，美国人民会怎样想呢？他说他看不出任何一届政府可能向美国人民提出这样的外交政策。在这一个大洋上奉行孤立主义的政策，同时在另一个大洋上奉行和孤立主义正相反的充满活力的外交政策。我们不可能在太平洋方面奉行孤立主义，中国共产党干些什么都装作看不见，而同时采取强硬的，反孤立主义的立场，对付共产党在欧洲方面的威胁。

艾奇逊接着提出了另一个有力的论点，我国曾经采取相当强硬的行动，对付朝鲜方面较小的侵略。而现在我们面对的则是较大的侵略，中国共产党的侵略，我们甚至在这个侵略者手里遭受到挫败。如果我们忍受了这次较大的侵略，不仅在亚洲，而且在欧洲，我们对侵略的整个看法难免要受影响。要想使美国人民接受远东方面的侵略行为，而不接受欧洲方面的侵略行为，那将是一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

国务卿并且促使我们英国客人注意一个事实，蒋介石是另外一个复杂的因素。因为蒋，不管对也好，错也好，已经是一个象征。

我扼要地给艾德礼介绍了蒋介石给我国造成的一些麻烦。我指出他的朋友们，尤其是参议院里的一些人，一直在为他吵吵嚷嚷。然而，蒋介石的一切行动都显示出，他对于改善他所控制地区的情况并不感兴趣，而是希望把我们纠缠到中国大陆上去。关于这个问题，艾奇逊补充说，完全撇开蒋介石不说，摩萨也不能落入共产党的手里。他说当我们在朝鲜大战方酣的时候，如果让摩萨受到攻击因而陷落的话，我们将会在日本和菲律宾造成严重的危险，而这两个地区是我们军事活动的基地，我们整个太平洋的地位也就建立在这上面。

艾奇逊坚持我们不能讨好中国共产党，我们不应该试图证明我们比俄国人对他们还要友好。在他们对我们来这么一手之后，
依他看来，倒该由中国人向我们保证他们是“我们”的朋友。艾奇逊继续说，我们目前的立场是，我们应集中军事力量和实力，制止将来再发生这类事件。我们不得不采取以实力为基础的政策。

我表示完全同意国务卿所阐明的意见，并且补充说，必须了解到，如果没有国内坚强的支持，美国在国外是做什么也做不成的。我们不应该放弃远东。这样做美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这是不可能的。

艾德礼说，他了解我们外交政策要依靠美国人民的团结一致。但是，他又说，联合国团结一致也是很重要的。此外，我们还要使亚洲的看法一致起来——再没有比亚洲国家背离我们更危险的事了。艾奇逊插了进来。他说，“肯定的，再没有比削弱美国更危险的了。”

艾德礼继续为这样的政策辩护，主要考虑怎样使亚洲国家依附于西方。他转过来对着我说，他知道我一定会考虑公众对蒋介石和缅甸的意见，但是他希望我也会记住无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都要通过联合国，而在联合国里仅仅依靠美国和联合王国的努力和表决权，那是行不通的，“尽管我们是那么重要。”

奥利佛·弗兰克斯爵士不愧为优秀的外交官，他插了进来，并把我们看来已经同意的各点概要地说了说。这样使讨论又回到几个具体问题上来。第一，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是否可以考虑作为一个和他们谈判的题目。

艾奇逊坚决地认为我们甚至不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也这样作，实际上是对共产党他们赌输的，现在他们可以收场了。这无异给侵略者以奖励。就为了这个原因，如果不为别的，甚至共产党打败了，并且迫使我们撤出朝鲜，艾奇逊也宁愿不进行谈判。

我要求马歇尔将军谈谈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这位将军说，从军事观点来看，他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惋惜。他说明了我们不能
把福摩薩交給敵人，而使我們一連串的前哨島嶼斷了一節的理由，这个論点得到布萊德雷的支持。

英國人然後又提出了这样的意見：也许福摩薩还可以留在蔣介石的控制之下，而同時我們也可能承认中國大陸上的北平政权。馬歇尔将军說，关于蔣介石最成問題的是沒有人可以代替他，很久以来，事情就“非常明显”，尽管人們强烈地反对蔣，然而还是没有人可以继承他。

這次會議在下午四時五十分休會。

12月6日开了两次会，上午的会几乎全部是討論经济問題。英国人到华盛頓来時，为了使他們的国防计划能够很好地走上軌道，带来了一张他們所需要原料的清单。他們的问题是如果不出口他們简直就不能进口，但是他們需要进口来重新武装。战后的“緊縮”迫使英国经济削减到最最必需的物資，尤其是那些复兴國家的物資，正如艾德礼在那天上午所說的，“我們不能再削减了，我們身上已没有什麼油水可挤了。”

有些物資是英国迫切需要的，如鋅、磷酸和棉花。艾德礼要求我們考虑这些需要，但是我們也要和他們討論是否可以建立联合机构来处理这类問題，就像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那样机构。

我請首相放心，我的同僚們和我都重視这个問題的性质，这个問題在前二天的內閣會議上討論过。我还告訴他，已經指示內閣的成员、政府人員同英国代表們会談，我希望他們对有关原料缺乏的种种問題最好能够进行全面的討論。我希望在我們的华盛頓会談結束以前，他們会有个结果，提请批准。我宣布我已指派國家安全資源委員会主席斯图尔特・薛明頓担任美方的会談代表的主席，会談在當日下午就開始。

在我们上午的会談开始前不久，国防部副部长羅維特自五角
大楼打电话报告说，在北部边境的一些防空设施的雷达屏幕上出现大队的不明国籍的飞机向我们飞来。已经派遣战斗机去侦察，并已向新英格兰和其他的空军基地发出警报。但是一个钟头以后，当我和艾德礼在开会的时候，罗维特通知我说报告是错误的。北极大气团不寻常的干扰使雷达发生了误差。

查尔斯·罗斯的葬礼就在那一天举行，因此我们下午的会谈推迟到三点半才开始。这次会议专门讨论了欧洲局势，特别是怎样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同意建立统一的军事机构的问题。英国急于看到这样的安排成为现实，并且重新提出，他们的论点是：美国派军队驻在欧洲——即使是没有战斗经验而需要在欧洲训练的军队——比任何方法更能激励欧洲国家的努力。我们必须拟一封致法国的信，促使他们对建立统一的欧洲防御的建议从速采取行动。

我们12月7日的会谈，重新回到远东的局势问题上来。艾德礼指出我们曾经同意设法避免和中国进行大战，但是我们要在朝鲜尽可能的活下去。他认为这样作，迟早仍然要迫使我们寻求远东问题的解决。他希望把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摊开来。

第一，他的政府认为中国（意即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内应该有个席位，首相承认这是他们和我们分歧的一点。但是他认为我们终究会发现我们要在某一个地方，某一种方式之下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他说，英国人认为装做没有看见对面有那么一个“讨厌的家伙”，那是没用的。

艾德礼对朝鲜的有限战争表示怀疑。他说他能理解它所根据的理由，他肯定地认为——从道理上讲——这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困难是可以预见得到的，因为，他相信，会有许多人热衷于全面胜利，而这就意味着要进行无限制的战争。

首相说，“我认为如果中国参加了联合国，那就有可能讨论了。
我知道这是不合你們口胃的。但是我想如果要解決問題的話，最好是由联合国。我倒认为，如果目前的中國政府是在联合国之内，比起同一些人在联合国之外谈判，我們要少丢一些面子。”

艾德礼指出这一个結論，一旦中国共产党进了联合国，就有可能利用联合国的原则来对付他們。只要他們留在联合国外面，就不可能这样做。

迪安·艾奇逊回答了首关于有限行动的問題。艾奇逊承認除非我們願意进行全面战争，我們还可能对共产党中国有太多的損害。但是，這位国务卿說，我們对共产党中国的态度在远东有很大的影响。这将有助于我們扶植日本、菲律宾和其他亚洲国家。他认为我們在远东的政策不应受形式逻辑的支配，而应由我們行动的结果来决定。

国务卿指出，在世界的很多地区，我們都是处在苏联的压力之下的。在整个地球上，克里姆林宫似乎处处在发动反对美國的斗争。我們要从人们經常伤脑筋的一个問題：“离战争还有多久?”来寻求我們远东问题的解答。如果我們认为共产党的确是以最大的速度向战争推进，那么在侵略者刚刚要脱缰狂奔的时候，我們给他一点甜头将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錯誤。这只会削弱我們自己。这可能使侵略者得寸進尺。国务卿继续說，“照我推測，这行不通。充其量也不过争取一些时间，但是决不会有足够的时间作出什么好來。只有的足够时间是使我們的人心大乱。只有的足够时间是削弱我們的道德力量。”

艾德礼似乎稍稍有点吃惊。他說，艾奇逊以为谈判就意味着全线后撤。他认为，福摩薩会给共产党拿走，但是也可能会。也許我們的谈判能够只談怎样使共产党不过朝鲜三八线。

艾奇逊回答說，他的看法是在我們确定我們的方向以前，我們不应该进行谈判。如果我們現在就停談，我們在談判中将处于
劣勢。如果我們堅持下去，或許能夠改變我們的処境，我們就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停戰。自然，如果我們被赶出朝鮮，那也就不会有談判了，但是我們一定要达到目的。

我补充说，如果允许中国共产党进入联合国，美国国内将遭到可怕的分裂，而我看不出我們能够获得什么，足以补偿我們在公众士气方面的损失。如果我們让中国赤色分子进入联合国，他們和俄国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說，我以为他们和其他卫星国家没有什么两样。

我提到中国赤色分子在成功湖說到我們时所用的语言和他們所散布的謊言时，我使用了我所知道的最利害的話語。我说他們对待我們的传教士和領事的做法是人类的一个污点。除非他們改变了他們的作法，决不能让他們进入联合国。

罗杰・麦金斯爵士指出我們两国政府奉行的任何政策必須是联合国的政策。我对这种說法很同意。麦金斯爵士继续說，那么我們的政策必須是在联合国大会上能够获得多数拥护的政策。按照他的看法，联合国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要求談判解决的情緒。他认为，这种情緒是这么强烈，如果我們在过去不是那么注意，事情有关朝鲜都通过联合国来談判解决，那么我們今天要使其他国家和我們站在一起就会遭到真正的困难。他认为我們也許应该让联合国来想办法，寻求問題的解决。

我們負責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同意麦金斯爵士的看法，我們應該尽最大努力使其他国家和我們站在一起。但是他說他看不出，为了解决争端，我們为什么要表示友好。同意中国赤色分子坐到联合国里来。我們曾在联合国内多次主动地明确表示我們的和平願望，而总是遭到俄国人的拒绝。如果現在只是为了我們能夠和他们談判，而同意中国共产党进入联合国，那我們将是作一次大的让步。我們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我們对于談
判的愿望，因此在我们得到谈判机会以前，不应该要求再作让步。

马歇尔将军说，据他了解我们都同意避免和中国发生大战。他说明我们之所以同意这样，主要是因为我们面临着全球战争的威胁。既然这种威胁目前还存在，既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几乎是不可能和他们谈判的，那么在只会暴露我们的弱点的时候和方式之下进行谈判，将是十分危险的。

马歇尔说，我们再不能丢掉福摩萨了。它在我们手中并没有特别的战略意义，但是如果它为敌人所控制，那它就是个祸害。他说，除了保有我们的阵地利用时间在各战线上聚集力量以外，他一时还没有解决问题的答案。

说到这里，我扼要地说了说开罗宣言中有关福摩萨的一些史实——这个宣言的拟定是在日本这个敌人称霸太平洋的时期。那时我们的目的是要在太平洋建立一个对美国，对联合王国，也有一点想到对联合国友好的力量。我们还有个目的，宣布我们的计划以扰乱我们的敌人。

但是，我继续说，现在的情况改变了。我们希望建立的国家——中国——不仅落入不友好者的手中，而且现在对美国抱着刻骨的敌意。

我说我们在朝鲜的态度是由于我决定给联合国反对侵略的决议以全力的支持所引起的，而我很高兴英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行动的目的是保护一个小国免受侵略，而在我接近成功的时候，这个对我们抱有“强烈敌意”的国家插了进来。

我说，“我们现在已经不能由于把福摩萨给了这个国家而使我们整个的侧翼裸露无遗。我们绝不能同意这一点。我想中国人终究会认识到他们真正的朋友并不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他们的朋友是在伦敦和华盛顿。”

首相面无笑容地说，“如果你们一直和他们作战，那就不会使
他們認識到這一點。”

我說，“不會，但我不撤出朝鮮……”
“在朝鮮我是和您一起的，”艾德礼說。

接着沉默了一會。我們已經講述了我們的觀點，也了解到我們的分歧點。

然后泰德勋爵和馬歇爾將軍開始討論繼續對共產黨中國執行有限的敵對政策意味着什么。斯城元帥和布萊德雷將軍也參加了討論。這方面的討論進行了一會以后，阿弗里爾·哈里曼要求發言。他就认为所有的人都必须了解我們最关心的是自由世界的士气。如果我們对共产主义让步，士气就会急剧低落。如果我們在遠东投降，那我們除了贻害欧洲以外，什么好处也没有。采取最激烈的方案，加强自由世界，是解决危机的唯一的办法。这方面可做的事就很多，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加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除非美国和英國在远东方面能够通力合作，否则北大西洋公約的事情简直没有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的希望。

我表示同意哈里曼的意见。像在前几次會議里所作的一样，奧利佛·弗兰克斯爵士把話头牵到一块来。他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人到华盛顿来不是为了坚持某一些特殊的条件，只是来要求我們考虑他們的看法和了解我們的意见。他說对于基本問題，即避免发生大战和決定留在朝鲜，很明显，是没有疑问的。他认为馬歇爾将军的等待时机的意见是很恰当的，并且說美国人到这里来，对于作什么样的让步，或者要不要让步，都没有既定的意见。照他看来，交談的结果使一个政府对另一个政府的意见有了更多的真正了解，而这对今后是有用和有帮助的。分歧的意见比过去是加深了，而不是在接近。

迪安·艾奇遜說他同意这种看法。
我们何时同意会到第二天十一点，到那时候我们可以检查我们各个专家小组的工作，并且草拟双方同意发表的公报。首相问他同意。

在当天晚上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晚宴会上，我找到和艾德礼比较非正式谈话的机会，我向他谈到了参议院里有些人形成的一个反对集团的问题，这些人像是出了疯狂的，下定决心要破坏国家的外交政策。就在那一天，二十四名参议员，全部属于共和党，联名签署，由密苏里州的参议员克姆——我就是那一州的人——提出的，得到参议员惠里“坚决支持”的决议，要求我说明我向艾德礼承担的“秘密义务”。这些人不觉得一头载进亚洲战争里有什么不对，但是为欧洲防务拔一根毛却不肯，他们认为英国首相不可相信，而蒋介石却不会错。

艾德礼也谈到他的工党内部也有一些反对领袖，尤其是比万和他的集团，他谈到他们给他造成的麻烦。只有一生消磨在政治上的人才能像我们谈得那么投机，——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可能更彻底一些。

星期五的会议，原先只打算是一个形式，使我们有机会批准会谈的公报。但是，柯林斯将军恰好在那时从日本和朝鲜回来了，我们请他进来，向美英双方汇报战争情况。柯林斯用大比例尺的地图向我们作了详细的报告。他一个师，一个师的，几乎是一个团，一个团的，指出联合国部队的驻扎地点。他报告说第八军军长沃克将军相信他可以守住南朝鲜，如果不需他保卫汉城的话。柯林斯说麦克阿瑟同意这种看法，而他自己在视察之后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还报告说沃克将军相信他能够无限期地守住朝鲜的大部分地区，以釜山为供应基地，朝鲜东部的第十兵团的情况仍然很严重，但是柯林斯认为没有疑虑该兵团几乎全部可以从海路撤出。他补充说，从军事观点来看，朝鲜的情况是严重的，但不再是有急
的了。

会議接着討論了專家們的報告，並草擬公報。后一項工作交
給在場的外交专家去办。在等他們回来的当申，我們非正式地交換
了意見。

在这段間隔当中，艾德礼提到了原子弹的问题。他和我单独
地坐在一起，他问我我在最近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是否暗示，也
许，我們正在更积极地考虑使用这种炸弹。我向他保证并沒有这
种打算，并且将发表声明的经过情形詳細地告訴了他。我們同意
在声明中加进一小段，使得关于原子弹的真实情况重新引起重视。

像在我們的前几次會議一样，奧利佛·弗兰克斯爵士對我們
是有帮助的。这位英国大使身材又高又瘦，动作很快，对于我們当
前的问题抱着友好的态度，当我和首相正在为声明中某一些字句
作难的时候，他跪在我們中间，建議使用一些字句，而这些字句往
往是被采用的。我問他如果首相的选民和他的政府看到英國大使
跪在美国总统面前的照片，他們将作何感想。他跪着就有我和艾
德礼坐着一样高。隔着我书桌的写字台面，一边坐着我，另一边坐
着首相，他采取这种姿势是为了工作方便。

最后的公报談到我們曾經在一起讨论了我們两个国家在国际
事务方面沒有解决的問題。它重申我們两国在外交政策上目标是
一致的，即维护世界和平；尊重各国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增进世界
上爱好自由的国家的力量和信心；消灭恐惧，贫穷和不满的原因；
并实现民主的生活方式。

公报也提到我們两国目标一致是整个討論中的基调，经过討
論，对于我們两国所面对的威胁的性质，对于克服这种威胁所应采
取的基本政策，双方明确地認識到我們是沒有分歧的。我們声明
我們曾經仔細地討論了朝鲜的形势，认为形势非常严重，影响深
远，并且說我們完全同意不管是在远东或是其他地区，絕不纵容和
鼓励侵略。持久的和平，和作为世界和平工具的联合国的未来，决定于我们对抵抗侵略的努力是否坚决予以支持。

我们声明，“在这一方面，我们像以往那样，准备遵循谈判途径，设法终止敌对行为。按照我们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凡是适用于威胁世界和平任何行动的国际行为的原则，也应该同样运用于目前的局势。必须作最大的努力，通过和平手段，来达到联合国在朝鲜的目的，并根据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的朝鲜的原则，寻求朝鲜问题的解决。我们相信联合国中的大多数国家具有同样的看法。如果中国人在他们那方面表示同样的态度，那我们维护和平事业就有了希望。如果他们不这样，那就要由世界各国人民，通过联合国，来决定怎样才能最好地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至于我们，我们预先声明，我们要坚决地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我们在公报中并未没有抹煞两国政府对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的有分歧看法。事实上，我们提到我们曾经对这个问题的分歧进行了讨论，并且肯定这不妨碍我们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同心合作。

最后，声明谈到了自由世界的安全问题。我们注意到整个自由世界的力量，在朝鲜事件以后，更加迫切需要建立起来；如果要避免战争，必须有足够的防御兵力。

我们宣布了如下的结论，

“（一）美国和联合王国的军事力量要尽快地增强。

“（二）两国应该扩大武器生产，供给所有和我们一起，进行共同防御的自由国家的部队使用。美国和联合王国应该和其他自由国家一起，继续作出共同的安排，通过这种安排所有国家将对共同防御适当地贡献一份力量。

“我们同意一旦建立一支精锐的、统一指挥的军队的计划获得批准，就应指定一名最高司令。这个计划目前在北大西洋公约
組織里已接近完成。我們共同希望這種任命尽快確定。

“除了這些加強我們軍事力量的決定之外，我們同意維持民用
經濟的健康发展对于防务努力的成败有着非常重大的关系。我們
同意在原料供应不足的情况下，生产必須尽最大可能优先保证防
務需要，同时也尽可能的滿足自由国家人民必需品的需要。
为了获得必要的原料和尽速地将它们分配给这些优先的目的使
用，我們同意保持密切合作，以增加原料的供应。我們認到为了
保证按照防备和国内的主要需要而公平地分配主要原料，必須采
取国际行动。我們討論了某些原料缺乏的迫切問題，而今后还
要继续考虑这些特殊問題。我們充分意識到越来越有必要阻止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原料和物資流入那些可能用来反对自由世界的人們之手。

“鉴于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处境，我們两个国家除了用所有精力
来建立我們的防卫部队以外，沒有别的选择。我們这样作，纯粹是
为了防卫。我們相信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果他們願意，
可以矫正自己的行为，以使这些防务准备成为不必要。我們將尽
我們一切可能，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使他們对这种看法有个深刻的
印象，并努力使目前存在的問題得到和平解决。

“总统声明他希望世界局势永远不至于有使用原子弹的必要。
总统告訴首相說，他也希望把可能改变这种局势的情况发展随时
通知首相。

“在这个危急的时期，我們感到非常满意的是，我們两个政
府对基本問題的看法是如此接近。我們相信这种目标的一致使我
們两国政府有可能贯彻共同合作的决心，以加强自由国家中已經
达到的团结，以保卫那些对我们所代表的人民具有根本重要的、有
价值的东西。”
第二十六章

朝鲜的危机

1950年12月的头两星期是一个危险关头。朝鲜传来的军事消息糟糕得很。

说来真是不幸，有些人竟那么健忘。多年来一直阻挠国家执行可靠的军事政策，又将缩减一切以求收支平衡的人，如今就是叫嚣得最厉害的人。要求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把现成的几师兵迅速地开去援救麦克阿瑟。有些人要求抽出我们在中国的一切军队，放弃欧洲，建立起一个“美国堡垒”来。又有人要求放弃朝鲜，把力量集中在欧洲，与此同时别人则又认为我们应该在中国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放弃我们在欧洲的阵地。甚至有少数人认为我们应该在当时挑起世界战争，有些人实际上竟说要自己惹起对外政策的危机，为的是要为自己取得更多的权力。

具有言论自由的任何制度都有这样的特点，评论家和政治煽动家的言论比支持既定政策的人的言论往往更受人欢迎。首先是因为对政策表示满意的人没有理由大声叫；其次是因为我们传达和整理舆论的机构——报纸和电台——总是强调意见分歧的一面，而不强调一致的一面。总统绝不应受这种歪曲舆论的行为的影响。他一定要能够辨别什么是宣传，什么是人民的真正意见。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50年12月这件事似乎显得特别棘手难办。

我刚通过艾德礼获悉英国内阁的看法。我派去日本和朝鲜亲自观察局势的柯林斯将军带回来一份麦克阿瑟将军的见解的摘要。
要。

这位远东司令告诉陆军参谋长说，他认为可以采取的行动方案有三个。

第一个方案是只在朝鲜继续采取反对中国人的行动。这意味
着我们的部队仍将受他们当时所受的一些同样的约束，即不空袭
满洲的基地，对中国大陆不进行海军封锁，不利用国民党的中国军
队，不大量增援联合国在朝鲜的军队。在麦克阿瑟将军看来，采取
这一个办法等于是投降。他确信，如果我们走这条路，我们迟早会
被迫撤出朝鲜。我们所能希望从这个方案中获得的充其量只可能
是一种明智的拖延时间的行动而已。

麦克阿瑟将军赞成第二个方案。这一方案准备由联合国封锁
中国海岸，并要求轰炸中国大陆。麦克阿瑟还明确说明应该最大
限度地在朝鲜利用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同时还要把蒋介石的军队
“引导”到中国南方去，可能是通过香港。“以后在朝鲜是采取军事
行动还是撤退，要看中国人的反应再作决定。”

按照麦克阿瑟的意见，还有第三个可以采取的方案，那就是中
国共产党会自顾地同意留在三八线以北。麦克阿瑟告诉柯林斯说，
联合国应该接受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停战。在他看来，除非联合
国愿意接受他所建议的第二个方案，在一个联合国委员会监督下
的停战是最合适的解决办法了。

麦克阿瑟将军是秘密地把他的看法告诉柯林斯的。这位参谋
长在报告时也注意到保持适当的秘密性。但是东京的新闻界代
表已经相当透彻地知道了麦克阿瑟的看法，而且他通过许多声明
和记者访问也透露了不少，因而使美国公众得出了这样的印象，认
为他提出了在朝鲜取得胜利的唯一有把握的办法。然而事实上却
有很大的困难，麦克阿瑟所鼓吹的方案很可能意味着一场全体出
动的世界大战——包括原子武器等等。
我怎么也不能使自己相信像麦克阿瑟那样一位战场老战士不会理解把“中国国民党军队引导到中国南部去”就是一种战争行动；我也不相信，像他那样三十五年来在世界大地上居于重要地位的人，会不认识到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城市被轰炸的反应，会跟美国人民在珍珠港被轰炸时的反应一模一样；我也不相信以他对东方的了解，会看不到这样的事实：他炸了中国的城市以后，苏联的物资仍源源而来，如果他要贯彻到底的话，他第二着就得轰炸德奥朝和横穿阿西利亚的铁路！但是正因为我相信麦克阿瑟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些事情，我就只能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麦克阿瑟将军准备冒险发动一次大战。我可不主张这样干。

我发觉麦克阿瑟将军的看法同我的看法距离那么远。我感到惴惴不安。但是，他把他的意见上达给他的统帅，这当然是正当而又合适的。如果他没有超越这一点，我就决不会感到必须撤他的职。

我认为，高级军事领袖们的一个问题是他们之中有许多的人依靠“摘要”解决问题。他们的实际材料和具体意见大多是他们参谋所提供的简短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如今任何一个高级官员只能那样办事；美国统帅也得依靠“摘要”来解决问题。但是这里有一点大不相同的地方：总统有许多思想互不相同的人，有经常进出其办公室的人做他的幕僚；他们各有各的技术和专业；他们的前程并不依靠他们所提供的报告的正确程度。然而，在军队里，尤其是在职业军人中，强烈的信念和苛求的头脑就会断送事业。我在野战炮兵后备队里当上校时，我看过所有关于论述参谋人员应该如何克尽职责的军事手册——而且我也懂得书上是怎么说的；可是我也知道一个统帅必须努力使自己不受唯唯诺诺的人的包围，而一个军事领袖可就意味着没有这么多的理由这样做了。但是，如果他不这样的话，他对局势的看法就越来越偏激。由于一向采
用轮流任职的惯例，这种情况并不是常常发生的。但是麦克阿瑟却并没有遵循这种惯例。多年来，他的周围实际上就是那同一批朋友和衷心爱戴他的人。难怪他不懂得为甚么从前当过军士的人不成份队地回到军队里去，难怪他不懂得联合国在西方国家的社会中到底意味着甚么：而且难怪他相信美国愿意参加到亚洲战争中去！他脱离了自己的人民。

在美国总统的身边，一位幕僚所起的作用却是大不相同的。跟军事参谋一样，幕僚执行总统的决定（或者说至少是决定的一部分），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在任何时候幕僚要尽可能地把足以影响总统决策的全部论点提供给他。在白宫幕僚中或政府内阁中，一个唯唯诺诺的人是一无用处的。

在我作出决定以前，我总是设法把每一个问题尽可能充分地加以讨论。我要看无数的背景材料，弄清楚我的顾问们是否已把各种不同的看法都包括进去。当然，在作出决定以后，我希望我的幕僚支持我，但是在作出决定以前，我需要他们的辩论。我深信这样做是稳妥的、值得一的。它只有一个缺点：很多时候，局外人听到了这些辩论，就以为是发生了争执，接着，报上的大字标题和杂志专栏作家便大事渲染。可是，那年12月，我们却不得不着实地辩论一番。

不但有军事政策的问题，而且还有许多别的问题。在联合国，十三个亚洲国家提出了一个呼吁在朝鲜停战的议案。我们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毫无价值的举动，因为除非中国共产党先获得了我们所不能付出的代价，他们无疑地是会拒绝谈判的。但是，世界舆论似乎是强烈地赞成停战尝试的。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一决议案。它规定由三人小组决定可以在朝鲜达成停战的基础，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以便实现停战。1月2日小组的三个人——伊朗的安迪逊、加拿大的皮尔逊和印度的劳氏——向联合国报告说，
他們的努力失敗了。中國共產黨除非按照他們自己所提出的條件，否則不願意考慮停戰談判。

与此同时，我們已采取步驟來加速我們的軍事計劃，並為此提供可靠的經濟支援。當朝鮮傳來第一個壞消息時，我馬上就作出決定，我應該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在12月8日的內閣會議上，也就是在我們和英國的談判結束以前，我們已就這一問題多少討論了一下。我当时授權馬歇爾將軍通知國會的撥款委員會，說我已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自然，我不願意不提出我們應該怎樣辦就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所以，以後的幾天我們召開了許多次會議。

12月11日我出席國家安全委員會討論聯合國關於停戰決議的問題。在與艾德禮的談判中，大家同意我們和英國都不謀求停戰。然而，聯合國中十三個亞洲國家的決議案，使我們必須決定我們是否同意在這時候取得停戰。

我提醒委員會的委員們說，在與艾德禮的談判中曾取得明確的諒解，我們都不願意屈服；還說除非我們被趕出来，否則我們決不離開朝鮮。布萊德雷將軍指出，我們很難同意停戰，除非它規定雙方可以自由觀察，或者是由一個聯合國的委員會進行觀察。我同意應該規定可以自由到朝鮮各地去，因為我們不能坐等敵人加強实力。

馬歇爾部長說，停戟能停止所有的空中偵察，並且可能會迫使我們的海軍撤退。共產黨那時候就可以大大地增援，如果我們表示反對，他們會說我們不遵守停戰令。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反對停戰，我們的朋友又會認為我們在反對和平解決。

迪安·艾奇遜國務卿問到會的軍方成員，在達成停戰以前，如果共產黨再來一次新的攻势，我們被迫再後退，這有甚麼危險。布萊德雷說，他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人的給養已開始發生
困难了。

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海军少将戴维斯说，从军事观点来看，最好不要在这时候停战，但是如果一定得停战的话，我们应该明确说明我们的条件；条件应该包括增兵，即派军队到适当的分界线和别的据点去。自然，我们应该坚持从东北战区完全撤退第十兵团。

我说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条件未谈妥之前，就同意停战。

马歇尔将军指出，第一项——增兵——是会有困难的，因为在概念上有根本的分歧。譬如说，麦克阿瑟将军必须补充已被遣送回国的人，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这就可以作为进一步增兵的借口。

副总统巴克莱的意见是，我们不应该上套而陷入可以被指控为反对停战的境地。布莱德雷将军要求知道是否应该发出命令要麦克阿瑟退回三八线。我立刻回答说，在第十兵团从东北战区撤退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顽强地守住目前的阵地，而且一直要守到真正停战为止。马歇尔说，目前的计划要求作审慎的退却，并需要知道我是否会反对这些计划。我说，“我不反对”，但我又说我不想进行匆忙的撤退。我不想作出退兵的政治决定，而认为撤退的速度应从军事上来斟酌决定。目前给麦克阿瑟的指令仍是合适的、有效的。

接着我谈了一下我跟艾德礼讨论的情况，并提醒大家说，除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以外，会谈表明两国政府的意见是极为一致的。我着重说明跟英国密切合作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跟他们合作，美国的力量才能充分显露出来，在太平洋是这样，在大西洋也是这样。然而，我说，两国政府同意跟中国共产党纠缠在全面性战争中的严重危害性。

马歇尔将军报告说，在现在看来这一点是相当有把握的。我们在朝鲜能够守住一条阵线，第十兵团的撤退也可以成功。但是，他
认为总的局势还是一样的糟糕。国防部长说，有一个问题，国会似乎在大谈战争以及像全面动员这样的战争措施。而在这时候，我们在军事上所处的地位却不能支持这种说法。但是，他觉得为了使总统有必要的权力来改善这种处境，就必须宣布全国紧急状态的存在。

史密斯将军就苏联对美国的全面动员所能发生的反应发表了意见。关于这一方面的估计，第一点是，我们得设想俄国人预料到我们由于他们的行动而在美国增加军事准备。但是，既然俄国人可能是根据相当灵活的时间表行动的，在得假定我们的动员只能使他们调整一下时间表而已。他们也许不乐意立即进入一場大战，而是想保证他们不給我们在军事力量上远远超过他们的机会。

那么，我们所要达到的便是，苏联将设法进一步削弱西方联盟，办法是：利用西欧各国的战争恐惧，利用和平建議和外交界的和解努力，表示要討論裁军問題，进行破坏活动，并在极为分散的地区进行局部的侵略活动。如果这还不能有效地阻挠美国的动员计划的话，那末苏联人也许就会抓住先发制人的有利时机立即对西方发动攻势。

马歇尔将军指出，我们即将动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武装部队，又说我们整个的国际地位是依靠西欧的加强。我们不能突然在朝鲜和太平洋采取措施，这会引起俄国人反应，而吓跑欧洲盟国。

我问斯奈德部长关于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意见，他说为了要討服国会，这样做是必要的。他表示国会中有一方冲动很大，甚至于是太冲了，他们要求采取军事行动，而另一方则拒绝通过征税法案，說我們的时间还充裕得很。

我接着就宣布星期三将与国会领袖們举行会议，以便简单说明我的行动计划，并把我关于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定告诉
他們。到那时候我将向全国广播，说明局势并要求支持我们的政策。

我与国会领袖们的会议于 12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十点举行。与会的人全是两党人士，是民主党党和政府在外交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中的一些前辈委员。除了国会议员以外，出席的还有：艾奇逊、马歇尔、斯奈德、薛明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哈里曼。

我对国会领袖们说，我们有必要在动员工作方面大大迈进一步。为了要促进这一局面，我正在考虑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我把情报局关于苏联在目前情况下可能采取的活动的一个报告的摘要给他们听，这样国会议员们就可以了解我们将面临的情势了。

该报告说，根据从俄国可靠方面获得的证据，俄国想达到的四个主要的愿望是：第一，联合国军队从朝鲜撤出，美国第七舰队撤离远东海域；第二，扶植共产党中国成为远东的主导力量，包括北平政府进入联合国；第三，削弱西方对日本的控制，作为最后消灭西方在该国的一切势力的一个步骤；第四，阻碍西德重新武装。

情报局报告说明，据估计俄国人将继续提议与西方强国会谈，目的在于保持他们作为“和平解决”的拥护者的姿态，但是没有迹象足以说明俄国人会让步，或甚至放松他们对这几点愿望的任何一点压力。要求召开会议是为了要在美国和西欧制造混乱。克里姆林宫本身继续把会议看作是用强力来巩固他们已获得的或正在获得的利益的地方。他们的态度从来没有改变过；只是为了应付未来的情况，他们的办法可以有所不同。

苏联对朝鲜问题预计仍将继续施加压力，但是苏联的军事准备和苏联宣传的性质表明，他们有可能在其他地区采取行动。显得最为紧张的地方是柏林、西德、印度支那、南斯拉夫和伊朗。在这些地区，很容易制造出一个小事件来，好给俄国人进行公开干涉
的借口。就算不发生事件，压力也可以增加到足以严重危害西方国家的地位的程度。

最后，当俄国多半为了吓唬西方并削弱抗拒俄国的压力的意志，而在大谈新的世界战争时，我们应当现实一些，在我们的计划中要估计到这样的可能性，克里姆林宫也许并不是在虚张声势，并可能已经决定跟美国来一次全面性战争的时机已经成熟。

艾奇逊说，他完全同意我们的情报机构关于局势的估计。事情很明显，自从6月以来，苏联就在全力攻击美国的领导。同样明显的是，苏联领袖们认识到他们的政策可能引起一场全面性战争，而且他们准备冒这种风险。他还指出，苏联的主要手法是“要圈套”——要弄清楚究竟能使我们浪费掉多少力量，而他们自己的主力则仍自由自在地保留下来，以供将来之用。

艾奇逊说，他们当前的主要努力是离间我们和我们的盟友的关系，而这一努力正取得了某些成就。

艾奇逊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尽量加强我们自己和我们盟友的军事力量。这就是说，要保存我们的力量，并且在增强实力的过程中不要过分消耗它。他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阻止苏联夺取世界霸权的野心。

接着我请国防部长马歇尔发表意见，他叙述了军事方面的情况。国防部长开始讲话时简单地谈了一下我们现有的地面部队的力量。在美国国内只有一师美国陆军，要到春天才可以有其他一些师训练好，装备好。他接着就转而谈到朝鲜的情况，并且简短地说明我们在那里的处境，他说我们的军队马上就可以占相当巩固的防御地位，又说他们随后就可以很巩固地防守一些时候。

他从这一话题转而谈到日本，说我们在那里根本没有战斗部队，安全是靠七万五千名日本警察来维持的。马歇尔说，对国防部说来，这是一个令人深切忧虑的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俄国人下一
步会干什么。他们有許多坚固的军事基地,特别是空军基地,攻击日本的距离很近。

马歇尔继续说,与此同时,欧洲的情况也到了严重关头。正当我们在最后安排一支统一指挥的欧洲防务军队和最高司令的时候,俄国人就搞起他们的宣传鼓动来。他们曾几次警告说,他们不能“容忍”武装西德的任何行为,而且可能准备以武力来支持这一威胁。

接着,马歇尔提起了拨款问题。他说根据快速计划,我们试图在1952年达到原来计划在1954年达到的数字。这种加快的过程自然会造成紧张状态，尤其是在装备问题上。陆军方面遇到商订合同已有困难，因为没有合法的权力可以使军事合同优先于民用需要，工业并不热衷从民用品的生产，转向军事生产。如何为扩充了的服役人员加速取得物资，真正成了整个计划中很难办的问题。

我指出这会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所能做到的问题的一方面，虽然这在其他方面也会有好处。这会给予行政首长某些他所需要的权力，而且总的说来能使我们达到我们的目标:“尽可能迅速地进行适当的、有组织的动员；同时我们稳定经济局面，就可以使合同承包商履行他们的合同，如期交出军事装备。”

关于经济稳定计划，我宣布第二天和一些国会議员及其他人士开个会来讨论物价管制、工资稳定措施、优先訂货、原料分配以及其他的问题。我指定了请哪些人来开会，解释说，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会照顾到这些问题中的一些，而不能全部都照顾到。要进一步取得权力，就必须跟国会商量。

回顾由于中国人在朝鲜的干涉行为，而引起的极端危急的世界局势之后，我向他们保证，我们能应付这一巨大的危险，只是必须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

参議員塔夫脫马上要求知道，馬歇尔所說明的扩大兵役的計
划是否就意味着全面动员，或者只是走向全面动员的一个中间阶段。我答复说，这并不是全面动员，又说在我们还未发觉自己进入大战以前，不会进行全面动员。

看来参议员塔夫脱对这一答复并不感到满意，而是要求知道这次拟议中的全面动员的幅度有多大。我回答说，随着局势的发展，必须动员到足以应付局势的地步；马歇尔将军补充说，现在我们并不考虑全面动员，而只是准备全面动员的基础，如果准备是必要的的话。

参议员惠里说，在他看来，总统是在要求进行全面动员的权力，只不过是在要求的同时又希望他不需要行使所有的权力。我表示同意，说我没意思要超过必需的限度来运用权力。

参议员塔夫脱提醒与会的人（虽然他的意思显然在提醒我）说，我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将受到国会关于提供款项的规定的限制。我表示同意，并补充说，这些行动是整个国会关心的问题，不单纯是拨款委员会得考虑的事。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邀请那么多的国会领袖今天上午来白宫商讨这些问题。

众议员文森问起是否已经作出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定。我说已经决定了，除非大家提出充分的理由，主张不应该这样做。威克马克提出，1939年和1941年罗斯福所发布的紧急令在某些方面今天仍是有效的，只是形势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又有根据新的形势宣布新的紧急令似乎是恰当的。

众议员文森说，如果宣布紧急令就无需在商订合同、优先订货或原料分配方面进一步采取国会行动了。根据今年9月制定的一项法律，在紧急状态下，总统就有这样的权力。

然而，参议员塔夫脱认为没有理由要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认为9月制定的法律所授权的一切在不宣布紧急令的条件下也可以办得到，但是总统的顾问墨菲解释道，有一些其他法令要有紧
急令才能赋与总统以权力。

众议员马丁要求知道，除商讨合同以外，宣布紧急令还可以有哪些方便。为了答复他的问题，我递给司法部编印的一份立法条款的单子，只要总统一旦宣布全国紧急令，所有这些条款就都生效。

众议员马丁询问在国会本届大会上是否有制定其他任何立法的需要。我觉得没有这种需要，但是希望国会注意我们的动员和防御努力中最重要的几项项目：军事拨款、援助南斯拉夫、征税法案和民防立法。

接着马丁说，他想问一个也许也是题外的问题，他怀疑我们是否在想办法取得其他国家的更多的支持。我回答说，这就是艾德礼之所以来华盛顿的理由之一。但是，马丁说他所想的偏重于马上援助朝鲜。我们是否正在印度、日本以及“友好的中国人”中努力取得“战斗团体”？

马歇尔将军说，这里有一个是否切合实际的问题。我们简直不可能利用日本人，因为中苏条约是以明确地针对这两个国家的一方可能与日本人打仗而签订的，发生这种事件时，另一方就有义务参战。他认为取得印度的帮助没有多大希望，他说印度正在装腔作势。

接着雷朋问道，我是否要知道与会的全体议员关于宣布全国紧急令这一特殊问题的意见。我回答说，我殷切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谈一谈，而且我也请每一个人依次发表意见。

巴克莱说，如果我们不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保卫国家，我们就对人民不负责任。他认为，为我们自己打算，为给我们在全世界的朋友打气，我们应该毫无顾虑地宣布紧急令。

谭长雷朋仍犹豫不决，想先听一听某些其他议员先生们的反应。马丁也拿不定主意，但似乎对宣布紧急令的必要性表示怀疑。
参议员塔夫脱怀疑从法律上考虑，是否有宣布紧急令的迫切需要，而且一般说来，“在不知道所牵涉到的细节”——如征兵和征税——以前，是反对宣布紧急令这一主张的。

众议员麦克马可说，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要使美国强大。我们得承认一般老百姓是自满的，我们得使用强烈的言语，采取强烈的行动才能唤醒他们，使他们采取必要的行动来保卫他们自己。于是塔夫脱作与他，他不希望别人误解他，他是完全赞成加强武装部队的，他所不同意的并不是这一点。麦克马可接着说，在他看来，宣布全国紧急令是领导方面一种坦率、明确和果断的行动。应该这样做。

参议员惠里说话的语气可就大不相同了。他说他赞成加强国家实力的计划，但是关于宣布紧急令，他认为他还需要了解更多的事实。他也怀疑我们在国外所承担的义务，虽然他并没有说出来是哪一些，而且他觉得奇怪，总统希望通过宣布紧急令来取得更多的权力，为甚么不能要求国会一项一项地给他。他转过来说着我，直截了当地问我，如果我需要更多的权力，为甚么我不向国会要求。我回答说，如果我应该随着情势的需要而迅速采取行动的话，我所需要的许多权力一定得是无条件的。惠里问我，为甚么我不能只要求某些权力，而要求足以进行全面动员的大权呢。我回答说，这主要是时间问题，零打碎敲地要求授权以扩大我们的部队，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惠里反驳说，我当然应该知道，我是唯一掌握实际材料的人。我答复说惠里以及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实际材料。他们所得到的摘要与任何国内的官员所得到的是同样完备的，而且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再询问一些问题。

惠里的攻击使我感到愤慨。我说，我以为人人都知道我对扩大权力并不发生兴趣。国会议员们一定记得，我曾多次自动地放弃权力，甚至曾经要求国会取消作为总统而授予我的某些权力。
但是这一切都已经过去的事情了。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局势是非常严重的。我现在之所以要求权力，并不是因为我要权力，而是因为我必须拥有这种权力。

参议员康纳利认为应该发出关于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宣告，因为这可以向国外证明我们的决心。但是必须告诉美国人民这样的宣告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说我准备到四家通讯社联合站去广播，又说我将如实说明为什么有必要宣布全国紧急令以及我们将采取什么步骤。康纳利补充说，朝鲜事态的发展已使全国神经敏感。因而总统作一次演说，让美国人民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情况，是有好处的。

众议员文森也赞成立即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接着马上应该对国防所必需的一切商品实施原料分配制度和物价管制。参议员麦克拉说他担心某些人会把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当作是宣布战争，但又说他相信紧急状态确实存在，应该宣布。在国会似乎存在着不同意见的迹象时，参议员乔治对宣布紧急状态仍有些怀疑，但他希望这些意见分歧能够消除，又说到这时候就可以宣布紧急状态。他还认为接着就应该采取经济管制措施以及新的征税方案，以便与预算的新要求相适应。参议员密利金认为宣布紧急状态还有个时机问题。如果宣布的时机不对头，人民就会误解。采取这样的果断步骤应该有所准备。他接着重复提出塔夫脱所提出的一点，即宣布紧急状态，报纸当天就会出现大字标题，就会不必要地使人民感到震动。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使公众明白，我们最好的依靠是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并时时保持我们的武力。

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代理主席、众议员理查兹说，物价和工资与整个国防计划是密切相关的，我发表任何演说，人民都愿意听我谈起物价、工资以及国防计划。众议员伊顿认为应该宣布紧急
状态，也应该开始迅速加强我们的部队，问题不在于这可以使俄国人感到惊惶（在他看来，这是不会的），而在于这可以使世界上其他的人都明白我们有决心制止俄国人。参议员卢卡斯说，如果与会的人散会后纷纷向报界发表他们的不同意见，这对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就会是一种致命的打击。他本人同意那些人的意见，要求在充分说明我们的计划的同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但他认为，如果参议员塔夫特、惠里和众议员马丁会后离开白宫向报界发表谈话，根本就没有必要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就将是极端有害的。

接着我请泰伯先生讲话，他说，他认为人民是混乱和不安的。但是，如果向人民说明明确的政策和明确的计划，人民就会跟着去做的话，他就满意了；而且说，在他看来，要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却非得有那样的计划不可。杜威·肖特宣称，他相信议会是很不愿意授予权力的。但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事情不得不这样做。他认为国会应该支持总统，而且他还希望总统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得到大家一致的赞同。

既然，与会的每一位官员这时都得到了讲话的机会，我便对他们的出席会议和坦率的发言表示谢意，随后就宣布散会。

第二天我和另外一些官员们开了一个会，这一次着重讨论了原料分配、工资和物价管制等经济问题。在这天和第二天，我和我的幕僚与官员又开了几次会。在这些会上，我们拟定了计划的细节，宣布计划时的演说也拟定了初稿。

12月14日下午，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所拟计划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含义。我急于要确定我们的军事生产的需要是可以得到满足的，但是，我也认识到一般老百姓不得不支持这样的计划，实行粮食配给和类似的严格管制是不会受人欢迎的。

某些报纸和政治家纷纷提出要求，在武装方面定一个“摧毁性
的计划”，也就是要求全国在战时才可能实施的全国性的断然大动员，当然这使情况更加复杂化了。我反对这种要求全面动员的叫嚣。我们在朝鲜作战，但是我们必须把战事局限在这一国家的范围中，不想引起一次世界性的战争。此外，还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如果我们现在武装得那么迅速，将来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就可能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地位，因为我们的装备已经过时了。我们需要的是加紧完成既定的计划，以便在1952年达到1954年的目标，然后稳住我们的生产水平和准备工作，不但要保持动员的基础，而且还要使这个基础现代化，以便一旦大战爆发可以迅速扩充。

我们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时，脑中就自然而然地拿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我们的部队增加的情况来作比较。譬如，罗维特先生说，动员两年之后，到1941年12月31日，我们的武装部队的人数只有一百六十八万八千二百七十一名，副总裁巴克莱说，此后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部队加强了十倍于当时的规模。会上我几次说明，我们必须努力争取的地位是：要使我们的军事机器和工业机器能在最短时间内将能力扩充到最大限度。

12月15日星期五晚上十点半钟的时候，我发表广播演说，告诉我国同胞，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以及我们将采取的对策。

我说，“第一，我们将继续维护，必要时以武装保卫联合国的原则——自由和正义的原则。

“第二，我们将继续与其他自由国家合作以加强我们的联合防务。

“第三，我们将加强我们自己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并为我们的盟国制造更多的武器。

“第四，我们将增长我们的经济并使它保持平衡。”
我接着谈了这几点的详细情况。最后我预示说，第二天上午我将发表一项公告，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我说，“这将要求每一个公民为了国家的利益，把他的私人利益摆在一边。我们必须拿出一切力量专心致志地执行我们面临的任务。”

“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曾有过比我们国家现在所负有的这样重大的责任。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自由世界的领袖。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之所以能取得和平的，只有和其他自由国家和每一地方爱好自由的男女进行合作，才能取得和平。”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目标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在整个世界上，我们是拥护国际正义的，是拥护一个以法律和秩序的原则为基础的世界的。我们必须这样坚持下去。我们愿意举行谈判以解决分歧的意见，但是我们决不动侵略以对邪恶的姑息不是走向和平的道路。”

“美国人民从来就是以勇敢和坚毅来对待危险的。我深信我们现在的就会这样做，在上帝的保佑下，我们一定能保卫我们的自由。”

在这一广播演说之后，信件、电报和电报电报雪片般地向白宫飞来，这表明全国绝大多数的人是赞成我的演说的。只有少数人有不同意见。但是，当时有一些参议员鼓噪一时，发出了一阵子怨言，说什么如果我要证明我想促进国家的利益，首先该把艾奇逊撤职！这使我感到十分恼怒。

国务卿艾奇逊长期以来就受到了某些报界人士和国会人士的攻击。最近对他的攻击使我感到极其恼怒，因而我发表了一个声明。我相信，如果艾奇逊当时在华盛顿的话，他对声明的内涵和语调都会表示不同意！有一次我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在这些日子里，我总有一天会“爆炸”，今天就是这样！

500
我说："在最近一星期中，对国务卿艾奇逊又有了新的攻击。有人要我撤他的职。说这样话的人认为这样做对国家有好处。

"艾奇逊退职，怎能改善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我真不能理解。艾奇逊先生帮助制定并执行了我们抵抗共产帝国主义的政策。几乎从四年前我们分担希腊和土耳其所需要的武器的时候起，直到目前他劝我抵抗共产党对南朝鲜的侵略为止，我们政府中没有一个官员比他更敏锐地感到共产主义对自由的威胁，或者更强烈地要求抵抗这种威胁。

"此刻，他还在布鲁塞尔，代表美国在建立反侵略的共同防务。这才使有可能指派艾森豪威尔将军为盟国驻欧洲的最高司令。

"如果共产主义今天在世界上得势的话——当然它不会得势的——艾奇逊即使不是为自由与基督教的敌人所打死的第一个人，也将是头一批人中的一个。

"最近对艾奇逊先生的攻击，在上述意义上来说，还是老一套，它们是几个月以来一次提出的一些同样的不真实的指责。它们是毫无事实根据的。

"这与西华德所碰到的事如出一辙。有一伙共和党人要求林肯总统撤换国务卿西华德。他拒绝了。我也同样拒绝撤换国务卿艾奇逊。

"如果我采取任何其他措施，这将会削弱国家在反对共产党侵略中所持的强硬立场。

"如果攻击我们的外交政策和艾奇逊先生的那些团体有别的政策可以提供的话，他们应该提出来。这是他们对国家应尽的义务。现在我们是面对冷酷的事实作仔细思考的时候。这可不是作含沙射影的指责和不公正黑帚自进行打击的时候。

"有一些共和党人看清楚了攻击国务卿艾奇逊的实际情况和真正理由，跟他们的同僚却有不同的意见。
“国家需要所有人民发挥智慧。现在是万分危急的时候。这是需要大家团结一致，需要真正发挥两党制的作用的时候。这是需要利用像爱奇逊那样的人的伟大才能的时候。

“撤换爱奇逊而能得到好处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相信，历史将把爱奇逊列为我国曾经出现过的真正伟大的国务卿之一。在快到八年的时期中，我用了四位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任职时是罗斯福总统逝世，我刚进入白宫的时候；贝尔纳斯任职约十八个月，任期是战争最后几个月和战后初期；马歇尔将军当了两年国务卿，这两位是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实施马歇尔计划和俄国封锁柏林的年头；爱奇逊任职达四年，任职前他曾当过助理国务卿和副国务卿。出任国务卿的人能像爱奇逊那样具有任职的充分准备和具有优秀条件的人是不多的。他头脑敏锐，性格冷静，目光远大，这些都使他能很好地处理有关政策的重大问题和国务院的日常事务。

爱奇逊在他作证时曾受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精细的质问。但是，现在对他的攻击变得尖酸刻薄了，特别是我们在朝鲜采取行动以来。大多数的批评是参议院中那些有时被称为“中国第一”集团的成员发出的。这些人一再重复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摘，说什么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爱奇逊不知搞什么名堂所造成的，他们现在又指控说，爱奇逊剥夺了麦克阿瑟将军取得胜利的手段。

麦克阿瑟将军对国外战争退伍军人所发表的福摩萨声明和他最近在公开场合的谈话给憎恨爱奇逊的人提供了一个把柄。他们借此就能纠集力量进行攻击。换句话说，他们要打倒爱奇逊，因为他坚持了我的政策。在爱奇逊担任国务卿的四年中，从来没有人说他与我在政策上发生过意见分歧。在他广阔的职责范围内，他小心翼翼地使我完全了解每一件事情的发展。
他透徹地了解总统在我国宪法体制中的地位，而且充分認識到。虽然我依靠他经常給我提供意見，但政策必須由我作出政策决定，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做了。

那些攻击艾奇逊的人实际上是在攻击我。不幸得很，在共和党处于少数派地位的多年中，党内产生了一个派系，它們似乎除貶損、抨击和否定而外就不知该采取甚么态度来对待政府。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这些人甚至在危机时期也不了解，两党合作制要取得成就，既需要一个执政的多数党，也同样需要一个有责任感的反对党。

我除了召集議会领袖，举行几次会议，说明真实情况以外，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再进一步着重说明我們到底处在多么严重的危境中，也就是说，我只能使他們看到我与我的顾问們所有的那一些极秘密的文件摘要。我們的制度的問題之一是，总统不可能把他所得到的一切机密情报告诉国会每一位议员，他們的人数太多，以致秘密一定会泄露出去，可是总统却必須在以这样的情报为根据而拟订出来的种种政策上取得他們的支持与合作。简单說，在外交政策上，两党合作制就是：总统可以信赖另一党的議員，而該党的领袖們也信赖总统就外交事务所采取的行动。

美国政党制是这样发挥作用的；政党中的领袖既要依靠资历的偶然性，也要依靠个人的长处和成就。这意味着，相互間的信赖和两党合作制在很大程度上看另一党的领袖是谁来决定。当范登堡代表共和党参議員发言时，我心里从来不怀疑，他的判断和裁决使我觉得可以放心跟他討論最微妙的外交问题。当馬歇尔和罗維特想个别找他討論他們感到伤脑筋的问题时，他懂得而且理解到他所处的地位是既受到了无比的信任，也负有重大的责任。有时候范登堡不同意我的政策，但是他从来不企图破坏我的政策。

然而，惠里以及另外一些我可以举得出来的人，对两党合
作制似乎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对他们来说，两党合作制是一条单行马路。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两党合作制的方式在他们看来似乎意味着任何事情在他们未搞清楚以前，总统就不得采取任何行动。而反过来，他们却又不承担任何责任来支持总统。

另外一些人又显然认为，两党合作制在对外政策方面是设立一个协商机构就可以做到的事，或者认为在对外政策领域中的某些多少具有重要性的职位上安插几个另一政党的成员就可以做到了。但是那倒不一定就意味着他们真是该党的代表。除非具有信赖的精神，上述办法就不会有任何差别。除非议员们以负责的、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对外政策，这种工作关系就没有可能。除非总统在跟反对党的成员谈论那些透露过早就会泄密国家安全的问题时，总统可以信得过他们的判断和裁决，事情是不能顺利进行的。

不幸得很，那些叫嚣得那么厉害，要求解除艾奇逊的人，已充分证明，只要能作为他们进行党派活动的材料他们就不惜利用任何情报，而且他们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们的党派活动。
第二十七章

麦克阿瑟将军的召回

当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朝鲜的时候，我们的军事与情报专家们却越来越担心在日本没有军事防御的情况下，俄国突袭日本的可能性。我们在朝鲜的需要使美国占领当局在日本竟没有留下任何战斗部队；虽然麦克阿瑟已着手鼓励日本人建立一支至少可以充当临时防御的国家警察队伍，但是这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因此，12月19日麦克阿瑟将军要求参谋联席会议增援日本。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马歇尔将军跟国务院官员开了一连串的会议，想找出某些办法来应付这一问题。我们简直就没有什么能成的增援部队。我们不能把第八十二空运师派遣出去。它是在美国的唯一可以立即出发的部队，而我们却不得不在国内保持最低限度的后备力量。国民警卫队的各师在8月前不能准备就绪运送到国外去。军事首脑们以为我们可以想办法“光荣地”撤出朝鲜，为的是保卫日本。然而国务院采取的立场是，除非我们被赶出来，否则我们决不能撤离朝鲜。做不到这一点就等于放弃原来使我们进入朝鲜的那一原则。

可以多少缓和远东局势的一个办法是增加大韩民国军队的规模。李承晚总统曾一再要求给他更多的武器，但是我们无法给他更多的东西，因为我们自己的需要都没有满足。但是，1951年1月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可以供给他武器和弹药的种类和数量，并征询他的意见。

以这些数字为基础，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韩国军队可以从二...
十万增加到三十万，并配备步枪、自动步枪、卡宾枪和轻机枪；他要求麦克阿瑟就这一问题提出建议。

1月6日，麦克阿瑟将军作了答复。报告说，武器不但已经给了南朝鲜的军队，还给了青年团及其他类似的团体，但是敌人的游击队仍然在许多广泛分布在南朝鲜的地区进行有效的活动。而倾向于我们的游击队伍在共产党后方地区却很少有作为，主要是由于缺乏坚定的领导，而且韩国的军队始终没有完成适当的任务。麦克阿瑟将军深信，如果我们武器和弹药不给南朝鲜而给新建立的日本国民警察后备队，将有更好的用处。

这时，朝鲜的局势已经开始好转了。第十兵团撤出兴南地区的行动已顺利完成，该团成员已并入第八军，并由该军的指挥。第八军在沃克将军死于吉普车载车翻以后，已由李奇微中将任新司令官。

麦克阿瑟将军在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建议时，在他看来，战争应该扩大，办法是袭击满洲机场，封锁中国海岸和利用福摩萨的中国人。譬如说，在12月29日的电报中，在重申他的看法之后，他提出这一行动方案之所以遭到拒绝是因为他以为还讨要起中国和我们进行全面战争的结局。但是，他认为这种害怕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以为怎么也不会加剧与中国面对面的局势。至于俄国人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倒是他也不多出来的。然而，如果俄国人打算袭击日本，只要他得到他现日本要的四个额外的师，他就可以拖延俄国人行动。

他认为，如果我们无意扩大战争，唯一的其他抉择就是逐渐缩小我们在朝鲜的阵地，一直到只剩下釜山滩头堡，然后再从那里撤退，不管这样做对亚洲的士气会有多么坏的影响。

应该指出，这种撤退似乎已经强加在我们头上了，因为1月1日共产党对第八军发动强大的攻击，迫使我们放弃汉城。
1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向我报告，麦克阿瑟将军说，他所建议的报复性措施华盛顿正在考虑中。参谋长联席会进一步向他明确说，我完全了解中国共产党进入朝鲜和目前进入南朝鲜引起的局面改观的情况。但是，参谋长联席会通知他说，其他方面的考虑需要我们在朝鲜保持我们现行的政策，因此训令他，逐步坚守阵地，尽可能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但是，主要的考虑应该是他的部队的安全问题和他保卫日本的基本使命。如果根据他判断，为避免人员和物资的严重损失，不得不撤退，那末他可以将他的部队撤到日本去。

麦克阿瑟将军第二天对这一指令作了答复，要求澄清指令内容。他说要他守住朝鲜阵地而同时又要保卫日本，使它不受外部的袭击，他所统率的军队将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他进一步强调说，如果他必须继续受限制，以他现有的军力作战，那么，他所统率的部队在朝鲜的军事地位最后将支撑不下去的。他指出，由于长期的、艰苦的战斗，联合国军已筋疲力竭；他说他们由于受到不正当的批评而感到苦恼，士气正在急骤下落。他看来，除非有其他更重要理由，一旦战术上可能，他所统率的部队应该尽速撤离朝鲜半岛。

另一方面，他说，如果政治的①原因要求我们在朝鲜守住一个阵地，那末我们就应该负责军事后果，他预料这个军事后果将是重大的伤亡和严重地危害在日本的安全。

在马歇尔将军把麦克阿瑟拍来的电报拿来给我看的时候，我感到非常不安。实际上，这位远东总司令官在报告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决定的，同时又经批准的行动方案竟是行不通的。他在说我们回从半岛上被赶出来，否则就至少得蒙受极

① 在这些讨论中所用“政治的”一词的意义，指的是世界事务，而不是指国内的情况。
大的损失。后来的事实证明他错了。但是，在他来说，这是他表示怀疑，并要求重新考虑华沙顿决定的正当手续。我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月12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麦克阿瑟的电报和对这一问题应该怎么办。

在这次会议上，我表示意见说，重要的是要让麦克阿瑟充分了解政治和军事问题。我们一直是在这样做的。他曾收到许多份重要的文件，可是显然真正送到他办公桌上的却寥寥无几。所以，我要以个人名义拍个电报给麦克阿瑟将军，使他了解我们当前的外交政策。我给麦克阿瑟的电报如下：

“我希望你知道此间对朝鲜的局势已予以极大的注意。同时希望你了解我们的努力正集中在这个对美国的前途和其他各国自由的人民的生存极为重要的问题上，以寻求正确的决定。

“我希望在这封电报中就我们继续在朝鲜抵抗侵略这一问题上，让你了解我对我国和国际上的基本目的的看法。我们希望你率领下的联合国军及国联军在世界基础上迅速组织起来的抵抗侵略的行动，我们需要你就联合国军及国联军能合理地提供的最大力量作出判断。不管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不要把这封电报当作一纸训令。这封电报的目的是告诉你，我们对政治因素的某些看法。

“（一）在朝鲜能胜利地抵抗侵略就可以达到下列重要的目的：

“（1）具体表明，对侵略行动我们和联合国是不能接受的，并提供一个团结的目标，使自由世界的力量能够团结起来，以应付苏联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所发出的威胁。

“（2）打击共产中国已被夸大到危险地步的政治和军事威望，这种威望现在大有破坏非共产党亚洲的抵抗，并且妨碍共产主义对中国本身的控制的危险。

“（3）提供更多的时间和直接援助在中国国内外组织的亚洲
非共产党的抵抗。

“(4)履行我们对南朝鲜所承诺的光荣义务，并向全世界表明美国的友谊在苦难中是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

“(5)使日本可能取得更为满意的和平处理方案，并对日本与大陆间在和约签定后的安全地位作出巨大贡献。

“(6)促使许多目前生活在共产党势力阴影下的国家坚定意志(这不仅仅指亚洲的国家，而且也包括欧洲和中东的国家)，让它们知道它们不必急于在所能取得的实质上等于完全屈服的条件下，与共产主义妥协。

“(7)鼓舞那些可能在遭受苏联或共产党中国突然攻击下，响应号召，以寡敌众的国家。

“(8)使人门看到迅速建立西方世界防务的理由和它的迫切性。

“(9)使联合国贯彻对集体安全所作的第一次巨大努力，并形成自由世界的联合阵线，这个联合阵线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10)提醒铁幕后面的人民，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主子向往侵略战争，这种罪行将遭到自由世界的反击。

“(二)我国目前的行动方针应该配合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这大多数国家不仅仅是联合国组织的一部分，而且在苏联向我们发动攻击时，他们也是我们迫切需要依赖的盟国。此外，在我国的力量尚未建立以前，只要是涉及扩大战区的问题，我们的行动一定得十分谨慎。某些步骤就其本身而论，也许是具有充分的理由的，这也可能有助于朝鲜战役。但是，如果這些步骤反而把日本和西欧国家卷入到大规模冲突中去，那就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三)当然，我们承认以你目前被迫用来应付大量中国军队的有限兵力，要继续进行抵抗，在军事上也许是不可能的。再者，在
目前的世界局势中，你的兵力应该保存起来，作为保卫日本及其他地方的有效工具。然而，如果在朝鲜本土据守一个重要地区已不可能，同时你又认为某些上述重要的目的是适当而又切实可行的，那么你就可以在朝鲜沿海诸岛，特别是济州岛，继续抵抗以支持上述这些目的。在最坏的情况下，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必须撤离朝鲜，我们得向全世界表明，我们是出于军事的必要而被迫采取这样行动的，除非侵略的行为得到纠正，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我们将不承认撤离的后果。

“(四)在对朝鲜问题作出最后决定时，我不得不经常考虑来自苏联的主要威胁和迅速扩大我们武装部队应付这一危险的必要。

“(五) 有人敦促我去相信，自由世界对摆在我们面前的危险已有一个现实而又清楚得多的认识；必需的勇气和力量即将涌现出来。联合国最近的会议已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混乱和脱离实际的想法，但我相信大多数会员国是受述愿望所驱使的：彻底搞清楚所有谋求和平解决的可能途径都已经完全尝试过了。我相信绝大多数会员国正迅速地团结起来，结果将出现一个鼓舞人心的、不可抗拒的联合力量来保卫自由。

“(六) 全国人民都感谢你在朝鲜艰苦斗争中的卓越的指挥和你的军队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下的出色的表现。

“哈里·杜鲁门(签字)
“1951年1月13日”

正如麦克阿瑟在以前的几次战争中一样，他表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但是，我需要他像一个军人应该做到的那样，接受政府文官当局所已经决定的政治决策。

1951年1月间，我们的军队已拦阻住了朝鲜的战争浪潮。敌人已经被拦阻住了，而且在某部分战线上还被打了回去。当柯林
斯将军去视察第八军的时候，他在1月17日报告说，该军阵容良好，而且天天在改进中。中国人由于补给线太长，显然已落到不能有效地进行作战的地步。

柯林斯将军和范登堡将军视察远东的另一结果是，他们报告说，麦克阿瑟将军说，除非俄国插手干涉，看来只要我国整个民族利益需要，我们现在就可以在朝鲜继续打下去，而又不会使第八军遭受严重的危险。

柯林斯将军和范登堡将军回国后向我作了报告，告诉我他们在那里所看到的情况以及他们与麦克阿瑟的谈话。我听了他们的报告，心里就安心得了，但是局势还远不能令人高枕无忧。1月18日，情报透露，敌人在朝鲜可能重新纠集起来，这意味着可能发动新的攻势。同一报告还谈到共产党越来越注意日本。在中国南部有军事活动，这可能是即将进攻香港的迹象。这一切可能意味着北平准备在各个方面进行主要突击。

从朝鲜的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我总认为这是俄国人的策略，是克里姆林宫破坏自由世界的团结的一部分计划。俄国人知道，只有美国参加欧洲防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才能成功。不让我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尽我们的一份力量的最方便办法是把我们拉进亚洲的军事冲突中。我们无法拒绝给亚洲共产党侵略的牺牲者以军事援助，除非我们愿意让其他国家由于害怕侵略而转向苏联阵营中去，他们是无法单独抗拒侵略的。与此同时，这就可以在世界上削弱我们的力量，这当然也是俄国的目的。

我们的政策是保持我们在亚洲的地位，促进欧洲的防务和团结，并使美国有所准备。就我当时的看法以及我今天的看法来说，这三个目的是彼此相依赖的，如果我们不努力达到政策的整个三个部分，其中的一个也就不能获得。

1月底，法国总理普利文先生访问华盛顿时，我曾借此机会表
明我的立场。我与他会谈了三次，第一次专谈亚洲问题。

普利文跟我谈了印度支那的局势，法国人从1946年以来一直在那里与共产党匪徒作战。在他谈完之后，我告诉他说，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承认北平的共产党政权，又说我深信共产党之所以向南朝鲜进军是因为他们害怕西方国家在远东的进展。日本有了真正的进展。大韩民国的进展也很大。法国人自己也一直在印度支那取得进展。苏联人正企图以进攻南朝鲜来抵消我们在远东所已获得的一切成就。更重要的是，他们正企图粉碎我们的整个计划。

我确切地告诉普利文先生，美国的政策是建立在这样的前题下的，我们所努力谋求的世界和平是不能分割的，只有集体安全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我们愿意和中国人进行谈判来恢复朝鲜的和平，但是却不能牺牲集体安全和民族自尊。

当然，在总统所确定的概括性的政策目的与必须以日常事务为基础而拟订的政策的实施细节之间是有距离的。关于这些实施细节，通常是有点分歧的。有时，实施细节的比重增加了，以致总统必须作出决定，但即使把问题提交给总统以前，一般都要交换过许多次意见，开过许多次会，研究过许多文件，等等。在1951年最初几个月的整个期间内，国防部和国务院官员再开会计划可以在朝鲜和亚洲普遍采取的行动方案。

3月间，当战斗的浪头开始转转的时候，国防部和国务院双方的官员都赞成对已谈判的停战求求新的途径。他们的推论是：既然我们已能使中国人蒙受重大的伤亡，并且正将他们赶回和赶过三八线去，那末，首先，停止战斗现在对他们是至少跟对我们同样有利；其次，侵略者已大部分被赶出了韩国的领土。

国务院草拟了一个声明，他们建议应该由我发表。3月19日，国务卿艾奇逊、马歇尔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开了一个会，讨论这个声明草稿。他们还同意通知麦克阿瑟将军，说总统将发表声明，
要他提出建言。

我正好结束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小白宫的短期休假，在那里我与艾奇逊和马歇尔经常保持联系。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执行前一天所同意的事，给麦克阿瑟将军拍去了这样的电报：

“国务院正草拟一个总统声明，要点如下：联合国已肃清了南朝鲜大部分地区的侵略者，现在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联合国又有这样的情绪，认为在大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以前，应进一步作外交上的努力，以便取得和解。这就需要时间来判断外交上的反应，并等待新的谈判的发展。鉴于三八线并没有军事意义，国务院已同过参联会会议，你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才能在以后的几星期内取得充分的行动自由，以便保证联合国部队的安全并与敌人保持接触。希望你表示意见。”

第二天，麦克阿瑟将军在他的回电中建议对他的指挥权不再加以限制。他指出，以他所统率的军队，在对他所加的限制下采取军事行动，要他肃清北朝鲜的敌人是实际行不通的。为此，他感到他现有的指令很适用于当时的局面。

在接到麦克阿瑟的回电以后，参联会会议又和国防部与国务院开会，进一步确定了提议中的总统声明的细节。此外，国务院官员还与出兵朝鲜的其他国家驻华盛顿代表会商，为的是征得他们对提议中的总统声明草稿的同意。

声明的草稿如下：

“我作为政府的行政首长，应联合国的请求，在朝鲜行使统一的指挥权，并在与提供战斗部队支持联合国在朝鲜的行动的联合国各国政府充分协商之后，发表如下声明。

“联合国在朝鲜的军队正从事击退向大韩民国和联合国而发动的侵略行为。

“侵略者遭受重大的损失之后，已被逐回去年6月最初发动非
法进攻的地区附近去了。

“有待解决的问题是按照1950年6月27日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所提出的条件来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与原则要求尽一切努力来阻止战争的蔓延，并避免苦难的延长与生命的损失。

“这里有一个在该地区恢复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它应该是一切衷心希望和平的国家所能接受的。

“联合国统一指挥部准备履行能终止战争并保证不再发生战争的部署。这种部署能为解决朝鲜问题开辟更宽阔的道路，其中包括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联合国已宣布这个世界组织的政策是：允许朝鲜人民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国家。

“朝鲜人民有权享有和平。他们有权利按自己的选择，适应自己的需要，来决定自己的政治以及其他制度。

“朝鲜人民有权获得世界组织的援助以医治战争的创伤。联合国已准备给予这种援助，并为此设立了必要的机构。联合国会员国已提出要给予慷慨的援助。目前需要的是和平，在和平的情况下，联合国才能把它的资源用在创造性的重建事业上去。

“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在朝鲜对联合国的人对原来可以而且仍然可以为朝鲜带来和平解决的许多机会很少加以理会。

“迅速解决朝鲜问题就能大大地减轻远东的国际紧张局势，并能开辟道路，按照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来考虑这一地区的其他问题。

“在未达成令人满意的结束战斗的部署以前，联合国的军事行动必须继续下去。”

发表这一声明的用意是，不惜任何威胁或谴责而愿意取得和平解决的提議也许会得到良好的反应。

514
不幸得很，我们的周密准备竟枉费心机。8月24日，麦克阿瑟将军发表了一项声明，它与我所准备发表的声明完全背道而驰，结果是如果我发表那项经过密密谋的声明，就只能引起世界的混乱。因此，我们为取得其他国家政府的同意而花去的许多时间以及许多外交家和国防领袖们的详尽讨论全都付诸流水了。

麦克阿瑟将军的声明是这样说的：

“战事仍按照预定的日程与计划进行中。现在我们已大体上肃清了共产党在南朝鲜的有组织的军队。愈来愈明显，我们昼夜不停的大规模海空袭击已使敌人补给线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将使敌方前线部队无法获得足以维持战斗的必需品。我们的地面部队正出色地利用这一弱点。敌人的海上战术已无异于失败了，因为我们的部队已经尔作这种形式的战斗。敌人的渗透战术只能加重他们的被零星消灭的损失。敌人的持久力在气候、地形与战斗的困难条件下显得不如我们的部队。

“比我们在战术上的成功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事实已清楚地表明，这个新敌人——赤色中国——的军事力量被过分地渲染和夸大了。它缺乏工业能力，无法充分供应进行现代战争所必需的许多重要物资。它缺乏工业基地，甚至连建立、维持和运用普通海空军所需要的原料也感缺乏。它无法供应顺利进行地面战斗所必需的装备，例如坦克、重炮和在战争中已被使用的其他科学发明。从前，他在人数上的巨大潜力很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但是，随着现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方法的发展，人数上的优势已不能抵偿这些缺陷所固有的弱点。制海权和制空权在当前的重要性及其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并不逊于过去，有了制海和制空权就有了对补给，交通与运输的控制权。由于这种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再加上敌人在地面火力方面的劣势结果就形成战斗力的悬殊，而这种悬殊决不是勇气（不管它是多么疯狂）或完全不顾生命的损失所能克服

515
的。

“自从赤色中国加入朝鲜的不宜而战的战争以来，这些军事弱点就已清楚而明确地暴露出来了。联合国部队目前是在联合国当局的监督下进行作战的，因而相应地使赤色中国得到了军事优势，即使是这样，事实还是表明，赤色中国完全不能以武力征服朝鲜。因此，敌人现在必然会痛苦地认识到，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容忍决定，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部基地，那么，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确认了这些基本事实以后，如果朝鲜问题能够按它本身的是非加以解决，而不受与朝鲜无直接关系的问题（如福摩萨问题或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的影响，则在朝鲜问题上作出决定并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绝不能牺牲已受到极其残酷蹂躏的朝鲜国家和人民。这是一个关系至为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军事方面的结局得在战斗中解决，但除此之外，基本的问题仍然是政治性的，必须在外交方面寻求答案。不用说，在我作为军事司令官的权限以内，我准备随时和敌军司令员在战场上举行会谈，诚挚地努力寻求不再继续流血而实现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的任何军事途径，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反对的。”

联合国的一位军事司令官自作主张地发出这样一个声明是极不平常的事。这是完全漠视不许发表有关对外政策的任何声明的所有指令的行为。这是对我作为总统和最高统帅而发布的命令的公然违抗。这是对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的挑战。这也是对联合国政策的藐视。

由于这一行动，麦克阿瑟已使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再也不能容忍他的这种不服从领导的行为。

实际上，麦克阿瑟的举动等于用最后通牒来威胁敌人，等于说
盟国的全部优势力量可以用来攻击赤色中国。当然，他说这得有待政治当局去决定，但考虑到他是高级负责人，全世界人民会认为他事先获得消息，知道会作出这样的决定。

在我们的盟友中果然马上就发生了这样的影响。世界各地的首都所发出询问的电报纷至沓来：这是什么意思？美国的政策难道要改变了么？

事情所牵连到的不单单是美国总统所要发表的已准备好的声明的命运而已，甚至也不只是这一“檄文”所引起的外交界的怒潮而已：挪威大使向国务院询问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称它为“檄文”。更重要得多的是，麦克阿瑟将军又一次公然反抗他的统帅——美国总统的政策。

当天（星期六）中午，我和艾奇逊、罗维特与腊斯克开了一个会，重新看了12月6日发给麦克阿瑟的这道命令，其中要求一切公开发表的声明应经有关部门予以审核。我问其他的人这一命令的意思是否有任何模糊不清的地方，他们都同意这是一道极为明确的命令。

我要罗维特先给麦克阿瑟将军拍封电报去，提醒他在这道命令下所负的责任，因为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阻止这位将军再发表声明。

麦克阿瑟将军在同一月份早些时候的一项声明中，也曾对总统的政策进行挑战。我是了解这个事实的。3月7日，他曾向新闻界发表一个声明，大意是除非我接受他的政策，否则就会发生“残酷的屠杀”。不过，他当时至少还承认，这不是由他作决定的事。可是，现在，由于他的声明，他已确实影响了政策的方向，而且再作这样的声明就只会带来巨大的损害。

于是参军长联席会议便向他发出下列电报：

517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麦克阿瑟专电

“总统指示你注意他于1950年12月6日发出的命令。鉴于1951年3月20日给你的情报，你以后的任何声明都必须符合12月6日的命令的规定。

“总统还指示，一旦共产党军事领袖要求停战，你应立即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这一事件请求报告。

“布莱德雷
“1951年3月24日”

我不得不说我大为震惊。我从来没有低估我跟麦克阿瑟相处的困难，我舞会后，我希望他会尊重总统的权力。然而，我力图设身处地为他着想，力图搞清楚他为什么要向政府交涉的权力最高权力挑战。

事实上，他的论点和建议过去始终是得到我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充分重视的，因为他们和我至少还尊敬这位将军的军事威望。但从11月以来，即从中国人进入朝鲜以来，他所发表一系列声明都暴露他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人。除非我们假定，对这位将军来说，要紧的是不让结束战斗的功劳落到别人头上，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最近这件事的发展。

我回想起亚伯拉罕·林肯尽力和麦克弄伦将军相处时所遇到的同样情况。卡尔·桑德伯格讲了一个关于林肯和麦克弄伦的关系的故事：那位将军对军事以外的一些问题不时发表政治声明，有人问林肯，他将如何对付麦克弄伦。这个故事说，林肯回答道：“没什么，但是这使我想起了一个人，他的马直踢后腿，还扭伤了他登在镫里的脚，于是这个人就对马说，‘要是你还继续踢下去，我可就要下马了。’”
林肯常常与麦克累伦大闹纠纷，不过当时的政策上的分歧和现在的刚好相反；林肯要麦克累伦进行攻击，而麦克累伦则按兵不动。这位将军对战争应该如何进行，甚至国家应该如何治理，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总统直接下令给麦克累伦，但这位将军却置之不理。半个国家都知道麦克累伦有政治野心，这正是反对林肯的人企图加以利用的一点。林肯很能忍耐，因为他的天生性格就是这样，但是到了最后他还是被迫解除了这位联邦军队的主要司令官的职权。虽然我对我和麦克阿瑟在相处上发生的事情，曾极为忧虑，但是我也认识到解除这位国家高级武官司令官的职权以外，我没有别的办法。

如果说我国宪法中有一个基本要素的话，那就是文职控制军人。政策是由选出来的政治官员来决定的，而不是由将领们来决定的。然而，麦克阿瑟将军却一再表示他不接受政府的政策。由于他一再公开发表的一些声明，他不但使我们的盟国对我们的政策的真正方向分辨不清，实际上他还用他的政策来反对总统的政策。

作为军人来说，麦克阿瑟将军一向是我所尊敬的，而且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我知道，我的任何行为都不足以改变他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杰出的军事人才的地位，而且我也完全没有意愿要贬低他的地位。我曾希望，而且也曾努力说服他，我要求他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可是，他有不同意见。他曾公开提出批评。如今他的行动终于破坏了他宣誓要效忠的政府及其盟国所共同决定的政策。如果我容忍他用这样方式来反对文职当局，我自己就会违背我要坚持和保卫宪法的誓言。

我始终相信文职控制军人是我们自由政府制度最强固的基础之一。我国人民有许多都是那些为了逃避军国主义的压迫而离开祖国的男男女女的后裔。在美国，我们有时没有给予军人和海员
以应有的尊敬，这对我们是有害的。但是，我们始终小心翼翼地保卫宪法的规定，防止军人从掌握权力的民选当局那里夺取政权。

常常有人指出，美国人民有选择军事上的英雄担任国家最高职位的倾向，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一种误解。诚然，我们曾选择像华盛顿、杰克逊、甚至格兰特这样的人物当我们的行政元首。但是在这三个人当中，只有格兰特是作为一个职业军人而培养起来的，而且他曾放弃自己的职业，只是在战争爆发时，才像成千上万的公民一样，回到军队里去。我们选择过在战时建立丰功伟绩的人，但是直到1952年为止，我们始终没有把任何一位毕生从事军职的人推选到白宫来。

我们一向是那么谨慎小心地不使军人超越其本分的一个理由是，军役系统的固有性质使军事司令官很少有（即使有的话）机会懂得做好公务所必需具备的谦恭的态度。选出的官員从不会忘记，——除非他是个笨蛋，——其他同样适当的人或条件更好的人也是很可能被选上的，何况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不相信最后决定下来的就是最好的选择。任何通过在我国进行的政治选拔程序而上台的人都了解，成功是一贯坚持原则和在适当的时机与地点作出适当调整的混合物。这里所指的调整，是指对环境而言不是指对原则的调整。

这些东西是一个军官在他的职业道路上很难学到的。支配他的思想的词汇是命令和服从，而这些词汇的军事定义却又不是共和国中通用的定义。

这就是我们的宪法为什么规定文职控制军人的原则。受到麦克阿瑟将军威胁的正是这一原则。我不相信，他有意地决定要抗拒文职控制军人的原则，但是他的行为的后果是使自由政府的这一基本原则受到了威胁。

我有责任采取措施。
在这个问题上我思想斗争了好几天之久，但是到了4月5日
我终于作出决定，因为这一天又发生了另一件意外的事。

这一天，众议院少数派领袖、众议员马丁在众议院宣读了麦克
阿瑟将军给他的一封信。马丁是一个孤立主义者，长期反对高瞻
远瞩的对外政策，3月初他曾写信给麦克阿瑟，除其他事情外，他
谈起不在朝鲜利用中国国民党的军队简直是愚蠢透顶的事。接着
他问这个看法是否和这位将军一致。

麦克阿瑟将军3月20日写的回信如下：
“8日来函附来了你在2月12日发表的演讲稿，至为感谢。
我以莫大的兴趣阅读了它，我看出，多少岁月消逝了，而你当年的
英风却丝毫未减。

“关于共产党中国在朝鲜参加对我们的作战而造成的局势，我的
看法和建议已极其详尽地呈交给华盛顿。总的说来，大家都知道
并了解这些意见；因为这些意见只是遵循传统的方式给暴力以最
大的还击而已。我们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你关于利用在福摩萨
的中国军队的意见既符合逻辑，也符合这个传统。

“有些人似乎不可思议地难以认识到，共产党阴谋家已选择亚
洲这个地方来着手征服世界，我们已经再战场上参加了由此所造
成的争端；他们难以认识到我们在这里是用武器为欧洲作战，而外
交家们则仍在那里进行舌战，而如果我们在亚洲输给了共产主义，
那么，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了，如果我们在这里赢得胜利，则欧
洲就很可能避免战争而维护了自由。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必须
赢得胜利。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这一封信的第二段本身就足以构成对现行国策的挑战了。麦克
阿瑟是完全知道不使用中国国民党军队的道理的。仅仅在八个多
月以前，他本人也是承认这一决定的好处的。后来，当他改变了他
的看法，并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时，我们又再度通知他，这是总统既
定政策的一部分。所以，在赞赏马丁先生的逻辑和传统立场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说我的政策是不合乎逻辑和违背传统的。

何况他信上所提到的传统——给暴力以最大的打击——除军事教科书之外，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当然，就运用军队来说，这是一条很明确的规定；但是这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毫不相干的。美国人民之所以获得很多的成就和崇高的地位，并不是由于使用武力，而是由于工业、创造和侠义的行为。

当然，麦克阿瑟信中的第三段才是真正的“绝妙高论”。我不了解这位将军通过什么情报路线而知道共产党人决定把力量集中在亚洲，更明确地说是集中在他的管辖区。也许他不知道遏制在伊朗、希腊和柏林的共产主义狂潮得花上多大的力量，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许他不知道克里姆林宫怎样在大力地想阻挡西欧联合战线的出现。当然，实际上，我1月13日的信已说明了，共产主义不但可能袭击亚洲，也可能袭击欧洲，并且说明了这就是我们没有能力扩大朝鲜冲突的一个理由。但是麦克阿瑟却对我们的外交努力加以轻蔑性的评价，最后竟至说出“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但是，胜利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正好像有的战争为的是正义，而有的则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错误的。

正如布赖德雷后来所说的：“要是把战争扩大到亚洲大陆的话，那么，这就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麦克阿瑟心目中的胜利是轰炸中国城市而取得的胜利，是把冲突扩大到整个中国而取得的胜利，这必然是错误的胜利。

对某些职业军人来说，胜利———单是战壕上的胜利———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目的。拿破仑在他倒霉的莫斯科战役中说，“在每一战战斗中，我都打败了他们，可是我还是毫无所得。”

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候终于到了。麦克阿瑟给众议员马丁的信
表明这位将军不但不同意政府的政策，而且还以公开不服从他的统帅的方式向这种政策挑战。

我要艾奇逊、马歇尔、布莱德雷和哈里曼于 4 月 6 日星期五上午跟我会商有关麦克阿瑟的行为问题。我公正地把问题提了出来。应该怎样来处理麦克阿瑟将军呢？我们就这一问题讨论了一个小时。每一个人都认为政府面临一个严重的处境。

哈里曼认为我早在两年以前就应该革掉麦克阿瑟的职务了。在 1949 年的春天，正如在 1948 年的情况一样，麦克阿瑟解释说，由于东京的事务紧迫，不能脱身回国，因而陆军部长肯尼思·罗斯耳就不得不迫地从华盛顿插手阻止麦克阿瑟批准日本国会的一个法案，因为这个法案与华盛顿政府当局所规定的占领军的经济政策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国防部长马歇尔劝告说，要谨慎从事，他希望多考虑一下。他认为，如果我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通过国会取得军事拨款就会发生困难。

布莱德雷将军完全从军纪的观点来看这一问题。在他看来，这显然是违抗命令的问题，理应解除这位将军的指挥权。然而，他希望与各参谋长商量一下，然后再提出最后的处理意见。

艾奇逊说，他认为应该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但是他认为在我行动之前，取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致意见是必要的。他劝告我，对这一问题要进行慎重的考虑，因为这是极重大的事。他又说，“如果您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就会引起您任总统期间的一场最剧烈的斗争。”

接着，我们就参加内阁定期举行的例会。当然，与会的人都就麦克阿瑟给马特的那封信表示了意见，但是大家都没有谈到如何处理麦克阿瑟的问题。内阁会议之后，艾奇逊、马歇尔、布莱德雷与哈里曼跟我一起回到我的办公室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523
我很小心，沒有流露出我已作出決定。散會以前，我提醒馬歇爾翻閱一下國防部檔案中過去兩年來和麥克阿瑟將軍往還的全部電報。接着我要他們四位第二天上午九點鐘仍到我这里有来。

第二天（4月7日星期六）上午，我們又在我的辦公室裏碰面。這次會議很短。馬歇爾將軍說，他已經看过了那些電報，又說他現在得出結論，麥克阿瑟早在兩年前就應該革職了。我要求布萊德雷將軍在星期一向我提出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最後意見。

4月8日星期日，我將艾奇遜叫到布萊德雷大廈來，我跟他進一步討論了這個局面。我告訴他，那天上午我已和斯奈德商量過。接着，我又告訴他，星期一在布萊德雷將軍向我報告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意见時，我將準備採取的行動。

星期一上午九點鐘，我又與馬歇爾、布萊德雷、艾奇遜和哈里曼碰面。布萊德雷報告說，星期日他召开了參謀長聯席會議，又說他和他們的一致意見是，應該解除麥克阿瑟將軍的職務。

馬歇爾將軍又一次肯定地說，他的結論也是這樣。哈里曼也重新說了他在星期五那天的意見。艾奇遜說他完全同意撤麥克阿瑟的職。

到这一时候，我才回答說，在麥克阿瑟將軍發表他的3月24日的聲明時，我已決定他必須下台。

接着，我指示布萊德雷將軍起草命令，解除麥克阿瑟將軍的各項職務，并由駐朝第八軍司令官李奇微中將接替麥克阿瑟的職務。我指示布萊德雷與国务卿艾奇遜商量一下，因為這與聯合國軍總司令的職務有關。

星期一下午三點一刻，同一批人带着起草好的命令到白宮來向我匯報，我在命令上簽了字。

大家決定命令由當時在朝鮮的陸軍部長佩斯轉交給麥克阿瑟。我們知道他在第八軍總部。我要艾奇遜通過穆聰把命令轉給
佩斯，并且要佩斯去东京，亲自将命令交給麦克阿瑟将军。

但是，我們的电报迟迟未能送达佩斯的手，这首先是由于发电时机械发生了故障，其次是由 于佩斯和李奇微将军在前线视察。

我要国务卿艾奇逊通知国会的领袖们，要他将我們对麦克阿瑟所采取的行动通知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叫杜勒斯去日本，向南日政府保证，司令部的撤换决不影响我們加速进行締结对日和约的政策。杜勒斯同意这样做。

然而，4月10日的晚间，布莱德雷将军匆匆地来到布莱尔大厦。他說，他听到消息已經泄露了出去，又說芝加哥的一家报纸明天上午就要刊登这一消息。这使我不得不改变原定的步骤。我当时决定，我們已无法讲客套，叫陆军部长佩斯亲自送达命令，只好用象解除其他军官职务的同样方式向麦克阿瑟将军下达命令。

在这些新的情況下，我觉得我不得不指示我的新闻秘书肯特在4月11日上午一点钟举行一次新闻記者特别招待会，这正是尽可能迅速地将原令略加改动而重新印出的时间。

新闻记者们都接到一系列文件，第一个文件便是我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的声明。

这项声明是这样說的；

“我深感遗憾地得出結論，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有关正式职守的问题上不能够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联合国的政策。鉴于美国宪法赋予我的特殊责任，以及联合国特别委托我的責任，我已决定更换远东的统帅。因此我免去麦克阿瑟的各项指挥权，并已任命李奇微中将接替他的职务。

“对于国家政策的各种問題进行充分而热烈的辯論是我国自由民主宪制制度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各军事司令官必须遵守按我国法律与宪法所规定的方式下达給他們的政策和指示，这
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在危急时期，这种考虑尤其必要。

“麦克阿瑟将军在历史上的地位已充分地确立了。国家应当
感谢他在担任艰巨任务期间，为国家作出的优异而卓越的贡献。
为此，我重申对于他的问题，我为我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深感遗憾。”

第二个文件是解职令的本文。这道命令通知麦克阿瑟将军他
的各项指挥权已被解除，并命令他把他的权力移交给李奇微将军。
另外还有一个文件命令李奇微将军接替麦克阿瑟将军过去所担任
的职务，并通知他沈佛里特中将已首途赴朝接替他的第八军指挥
官的职位。

这次也发表了一些关于背景资料的文件。其中有我的12月
6日关于澄清公开声明的命令。有关拟议中的总统声明致麦克阿
瑟的通知。有麦克阿瑟自己的反声明，接着便是关于发表声明的条
件的提示。致众议员马丁的信。1月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
瑟要他裁武装额外的韩国军队表示意见的电报以及他的1月6日
的回电。

最后两个文件之所以一并发表是由于当时又出现了麦克阿瑟
所发表的新声明。一家常常批评政府政策的期刊向麦克阿瑟提出
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之一是针对武装南朝鲜的问题而提出的。
这家杂志说，据悉，南朝鲜迫切地希望保卫自己而“华盛顿”却不给
他们武器。

事实上，大韩民国提出关于给予更多的武器的要求之所以遭
到拒绝，主要当然是由于麦克阿瑟将军在1月6日的电报中对这
个问题表示反对。但是，他竟告诉这家杂志说，这一问题所涉及的
事项是他力所不能及的，意思是说，如果事情由他决定的话，韩国
早就得到更多的武器了！
就我自己来说，这些文件已把事情说清楚了。美国人民仍在朝鲜面临着共产党的侵略，共产党的阴谋仍在欧洲和亚洲威胁着西方。4月11日晚上，我发表广播演说，重新向美国人民说明政府的政策。我解释我们要在朝鲜，为什么不能允许朝鲜的战事成为一场全面的战争。我宣称我们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解决的方针则是根据3月间所拟定但还没有发表的声明。我还解释为什么必须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

我告诉无线电广播的听众说：“自由国家已把它们的力量团结起来，尽力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

“如果共产主义的领袖们想挑起这场战争的话，那么，它是可能爆发的。但是，对于这场战争的爆发，我国和我国的盟友是不负责任的。”
第二十八章
朝鮮停戰談判

麦克阿瑟将军回到美国引起了感情冲动的浪潮和一大陣爭吵。我已料到这一点，这并沒有使我感到不痛快。事实上，我公开表示我认話這位将军到众議院演说，以及承认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军人的成就，是完全應該的。

然而，我对接着举行的在参議院軍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联席会议前的作证，却有完全不同的感觉。在这些所謂麦克阿瑟作证的会议上，结果并沒有产生什么东西可以给那些政府政策的批评者以多大的鼓动。恰恰相反，联合委员会得出结论说，国家的最高统帅完全有权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撤换军事司令官。事实上，只要宪法还得保持它的意义，他們就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結論。

但是，苏联领导人必然从这些証詞中得到极大的满足。委员会中的共和党人，除少数例外，利用这个机会在会议记录上記下了我们的战路计划的每一个細节。不對，我們會采取措施，从发表的记录上删除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片断。但是以委員会組織之大，所有其他参議員又都被邀请出席的，报纸一般都能找出记录中被删掉的是什么。

这一問題与我关系很大，于是我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考虑一下防止国家安全情報通过国会的泄露出去的问题。在5月2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我們花了一些時間討論這個問題，但是无论在这次會議上或在以后的任何时候，我們都沒有得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決办法。
当然，问题是国会西员和报纸都认为，而且是正确地认为，政府的事就是公众的事，因而也就是每个人的事。所谓“每个人”当然包括能看到国会记录、作证发言和委员会报告的每个人，而不是单指只能看到报纸的人。我們非常担心政府中的某些雇員可能泄露秘密，因而我們开除了、侮辱了一些人，只是因为怀疑有些人可能泄密，或是总有一天会一时失慎而泄漏机密。但是只要付出剪辑工作的代价，美国的敌人就能得到关于我們的计划和意图，甚至设施和装备的那些部分保密的资料。这些东西之得以公开发表是因为“人民有权知道”。

既然任何两个人对安全的需要与公众的利益两者之间的范围意见很可能大相径庭，美国的敌人只消设法掀起轩然大波，就会导致国会的调查。于是他也许不需什么额外的代价就能取得他所需要的一切情报。

在麦克阿瑟听证的会议期间，这种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在这段听证会期间，所发生的另一个问题是总统和他的顾问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布萊德雷将军忍受着委员会上大多数共和党委员的无礼质问，他婉言拒绝告诉参议员们对他和我在一次面谈中所交换的意见。他对参议员们说，如果他证实和说出他和他的总统的谈话，他就会破坏他作为一个顾问对总统的作用。

在这一问题上，我完全支持布萊德雷将军，因为这个问题所牵涉到的决不只是杜鲁门与布萊德雷两人的谈话而已。这是关于政府分权制的意义的一个基本问题。

制定我国宪法的那些人在规定政府明确地分为三个独立的部门的时候，是了解他们这样做的道理的。他们多半是有法学家素养的人，而且他们对从巴比伦到英国的政府演变的历史都有丰富的知识。他们深信这个新国家的政府应该是一个能够保护个人自由并让个人自由得以充分发展的政府。他們知道独裁甚至暴虐无道
政府是由于政府权力统一在一个人手里才出现的。他们所制定的制度的目的是防止野心家或“兵权在握的人”攫取政府的各种权力。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读过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联邦主义文选》，后者是汉密尔顿、麦迪逊和贾埃的论文选集，它详尽地阐述了宪法的用意何在。后来，我在夜晚研究法学的期间，读了一些布莱克斯通和柯克的著作，以及斯托里法官的《评论集》。有关这方面书籍的阅读以及有关历史和我国政府的研究，是我考虑我国宪法问题的基础。我国宪法是一个内容极为精辟的文献，每一个美国人对自己的祖国都负有义务，不仅要吸取宪法的字义，而且还要了解宪法所代表的伟大思想。

在我看来，其中最伟大的是关于公平审判的思想。我们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了这个思想，谁都不能被认为有罪，除非通过公平的法律程序证实他有罪。

其次，体现在我国宪法中的最重要的思想是，通过分权的办法，使政府的权力始终受到限制。这就是说，政府的三个部门——立法、司法和行政——必须小心翼翼地保卫着自己的地位。这种小心翼翼的防范是件好事情。在我当参议员时，我总是殷切地注意到国会的权利和特权得到维护。如果我曾担任过司法职位，我也一定会认为我有责任随时警惕，不使司法机构遭受任何可能的侵犯。作为总统，我有责任保护我所担任的职位——美国总统职务——的宪法地位。

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还没有和美国总统职务完全相像的职位。总统有很大的权力。但是这些权力必须加以保护使不受侵犯，正如国会必须关心国会的权利和特权一样。

当然，领导政府如今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你并不是在一个理论的空中楼阁里领导政府，而是要对付在各种困难局势下的
許多棘手的問題，而且還不容你有猶豫的餘地。只有重視實際的人才能領導政府。但是他們必須重視實際而又對政府應該體現的崇高價值有深刻的認識。

作为一个实际的前提，政府的行政部门和国会一样不能单独领导政府。总有一位议员在办事情时好像要控制行政部门的每一件事情一样，可是当行政责任落到他們肩上时，他們就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了。但是，却没有一位总统曾企图单独进行统治。每一位总统都知道而且必须知道，国会对财政的控制权一定要加以尊重。因而，总统，作为一个实际的前提，通常都倚重国会，把有关行政部门的各项工作的情报提供给国会。

然而，有一点很明显，每当行政方面断然拒绝向国会提供情报的时候，也正是行政方面感到国会侵犯了它的特权的时候。当然，国会希望尽可能地掌握事实。这多半是为了制訂立法时的正当理由，但有时候这只是为了要和总统为难，要他的好看，换句话说，这只是为了党派的政治原因。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时，总统的庄严责任是拒绝追查他的私人文件的要求。那怕是所謂的较弱的总统对于这种事也是不会容忍的。

我总是努力关心和维护我所担任的崇高职责的地位。没有顾问或是没有别人的建议（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总统就不能发表作用。但是只要总统一旦必须说明他听取了什么样的意见，誰告诉他些什么，或者是他保存什么样的记录材料，他所得到的意见就会毫无价值了。要顾问发挥作用，就必须使他們觉得，他們所说的或写的都将保守秘密；他们提供忠告的那个人或机关认识到，他們只是表示意见而已；而且他們也许并不是被邀表示意见或提出忠告的唯一的人。在作出决定之后，只要有人企图隐瞒这一决定，并要判断促成这一决定的意见或忠告是否“正确”，同时对提出不“正确”意见或忠告的人进行报复和批评，那么，唯一能产生明
智决定的独立思考就会受到阻碍或遭扼杀。

当某些参议员忙于想证明我使麦克阿瑟将军不能在战场上取得巨大的成就时，麦克阿瑟的继任者却在朝鲜出色地执行政府的政策。李奇微将军并不是一向都同意政府的政策或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的，可是他却小心翼翼地在执行命令。李奇微将军在日本抓得很紧而且有良好的效果。曾经有人预言日本会发生风波，因为日本人民已对麦克阿瑟将军有了信仰。但是，李奇微将军的沉着而有效率的作风保证了占领的顺利进展。这次人事上的更动向日本人民证明：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文职当局在军事当局之上，将领们不同于日本人的战时领袖，他们本身并不是法律，他们必须执行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的命令。

对李奇微将军的另一个初步考验是对韩国及其总统李承晚的关系问题。韩国政府曾再三要求供给它的各种青年团体以武器。我曾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我不同意我们武装实际上等于政治单位的团体，可是我曾要求他们研究为韩国建立一支更为有效的军队的长期计划的可能性。

李承晚总统曾要求供应武器，用以装备韩国军队的十个新师，但是李奇微将军提出反对意见。他作为第八军司令官的经验告诉他，在增加装备和供应以前，大韩民国首先必须改进领导。在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这一意见的报告中，他引用了4月28日范佛里特将军给他的一个电报。

这份电报说：“韩国军队的基本问题在于领导和训练，而不在于人力或装备。除极少数的情况外，普遍都缺乏领导。如果有充分受过训练的军官或军士，目前的部队中是需要他们的。除非上述缺陷得到弥补，允许组织和供应更多的部队只会浪费极端缺乏的装备和军需品。据估计，自朝鲜战争开始以来，韩国军队在装备上的损失已超过装备十个师所必需的东西；而且这还没有给敌方
以相等的损失，有时简直就不打仗，就把装备丢掉了。⋯⋯”

李奇微将军表示同意范佛里特的这一估计。两位将军都负责说服李承晚总统，这种缺乏领导的现象只有朝鲜自己的政府才能加以纠正。他们对他说，长治久安的解决办法需要建立一个原则性强、业务能力高的忠诚的军官团体。而这种团体并不存在，他们正在计划能产生这样效果的办法。他们还说，除非能形成令人满意的领导，一切关于扩大大韩民国军事力量和为这些部队提供更多的装备的进一步谈判不得不推迟。李承晚不大高兴，但是由于这种非常坦率的交换意见，结果很快就产生了一个训练计划，这个计划帮助建立了一支具有相当作战能力的韩国的军队。

不过，停战谈判的开始正是朝鲜局面的最重要的发展。

5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的“春季攻势”给打退了；总的说来，联合国军队都能坚守接近三八线的一道防线。6月里还进一步越过三八线，并短时间攻占北朝鲜首都平壤，但一般的战斗是轻微的。

6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发表声明说，“沿着接近三八线的地带停火就能达到击退对大韩民国侵略的联合国的目的。6月7日，国务卿艾奇逊也发表了一项类似的声明，这一声明是符合经我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的。在5月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开始有系统地讨论我们在这个目的；这一讨论一直继续到6月16日才结束。关于朝鲜问题，我们将政治目的（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朝鲜）和军事目的（击退侵略并按停战协定结束敌对行为）区分开来。在战斗停止后，我们的目的是，在北部边境以南适于防御和管理而又接近三八线的整个朝鲜地区，建立韩国的权力；为非朝鲜的武装部队撤出全朝鲜创造条件；以及建立韩国军队，以便制止或击退北朝鲜卷土重来的侵略。

这一政策并没有变更。在整个朝鲜问题的过程中，我始终相
信心，联合国可以而且应该证明，它不允许侵略者保持由于罪恶行为而取得的果实。但是，我从来没有使自己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正在坐在克里姆林宫里；或者忘记：只要这一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幕后拉线，我们就决不能将我们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

因此，一旦大韩民国的领土基本上肃清了侵略军，我们又重新强调我们愿意举行谈判，以期实现停战。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马立克终于在联合国的广播演说中表示，苏联政府认为朝鲜交战的双方应该开始谈判。两天以后，北平《人民日报》说，中国人民拥护马立克的和平建议。

这时，我正在田纳西州土拉霍马参加一个航空工程研究中心的落成典礼，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表示我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我国外交政策的某些想法。下面便是我当天下午所说的几句话：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曾尽最大的努力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我们这样做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因为保持我国安宁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维持世界和平。⋅⋅⋅⋅⋅⋅

“从来没有人对侵略者进行这样一系列的保障和平的积极措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防止世界大战爆发的屏障。

“当然，我们不能担保将来不会有世界大战。只要克里姆林宫愿意，它就能够掀起一场世界大战。它有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机器，它的统治者是一批专制的暴君。

“苏联统治者未来究竟怎样做，我们无法肯定。

“但是，我们能够使自己有资格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进攻，你们就会遭到自由国家的联合力量反击。如果你们进攻，你们就会面临一场你们不可能得胜的战争。⋅⋅⋅⋅⋅⋅

“克里姆林宫仍然在设法离间自由国家。克里姆林宫最怕的是自由世界的团结。
“苏联的统治者一直在设法分裂北大西洋公约国家。他们一直企图在我们和其他自由国家之间散布猜忌的种子。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拆散我们的盟友，并迫使我们‘单枪匹马地去干’。

“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就能够进而实行他们的计划，各个击破，以征服全世界。

“不幸的是，一直在设法离间我们和我们盟国的不仅仅是克里姆林宫而已。在我们国家里有些人正在企图使我们‘单枪匹马地去干’。⋯⋯

“抱有党派成见的人力图把我们的外交政策说成是‘姑息主义’，还给它加上‘恐惧’或‘胆怯’的按语。他们只指向一个目标，要使我们‘单枪匹马地去干’，走上通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道路。

“把世界上的自由国家团结在维持和平的伟大、统一的运动中，这难道是恐惧政策吗？在朝鲜打击武装侵略，并把它击退，这难道是姑息政策吗？

“当然不是，每一个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不是。

“请看看这些批评家提出的另外的办法吧。他们是这样说的：冒一下风险吧，把冲突扩大到亚洲大陆去；冒一下风险吧，最多不过丧失我们在欧洲的盟国；冒一下风险吧，说不定苏联不愿在远东作战；冒一下风险吧，也许我们会不致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们希望我们拿着顶上子弹的手枪，用美国的外交政策同俄国玩轮盘赌。⋯⋯

“在朝鲜和其他世界其他的地方，我们必须准备采取一切能够真正实现世界和平的步骤。我们必须像避免瘟疫一样地避免足以导致世界大战的不必要的冒险行动，或其他足以使侵略行为得逞的软弱行动。”

在同一篇演说中，我重复了我们愿意参加朝鲜和平解决的谈判，但是这必须是一个能使朝鲜人民重新得到和平与安全的真正
的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国务院训令驻莫斯科大使柯克就马立克的演说询问苏联政府的意见，苏联的答复证明马立克所表达的是苏联官方的意见。

国务院以及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之间举行了许许多次会议。这些会议的结果是我接到了一份建议书，它说我们的下一个步骤应该由李奇微将军发表一个声明，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司令员进行谈判。我批准了这个声明；于是6月29日（星期五）便把这项声明发表给远东美军总司令，并训令他在当日华盛顿时间下午六点钟将声明广播出去；

“总统训令你在东京夏季时间星期六上午八点钟将下列电报用无线电指示发给朝鲜共产党军队司令部，并同时向报纸发表：

“我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通知你们如下：

“我得知你们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一个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为及一切武装行动的停战，并附有维持此项停战的充分保证。

“在接到你们愿意举行这样一个会议的通知之后，我将指派我的代表。那时我将提出我方代表和你方代表会晤的日期。我提议这样的会议可在元山港内一只丹麦医院船上举行。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中将李奇微（签字）”

在这份电报之后，我们就可能举行的任何谈判的方式又给李奇微将军发去一些训令。这些公务同样是国务院和国防部共同拟定的。6月29日晚，布莱德雷将军带了一纸训令的草稿到《威廉斯堡号》游艇上来，我在那里研究了这个草稿，并批准了它。

这道训令撤消了从前关于停战条件的指令，并包括关于在李奇微和朝鲜共产党军队司令员进行谈判时作为指导的某些谈话的训令。其中有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536
“(一)在这次停战中，我們的主要軍事利益在于停止在朝鲜的冲突，保证制止战斗的再起和保卫联合国部队的安全。……

“(二)不論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对决定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停战部署的态度是否认真，或者他們是否准备同意訂立解决朝鲜問題的可以接受的永久性办法，我們都缺乏确切的保证。所以，在考虑停战时，纵使就政治問題和领土問題达成协议毫无进展，获致在相当长的时期內仍为我们所能接受的停战部署，也是具有极大意义的。

“(三)你和敌方部队司令員之間的谈判应严格限于军事問題；尤其不应进行关于最后解决朝鲜問題的谈判，或考虑与朝鲜問題无关的問題，如屈摩薩問題和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問題，这些問題必須由政府处理。……”

我训令李奇微在谈判立场上要极其谨慎小心，除非对方不接受我們最低限度的条件，否则不得让谈判破裂。

我又进一步向他发出训令，停战协议应限于朝鲜問題，而且严格地只限于其中的军事問題，不应该涉及任何政治或领土問題。

共产党司令員给李奇微电报的复文是7月1日由北平播出来的。他同意为“举行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談判”而进行会晤，并建議在三八線附近的开城地区作为談判地点。双方联络官于7月7日首次会談，7月10日代表团举行首次会議。

从第一次会議起，共产党人证明他們在阻挠和拖延談判的进行，直到符合他們的意图为止。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我們先后以海军中将乔埃和哈里逊将军为首的談判人员对他们的任务表现极大的耐心和毅力。正如过去从战场送来的报告一样，我每天接到有关和談實施中进行談判的全部情况的报告。重大的步骤都是經总统明确批准以后才决定的，甚至远东軍总司令或首席談判代表在重要关头所作的声明的措词也是这样。
我一再表明，如果停战谈判失败，必须使全世界人民都清楚地了解谈判的失败是由敌人造成的，而不是由我们这一方造成的。

李承晚时常发表声明说，他决不在一个不统一的朝鲜，这使谈判复杂化了，而是在11月到1月间谈判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这段时期还未过去以前，达成协议看来似乎是可能的。接着新的复杂的情况发生了。有些问题所牵涉的只是这样一些细小的问题，如应该用什么字样来称呼“朝鲜”。然而，最难于对付的问题是牵涉到遣返战俘的问题。

我们当然极其迫切地希望我们被俘人员能遣返回来。有许多传说和证据说明共产党人对俘虏采取不人道的待遇。共产党人拒绝红十字会观察俘虏营，虽然他们最后提供我们一张俘虏的名单。不过，这只有他们自己公开宣称他们所俘虏的战俘人数的六分之一，而他们却反而说联合国司令部所提供的名单不完全。

1952年1月1日，我方建议交换一切愿意遣返的战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最激烈的争论，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坚持我们不能让步。

共产主义是一个不尊重人类尊严或人类自由的制度。没有什么制度比这更不人道，没有什么制度比这更不民主，没有什么制度比这更不自由，没有什么制度比这更不平等，没有什么制度比这更不平等。我决不能抛弃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南朝鲜人和自由，现在也是这样，我拒绝同意规定违背战俘的意志而把他们送回共产党统治地区去的任何解决办法。1952年5月7日，我以官方的口吻发表一项公开声明表达了我的思想，其中有一句话丝毫不差地在文字上道破了我心中的想法：

“我们决不用遣返这些人供屠杀或奴役的办法来购买一个停战。”

就我来说，这决不是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问题！

下面是我声明的全文：
“(一) 美国完全同意并且毫无保留地支持李奇微将军向朝鲜的共产党侵略者提出的关于达成停战协议的建议。

“(二) 去年7月，联合国军击退了共产党在朝鲜的侵略，向共产党证明了侵略是不可能得逞的，并为全世界自由的人民带来了和平的新希望。接着苏联表示可以通过军事停战协议来停止朝鲜的敌对行动。联合国军司令部抱着为和平解决寻找基础的真诚愿望，开始在朝鲜同共产党进行停战谈判。

“(三) 经过许多曲折重重的谈判以后，除三个问题外，全部问题都获致初步协议；在谈判中，每个问题都是分别讨论解决的。现在很明显，剩下的三个问题是不能分别解决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建议为同时一致解决这三个问题提供了公平而确实的机会。这个包括三点意见的建议是：

“(1) 不能按共产党所坚持的强迫遣返战俘。同意强迫遣返战俘是不可想象的。这样做将违反基本的道义和人道原则，而这些原则是我们在朝鲜的行动的基础。用武力强迫遣返我们所拘留的战俘，会造成痛苦和流血，而使美国和联合国的名誉永受玷辱。

“我们决不用遣送这些人作屠杀或奴隶的办法来购买一个停战。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把那些表明坚决反对遣返共方的战俘分开时，极为慎重。我们已建议在停战后让公正人士对我们拘留的那些人重新进行询问。再也沒有比这种方法更公平的了。共产党坚持强迫把不愿受他们统治的人遣送回去，这向全世界骇人听闻地暴露了他们所实施的制度。

“(2) 联合国军将不坚持禁止重建或修复飞机场。

“(3) 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应由共方遴选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联合国军司令部遴选的瑞典、瑞士四国代表组成。

“(四) 李奇微将军建议中的三个部分是构成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一个整体，不是零散的东西。我们是否同意达成协议
要看他們是否接受整個建議而定。這就是我們的立場。共方迄今只表示願意撤回要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建議。这个假造的问题是他们在谈判的后期提出来的，撤回这个问题并不是他们的真正让步。

“（五）李奇微将军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談判代表表现了耐心和机智。他们不顾几乎不能忍受的挑衅，在达成停战的许多实质条款的協議方面获得了真正的进展。李奇微将军的建議是同时解决剩下的问题的明智办法。这个建議将使那些热望和平的人不能不表示同情。”

1951年秋天会議地点已从开城移到板門店。这一声明所谈到的建議是为调解会上显然存在的分歧意見的三点计划。

然而，共产党人对交换战俘問題依然拒绝作任何让步。他們想以他們所拘留的全部战俘交换我方所拘留的全部战俘。我明确地表示，我不同意进行任何战俘买卖，这可能造成把非共产党人强迫送回到共产党控制区去的后果。同意这样做不但是不人道的和悲惨的，而且也是可耻的，因为我们在战俘营中的調查证明，为我方所俘的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和北朝鲜人都不愿意在这样的情况下遣返回去。因而，我們建議交换所有願意遣返的人。

共产党的代理人为了达到控制战俘营的唯一目的，有意让自己被俘虏过来，他們在某些情况下，的确成功地建立了恐怖統治。然而，这並没有改变許多战俘的意志。只是因此而引起的騷乱却给我方司令官制造了很多的困难。

1952年5月远东軍司令換了人，當時我派李奇微将军去欧洲接替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职位出任盟軍駐欧洲的最高司令。为了接替李奇微，国防部推荐我們战时駐意大利的司令官馬克·克拉克将军，我批准了这一推荐。
克拉克将军的工作很不容易。几乎在他一接掌统率权时，就碰到巨济岛上战俘营里的棘手的局势，那里的共产党战俘党企图绑架主管战俘的美国将军。停战谈判似乎完全停顿了，但是共产党发言人南日将军坚持继续举行会议，在会上他长篇大论地发表宣传演说。李承晚总统和他的国民议会发生了争执，他宣布了戒严令，逮捕了他的一些政敌。

与此同时，北朝鲜的共产党力量已经加强了，克拉克将军不得不提出增加军队的问题。显然，自从1951年春天以来，我们已尽了很大的努力来改善韩国的军队，因为克拉克坚决主张扩充韩国的军队，他还再次提出国民党军团的支援问题，主张要蒋介石提供两个师。

我们在中国的军事顾问郑少将不赞成当时派蒋介石的任何部队去朝鲜。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仔细地研究了这一建议的军事利益，向国防部长建议，在他们看来，派中国国民党的部队去朝鲜是可取的。罗维特部长就这一问题和他所有的顾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不时向我报告讨论的进展。

国防部长对各种办法进行了慎重的研究。这些办法可以多少减轻两年来对朝鲜提供那么多战斗力的美国军队的负担。最后，发觉增派中国国民党的部队的利益是增加韩国部队所能取得的。没有事实足以说明从中国派出的两师中国军队（尽管他们部分受过训练的）会使1952年的朝鲜局面起重大的变化。

关于我们的朝鲜政策问题，与其说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倒不如说是我们不得不做什么。

我已相当详细地叙述了我们在朝鲜所采取的行动的一些事实，因为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在朝鲜所做的对全世界未来的和平将有深刻的影响。这是我作为总统不得不作出的最棘手的决定。我们在朝鲜的攻击中所碰到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兆头不祥的威
但除迅速的军事行动之外还有其他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这种侵略。因为我看抵御侵略就会引起生命的可怕的牺牲和深重的苦难。但是摆在我们和自由世界面前的只有一条路——抵抗，不抵抗就只有向共产党的帝国主义军事侵略投降。我相信，如果在朝鲜的侵略行为不加以制止，正如1930年在满洲③和1935年在埃塞俄比亚的侵略行为没有加以制止一样，全世界就必然会陷入另一次世界大战之中。

这是和希特勒在越过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境时在世界其他国家面前所夸耀的同样性质的挑战。自由世界当时没有迎击那一挑战，结果就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次，自由国家——联合国——迅速地意识到对世界和平的新威胁。联合国是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中产生的，建立的目的就在于阻止或对付侵略，不管侵略在甚地方有爆发的危险，或实际上已经爆发。

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能那样自发地，迅速地起而对付侵略。利用国际机构来对付那些凭借战争手段强把他们自己的意志或制度加在别国人民头上的人，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我们一开始就看，美国得承担主要的重担。由于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我们的力量，这是责无旁贷的。我们的盟国还在重建它们百孔千疮的国家，还在医治恢复缓慢的民众创伤。何况我们的大部分盟国在自己的边境上也可能遭遇共产党的侵略。

过去，有好几次，共产党人曾企图刺探，如果他们采取征服和扩张的行动，我们该怎么办。在伊朗、希腊、土耳其和柏林，他们都知道我们是不受威胁或欺骗的。但是在朝鲜问题以前，他们一直把他们的行动局限于颠覆活动、间接侵略、威吓和革命上。

③ 原文有误，此处应系指1931年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编者
在朝鲜，全世界面临了共产党人新的大胆的挑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共产党人在这里第一次公开地、狂妄地诉诸武力和侵略。

我们必须袖手旁观，让共产党帝国主义者认为他们可以随意进入朝鲜或其他地方。我们必须迎击这一挑战；事实上我们这样做。我们必须迎击这一挑战，使全世界不致卷入一场全面性的战争。这一点也做到了。
第二十九章
钢铁危机

1951年11月1日，美国联合钢铁工人工会宣布，当他们和钢铁制造商所签订的合同到1952年初到期时，他们就将要求改善某些工作条件和大幅度地增加工资。这是一系列事件的开端，最后，它迫使政府不得不出来接管全国的一些钢铁厂。

钢铁工人们的要求，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什么越轨的地方。朝鲜战争和国防计划的需要大大增加了钢铁工厂的营业数量，钢铁公司的利润上升了。朝鲜战争前三年，钢铁工业的平均利润是每吨六元五角九分美元。可是，1951年这个供应朝鲜战争需要物资的第一个整年头，纳税后的利润是每吨七元零七分美元。而当根据总统的要求和国会的授权，国防部给予它们以大量的定货，从这些大量定货来看，对钢铁制造商来说，1952年的情况如果不是更好的话，至少可望与以前一样好。

我们面临这样一种经济情况，工业的赚钱多了，而工厂里的工人却发现，生活费用的提高削弱了他们工资的购买力。食品和衣着以及类似的基本项目的价格上涨了。

可是，工资只是工会希望进行谈判的问题之一。工会和某些公司——特别是美国钢铁公司——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恶化了。纠纷是由于公司设法采用增产鼓励工资制而引起的。工人指控说，不管对不对，这个制度把他们当成机器一样来对待，他们对此感到愤慨。

我相信，许多好心肠的公民却没有认识到下列事实，即对工人
們說來，工會遠不止是一個爭取提高工資的工具。在這個機器時代，單個工人沒有多少機會使他感覺到他所做的工作是重要的。參加了工會的工人，像其他任何人一樣，希望感到自己是在取得某些成就。通過工會，他獲得了人類的尊嚴感，感到他與別人一道做了一些有意義的工作。這就是為什麼他要抗拒任何干預工會的行徑。

雇主压迫工会，雇主反对工会，原是有一段很长的历史的，这就难怪工人們一向认为，大多数雇主是想尽办法要扼杀工会，雇主通过一項变革所希望做到的任何事情都是旨在使它成为工会的催命符。工会反对增产鼓励工资制的原因之一是，它們把它看成是剝奪它們作为爭取工資的談判代理人的权利的一个工具。剝奪了它們这种权利，将会削弱甚至剝奪工會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我們的某些比較開明的工業懂得這種道理，發展了勞工方面和管理方面兩者之間的關係，結果取得了較大的效率。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管理和勞工之間的關係導致了和諧和彼此諒解，这对工人和公司兩方面都有利。但是，在某些工業中，工會主義却从来就沒有被全部接受。

1951年，钢铁工业声称，它不希望討論工会所提出的增加工資和改变工作条件的要求，工會方面則宣布，工人将在12月31日举行罢工。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公司方面拒绝和工会举行談判。也許他們认为，这是强行其是的大好机会。也許他們相信，国防計划的急迫需要将会把政府带进這場爭执之中，而在不改訂合同条件的情况下强迫继续进行生产。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国防部和国防生产机构的官员却怀着极为惶恐的心情看待这場迫在眉睫的罢工。国防部长罗伯特·罗維特几个月来一直向我指出，如果讓罢工阻碍了生产，那末国家防务计划将会受到危害。内阁中所有的成员都一致同意羅維特的看法，认为，如果允许我們的钢铁工厂关門，对于美國和朝鲜战争将都是有害的。这时我們不但要設法
使朝鲜和其他地方的武装部队得到充分的装备，而且我们还答应要给盟国以武器和弹药，而它们抵抗共产主义的决心，可能就要看我们能不能供应他们所迫切需要的武器。显然，如果钢铁工业发生罢工，我国的最高利益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12月22日，我向美国联合钢铁工人工会和公司之间的发生这种纠纷的工业局去解决。工会方面立即响应了这个行动，同意推迟罢工，以便生产不遭到中断。

在推迟罢工以后通过谈判求得解决办法的方面，我可以在国会提供的两个办法中选择一个。第一个办法引用塔夫脱一哈特莱法，该法案有一条关于八天禁止令的规定。而一些不理解情况的人所断言的相反，这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相反地，它规定了在罢工危害到国家的健康与安全的情况下，总统可以指定一个调查委员会来判断事实真相，并将报告提交报告。在收到了那个报告之后，总统可以指令司法部要求法院下令禁止罢工八天。在这一段期间内，调查委员会就设法求得一个解决办法。在第八天终了时，除非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否则罢工就可以合法地进行下去，这时总统必须向国会提出报告和建议。

另外一个办法是引用1950年的国防生产法，该法案宣称，“国会的意图是，为了提供有效的物价和稳定的工资……以及维持不间断的生产，必须有有效的处理办法来解决影响国家防务的劳工纠纷”。这一条规定授权总统提供类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时劳工局所采取的处理办法。

我秉承国会的指示办事，曾经设立了一个工资稳定局，并设成该局负有解决影响国家防务的劳工纠纷的职责。1951年，国会收到一份记录在案的详细报告，其中谈到该局如何起到了塔夫脱一哈特莱法中所规定的处理办法的替代作用。众议院曾打算提出一项动议，以便剥夺工资稳定局所具有的处理劳工纠纷的权利。可
是，这项动议被击败了，国会还竭尽全力来扩大国防生产法，使它包括一个用来处理劳工纠纷的代替办法。

在这两种办法中决定要选择其中之一时，我首先考虑了塔夫脱—哈特莱法。但是塔夫脱—哈特莱法基本上是为了解决和平时的劳工问题而设计的。而工资产定局却是特别为了解决与防务有关的劳工纠纷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三年中，它的这种职能还再一次被国会所肯定。我们所面临的这种形势使得我转向了工资产定局。

从1952年1月10日到2月26日，工资产定局举行了范围很大的意见听证会，并与各党进行了讨论。3月20日，该局交给了我一个报告。关于工资问题，它建议，应该给工会增加工资，增加的总数是每小时二角六分四厘美元，在十八个月内分成三个阶段来执行。这比工会所要求的要少些。在其他方面，工资产定局也削减了工会的要求。在某些方面，它建议完全拒绝工会的要求。把这个决定与工业界当前和未来可能赚得的收入相权衡，这项建议在我看来似乎是公平的和可行的。

国防动员署署长查尔斯·威尔逊在3月24日向我提出报告说，公司方面将断然拒绝建议中的解决方案。他说，在长期罢工之后，工业界将会进行抵制，防止工厂关门的唯一办法是批准公司方面所要求提高的价格。

为了防止这次全国性的危机，我并不反对合理地提高价格，这对补偿较高的工资成本，当我们在1946年遇到一次钢铁罢工时，专家们为我作了一次计算，它告诉我们，当时提议中的工资到底要增加到多少才会使产品成本上涨，提高价格就是根据那种计算来批准的。然而，根据目前这次情况中的数字来看，我感到钢铁公司所提出的提高价格的要求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对于国家来说，这次要求提得也不是时候。
工业界要求对所有的精制钢，不管其售价如何，一律全面提高价格。其实却是，钢铁的价格，从便宜的精制钢到特种钢和高级钢，其价格等级是相差很大的。对现行价格按美元来一次全面提高，其结果将会是，较低级的钢的价格按比例来说就提高得较多了一些，但是对那些生产出来以最高价格出售的钢的价格来说，那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我认为，采取这种全面提高价格的方式求补偿提高了的成本，并不是一个好办法。

钢铁公司的利润在不断增长。国家则在征服它的目的前往战场作战，我认为，军火制造商和他们的原料生产商不应该利用这个紧急时刻坚持要获得超额利润。在我看来，公司方面态度似乎是错误的，因为，在加速进行国防计划的情况下，政府就是钢铁和钢铁制品的最大的主顾。在个时刻提高价格，那就意味着在国防工具上向政府索取更多的钱。

当然，我理解到，工资的任何提高都意味着增加产品的成本，但是，在未能证明由于工资的增长而必须按照一个划一的数字来使价格表上的价格全面上升的情况下，我可不愿意让我自己承担核准这一数字的责任。

在我国的高技术化的经济中，钢铁是如此之重要，以致其价格有任何细微的上涨就立即会引起一大串货物——从冰箱和汽车直到罐头和发夹——的价格上涨。钢铁价格不成比例的上涨将会起一种引起通货膨胀的作用。由于这个缘故，我认为，只有钢铁工业所担负的生产成本超过了其正常的数额，我才有理由同意提高钢铁价格。然而，这一次，钢铁工业却极力想要取得比其应得的利润还要高得多的好处，並且使政府吃亏。

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威尔逊竟把考虑到一次价格调整，以补偿实际增加了的成本这个意愿，解释为答应满足公司方面的全部要求。当我纠正他的解释，指出他的错误时，他便辞职了。
現在已很明显，要找出一項解決辦法是很困難的。

人們開始舉行一連串的會議和商討，我的助手、解決勞工問題的能手約翰·斯蒂爾曼，在他的辦公室里和勞、資和政府方面的團體和個人舉行各種會議。會議的參加者將他們的談話內容報告給我，並征詢關於某些問題的意見或決定，但沒有取得什麼進展。4月9日，工會宣布它們將舉行反對鋼鐵公司的罷工。

我又把我的一些主要顧問召集來商談，以決定採取什麼步驟对付這次緊急事件。國防部長羅維特強調說，鋼鐵生產的任何停工，甚至是極短時期的停工，都會增加我們在軍備計劃的“加緊生產制”中所承擔的風險。他还指出，我們三軍中整個的作戰效能，就是依靠充分利用我們的工業設備。在着重要到朝鮮的情勢時，他說，“我們現在是用彈藥而不是以我們軍隊的生命來守住這條的。”他警告說，鋼鐵生產有任何縮減，都將危及我們作戰人員的生命。

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戈登·迪安對於因缺乏鋼鐵而會耽誤大力擴充原子武器生產設施一事，感到嚴重的關注。國家生產局局長亨利·福勒對我說，除了軍事裝備、原子能建設、動力工廠、鐵路建設、造船、工作母機制造等部門外，一切都將停頓下來，如果鋼鐵工廠關門的話。他指出，這就要看存貨的情況和制造业工廠的鋼鐵能維持多久；而某些作戰部門實際上手邊已無存貨。

電商部局長桑扎要我談到鋼鐵工廠關門對若干運輸計劃所產生的影響。他提出的數字表明，鋼鐵生產中斷十天將意味着損失九萬六千呎的橋樑和一千五百哩的公路。他報告說，萬一鋼鐵工廠關門，那麼正在美國造船廠里建造的九十八艘船，只有二十一艘能夠建成，另外三十九艘就不得不全部放棄。他對我談到對飛機生產將會有這樣的作用，以致譬如說康維爾和道格拉斯两家工廠將不得不在六十天以內停止它們的裝配線。危險的是，有些制造
厂商将等不到缺货开始，而是一旦钢铁生产停顿，就要关门。

内政部长奥克斯克尔·查普曼说，石油、煤气和用电部的设备维修和扩建都要依靠钢材。对于煤矿和炼焦炉，不但任何一个附件，而且主要用途也都需要钢。

我和迪安·艾奇逊的讨论，谈到这种威胁着要瘫痪我们的国防经济的冲击，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同世界其他各国的关系。根据共同防务援助计划，我们答应给我们的盟国以装备，我方如果有任何一点做不到，将会严重地损害他们对我们在在危急时期援助他们的能力的信心。俄国将会由于看到我们在重整军备方面减缓速度而感到高兴。我们甚至也不能忽视这样的可能性，即俄国认为我们因一次持续罢工而被削弱，以至招致他们作进一步的侵略，而且可能出现其他的“朝鲜”。

所有这一切呈现出一幅非常严重的景象。国会在进行辩论，并大谈其钢铁危机；我本来是欢迎国会有任何实际解决办法的。但光凭讨论还不够。我必须采取行动来制止这个危及国家安全的钢铁生产停工。除非最后几分钟的努力导致和解，我看不出有其他办法，只好由政府来下令接管钢铁工厂。

“政府接管”的说法听起来好像很可怕。有些人认为，接管意味着把私人财产充公或加以剥夺。但是所发生的真正情况是，政府只是对这些财产采取暂时保管的办法。原来在接管前负责管理工作的那些人则让他们代表政府继续做这些工厂和工场的管理工作。这样一来，政府就能有把握地做到使生产不致中断。

资方也好，劳方也好，谁都不愿意政府接管。他们是不会愿意的——当然不会愿意。政府方面也同样不愿意。最好是每个人、工方和资方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而不叫政府加以干涉。但是当他们走进了死胡同，危害到国家，像这次的情况一样，接管便是帮助他们获得解决办法的一个有效途径。
当我在白宫任职期间，政府部门的首脑常常劝我接管那些一定要罢工或以罢工相威胁的工业或工厂。但是除非在少数危急情况下，我是拒绝这样做的。我总是把接管当作一种最后的手段——只有在看来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阻止对国家利益的侵害，或者在必须保护整个国家的时代，总统才采取这种办法。

为了这个原因，我一直等到罢工开始前的最后一天的下午，才发布这个接管令。在那个最后的一天，我大部分时间是同斯蒂尔曼博士和商务部长索耶一起度过的。他们两位的工作将是监督被接管的工业。于是就在工厂预定要受到罢工打击的前几小时，我发布了第一零三四零号行政命令，接管钢铁工厂。同一天的傍晚稍后时分，我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国发表演说，说明采取这次行动的理由。

“如果钢铁生产陷于停顿”，我解释道，“我们将不得不停止制造直接运送到朝鲜前线的士兵手中去的子弹和炸弹。如果钢铁生产陷于停顿，我们将不得不削减和推迟原子能计划。如果钢铁生产陷于停顿，不久我们将不得不停止制造空军飞机用的发动机。

“我们的国家安全和争取和平的机会有赖于我们的国防生产。我们的国防生产则有赖于钢铁……

“我毫不怀疑地认为，如果我们的国防计划没有能实现，那末战争的危险和遭受敌人攻击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如果我不尽一切努力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那我便是不忠于我作为总统的责任。

“由于美国军队正在战场上与敌对垒，如果我没有能做到所需要做的一切，供应他们以保卫生存所需要的武器和弹药，那我便是没有履行我作为总统时的誓言。”

我宣布说，我已命令商务部长索耶接管钢铁工厂，要它继续
开工，并已指示斯蒂尔曼博士把钢铁公司和钢铁工人工会的代表都召开华盛顿来，重新再作一番努力，让他们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

我向美国人民回顾了导致这种局势的发展情况，并强调指出下列事实，即在平时期，集体谈判是解决工资和工作条件的适当办法，但是在这个国防建设时期，阻止物价飞速上涨乃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国会曾规定一个基本政策，每个人都必须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稍微牺牲个人的一点利益，而根据国会政策所制定出来的规章是公平的和公正的，而且也公平地和公正地应用于这次的事件。工会方面接受了这些规章，但是公司方面却没有接受。遗憾的是，公司方面采取了下列立场，除非他们能够在他们所要求的钢铁价格上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否则该工业就将停止生产。

我指出，这对整个物价稳定的计划的灾难性影响，如果答应钢铁价格作一次大幅度的提高的话，并且说明这如何会引起所有用钢铁制造的货物——从坦克到打蛋机——的价格上涨，这又如何为许多其他希望提高它们物价的工业树立了一个先例。“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对钢铁公司让步”，我说，“那你就得与稳定的物价告别了。如果我们向钢铁工业投降，那可怕的噩梦将会出现。物价将会在我们四周立即飞涨起来——不单单是用钢铁制造的东西的价格，而且我们购买的其他许多东西，包括牛奶、杂货和肉的价格也会上涨。”

我说明，国会让我在利用工资稳定局或塔夫脱一哈特莱法禁令两者之间选择一个办法；我决定从头到尾通过工资稳定局。结果，我们得到的是九十九天的生产而不是一项禁令所给予的八十天的生产。然而，国会既未选择向我提出建议，也未赋予我权力来运用这两种可供选择的办法，因此，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的境地，只有政府实行接管，才能阻止这种威胁性的关厂。我非常清楚地
表明，我无意让政府接管钢铁工厂的时间，丝毫超过为阻止关厂所
绝对必需的时间。但是根据我在总统时宣告要完成的职房，我认为，如果
没有别的办法来阻止钢铁生产停工，现在就无可避免地要
接管工厂。

第二天，我向国会提出一个咨文，说明我所采取的行动，我请
求国会为政府接管工厂的期限和条件规定特别立法。我在这个咨
文中说，我乐意执行国会针对这种情况而打括号订的任何政策，甚
至他们想取消我刚才采取的行动也行。我补充说，除非国会采取
行动，否则我自然必须负起我自己的责任。

在我看来，接管完全是在宪法赋予我的权力范围之内的，我是
据此而行事的。宪法规定，“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被赋与行政权
力”。这句话把一项非常重巨的权力加在一个有幸做了总统的
人的身上。他担任的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职位。肯定地说，这是
美利坚合众国所能赋与任何人的最大的信任。正因为赋与了这种权
力，才使得一个有思想活动的人受宠若惊。历史上有些人喜好权
力，喜好伴随权力而来的那种魔力。简单举几个人为例，如亚力山
大、凯撒、拿破仑就是如此。我却从来不这样。我所关心的，只
是对于那赋与我以权力的人民所应负的责任。我认为，总统的权力
应该为了人民的利益来使用。为了做到这一点，总统就必须运用
宪法所没有明文规定不让他使用的一切权力。

当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在国家安全处于危急的时刻行将发生
瘫痪这种危险时，那末，在我看来，总统明显的责任便是采
取步骤来保护国家。林肯有一次曾经问道，“一个政府是不是必然由于太
强硬而违反了其人民的自由权，还是由于太软弱而无法维持其生
存?”历史用林肯的行动记载了他的回答。

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相信政府既能是自由的也能
是坚强的。而且，我肯定地认为，需要有一个坚强的政府来维护人
民的自由权，只有一个自由政府才能具有这个确保其生存的力量。民主政府的精髓在于它是负责任的，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应接受并实行政府的这些责任——直到选民将它们交给另一个人为止——那时他的责任便是按照他所理解的为国家的最高利益而采取行动。

政府的这个责任——积极地增进国家的利益——沉重地落在总统的肩上，但是也落在国会的肩上。而国会应该采取一种否定的方针就不能履行其责任。国会对政府在紧急时期所采取的措施仅仅使用瘫痪的办法，是不能执行其宪法职能的。

我本来希望，国会将会以某种积极行动来回答我提出的报告，我是非常愿意忠实的执行国会所决定的一切政策的。但是，表现出来的唯一的行动似乎完全是否定性的。在参议院里，对第三补充拨款法案提出了一个附属，用以限制根据我的接管令对钢铁厂采取行动而拨出的那笔款子的用途。这是彻头彻尾地运用政治权力来进行一项拨款立法，这样的行动是我一向所反对的。参议院的这个行动促使我向作为参议院主席的副总统巴克莱写了下列一封信。

“我并不希望，”我写道，“妨碍国会所采取的行动，我很想请求国会——如果它采取行动的话——以一种符合其责任的态度，根据我国和整个自由世界所面临的危急形势而采取行动。……

“不管钢铁生产实质上停工多久，都会立即削弱我们在朝鲜的军队保卫自己以抵抗敌人进攻的能力。如果敌人今年春天在朝鲜发动另一次进攻，那末这次进攻的成败与否就全看我们是不是使我们的钢铁工厂一直在进行生产……

“我希望，国会在这个问题上所通过的任何立法，都会提供一种办法，从而使钢铁工厂能够保持持续不断的开工生产……”

我感到遗憾的是，参议院并没有答复我这封信。许多南方的
参议员同所有的共和党人——只有莫尔斯和朗格这两个共和党人除外——一道把这个附录写进了这个法案，但是国会却沒有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也没有拿出任何建设性的建议来对付这次危机。这是为什么，我就永远也弄不清楚了。

与此同时，斯蒂尔曼博士继续同代表劳资双方的谈判者举行会谈。国防部长罗維特在谈判者面前向他们着重地谈到了国防形势的严重性，并且指出了由于停止生产——不管共时间是多短——所带来的危险性。

钢铁公司对接管采取了猛烈的反击行动，紧接着在我向全国发表了演说的第二天，内地钢铁公司的总经理克拉伦斯·朗戴尔便开始作了一次广播和电报演说。公司方面现在向法院提出了控诉。

诉讼程序——最后到了最高法院——的第一阶段发生在4月29日，当时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区法院法官戴维·潘恩下命令要商务部长索耶把这些工厂交还给公司。可是，在第二天，上诉法院将这个命令拖延了一下，这样最高法院便可以就政府接管工厂的权利作出决定。

在潘恩宣布了他的命令之后，钢铁工人工会便停止了工作。但是当上诉法院接着发出了延期令时，工会便立即恢复了工作。公司和政府于是便要求最高法院审查法官潘恩作出的裁决，当高等法院在仔细考虑要不要和何时审理这个案件时，谈判在继续进行——多半是在约翰·斯蒂尔曼的办公室里——他们在寻求直接的解决纠纷的办法。

到了5月3日，美国钢铁公司的总经理和公司方面的主要代言人本·费勒斯同美国钢铁人工会的主席菲耳·墨萊（也是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主席）最后排除了某些主要的意见分歧的地方。约翰·斯蒂尔曼告诉我，能够有一次真正的机会来达成协议，这
还是第一次。但是，当白宫和劳资方面的谈判代表还在进行工作时，新闻发报机发出报道说，最高法院已经同意立即审理这个案件。这就突然中断了一切谈判。钢铁公司在那天的早晨已经表示愿意作重大的让步，而他们现在却退出一切谈判。如果最高法院大约迟二十四小时或四十八小时发出这个通知，那就很有可能达成了协议。

政府的起诉书是由助理检察长菲利普·珀耳曼在最高法院提出的，他是一个出色的律师和有献身精神的公仆。他巧妙地和强有力地提出了政府的控诉。

钢铁公司方面的代表是约翰·戴维斯，他是192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率领了一个由纽约、费拉特尔费亚、克利夫兰、匹兹堡和华盛顿的能力很强的公司法律顾问所组成的代表团。

这位助理检察长为美国政府提出了两方面的论据。第一，法院不应该受理他们的控诉，因为公司方面不管由于接管而可能遭受到什么损失，他们是有能力加以恢复的。第二，接管公司的财产是美国总统权力的一种合法运用。

据我看来，报纸在对待这次接管钢铁工厂的事件中所作的耸人听闻的报道和所表现的党派之见，在历史上是无出其右的。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要算在美国最高法院还没有裁决一个案件之前，美国报纸社论所进行的干涉。新闻报道和社论诋毁接管并煽动舆论，在法院本身正在听取双方论据的时候来左右和判定这次案件。钢铁公司买下了整版整版的广告栏，利用它们在全国报纸上对美国总统进行攻击。它们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来影响舆论，反对政府。

对政府来说，我的见解是，一旦案件到了法院，我再表示意见就不适宜了。我一向认为，我们的报纸有时对法院未加判决的事情就进行评论的这种做法，是影响一个法官判决案件的一种不道
德的企图。的确这样，在这次钢铁事件中，它们用尽了一切办法散布不正确的看法，渲染气氛。公司方面的公众关系专家巧妙地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工业界对价格的要求转移到莫须有的总统的不正常的和无前例的行为。

稍稍读过一点历史书的人就会知道，这种行动并不是罕见的事——过去，甚至在这个国家还没有发生什么真枪实弹的战争之前，政府就曾接管过受到罢工威胁的工厂。但是这些事实没有被提起，或者即使提起了，也很快地一笔带过，好像它们在目前是没有什么意义似的。

当然，我决不会隐瞒下列这个事实，即6月2日最高法院所宣布的裁决令我非常失望。我想最高法院院长文森的反对意见是完全对的，我肯定地认为，总有一天他的这个看法会被人公认为正确。

最高法院院长根据他自己的看法，对法院的多数派意见作了下列的评论：“多数派中六种主张所表示出来的意见分歧，没有参照权威性的先例，一再倚赖于先前的反对意见，完全忽视了表明紧急事件的严重性和接管的暂时性质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人们在肯定区法院的命令上是走了多么远。”

我不是律师，这种法律上的辩护还是由别人去管吧。但是作为一个门外汉、作为政府的一个官员和作为一个公民，我往往感到难以理解，法院怎么能这样对待像罗维特、查普曼和其他一些人的证词并完全不把它们放在眼里，而所有这些人都详细地说明了一次钢铁厂停工将会对国家带来严重的危险，他们的证词既没有遭到公司方面的反驳，也没有引起它们的争论。

我不禁想到，要是在法庭上有一个霍姆斯①，一个休斯②，一个

---

① 奥利弗·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1841—1935)，1902—1932年曾任美国最高法院陪审法官。
布伦代斯②或者一个斯通③,不知道将会作出怎样的裁决！

法院的裁决令于6月2日下午早些时候送到了我的办公室里。在三点钟以前,我便给商务部长索耶发出一个命令,要他遵照裁决令办事,把工厂交还给钢铁工业。下午四点半钟,在我的办公室里匆匆地召集了一次会议。国防部长罗维特和商务部长索耶一道出席了会议。新上任的司法部长詹姆斯·麦克格拉纳里也在座,同来的还有司法部副部长珀耳曼、劳工部长托宾和白宫的几位工作人员。我希望知道一下,这些顾问们根据法院的裁决将会提出什么样的行动方针。我们现在应该采取塔夫脱—哈特莱法的禁令吗?如果不采取的话,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想呢?我顺着坐序请每一个到会的人都谈谈他们的意见。只有一两个认为,我应该根据塔夫脱—哈特莱法开始采取行动。多数人认为,既已利用了工资稳定局,这条路对我就不再行得通了。也有人感到,最高法院的意见大大地加强了工业方面的谈判地位,以致要想从中调解,找到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比以前还要困难得多。

6月10日,我作了一步进一步的努力,要求制定法律,允许我接管那些一定要罢工的工厂。但是国会拒绝给予这个权力。整个国家的钢铁工厂都停下来了。

罢工持续了五十三天之久,只是到了劳资双方最后达成一项协议时才告结束。这是在答应提高钢铁价格之后才达成这项协议的。为了解决罢工问题,允許给公司方面每吨钢铁增加五元六角五分美元。

②查尔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 1862—1948),1930—1941年曾任美国最高法院院长。

③路易斯·布伦代斯(Louis Dembitz Brandeis, 1856—1941),1916—1939年曾任美国最高法院陪审推事。

④哈伦·斯通(Harlan Fiske Stone, 1872—1946),1942—1946年曾任美国最高法院院长。
我以一种不得已的心情批准了这次价格的提高，因为我确信这是错误的——正如同我在3月和4月拒绝批准时一样，那时提高物价就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最高法院已否定了政府管理工厂的权力，国会收回了我请求接管的权限。因此公司方面现在拥有一切有利条件。如果我们需要钢铁——我们需要迫切地需要——那就得依从工业所索取的价钱。

罢工在7月24日结束。六十万名钢铁工人吸闭了七星期以上。二万五千铁矿工人在那个时间内举行了一段时间的同情罢工。由于缺乏钢铁，汽车工业中有三十万工人遭到解雇。在这个时间内，每天的工资和生产损失估计为四千万美元。全部损失估计在二十亿美元以上！这还没有包括解决纠纷之后国家为防务努力而需要的钢铁和钢铁制品所付出的较高的价格计算在内。

当范佛里特将军于1958年3月从朝鲜回来时，他抱怨他看到他的军队在1952年夏天和初秋缺少某种类型的弹药。美国公众对于这一事实是不会感到惊异的。国防部长罗维特和国家生产局局长福勒在钢铁案件的证词中，曾经赌咒发誓地谈到，钢铁生产停工将会影响我们运送足够的军火到朝鲜前线去的能力。

我想，我们并没有因为钢铁厂关门而在朝鲜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这算是幸运的。从12月31日罢工首次爆发开始，直到6月2日的整整五个月，政府采取的行动成功地保持了生产。所赢得的这个时间是宝贵的。但是，不管律师们如何为之申诉，所损失的七星期是再也无法补偿的了。

不管最高法院的六位法官关于总统宪法权力的不同看法是什么意思，他总必须在国家危急的时刻采取行动。法官们说，只有当宣布战争或当国家遭到侵略时，总统才能拥有广泛的权力，这种说法是非常不现实的。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敌对行动不通过有礼貌地互换外交照会的方式就开始了。在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
之間以及軍事目標和平民禁区之間，已不再有什么显著的区别。我們也不能把經済事務和国防与安全問題截然分开。

在这个时期和时代，国家的防务不只是建立一支陆海空军。这是要动用整个国家资源的事。作为总司令和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总统，必須能够在任何时候采取行动，以应付任何对国家安全的突然威胁。一个賢明的总统永远是会同国会合作的，但是当国
会在发生危机时沒有采取行动或无力采取行动的时候，根据宪法，总统就必须运用他的权力来保卫国家。
第三十章

1952 年的总统选举

我之决心不再做 1952 年总统竞选的候选人，应回溯到 1949
年宣誓就职的那一天。当时我面对要再担任总统职务四年，我脑
子里一直在考虑我国和全世界所面临的许多重要问题。我想到自
己的未来，想到一个人应当就任总统多久和一个国家必须经常更
换领导的问题。现在我已确定决不再参加竞选。但我不能将这
个决定告诉其他任何人。一位总统，由于他的职务的性质，必须尽
可能地对这一决定保守秘密，直到最后的时刻。

在我就任总统一年多以后，于 1950 年 4 月 16 日在一个备忘
录里写下了我的想法和我的打算，并把它收了起来；

“我不是民主党代表大会提名的候选人。

“我第一次竞选公职是在 1922 年 1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我在军队里服务了二年，在参议院十年，担任参议院副议长和参
议院议长二个月又二十天。我担任公职有三十多年，就任美国总
统差不多整整两届。

“华盛顿、杰斐逊、门罗、麦迪逊、安德鲁·杰克逊和伍德罗·
威尔逊以及卡里文·柯立芝是就任两届总统的先例。只有格兰
特、西奥多·罗斯福和弗兰克林·罗斯福试图打破这个先例。弗
兰克林·罗斯福成功了。

“我认为，当八年的总统就够了，而且有时候，对任何担任这个
职务的人来说，都是吃不消的。

“权势有一种引诱力。它可以渗入人的血液，正如大家知道的

581
赌博和贪财有引诱力一样。"我国是一个共和国，是全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我愿意
这个国家继续是一个共和国。辛辛纳塔斯和华盛顿指出了这条道路。当罗马忘记了辛辛纳塔斯它就开始衰退。当们忘记华盛顿、杰斐逊和安德鲁·杰克逊这些人的榜样（所有这些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原是能够继续担任总统职务的），我们将开始走上独裁和
毁灭的道路。我知道，我能够再度当选，并能继续保持为弗兰克林·罗斯福所打破的旧的先例。但我决不这样做。今后这种先例
的延续，不应当靠宪法修改案，而应靠以在职的人的荣誉为基础
的惯例。

“虽然我可以辩解，我只做了一届总统，但为了重新建立这样
惯例，我不是一个候选人，我将不接受另一届的候选人提名。”

同年即1950年7月，我从基韦斯特的小白宫取出这一备忘录，并且念给我的白宫南部听众。反应是可以预期到的。他们的
情绪十分激动，并且表示了异议和失望。他们要求我不要把任何
这样的声明公布出去。但是我不打算这样做，到了适当的时刻我
就会公布出去。

我已决心不参加1952年的竞选，而我所关心的问题则是向人民
推荐一位合适的人做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我认为最合理
的、最适当的候选人是美国的最高法院院长弗雷德·文森。

文森在我国政府的所有三个部门里都有丰富的经验。在这方面，两党之中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的经历。他在好几届国会中
任职，在国会里他被认为是税务和另外一些问题的专家。他曾在
联邦高等法院任职。在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任命他负责稳定经
济的工作。后来他作为总统的助理进入白宫，负责管理战时经济

（1）第十八届国会提出这样的宪法修改案（现在是第二十次），但在未获这一备忘
录时，宪法修改案未获得足够票数的批准。
以及转入和平生产的重大工作。文森在我任内政府里担任财政部
长的职位又增添了他对内阁的经验。当最高法院的内部争执增长
时，我又要求弗雷德·文森以他的卓越的行政管理的才干协助我，
在最高法院院长斯通逝世后，我任命他为最高法院院长。

文森具有一种天赋的个人忠诚和政治忠诚，这在华盛顿上层
人士中是罕见的。在华盛顿，有些人争夺政治权益时常常背信弃
义。而文森就不这样。他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和感情不外露的爱
国者，他能够始终保持不渝地对个人和党表示忠诚。

当我在参议院他在众议院时，我对他并不十分了解，尽管当时
我们常常在政府工作或事务上打交道。只是当我进入白宫以后，我
才完全了解他，并且发展到对他很尊敬。我们紧密地一起合作。我
们发现我们都对历史有兴趣，我们对历史上的许多日期和地区有
争议，这些争议是通过事后的研究才解决的。文森精通现代的和
古代的历史。他经常阅读重要历史书籍，并一直与当前的出版物
保持接触。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既广又深。我回想起一件事情，这
件事情足以说明文森忠心耿耿地和专心一地地对待本职工作。当
我准备好去波茨坦与丘吉尔和斯大林会谈时，我要求文森和我一
同前往，在那里做我的助手。他拒绝了，他说：“总统先生，您就
要出国，而且您要离开国内数星期。我想我最好还是留在白宫本
职岗位上，以使日常工作不致中断。”

1960年夏，在我写完关于我决心不再竞选总统的备忘录以后，
我第一个向文森提出建议，希望他继我为总统候选人。但他拒绝
了。

1961年秋，我邀请文森到基韦斯特的小白宫来见我，在那个完
全秘密的地方，我重新和他谈起关于他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问
题。我向文森直率地指出他对美国总统的合理人选的理由。我
们交起了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最后他说，他将同文森夫人商谈一
下。每当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时，他总是同她商量。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亲密的夫妇。

文森回到华盛顿对我说，他同文森夫人商谈并慎重考虑以后，他仍然真地感到，并且在他的心目中认为，他不应当利用法院作为爬上总统职务的阶梯。针对这一点，我回答说，我知道有些人曾经利用过法院，查尔斯·休斯就曾利用过它，我看来，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没有什么错。在那次会谈后不久，并且在另外一次谈话以后——这一次是同文森夫人谈话——最高法院院长以身体健康为由，坚决地予以拒绝。我认为，如果文森真的作了总统，他将成为历届总统中评价较高的一个，但是很可能缩短他的寿命。

由于文森不愿意出来，就我来说，活动场所现在就很开阔了。我的助手和民主党重新向我施加压力，让我重新考虑参加1952年的竞选。但是我的回答仍然同以前一样，我的决心已定，我只能从其他地方去找总统候选人。

我开始从全国各个角落着手检查竞选的情况。寻找一位在气魄上、外表上和能力上都适宜的人来担任我国政府的最高职务，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从经验中知道，政府中正直的人通常是能够担负起他们的职务和责任的，尽管他们可能被认为是不适宜的。但是说到总统这一职务，则包含很多方面的考虑，虽然许多有资格的人可供选择，但这一次却没有一个是“必然的”选择对象。为了挑选一位最好的全面发展的候选人，使我想起伊利诺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我在6月8日写的备忘录如下：

“我已经说过，不要叫我担任第三届总统。我在1950年4月16日表达了这个意见。

“现在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位能接替并继续执行公平施政、第四点计划、合理就业、对农民实行平价政策并对消费者实行保护政策的人，民主党就能够从现在起一直得胜。
“目前，依我看来，伊利诺州州长有这样的背景并具备了所要求的条件，我想我应当和他谈谈。”

我喜欢史蒂文森的政治素养和从政经历。我个人很钦佩他。我喜欢他的坦率和他精力充沛地参加州长的竞选运动。他在那次竞选中表明他具有一套政治本领和政治“感”，他知道最完美的政治既要懂得管理业务也要有管理艺术，他懂得政治这道本领是执行我国政府形式的职能所不可缺少的。

特别重视史蒂文森作为许多机构首脑和内阁成员的特别助手对联邦政府所作的许多贡献。他在联合国和国务院的工作表明，他清楚地理解我国作为世界各国的领导和保卫和平的计划所担负责任的任务。

下面是我同史蒂文森州长谈话后所作的笔记的一部分。

“早在1952年1月，我曾邀请伊利诺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到布莱尔大厦来谈话。有一天晚上八点钟左右他来了。我们谈了一个多钟头。

“我对他说，我不准备再参加总统竞选，我认为他最适合担任总统职位。他出身于一个有政治传统的家庭，他的祖父母作为副总统和总统同格罗弗·克利夫兰一起参加1892年的竞选运动和选举。他的祖父还曾在1880年同温菲尔德·汉考克一起作过总统候选人。他曾任在国会里任职。

“艾德莱的父亲参加过伊利诺州政府的工作。艾德莱曾经在国务院和联合国为国家效力。他曾是伊利诺州的一位出色的州长。

“当我同他谈话时，我对他说到了我对总统职务的认识，它是怎样成为世界上最有力和最伟大的职务。我要求他担任这一职务，并对他说，如果他同意，他将被提名为候选人。我告诉他，一位白宫的总统一向控制着全国代表大会。我提醒他注意杰克逊、范布伦和波耳克。我谈到1912年的塔夫脱，1920年的威尔
逊，1928年的柯立芝和梅隆，1936年、1940年和1944年的罗斯福。但是他说：不！他显然被我弄得不知所措。……

“3月4日那一天，史蒂文森州长又来找我，这一次是他要求见我的。他对我说他已经在答复再度参加伊利诺州州长的竞选。他认为收回他的这个诺言是不正当的。我赞成他的看法，我尊重他这样做。他说他不希望人们认为他宣布重新参加他的大州的竞选，是为了取得进入白宫的阶梯。”

但是，我感到我在史蒂文森身上发现了他是我愿意将党的领袖的职务安全地交给他的一个人。他是民主党所需要的一种人，尽管我不能强迫他接受，但我确信他将理解到要把争取提名做候选人当作他的责任。

3月29日，在华盛顿首都国民警卫队军械库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杰斐逊—杰克逊纪念日午宴会上，我宣布我将不再参加竞选。

出席的民主党员将近五千三百人，我在讲话将结束时，离开了准备好的讲稿说：“我将不再参加竞选。我为国家服务的时间已够，而我认为我曾忠实而有效地为国效劳。我将不再接受候选人提名。我不认为在白宫再度过四年是我的责任。”

大厅里顿时之间鸦雀无声。随后不同意的喊叫声沸腾起来了，当我讲完话离开大厅时，不同意的叫声仍不断地传来。

当我知道这一决定后抵白宫时，我发现白宫侍者和看门人几乎要掉下泪来，而侍候我岳母的两个女仆正在哭泣。我劝他们安静下来，正常工作。

我预料到，当我的一些朋友突然听到宣布这一消息时，会引起失望甚至震惊。但我确信，他们想必会知道，我是经过长期的和仔细的考虑才作出这一决定的，而且一直等到我认为适当的时刻才向公众宣布。

担任总统这一崇高职位的人往往理解到，他之当上总统仅仅
是因为更多的人民渴望于他而不是渴望于别人。但是如果他根据围绕他周围的人来判断他的处境的话，他听到的一百个声音都将说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尽管其他所有的人都说他不是。一个总统，如果他想有清醒的看法和永不脱离实际，就必须从他四周的声音当中解脱出来，必须有自知之明，弄清楚他所得到的消息的可靠性。

无论如何，我是不可能再改变主意的，而且在这一点上，我甚至更加明确，在现时条件下，变换一下国家领导对于我、对于民主党和对于国家都有好处。

我倾向于认为，如果早在1950年或1951年我就宣布决定参加竞选，艾森豪威尔将军可能不会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或者不会当选为总统。我持有这种看法是因为我确认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相信他在竞选中没有对手，或许认为民主党也会提名他为候选人。

老实说，有许多贤明之士可以做民主党候选人。我很清楚地知道，历史上没有一个候选人能够得到执政党的提名，除非他得到白宫总统的支持。因此，我仔细地研究并考虑了每一个候选人。我和我的部分和顾问们讨论了他们的各项条件。我总是权衡当时的局势，我就愈清楚地认为，从经历、经验和才干来看，史蒂文森州长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

竞争提名候选人当中一位最能干最恰当的人物是阿弗里尔·哈里曼。他在政府服务的时间久而且工作出色。哈里曼在危急的大战期间和战后年代里在许多重要部门任职。他在伦敦经管租借法案的工作成绩显著。他担任驻苏大使和驻英大使的工作也很出色。在我的内阁中他是很能干的商务部长，在执行欧洲马歇尔计划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对哈里曼非常重视，过去这样，现在仍然这样，但是我感到，由于他在竞选政治上的有限经验，以
及由于他对竞选公职的活动毫无经验，他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有些受到限制。

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几个星期，哈里曼来见我，问我是否同意纽约代表提名他为候选人。我答复哈里曼说，他可以采取这一步骤，但是我对他讲，当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希望他能与大会提名采取一致行动，不管那个人是谁。有些党的领袖也来见我，问我他们是否能帮助哈里曼，我对他们说，当然他们可以这样做。美国其他某些地区的集团也愿意将哈里曼推举出来。我诚实地对哈里曼说，如果他和史蒂文森之间到了摊牌阶段时，我将支持史蒂文森，因为我认为史蒂文森是民主党目前能够提出的最强的候选人。哈里曼和我之间达成的这种谅解已落后于7月召开的代表大会的某些情势发展之后。

埃斯提斯·克弗维尔在竞选提名上展开了有力的和广泛的活动。他在众议院担任议员的经历和他在参议院的工作在许多方面都是得到赞扬的。我知道他的名声。我赞同他给他的调查委员会所提出的要求，但是我不赞同他所使用的方法和他着手进行工作的方式。

俄克拉荷马州的罗伯特·克尔是另一位讨人喜欢的候选人。他是一个有能力、勇敢顽强和精明强干的参议员。不幸的是，克尔提出的一项议案被我否决了，因为我认为该项议案对于公众不利。鲍勃·克尔已显示出，作为一名州长和一名参议员，他具有高度的行政管理和立法的才干。但是，根据我的看法，他在参议院内代表石油和煤气利益集团的经历，就使得他没有被选中的资格。我一直认为，任何一个人进入参议院或众议院去代表他本州的特殊利益，为了援助该特殊利益集团而首先提出立法案，这样的人就丧失了任何要求作为民主党全国领袖的资格。从历史上看，民主党不

(1) 罗伯特·克尔的昵称。——译者

568
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党。

佐治亚州的迪克·罗塞耳是一个可以考虑提名的候选人。他有才干，为人正直诚恳。他是参议院消息灵通的人士之一，可能对全国农业形势最为了解。作为一名参议员，罗塞耳往往能够以清楚和直接了当的方式提出问题，使得每个人都能理解。在麦克阿瑟委员会听证会举行时，他巧妙地掌握了会场。这件事表明他有作主席的才干，智慧和果断的气魄。但是由于他来自佐治亚州，那里的种族问题闹得很厉害，他没有得到提名的真正机会。我相信，如果罗塞耳是来自印第安纳州或密苏里州或肯塔基州，他很可能成为美国的总统。

当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日期临近时，艾德莱·史蒂文森仍然继续不预备全力以赴。他不叫我公开支持他提名作为候选人。在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弗兰克·麦金尼数次谈话后，史蒂文森州长仍然保持原来的态度。由于大会即将闭幕，因此民主党有必要另外决定一位强有力的候选人，并团结在他的周围。在这个场合副总统艾尔本·巴克萊起了关键性和戏剧性的作用。

巴克萊在人民中间，在党和国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如果不是由于他的年岁的缘故，他应当是一个最合理的候选人。由于总统的工作异常繁重，年岁这个问题是不容轻视忽视的。也许，由于巴克萊的体力和精力抵御了时间的作用，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适合于他的情况，但是这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

大概是在这个时候——大约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二周——巴克萊宣称他愿意成为总统候选人。我邀他参加白宫的一次会议，麦金尼主席和我的一些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上，我对巴克萊说，直到那时候为止史蒂文森一直拒绝参加竞选，如果他（巴克萊）真的要求提名，我们将支持他。
在 7 月 21 日芝加哥代表大会召开的那一天，巴克莱 如 约 前 往。但是，在一个主要方面，巴克莱没有按着我們 向他提出的建議 去做。在征得工会领袖的支持时，我們建議他每一次只和一位工会领袖会谈。可是，他没有接受这个劝告，他安排了一次与十六位工会领袖见面的午餐会。我們知道这些工会领袖从来不願聚在一起，这次会谈的结果是，工会领袖们一致拒绝。我的看法是，如果巴克莱接受一位善于同工会打交道的党的领导人的建議，工会的这种拒绝原本是不会发生的，而巴克莱就会成为民主党的总统提名候选人。

同一天下午，在同工会会谈失败后，巴克莱到华盛顿来見我。他对我說，他准备退出，不做候选人了。我劝他繼續竞选下去。但他說，他的夫人和他的支持者們建議他在目前情况下最好还是退出，他这次來見我的原因是想告訴我，他已将这一决定向报界公布了。我对巴克莱說，我了解他受到了工会领袖行动的挫伤，但我认为他目前仍是凭一时的任性而这样做的，如果他坚持要退出，把代表大会軒然撤下不管，他将来会感到后悔。

在同巴克莱談話后不久，我接見了商务部长查尔斯·索耶，他对我说，他认为在巴克莱还没有和代表大会见面以前就允许他离开芝加哥是不对的。我同意索耶的意见，并打电话給芝加哥的麦金尼，建议他让巴克莱出席代表大会作一次告别演说。这样安排好以后，7 月 23 日，艾尔本·巴克莱便由人陪同，到讲演台上接受全国政治性代表大会从未有过的最热烈的一次欢迎。

巴克莱的即席演說，是 1952 年代表大会的一次难忘的高潮。演說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是在这样集会上最生动最受人欢迎的演說之一。这是“副总统”最好的一次演說。我认为，这个演說是一位重要的候选人声明退出时所能做的最伟大和再好不过的表示。
但是这幅非常出色的图画被污染了，因为巴克萊突然允许除他的州以外其他州的三个代表提名他为候选人。他后来告诉我当时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尽管他告诉我他已经退出——人们已开始瞩目于他，代表大会好像会变成僵局，而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代表大会最后可能优先考虑提名他为候选人。但是，我对于他答应提名一事感到遗憾，因为他这样做破坏了他的精彩的告别演说。

第二天，7月24日，我在白宫收到史蒂文森州长打来的电话。他说他打电话来是为了问我，如果他答应被提名为候选人，是否会使我感到为难。我以激愤的口吻和强烈的词句回答了他。最后我对史蒂文森说，“自从1月份以来我就想方法使你说这样的话。这又怎么会使我感到为难呢?”

从那时候起，事情开始很快地向前发展，逐步形成的趋势是，代表大会将提名史蒂文森为候选人。

我发出命令命令我在密苏里州代表团中的代理人托马斯·加文，命令他支持伊利诺州的候选人。

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布里恩·麦克马洪，虽然重病垂危，但仍能在病中作了一些安排，以便随时了解代表大会的发展情况。他通知麦金尼和我说，当时机成熟时，他就以康涅狄格州的代表团出面支持，并且指示部下届时通知他，不管他自己的健康情况如何。就这样，第一个打破僵局的州是康涅狄格州，变成了史蒂文森的支持者。这一行动使优势开始转向史蒂文森，而我公开宣布加以支持，就确定了他被提名为候选人。

实际上，如果巴克萊没有退出的话，如果当他是我时没有把事情弄得不可挽回的话，我就不可能在后期对史蒂文森说支持他的話，而巴克萊就将成为民主党的总统提名候选人。

代表大会召开的第四天，帮助史蒂文森的竞选活动集中于……
他出来参加竞选，而他却勉强地、好不容易地才宣布他自己为总统提名候选人。

第五天，7月25日下午，我的夫人和我乘上《独立号》专机飞往芝加哥。该机的司机长威廉斯上校放置一架电视机在我的座舱内。一路上我们注视代表大会的进展情形，我们看到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和第三轮投票的开始。飞机抵达芝加哥机场的时间是下午三点三十分。芝加哥市长马丁·肖讷利和代表大会主席麦金尼到机场迎接，然后我们驱车来到黑白旅馆。

我在旅馆里看了我的一些朋友，然后着手准备我的演说，大约在早上一点四十分，我抵达国际剧场，并走进代表大会的大厅。代表大会曾在下午四点钟休息过，一直到代表大会重新开始并且在史蒂文森得到提名以后我才露面。

我同史蒂文森走到讲台口，将他介绍给代表大会，并保证说，“我将竭尽全力并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取得胜利。”

代表大会在史蒂文森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以后再次休会。这时候，萨姆·雷朋、史蒂文森、麦金尼和我退到大厅讲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内，商讨谁做史蒂文森的竞选伙伴。在作出决定前我离开了他们，但在离开前我提示了一下，认为亚拉巴马州的参议员约翰·斯巴克曼可能是最合适的人选。斯巴克曼在一致赞成的欢呼声中，没有经过投票就当选了，于是第三十一届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就此闭幕。

在竞选总统运动中，史蒂文森的演说才能果然名不虚传。他的确擅长讲演，因为他的语句能明确地指出我们时代主要问题的意义。他特别善于阐述我国对外政策。他从不发表煽惑性的演说，他不作超过限度的诺言。他从不含糊不清地讲述一件事情，而是一针见血。有些人认为他讲的话不可理解，其实他是个毫不妥协的人。他的竞选活动是一次伟大的竞选活动，为党和国家增
加了光彩。他没有迎合人民的弱点，而是正视了人民的长处。他从不以原则作交易以换取选票。他在南部说了什么，在北部地区也说了什么，在东部说了什么，在西部也说了什么。他的光荣之处在于，尽管反对党提出挑衅，但是他不卷入个人之间的争吵，也不进行攻击。

但是，史蒂文森对于他想继任总统的态度，使我有些时候感到困惑莫解。我认为史蒂文森犯了某些错误。产生的原因究竟是由于他的顾问们的专制或者是听到坏的报道，还是由于他染上了某些因友谊反对民主党报刊所传的传染病，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他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是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进行攻击，并且把他的竞选司令部移到伊利诺伊的斯普林菲尔德，这给人的印象是他在寻求同华盛顿的政府机关脱高联系或者是同我分离。我不知道，史蒂文森是怎样想的，他怎么能希望促使美国的选民同意保持民主党执政，而又似乎想与民主党的有权势的分子脱离关系。

不幸的是，史蒂文森在俄勒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一个问题时引用了一个记者的话，他说，他将清除“华盛顿时的污垢”。我怀疑他是接受了共和党的欺骗宣传，把我们华盛顿时窗户上常常留下的粪污夸大为一个大的污点或“污垢”。近几年来，共和党反对派曾企图制造一个案件来反对政府，但是它只发现政府对根除任何地方的贪污或恶习永远保持警惕。只要有人行贿，就必然有人大受。这在私人企业是实际情况，在公用或政府企业也是这样。这在工业、银行和联邦政府亦同样是实际情况。这种情况在政府要少得多。由于史蒂文森在俄勒冈的疏忽大意，使得共和党反对派在艾森豪威尔竞选运动中敢于进一步提出两个骗人的论点——贪污和朝鲜事件。
史蒂文森的竞选运动中另一个错误是，他拒绝同几个大的人口中心的民主党组织合作，没有适当地同这些组织打招呼。这使我感到吃惊。我曾经认为他之出任伊利诺州长是因为他具有现实的政治判断力。我曾想，他那位机敏的祖父一定给他注入了某些坚实的政治本能。

由于史蒂文森在一开始就同许多有影响的政治领袖保持疏远，他可能认为他获得了充分的行动自由。可是实际上，他却是没有必要地牺牲了基本的政治后盾，而且可能失掉几百万选票。我这样说过并不排除下列事实，即他获得了直到现在为止比任何其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得到更多的选民选票——弗兰克林·罗斯福在1936年所取得的压倒一切的伟大胜利的情况除外。

党的领导工作和党的政治斗争，并不仅仅是发表演讲，尽管演讲可能是精彩的。一位政治家很快地懂得，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演出，依靠政治家的帮助同依靠自己的才能同样重要。同其他人一样，史蒂文森现在知道，对许多人来说，政治是一种高度的组织工作，不是专于这一行的人要么必须很快地学会它，要么便是失败。我常常把政治的含意解释为管理的科学，可能是一门最主要的科学，因为它包括使人民生活在一起的艺术和能力。竞选官职或参加总统竞选只不过是政治的一部分。为了人民的最高利益尽职或处理公务是政治的实施。就我看来，我国两个主要大党的分歧之处在于，当共和党人在每次竞选中到下面去向人民讨好时，我们民主党人却永远和人民在一起，通过建立起政治组织同他们保持经常的联系。因此一个竞选任何官职的民主党候选人在，如果他不是由于某种正当原因而抛弃组织的支持的话，他的竞选活动通常总是进展得很顺利的。

1952年竞选中的另一个错误是在华盛顿和斯普林菲尔德之间很少合作或根本没有合作。实际上民主党开展了两个竞选运动，
因此重复和混乱时常发生。这种不幸的局面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我认为，史蒂文森要求我参加他的竞选时，时间似乎是太迟了。然而我还是尽快地投入，并且尽我的力量去做。我认为，史蒂文森先生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他在克利夫兰和其他城市，对于所谓政府中的共产党问题采取了守势。共和党内中的轻率的煽动家编织了一套当代最无耻的谎言。他们说民主党人对共产党太软弱了。共和党人利用恐惧和大欺骗的伎俩来恐吓我们的人民，在他们中间制造混乱。历史的事实是，民主党政府采取了经济和军事的措施，保卫了西方的文明免遭共产党的控制。

正是民主党政府揭发并判决了我国人人皆知的共产党阴谋家，民主党政府在这样做时，并未抛弃我们的人权法案而诉诸极权主义措施。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用保持充分就业和经济繁荣来巩固我们的经济，从而有助于打垮共产主义，在那里饥饿和恐慌威胁者自由的人民。

这样的成绩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所有美国人，不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都会理所当然地为我国在这一继续为世界民主而斗争的伟大时期中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

我认为史蒂文森是了解这些情况的，因为他，如同爱森豪威尔一样，参加了本届政府反共产主义的斗争，对任何把他列入反对共产党的行列的阴谋，他原本应当予以强烈的反抗的。他决不应当向卑鄙的煽动家让步，因为当政府同共产主义进行斗争时，他们当中许多人是畏缩不前的。

如果史蒂文森在 1952 年 1 月 30 日诚恳地接受我的建议，使我们能够适当地做好准备，我确信在芝加哥就谈不上有什么竞争，我认为他至少还可以多获得三百万选票。可能这不会使他获得足够的选票当选总统，但至少是可以谴责爱森豪威尔所进行的堕落
性宣传，并使他承认詹纳尔—麦卡锡的“大欺骗”。

这样说了以后，我想说清楚我赞赏史蒂文森作为民主党的领袖和总统候选人的理由是，他能够出色地说明主要的问题。他善于将民主党的原则用感人心弦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能力，使他赢得了好的名声，成为世界闻名的人物。我极端重视他的机智勇敢。面对共和党人发动的爱憎性竞选运动，能够公正地和坦率地谈话是需要有勇气的。史蒂文森尽管是失败了，但是在美国人民中间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感人的和高水平的竞选活动，为国家和党增添了光彩。

当然，史蒂文森遇到了享有盛名的而为共和党所利用的艾森豪威尔将军非常强烈的竞争。任何一个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不得不面临巨大的心理上的障碍——竞选的对手是一位闻名的军事上的英雄。某些共和党领袖认识到，他们不能靠塔夫脱参议员或其他老资格的共和党人来取得胜利。共和党，由于它是一个少数党，他们知道必须从民主党或其他无党派人士那里取得选票，以增强实力。他们获得实力的唯一希望是寻找一位候选人，这位候选人对选民的吸引力足以跨过党的界限。一位像艾森豪威尔这样的战争英雄，他的名气似乎为一个很少有成功希望的共和党集团提供了难得的政治资本。

在1948年和1952年，甚至有些民主党人，由于害怕在竞选中失败，也要求抓住这个人。重要的战争常常将某些军事人物提到显赫的地位，他的名声和他的军事技巧有助于建立民众的士气。这些人物的光彩很容易地跨过了党的界限。在艾森豪威尔宣布他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以前，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一直弄不清楚，他究竟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他被人们劝告说，他的名声在共和党内不会遭到任何反对。甚至有人这样鼓动他们说使他相信民主党也会一致提名他为候选人。这些顾问们显然不是代表共和党领
袖说话，当然更不代表民主党。随后在共和党领导中发生了一场艰苦的斗争，艾森豪威尔发现他自己已深深陷入政治泥潭中。他不得不利用杜威和布兰纳尔的策略和他个人的名声来赢得共和党的提名。

我们之中凡是知道艾森豪威尔在两届民主党政府下在军队里长期服务的人，都有理由相信，他将以不同于一般的条件参加竞选。他在反对极权主义国家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战争中和战后时期在重建西方国家的军事方面，担任了重要的职务。他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他的任务，无愧地赢得了盟国的感激之情。他有机会知道和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和我国正在做些什么。他协助两届政府贯彻重要的政策，并且在许多重要的决议上有充分的机会表现他自己。

当我们将他后来展开了这样的竞选，我们大吃一惊并感到失望。他容许了一次诽谤和歪曲事实的竞选运动，而这种诽谤和曲解连他自己也可能不相信是真的。这个运动大量地指控民主党政府贪污腐败。但是共和党执政二年却一直未能提出任何证据足以证明竞选时所进行的恶意诽谤是正当的，尽管他的司法部长进行了疯狂的调查。过去令人难以理解艾森豪威尔的地方现在清楚了，使我们感到很大震动的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竟被当作为政治游戏来玩要。当我们在朝鲜的斗争被盗用于党派政治目的时（而我们当时正同一个最顽固、最狡猾的敌人进行停战谈判），我感到我们无论在政治上或道义上都不能对此加以容忍。我能够理解某些孤立主义者利用朝鲜问题作为政治武器，但我永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位负责的军事人员，一位非常了解我们进行停止敌对行动谈判的极端微妙之处的人，会利用这一悲剧作政治上的便宜。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政治史册将载入这样的一章。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底特律市的演说中宣称，如果他当选，他将亲自访问朝鲜使战争停

577
下来。当他说明这话时，他一定会知道他是在削弱我們的谈判。他一定会知道，这样一种旅行即使能够取得什么成就的话，也是很小的。他也一定会知道，他的这种说法，使美国人相信在他当选以后，他将给他们带来和平。在新政府执政后，战争仍然进行了数月；而朝鲜的和平尚未取得争取。在我国国民中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有理由了解和有更好的机会去发现敌人的性质。任何人都无权利用这样一个危机为政治目的服务。

还有一些事情我也永远无法弄明白。当艾森豪威尔在威斯康星州进行竞选期间，他在密尔崔基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说，他被说服在演说中删去了一部分对他的从前的部长马歇尔将军表示赞扬的部分。艾森豪威尔同意删去这一部分的目的，是为了使参议员麦卡锡能够和他一起在讲台上出现。

我认为，由于艾森豪威尔在政治上没有经验，他这次是上当了。艾森豪威尔之所以从事疯狂的个人目的，是由于他发现，如果不竞争或不进行激烈的个人竞选活动，他可能得不到提名或总统职务。为了赢得提名，他必须紧紧追随肯塔夫脱展开剧烈攻击的代表们。随后，为了赢得当选，他还必须展开一个全面竞选活动。

艾森豪威尔将军获得了胜利。他获得全国有史以来比任何总统候选人所得到的票数都多的选票。但是，按比例来说，并没有接近弗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和1936年所得的多数票，或哈定在1920年、赫伯特·胡佛在1928年所得的票数。但是，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六千余万人参加投票的局面，甚至史蒂文森所得的票数也比罗斯福在1936年所得全部票数多十六万三千票。史蒂文森被击败了，对方多六百万票。

但是，富有戏剧性和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二千七百多万民主党党员不为这位军事英雄的魅力所惑，坚守他们的基本信念，投史蒂文森的票。
这次竞选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是由于艾森豪威尔的名声很大以及所采取的竞选方式这两种因素加起来的缘故，这促使千百万从来没有行使过投票权利和义务的选民出来投票。

如果没有这些首次参加投票的千百万选民的支持，我怀疑共和党人能否在参议院或众议院中取得胜利，甚至连这个勉强取得的微弱的多数也是不可能的。

史蒂文森和民主党是在没有进行狭隘的党派之争，和没有在国家处于危机状态以虚妄的希望为诱饵的情况下，取得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业绩的。
第三十一章

政权移交艾森豪威尔

1952年11月4日，我在吃早饭前，很早就到独立城的纪念堂去投了票。我在这个地方投票已经三十多年了。这里离我的家只有很短的一段路。但是这次投票在我来说却是一种新的体验。三十多年来，当我投票的时候，很少说在候选人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不是担任这项公职，便是担任那项公职。而这一次却是这种情况。我的夫人和玛格丽特同我一道走到投票站，我们想到了将来可以回到独立城我们的老家安安静静地过和平生活的愉快情景。

在投票以后，我们便立即搭上了开回华盛顿的总统专车。我把我的注意力转向公务。就像以前历次选举一样，选举运动一旦结束，我便不再去惦念它，也不作什么猜测。我按照往常的时间就寝，当时还只有一些关于各个地区选举结果的零星报道。

但是，甚至在我还没有就寝以前，我就料想到我们在这次选举中是失败了。

半夜时分，有人把我叫醒，他递给我一大叠关于各地选举结果的电报，我从上面看到，艾森豪威尔一定会获得这次选举的胜利。

我于是又转过身去睡了。我没有听说史蒂文森准备在选举中让步。第二天早晨的报道表明，艾森豪威尔以获得空前未有的大多数选民票赢得了胜利。

我感到失望，但我并不感到奇怪。当我研究那些关于选举结
果的报道时，我看到在国会选举中，整个选民的投票来说，还是以民主党这一边占多数，但是按选票的分配来说，就使得共和党占到微弱的多数并控制了国会。

在我们的全部历史中，要和一位身为战争中的英雄人物的军人开展政治斗争，总是存在着困难的。

在返回华盛顿的旅途中，我在弗吉尼亚州的马廷斯贝格站，从火车上拍给了艾森豪威尔如下一封电报：

“祝贺您获得大胜。1954年预算必须在1月15日前送交国会。初步数字已全部编制好，您应指派一名代表立即和预算局长会商。如您仍然想要前往朝鲜，《独立号》当归您使用。

“哈里·杜鲁门”

11月5日下午二时十七分，我在白宫收到下列电报：

“我非常感谢您拍给我的慷慨和多礼的电报。我将争取在两三日内作出安排，派遣我的私人代表来和预算局长会商。最令我感激的是，您提出应我使用《独立号》，但是请放心，三军中有谁能提供任何一架合适的运输机，便足以满足我计划中的朝鲜之行了。在取得您许可的情况下，我将把我授于的启程日期尽早地通知国防部长。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在收到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电报以后，我当天就拍给了他另一封电报，请他来白宫商讨关于如何有条不紊地办理新旧政府交接的问题。电文如下：

“谢谢您迅速和多礼的回电。我想您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即
我們必須有条不紊地来办理政府各行政部门的新旧交接事宜，特别是在我們这个国家和整个自由世界面临国际上的危险局势和问题的时候，更应当如此。因此，我邀请您在您认为方便的时候，尽早来自宫和我商讨关于这一过渡时期中的问题，以便全世界都知道，在维护自由与和平的斗争中，我们这个国家是团结一致的。

“哈里·杜鲁门”

在拍发这个电报以后，我便就选举事宜发表了一项公开的声明，同时宣布我已經邀请当选的总统前来白宮。声明如下：

“美国人民已经选举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为他们的总统。在我們的民主制度下，这就是我們决定由誰来统治我們的方式。我代表人民的意志接受这一决定，我將支持由人民所选出的政府。我也請求全体公民都这样做。

“新政府和新国会将面临极端困难的问题，特别是外交方面的問題。对于这些问题的正当处理，将可能关系到我們是否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而且，事实上，将关系到我們是否能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國家而生存下去的問題。同时，当前还没有什么能迅速和容易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求我们在未来的岁月中作出牺牲和进行艰苦的努力。我們必須支持我国政府为了维护我們的自由和实现世界和平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即使這将是一段漫长和艰苦的道路。

“我已随时准备尽我职权范围内的一切力量，协助政府各行政部门有条不紊地办理交接事宜。我已經拍电給艾森豪威尔将军，建議他派出一个代表来和预算局局长会商，以便使他能充分了解预算中的各个项目的情况。我必須把预算送交国会，因为根据法律，这项预算应在1月18日移交新政府。凡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希望移交給新政府的其他有关事宜，我們都将采取步骤，同他合作。
已邀請艾森豪威尔將軍尽早來白宮和我會晤，商討這些問題，以便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在維護自由與和平安定的鬥爭中，我國人民是團結一致的。

“在結束這項聲明之前，我還不得不向史蒂文森州長所進行的這次競選活動表示我的欽佩和感佩。他奉行了我國民主制度最優良的傳統。很明显，從他的身上，我們看到我們擁有一个將在未來歲月中對我們的國家生活作出巨大貢獻的新的偉大領袖。

“我們將來還將有其他的選舉。屆時我們將能再一次提出我們的看法和分歧意見，供美國人民抉擇。在目前，對我們大家最有利的是，加強團結，為了作為這個偉大共和國的公民的共同利益而一致努力。”

在發布這項聲明以後，我向白宮的工作人員和全体閣員以及各部门的負責人發出了一个口頭指示，要他們立即開始準備同艾森豪威尔會晤時所需要的材料。我要求他們就白宮前所面臨的最緊急和最迫切的事務作出全面的報告和繪制相應的圖表。

我迫切希望做到有条不紊地辦理這次政府交接工作，並希望尽一切可能來保證我們外交政策的執行不致中斷。

在这一点上，我沒有理由對即將上任的總統感到耽心害怕，尽管这位總統為了競選的目的曾經令人遺憾地和錯誤地利用了朝鮮這幕悲劇。即將上任的總統原是了解或者說應當了解世界的局勢的。不管怎样，他畢竟曾經擔任過歐洲的盟軍統帥，擔任過總參謀長，訪問過中國、朝鮮和阿富汗，后来他还回到歐洲去組織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武裝力量。沒有誰曾經比他獲得更好的機會去了解整個局勢的情況，特別是他當時曾擔任過那麼重要的職務。

第二天，11月6日，我收到艾森豪威尔將軍下面這封電報：

“白宮
總統

583
“谢谢您的电报。为了有条不紊地办理这次交接事宜，您建议我们俩亲自会晤，我对此谨表示感谢。由于我显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就指派重要助手的问题进行谈话和会商，我敬谨建议，我们不妨把拟议中的这次会晤安排在从11月17日开始的那个星期的头两三天。同时，在您的许可下，我想趁您提出关于派遣代表接交预算事务这一建议的机会，附带提出其他一些人员，以便接洽联邦政府其他几个部门的事务。这样，我们两人之间的会商便会取得最大的成果。我和平洋希望，我们可以向全世界显示，在根本问题上，美国是团结一致的。

“敬悉您的，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佐治亚州奥古斯塔 11月6日
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

就在这一天，我原已派专人送达艾森豪威尔将军一封电，提请他注意我必须作出政策性决定的一些有关国际局势的特殊事件。原信如下：

“亲爱的将军：

“昨天下电给您电报以后，我便同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和预算局的负责人进行了会商。

“在联合国，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真正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这是必须采取积极态度去对付的。我希望您除了提出一个同预算局长接触的人员外，还提出另一个人员，以便他能负责地同国务卿、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商讨这些问题。

“在联合国，有一项关于朝鲜的决议案尚待解决。

“伊朗问题是一个极为微妙的问题，它牵涉到我们同英国的关系。

584
“突尼斯问题也是具有同等重要性的问题，它牵涉到我们同法
国和南非的关系。
“还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问题，关于资源的分配公式还悬而
未决。初步报告可望在11月15日提出。
“所有这些事情都牵涉到重大的政策性问题，而且只有美国总统
才能作出决定，但是，尽管必须在这些问题作出决定，在没有得
到您赞同的情况下，我不愿断然作出决定。这些事情影响到美国
对待自由世界的整个政策。
“如果您能指派一个全权的代表，或者由您自己到这里来参加
这些会议，那就会使这方面的问題获得正确的解决。
“您的真诚的，
“哈里·杜鲁门
“1952年11月6日

“致佐治亚州奥古斯塔
奥古斯塔国民高尔夫球场
美国当选总统
可尊敬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和自华盛顿以来各个总统的历史经验，我
希望能帮助您总统在上任以前熟悉事实情况。

总统职责的繁重和复杂性已经发展到了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
地步。重大的决定是不可能等待的。总统不但必须根据他所掌握
的事实情况作出决定，而且必须根据他对这些事实情况所具有的
经验和所作的准备来作出决定。一个新总统在上任以前没有
充分听取情况汇报，便要来作出一系列关系重大的决定，那将是极
大的困难。我认为，一个离任的总统不去帮助他的后继者承受政
权，不把这一点作为自己的职责，这是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有所疏忽
之处。
这种疏忽可以追溯到我国的早期历史。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是在半夜里离开白宫的，因为他不想在杰斐逊举行就职典礼的那天和他见面。这给杰斐逊造成了困难。但是，同今天的局面相比，他的困难只是一种较小的困难。在杰斐逊时代，我国的人口只有五百三十万零八千人，而在我必须将政权移交给艾森豪威尔的时候，人口却达一亿六千万人。我们现在在的某些县，几乎拥有杰斐逊时代整个国家那么多的人口。

在较近的历史中，塔夫脱总统没有向伍德罗·威尔逊办好政府的移交工作，尽管塔夫脱曾经陪同威尔逊乘车去参加就职典礼。塔夫脱没有把政府部门的任何事情给威尔逊作好安排。

威尔逊也没有向哈定办好政府的移交工作，不过当时威尔逊是一个病人，他在争取挽救国际联盟命运的斗争中受到了打击。

赫伯特·胡佛在1932年选举后不久，曾经邀请当选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到白宫来商讨全国性危机问题。罗斯福去过白宫两次——一次是在11月下旬，一次是在12月。但是他拒绝在实际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时承担责任。罗斯福自己提出的理由是，作为一个当选总统，在宪法上还没有赋予他承担唯有总统才能行使的决定权。除了就职典礼的前两周内由离任的和接任的财政部长非正式地在一起进行工作外，政权并未移交。

1945年4月12日，当我成为总统的时候，交接方面的情况有些不一样。罗斯福是突然逝世的，这就使我不得不尽自己所能地去熟悉情况。当时正在进行一场世界大战，自然要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待一切问题，因为人人都希望赢得这场战争。由于每个人都期望着要赢得这场战争，这就给政府的事业造成了一种生气蓬勃的局面，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移交方面的问题也就成了如何把这一事业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当时全国团结地团结在一起，不分党派的精神始终得以保持。
但是我們現在正面临着不同的局势，我們的国家刚刚进行了
e場令人无比遗憾的激烈斗争。

我坚决认为，我們应当使政府的每一个部門都能有条不紊地
移交给新政权，协助它繼續保持这个国家的生气蓬勃的局面。

11月7日，我收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如下回电，

“佐治亚州奥古斯塔，
1952年11月7日

“亲爱的总统先生，

“由于我坚决相信应当采取两党会商的方式来处理我国的外交問題，因此对于您在11月6日的信中所提出的建議，即由我派出一个代表来参加外交方面某些急待作出決定的问题的討論会，
我特别感到欣慰。不过，由于我一直沒有找到罗致我的顾问和助手們的机会，要指派一位对参加这种会议能起有利作用的人員，还
略需时日。我一定优先注意这个问题，我将最迟在下星期一（11月
10日）以前再同您联系。

“在您的信中，您使用了‘全权的’这个字眼，我猜想，您使用这
个字的意思是希望我派来的代表能够准确地反映我的观点。这一
点我的代表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很自然的是，他的全权也就只能
到此为止，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自己还没有什么全权可言。

“尊敬您的，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当天我拍给当选总统一个电报，

“佐治亚州奥古斯塔
奥古斯塔国民高尔夫球场
美国当选总统
可尊敬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您昨天的电报刚好在我派出的信使抵此前往奥古斯塔以后收到。关于政府各部门的移交问题，我们的想法显然是一致的。我满心高兴地希望能在17日见到您，如果这个日期对您完全合适的话。您如能尽可能早地派出同国务院和国防部的联系人，我将十分感谢。要完成预算的编制工作，并在1月18日前作好准备，将预算送交国会，这是需要很大一部分时间的。我希望您派出的人员尽可能迅速地向预算局提出报告。”

“哈里·杜鲁门”

两天以后，11月9日，当选总统拍来了如下电报：

“佐治亚州奥古斯塔，11月9日
下午五点十分

“白宫
总统

“根据您几次函电中所提到的事情，我谨派往萨救塞州的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参议员作为我个人的联系人，来同政府各部门和其他机构（预算局除外）进行联系，这种联系工作可能对促进新旧政府各项公务的交接工作有所裨益。

“洛奇参议员将在本星期内来华盛顿，到达时定当通知办公厅。”

“我还委派库特律的约瑟夫·道奇作为我个人的联系人，由他本着同一目的来和预算局长进行联系。道奇先生打算在11月12日来华盛顿，他将很快同预算局长接头。”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我立即在一个信封的信封上……草拟了如下回电：

588
佐治亚州奥古斯塔

可尊敬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您提出的两项先生我非常满意。谢谢您这样迅速地将他们提出来。

“总统
1952年11月9日”

另一方面，国务卿艾奇逊曾经向我表示，他对艾森豪威尔提议中的朝鲜之行将给停战谈判和联合国对这一谈判的支持所带来的影响，感到担心。11月6日，艾奇逊给我留下如下一段未忘录。

“我们昨天讨论了关于朝鲜和联合国大会的局势这一紧急问题。

“您知道，在纽约举行的第八届联合国大会现在正面临一项具有空前重要性的问题——讨论朝鲜问题。在经过一段漫长的时期和进行细致的外交准备活动以后，美国和其他二十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开幕以前，提出了一项关于支持联合国军司令部所采取的举行停战谈判的决议案，特别是表示赞同联合国军司令部所采取的关于战俘的不强迫遣返的立场，赞同向共产党人发出呼吁，要求他们接受这个显然是最后阻碍停战谈判达成协议的原则。

“美国提出的决议案中所包含的一些原则，是获得人们的高度支持的，我们希望并期待这一决议案很快就能以绝大多数票获得通过，从而在联合国大会和世界舆论的无比强大的压力下，迫使共产党人在联合国军司令部各项建议的基础上接受停战。但是，由于看到艾森豪威尔将军即将有朝鲜之行，许多代表都摸不准他究竟是否会支持迄今美国在停战谈判方面所采取的立场，因此都似乎不大愿意就这项决议案进行表决。苏联和其他一些‘中立的’代表
团很快就利用这种局面来在联合国大会进一步制造不利于美国的那种混乱和怀疑的气氛。

“在代表团之间，关于艾森豪威尔将军朝鲜之行的可能后果，也存在种种推测。有些代表似乎认为，朝鲜之行可能会影响到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板门店所采取的立场，也可能会改变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谈判人员迄今所持的观点。另外一些人则推测可能会由此而作出与自己有重大关系的重要军事决定。

“如果艾森豪威尔将军认为他可以发表一个声明，申述他的朝鲜之行的目的，并表示支持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目前所进行的各种努力——要是他能这样做的话，那就将无可估量地有助于应付这一严重的局势。……”

我告诉艾奇逊，当艾森豪威尔将军这次来白宫访问的时候，我盼望同他谈谈这个问题。

我希望能确有把握地做到不致于丧失我们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这种国际上的领导地位关系到世界的和平和千百万人民的生命。

自从我宣布不做 1952 年大选总统候选人那天起，我就时常想到如何做到有条不紊地将政权移交给后继者的问题。甚至在民主党与共和党在芝加哥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提出各自的总统候选人以前，我就下定决心，要使双方的候选人都能经常了解我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发展情况。我有着双重目的。首先，我希望使外交政策不受党派政治的影响。其次，由于我们具有领导世界的责任，我希望能确实做到，不管是谁当选总统，都能充分获得有关方面的情报，能为将来处理外交事务作好准备。

因此，8 月 13 日，即使竞选运动还正在进行的时候，我就拍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如下一封电报：

590
“白宫，1952年8月13日

“科罗拉多州丹佛

棕榈旅馆

尊敬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您如能在下星期二（19日）光临参加内阁的午餐会，我将至感愉快。如您希望把您的新闻秘书和其他工作人员一道带来，我也将乐于接待他们。如能在十二点十五分到达这里，我将请史密斯将军和中央情报局向您汇报一下外交方面的情况。然后我们将同内阁阁员共进午餐。之后，如您愿意，我可以叫我的全部工作人员向您汇报白宫的情况，以便使您了解所发生事情的全貌。我将已经和中央情报局作出安排，由该局每周向您提供一次关于世界局势的情报，正如我们向史蒂文森所作的那样。

“哈里·杜鲁门”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拒绝了我的邀请，并作了如下回答，

“亲爱的总统先生，

谢谢您关于由政府某些机构向我汇报外交情况的建议。就我私人来说，我还应对您希望我出席午餐会的邀请表示感谢。

我当前所处的地位是作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以及作为其他希望全国政府有所改变的美国人士的旗手，因此我的职责是继续自由自在地在我认为得当和符合国家利益的时候，公开对现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进行分析。

在当前这个时期，人民正在就我国今后四年的领导人作出决定。这也就是在由共和党提名的人和由您和您的内阁所支持的候选人之间作出决定，而在您拍给我电报以前，您是同这位候选人进行过会面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和在这样一个时期，我觉得我们
彼此所交换的情况，应当只限于美国全体人民众所周知的情况。因此我认为，如果我应您的邀请来参加在白宫举行的会议，那将是不明智的，并将在公众人士的思想上造成混乱。

“正如您所知道的，您提出要加以讨论的问题，都是我多年来所经历过的问題。但撇开这一点不管，一切出现严重危急关头，我是可以立即改变我的这一决定的。而在您来电中，却丝毫没有表明目前就是这种情况。

“承您盛情建议由中央情报局每周寄给我一份报告，我谨表示欢迎看到这些报告。但是，根据我的看法，除了牵涉到美国安全的事情外，美国人民都有自己了解关于国际局势的全部事实。我希望明确这一点，那就是拥有这些报告，决不能限制我凭自己的判断来对外交绸缎进行讨论和分析的自由。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谨复”

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令我很生气。很明显，政客们已经开始向他乱出主张。8月16日，我亲笔给艾森豪威尔写了如下一封私人信：

“亲爱的艾克①：

“如果我使您感到有任何为难的地方，我谨向您致歉。

“我经常想到的一件事过去是今天仍然是如何使我们的外交政策得以继续执行下去。您知道这是事实，因为您曾经参与制定这一政策的工作。

“在美国的范围内，必须停止党派政治。我感到无比遗憾的是，您竟然容许一小撮阴暗怪气的人物来离间我们关系。

① 艾森豪威尔的原称。——译者
“您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希望不要因为这个严重的错误而使这个伟大的共和国受到损害。

“像这样一个伟大的共和国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希望看到这个共和国继续保持下去，不管在世界历史上占据最重要地位的人物是如何想法。

“恳求上帝指引您，赐给您智慧。

“这是这样一个人写给您的信，他一直是您的朋友，也一直是您的朋友！

“真诚的，

“哈里・杜鲁门”

三天以后，8月19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寄来了一封私人的回信，也是亲笔写的。他在信中对我16日寄给他的感谢致意的信表示真诚的谢意。他要求我放心，我对他的邀请和没有使他感到有什么为难的地方。他说，他的感觉是，既然已经卷入这一场政治斗争，那么，一旦他同我以及同我的内阁会晤，就牵涉到是否向公众进行含蓄简明的解释。他继续说，由于在我的邀请电中没有表示国家有什么紧急事，所以他已不再担任任何公职，因此他认为比较聪明的办法是谢绝这次邀请。

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希望再一次表示，他感谢我的邀请和关于由中央情报局每周寄给他一份报告的建议。他说他将通过这些报告经常了解外交方面的情况。他在信中最后向我保证，在外交问题上，他支持真正的两党政治。

11月18日上午，国务卿艾奇逊、财政部长斯奈德、国防部长罗维特和总统助理阿弗里尔・哈里曼同我一道举行会晤，就当天下午将和艾森豪威尔进行商讨的事宜交换了意见。同艾森豪威尔的会晤预定在下午二时举行。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一点五十五分来到白宫办公室，他立即由
人陪同引进我的办公室。随同他一道来的还有参議員洛奇和道奇
先生，但是我請这位当选总统在我們和諸位助手共同举行会议以
前，单独和我商議一下。

艾森豪威尔脸上沒有笑容。我觉得他显得有点紧张。我想使
他感到随便一些。在接触到这次会议的目的以前，我就办公室悬
挂的一些图画和他閒聊起来，我指给他看那个壮丽和巨大的地球
仪。这是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經使用过的地球仪，
波茨坦会议期間我在法兰克福見到他的话，他将这个地球仪送
给了我。我对他說，我打算把这个地球仪給他留在白宮使用。他表
示接受，但他脸上仍然沒有笑容。于是我便开始进入正题。

我对他說，我认为，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有必要举行这次会
議，我想到有两个重大的理由。

我們必須再一次向其他国家保证，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具有一
定的稳定性，在这一过渡期間，必须消除那种惶然不安的情緒。

我說，我希望把話說清楚，我提出的合作和他进行合作，以便
将政权有条不紊地移交给執掌的建议，是一个真正符合国家最
高利益的建议。我的目的不是要設置政治圈套，我沒有这样的打
算，也不是力图推卸我作为总统所承担的任何责任。

我告訴他，按照宪法規定，一个卸任总统在他的后继者举行就
职典礼以前，他都是能行使总统任内所具有的权力和责任的。在1
月20日前，仍然是我的責任，我希望履行这一责任。

我說，我知道，任何当选总统在取得法定权力以前，都是不願
意承担作为总统的任何政治責任的。他們这样作是理所当然的，
也是名正言顺的。

我說我的政府并不希望新政府过早地承担責任。但是，也可
能有某些外交政策方面的問題，使我們不可能贯彻下去，除非其他
国家确实知道我国的外交政策将由新政府继续执行。
这就不是现政府的权力所能决定得了的事。
我說，“我們將告訴您这是一些怎样的問題，我們將欢迎您对
这些问题表示赞同和支持，如果您希望给予这种支持的话。
“但是我們将不强迫您这样做。这个問題必須由您自己根据美
国的最高利益来作出决定。”
我建議当我们到內閣議事室同其他的人一起开会的时候，择
要談談国际上的这些問題。
但在我到內閣議事室去参加会议以前，我想告诉当选总统艾森
豪威尔几件我认为对他了解原子能方面至关重要的事。
我概括地叙述了一下必須由总统来作成决定的原子能問題，
以及总统怎样会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委员会进行工作的情况。
我提醒他注意原子能方面存在的問題，因为这些問題牵涉到我国
同联合王国和加拿大的之间的关系。
我提出应当作出安排，让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戈登·迪安为他
提供有关原子能计划的最新材料。
我們的会晤一共二十分钟，然后我陪同艾森豪威尔将军走进
內閣議事室。
同我們在內閣議事室一起参加会议的有艾奇逊国务卿、罗維
特部长、斯奈德部长、哈里曼、參議員亨利·洛奇和約瑟夫·道奇。
我在宣布开会时作了如下讲话。
“我邀请你们几位先生到这里来和我会談，是为了在 1 月 20 日
以前这一暂的过渡期間，建立一个旨在充分了解我們的問題和
目的的組織形式。
“就我們国家同其他国家的关系而論，我认为在这一期間，主
要的是要避免现政府及其后继者之間生产的不必要的分歧。这有
好几层理由，
“第一，这将向全世界表明，在外交政策方面，我們的国家能做
到政治上最大可能的团结一致。

“第二，这将有助于保持国外人士对美国的威力和声望的尊重，保持我们的盟国和朋友对我国外交政策的信心。

“第三，这将有助于制止克里姆林宫为了离间美国同它的盟国和朋友的关系所作的努力，有助于不让克里姆林宫利用这样一种误解来制造危机。即认为在我们维护自由世界的团结这一目的方面，我们是分裂的或动摇的。

“这也就是我希望现政府尽其所能地进行协助，以便把我们的职责有条不紊地移交给我们的后继者的目的。我认为这样做是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的。

“我希望使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的同事们获得有助于他们接管政府工作的情报。

“我的目的不是企图推卸现政府从今天到1月20日这段期间所采取的行动的责任。直到1月20日为止，我将一直奉行我认为正确的政策，我也将对这些政策负完全责任。

“有些问题，可能对我国的外交政策至关重要，而有待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他的看法。但是这也还是要由他自己来决定是不是愿意这样做。

“我欢迎艾森豪威尔挑选洛奇参议员和道奇先生来同本政府建立联系。我们将同他们充分进行合作。

“如果艾森豪威尔将军希望随时指派更多的代表，我们也将乐于和他们共事。

“我们希望竭尽全力来协助即将执政的政府，一方面我们为当前的问题充分提供背景材料；另一方面，我们也为你们将来必须处理的问题预先提供有关的情报。

“我们的目的不是企图使新政府承担责任或义务，我们没有这种打算。
“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只是力求對局勢提供常識性的探討。”

然后我告訴參加會議的其他人士，我刚才已經同艾森豪威尔
將軍私下作了一次談話。在談到这里的时候，当选总统問我是不是
可以給他一份关于我們这次談話的备忘录。我向这位将军保证，
我很乐意这样做。

接着我递給他两页由財政部长約翰•斯奈德所准备的一份备
忘录。这份备忘录扼要地提出了新政府必须加以处理的某些問題，
是為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顧問們提供有关情报以供他們参考的。它
涉及到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美国的国际地位問題。

我們邀请当选总统的财政顧問們随时莅临财政部，以便听取
该部专职人员的详细汇报。

然后我请艾奇逊国务卿提出某些或者是立即需要加以注意，
或者应当由艾森豪威尔将军认真考虑的问题。

在艾奇逊发言以前，艾森豪威尔将军問我他是否应当把国务
卿提到的问题记录下来，或者是交給他一份备忘录。艾奇逊同意
交給他一份包括这些问题的备忘录。

然后，艾奇逊说，他将谈到一些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目前就
需要采取行动去加以对付，而对1953年1月20日接管政权的新
政府来说，在今后的岁月中都可能具有重大的影响。

为了节省時間，艾奇逊只談到一些最重要的問題。他对艾森
豪威尔将军说，他认为最好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能扩大他同国务院
进行联系的范围，以便能有尽可能多的和为他所信赖的人員得以
熟悉在1月20日以后必须加以处理的事务。

艾奇逊接着谈到聯合國討論朝鮮問題的情况，特別是在討論
到有关战俘問題时的情况。

由于前兩天印度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建議，聯合国大多数国家
的团结有赖于破裂的危险。艾奇逊就这方面的情况作了解释。
英国、加拿大和法国的代表已經表示准备对印度的建议作
某些修改，使它让大家看起来显得顺眼一些，但是这样做事实上就是
要我們放弃我們所坚持的原则，由战俘自由选择。

艾奇逊说，在纽約，正在形成一种极其严重的局势。同維辛斯
基进行辩论的结果，不应当采取强迫手段来遣返战俘的意见已极
为普遍地为人所接受。就连維辛斯基也不願意赞成与此相反的原
则。而中立国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所采取的方针则是
要設法挫败这一原则。在这一点上，它们得到了加拿大人和英国人
的强烈支持，而現在又得到了法国和其他国家人士的支持。挫败这
一原则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把战俘交给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
是不对战俘采取强迫手段的，但是要由它来遣返战俘，而这些人在
被遣返以前，便始终是战俘。如果这些战俘在三个月之内没有得
到遣返，那就把他們交给一个政治委员会去讨论，这种政治会议无
疑会要继续重复同样的程序。

“他們的企图是，”国务卿继续说，“接受关于这一原则的说法，
而使共产党人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目的——遣返战俘。在那个
委员会之下，战俘們除了被遣返外，无法逃避做俘虏的命运。

“如果这样一个建議獲得通过，那就会产生某些明显的后果。
首先，在全世界人的心目中，我們显然已經放弃了我們自己的原
则。挫败这一原则的做法是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其次，我們
无疑将依靠使用武力的办法来反对将战俘交给一个委员会；尽管
这个委员会不采取强迫手段，但是在战俘們得以返回家园以前，他
們将始終只能是俘虏。

“第三，我們将签订一个最不可靠的停战协定，在战俘营里，很
可能会产生严重的麻烦问题。

“陆军将不会在敌军防线上进行任何视察，它将不可能正当地
部署在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下的部队。
“共产党人将在北朝鲜无所约束地修复飞机场，我们随时可能被加上破坏停战协定的罪名，因为关于战俘的建议是含糊的，行不通的，也几乎肯定会引起种种误解。

“因此，纽约方面的局势要求美国采取最强有力的行动，来击败或者改变这种想要使自由遣返原则归于无效的企图。这就牵涉到要使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同我们连成一气的问题。很明显，已经到摊牌的时候了。杜鲁门总统和他内阁的顾问们的态度是明确的。因此，如果有人屈服的话，那只能是那些企图使这个新建议获得通过的人。

“辩论将于明天（星期三）开始。就建议进行表决最早是在星期六，很可能要到下星期。

“艾森豪威尔将军就这个问题发表的关于支持现政府观点的任何声明，都将发挥有助于问题获得解决的最大作用。我已经准备好可能发挥这种作用的一个声明，现在把它交给洛奇参议员。

“我已经通知英国、加拿大和法国的代表，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他们和我们之间的任何分裂，将在美国招致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意味着对集体安全理想的幻灭。这种后果还不限于影响到朝鲜问题，而且会影响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协定。”

下面就是我们建议艾森豪威尔发表的声明：

“关于朝鲜问题的声明（建议）

“美国人民迫切希望在朝鲜获得和平。但是，他们坚决要求签订一个体面的停战协定。这个停战协定必须是一个清楚明白的停战协定，它应当解决一切军事上的问题，不容留下任何可钻空子和招致误解的地方。

“在共产党人手中的我国战俘必须立即归还。在我们手中的共
共产党战俘应当让他们回家。但在我看来，有一点是明显的，即凡是坚决抗拒回到共产党国家去的人，不能把他们赶回去。不能把他们永远当俘虏看待。必须把他们释放，使他们成为自由人。

“我希望联合国大会在这些问题上采取坚定的立场。”

没有人请艾森豪威尔将军立即就我们建议的这个声明作出回答。但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将在星期二见到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届时时同他商量一下有关朝鲜的问题。

然后艾奇逊谈到伊朗的局势，这里的局势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这是伊朗和联合王国之间关于石油的争执。艾奇逊国务卿建议新政府应当密切注意这里的局势，因为很可能会因此而引起重大的麻烦。他认为，如果美国能主动地和单方面地采取某些行动，将有可能促使双方求得共同的解决。

艾奇逊谈到新近法国和德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方面的一些纠葛问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然是艾森豪威尔所熟悉的。

在谈到东南亚的情况时，艾奇逊说：“我们长时间以来就很关心对印度支那采取的行方方针。在法国，很大一部分人的意见都认为这里的事业是失败了，它既耗费法国的财力，也减少了法德两国在欧洲防务方面保持同等地位的可能性。

“从军事观点来看，法国在印度支那是显然缺乏进取心的。印度支那的中心问题是老百姓采取一种骑墙的态度。除非他们获得合理的保证，知道谁是胜利者，而这个胜利者将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他们是不会倒向这一边或那一边的。

“在援助法国方面，我們所已經做到的是为它负担印度支那战争费用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我們已經在美国、联合王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国之间举行军事会议，会议的目的在于从
军事上求得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来对付中国人公然干涉印度支那的这种意外事件，但无效果。现在法国想从政治会议入手来促进这一问题获得解决。

“这是新政府必须作好准备和采取行动去加以解决的迫切问题。”

艾奇逊指出，所有这些外交上的问题，都是在我的命令下就如何把我国的资源用于外交方面所进行的一次调查研究中提出来的。

洛奇先生（他曾为我在这个调查研究工作中效力）说，他了解这项调查研究工作。艾奇逊先生还补充说，这项工作涉及到对这样几方面的研究：如何恰当地把国家资源分配于外战而不分配于国内的重振军备，如何在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之间进行分配，以及如何在地区方面进行分配。

艾奇逊结束他的发言后，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希望能看到国务卿这次发言的一份备忘录。他将对这一备忘录和他建议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声明进行仔细的研究。

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认识到所讨论的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他接着说他准备在这次会议结束以后立即同罗维特部长去会见三军参谋长听取军事汇报。

我曾经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在五角大楼等候，以便就朝鲜问题向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一次专门的汇报。

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我于是就我在白宫已经准备好的一项联合声明的草稿进行了商讨。他请我在两处地方作了一点修改以后同意了这个声明。这次会议在下午三点半结束，接着由白宫发布了下列联合声明：

“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今天在白宫举行了会晤。在他们会谈以后，又同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共同
安全局长以及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助手洛奇参议员和道奇先生举行了会谈。

会谈以后，总统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发表了如下声明，

"我们讨论了在国际关系方面影响到我们国家的一些极关重要的问题。同这些问题有关的情报曾经提供艾森豪威尔将军参考。

"根据我国宪法，总统在卸任以前必须履行其职责，在其后继承者就任以前，不能要求他分担或承担总统的责任。

"我们已就现政府和未来政府之间的联系和交换情报的工作建立一个组织形式，但是我们并没有作出违背我国宪法整个精神的安排。没有人要求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它宣誓就职以前承担总统的任何责任。

"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为了进行合作所作出的安排，将对巩固我们的国家和对国际事务的有利进展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相信，这次会谈和我们今天为了进行联系和新旧政府之间的合作所作的安排，为本国人民本着继往开来和勇于负责的精神来处理自己事务的能力提供了新的证明。"

在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助手离开以后，我很是大惑不解。我觉得，在白宫举行的这次会晤为止，艾森豪威尔将军还没有领悟到摆在在他面前的工作的无比严重性。他在会晤期间所表现的那种态度，我总觉得有些地方无法理解。也许是因为这次会晤使他第一次认识到总统的职位和责任意味着什么。也许由于看到总统所必须应付的一系列问题和必须作出的各式各样的决定而感到担忧害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我倒还将可以了解为什么在整个会晤期间他都是那么一副冷冰冰的严肃相。但也可能是其他原因。他也许不理解政府过去所作所为的真相，因为在党派政治的斗争中，他所知道的都是一些遭到严重歪曲的事实。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一直还在惦念着。